中国通史

修订本

20

白寿彝 总主编

龚书铎 主编

第十一卷

近代前编

(1840—1919)

下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通史

白寿彝 总主编

20



上架建议：中国历史
ISBN 978-7-208-04997-0



全套总定价 1060.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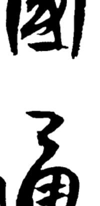
中国通史

20

第十一卷 下册

修订本





中國通史

刘大年题签

白寿彝 总主编

龚书铎 主编

第十一卷 近代前编 (1840—1919)

下册

20

上海人民出版社

扉页题字　刘大年

撰　　稿

艾素珍	白寿彝	蔡景峰	陈东林
陈旭麓	陈　铮	程维枢	戴学稷
丁　蔚	龚书铎	何绍庚	何泽福
黄名长	黄　彦	黄绮文	侯宜杰
李进修	李　侃	林文照	林增平
刘泱泱	罗桂环	穆　渊	桑咸之
苏双碧	史革新	孙占元	汤志钧
王　冰	王道成	王　杰	王俊义
王庆成	王扬宗	王渝生	吴　杰
杨怀中	易春秋	张奠宙	张　藜
章开沅	赵慧芝	郑云山	鍾康模

（按汉语拼音序列）



目　录

丁编　传　记

丁编　传　记

第一章　林　则　徐

第一节　悉心研求经世之学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竢村老人、七十二峰退叟等,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生于清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0日)。父林宾日,是位穷秀才,一生以教读为业;母陈帙,刻苦持家,平日制作手工艺品换取微薄的收入以补助家用。在父亲的谆谆教导下,林则徐从4岁起开始读书,7岁学作文,13岁获府试第一,14岁便考取秀才。此后就读于鳌峰书院7年,20岁中举人。

书院山长郑光策(1755—1804)是当时福建知名的学者,讲究气节,注重经世致用之学,给他以严格教导。还有前辈学者陈寿祺(1771—1834),被称为"研究今文遗说者",他的文章对林则徐有较大影响。

林则徐中举以后,家境仍较困难,不得不和其父一样,假馆于外,维持生计。他曾应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之聘,担任了短时

期的书记(文书),以后又被福建巡抚张师诚招入幕中,司笔札凡4年。他的才华和勤奋,大为张师诚所赏识。在张师诚的帮助下,他学到不少历史掌故和有关兵、刑、礼、乐等方面的知识,为他日后成为一名精明能干的官吏准备了必要的政治和文化素养。

林则徐在21岁后两次去北京参加会试都落选了。到嘉庆十六年(1811)27岁时,他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以二甲第四名,朝考第五名中进士,被选拔为庶吉士。在庶常馆,他致力于研习满文,悉心研究舆地、象纬及经世致用之学。嘉庆十九年(1814),授编修,嗣被派充国史馆协修。此后五六年间,他先后任撰文官、�书房行走、清秘堂办事、江西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和江南道监察御史等职。在近10年的京官生涯里,他利用翰林院和京师丰富的藏书和档案等有利条件,更加努力研究经世之学,仔细综核"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1],一心等待机会实现自己济世匡时的志愿。

第二节 实现匡时济世之志

嘉庆二十五年(1820),林则徐36岁,外放任浙江杭嘉湖道。从这时起到道光十八年(1838)的近20年间,他历任江南和西北、中南地区一些省的司道包括按察使、布政使等职,旋被擢任河东河道总督,以后又担任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虽然其间因故和两次丁忧有所中断,但在仕途上他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使他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能,

①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国朝先正事略》卷25。

实现他平素的主张和宿愿。

林则徐为学"实事求是，不涉时趋"，办事认真负责，讲求实际。他任杭嘉湖道仅一年，"于所属海塘水利，悉心求之"①。道光帝在接见他时特予嘉奖，认为他"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②。此后他奉派接署浙江盐运使，又协助浙抚帅承瀛"厘革夙弊"，整顿盐政，取得了成绩，一些由他制定的规章制度一直被沿用下来。道光三年(1823)夏秋之际，他任江苏按察使时，因大雨成灾，田禾被淹，松江一带饥民人心惶惶，聚众将变，巡抚韩文绮拟调兵镇压，林则徐亲往松江，采用劝平粜、禁囤积、减缓征赋、赈济贫饿等积极措施，解救了濒于饿死的饥民，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暴动。

道光十年(1830)六月，林则徐被任命为湖北布政使，七月出都赴任，十一月调河南布政使，次年七月初又调任江宁布政使。1年多时间里，周历3省。他在这3省中，"多所兴革，凡民生疾苦，吏事废坠，人才贤否，无纤悉不知，知无不行"。在兴修水利、救灾办赈、整顿吏治等方面都作出相当的成绩，"一时贤名满天下"。以致当时"儿童走卒、妇人女子，皆以公所莅为荣。辄曰：'林公来，我生矣'。至以公所行政，播诸歌谣，荒村野市，传之以为乐"③。这年秋天，林则徐又被调任河东河道总督。到任后，认真负责，细心查验，揭露和杜绝了不少弊端，较好地推进了治河工作，使道光皇帝不禁发出赞叹说："向来河工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认为假如所有官吏都能"如此勤劳，弊

①③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24。

② 《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3页。

自绝矣"①。

由于林则徐政绩斐然,道光十二年(1832)被调任江苏巡抚。这一年,林则徐48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从这时到奉派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以前的6年多时间里,前5年他在江苏巡抚任内,曾两署两江总督,后1年多时间里,升任湖广总督。在江苏巡抚任上,他与两江总督陶澍"志同道合,相得无间"②。他们采取了一些"兴利除弊"、"利用便民"的措施,处理了清代财政经济中极为棘手的钱漕、灾赈、水利、盐政、货币等实际问题,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他自奉清廉,办事公正,博得地方民众的普遍好评,被称为"好官""青天"。

在湖广总督的1年多时间里,林则徐面临着当时国计民生中最主要的祸害——鸦片问题。他对触目惊心的烟毒泛滥深恶痛绝,"十余年来目击鸦片烟流毒无穷,心焉如捣"③,坚决主张严禁。早在江苏巡抚任上,由于他的得力措施,禁烟就已取得初步成效。到了湖广总督任内,他更进一步推行严禁政策。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严禁鸦片重治吸食的奏折,五月初七日(6月28日),林则徐亦上《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拟具章程六条,提出成套禁烟的具体办法,并附戒烟药方,建议皇帝颁行各省以资推广。八月初二日(9月20日),他又上了有名的《钱票无甚关碍宜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尖锐地指出鸦片泛滥对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的严重破坏,认为如再不推行严

① 《林则徐集・奏稿》上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25页。

② 魏源:《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行状》,《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11页。

③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71、601页。

禁政策，采取有效措施，“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①，促使道光帝下决心严禁鸦片。他在湖北、湖南两省雷厉风行地展开了禁烟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到他奉命离开武昌赴京觐见前，在湖北所获烟土烟膏即达二万四五千两，收缴烟具数千件②。林则徐不仅厉行查禁，而且立足于劝戒，定以期限，示以戒烟药方，导烟瘾者以自新之路。在严禁吸食鸦片的浩大声势下，许多吸食者纷纷自行戒烟。武昌、汉口各家药店配制的戒烟药，“无家不有，无日不售，高丽参、洋参等药皆已长价数倍”③。当时，“湖广之人，有积瘾三十年日吸一两而居然断去者，断后则颜面发胖，筋力复强，屡试屡验”④。许多吸食鸦片者在戒绝后获得新生，他们的父母妻子都对林则徐表示衷心感谢，“并有耆民妇女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等语”⑤。

无可置疑的是，当道光十八年清廷在全国厉行查禁鸦片前，林则徐是所有大吏中禁烟最坚决而又取得显著实效的突出人物。

第三节　在广东禁烟和抗英

道光年间，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资本主

①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71、601页。

② 林则徐：《致刘建韶》，《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③⑤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98页。

④ 《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3页。

义各国中,英国走在最前头,它为打开中国的大门,不惜以毒品鸦片为敲门砖。英国鸦片商贩在英国政府的支持和纵容下,用走私漏税等卑劣手段把鸦片烟土源源不断地偷运到中国内地。鸦片战争前,英国等输入中国的鸦片逐年激增。嘉庆二十五年(1820),鸦片输入量还是 4000 余箱(每箱重 100 至 120 斤),到道光十八年(1838),便增加到 40200 箱[①]。在道光帝即位后的这 18 年中,中国白银外流约达 2 亿元左右。鸦片大量输入,不仅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和劳动群众的利益,而且也极大地威胁了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引起了统治集团中相当多人的深切忧虑。在银荒兵弱的现实威胁下,道光帝鉴于烟毒泛滥将根本动摇其统治基础,便下定决心采纳了严禁鸦片的主张。

道光十八年九月,道光下令各地加紧查禁鸦片,"其贩运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拿,分别办理"[②],并饬大学士穆彰阿等议定禁烟章程。随即降旨将主张弛禁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由正四品降为六品,即行休致,以示惩儆。九月二十三日(11 月 9 日),召林则徐入京觐见。十一月中旬,林则徐由湖北武昌赶到京城。道光帝在八天中接连八次召见他,表示了对禁烟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对林则徐的倚重。十一月十五日(12 月 31 日),道光帝特颁给林则徐以钦差大臣关防,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在接受重任后没有多作停留。他于道光十八年十一

① 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1 卷,张汇文等译,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239 页附表戊。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1 册,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124 页。

月二十三日(1839年1月8日)自北京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兼程跋涉,于翌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

禁烟,在当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内外上下,阻力都很大。当林则徐在京城受命为钦差大臣时,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彰阿对于林则徐居然得到这样特殊的政治待遇很感到意外,他为自己的权位利益考虑,不禁“亦为之动色”①。事实证明,当时林则徐面临的前景是困难重重的,除“中外柄臣,有忌阻之”以外,如同龚自珍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所预计的:在广州,当地官吏、幕僚、游客、商贾、绅士中,反对和阻挠禁烟者,所在必有;加上英国侵略者和中外鸦片贩子的破坏捣乱,真是艰险横陈。与林则徐接近的“京朝官、故人子弟,亦以边衅为公虑”。但是,尽管这些或者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种种阻力和破坏,都没能阻拦林则徐南行执行他的庄严使命,也没有动摇他禁绝鸦片的决心。他在临行时辞别其座师工部左侍郎沈维鐈时表示:“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②表现了置生死于不顾的凛然气概。以后他在致友人信时也追述道:“戊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③

但是,严禁鸦片,消除烟毒,毕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义事业,它获得全国各阶层的广泛拥护,也取

① 雷瑨:《蓉城闲话》,《鸦片战争》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314页。

②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24。

③ 林则徐:《致叶申芗(小庚)札》,《林则徐书札手迹选》,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

得有爱国心的官吏、将领、士兵们的赞同。林则徐到广州后,在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当地主要文武官吏的积极支持与密切配合下,立足于堵绝来源。面对广东沿海鸦片烟贩猖狂走私的实际情况,他意识到仅仅是严禁吸食已不足禁绝鸦片,要根本解决问题,必须着重于遏制鸦片的输入,查禁走私。这是他禁烟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

在严禁鸦片时期,林则徐主要做了三项工作:第一,调查鸦片走私贸易情况,采取有效措施,限令外国鸦片贩缴出烟土进行具结,并将缴获的全部鸦片予以销毁,主持了虎门销烟的历史壮举;第二,组织各方面人才,搜集和翻译西方国家的书报,积极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军事、法律、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各方面的情况,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文化知识的先河;第三,积极加紧战备,整顿和加强海防力量,增设炮台,训练水师,招募水勇,号召民众组织起来抵御外来侵略,作各种必要的战争准备,并坚决痛击前来挑衅的英军,从而使他成为统治阶级中抵抗派的领袖。

1. 严禁鸦片。

林则徐在离开北京南行途中,抓住各种可以利用的时机,通过各方面的人物,周密地调查了广东鸦片走私的有关情况和查禁鸦片的有效办法。他在行抵安徽舒城时,邀约了曾任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令的田小泉晤谈缉烟问题,虚心听取田在香山县缉获鸦片万余斤的经验;到江西赣州,又将曾任粤海关监督豫堃幕僚的郭桂船接去询问有关粤海关的情况,并通过郭向主编《粤海关志》的梁廷枏索取有关海事的文献图册,其中包括"诸国禀件禁令及沿海要隘、诸县界域道里、墩营炮

械”等资料[①]。因此在抵达广州前，林则徐已初步掌握了外国鸦片贩子与广东海关、水师、行商等勾结舞弊的种种内幕。为了避免外国烟贩等闻风远飏，及早拘拿案犯，行至江西泰和县，他即将在京了解到的京堂科道指名陈奏发交调查的和一路密查暗访到的“所有包买之窑口，说好之孖毡与兴贩各路之奸商、护送快艇之头目”分为最要、次要两种，飞札广东布、按两司，要求迅速予以捉拿[②]。到达广州后几天，他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配合下，查办了历年包庇鸦片走私贪污受贿的督标副将韩肇庆，严惩与外国鸦片贩狼狈为奸的行商。

紧接着，林则徐向外商明确地宣布了他严禁鸦片的坚决意志和禁烟政策。二月初四日（3月18日），也就是他到广州城刚一星期，他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等共同传讯了十三行行商，发给谕贴两件。其一是《谕洋商责令夷人呈缴烟土稿》，其二是《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他在指斥行商历年与外国鸦片烟贩勾结和他们所进行的种种舞弊不法行为后，责令他们转告外国鸦片烟贩遵照规定缴烟并具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指明如能不夹带鸦片，可以“照常贸易”。他庄严地宣告严禁鸦片的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③]但是，那些狡猾的鸦片商开始时多数则怀疑观望，企图拖延时日不了了之，其后又在英国驻广州商务总监督义律的支持和唆使下，负隅顽抗，拒缴鸦片。

---

① 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页。

② 《林则徐集·公牍》，第47—49页。

③ 同上书，第56—59页。

为了打击义律和外国鸦片烟贩的猖狂气焰，制裁他们的不法罪行，以推动禁烟运动的顺利进行，二月初十日(3月24日)，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宣布将停泊在黄埔港的外国商船先行封舱，不准装卸货物，同时撤出广州商馆的全部中国雇员和工人，派兵包围商馆，不让一个外国鸦片商逃走，并断绝商馆内外通信联系、食物和饮水等一切给养，勒令外国鸦片商必须缴出所有鸦片。在林则徐毫不妥协的禁烟措施面前，义律不得不于二月十三日(3月27日)表示同意缴出全部鸦片，第二天呈报承允缴付鸦片烟土20283箱。最后，以英商为主的外国鸦片烟贩一共缴出19187箱又2119袋①，实重2376000多斤，超过了义律承允缴出的数额。从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十五日(6月3日—25日)，林则徐偕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在虎门海滩监督销毁所缴获的全部鸦片，取得了禁烟运动的第一个大胜利。

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壮举，气壮山河，它震撼了中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销烟时不仅“沿海居民观者如堵”，而且外国商人和传教士等亦获准前来参观。林则徐还当场接见了美国商人京(或译作经、金)、传教士裨治文、船长弁逊等一行，向他们宣谕了禁烟政策，说明禁烟不影响正常贸易，要他们“永远不可夹带”鸦片，“专作正经贸易”②。当时，在广州和澳门的外国人“对于钦差大臣究竟如何处理已经呈缴的鸦片，揣测颇多”，他们曾经预言这些鸦片将为林则徐等官员所中饱私吞，“有许多人曾断言中国

①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38页。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343页；《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56页。

人是不会销毁一斤鸦片的。另外有许多人深信即使真的烧烟，大部分鸦片一定会被偷去”。因此他们怀着猜疑的心情，要“亲眼看看销毁鸦片”。前面所说的美国商人京便携带女眷和传教士裨治文、船长弁逊等，驾船由澳门到虎门亲往观察，回去后，裨治文著文刊登在他主编的《中国丛报》上，写道：“我们反复检查过销烟的每一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作更为忠实的了。”① 另一个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他写的《中国总论》一书中也说：“鸦片是在最彻底的手段下被销毁的。……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上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为卓越的事件。”② 这样，林则徐赢得了原先对他抱怀疑态度的外国人的崇敬，甚至连他的对手和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很有意思的是，鸦片战争后几年，在英国伦敦一座专门陈列世界名人伟人的蜡像馆里，特为林则徐塑了一尊蜡像。虎门销烟三十九年后(光绪三年，1877)，清朝派驻英国的第一任副公使刘锡鸿在陪同公使郭嵩焘等前往参观时记载说：“文忠(像)前有小案，摊书一卷，为禁鸦片烟条约。上华文，下洋文。”他为此发表感慨说：“夫文忠办禁烟事，几窘英人，然而彼固重之者，……可谓知所敬。”③ 说明了虎门销烟这一气吞山河的壮举，对于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对世界的深远影响。马克思充分注意到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他写道：“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的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最高潮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

① 《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5—169页。

②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2卷，第504—505页。

③ 刘锡鸿：《英轺纪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

照他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1] 为了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我国人民政府于建国之初在天安门广场建立的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其中第一幅大浮雕便是由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的伟大场面。

在厉行禁烟和虎门销烟的同时,林则徐对从事正当贸易和愿意遵照规定具结的外国商船予以鼓励,欢迎他们进港,与进行鸦片走私及抗拒具结的鸦片烟贩区别开来,坚持"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2],加以争取和分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这个正确的对策却为不明世界大局、顽固自大的道光帝所反对和否定。因而,林则徐不得不执行他所不赞成的不分青红皂白与外国所有商船永远断绝的命令。

2. 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官僚,他非常注意了解和研究外国,主张睁眼看世界。

为了"采访夷情",在到达广州后不久,他即组织了当时很难找到的几个通晓外文的人才,从外国报刊上搜集有关的资料。根据这些搜集到的资料,编译成《澳门新闻纸》。从他到广州后的两年时间里,直到后来被革职,由他组织的翻译西书西报的工作一直坚持下来没有中断过。除《澳门新闻纸》外,他还组织人力根据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大全》之一部分编译整理成《四洲志》。《四洲志》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大观,它介绍了世界五大洲的 30 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概况,成为后来魏源编纂《海国

①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18 页。

②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705 页。

图志》的蓝本。他还组织有关人员摘译西方报刊上议论中国的各种言论资料辑成《华事夷言》；摘译瑞士人瓦特尔（或译作滑达尔）关于国际法的著作，编成《各国律例》；摘译英国人池尔洼的《对华贸易》等书。通过这些翻译成汉文的西方著述和资料，林则徐了解到不少"夷情"，并据此制定了对敌的"控制之方"。林则徐在被革职查办后给新来的靖逆将军奕山所提的建议中还特别强调说：从外国报刊书籍翻译过来的资料，"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①。他还请人翻译西方关于大炮瞄准法等武器制造方面的应用书籍，以学习外国的先进军事技术，改进和提高清朝军队的武器和作战能力，并将这个大炮瞄准法在广东防务中加以应用。

林则徐如此致力于了解"夷情"，目的很明确，是为了"尽得西人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以抵抗外来侵略。这个指导思想也就是魏源后来在《海国图志》中所概括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它对当时和后来人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指导思想划分了林则徐等一些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与一般封建官僚闭目塞听、抱残守缺的保守思想之间截然不同的界限，二者成为鲜明的对照。当时，外国人对此曾评论道："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中国人果真要求切实见闻，亦甚易，凡老洋商之历练者，及通事、引水人，皆可探问，无如骄傲自足，轻便各种蛮夷，不加考究。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亦有他国夷人，甘心讨好，将英吉利书籍卖与中

①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68—69页。

国。林系聪明人,不辞辛苦,观其知会英吉利国王第二信,即其学识长进之效验。"①

林则徐的这种努力了解和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长处,睁眼看世界的精神,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他是道光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崩溃之际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之开风气者。

3. 加强防御,抗击英军侵略。

林则徐在进行禁烟和了解"夷情"的同时,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一到广州,就抓紧海防,积极加强军事上的防备,以对付英国的偷袭和挑衅。

虎门销烟后,义律阻挠英国商船遵照林则徐的规定进行具结,并不时发动挑衅。林则徐针锋相对,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他在亲自视察和调查的基础上,认为"英人非不可制",相信"民心可用"。他在上道光帝的奏折中写道:"臣等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士端人衔恨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② 因此,他在注重水师训练和招募水勇作为辅助力量外,鼓励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就号召"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村庄,或由府县雇觅壮丁以资捍卫"③。他多次发出告示悬赏,奖励人民群众勇敢杀敌,号召沿海居民"群相集议,购买器械,聚合丁壮,以便自卫。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人民各准开枪阻止"④。他赞扬沿海水上

① 《澳门月报》,《鸦片战争》第2册,第526页。

②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78页。

③ 同上书,第881—882页。

④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72页。

居民"渔蜑(疍)各户"勇敢善战,招募他们的水勇进行操练,并进而动员广大民众,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①。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以夜战和火攻骚扰敌船。所有这些都是一般封建官僚所无法企及的。但同时也应看到,林则徐并不可能超脱他的时代和阶级局限,在利用民力御侮这个问题上,他从封建统治阶级利益考虑是很明显的,对这些"渔蜑各户"劳动人民,他是很不放心的,认为他们这些人"贪利亡命","雇用此辈,流弊亦多",不能一概信任和依靠,其所以招募他们为水勇,"系属因时制宜",暂时利用,也是"以奸治奸,以毒攻毒",因此对他们"权宜虽在暂时,而驾驭必须得法"。

道光十九年下半年,中英双方关系日趋紧张,义律多次率英国兵船进行挑衅。由于林则徐、关天培作了周密的防备而未能得逞。继七月二十七日(9 月 4 日)对九龙水师挑衅遭到反击后,九月二十八日(11 月 3 日),义律又以兵舰阻挡英国商船进港具结,挑起穿鼻洋之战。水师提督关天培奋勇督战,击中敌船,清师船亦中弹漏水。此后 9 天内,英舰向尖沙嘴迤北官涌山的清军阵地发动 6 次进攻,都被击退。这些战斗规模都不大,可说是鸦片战争的前哨战,由于林则徐事先的认真备战,中国方面一般都掌握了主动。

十二月,林则徐被任命为两广总督,接替邓廷桢的职务。这时,英国政府为维护其可耻的鸦片贸易,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翌年正月十八日(1840 年 2 月 20 日),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

① 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 30—31 页。

为侵华军全权正、副代表，由懿律率大小兵舰40余艘于六月初抵达广东沿海。由于广州防范严密，英舰无隙可乘，懿律与义律便率舰北上，于七月中到达大沽口外，向清廷进行威胁。七八月间，被英国兵舰吓破胆的道光帝命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与英方进行谈判，表示要治林则徐重罪，为侵略者“代伸冤抑”。八月二十二日(9月17日)，道光帝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办林则徐。懿律等得到上述的答复，率舰南返，等待清政府实现其诺言。

道光帝责备林则徐“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而生出许多波澜”。在封建专制君主的淫威高压下，林则徐不得不自请“从重治罪”①。然而他自信是做得对的。他致书怡良，表示“徐不敢不凛天威，亦不敢认罪戾，惟事之本末，诚不得不明白上陈耳”②。八月二十九日(9月24日)，他在《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中，坚持必须严禁鸦片的主张，申述了“鸦片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的种种理由；驳斥了投降派所鼓吹的“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即战争的发生是由于严禁鸦片的谬说。他指出：“盖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鸦片获利之重。”说明英国发动侵略战争，是为了以此“试其恫喝”，以“冀得阴售其奸”。末了，他要求道光帝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戴罪前赴浙省，随营效力”。林则徐的这些说明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他请求到前线“随营效力”是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的表现，是应

①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2—883页。

② 林则徐：《致怡良》，《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第133页。

当得到支持的。然而，道光帝给他的朱批答复却是："无理，可恶！"、"一片胡言"①。九月初八日（10月3日），林则徐和当时已调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同时被革职查办。

第四节　遣戍伊犁

当林则徐被"奉旨革职"的消息传开以后，"连日铺户居民来攀辕者填于街巷"，他们向林则徐赠送靴、伞、香炉、明镜和颂牌等物品，以表示他们拥戴的心情。从林则徐日记里不完全的记载看，当时士绅商民呈送的颂牌，自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的四五天时间里，即达52面之多，其中题词有："民沾其惠，夷畏其威"、"仁风其沐，明鉴高悬"、"恩留东粤，泽遍南邦"、"明察秋毫，忠心对天"，还有"威慑重洋"、"民怀其德"、"德敷五岭"等。题词高度评价了林则徐的政绩和反抗外来侵略的气概②。这一情况，外国人也看得很清楚。一个参加侵华战争的英国军官在他的《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写道："若说林公虽然不为皇帝所喜，但是他却很受他新近管治人民的爱戴，这对于林来说，只是公道而已。他的最大死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在中国的政治家中，这种情形是闻所未闻的。"③尽管林则徐无辜地受到皇帝的惩罚，但是人民拥护他，公道自在人心。

此后半年间，林则徐和邓廷桢（也奉命回广东等待查办）都以待罪之身滞留广州。这时，林则徐虽然处于无权和逆境中，但

①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3—885页。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372—374页。

③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146页。

仍密切关心时事,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有助于抗英的事。沙角、大角炮台失陷,陈连升等英勇战死后,林则徐与邓廷桢认为"再难坐视",怀着焦急的心情要求琦善分配给他们适当工作,结果为琦善拒绝。虎门失守,关天培壮烈牺牲,林则徐感到无限痛心。他与邓廷桢曾催请琦善发兵增援,仍遭拒绝。他对琦善自毁长城,"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等种种倒行逆施和对英国侵略者一味妥协的行为十分不满。在家信中,他以极度的愤慨沉痛地写道:"此次大败(指虎门之战),皆伊所卖,岂尚能追溯缴烟之事乎?"[1]因此,他积极支持怡良揭发琦善的卖国罪行。义律咄咄逼人的进攻,使他感到担心。为了保卫广州,他自己捐资招募壮勇。琦善被革职押解返京查办后,他又先后向署两广总督怡良和新任两广总督祁塤、靖逆将军奕山提出关于加强战备和要注重调查研究敌情等积极建议,还向奕山介绍造船的经验。但奕山和祁塤都没有很好采纳他的意见。

在林则徐的一再恳求和两江总督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等的再次荐举下,道光帝终于同意派遣林则徐以四品卿衔赴浙江前线协助裕谦抗战。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三日(1841年5月3日)离广州前往浙江,深入到浙东沿海前线镇海一带,积极参加前线的军事防御,考察各地炮台,修筑工事,研制大炮、战船等,并将自己在广东搜集到的和进行研究的制炮技术以及8种战船图样交给龚振麟等技工人员作参考。

然而,正当林则徐在浙江沿海前线积极进行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筹防事务时,这年的五月二十五日(1841年7月13日),从

① 《林少穆先生家信摘录》,《鸦片战争》第2册,第565页。

裕谦那里转来道光帝对林则徐的遣戍命令，革去林则徐的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林则徐在接到遣戍令后的第二天，即离开镇海踏上赴戍的路程。七月初，他在江苏京口（今镇江）会见魏源，委托魏源将《四洲志》加以修订扩充，这便是后来刊行的《海国图志》。当他抵达扬州时，又奉旨折回，赴河南祥符河工工地襄助王鼎办理堵口工程。经过半年的辛苦治理，开封附近的黄河堤岸决口胜利合龙。但道光帝违反了以功赎“罪”的成例，仍命令林则徐继续赴伊犁戍所。

林则徐怀着报国无门的极度悲愤心情踏上戍途。一路上他写下了大量的诗篇，抒发自己爱国忧时的情怀。他深切地关注着东南沿海抗英战争的进展情况，条条战讯都牵动他的心。至于个人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他都把它埋在心底，高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安慰家人“莫心哀”。随着行踪的西移，与战场的距离越来越远，他忧国的情思也就越来越强烈。奕经浙东溃败，他不胜扼腕；镇江失守，他“滋切愤忧”[1]；英舰长驱直入长江后的局势更使他无限悬念。他在致友人信中痛苦地表示自己的心情说：“自念一身休咎死生，皆可置之度外，惟中原顿遭蹂躏，如火燎原，……侧身回望，寝馈皆不能安。”[2] 在抵达伊犁前，途经各地，他必探听战局的发展讯息。他虽身遭放逐，但爱国之心不已。

从河南重赴戍途起，经过将近10个月的长途跋涉，道光二

① 林则徐：《致刘建韶札》，《林则徐书札手迹选》，第34页。

② 林则徐：《致姚椿、王柏心》，《林则徐信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1842年12月10日),林则徐终于抵达西北边防重镇的伊犁戍所。

林则徐在新疆整3年间,前两年主要在伊犁惠远城,后一年则奉命赴南疆各地查勘新垦地亩,奔波于广阔的荒野与戈壁滩。

在伊犁戍所期间,林则徐在起初相当长的时期里,身体很不好,但仍时时关心国事。他通过阅读过期的京报和新疆地方档案资料,了解了不少国家时事和地方上的边防、屯田垦殖、水利、边疆史地等情况。在伊犁后一段时间,他向伊犁将军布彦泰申请捐资兴办惠远城东阿齐苏废地垦务。他的认真负责和精明干练,得到布彦泰的高度赞赏。布在给道光帝的密奏中,认为林则徐是他"平生所见之人"中,"实无出其右者"的"有用人才",要求道光帝予以"弃瑕录用"①。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林则徐被派遣去查勘天山南路诸城所垦荒地。此后将近1年时间,他仆仆风尘,遍历新疆十城,行程兼及天山南北的广袤地域,经他丈量查勘的垦地,不包括后勘的哈密垦地,面积约达70万亩。在此期间,他特地乘赴喀什噶尔之便,专门拜访领队大臣开明阿和换防镇军丰伸了解西部边防的情况,寻找去过境外中亚诸国的"回子","译询卡外各国夷部地土风俗"②,一路上他还注意各族人民的生活,倡导兴修水利,改进推广坎儿井(后被当地人民称为"林公井"),教民制纺车、织布,为新疆各族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赞扬和怀念。

---

① 《鸦片战争》第3册,第512—513页。

② 林则徐:《乙巳日记》,《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页。

通过对边防的了解与实地开垦、查勘，林则徐认识到最重要的是应把垦务与巩固边防密切地联系，也就是说，招民开垦是为了充实边地。他在南疆各地深入基层的实地查勘中，对边疆各少数民族的苦难有了较多的体会，"亲见其居处饮食之苦，男女老幼之愚，实在可怜"①。经过查勘后，他向布彦泰和道光帝建议，将这些垦地发"给回民耕种"。这也是林则徐的筹边思想。正是由于林则徐能较正确地看待新疆的各少数民族，恰当地处理汉族与当地其他民族的关系，促使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友好团结，有利于新疆边防的巩固。

林则徐在被遣戍新疆的3年，通过他勤于调查和对边境的实地了解，对沙俄侵华野心有了感性的认识。他认为："予视俄国势力强大，所规划布置，志实不小。……将来必为大患，是则重可忧也。"②

在度过3年流放生活后，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1845年12月)，林则徐在哈密被"赐环"，以四五品京堂回京候补。进京途中又被授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随即又被正式任命陕西巡抚。在此后1年里，他在甘肃、陕西镇压藏民、回民和刀客的抗清斗争。道光二十七年(1848)调任云贵总督，翌年以办理"回务"有功，被加以太子太保衔，赏戴花翎。在云贵总督任上，他整理了云南矿务，主张"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开采银矿，并对铜矿主张维护"放本收铜"的政策。

这时，林则徐已年老多病，有"决然求退"的想法。道光二十

① 林则徐：《致汝舟》，《林则徐信稿》，第138页。
② 欧阳昱：《见闻琐录后集》卷4，同治四年刊本。

九年(1849)八月,在林则徐的一再恳求下,道光帝批准他开缺回籍,就近调治。九月,他自云南昆明动身,途中经江西南昌稍有停留,于翌年三月初返抵福州原籍。

林则徐回到福州时,正是福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斗争高涨之秋。这一年,英国传教士进一步强行进据乌石山的神光、积翠二寺,激起福州爱国绅民的强烈反对。林则徐回乡后,便与当地士民共同商讨驱逐侵略者的办法。为加强海防抵御能力,他抱病乘船至闽江口的五虎礁和闽安、长门等要塞察看形势,修筑炮台,并向地方大吏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畬提出调兵、演炮、募勇等积极建议。由于刘韵珂、徐继畬等当权者主张对外妥协,与林则徐意见不合。当刘、徐正准备对林则徐反侵略的爱国行动加以"破坏和局"罪名进行中伤时,恰因清廷拟起用林则徐,他们得知风声而悄悄中止。十月初一日(11 月 4 日),林则徐收到新即位的咸丰帝授他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正在兴起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命令。他带病仓促启程,十月十九日(1850 年 11 月 22 日)行至广东潮州府普宁县逝世,终年 66 岁。



第二章　龚自珍　魏　源

清道光年间，中国社会急剧地发生着变化。龚自珍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末世向近代社会转换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的重要影响越来越被日益觉醒的人们所认识。正如梁启超所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盦文集》，若受电然！"① 这一变革时期产生的另一个杰出人物是与龚自珍相齐名的魏源。作为龚自珍的好友和同道，他们生活在同一时期，共受今文经学影响，都猛烈地抨击封建末世的黑暗，主张改革，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龚自珍的特点在于以"但开风气不为师"标榜，对旧的社会现象和士林风气进行了最早、最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其锋芒所向，主要在封建社会内部。鸦片战争爆发后1年，龚自珍即逝世，在新的时势面前，发展改革思想的旗帜便由亲历了鸦片战争硝烟的魏源继续高举。他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开辟了反抗外国侵略、学习西方文明的新方向。

---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54页。

第一节 龚 自 珍

生 平 事 略

龚自珍,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1792 年 8 月 22 日),卒于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1841 年 9 月 26 日)。他出身于一个仕宦的书香门第,祖父龚敬身为乾隆进士,曾任内阁中书、知府、道员等官;父亲龚丽正为嘉庆进士,曾任知府、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等官,是乾嘉时著名训诂学家段玉裁的门生和女婿;母亲段驯,在当时也颇有文名,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龚自珍从小受到经学和举业的熏陶,8 岁便读《登科录》。

嘉庆七年(1802),11 岁的龚自珍随父亲来到京师,先师事建德贡生宋璠,次年又随外祖父段玉裁学习《说文》,接受了严谨的训诂训练。14 岁即考究古今官制,撰有"汉官损益"等文。16 岁开始通读《四库全书提要》。他不满足于私塾之学,曾逃到附近的法源寺去读书。21 岁时,龚自珍由副榜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未几,又随父往徽州任官,参加了《徽州府志》的编撰,负责修撰"人物志",并创立"氏族表",初步显示了才华。然而,他的科举仕途却坎坷不平,27 岁考中举人,以后五次参加会试考选进士,都落榜不第。十几年中,他随父亲升迁调任,往来于直隶、江苏、安徽一带,出入官场,目睹吏治的黑暗腐败、贪污横行。这些人间不平事与他胸中积聚的怀才不遇悒郁心情屡屡撞击,迸发出改革弊

政的思想火花。

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徒攻入皇宫的巨变震惊了朝野,嘉庆皇帝也不得不下"罪己诏",然而同时却把责任推在群臣身上,斥责他们寡廉薄德。龚自珍借此机会,撰成著名的《明良论》,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对君权专制进行抨击。他指出,腐败的原因首先在于皇帝视臣下如犬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耻,只知朝夕长跪,只知追求车马、服饰,以言词取媚君上。在这种制度下,"官愈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益工"[1]。入骨三分的针砭,令外祖父段玉裁阅后又惊又喜,他欣然加墨批点:"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他欣慰地说"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憾矣!"[2] 这一时期,龚自珍诗文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甚至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3]。龚自珍这一时期的政论文章,揭露重于说理,感情重于理性。他需要更深刻的思想理论来阐明自己的思想主张。

嘉庆二十四年(1819),28 岁的龚自珍会试不售,在京师与魏源一起师事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今文经学本是西汉的一个儒家学派,他们以五经推测人间祸福,以微言大义解释统治权术,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在诸经中尤重《春秋公羊传》。古文经学则相反,注重诠释词义、训诂名物,不问政事,在诸经中推崇《周礼》。自魏晋以降,今文经学一直无立足之地。然而到了清中后期,作为对乾嘉汉学埋头考据、脱离实际的一种挑

---

① 《龚自珍全集》上册,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1 页。

② 同上书,第 36 页。

③ 张祖廉纂:《定盦先生年谱外记》,《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648 页。

战，今文经学开始复兴，首倡者为庄存与，刘逢禄是他的外孙和学生。龚自珍从刘逢禄讲述的今文经学那里找到以微言大义、托古改制的形式来阐发自己改革思想的理论根据，他兴奋地在诗中吟道："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①]从此，他便以今文经学家的继承者自许，"但举大谊，不为卮词矣"。

嘉庆二十五年(1820)，龚自珍会试再度落第，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从道光元年起，又任国史馆校对等官职，先后十几年。其间，他阅读了内阁丰富的档案和典籍，勾索旧闻，探讨历代得失，以后又参加《大清一统志》的修撰，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

道光九年(1829)，38岁的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他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绥远疏》，议论新疆平定张格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②]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在历任京官的20年中，龚自珍虽困厄闲曹，仍屡屡上书，指斥时弊，但都未被采纳，甚至被同僚视为"痼疾"。这一时期，他也撰写了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论，如《乙丙之际箸议》、《大誓答问》、《古史钩沉论》等，讥刺封建官僚的昏庸。

---

① 《龚自珍全集》下册，第441页。

② 吴昌绶：《定盦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下册，第618页。

在京中，与龚自珍密切交往的好友，除了魏源等常州学派的师友外，还有不少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如姚莹、汤鹏、张际亮、黄爵滋、包世臣等。他们常常在诗酒酬唱、赏花观月的聚会中抒发自己救时补弊的情怀。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湖广总督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龚自珍极表支持，作《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建议严惩烟贩，积极备战，并表示愿随同南下，共事禁烟。

由于龚自珍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道光十九年(1839)春，他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4日)离京。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

道光二十一年(1841)春，龚自珍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三月，父亲龚丽正去世，龚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夏末，他曾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的战斗。但八月十二日(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年仅50岁。

政治思想

龚自珍的思想在政治、学术、经济、文学诸方面，都起到了振聋发聩、开一代风气的作用，其中尤以他猛烈批判封建黑暗、鞭挞混浊士林风气的政治思想最为激奋。

嘉庆、道光年间，虽已内尽隳坏，但官僚地主、士子文人却还沉醉在“盛世”的迷梦之中，文恬武嬉，歌舞升平。龚自珍以锋利

的笔触，挑破了欺人外皮，无情地挤压着内中的污秽。他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指出，嘉庆以来国势陵夷，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了：

> 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①]

然而，在这样危机四伏的社会里，高踞于统治阶级庙堂之上的又是些什么人物呢？久居官场、出入士林的龚自珍看得很清楚：京师和地方到处充塞着昏庸卑劣之徒，他们只知道升官发财、封妻荫子。这些丑类互相勾结，盘根错节，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恶势力。在他们控制下，“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②]，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幅豺狼当道、正气不伸、鸦雀无声、黑暗凄凉的景象。龚自珍还指出，另一个使人才被压抑、摧残的原因是官场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和专重八股的科举制度。朝廷取士全看代圣贤立言、脱离实际的八股时文，因为内容空疏无以见高下，便用楷法工整作标准。一个有幸得中的士子又面临着以岁月的累积决定升迁的漫漫之路。自庶吉士至尚书，大约需 30 至 35 年，至大学士又需要 10 年，这时身膺重任的一品宰辅“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惫矣”，“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③]，就像官府门口的石狮子，徒有其形，相向而坐。为了表示愤慨，龚自珍毅然将自己耗尽“华年心力”的 2000

---

① 《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106 页。

② 《尊隐》，《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88 页。

③ 《明良论三》，同上书，第 33 页。

篇八股文付之一炬。他尖刻地嘲笑,"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书法也!"在这样的恶势力和制度的束缚下,整个社会各阶层都在倒退,思想窒息,人才枯竭。以至到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的地步①。目睹这种衰世颓败现象,龚自珍晚年悲愤地呼出自己的心声:"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② 他大胆地预言,一场大的动乱为期不远了。果然,在他去世的前后几年,鸦片战争的战火和太平天国的风雷便无情地冲击着这个衰朽的皇朝。

在龚自珍的政治思想中,闪耀着特异光辉的是:揭露、批判腐败现象的矛头已经触及到了君主专制制度。他斥责封建帝王为了树立自己"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淫威,"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③。在这种威胁利诱之下,士大夫养成阿谀奉承的习气,"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④因此,政事日坏,人才日鲜,也就是必然的了。龚自珍的揭露,实际上已把社会黑暗的根源归结于封建君主专制。尽管他的认识还不具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的要求和意义,但他这种大胆淋漓的揭露,对后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每每有启迪作用。

龚自珍是一定时代和社会阶级的代表人物,时代和历史的进程,向中国封建社会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作为这种时代社会要

① 《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6页。
② 《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下册,第521页。
③ 《古史钩沉论一》,《龚自珍全集》上册,第20页。
④ 《明良论二》,《龚自珍全集》上册,第31页。

求的反映，龚自珍在揭露和抨击衰世弊政和士林风气的同时，还提出了救时补弊的改革主张，他大声疾呼，“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奈之何不思更法?”并提出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淘汰冗员，将八股改为策试，加强大臣的权力，兴修水利等等。但是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使他突破封建制度的门槛和地主阶级的局限，只好把这一切寄托在希望出现的圣君身上，劝说皇帝自动改革。由于他的企求仍建立在补救旧制度之上，因而其改革思想较之对旧制度的揭露和鞭挞颇为逊色，一系列具体主张也不外乎前人早已唱过的老调。

面对“外夷”强陵的时势，龚自珍产生了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和林则徐、黄爵滋一起主张严禁鸦片；建议林则徐赴广东禁烟，“火器宜讲求”，“多带巧匠”，“修整军器”。并申明这场反侵略自卫战争的正义性质：“此驱之，非剿之也”，“此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而不是畏缩颟顸之流诬蔑的“开边衅”[①]。龚自珍对鸦片战争的发展态势很有预见，据记载，直隶总督上奏请裁撤天津水师，“谓无所用，岁计费且数十万，上可其奏”。龚自珍闻知，急上书万言，“言不可撤状”，但不为所用。两年后，英国军舰果然北上攻打天津，“人始服其先识”[②]。龚自珍对西北边疆也十分关注，曾协助历史地理学家程同文、徐松修撰《会典》“理藩院”一门，在研究西北山川地理、部落源流的基础上，较早地提出在新疆设省，开垦移民，防止外国殖民者入侵。龚自珍的早逝，使他的抵御外侮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内容中未能得到进一步

---

① 《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70页。

② 《龚自珍研究资料集》，第342页。

发展。

学术思想

龚自珍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利用了“今文经学”这个旧的形式，使之与“经世致用”相结合，成为他关心国计民生、批评时政、改革社会的武器。

龚自珍并非清代今文经学兴起的首倡者，他之前已有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几代学人。庄存与生活在封建危势渐露的清中期，再度提倡汉代应变的公羊思想，企图以此调整旧的社会秩序，但他主要还是一个经学大师，与现实政治尚保持一定距离。刘逢禄虽然强调何休的“微言大义”，使公羊学逐步和实际相结合，由此可能引申出改制变革的新意，但他们都未脱出汉代以来今古文经学传统斗争的窠臼。龚自珍自幼吮吸的是清代占统治地位的乾嘉汉学浓郁空气，但面临腐朽颓败的社会现实，他对社会的认识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从而对今文经学的《春秋公羊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封建末世的社会危机感和挽救这种危机的责任感，使他毅然离弃和抨击脱离现实的考据汉学和宋明理学，“言生平恶《周礼》”，指斥“著书只为稻粱谋”，“至竟虫鱼了一生”的迂腐学风。他认为，道和学、治，本是一体。得天下者为王，佐王者为宰、卿大夫，交租税者为民，民之有识者为士。王、宰、卿大夫与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①。这种把经学和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认识，在

---

① 《乙丙之际箸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册，第4页。

清代今文经学中是一个新的发展。同时,龚自珍对汉代以来旧的今文经学也进行了改造和批判。

龚自珍十分强调人的作用,他批判董仲舒"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的公羊学天人感应论,指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而人也是"自造","非圣造,非天地造"①。极力主张破除对自然现象的迷信和神秘观念,反对用今文经学对人间灾异作穿凿附会解释:"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建议根据钦天监中历来彗星运行的记录档案,研究其规律,撰成一书,"可以摧烧汉朝天士之谬说矣"②。他打破了由来已久的今古文经学森严门户的拘束,吸收了"六经皆史"观点,认为《易》、《书》、《春秋》等,都是"卜筮"、"记言"、"记功"之史,从而将今文学家眼中涂有神秘色彩的诸经,还原为社会历史的记载。龚自珍虽然以服膺今文经学相标榜,但实际上他与汉代董仲舒诸人已相去甚远,既不主张寻章摘句、考据训诂的汉学,也不主张以谶纬迷信附会臆说的公羊学,而是用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去阐发经世致用思想。在这个宗旨下,他又提出了朴素的辩证思想。

龚自珍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③。制度和朝代一样,都是新旧更替,不断变革的,已经陈旧过时了的制度、政令如果不自行改革,就必然被新势力强制改革所代。他引申了公羊三世说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把社会历史解释为"治世——乱世——衰世"三

① 《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第12页。

② 《龚自珍全集》,第346页。

③ 《上大学壬书》,《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19页。

阶段。从经世致用思想出发，他明确指出，当时的社会是“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必须对种种丑恶黑暗的现象和制度予以揭露和改革。但是，究竟怎样改革，他却找不出明确的答案。尽管龚自珍是那个时代、那个营垒的佼佼者，但他毕竟要维护封建阶级的根本利益，这种立场的限制，就使他的辩证思想仍然跳不出封闭的循环的圈子。他说：“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只承认现象的变异而否认质的变化，因此事物最终还要回复到原始的状态。这种认识反映在政治态度上，即是一方面对腐败现象嫉恶如仇，一方面又主张“风气之变必以渐也”。在抨击腐恶、开通风气斗争中表现为勇敢的猛士，在传统儒学和封建根本伦常面前却表现得迷惘和怯懦。这样，笃信今文经学的龚自珍，晚年又“犹好西方（佛教）之书”，校雠佛经，撰《龙藏考证》等。这种矛盾交织的现象，说明他在经世致用、开辟新路的挫折中，“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只好向域外去寻求一些精神安慰和解脱了。

经济思想

龚自珍的经济思想，是其政治思想在经世致用过程中，思索衰世之源和寻觅救世之方的反映。

他看到了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严重贫富不均现象，揭露了清统治者对人民血汗的无止境榨取，谴责开捐例、加赋、加盐价等政策是“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痛斥官僚大吏只知以苛捐杂税中饱私囊，致使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农村经济严重破坏，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透过种种社会经济凋敝现象，龚自珍力图从社会财

富分配方面去寻找动乱之由。他在《平均篇》中指出："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1] 这里，他能够觉察到封建社会的兴衰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否平均，并且觉察到由于分配不均而形成的贫富悬殊和社会矛盾，力图从经济根源上寻找皇朝治乱和新旧更替的原因，这无疑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他对造成严重贫富不均现象的进一步分析，则陷入了主观意识决定论，他把这种现象归结于"人心亡，世俗坏"，因而官吏贪污无忌，商人"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不可能揭示封建制度的本质。所以，龚自珍头脑中的经济改革主张只是调整贫富悬殊的较大差别，保持"小不相齐"，防止"大不相齐"，即"富贵者，天所以待王公大人君子"，统治阶级按其等级地位，应该占有较多的财富；"贫贱，天所以限农亩小人"，被统治阶级居于贫贱也是合理的，企图用调和的办法去缓和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具体到土地分配上，他在《农宗》一文中提出以西周宗法制度来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办法，将宗法组织中的成员分为"大宗、小宗、群系、闲民"4 个等级，按此进行土地多寡的分配。这种以复古的办法来解决农民丧失土地、沦为流民的现实，显然是虚幻的。龚自珍一方面对土地兼并的积弊强烈不满，一方面又苦于公羊学的空洞，在古代经书中既找不到解决实际问题的典章制度，在自己头脑中又设计不出重新规划社会秩序的有效方案，于是也像以前的今文经学家一样，只好从古文经《周礼》中向回归上三代社会那里去寻找出路。然而这是一条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不通之路。

---

① 《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78 页。

任何先进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是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反映。尽管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但到了龚自珍时代，商品经济在中国，特别是在江南地区仍然有了某些发展。晚年的龚自珍，也由早期重农抑商思想开始向较为重视商品经济转化。他改变了商人是破坏社会经济因素的看法，提倡发展蚕桑木棉等商品原料生产，主张“且仿齐梁铸饼金”来抵制外国银元，并建议林则徐在抵御外侮的同时，发展有限的“互市”。当然，在中国社会自然经济受到外来冲击之前，龚自珍的经济思想内容是比较浮浅的，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也是出于直观的现实感受。他的建立在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原则下的平均思想，其积极意义在于尖锐地揭露了这种制度造成的“贫者日相倾，富者日愈壅”的社会现象，并从经济上寻找社会危机的原因，向统治者发出了“丧天下”的严厉警告。

文学成就

龚自珍的文学成就，如同其政治思想是鸦片战争前夕这个变革时期的产物一样，也以新的内容和风格在封建末世独放异彩。

他写成于南归旅途中的《己亥杂诗》，是中国诗史上罕见的大型组诗，总结了几十年来师友交游、仕宦沉浮、著书倡说的经历，也是对沿途所见社会凋敝、民不聊生景况所发的感慨。他的诗有意境清新、词语瑰丽、高言快语的特点，不过使他的许多诗作不胫而走、备受推崇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它对社会腐恶现实的无情鞭挞，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和激赏。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①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津梁条约遍南东,谁遣藏春深坞逢?不枉人呼莲幕客,碧纱橱护阿芙蓉。②

这些慷慨、悲愤、掷地有声的炼句,深深地打动了迷惘而又不甘沉溺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意绪,喊出了久被压抑的人们的心底之声,因而使他的诗歌从清代诗坛王士禛"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理说"等专重形式的樊笼中冲跃出来,被后世誉为"三百年间第一流"。龚自珍的诗歌在艺术和思想、形式和内容的融合上,展示了一个新的境界,成为晚清现实主义诗歌的开创者。

龚自珍生活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他的思想在政治、学术、经济、文学等方面都反映出了对当时人间痼疾的强烈不满和深沉忧虑。经世致用、治国安邦的抱负,促使他以开通风气、扭转颓世为己任,然而,重重的羁绊,黑暗的闸门,又使得他徒有雄心,无所用事;阶级的局限和传统思想的缠绕,更使得他实际上提不出改革时弊的有效办法。这种有志救国、无力回天的苦恼和四处碰壁仍奋击不止的生活实践,用他自吟的两句诗概括就是:"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还没有等到鸦片战争结束和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这

① 《咏史》,《龚自珍全集》下册,第471页。

② 《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下册,第509、517页。

位近代改革的先驱者就与世长辞。

第二节 魏 源

广泛问学

魏源，原名远达，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晚年因信佛，自称“菩萨戒弟子魏承贯”，湖南邵阳人，生于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794 年 4 月 23 日)，卒于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 年 3 月 26 日)。其父魏邦鲁曾任江苏海州惠泽司巡检、宝山县主簿等地方佐杂官，管理刑名、钱粮、水利等事务，受到历任布政使林则徐、贺长龄、梁章钜和巡抚陶澍的好评。这对魏源后来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也使他能较早地结识一批当时较为注重国计民生的疆臣。

魏源七八岁时入私塾学习，读书十分刻苦，每至通宵达旦仍不释卷，自幼沉默寡言，常独坐深思。15 岁时考中县学生员，开始潜心研习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的心学。嘉庆十八年(1813)，他 20 岁，举为拔贡。次年，又随父亲魏邦鲁入京。在北京，他被延馆于侍郎李宗瀚家，结识了京师当时各种学术流派的名士，先随胡承珙学习汉学，又师事姚学塽究心宋学，同时仍常常向在湖南时选拔他为贡生的座师汤金钊请教王阳明心学。广泛的求学，刻苦的钻研，使魏源很快名满京师，名士醇儒相与交纳。嘉庆二十四年(1819)，他考中顺天乡试副贡生。道光元年(1821)，再赴顺天乡试，却仍被抑置副贡生。这个时期，魏源一面为自己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一面也在不断探讨治国安邦的学问。

讲求经世致用,批判时弊

道光二年,魏源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中顺天乡试举人。不久,他赴古北口受馆于直隶提督杨芳家,并考察山川关隘。道光五年(1825),他被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为幕宾,编辑清代经世致用文章集大成的《皇朝经世文编》,"遂留意经济之学"。巡抚陶澍是一个注重国计民生的名臣,也常常和他商筹海运水利等政事。

魏源少龚自珍两岁,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岌岌可危的衰世同样刺痛着他的忧国忧民之心。作为幕宾,通过治民理案,得以体察社会,从而使他对社会危机和官场积弊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痛感时世腐败的同时,魏源开始思索世道日衰的原因所在。他在京求学之时,正值清代今文经学崛起,便拜在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门下,研习《公羊春秋》。在那里,魏源结识了龚自珍,两人都为刘逢禄所激赏,常常在一起切磋古文辞,探讨实学。

道光六年(1826),魏源与龚自珍同赴礼部试。刘逢禄适为会试同考官,得浙江、湖南两卷,"经策奥博",认为必是龚、魏,极力推荐,但他们还是落第了。刘逢禄感慨万端,于是作《题浙江湖南遗卷》诗以表痛惜,但从此世以"龚魏"并称二人。

同龚自珍一样,魏源对乾嘉之际沉迷于训诂考据、繁琐无用的学风十分反感,他尖锐批评道:"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争治训诂音声,爪剖釽析",他们将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的经世致用之学摒于经学之外,却以

专事寻章摘句来"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①。为了纠正这种学风,并从根本上否定这种风气赖以流行的护身符,魏源从今文经学的角度对一些被清代汉学家奉为神明的经典提出大胆质疑。在《诗古微》中,他指斥《毛传》和大小序皆系晚出伪作;在《书古微》中,他认为马融、郑玄之学都出于伪作的杜林《漆书》,提出古文《尚书》是否存在尚有疑问,被视为"阎百诗以后第二重公案"。魏源认为,《六经》并不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只是"网罗放失,纂述旧闻,以昭代为宪章,而监二代之文献"②。既然上古三代与后世的天地人物都不同,法令和制度也都随之发生变化,那么就不能泥守古法,必须变革。他举出了从唐代租庸调至两税法,再到明代一条鞭法的一系列赋税制度变化,来说明"变古愈尽,便民愈甚"③,改革越彻底,进步就越显著。这种建立在历史进化论之上的改革思想,较之龚自珍又深入了一步。经学发展到龚、魏手中,开始摆脱了繁琐无用的学风,逐渐与通经致用、改革时弊结合起来。

魏源还猛烈抨击了使士林醉心于功名利禄的八股科举制度,他讥讽这种考试的结果,"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的"科举兔册"④之人来遍任六官之职,治理四方之民。针对嘉道时期专以楷法工整取士的科举制度,他在诗中辛辣地嘲笑:

小楷书,八韵诗,青紫拾芥惊童儿;书小楷,诗八韵,将

① 《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358 页。

② 《国朝古文类钞叙》,《魏源集》上册,第 228 页。

③ 《默觚下·治篇三》,《魏源集》上册,第 48 页。

④ 《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 37 页。

相文武此中进。……从此掌丝纶,从此驰羁铎,……从此考枢密,从此列谏官,尽凭针管绣鸳鸯。……雕虫竟可屠龙共,谁道所养非所用!①

尽管他厌恶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但又只能通过这个途径获得一个官职,来实现自己经世致用的抱负。因此,他仍不断地参加会试。

参与盐务、漕运、治河的改革

道光八年(1828),魏源以举人捐资为内阁中书舍人,在阅读内阁史馆如"掌故之海"的典籍档案中,他积累了大量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为以后著史理政奠定了基础。道光十一年(1831),魏源以父丧居乡3年。赏识魏源经济才干的两江总督陶澍,延请魏源入幕协助改革盐政,直至鸦片战争以后,魏源在盐务、漕运、治河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并进行具体的尝试和努力。

清代盐的生产和运销,一直由官府垄断。长期以来,盐官和官准的场商、运商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特权集团。官僚管理的亏损,对皇室的报效,贪官奸商的中饱,都转移到盐的生产者、消费者身上,造成盐价昂贵、产销停滞的严重积弊,致使私贩蜂起,清廷虽以严刑缉私,也缉不胜缉。魏源清楚地看到了垄断的症结,提出改行"票盐"制度的方法。由商人向官府交纳一定的盐税后,官方便发给盐票,凭盐票可以自由买盐、自由贩卖。这样减

① 《都中吟》,《魏源集》下册,第675—676页。

少了中间环节各级官吏的层层盘剥，“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1]，所以盐价降至一半而商人仍有利可图，私贩自然不禁自灭。魏源的主张被陶澍采用后，果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每年“倍额溢课数十万”[2]。此后的历任两江总督陈銮、林则徐、璧昌、李星沅、陆建瀛等，遇有盐政要务，都常来与魏源商议。

水灾频仍，黄河泛滥，是清朝统治者深感头痛的问题。“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可是河患依然如故。魏源认为，河患水灾有来自自然的一面，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祸，即治河官吏的侵蚀河工经费、地方豪强的垄断水利。所以，“欲兴水利，必除水弊。除弊如何？曰：除其夺水夺利之人而已”[3]。魏源还认为，过去治理黄河的方法也不对头，“下游固守，则溃于上；上游固守，则溃于下”[4]。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济于事。他主张因势利导，使黄河人工改道，北流入海。指出这是迟早会发生的自然趋势，而以人力预先改道为上策，如果等待黄河一旦崩决，自然改道，则后果不堪设想。魏源的这两种见解，在当时都无法实行。官吏贪污是封建官僚制度的必然产物，无法根除。而在道光咸丰衰世，即使一次小的整顿也困难重重。黄河人工改道，工程浩大，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清廷也无暇及此。鸦片战争以后，魏源在出任兴化知县等地方官时，又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在小范围进行了水利治理。兴化境内临近运河和高邮、洪泽二湖，时有涝灾。

---

① 《淮北票盐志叙》，《魏源集》下册，第 439 页。

② 《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铭》，《魏源集》上册，第 329 页。

③ 《湖广水利论》，《魏源集》上册，第 391 页。

④ 《筹河篇上》，《魏源集》上册，第 367 页。

一次,高邮湖将决,他亲率民卒护堤保稻,"冒风雨伏堤上",以致"目赤肿如桃",终于保住了大堤,百姓遂将当年收成称为"魏公稻"①。治水过程中,魏源撰写了筹河、水利、堤防等文多篇,见解虽好,然而生逢末世,终不为所用,使他的才能得不到发挥。魏源临终前二年的咸丰五年(1855),黄河果然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于铜瓦厢大决口,改道入海,给下游人民造成惨重损失。

漕运,是当时又一积弊。自明清以来,南粮北运一直通过运河,朝廷设有漕运总督等一系列官员进行管理。至晚清,由于各级官吏把持盘剥、地方豪强敲诈勒索日形严重,弄得怨声载道。魏源看到漕运之弊已是积重难返,便主张改为海运,由商人承办,不再以官府垄断。他指出,海运不经河闸,不经层层中饱和馈送,有四利、六便,对国家、人民、吏治、商人均有好处。他进一步指出,商人办海运,可以把江浙之货附于漕船,运往北方,将促进南北物资交流,使物价下降,繁荣国内的商业。道光五年(1825),魏源在巡抚陶澍幕中,还实际参与了筹划海运活动,撰有《筹漕篇》、《道光丙戌海运记》等文,并在《皇朝经世文编》书中对这一关系国计民生和吏治的重大改革予以赞扬。

道光十五年(1835),魏源为了奉养母亲,在扬州买了一所庭园,取名"絜园",内有"古微堂"书屋,他在此写成了许多诗文,集为《古微堂集》、《古微堂诗集》。在魏源宏富的著述中,还有阐发"微言大义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的《诗古微》、《书古微》、《公羊春秋论》、《董子春秋发微》,探讨学术、评论政治的《默觚》,以及《元史新编》、《禹贡说》等。

---

① 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集》下册,第956页。

综观鸦片战争以前魏源的思想和活动，主要是抨击封建末世的黑暗现实，与龚自珍一起以今文经学的形式，倡导关心国事民瘼，主张改革社会政治风气。他继承明末清初经世致用崇尚实学的思潮，提出了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主张和具体措施，但思想范畴仍未超出探掘阐发古代经书“微言大义”和“经世致用”的框架。

参与抗英和编撰《海国图志》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正在扬州治河的魏源赶至宁波前线，在钦差大臣伊里布军中参加审讯俘虏的英军军官安突德。从其口供中，魏源对西方的人文地理有了一些了解。次年，他结合其他英俘的口供，撰成《英吉利小记》，后收入《海国图志》。

道光二十一年，魏源在两江总督裕谦幕中筹办浙江防务。裕谦是一个坚决主张抵抗侵略的疆臣，但部下将领余步云等贪生怕死，清军武器装备又极为落后，终使浙江海防失守，裕谦自杀。亲历了这一抵抗英国侵略战争的魏源，看到了英军的残暴行径和坚船利炮，看到了清朝统治者张惶失措、昏聩庸懦的丑态，“羯虏云翻覆，骄兵气指挥。战和谁定算，回首钓鱼矶”。他也看到了沿海军民忠勇抵抗、不怕牺牲的气概。从此，魏源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魏源从事实中认识到，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统治者的昏庸腐败，指出了他们对世界情势的懵懂无知、虚妄自大而又畏敌如虎：“承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破一岛一省震，

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冯河暴虎者虚骄而无实。”① 他希望清统治者励精图治，整军备武，以求长治久安。为了振奋人心，鼓舞抗击强敌的士气，魏源根据自己任内阁中书舍人以来积累的大量资料，发愤撰写了《圣武记》14 卷，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完成。书中历述了清初以来的武功方略，讨论了兵制、战术等具体问题，反映出他要求富国强兵的强烈爱国主义热情。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林则徐被遣戍，从重发往伊犁，途中经过镇江。林、魏当年在北京即志同道合，意气相投，此时相会，两人感慨时事，推心长谈。林则徐把他在广东抗英时所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和粤东奏稿及有关西方枪炮、地理图样交给魏源，嘱“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编撰一部《海国图志》。魏源果然不负重望，他结合历代史志及明以来的岛志和近日所得“夷图、夷语”等大量资料，于道光二十二年底编成《海国图志》50 卷，4 年后增广至 60 卷。咸丰二年(1852)，又补充以葡萄牙人玛吉士《地理备考》、美国人高理文《合省国志》等，扩展为 100 卷，予以重刊。《海国图志》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经济、文化、军事等内容的新书，它的刊刻问世，对国内有识之士开拓眼界，了解世界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咸丰八年(1858)，兵部侍郎王茂荫曾奏请将此书广为刊印，使亲王大臣每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作为教材学习。然而酣嬉悠游和麻木僵化的王公大臣、贵胄子弟们已经失去了接受任何新鲜事物的能力。虽有王茂荫煞费苦心的推荐，《海国图志》在中国上层统治者

① 《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 187 页。

中，还没有达到在日本的受重视的程度。自道光三十年(1850)第一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至明治维新前已传入十数部，被日本学人摘译翻刻达22种版本以上[①]，对日本的维新开通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抵御外侮的思想，“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②]。驳斥了“夷兵不可敌”的畏敌观点及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的谬论，并胪列了“师夷长技”的具体内容和措施。“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不仅把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推向了有更广泛代表性的抵御外侮、学习西方的近代爱国主义思想新高度，而且开始打破了长期的思想封闭状态，使魏源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呼号者和改革维新思想的先驱者。

魏源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认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认为师夷是为了制夷，而认真研究夷情是制夷的重要条件。“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③]。这是对长期以来清朝闭关政策和陈旧国防观念的否定和批判。同时，他把师夷作为制夷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也泾渭分明地表现出与一味求和、以媚夷求苟安的妥协派的根本区别。其次，魏源明确地指出，夷之长技是“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所谓“长技”，“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利民用”[④]，而不是什么

① 黄丽镛：《魏源年谱》，第228页。
② 《海国图志叙》。
③ 《海国图志》卷37。
④ 《海国图志》卷2。

稀奇古怪的不祥之物。他肯定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是人类生产进化的结晶，嘲笑清统治者中的顽固分子长期以来颟顸蒙昧。最后，魏源具体地指出了要学习的西方长技内容"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是在反侵略战争失败中认识西方的，而战争失败的具体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缺乏"夷之长技"。因此，他把加强反抗侵略的军事手段作为当务之急，把学习西方的认识焦点凝聚在西方军事工业技术上，是很自然的。

魏源提出了一系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具体措施。(1)买进西方坚船利炮，并在国内设厂制造。起初，他以为只靠买进船炮，就可以掌握长技，后来进一步认识到必须自己生产才不受洋人牵制，因而具体提出建议：在广东虎门外设置船厂、火器局，延请法国、美国等"夷目"分携工匠前来司造船械。如此，"我有铸造之局，则人习其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2)发展"自修自强"的对外贸易，学习西方技艺，利用西方各国之间矛盾。魏源认为，对外贸易如果没有鸦片进口，是有利于中国的。他以道光二十七年(1847)情况为例分析，外国输入中国的货物(不包括鸦片)值银"二千十四万八千元"，而中国出口之货值银"三千五百有九万三千元"，"使无鸦片之害，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①] 在进口物品中，他主张进口大米的同时，进口武器及发展工业所需的"铅、铁、硝"等物，也准外商以"艘械抵茶叶湖丝之税。"(3)积极培养掌握西方长技的人才。魏源认为中国也应该像西方那样，鼓励学习科学技术，改变单纯以科举词章取士的制度。如有能造西方战舰、火轮船、大炮、水雷等

① 《海国图志》卷2。

新式器物者，即可给以科甲出身。(4)设立译馆，翻译介绍西方书籍。魏源说："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1]他十分称赞林则徐在广东设译员翻译《澳门月报》等外文书报的举措，自己也非常注重西方著作。他在《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叙》中说：西方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应该积极地向他们学习。据统计，《海国图志》一书中魏源引用的西方著作就达 20 种之多。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早期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冲击了自明清以来唯我独尊、视外国为"夷狄"，视中外交往为"来贡"的蒙昧传统，大胆提出"师夷"的口号，开创了吸收外来先进文明的风气。尽管这种吸收和学习在魏源身上只达到对西方部分物质表层的认识阶段，但他开创了为拯救中国、抵抗外国侵略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河，这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思想，在中国近代相当长的时期中，一直为各个阶层的先进人物所遵循。如王韬所说："师长一说，实倡先声。"[2]

值得注意的是，在魏源为抵御外侮而激发的新思想中，朦胧地闪现着一些代表近代资本主义要求的思想光芒。他提出的建立新式军事工业的主张，也包含有建立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因素。他看到军事工业的兴起，必将刺激国内商业的勃兴和新技术的传播，对近代工业产品必有蜂起的需求，"盖船厂非徒造战舰也。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因此，军事工业除造战舰外，

---

① 《海国图志》卷 37。

② 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02 页。

其他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等等,“凡有益民用者”,都可以制造。在军事工业生产民用品的基础上,他终于提出“沿海商民有自愿仿效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的主张①。在鸦片战争硝烟散去不久的几年中,魏源的眼光已超越了林则徐等同时期单纯以“制夷”为目的的先进人物,开始发出了中国近代新式工业的诞生呼喊。在《海国图志》中,魏源还通过介绍欧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隐约地表达了自己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憧憬。他说,美国总统以四年为一任,期满更代,“总无世袭终身之事”;选官举贤自下而上公举,“可不谓公乎?”② 魏源的介绍和推崇,一直影响到几十年后的戊戌维新思潮,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发轫。当然,在魏源提出这些主张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土壤。他朦胧地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某些长处,但还不能设计出近代中国的政治蓝图。他的基本立场仍是立足于补救封建制度。尽管他比龚自珍较多地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在政治见解上也超过了龚自珍开出的“古方”,但在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弊害方面却比后者要含蓄、缓和。如果说龚自珍是诅咒和鞭挞封建专制制度的勇士,那么魏源就是改革弊政、富国强兵的积极追求者了。

魏源在鸦片战争中,看到了沿海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伟大力量,给予很高的评价:“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帅,歼夷兵,以款后开网纵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③ 他主张利用沿海劳动民众与海上渔民练成兵卒,抵抗侵

① 《海国图志》卷2。

② 同上书,卷59、60。

③ 《筹海篇一》,《魏源集》下册,第855页。

略，驳斥了封建官僚污蔑他们为汉奸的谰言："若谓闽粤民兵虽可用，而多通外夷"，为什么广东"斩夷酋、捐战舰者皆义民？"为什么台湾"两禽夷船"、"南澳""火攻夷船"的也都是义民？[①] 同时，魏源对中华民族战胜侵略者也充满必胜信心，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并"不亚西土"，只要"集众长以成一长，则人争效力"，就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不仅可以战胜西方的侵略，而且可以赶上和超过西方。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使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在保卫民族生存的前提下，代表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的魏源，其思想在一定时期与人民利益表现了一致性，从而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峰。

晚年遭遇

道光二十四年(1844)，51岁的魏源终于考中礼部会试第十九名贡士，但因试卷文稿草率，被罚停殿试一科，次年才补中三甲进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先后赴东台和兴化县任知县。道光二十六年，他以母丧丁忧去官，后又南游广东，至澳门、香港，与外国人接触，观其景况，深感"扩我奇怀，醒我尘梦，生平未有也"[②]。北归途中，历游两广、两湖、江西、安徽、江苏7省，行程8000里，经时半年。道光三十年(1850)，又出任北海州分司运判，协助两江总督陆建瀛改革盐政。

① 《筹海篇二》，《魏源集》下册，第858页。

② 《香港岛观海市歌》，《魏源集》下册，第740页。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中国南部大地,魏源时补授高邮州知州。咸丰三年,太平军定都南京,二月又攻克扬州,距高邮仅40里。魏源以知州先办团练,防御溃逃官军沿途焚掠,又镇压了湖西太平庄响应太平天国的地方起义军。三月,他被督办江北防剿的杨以增以迟误文报而奏劾革职,咸丰皇帝在上谕中饬责魏源:"于江南文报并不绕道递送,屡将急递退回,以至南北信息不通,实属玩视军务!"① 不久,钦差大臣周天爵又延魏源入幕参谋军务,因攻打宿州捻军有功,十一月奉旨复官。但这时的魏源却"以年逾六十,遭遇坎坷,世乱多故,无心任宦"② 辞归。从此举家避兵兴化,不问政事,唯手订生平著述,又潜心佛学,汇辑《无量寿经》等。魏源晚年辗转于清军与太平军激烈角逐的江浙地区,虽在任职时参与抵抗太平军,但总的说来态度是不积极的,甚至有传说称魏源曾被太平军聘为谋士③。

咸丰六年(1858),魏源出游至杭州,寄住僧寺,闭门谢客。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逝于杭州,终年64岁。

第三节 龚、魏的不同性格

龚自珍和魏源有很深的交谊,同在刘逢禄门下研习今文经

① 《清文宗实录》卷88。

② 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集》下册,第958页。

③ 据《世载堂杂忆》:刘禺生在香港听容闳回忆,李秀成之弟侍王李侍贤"府中有三老人,称为中国年高有大学问者,最为王所礼遇"。一是古文大家梅曾亮,一是安徽包世臣,"其三为湖南魏先生,通达中外地理"。又李柏荣《日涛杂著》:"默深声既宏伟,又值洪秀全建国南京,提倡文化,设科取士,乃聘江宁梅伯言、泾县包慎伯及默深为乡三老。"

学，常常作“促膝之谈”；同任内阁中书时，又时时相聚饮酒赋诗，纵论时弊。魏源离京后，龚自珍深感孤寂地叹息：“默深去后，更可缄舌裹足，杜绝诸缘。”[①] 道光十五年(1835)后，魏源迁居扬州絜园养亲，龚自珍自都中归，必过园留宿。他曾为絜园书一对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道光二十一年，龚自珍逝世前不久，还一至扬州，宿魏源园中。二人曾约定，“孰后死孰为定集”。待龚自珍逝去，魏源即受其子龚橙之请，亲手校订遗稿，编定《定盦文录》12 卷、《定盦外录》12 卷，并为之《叙》。

实际上，这两位齐名于世的密友性格迥然相异。龚自珍性情豪迈，“嗜奇好客”，多出奇僻激烈之言，又“喜与人辩驳，虽小屈，必旁征博引以伸己说”[②]。他抨击时弊常常不顾忌权贵，骂坐之言，随口而出，被人讥讽为“龚痴”。魏源则“默好深湛之思”，喜独居一处，晚年尤寡言，虽见门生亲友，“接二三语，便寂对若望”。他深为龚自珍的放荡不羁性格担忧，曾致书劝说：“近闻兄酒席谈论，尚有未能择言者，有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言与广廷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谊深恐有悖。”“此事要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旦可致，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③] 龚自珍也曾试图压抑自己胸中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气，几度戒诗，烧诗，但戒了又作，作了又戒，甚至为戒诗而作诗：“百脏发酸泪，夜涌如源泉；此泪何所从，万一诗祟焉。”[④] 他对现实的

---

① 《甲寅杂志》第 1 卷第 7 号。

② 吴昌绶：《定盦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603 页。

③ 《甲寅杂志》第 1 卷第 7 号，《魏源集》未收。

④ 《戒诗五章》，《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451 页。

叛逆性格终已铸就,一出都,鞭挞时弊的诗作即如连珠泉涌。其实,魏源内心对龚自珍的性格和政治、学术见解十分钦敬,并引为同志。他在赠别龚自珍诗中把两人共比为:“天昌二鸟鸣,同谪胥江浦,使为世所诛,又为讥所俯”,“誓回屠龙技,甘作亡羊补!”[①]使他们紧紧吸引在一起的,正是这种强烈不满现实企图挽回颓危的抱负和意气。但腐朽没落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容不得这样杰出的人才了。

龚自珍和魏源是中国近代初期并称的杰出人物,他们所开创的经世致用新风,对后世的维新改革有巨大影响。梁启超多次给以很高评价:“自珍、源皆好作经济谈,而最注意边事”,“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②]“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③]另一个戊戌变法的领袖谭嗣同也认为清代文士中,魏源、龚自珍“皆能独往独来,不因人热。其余则章摹句效,终身役于古人而已”[④]。

把两人的性格对照相比,龚自珍以其浪漫的热情、尖辣的笔墨,对封建末世的黑暗腐朽进行无情砍杀;他的方向,主要在于向鸦片战争以前旧的统治掷出投枪。而魏源则显得深沉、严肃、实际,以具体口号和身体力行从正面提出了抵御外侮、学习西方的建设性方案;他的方向,主要在于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前途的

---

① 《昆山别龚定庵自珍》,《魏源集》下册,第600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56页。

③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7页。

④ 谭嗣同:《论艺绝句》,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页。

探索。龚自珍和魏源，以他们清新的思想、共同的追求、不同的格调，在鸦片战争前后这个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奏出了改革浪潮的主旋律。他们的政治思想，也在此后100多年中国人民寻求解放的斗争史诗中，不断闪耀出光辉。

第三章　洪　秀　全

洪秀全，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大约在信拜上帝后自行改名秀全，自此以秀全之名著闻于世。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1814 年 1 月 1 日)出生于广东花县官禄㘵。父洪镜扬，母王氏，兄仁发、仁达。

第一节　从应科举到拜上帝

清康熙中期，洪秀全的五世祖从广东嘉应州迁到花县官禄㘵，到洪秀全的父亲洪镜扬时，经历四世，时逾百年，家族繁衍，世代务农。洪秀全 7 岁入本村书塾，五六年间就能熟读“四书五经”、《孝经》和许多古文，很受业师称许。洪镜扬和族中人都期望和相信他会很快获得功名，光宗耀祖。

洪秀全虽聪明而用功，但在科举考场上却始终不得志。大约从十五六岁起，直到 31 岁的十几年间，他多次应考，但从未得中秀才。

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秀全又一次应考失败后，仔细阅读了一本叫《劝世良言》的书。这是早年的基督徒、广东高明人梁发编写的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其内容是摘引新、旧约《圣经》

的某些片断，加以中国化的敷衍讲解，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反对拜偶像邪神和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说教。洪秀全于道光十六年(1836)在广州应考时得到这本书，但当时只略一翻阅就置于书笥。这次细读后，他在思想上产生了强烈震动，“觉得已获得上天堂的真路和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①]。于是他和表兄李敬芳二人按书中所说自行施洗，向上帝祈祷，答应自此不拜邪神，不行邪事，遵守天诫。

此后，洪秀全首先向亲友“宣讲拜偶像之罪恶及拜真神上帝之要”，说服了父母兄嫂侄辈和友人同拜上帝，其中包括他的至好冯云山、族兄洪仁玕。

但洪秀全不是一般地信仰上帝，而是自认为负有向世人宣传拜上帝、斥偶像以拯救世界的特别使命。他之所以产生这种自我意识，是同他个人的内心经验有密切关系的。他在道光十七年(1837)病中曾连续地产生一系列模糊的幻觉，似乎有人迎接他到一处华丽而光明的地方，有一老人对洪秀全说，世人都是他生养的，但都忘记了他，反而去拜事妖魔；授给洪秀全一柄斩妖魔的剑和一枚治服邪神的印，要他放胆去做。这些幻象可能是他曾大略浏览过的《劝世良言》中关于上帝、天堂、邪神等片断印象的再现。这次他仔细阅读《劝世良言》，把当年病中的幻象同这些幻象所由产生的本源——《劝世良言》加以对照比附，“大觉大悟，如梦初醒”，认为自己的灵魂曾经升天，见过上帝，他自己就是上帝所派的拯救世人使人们回到敬拜上帝之路的使者。

---

① 韩山文著、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1935年燕京大学图书馆印。第9页上文字据英文稍有改动。

梁发的《劝世良言》只是一本粗浅的基督教传道书，但他为了从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中夺取阵地，却很通俗有力地揭露了中国社会的弊病，并且许诺人们只要信仰上帝，就可以纯洁灵魂，消除邪恶，达到“君正臣忠，父慈子孝，官清民乐”，实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清平好世界”。由于自身前途无望而对旧世界、旧信仰产生失望、怀疑的洪秀全，接受了这种新的说教，相信这就是真理。从此，他抛弃功名仕进之途，为着反对世上之陋俗和拯救邪恶的社会而诚心诚意地作一名宣传上帝福音的使者。

道光二十四年(1844)春，洪秀全、冯云山等以极大的热忱离开本乡去外县和广西传教。在广西浔州府贵县赐谷村洪秀全表兄王盛均家，他们停留了几个月，发展信徒百余人。但王家贫苦，难以久住，洪秀全于冬十月返回广东，冯云山不愿回来，独自到桂平县，辗转进入紫荆山，在那里做工、教书、传教。

洪秀全回家后，仍以执教为生，并继续在本乡和附近传教。他在广西传教时和回家后的道光二十五、二十六(1845、1846)两年中写了五十多篇文章。现在留存的有写于道光二十四年的《百正歌》和写于道光二十五年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

《百正歌》宣传“正”这样一种道德观念，要求君臣、父子、夫妇、男女和富人、贵人各色人等悉由“正道”行事，反对“不正”的言行。诗歌列举尧、舜、禹、稷、周文、孔丘等古圣先贤，说他们是君正、臣正、父正、子正的典范，列举桀、纣、齐襄、楚平等由于贪色、淫妹、纳媳、纵妻等不正的行为而受到惩罚。洪秀全在这篇诗歌中以正和不正为国家兴衰、个人祸福之根源。

《原道救世歌》首先宣传所有人应该只拜上帝，不拜邪神。但它的主要篇幅是较《百正歌》更为具体地提出“正道”的思想行为

准则，以夏禹、伯夷、叔齐、周文、孔丘、颜回等人为例，宣传孝顺、忠厚、廉耻、非礼四勿、贫富有命等“正道”的思想行为准则；反对六不正即反对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赌博、吸洋烟、饮酒、看风水、相命等。如诗歌题名所示，这是洪秀全当时的救世方案。

《原道醒世训》谴责“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批判国家之间、省府县里乡各地区之间、族姓之间相陵相夺相斗相杀的现象。洪秀全提出天下男女都是兄弟姐妹，不应有此疆彼界之私、尔吞我并之念，憧憬唐虞三代之世“天下为公”的大道。他以为，陵夺斗杀的原因在于“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在于人们不知道上帝是大家的共同父亲，“见小故其量小”。所以实现大道之途径在于皈依天父上帝和“心好”、“量宽”、“各自相安”。

洪秀全在乡间的传教活动为在广州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所闻知。从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1847 年 3 月下旬）直到六月，除短期回乡外，洪秀全一直在罗孝全教堂学习。

罗孝全的教堂称为“粤东施蘸圣会”，成立于清廷对传教弛禁后的道光二十五年六月（1845 年 7 月），当时在粤的著名传教士裨治文、吉勒斯匹和《劝世良言》的作者梁发均任该圣会的教务评议员。

洪秀全在教堂参加了圣经班，每天接受教导两小时，学习了旧约、新约圣经。罗孝全对洪秀全似乎是满意的，说“他学得了比较完备的知识”，“其行为举止无可指责”。在此期间，洪秀全请求受洗并加入教堂。于是，罗孝全委派了一个委员会到洪秀全家乡作调查考核；考查报告是有利的，接着就在教堂进行口试。就在要接纳他的时候，洪秀全对教堂没有薪金表示了犹豫，这使罗孝

全宣布无限期推迟洗礼①。

洪秀全在罗孝全教堂受洗不成，决定不回花县，于六月初十日(7月21日)去广西寻找冯云山。这造成了洪秀全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第二节 建立太平天国

冯云山同洪秀全于道光二十四年在广西贵县分手后，辗转到了桂平县紫荆山内大冲曾家做塾师，同时向周围人民宣传拜上帝、去偶像。由于他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信徒日多，约至道光二十六年已形成了一个称为"拜上帝会"的团体。道光二十七年六月(1847年8月)洪秀全到紫荆山会见了冯云山。他们分手已近3年，冯云山传教获得了这样大的成绩，使洪秀全喜出望外。于是，洪秀全常亲自向新信徒讲道，拜上帝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约在洪秀全会合冯云山前后，信徒人数已达2000，遍及桂平、平南、武宣、贵县、象州、博白等县。冯云山是团体的创建者，但冯云山拜上帝的信仰得自洪秀全，"洪先生"的名声在团体中早已众所周知，因而洪秀全到广西后立即成为权威的教主。

充满着救世、醒世愿望的洪秀全，几年来在广东家乡苦口婆心对世人的劝诫，只获得寥落的反应，也不能阻挡世风之日下。现在他的好友冯云山竟已取得这样的成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

---

① 关于罗孝全教堂和洪秀全在教堂学习、申请受洗和口试问答等情况，均据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美国南部浸会差会部"收藏的罗孝全档案和发表于1856年美国《Putuam Monthly》的罗孝全文章《太平王(*Taiping Wang*)》。

团体,并且人人尊奉着迄未识面的洪先生,这使他心中充满喜悦。他在罗孝全教堂请求受洗而不可得,到广西后竟成了拜上帝会的教主。他到紫荆山后一个多月,就同冯云山等商量寻找"隐固处所"栖身,这表明洪秀全的救世主意识正向打江山的帝王抱负发展,因而需要一个密议大事的隐蔽处所。

洪秀全思想的这一巨大转变,是有其主客观条件的。洪秀全信仰的上帝虽然是中西合璧的,但对于中国的既有文化传统,毕竟是一种异端,是对现有意识形态的触犯。而且,他不是一般地拜上帝、去偶像,而是同时不满于当时的腐败社会,憧憬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因而蕴藏着反抗现实社会的思想。他思想中的这种异端因素和积极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向革命方面转变。

广西的社会条件有利于洪秀全思想的这种转变。广西地处中国南陲,素称多盗之乡。鸦片战争后,"粤东水陆撤勇,逸盗或潜入梧、浔江面行劫,或迭出南、太边境掳掠,勾结本省土匪及各省游匪,水陆横行,势渐鸱张。至道光二十七八年间,楚匪之雷再浩、李元发两次阑入粤境,土匪陈亚贵等相继滋事,小之开角打单,大之攻城劫狱,浸成燎原之势"①。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对付这种局面,竭力倡办地方团练。以下层人民和各种形式的起义势力为一方,封建官府和地主团练为另一方的对垒日益尖锐。这种形势促进了早已对现存社会不满的洪秀全走向反清革命的道路。

洪秀全到紫荆山后,曾偕冯云山等远征象州,捣毁当地群众

①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页。

信服的甘王庙，还进行了其他捣毁偶像的活动。这些行动激发了拜上帝会信徒的信心，同时也引起了本地封建势力的仇视。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紫荆山秀才王作新带团练拘捕冯云山，被拜上帝会群众奋力抢回。王作新向衙门控告冯云山等“结盟供拜上帝妖书，践踏社稷神明”，知县“严提两造人证质讯”，冯云山被解县羁押。冯云山先后向县、府反诉，结果以无业游荡之名被判解回广东原籍。但冯云山在途中说服解差信仰上帝，一同回到了紫荆山。

冯云山被羁押事件前后约历时半年。在此期间，道光二十八年三月(1848年4月)，发生了杨秀清以上帝附体代天父发言的事。接着，半年后又发生萧朝贵以耶稣附体代天兄发言的事。这两件事使拜上帝会内部形势发生了变化。

洪秀全以教主的身份承认了杨、萧代天父上帝、天兄耶稣发言的地位，自此，杨、萧在会内分别取得了天父、天兄代言人的地位，从而使洪、冯，特别是冯的地位受到削弱。杨秀清、萧朝贵都是紫荆山人，出身寒苦，但富于社会阅历和组织才能。他们两人，连同紫荆山麓金田村的韦昌辉和贵县那帮村的石达开，与洪秀全、冯云山逐渐形成了一个密谋起义的领导核心。

洪秀全在道光二十七至二十八年间写作了《原道觉世训》。它强调上帝创造世界、主宰世界，并从上帝的权能恩德方面论证人人当拜上帝。但另一方面，它鲜明地提出上帝的对立面，以“阎罗妖”为各种妖魔邪神的代表，指出阎罗妖是“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姐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的敌人。这篇宗教历史论文曲折地反映了洪秀全决心与清朝统治对抗的政治态度。

道光三十年(1850)春，洪秀全等决定发动起义，在紫荆山连

续举行了拜上帝会的骨干分子会议，确立起义大计，洪秀全并曾穿黄袍，这意味着太平天国起义一开始就以推翻清皇朝统治为目标①。五月，洪秀全派人去广东接家属来广西，接着就通知各地会众到金田集中，发动起义。大约至迟从七月起就有起义的会众来到金田，此后四五个月内，来自贵县、平南、象州、陆川、博白等地数以千计的起义者，扶老携幼举家奔赴金田。这年的十二月初十日（1851 年 1 月 11 日）洪秀全 38 岁生日这天，他们在金田宣布起义，建立太平天国国号，洪秀全称天王。随即以杨、萧、冯、韦为正副军师，与石达开分领五军主将；稍后又封五人为东、西、南、北、翼五王，以东王杨秀清总理军政，节制其余四王。经过在广西、湖南、湖北等地两年多的战斗，冯云山、萧朝贵先后阵亡，洪秀全终于在咸丰三年二月十二日（1853 年 3 月 21 日）攻占南京，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国的首都，称为天京。

第三节　社会经济理想和思想文化政策

洪秀全从道光二十三年起信仰、宣传上帝，以后转变成为造反起义的太平天国天王，在后世看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角色，但对于洪秀全自己，两者之间仍有一以贯之的思想，这就是要“恢复上帝之纲常”。他根据自己对中国历史的独特研究，认为中国古代也是信仰上帝的，这才有唐虞三代的盛世，只是秦汉以后邪教流行，致使世人沉沦，社会污浊，他奉有拯救这个世界

---

① 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下同），第 40 页。

重新回到上帝之道的使命。这使命,在他信仰上帝之初希望通过苦口婆心的劝诫去实现,如他自己所说,“婆心固结不能忘,言之不足故言长”。后来,他决心推翻清朝统治,因为清朝统治是一切邪教邪神的保障,所以要以剑与血来恢复上帝之天下。太平天国之具有宗教色彩,其原动力主要在于洪秀全。

与此相联系的,洪秀全在起义前后另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是恢复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他以为上帝之纲常与大同世界是并存的,而他心目中的大同世界就是他早年憧憬的“天下为公”的社会。太平天国内部的思想倾向是各各不一的,有石达开、李秀成等的爱民、济贫政策,有洪仁玕效法西方经济制度的主张,而居于思想指导地位的洪秀全则始终偏爱他自己的理想世界。

太平天国起义后,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洪秀全在所占领的地区不遗余力地打击佛、道“邪教”,摧毁庙宇,以简单的拜上帝的教义推行于军队和人民,实践着“为上帝争纲常”。建都天京后不久,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正是洪秀全描绘的大同世界的一幅图景。

《天朝田亩制度》有这样一些主要内容:

1.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田分9等,照人口(不论男女)均分,15岁以下减半。

2. 以军、师、旅、卒、两、伍编组所有人户。每两25家,为基层单位。

3. 每两设一国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

4. 每两人户所有婚娶弥月喜事所需俱用国库,但有限式,

不得多用。鳏寡孤独由国库供养。

5. 每户养5母鸡,2母猪。凡25家的陶冶木石等匠,俱由本两人户在农隙担任。

6. 每两设一礼拜堂。礼拜日各至礼拜堂颂祭上帝,听讲道理。童子逐日至礼拜堂听两司马教读太平天国刻印的圣经和洪秀全等的著作。

7. 两司马处理本两内的争讼,对本两内各户是否遵守天条、命令,是否勤于耕作,每年逐级上报。

8. 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由两司马逐级保举;诸官三年一升贬,各首领各保升奏贬其统属。

《天朝田亩制度》要求实现的,是一个平均的、自给自足的、公有的小农社会。这是上帝的救世蓝图。《天朝田亩制度》在规定一切剩余生产物俱交国库后说:"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这对于洪秀全早先在《原道救世歌》中的救世方案是一个深化,对在《原道醒世训》中憧憬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具体化。

洪秀全的这些思想主张,局部地曾依靠战争的胜利而得到推行,如以军师旅卒两伍编组人户和推举乡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施,但其主要的部分即关于均分土地和公有共享的规定却未能贯彻于社会。太平天国在军队中实行过公有共享制度,即军中所有金银财物都必须上缴公库,个人不得私藏;将领士兵的生活需要,由公库供给,供给大体平均。这种公有共享的圣库制度的基础是人无私财和大致的平均分配,其原则即是《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和"人人饱暖,处处平均"。

但这一原则和基础在太平军中并未能持久坚持，起义之初洪秀全就多次下诏要求将士们上缴财物，违者处以重罚，直至斩首，反映出违反制度的现象之大量存在。随着军事胜利，克复城镇日多，财货来源丰富，将士们各有私财，高级领袖生活日奢，供给配额已无实际意义，公有共享名存实亡。在全社会实行均分土地和公有共享，那是更复杂的问题。一切人都有土地，都在平均的原则下得到温饱的保障，在这方面，它代表了无地少地的穷苦农民的利益。但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农民不会愿意把自己劳动所得的剩余生产物都交给上帝去统一运用，在这方面它又不符合当时农民的要求。同时，在这个理想国里，每 25 家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虽然提到了银钱的存在，但没有商品交换的地位，事实上要求小农业和手工业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更加牢固地结合，使社会固定在不要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上。《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缺乏实践的基础，难以得到人民的支持。据记载，太平天国曾有向农民征收剩余生产物的条例和告示。脱离分配土地而向农民征收剩余生产物，自然更难被接受。“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①。这样，太平天国在实践中不得不另订他策。

太平天国在从广西北出的沿途征战中，普遍地以豁免钱粮为号召，军饷支应主要依靠对清朝官库的没收和对敌对分子财产的剥夺。建都天京后，事业发展，人员扩充，农民缴纳剩余生产物之规定既不可行，于是约在咸丰三年到四年间，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联名提出“照旧缴粮纳税”的办法“以充军储而裕国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 10、科派。《太平天国》第 3 册，神州国光社 1952 年版，第 275 页。

课”，得到洪秀全的同意施行。这一办法是在大体上不触动原有的地权关系的情况下向土地持有者征收钱粮。以后，终太平天国之世都基本上实行这一政策。但太平天国在后期仍重新颁布过《天朝田亩制度》，说明洪秀全在思想上始终没有放弃他的理想社会。

建都天京以后，洪秀全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方面在独尊上帝的原则下进一步提出了激烈的政策，这就是彻底排斥孔孟和诸子百家、古人古书。

洪秀全青少年时代熟读经史，对孔孟儒学和诸子百家有很深的基础。信仰上帝后，排斥佛、道不遗余力，但对儒家仍持调和态度，除不承认孔子的教主地位以外，不少儒家典籍中的言论仍被称引于他的著作，以印证上帝之恩德权能。但在建都天京后，洪秀全发动了大规模排斥孔孟、焚禁古书的运动。这次运动的景象，当时身居天京的地主文人有所描绘：“尔本不识孔与孟，孔孟于尔亦何病？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①]太平天国官员也曾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②]洪秀全对自己已出版的重要著作《太平诏书》（即百正歌、原道救世歌、醒世训、觉世训的汇编）和《天条书》等都作了删改，删去《百正歌》全篇，删去其他篇中一切称引儒家典籍的段落文句。从这些删改来看，这次运动所排斥的不只是儒家典籍、儒家和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而且包

①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第4册，第735页。

② 《诏书盖玺颁行论》，《太平天国》第1册，第313页。

括了各种历史人物。

洪秀全发起这场运动的目的,在于加强思想的统制。太平天国从建都时(或略早)起,就开始刻印旧遗诏书、新遗诏书(即旧、新约圣经),接着就实行新的印书制度,即把太平天国的出版物加以统一编目盖印,只有经过编目盖印的旧遗诏书、新遗诏书和"天命诏旨书"(即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著作)才准阅看。排斥孔孟和古人古书、删除已出版著作中的所有儒家典籍中的章句的做法,是同以上几件事联系在一起的,可以看作是加强思想统制的一部分。

洪秀全强暴地推行排斥孔孟和一切古人古书的政策,遭到杨秀清的反对。咸丰四年正月(1854 年 2 月),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方式明确指示不应当毁弃古书,对"四书""十三经",对历代史书和古代忠正人物作了肯定评价[①]。二月,洪秀全下诏设立删书衙,宣布对古书进行删改后准人民阅读,对古人古书实行焚禁的政策有所缓和。但洪秀全接受天父的指示——也就是杨秀清的意见,是勉强的、思想不通的。删书的工作终太平天国之世并未实现,所谓删改后准读只是一句空话;他本人直到晚年仍坚持"有读圣贤书者父师并斩",还禁止儿子读一切古书。他自己常看古书,但看完后就付之一炬[②]。

洪秀全这种对待古人古书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太平天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太平天国立国之始就开科取士,其后制度日备,有会试、乡试、县试等,而且录取颇宽,这显然

① 《天父天兄圣旨》,第 101—103 页。

② 幼天王供词别录,原件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有吸引知识分子的用意。太平天国开科考试虽然仍用八股文，但题目却不准用旧时的“四书五经”，完全出自太平天国的教义。这些题目是只熟悉孔孟的读书人难以理解甚至望而却步的。由于这方面的原因，还由于人们对太平天国的偏见，虽然也不乏士子前往应考的事例，但多数是粗知文义的医卜星相之流。太平天国很多将领和下层官兵珍视读书人，用他们为“先生”。但所谓“先生”，只是司笔墨、任抄写书记工作，并不是用为谋主、备任政治军事之顾问。即使应考得中者，也大都只用为基层乡官，位高的，或用为考官。太平天国失败后，李秀成以“无读书人”为太平天国的缺陷，这可以说是他对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一个补充看法。

第四节 洪、杨内讧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以后，军事上继续发展，长江中下游的两岸地区多入版图。在内部，基于洪秀全的以上帝为天下人共同之父的“天下一家”理论，以衣食与共、安老怜幼恤孤为伦理准则，起着鼓舞人心和团结互助的作用，使太平天国推翻清朝的事业具有胜利的希望。但是，发生于咸丰六年(1856)下半年的领导集团内讧，使太平天国的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内讧主要发生于洪、杨、韦、石四人之间，特别是在洪秀全、杨秀清之间。

洪、杨间的矛盾种因于太平天国的宗教、政治体制。洪秀全为拜上帝会教主，起义后为太平天国天王，本应是太平天国第一人。但自杨秀清被承认为天父代言人后，洪秀全的地位事实上发

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洪秀全称天父之次子,曾亲身上天受命,但一旦杨秀清天父附体时,洪秀全就必须俯伏听命。这样,洪秀全地位之得到尊重,洪、杨间关系之得到正常协调,就只能依靠杨秀清的善意,依靠他不滥用天父下凡的特殊权力。

但杨秀清的权势欲很大,不能谨慎使用自己的特殊权力。他获得天父代言人地位之初,天父下凡时所作的指示,有一些是告诫会众应确信洪秀全是他们的"主",这起了巩固洪秀全地位的作用。这可以看作是洪、杨间的一种默契。但"天父下凡"很频繁,所作指示的内容五花八门。根据现存的资料,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否定洪秀全的主张、打击洪秀全的威信和地位的。如上述否定洪秀全排斥古人古书的政策即是一例。杨秀清还曾以天父下凡的方式否定过洪秀全建都于河南的主张,否定过洪秀全出版新旧约《圣经》的决定。这些都是事关重大的政策问题,无论天父的指示是否正确,都使洪秀全的地位受到了伤害。

更有甚者,杨秀清还常因一些细小的事情频频以天父名义使洪秀全难堪。如一次,因洪秀全待4名女官过严,天父竟下凡要当众杖责洪秀全。又一次,因洪秀全要求妻妾去问候婆母时应速去速回,天父下凡责备,告以此等事也应与杨秀清商酌。又一次天父在半夜下凡,直入金龙殿,召洪秀全之妻出来加以"教导"。如此等等,都是洪秀全所难以容忍的。

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的另一类内容是处分太平天国的官员、将领和其他犯罪人员。这类事很多,处分往往随意而严厉。如秋官又正丞相陈宗扬因犯天条——私自与妻同宿而被天父判决立即双双斩首;燕王秦日纲因作战失利获罪被贬为奴;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因未报告女官对杨秀清失敬的话而被即行处死;北王

韦昌辉因天父下凡时未通告众人而被杖责四十[1]，等等。

杨秀清在起义之初已被封为军师，但他获得节制西王以下各高级领导人的地位是在几个月以后，始于被封为东王之时。无论军师或东王，同天王之间是君臣关系，这是明确的，从现存的若干文书可知，一些大小事情如处决吸食鸦片犯、修缮天王府、实行照旧缴粮纳税政策等，均由杨秀清上奏天王批准，就可说明。军师、东王都是臣下，非近代虚君制之首相、总理可比。杨秀清之所以权倾上下，可以不经过洪秀全而任意处分诸事，甚至包括洪秀全的事在内，显然不是因为他是军师，而是因为他是天父代言人。天父的权力是无章可依的，一切都是任意的，杨秀清正是凭借这样的地位在很多问题上架空了洪秀全，侵夺了有司的职权并使洪秀全和许多高级官员难堪的。

洪秀全性格刚毅执著，又有浓厚的君尊臣卑思想，按常理是难以容忍杨秀清的侵逼；但杨秀清有大功于起义，"天父降凡"久已成为立国之本，所以只好长期隐忍不发，然而，杨秀清的权势欲没有止境，虽在"天父降凡"时可以为所欲为，仍不满于世俗地位上居于"一人之下"。他的部属早就公开扬言"四海之内有东王"、"护卫东王早作人王"。咸丰六年(1856)夏，击溃天京城下的清朝"江南大营"后，杨秀清以为外患已除，就进一步威胁洪秀全天王的地位。这使洪秀全忍无可忍。于是矛盾剧发。

杨秀清威胁洪秀全地位的具体内容，据李秀成供词是"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太平天国沿封建旧制和民间旧习，洪秀全称万岁，杨秀清称九千岁，万岁和九千岁的区别是君臣间的

---

① 以上事例均见《天父天兄圣旨》。

分界标志,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就颁布的《太平礼制》一书,对此规定很严。杨秀清也称万岁,至少意味着“君臣不别”,与洪秀全并为太平天国的君主。

杨秀清逼洪秀全去东王府的日期是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1856年8月15日)。洪秀全不得不同意杨秀清的要求,但同时却密召其时在外督师的北王韦昌辉等迅速返京。杨秀清自以为计划将要实现,但他在此前对一些高级重要人物的错误处置,却孤立了自己,为洪秀全加强了对付自己的力量。咸丰六年三月初七日(1856年4月11日),杨秀清为了自作威福,杖责地位仅次于他的韦昌辉。六月十五日(7月16日),杨秀清锁押洪秀全次兄洪仁达。七月十五日即他召洪秀全到府的同一日,他指摘领导集团中的有力人物秦日纲、陈承瑢“帮妖”,又批评“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①]。这几乎把所有领导人推向了对立面。

咸丰六年八月初四日(1856年9月2日)凌晨,韦昌辉和秦日纲的部队自外地回师包围东王府,袭杀了杨秀清及其亲属部众。次日,洪秀全以韦、秦杀戮过多,下诏处以鞭刑。杨秀清部属数千人前往观刑,当晚又遭袭杀。此后,忠于洪秀全的和韦昌辉、秦日纲等的部队同杨秀清的余众在城内交战,被杀者数以万计。

洪秀全因杨秀清逼迫而密召韦昌辉等回京,是否同时也密令韦杀杨秀清,这是没有明确的史料可以证明的。从杀杨以后洪秀全责备他们株连太多,仅处以鞭刑来看,杀杨是符合洪秀全的意图的,是为洪秀全解决了问题。

杀杨后不久,太平天国的另一重要领导人石达开自湖北前

---

① 均见《天父天兄圣旨》。

线赶回天京。石达开也是应洪秀全之召回京的，因路远到达较迟。他也久不满于杨秀清的专横，但他同时也谴责韦昌辉等滥杀无辜，危及国家。当晚他逃出城外，起兵靖难，要求洪秀全杀韦昌辉和秦日纲。石达开得到众多太平军将士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杀了韦、秦，石达开回到天京，众人推举他“提理政务”，时为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月末。

这次血腥的内部斗争使太平天国失去了领导核心中的几位重要人物和至少两万名将士，但洪秀全作为天王的地位得到了巩固；石达开富于谋略，深得人心，太平天国的前途仍大有可为。然而，不幸的是，洪、石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问题。

洪、石间矛盾的主要问题是洪秀全对石达开的猜忌。当时已担任中级将领的李秀成叙述双方的关系和将士的态度说：“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二王，安王即王长兄洪仁发，福王即王次兄洪仁达，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欢悦。”① 洪秀全封两位兄长为王以牵制石达开，但这两位兄长并无才干，议事时众人不听，石达开议事则“环绕以听”。石达开的威信越高，洪秀全的疑忌越深，牵制越多，以致石达开不安于位，于咸丰七年(1857)四月底逃出天京。自此，石达开独立行动，脱离了天京政权。

第五节　重建领导

经过杨、韦先后被杀和石达开分裂出走等内部大动乱，太平

① 李秀成供词，见罗尔纲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4页。

天国受到极大的打击。实力损失,包括被石达开带走的,减员近10万人。领导骨干或死或走,首义诸王只剩下洪秀全自己。这是有形的损失,还有无形的损失。太平天国以天下一家、互助友爱的宗教政治理论为号召,内乱和互相残杀,使人心涣散失望,使这种理论面临危机。这种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后果,是比有形的损失更为严重的。

后期太平天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也严峻而复杂。杨、韦事起至太平天国七、八年间,武昌失守,湘军反攻江西,先后占湖口、九江,"江南大营"卷土重来,占庐州、镇江,再逼天京。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彻底消灭了"江南大营",克复苏、常,一度取得辉煌胜利。但同时,太平天国面临的敌人是更为有力的曾国藩湘军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已获得巨大利益的外国侵略者。

在军事形势逆转和内部动乱损失了大批干部的情况下,选拔新干部是当务之急。洪秀全识拔了后起的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青年将领,以他们和韦志俊、蒙得恩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委以军务。又新设"掌率"职位,以蒙得恩为正掌率,陈玉成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掌理朝政。但陈玉成等主要是在京外征战,朝政实际主要由在京的蒙得恩掌理。这样,到咸丰八年(1858),太平天国中央的一些重要领导职位都已重建,"稍可自立"[①]。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支柱,选拔他们担当大任,是洪秀全用人的成就。

但洪秀全在重建中央领导的过程中有些做法也反映了矛盾和弱点。军师本是"朝纲之首领",是实际处理军政各务的。

---

① 洪仁玕自述语,《太平天国》第2册,第851页。

洪秀全自兼军师，本来应该意味着亲自管理大事，在经过大乱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也只有他亲自掌握政务，才较能振奋人心、团结将士，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但洪秀全却另设“掌率”一职，由蒙得恩担任。“掌率”的职任未见明文解释，据蒙得恩之子蒙时雍说，他父亲“升正掌率二千岁，爵同王位，数年以来，掌握重权，总理国事”①，可见“掌率”是负责国事的，是军师以下的又一军师。这说明，洪秀全虽自兼军师，但并不真正作为军师实际处理国事。

洪秀全不乐于亲理政务和猜忌外姓，是他后期重建领导核心和任用干部方面的两大弱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于咸丰九年(1859)春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洪秀全很快就封他为精忠军师、干王，卸去自己的军师兼职，让洪仁玕担负总理国事的名义和责任。

洪仁玕幼年曾从洪秀全学，又是最早的拜上帝信徒之一。但他没有在广西参加过拜上帝会的活动，也没有赶上金田起义。他在香港流亡多年，接触西方传教士和西方文化较多，咸丰九年历尽艰辛到天京，决心效忠太平天国。洪秀全见洪仁玕到来，“彼此悲喜交集”，称他“志同南王(冯云山)，历久弥坚”②。但由于洪仁玕与太平天国渊源较浅，骤封为王和军师，引起宿将不服。洪秀全坚持原议，说“风浪暂腾久自息”，特聚集众将众官，让洪仁玕登台受印。另一方面，洪秀全接着先后封战功最著的陈玉成、李秀成为英王、忠王，以调整新老关系。洪秀全“曾当众饬谕，京内不决之事

① 《蒙时雍家书》，《太平天国》第2册，第756页。

② “洪仁玕供词别录”，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封干王诏”，《太平天国》第2册，第569页。

问于干王，京外不决之事问于英王"①。这表明了洪秀全对于二人的倚重，但同时也表明洪秀全不乐于亲理政务的态度，因而把京内京外的事都交臣下处理。后来，他还借天父梦中传言说，天父叫他不要亲理庶务。这样，他自己就不免愈益脱离实际。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洪仁玕虽居军师之位，但实际上不可能像前期军师那样统理军政。这主要不是军师职位的功能有什么制度上的改变，而是由于实际的形势与前期有所不同。内乱以后，除了洪秀全本人，已很难有人发挥集中统一领导如同杨秀清那样的作用。

太平天国后期，由于家天下思想影响，洪秀全多任用兄弟子侄。他原封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为安王、福王以牵制石达开，后因朝臣不服，撤去王封，改封安、福爵，但仍以王长兄、王次兄名号位居群臣前列，后又封信王、勇王之位。据"李秀成自述"，洪秀全在朝中第一重用的是幼西王萧有和，掌一切本章是否上奏之权。其次重用的是长兄、次兄和驸马钟万信、黄栋梁等②。这些人或缺乏才能和威望，如长兄、次兄；或年幼无知，如萧有和是洪秀全的外甥，只是十二三岁的孩子。他们居于高位，既不能提高中央领导的水平，反而加剧了将士的离心倾向。于是洪秀全"加恩惠下"，大量加官晋爵，以固结人心。这收到了暂时的效果，"各又振作同心"③。但此种办法一发而难以收拾，不少人"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统兵将领甚至对下属"私铸印信，私给官凭"④。这不但进一步助长了各各据地

① 见"洪仁玕供词别录"。

②③ "李秀成自述"语，见罗尔纲前引书，第190—191页。

④ 洪仁玕《立法制谊谕》，北大文科研究所编：《太平天国史料》，开明书店1950年出版，第147页。

自雄的分散主义，而且使官职越封越多，越封越大，一直封到2700个王，简直成为儿戏。洪仁玕到天京后，打算加强中央集权，抑止滥施爵赏的局面，但毫无效果。这样，终太平天国之世未能重建真正有力的领导。

第六节　对外关系

太平天国起义，正值鸦片战争爆发外国势力侵入中国。因此，它要对付的不只是清朝封建统治，还有外国侵略者。早在咸丰三年(1853)，英、美、法等就先后派它们的驻华使节到南京访问，窥探太平天国的虚实和政治、军事、宗教状况。太平天国内乱后，英、法等国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从中国攫取了更多的权利，包括中国开放长江中下游的几个口岸城市。深入的外国侵略势力同后期的太平天国短兵相接，使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面临更为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

咸丰八年五月(1858年6月)，清廷和英国签订天津条约，规定英国船只可到"长江一带各口"通商，但当时南京、安庆等沿江大埠都在太平天国统治下，英国要获得条约的权利，必须和太平天国打交道。十月(11月)，英国侵华军统帅额尔金率舰自上海溯江航行作实地探测，在南京江面遭到太平天国炮击，双方交战半小时。太平天国后来向他们道歉、赠礼，并给他们一份洪秀全写的诏旨。这件诏旨中有一些关于中西关系的话，如："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万事爷哥朕作主，弟们踊跃建万功"；"西洋番弟把心开，……替天出力该又该。替爷替哥杀妖魔，报爷生养战胜回。"所谓"灭臭虫"、"杀妖魔"，都是指消灭清朝官

兵。洪秀全这些话的意思,是在褒奖“番弟”对清朝的打击。

关于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是站在英国一边的。早在(1853年)英国使节第一次访问太平天国时,镇守边境的大将罗大纲致书英使:“伪清猖獗,盗据宗邦,内毒生灵,外拒与国。此前此贵邦创义入境,良有以有也。”[①] 这不是由于策略上的需要而造成的错误,主要的原因在于太平天国错误的基本理论观念——不以满族人为中国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太平天国很关心战况,曾在招贴板上公布英法联军在大沽、天津战胜清军的消息,并在消息之末写上“杀尽妖魔”的口号[②]。地方守将与英、法打交道时认为联军入侵是由于清朝“曾欺尊国”,“去岁天津叛议,以致复劳征战”[③]。

这一切表示出太平天国对英国的侵略是没有认识的。额尔金宣告他们此行是“履行条约权利”,今后还会有其他船舰来往于长江一带,洪秀全的诏旨没有涉及,太平天国的官员在会谈中也没有拒绝,只要求事先告知,以免发生如这次炮击的误会。

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重整旗鼓,消灭清军江南大营,洪秀全亲自主持确定了东取苏杭上海,然后购买轮船沿江上取湖北的大战略。太平天国于四月十三日(6月2日)占领苏州,半个多月后李秀成即致书在上海的英国公使,表示愿与各国友好,“结为兄弟之国”,现即将收复上海,为避免误犯,邀请各公使来

---

① 罗大纲照会原件影印,见《文物》1979年第8期。

② 据 T. W. Blackiston《Five Months on the Yang-tze》(1862)书中 R. J. Forrest 的报告。

③ 何文庆致法国领事照会,《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2页。

苏面商[1]。其后李秀成、洪仁玕又一再去信，都未得复。李秀成于七月(8月)进军上海，出乎意料地遭到在上海的英、法军队炮击，失利退回。这是太平天国同外国的首次军事对抗。

洪秀全幻想着“番弟”为上帝出力，但“番弟”却用大炮回报了他。这是因为英、法等国已从清廷手中获得巨大利益，尽管清廷在《天津条约》换约时有所抗拒，但普鲁斯已认定必须帮助清朝免于解体。于是，咸丰十年七月(1860年8月)当英法联军正在北方打击清军、压迫清廷就范之际，他们在南方却协同清军和太平军作战。这是侵略者自身的利益决定的。这使洪秀全从自身的体验中逐步认识到他们与“番弟”并无共同的目标。

咸丰十年九月(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在火烧圆明园以后，同清廷签订《北京条约》，获得了更多的利益，长江的镇江、南京、九江、汉口都开放为通商口岸。他们迫切希望这些利益在太平天国统治区落实。咸丰十一年正月(1861年2月)，英国侵华海军司令何伯及其政治助手巴夏礼一行自上海率舰队执行这一使命。他们照会太平天国，声称他们已获自由航行长江的权利，要求不干涉持有护照的英国船只，还要求太平军不进入上海及其他开放口岸百里以内地区，其条件是清廷不从这些地方派军进攻太平天国。他们同时又声称这是为了保护商业，对中国内战仍保持“中立”。

洪秀全同意了英船可自由航行长江，拒绝了不进入上海等口岸城市百里以内的要求。咸丰十一年一月(1861年3月)，巴

---

①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五月李秀成致“大英国全权钦差大臣”，原件藏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全文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304页。

夏礼等与太平天国赞嗣君、蒙时雍等几经会谈，巴夏礼等竟闯到天王府要求面见洪秀全。二月二十三日(4月2日)，洪秀全终于同意在本年内不进入上海百里以内地区。

洪秀全以为这次妥协只是有限的让步，因为进取上海本不在本年的军事计划之内，而对方则没有坚持太平军不进攻汉口、九江，还声称愿守中立，不助清廷，因此误以为这对双方有利，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协议。洪秀全因此发表诏旨，称“中西永遵和约章，太平一统疆土阔”。但事实上，在南京协议之前不多天，英国人已悄悄地干扰了太平天国进取武汉的行动。二月初八日(3月18日)，陈玉成占领了湖北黄州府，武汉旦夕可下，巴夏礼面见陈玉成，劝诱他不要进攻已向英国开放的武汉，陈玉成改变了进军方向。

在本年内不进攻上海的协议即将期满之际，李秀成经略浙江，占领了杭州，准备再次攻取上海。这时，英国官方对太平天国的敌意已日益明显。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61年12月27日)，英国舰长宾汉奉何伯之命，提出了几项蛮横的要求，主要是：

1. 称英国臣民在太平天国地区遭抢劫，要求立即赔偿；

2. 不仅英国船只，悬挂英国旗的木船，也得自由航行长江，不受检查；

3. 应无限期不进入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的百里以内地区。

几天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1862年1月1日)，蒙时雍等复照宾汉，全面拒绝英方的要求，指出：所谓抢劫，事无凭据，不能赔偿；前已同意英船可自由航行，但不能同意英国雇用的中国木船也有此权利；太平天国志在光复全国，不能允诺不进

攻上海等地；倘上海等地没有清兵或英国愿负责驱逐清兵，太平天国可以不用武力，只派员进驻安抚。

这篇有力的复照对英国的动机和立场提出责问，指出，正当太平天国攻克杭州和派军进取长江下游之际，“贵国欲我军勿攻该地，目的何在？”“贵国伪托友好，暗助满妖，派兵驻守彼等重地，箝制我军行动，宁非怪事？”①

英方当日致书太平天国，威胁说：“贵方对我总司令提议之拒绝，……我国必将相应对待之。”自此，太平天国政府同外国不再有官方往来，英国急剧地走向武装干涉太平天国之路，包括公开支持“常胜军”与太平军作战。

据洪仁玕忆述，洪秀全在起义前就有各国和平相处、友好交往的思想②。但他这种观念可能是朦胧的。他并不了解当时世界之形势，甚至也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些主要国家。起义后他自称天下万国之真主，其意义虽然主要是宗教上的，但却容易和中国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相通。太平天国前期，英、法、美使节来访，杨秀清等在文书往来中，以归顺、来朝、进贡视之，引起了若干礼仪上的争执。但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以宗教相同，同拜上帝，概以“洋兄弟”、“番弟”称外国人，表现出“傲慢和兄弟情谊的奇特混合”。后期，洪秀全给额尔金的诏旨，虽仍自居真主，但只称额尔金是来“朝上帝”的，没有直接说是来朝拜真主本人，这在外交的方式上是一个进步——虽然把额尔金之来意当作“朝上帝”也是误解。几个月后，洪仁玕来到天京，建议外交来往中不用“万方来

① 复照原件不存，此据（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亲历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23—326页。

② 见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53—854页。

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洪秀全同意。自此,太平天国在外交的观念上抛弃了旧日的落后传统,但对外国侵略的实质仍然没有认识,仍然幻想着同拜上帝的“洋兄弟”和他们有同一的目标。

从自居天朝上国、幻想外国和自己有共同的目标,到指斥英国“伪托友好、暗助满妖”,是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根据实际的体验而产生的认识上的变化和进步。太平天国拒绝不进攻上海等地的要求,同外国侵略军和雇佣军浴血奋战,他们的战斗具有反侵略的性质。

但他们的反侵略斗争是依据怎样的原则?或者说,他们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太平天国所强调的是国家领土的完整。以赞嗣君蒙时雍等的名义拒绝允诺不进攻上海等地的照会中再三申述的理由就是疆土,说:“我军肩负重任,为上帝光复全国,不能弃寸土于不顾”,“我国以疆土为重,……所欲恢复者中国也”。由于坚持光复全部疆土,洪秀全在晚期还作出了一项重要决策:不与外国武力合作以平分地土。这件事是“李秀成自述”中提及的,他说:

> 鬼子到过天京,与天王及(叙)过,要与天王平分地土,其愿助之。天王云不肯:“我争中国,欲相(想)全图,事成平定(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①

此事不见于其他中外文献记载。李秀成以太平天国的军事统帅提到这件事,其真实性是无疑的。

光复全国,不能弃置寸土,或者说,我争中国,欲想全图,这

① 见罗尔纲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 351 页。

正是洪秀全坚持的原则。这一原则不论是否可以称为“民族主义”，但在道光、咸丰年间外国入侵的年代，却指导了太平天国作出了反侵略的业绩。

第七节　后期的政策和失败

洪仁玕到天京受任精忠军师干王后，向洪秀全呈递了一篇《资政新篇》的重要文件。它对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外交、社会、文化、宗教，提出了全面的政策见解，洪秀全几乎完全表示同意。

《资政新篇》主张兴车马舟楫技艺之利，鼓励制造轮船火车和各种器皿，准许专利；兴银行，准富民集资设立，以利于商贾士民；兴宝藏，准民探矿开矿；兴邮亭、书信馆以通公私书信；兴新闻馆以报时事常变，物价低昂；兴市镇公司以司工商水陆关税；兴士民公会，由民办理救济、教育事业；兴医院、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等以济民间疾苦，等等。这是一幅发展资本主义和使中国近代化的蓝图，与洪秀全早年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的旨趣大不相同。

洪秀全虽然赞同洪仁玕的纲领，批准镌刻颁行，但一年以后他又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说明了他思想上的矛盾，说明了他对古代大同世界的偏爱胜于近代资本主义的乐园。然而，如前所述，他的大同理想由于不切实际，并不能刺激农民的积极性。洪秀全没有找到其他的真正出路，于是只好转向轻徭薄赋以吸引、团结人民的传统政策。

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克复苏州和苏南各属州县以后，

洪秀全发布了一道谕“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的诏旨。这是存世洪秀全诏旨中少有的直接涉及民生问题的文件。诏旨首先表明太平天国关心民生疾苦:“民有饥溺朕饥溺,痌瘝在抱秉至情”,“上帝基督带朕幼,照见民困发政仁。酌减征收舒民力,期无失所安众心”。它宣布:“朕格外体恤民艰,于尔民应征钱漕正款,今(令)该地佐将酌减若干。”[1]洪秀全的诏旨在苏南各县得到了宣传、执行。诏旨于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九月颁刻,十一月,常熟县“堂然伪天王黄榜,抚恤民团,起征粮米”[2]。这一年减征的成数不详,但存世的两件东珊县(今吴县东山)民人辛酉十一年、壬戌十二年地丁银完纳执照,均钤有“奉令减免一成,遵照九成完纳”的印记,可见减免政策一直实行了几年。苏南主要是李秀成的辖区,李秀成有强烈的仁政、爱民思想,他贯彻减征政策是尤为突出的:“苏州百姓应纳粮税,并未足收,田亩亦是听其造纳,并不深追”[3]。

获得民心,争取人民的拥护,是太平天国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清朝有识见的统治者也明白这一点,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与太平天国对抗的同时,先后在长江流域各省推行“减赋”,其重点“在裁减浮收,剔除中饱”,其用意之一,即在与太平天国争夺民心。洪秀全“减征”,减及田赋的正额,比清朝的政策更进一步,而且太平天国虽允许业主收租,但在若干地区又有限租、减租之规定。这本来应更有利于太平天国争取包括自耕农和地主在内的土地所有者以及佃农的支持,但事实却不

① 《谕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1页。
②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0页。
③ 李秀成自述语。见罗尔纲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222页。

然。太平天国版图内人民的负担，田赋仅是其中之一。后期疆土缩小，但征战频繁，军需日殷，更非田赋收入所能支持。因此，各统兵将领、基层官员经常向地方派征银两、物品，各种捐税名目繁多，其负担甚至远超过田赋的正额。如驻在安徽旌德县的一名将领给乡官下令，要每旅筹办饷银1000两，食油1000斤，盐1000斤。按规定的编制，一旅只有500户，要他们负担1000两饷银，就相当于上万亩的田赋。又如浙江桐乡县征收军需捐，是田赋以外的附加税，但高出正额1倍以上。这些捐税的名目，有些似乎是统一规定的，如田凭费、店凭费、门牌费、田捐等等，另有不少则系地方将领或乡官自定。捐税和摊派大多按田亩计征，使土地所有者的负担远甚于正额减征得到的好处。还有一些是按户计征的，更波及了无地的贫民。洪秀全的轻徭薄赋政策最后也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太平天国的斗争就成了一种单纯的军事斗争，在清朝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不能不陷于失败。

后期太平天国虽曾取得占领苏南、浙江大部分地区的胜利，但好景不长，自同治二年(1863)后又相继丧失，而后天京被曾国藩直接指挥的曾国荃军包围。在形势逆转并且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即放弃天京，经江西、湖北与在西北的太平军会合，另图发展。"这确是当时太平天国唯一的救亡良策"[1]，但洪秀全坚持死守南京。城中被困缺粮，饿死者日增，洪秀全命"合城俱食甜露，可以养生"。甜露是旧约圣经神话中上帝从天降下的一种食物，洪秀全这里所指的是一种草。他自己久食

① 见《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10页。

此草,因而得病,于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四月十九日(同治三年四月十九日,1864年5月24日)去世。十多天后,天京城破,太平天国灭亡。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失败,标志着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终结。



第四章　李　秀　成

李秀成原名以文，生于清道光三年(1823)，广西梧州府藤县宁凤乡五十七都长恭里新旺村人。父李世高，母陆氏。李秀成家庭贫苦，属于农村中的“半无产者”，他在“自述”中说：“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难，种山帮工就食。”李秀成说“自幼时八、九、十岁之间，随舅父读书”。念了3年私塾，就因“家贫不能多读”。辍学之后，曾经在私塾里帮过工。

大约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左右，冯云山在桂平紫荆山一带组织的拜上帝教，已经传播到藤县。李秀成由于生活贫困，深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对拜上帝教宣传普天之下皆为上帝赤子的平等思想，很容易接受，便加入了拜上帝教，是拜上帝教的虔诚信徒。他在“自述”中说过：洪秀全“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若云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李秀成加入拜上帝教主要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赞赏拜上帝教的平等思想和劝人为善。所以，他“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

金田起义之后，咸丰元年八月(1851年9月)，太平军进军永安州途中，萧朝贵、韦昌辉率部在李秀成家乡驻扎，李秀成被卷进革命的洪流。后来他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他是“被团练之

逼，故而迷迷而来”。又说“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说明他参加革命时对革命的意义认识还不是十分清楚。不过，他从只怕蛇虎伤人而恪守教义，到拿起大刀、梭标闹革命，从一个普通农民，变成了太平天国的战士，这是他一生不平凡历程的开始。

第一节　从战士到将领

从广西到金陵，李秀成从一个普通的太平军战士，逐步成长为一个有觉悟有才能的军事将领。他在“自述”中说：“一路自粤西而来，前之内政，俱不经我手。”咸丰三年二月(1853 年 3 月)太平军攻克南京之后，李秀成已“随春官丞相胡以晃理事”。随后经杨秀清“调保”为“右后四军帅，把守太平门外新营”。同年八月调升为后四监军。十月，随石达开到安庆抚民。李秀成在“自述”中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皖省巡查民务，又兼带兵，修营作寨，无不尽心。”石达开等“各上司故而见爱”。数月之中，李秀成屡次升迁，说明李秀成的才能得以发挥。咸丰四年(1854)春，胡以晃攻克庐州，李秀成被奏调去镇守庐州。之后不久，李秀成被调镇守和州。前些年发现的《太阳河牛路码头渡船规条碑》，其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凡无钱之人，有紧急事情，务宜飞渡，虽系一人，亦须送去。”此碑立于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正是李秀成镇守和州期间，表现出李秀成的爱民思想和鲜明的阶级意识。

当然，李秀成在军事上的突出才能还是在救镇江之役开始显露出来。咸丰五年(1855)秋，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和总兵张国

梁率1万多清军围困镇江。对于太平天国来说，“镇江为金陵之咽喉，必应坚守”①。咸丰五年末(1856年初)，太平军由燕王秦日纲挂帅，率冬官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等去救镇江。清军连营达30余里，营盘十分牢固。太平军与清军交战10多天，未能破围。李秀成说：“那时我欲救不能，吉、张破我不下，两边安寨对扎，两不交战。”这种两军对峙的局面，对太平军是十分不利的，守将吴如孝困守在镇江城里，已处于弹尽粮绝境地，随时有被清军攻破的危险。李秀成不是救镇江的主帅，但他面对着这种军事形势，却主动协助秦日纲制订破敌对策，决定派年轻勇悍的陈玉成“坐一小舟”，由水面而下镇江。陈玉成冒着枪林弹雨，“舍死直冲到镇江”，和镇江守将吴如孝计议，按照和李秀成约定的时间，集中兵力从城里打出来。而李秀成等则同时从城外攻入，争取两军会师。当时李秀成所部驻扎在汤头，汤头到镇江之间有一条小河。清军地踞险要，扎营河边。李秀成说：“此地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两进为难。”为了牵制清兵，李秀成移师到河边扎营，清军见李秀成摆开攻营阵势，立即把清营“移入汤水山边”，扼住太平军和镇江守军联系的通道。李秀成决定由陈仕章、涂镇兴、周胜坤率兵去攻打清营，而自己挑选3000精兵，乘雾避开清军越过汤头岔河。按原定时间，李秀成击破围城清军的营垒，按时和陈玉成、吴如孝由城里打出来的部队会师，士气大振。李秀成在“自述”中记载了这次战役：“汤头岔河隔汤头水山边廿里之大概，那时镇江吴如孝、陈玉成兵亦到，两下接通。那时欢天喜地，内外之兵，和作一气，大锐声张，与吉、张两帅答话。次日开

①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第8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571页。

兵,吉、张兵败,失去清营十六座。”清人陈庆年在《镇江剿平粤匪纪上》也说:“我军先屯岔河,凭险自固,贼移营汤水相抗。我军亦移垒往逼。庚子,伪丞相涂镇兴选悍党突至,李秀成乘夜袭汤头旧垒,断我后。……我军与贼搏于汤水,相角至午,始知后路被袭,甫引军还斗,城贼已大至。”陈庆年是丹徒人,熟悉本地情况,所记和李秀成所述情况是一致的。镇江解围之后,李秀成等为了扩大战果,当晚就和陈玉成等率主力渡过瓜洲,突袭江北清营,破清军营盘100余座,并攻占扬州,将江北清军的存粮悉数运入镇江,为后来太平军固守镇江作了物质上的准备。随后,于五月间,李秀成等奉命回援天京,他从金山渡江,进攻高资清军营盘,清军主帅吉尔杭阿自杀。九华山一带清营七八十座,因军中无主,全部溃败。李秀成乘胜追击,在丹徒又击溃清将张国梁所部。至此,镇江周围的清军全被打垮,镇江之围遂解。

镇江的解围,为杨秀清计破江南大营创造了条件。李秀成和陈玉成奉命回师南京。咸丰六年五月(1856年6月),李秀成、陈玉成等配合石达开等部,通力合作,大破向荣盘踞达三年多的江南大营。几年之中,李秀成从一个普通士兵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将领,时势使英雄人物脱颖而出。

第二节 被封忠王

破江南大营之后,李秀成等奉命率兵东进,接连攻占句容、丹阳,迫使由天京败退下来的向荣“自缢而死”。两个多月后,即八月初四日(9月2日),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袭杀东王杨秀清,并借机扩大事态,杀东王所部连同家眷2万多人。洪秀全在

石达开和天京军民的支持下，诛杀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石达开奉诏进京辅政，被天京臣民称为“义王”。但是，洪秀全对石达开信用不专，并有意重用其兄洪仁达、洪仁发，钳制石达开。咸丰七年五月（1857 年 6 月），石达开被迫离京出走，带走精兵 20 多万人，使太平天国一时出现“国中无将，朝中无人”的危局。

当时太平天国占领区，有点力量并能带兵作战的将领只有李秀成和陈玉成，天京叛乱时，李秀成在句容一带驻守。咸丰七年（1857）初，李秀成联合捻军在安徽霍丘、颍上取得了胜利，又和陈玉成大捷于安徽桐城，占领六安。石达开出走之后，镇江被清军围困，粮食几乎断绝，每天只能发给士兵米二两八钱，有的只好以芦根、野菜充饥，镇江军民面临着覆灭的危险。洪秀全求救于石达开，石达开不理睬，只好调李秀成下救镇江。李秀成奉命率领一支精兵攻入镇江，救出城中兄弟。这一举动对天京军民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李秀成的声誉也由此而提高。此后不久，大约在咸丰七年（1857）冬，洪秀全自任军师，并选李秀成和陈玉成、蒙得恩、李世贤等出来助国，李秀成任副掌率“提兵符令”。

李秀成手中有了权，很想干一番事业，但当时朝中政事不一，人心慌乱，无从着手。经过再三考虑，他认为只有整肃朝规，才能改变人心慌乱的局面。于是他下决心冒死直谏，希望通过说服洪秀全来施行自己的治国之道。正如他在“自述”中说的，是“尽心力而奏谏，恳我主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整朝纲，明正赏罚，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宽刑以待万方，轻世人粮税，仍重用于翼王，不用安、福王”。这是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的施政纲领。中心思想是“申严法令，整肃朝纲”，希望建立一个圣君贤相的天朝，恢复杨秀清执政时律法森严、国政划一

的局面。但是,洪秀全却报以极大的不满,李秀成因此而罢官。但李秀成出于维护太平天国的事业,把个人得失置于度外,再次写了奏章,“将天下大势情形,并陈奏谏之来历”。李秀成在进谏之前,先将奏本交大臣传阅转奏。在合朝文武大臣的支持下,洪秀全才重新恢复李秀成的职务,削除安、福王的爵位,并派人携金牌一道及合朝文武签名的表章要求石达开回天京共秉朝政。尽管石达开没有回来,但李秀成的据理力争,洪秀全还是采纳了一部分意见的。随后不久,太平天国恢复了五军主将制,陈玉成被封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这个班子的建立,使动乱之后的太平天国才“稍可自立”。

但是,韦昌辉叛乱和石达开出走对太平天国的打击是十分严重的,留在太平天国占领区的太平军大多是老弱病残,无战斗力,清军乘机对太平天国各占领区发动猛烈进攻,军事重镇频频失守。湖北的武昌,安徽的庐州、巢县、和州,江西的袁州、临江、九江等都先后被清军攻占,曾国藩扬言“金陵指日可克”[①]。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形势下,李秀成从被动中看到主动,他对太平天国的形势作了认真分析,对敌我双方的形势作了乐观估计。他指出清军“好勇而心不齐”,取胜是暂时的现象,太平军虽然暂时处于劣势,却还存在着许多有利条件。李秀成认为“上有皖省无为、巢县、芜湖,有东西梁山之固,有和州之屯粮,又有两浦之通,即使被德帅(德兴阿)攻破两浦,尚有和州之上未动,京中兼有余粮”。“粮米丰足,件件有余,虽京兵少,有粮有余而各肯

①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59页。

战，因而坚稳也"[1]。从两军的态势看，李秀成坚信天京仍然是"坚稳"的，因太平军人马虽少，但士兵"肯战"。李秀成并不悲观，他认为只要把现有的部队积极调动起来，集中兵力打击敌军，太平军是有可能重整旗鼓的。作为一个优秀将领，他能够在不利条件下去寻找有利因素，有了这样一个充满信心的估计，他就有可能去找到最有利的时机和最可行的计策来战胜强大的敌军。这一点是李秀成的杰出之处，也是他能够援救危局的极为宝贵的条件。

咸丰八年二月(1858 年 4 月)，李秀成为克服天京的被动局面，决定亲自出京到外围扩大兵员，伺机回救天京。李秀成一到安徽就连克昭关、和州、滁州、全椒等地，颇有旗开得胜之势。但这些胜利都还不能给清军造成威胁，为了从根本上扭转战局，李秀成意识到，必须集中兵力，协同作战，才能打击敌人有生力量。为此，他一面在皖北联合捻军作战，一面和陈玉成等将领在枞阳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各誓一心，订约会战"，各路兵马共同负起解天京之围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任务。根据会议决定，陈玉成立即从鄂、皖撤兵东进，由潜山过舒城破庐州；吴如孝部联合捻军龚得澍部攻打梁园、定远；李秀成则由全椒"整队领人马到滁州"。李秀成在乌衣和陈玉成部会合，截击清军德兴阿、胜保所部，一举歼敌 4000 余人。陈、李联军第二天又在江浦小店歼灭来援清军冯子材部 5000 余人，随后又攻克浦口，太平军士气大振。李秀成说：太平军在乌衣、小店歼灭清军之后，"顺势下浦口，陈玉成攻德帅之前，我攻德帅之后，德军大乱，死于浦口二万

---

①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第 2 册，第 801 页。

余人”。这个胜利使天京转危为安,李秀成和陈玉成为了扩大战果,扫荡清军的江北据点,太平军接连攻克江浦、天长、六合、扬州等城镇。这是石达开出走之后,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取得第一次重大的胜利。其后,于咸丰八年(1858)底,李秀成又配合陈玉成部在安徽三河打了一次大胜仗,湘军悍将李续宾部进入安徽后,接连攻占黄梅、宿松、潜山、石牌、桐城、舒城等地,来势迅猛,并想在攻占三河重镇之后进攻庐州、安庆。如果李续宾计谋得逞,太平军将处于十分被动境地。陈玉成、李秀成乘李续宾骄兵轻敌,立足未稳,几支部队同时包围了李续宾部,两军展开激战,一举歼灭李续宾部6000余人,李续宾本人被击毙。这一仗给清军以沉重打击,事后曾国藩在哀叹这一战役时说:“敝邑弁勇,自三河败后,元气大伤。虽多方抚慰,而较之昔日之锋锐,究为减色。”[1]三河战役的胜利,实为后期太平天国军事复兴的转折点。从此,太平军再次由被动转为主动,从处处挨打,逐步转为进攻,并慢慢地恢复了元气。这个军事形势的出现,和陈玉成、李秀成的军事才能是分不开的。

浦口、三河战役之后,李秀成即率兵进驻黄山。但是,在这前后却出现了李秀成两个重要部将的叛乱事件。其一是在三河战役之前,即咸丰八年十月(1858年11月),滁州守将李昭寿率部献滁州向清将胜保投降。李昭寿是由李秀成保举镇守滁州的,但李昭寿其人是由清军投降太平军的,所部纪律极差。李秀成在“自述”中说:“昭寿之兵甚为多事,兵又扰民,逢到州县,要任其支取,不支又扰于民,州县佐将被其打责。”李秀成看到李昭寿这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8,光绪二年刻本。

些劣迹并不追究，反而"无不对他重情深待"。这曾经引起李秀成其他部将的不满。所以李秀成对李昭寿的叛变非常生气，曾发过一篇讨伐李昭寿的檄文，声称："本主将誓必兴师问罪。情义既尽，各路之妖可缓诛，惟胜保与尔(即李昭寿)势必先诛了。"但随后，李秀成却偷偷地把李昭寿"在京所配之妻瞒我天王而偷送付"。暴露了李秀成思想的矛盾和感情上的弱点；其二是咸丰九年正月(1859 年 2 月)太平军江浦守将薛之元献城降清。薛之元也是李秀成保荐镇守江浦的。江浦是天京的北大门，江浦一失，天京形势又变得十分严重。李秀成闻讯后立即从黄山赶回江浦，并立即进攻江浦、浦口，但未能奏效。李秀成求救于陈玉成，陈军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集中兵力救六合、击扬州，在六合歼灭 3000 多清军，然后回师攻克浦口，击毙清提督周天培，打通了天京、浦口的通途。此时由于安庆告急，陈玉成匆忙挥师救安庆，清军乘机又包围浦口。

由于李秀成的两位部将降清，洪秀全对李秀成已存猜忌，恰巧在这时天京的卫戍部队在浦口搜到清军给李秀成的劝降信，天京顿时进入紧急状态，洪秀全下令不让李秀成部过江。李秀成在受到天京严重怀疑的情况下，坚持与清军进行激战，处境十分困难。时间的考验，使洪秀全看到李秀成的忠心，他没有半点降清迹象。于是洪秀全降诏晋封李秀成为忠王，并亲自用红缎书写"万古忠义"四个大字送给李秀成。李秀成是天京事变之后，继洪仁玕、陈玉成第三个被封王的。后来李秀成在追述这段历史时说，洪秀全"封我忠王，乐我之心，防我之变"。其实，这未必是洪秀全的本意，还是因为李秀成确有卓著功绩才封他为王的。

第三节 经营苏福省

李秀成被封忠王之后，面临的第一重大战役是部署第二次解京围。第一次破京围之后，因天京事变，清将和春、张国梁又重新建立江南大营，严重威胁着天京的安全。当时洪秀全主张如同杨秀清破江南大营一样，召集各路勤王之师解京围，李秀成则认为清军“密密加营，深濠格深”，“京城围如铁桶一般”。然而，此时官军精锐都汇集在金陵，而饷源却在苏、杭。因此，他主张轻兵从间道疾捣杭州，杭州危苏州亦必震动，江南大营担心我军绝其饷源，必分师奔命以救之，我军可乘大营虚弱，还军急击，就可以踏破大营，随后挥兵占领苏、杭就容易了。李秀成这个“围魏救赵”以解京围和进军苏浙的计划，得到总理朝政的洪仁玕的赞同。根据这个方案，李秀成自浦口出师，在芜湖作了解京围的战略部署，他用精警的字句激励士卒：“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先须联万心而作一心。”①随后，于咸丰十年正月中旬(1860年2月初)，自南陵经宣城向杭州进发，二月上旬(2月底)攻克广德，留陈坤书等驻守，以作后应。李秀成率谭绍光、陆顺德、吴定彩等将轻师入浙，李世贤也按原计划率部自皖南入浙，合军攻克安吉。随后，李世贤进攻湖州，转移清军视线。李秀成率精兵6000，昼夜兼程，“伪装缨帽号衣”②，直奔杭州，二月二十七日(3月19日)攻克杭州，静候清军援兵到来。几天之后，清江南大营果然派总兵张玉

① 许瑶光：《谈浙》卷3，《太平天国》第6册，第594页。

② 《太平天国》第2册，第852页。

良、浙江提督郑魁士从金陵、宜兴出兵援浙。据记载,江南大营先后抽出精兵1.3万余人,大大削弱了江南大营的实力。

李秀成看到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张国梁派兵来援杭州,知道敌人中计,便在第二天主动撤出杭州,取道余杭、临安进入苏、皖交界的建平。在攻占建平的当天,李秀成在这里召开了解京围的军事会议,后期太平天国的名将李世贤、杨辅清、陈坤书、黄文金等各路将领都来赴会。会上决定由李秀成自溧阳、句阳直趋淳化镇、紫金山一带,主攻江南大营;陈玉成率部自全椒南下,至江陵镇直趋板桥、善桥。其他各路也分别从各个方面配合进攻大营。闰三月(5月),各路兵马同时进击江南大营,踏破清营50余座,"官兵死者数万人"①。这是第二次破江南大营的成功战绩,在太平天国历史上这是一次有名的"围魏救赵"的战例。李秀成是这个战役的直接指挥者,显示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他没有文化,但善于学习。李秀成在杭州时,住张鼎之家,后来张鼎在《庚申泣杭记》中记述这件事时,说李秀成"不加搜括不杀戮";"案头一卷未卒读,《纪效新书》戚公作"。说明李秀成是在努力学习古代兵书的。

第二次解京围之后,在军事上为进军苏、常创造了条件。洪秀全为进取而召开了军事会议,当时有三种意见:陈玉成意在救安省;李世贤主张进取闽、浙;而洪仁玕、李秀成则主张进军苏、常、上海。洪秀全采纳了洪仁玕、李秀成的意见,并派李秀成率主力东征,陈玉成率部进攻扬州,牵制江北清军。咸丰十年三月二

---

①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4页。

十五日(1860年5月15日),李秀成自天京出师,清军于江南大营新败,如惊弓之鸟,无招架之力。几天之中,连克丹阳、常州、无锡。四月十三日(6月2日),攻克苏州。进军的胜利,不仅使天京得以稳固,而且使天京政权得到充裕的粮饷。仅在常州就缴获清军存粮4万余石,火药10万斤,府库存银七八十万两之多,在无锡、苏州也缴获大批粮、银。《幼主诏李秀成》中称李秀成攻克苏、常是“开疆裕国建奇功”,“富庶之区首苏福,陪辅京都军用丰”。而清廷则出现“江浙岁漕二百万石,粒米不得北上”的局面。

攻克苏州是李秀成军事生涯的全盛时期,他的政治主张也得到进一步施展。在攻克苏州之后,以苏州为中心建立苏福省,辖苏州、常州、松江、太仓等郡。为稳定社会秩序,李秀成采取几项措施:(1)举荐乡官,建立地方政权。并在这个基础上,督民造册,把百姓按太平天国基层组织的办法组织起来。李秀成认为“不举乡官即民事无人办理,不造册则户口无从核查”。(2)赈济饥民,扶助农业、工商业,尽快恢复生产,开户营业。为此,经李秀成建议,洪秀全下诏“体恤民艰”,酌减“应征钱漕正款”。(3)着力提倡农耕,对贫苦百姓“给粮给种”。并下令保护耕牛,“牛用耕田,有宰食者杀无赦”。并在苏福省辖内修筑海塘水利,恢复农业生产。(4)镇压地主武装团练。最初李秀成对团练的本质认识不足,对他们采取“不战自抚,招降一切”的办法,以为只要对他们赤诚相见,他们就可以就抚于太平军。实际上这些团练头子为非作歹,他们不断拦路袭杀太平军,并制造了把张家棚全村烧光、杀光的惨案。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下令对团练坚决镇压,对敢于袭击太平军的团练聚而歼之。有一次,他在和聚众造反的团练作战中,击毙击伤团练即达3000余人。采取上述措施之后,苏福

省基本上得到巩固，农业、商业都得到恢复，市场繁荣，苏州人民对李秀成颂声大起。据清人记载，当时苏州市场是“舶来日多，售亦日盛，乡民过午，满载而归，奚止利市三倍”[①]。《常熟报恩坊碑序》[②] 也说，当时常熟是“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归其业”。李秀成的“洋兄弟”呤唎说他在苏州“屡次见到忠王在国人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所有太平天国的将领没有一个像“忠王这样为百姓所热爱”[③]。

但是，由于农民领袖的阶级局限，李秀成在苏福省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却也暴露出不可避免的封建化。他被卷进农民起义的洪流，更多的是想拥立一个“好皇帝”，能共享“天下太平”过好日子。当他被选拔出来任副掌率“提兵符令”时，他要求洪秀全“依古制而惠四方”，希望建立一个“圣君贤相”的天朝。在苏福省握有实权之后，他简单地用“逆”与“顺”来区分善与恶。只惩罚那些敢于公开对抗的地主分子，而对那些表面归顺暗中破坏的地主恶霸，则加笼络和重用。如在基层政权里重用有重大罪恶的钱桂仁、徐少蘧、熊万荃等。这些反动势力潜进基层政权为非作歹。后来甚至发展到要暗杀李秀成，这股势力是苏福省长期不安定的因素。而在税收方面，李秀成则实行保护地主收租。李秀成在苏州发田凭，其部将要地主“放胆持凭”，并明确写有“仰该业户收执，取租办赋”的字样。在遇到农民抗租的时候，李秀成的部将则公开站在地主一边，禁止“抗租抗粮”，并规定“住租屋，种租田者，虽产主他徙，总有归来之日，该租户仍将该还钱米交还原主，

① 潘仲瑞：《苏台麋鹿记》，《太平天国》第5册，第300页。

② 《太平天国》第2册，第887页。

③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88页。

不得抗欠"[①]。如果"佃户匿田抗租者,……本人处斩,田充公"[②]。加上不少乡官是由地主、绅士来充当的,有的乡官竟有"腴田千顷",对其属下"重征厚敛"[③]。这样一来,在李秀成统辖的苏福省,地方政权基本上是封建化了,所以,苏福省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兴盛之后,地方政权很快发生蜕变,在军事形势吃紧之时,便纷纷发生叛乱,加速了太平军在苏福省的失败。

第四节 两次进攻上海

两次进攻上海,对李秀成的军事生涯和反侵略思想的形成都有重要意义。第一次进攻上海是李秀成在攻克苏州后,立即挥师东向直指上海。在天京御前会议上讨论太平军东进时,洪仁玕在分析当时军事形势时说:"惟东距苏、常、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其功易成。"说明东进的军事目标是包括上海在内的。洪仁玕还说,这个计划是经过洪秀全"旨准"之后,"即议发兵"的,可见,洪秀全也是同意进攻上海的。作为东征统帅,李秀成当然也是积极主张进攻上海的。从四月十三日(6月2日)攻克苏州到五月十三日(7月1日),一个月间,李秀成先后攻克上海附近的嘉兴、昆山、太仓州、嘉定、青浦、松江等重镇。当时上海城中守兵才2000余人,加上江南大营溃至广勇数千人,力量不足,居民都很害怕,商贾都关门息市,城里乱作一团,如果李秀成一鼓作气,攻下上海当是不太困难的。但是,李秀成对侵略者本

① 沈梓:《避寇日记》,《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第4辑,第73页。
② 龚又村:《自怡日记》,《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第4辑,第415页。
③ 汤氏辑:《鳅闻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

质认识不足，在扫清上海外围之后，未能集中兵力攻克上海，而是迟疑不决。李秀成希望通过谈判，在取得外国侵略者支持和谅解的基础上，然后再武力进攻上海。因此，他只带领3000随从部队到达上海城下，准备和英、法领事进行谈判。李秀成接连给各国领事致书数件，各国领事不但根本不予理睬，反而由英、法领事出布告称："上海县城及外国租界由英法联军占领"，如果有武装部队走近或攻击上海，英法"联军当依法对待"[1]。侵略者阻止太平军进攻上海本是再明白不过的，但李秀成还寄予一线希望，当陆顺德的部队指向上海时，李秀成却命令陆部停止进攻，等待外国领事正式回信，就这样坐失了时机。外国侵略者利用这些时间建城防，组织洋枪队，进一步加强镇压太平军的准备工作。

李秀成对侵略者的幻想破灭之后，下令部队进攻上海。而在这时，已拼凑起来由美国流氓华尔统率的洋枪队，乘隙袭击松江。清廷借此大肆渲染，并给华尔以3万银两的重赏，以鼓士气。李秀成为报洋枪队袭击松江之仇，亲率大军在青浦狙击华尔的洋枪队。这一仗，把洋枪队和清军打得大败，共"杀死鬼兵六七百人，得其洋枪两千余条"。但是，当李秀成乘胜攻克徐家汇时，英国侵略者一面协助清军守城，一面命令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英国战舰向太平军营地开炮。李秀成所部英勇攻城，在扫清城外清军之后，曾一度突进城区，与敌军激战3天。由于"洋人助妖"，有"一二千鬼子"(即洋兵)阻击太平军，加上遇到暴风雨，内应又被清军破获，太平军终于未能攻下上海而败退下来。白伦在《中国太平叛党志》中说，当太平军进攻城区时，他们用山炮散弹和榴

①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207页。

弹对太平军营地进行猛烈射击,迫使太平军不得不退到射程以外去。随后侵略军的炮艇溯江而上,用大炮继续射击太平军的营地,“这个最后的军事行动达到完全阻止太平军任何进一步进攻上海的结果”。李秀成之所以没有攻下上海城,完全是侵略者“助妖”的结果。血的教训使李秀成觉醒了,他在撤离上海前线时给英、美等国领事发了一个谕示,指责侵略军“不公不义无以复加”,“已坏其信,已伤我和,日后只在上海贸易则已,倘再入我地犯我界,我将与汝算之”①。

第一次进攻上海之后,李秀成奉命参与“会剿武汉以救安庆”的战役。安庆失守时李秀成已率军进入浙江。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 年 2 月),李世贤攻克五口通商口岸宁波,直接打击了侵略者的利益。同月,李秀成攻克杭州。李秀成认为,苏州、杭州已被太平军攻克,上海夹其中间,如果夺得上海,京东千里沃野便全归太平天国所有,而且可以利用这个大港口,取得各国友好人士的援助。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侵略者已和清廷勾结起来,决计联合镇压太平天国。因此,李秀成在第二次进攻上海时,所遇到的敌人主要是外国侵略者。这一点,李秀成是清楚的,在以他部将名义发的一份招降书中明确地指责外国侵略者说:“尔等外国军队更应急速回国,尔等既非我同族,何故与我战争?”② 但这次战争,李秀成由于战略战术比较陈旧,仍采取坚固围城的方法来围困上海,而掌握现代化武器的外国侵略者,却可以用炮火射击李秀成的营盘,使近围作战失去效力。所以,

① 《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3 页。

②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 430 页。

尽管李秀成在嘉定、南翔等地多次击败清军和侵略军，但终因敌强我弱，未能攻下上海城。通过这两次战争，他看清了侵略者所谓“中立”的本质，指责侵略者“公然派本国军队，前来侵犯我国疆土”。从对侵略者的认识不清楚，到比较自觉地肩负起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任务，是在两次进攻上海中形成的。这也是他在被俘以后提出“防鬼反为先”口号的思想基础。

第五节　从愚忠到晚节不终

第二次进攻上海失败之后，太平天国的军事形势急剧恶化。同治元年闰八月（1862 年 10 月），天京被曾国藩所围，形势十分危急，洪秀全命令李秀成率部救天京，没有成功。事后，李秀成率兵入安徽，进攻庐州、桐城、舒城、六安等地，都没有得手。次年四月（1863 年 5 月），李秀成回到浦口时，正遇江水猛涨，又遭清军的截击，10 多万士兵大部分被清军消灭或被水冲走，最后得以渡江回到天京的“总数不及一万五千人”①。

同治三年（1864）上半年，太平天国在江浙各个战场相继失陷。在李秀成第二次进攻上海之际，曾国藩派左宗棠率部入浙，随后宁波、金华等重镇陷落。是年二月（1864 年 3 月），杭州陷落。在苏福省的太仓、昆山、常熟也被攻占。李鸿章勾结侵略军的头目戈登集中力量进攻苏州、常州。正在这时，苏州守将郜永宽、周文嘉、汪安钧等 8 人叛变降清，苏州失守；四月，常州失守，天京危急。当时李秀成在丹阳，其弟李世贤看到天京不能保，劝

①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 499 页。

李秀成"另作他谋"，李秀成不肯，还是赶回天京。第二天，即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的建议。他说："京城不能保守，曾帅兵围甚严。濠深垒固，内少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又说："若不依从，合城性命不能保矣。"李秀成毕竟多年戎马生涯，对天京形势判断是正确的。在当时情况下，"让城别走"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况且，李秀成还提出了"别走"的具体方案。他主张：舍弃天京，尽弃苏浙两省地，御驾亲征，直趋北方，据齐、豫、秦、晋上游之地，以控东南。这些地方清军水师不能到，洋人势力也不能顾及，这样中原可以图，天下可以定。但是，洪秀全未能接受这个方案，而且用"奉上帝圣旨"，"何惧之有?"来驳斥李秀成的"让城别走"。

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担负起了天京保卫战的任务。天京粮食十分紧张，洪秀全命令"合城俱食甜露"，即食树皮草根，他不但自己先吃，而且亲自制作。李秀成为了减轻天京的压力，放出城中饥民达10多万人。这一举动虽减轻了天京粮食欠缺的压力，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天京军民的情绪。特别是在天京保卫战的紧急阶段，洪秀全因食"甜露"生病。四月二十七日(6月1日)，洪秀全病逝，李秀成为了稳住军心，在洪秀全逝世后第五天扶幼主洪福瑱即位，是为幼天王。天京形势越来越恶化，6月16日(7月19日)，天京被清军攻破。李秀成率领余部和清军进行激烈的巷战，第二天清晨他带着幼主，连同1000多余部自太平门侧城的缺口冲出，突围成功。

但是，突围之后，李秀成将自己的好马换给幼主，自己骑的是"不力"之马，在南京清凉山被清军冲散。两天之后，李秀成在荒山被奸民出卖，落入曾国藩之手。

李秀成被俘之初，十分坚强，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曾对李秀成动大刑，“置刀锥于前，欲细割之”，并“叱勇割其臂股，皆流血，忠酋殊不动”[1]。但是，在受到曾国藩的软化和欺骗之后，他却产生了求生之念，写下了一个“亲供”，即《李秀成自述》。“自述”竭尽了对敌人的吹捧和对自己的贬斥，诸如“中丞大人量广”，“一沾清帝之恩，二沾中堂、中丞之德”。说曾国藩“恩深量广”，“仁爱惠四方，兼有德行之心”，等等。此类肉麻的吹捧充斥“自述”，“自述”中还写下了招降十要。“自述”将洪秀全称之为“蒙尘之主”、“不修德政”，把太平天国事业说成是“乱及民间”，是“世人之劫数”。甚至喊出“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的感叹，结论是“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肯用人，亦而死报”。乞降言词，一至于此。李秀成的行为，对于太平天国事业来说，无论如何是个背叛。这对于那些坚持斗争的英雄们，也是个极大的污辱。所以，当洪仁玕在狱中看到“自述”的刻本时，立即逐条进行批驳，表示了应有的义愤。李秀成写完“亲供”后，于七月初六日（8月7日）被曾国藩处死，在他英雄的一生中，最后时刻留下了这个明显的污点，可算是历史的悲剧。

---

①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73页。

第五章 洪 仁 玕

洪仁玕字谦益,号吉甫,生于道光二年正月二十九日(1822年2月20日),广东花县官禄㘵村人,是洪秀全的同宗族弟。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是一个具有特殊经历的人物。特别是他在咸丰九年(1859)从香港来到天京以后,向太平天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主张,希望通过改革朝政,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最进步、最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他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一节 笃诚的拜上帝教徒

洪仁玕从小在家乡念书,和洪秀全一样,曾想跻身仕途,屡次赴考不第。后来在家设帐授徒,自修经史。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考落第,因受《劝世良言》启发,便在家乡创立拜上帝教,自行洗礼。洪仁玕和冯云山是最早加入拜上帝教的人。他和洪秀全一起,着手在他们的族人、亲戚中传教。随后,洪秀全到莲花塘教书,“在未离本村之前,叮嘱仁玕细心研究新教道,并宣传于其家及族人”。然而传教本身很快就和传统势力发生冲突,被人斥之为“疯狂愚蠢”之事。洪仁玕本人因为信拜

上帝教受到其兄殴打，其兄甚至撕破他的衣服，要把他逐出家门。但是，洪仁玕没有向旧势力妥协，为了表示他对皇上帝信仰的笃诚，便将他所在私塾中的孔子牌位拆除，并说："我是不是老师呢？孔夫子死了许久怎能再教人呢？"[①] 在当时敢于这样旗帜鲜明地反对孔子，是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的。

第二年正月灯节，这是花县有名的传统佳节，在这一天，人们照例要用各种形式来向菩萨献诚。本村父老要洪仁玕和洪秀全写歌颂偶像的诗词和对联。洪仁玕和洪秀全严加拒绝并宣传自己是"尊上帝诫条"行事的，因而大受乡间士绅指责，激怒了旧传统势力。加上由于洪仁玕和洪秀全因撤除孔子和文昌牌位，学生惊散，乡绅便借此解除他们的"教席"。洪秀全被迫远适他乡去传教。洪仁玕则因年纪较小，受到家人的阻拦，没能和洪秀全、冯云山同行。但他在本村也呆不下去了，只好跑到清远去教书，并就地传教。无奈收效甚微，几年之间接受他洗礼的教徒才有五六十人。单纯的宗教活动，群众并不热心。洪仁玕和洪秀全以为是教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所以，洪秀全在广西传教半途而废，回粤后便潜心著作《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重新解释教义的书。在这期间，洪仁玕和洪秀全过往很密切，经常和洪秀全一起探讨真道教义。他自己说在和洪秀全交往中知道了不少道理，对洪秀全更加崇拜。当然，洪仁玕的一些思想自然也注入洪秀全的这些著作中。

不过，洪仁玕和洪秀全一样，他们想通过这些教义，大力发展拜上帝教的信徒，希望通过建立拜上帝教，达到"以教治道"的

①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

目的，纠正当时那种“世道乖离，人心浇薄”的社会风气。但是，新教义的编制，是否就能顺利发展拜上帝教，洪仁玕和洪秀全都没有把握。他们想成为一名正式的传教士，以便合法地开馆传教，发展教徒。于是，在道光二十七年二月(1847 年 3 月)，洪仁玕与洪秀全一起到广州，在美籍传教士罗孝全处“研究真道”，罗孝全后来曾经回忆说，洪秀全和洪仁玕“来到广州我的住处，寻求宗教原理”。“我教导他们学习基督教教义和关于圣经的知识”①。

离开广州之后不久，洪仁玕回到花县，曾在家乡学习一段医术，后来又到清远教书。由于冯云山在广西紫荆山创立拜上帝教，把发展拜上帝教和农民起义最终推翻清皇朝的目的结合起来，拜上帝教在广西得到很大发展。洪仁玕对广西传来的消息，大受鼓舞。洪仁玕没能到紫荆山，没能够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准备阶段的工作，也没有能够加入太平天国起义的行列，但在思想上，他是十分向往和积极支持金田起义的，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曾派江隆昌到花县迎接洪、冯族人及亲友。洪仁玕立即响应，亲自率领“五十多人，或为洪、冯族人，或为友人，一同西上，迨抵浔州时，乃闻悉太平军已弃营他去，……不得已乃中途折回”②。咸丰二年正月(1852 年 3 月)，洪秀全再次派江隆昌来粤召亲友入桂。当时清地方当局对洪、冯家族实行镇压，挖坟、烧屋无所不为。在江隆昌的主持下，洪仁玕等积极支持，决定在清远的谷岭发动起义，响应太平天国革命。但由于事先缺乏准备，又没有足够的军需，起义没有成功，江隆昌阵亡，不少人被捕。洪仁玕也被

① 《北华捷报》1853 年 8 月 20 日。

②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 6 册，第 875 页。

擒获，将解官治死罪，幸而他机灵，当晚自解绳索，连同一起被捕的10多人逃入山中，藏匿在山洞中。一连几天，饥寒交迫，历尽艰险才找到一个亲戚家，这个亲戚怕事，竟要将仁玕押送清地方当局投案，幸得一位父老挺身相助，才得以脱险。

咸丰二年三月（1852年4月），洪仁玕逃到香港，住在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处，积极宣传太平天国革命，曾口述由韩山文写成《洪秀全来历》一文。但是，洪仁玕因生活困难，又向往革命，几个月后，他离港回到广东，隐匿在东莞一个朋友家里。次年十月（1853年11月），洪仁玕再度来到香港，学习研究西方先进理论和文化。

第二节　学习西方文化

洪仁玕这次来港起初虽仍然是出于生活所逼，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想仍然撞击着他的心灵。当他口述由韩山文写成《太平天国起义记》一文之后，便又回到上海，希望得到外国军舰的援助从上海到南京，但外国人不肯。当时正遇上海小刀会起义，洪仁玕决心先投小刀会，然后找机会到南京，无奈小刀会首领不相信他是洪秀全的族弟，而没有收留他。不得已，洪仁玕于是年冬，再次回到香港。他决心在香港学习西方文化，以便将来回去辅助洪秀全。

洪仁玕这次来香港，韩山文已经去世。他只好受聘于伦敦浸会，为外国传教士教授中文，兼习天文历法。由于他作风端正，学习认真，颇受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敬重。洪仁玕学习西方文化，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博览所能涉猎到的西方著述，当时香港和

南洋出版许多报刊，介绍西方各国和当地的情况，以此为媒介，洪仁玕了解到不少西方各国的经济、政治、地理、历史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一些传教士来到中国，都致力于译述外国书籍，如《大英国志》、《地理全志》、《联邦志略》(即美国史)以及一些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这些书籍，凡是洪仁玕能拿到的，他都进行认真学习；二是洪仁玕广泛接触外国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大多是些有学问有主张的知识分子，洪仁玕自然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这一次洪仁玕在香港住了 4 年多，通过对各国的政治、历史、地理有关书籍的认真研究和考察，他认识到西方国家有许多可取之处，值得仿效。他认为，如果洪秀全能采用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来管理中国，中国是会富强起来的。因此，他在香港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文化。他曾经遍览了英国传教士里雅各的藏书，对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较深刻的了解，这在当时中国人当中确实是少有的。洪仁玕在香港几年，曾多次想到天京辅助洪秀全，均未成功。这种急欲向洪秀全献策的心情表明他对中国和西方各国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他认为只有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和政治制度，才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唯一通途；他如果继续留在香港，就不会有所作为，只有把学到的东西和太平天国政权结合起来，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咸丰八年五月(1858 年 6 月)，洪仁玕由陆路经广东入江西，曾一度走入清军蔡康业营地，正遇蔡部和太平军杨辅清部作战，清军大败，洪仁玕趁机弃行李而逃离清营。之后，洪仁玕又辗转走湖北黄梅，一直到咸丰九年三月(1859 年 4 月)才来到天京。

第三节　发展资本主义的宏伟计划

洪仁玕到达天京，正是太平天国用人之际。洪秀全经受了韦昌辉之乱和石达开出走的事件后，力挽狂澜，自任军师，又选拔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一批年轻将领出来辅政，使紧张的局势刚刚缓和。但是，由于天京事变所造成的恶果并没有消除，"人心改变，政事不一"，一些新提拔起来的将领，虽有"奋兴之志"，却无精诚合作之心，不少人"各守疆土，招兵固宠"，追求个人爵位和功名，"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①。人心涣散，太平天国极需重振朝纲。洪仁玕的到来，使洪秀全"格外欢喜"，他对洪仁玕出来辅国，寄极大的希望。不到一月，洪仁玕就被封为干天福，几天后，又升为干天义，加九门主将衔，接着又封洪仁玕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授以总理太平天国军政大权的重任。

洪仁玕的这种恩遇，并非寻常之事，他没有参加过太平天国的艰苦创业，在一些人看来是无功受禄。对此，朝中大臣"均有不服之色"。当洪秀全知道诸将不服时，"就传令到教堂齐集众官"，令洪仁玕登台受印，下令"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洪仁玕受命之时，当众重申杨秀清秉政时的各项制度，"又把从前案件批评榜示"，在"万人之前，谈论无错"。这就博得大部分朝臣的信服，称他是"文曲星"。洪仁玕认为朝臣的不服是意料中的事，所以，他一再声明，他来天京"非图爵禄之荣"，只是想向朝廷献策，

① 洪仁玕：《立法制谊谕》，《洪仁玕选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7页。

来达到报效天国的目的。当洪秀全任命他当军师时,他“屡辞未获恩准”。当然,洪仁玕并不是真的辞而不干,而是因“诸将不服”,不得不辞。在辞而未准之后,就表示要“竭力效忠,以报知遇之恩”。

洪仁玕就这样登上了太平天国的历史舞台,总理朝纲,他决心要在太平天国的地区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他很快就向天王条陈《资政新篇》,随后又颁行《立法制宣谕》、《钦定军次实录》、《钦定英杰归真》等书,详细阐述了他改造太平天国政权的主张。当然,在这些著作中,尤以《资政新篇》最完整、最全面地揭示了他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主张。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是有重要价值的:

第一,革新政治,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性质的天国。《资政新篇》一开头就说:“照得治国必先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本军师恭膺圣命,总理朝纲,爰综政治大略,编成《资政新篇》一则。”这个说明十分重要。洪仁玕把“立政”放在第一条。而所谓“新篇”,“新”就在于区别旧的纲领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早期的纲领,带有极大的空想性,早已名存实亡。而《资政新篇》正是针对着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有纲领有措施地提出了“治国”、“立政”和“取资”的方案。

革新政治,首先必须从中央进行整顿。中央没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机构,励精图治也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当时中央领导集团各有一心,甚至“各有散意”。一些军事将领则“各守疆土,招兵固宠”。官员之中结党营私的更是屡见不鲜。因此,洪仁玕提出“禁朋党之弊”,他指出:“朝廷封官设将,乃以护国卫民、除奸保良者也。倘有结盟联党之事,是下有自固之术,私

有倚恃之端，外为假公济私之举，内藏弱本强末之弊。为兵者行此，而为将之军法难行；为臣者行此，而为君之权谋下夺。"① 洪仁玕还规定，对那些"越队求荣"，"私镌伪铸"印章的，或"私与官职"的，"当律以大辟，私受官职者亦正典刑"②。想从根本上杜绝各级将领随意拉拢亲信、封官给禄的现象。显然，他希望建立一个仿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政府，他不赞成事无大小都由天王一人裁决，而是主张发挥中央行政机关的作用，建议天王"更立一无情面之谏议在侧，以辅圣聪不逮"③。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主张政府官员要接受群众监督，设立新闻纸和意见箱。对行为不轨的官员及时进行揭露，这样就可以使"奸者股慄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希望把太平天国政权改造成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

第二，建立法制，以法制来巩固国家政权。洪仁玕在《立法制宣谕》中指出："国家以法制为先，法制以遵行为要，能遵行而后有法制，有法制而后有国家，此千秋不易之大经"。把立法看成是整顿国家的当务之急。在《资政新篇》的"法法类"中认为，如果政府规定的法律都是以法法之之法，多是遵五美、摒四恶之法，诚能上下凛遵，则刑具可免矣。至于那些不遵法的"顽民"，则用刑法来处治他。因此，《资政新篇》又有"刑刑类"之规定。洪仁玕的立法思想，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主张以"教化"为主，他认为应该是"治人心恶之未形者，制于萌念之始"。太平天国的刑法过于残酷，如辱骂官长、夫妻同宿、饮酒、赌博等都属"斩首不留"；在

① 《资政新篇》，《洪仁玕选集》，第4页。
② 洪仁玕：《立法制宣谕》，《洪仁玕选集》，第27、28页。
③ 《资政新篇》，《洪仁玕选集》，第21页。

刑法中,除杀头外,还有点天灯、五马分尸等酷刑;而所谓违犯“天法”,被冤杀、错杀的也为数不少。因此,洪仁玕又提出“勿杀”的主张,这是根据第六天条的“不杀人害人”的原则提出来的。对此,洪仁玕作了如下说明:“盖谓天父有赏罚于来生,人无生杀于今世,然天王为天父所命以主理世人,下有不法,上可无刑。是知遵刑者非人杀之,是彼自缚以求天父罚之耳。虽然,为人上者,不可不亲身教导之也。”行文很清楚,“勿杀”是以教化为前提的。“勿杀”之后,有“大罪宜死者”一条,说明洪仁玕并不主张不杀那些罪大恶极的坏人和敌对分子。

洪仁玕的立法,是针对当时社会和政权内部的弊端而定的。但侧重于整饬国家机关,对各级干部严明赏罚,以扭转队伍中的涣散局面。他主张对官吏要抓赏罚,即“器使群材、赏罚严明”。他认为,“器使则人无乱法,严明则人皆服法,无乱而服,则效命取胜之根也”。他还提倡官员要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守法行为来教化部下,主张“奉行者亲身以倡之,真心以践之,则上风下革,上行下效矣”。

第三,在经济上提出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宏伟方案。主张在太平天国占领区进行经济改革,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有“兴宝藏”、“兴邮亭”几项。中心是发展现代化交通,开办现代化工业。这些倡导不仅有内容,而且有具体措施。如兴车马之利,他认为交通工具以“利便轻捷为妙”,谁能造出如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火轮车,一日夜可行七八千里者,“准自专其利”,鼓励发明创造;而“兴舟楫之利”,则提倡“坚固轻便捷巧”,不论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乎智者自创,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办邮政的目的是“通朝廷文书”,设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在“兴器

皿技艺”一条中，他主张凡是“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而在“兴宝藏”一条，则明确提出：“凡金、银、铜、铁、锡、煤、盐、琥珀、蚝壳、玻璃、美石等货，有民探出者，……准其招民探取。”

另外，在“兴银行”一条，主张有“百万家财者”可申请开办银行，印发纸币。也可由“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此举大利于商贾士民”。

上面这些主张，是明显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蓝图，是任何封建思想家所无法提出来的。它和《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内容是不同的。《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废除一切私有财产，而《资政新篇》则主张发展资本主义，鼓励财产私有。后者是符合时代潮流的纲领，前者是一个空想的乌托邦的纲领，不能等同而论。

第四，推行进步的文化政策，提倡“文以纪实”。他来到天京，发现太平天国文风很坏，广泛流行着“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现象。一些文人的文章，不论“简短长篇，无非空言假话；下僚之禀贴面陈，俱是谗言赞誉”。因此，《资政新篇》明确规定，一切文件“只须写实，勿着一字浮文”。他把文风的好坏看成关系到官员是否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工作的问题。洪仁玕指出：“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绝乎邪说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于新天新地之大观。”

文字是宣传政策主张的工具，文风和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因此，洪仁玕十分注重文风，他特地给合朝内外官员士人下了一道《戒浮文巧言谕》，规定：“照得文以纪实，浮文在所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理由是这些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明晓，不得稍有激刺、挑唆、反间，故意令人惊奇危惧之笔”。若使人“听之不聪，即将贻误非浅，可见用浮文者不惟无益

于事，而且有害于事”，后期太平天国的文风有所改进，跟洪仁玕的这些提倡是分不开的。

第五，在外交政策上，洪仁玕主张平等互利，主张积极和先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由于封建皇朝长期闭关自守的影响，洪秀全、杨秀清在和外国人打交道时都曾以“天国老大”自居，把外国和太平天国的往来看成是“臣服”关系。《资政新篇》在“柔远人之法”中，严肃地指出，那种所谓“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等一切轻污文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并非“经纶实际”。他认为，这些傲慢的语言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无补于事。

洪仁玕主张和先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在如下两个方面他的思想主张是突出的：一是建立正常通商贸易关系，而这种通商必须是平等的。他认为，“外洋鸦片烟甚为中国害”，主张“遇其航来之路，或于外洋入口之烟，不准过关。走私者杀无赦”。通过正当贸易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二是准许外国“技艺精巧”的技术人员到中国来传授技艺，实际上是一种早期的技术引进思想。他批驳那种良莠不分、排斥一切外国人的做法。他提出一面允许外国人以技艺来“教导我民”；一面制订“一定章程，一定礼法”加以限制约束。这些外国人在华活动就只能是“为国献策”，而不是“毁谤国法”。洪仁玕想通过发展资本主义达到与“番人并雄”的目的，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尽管由于太平天国的形势所然，《资政新篇》未能实现，但他的方案提出之后，洪秀全都是加以支持的，多处批了“钦定此策是也”、“此策是也”的字样。洪仁玕的这些主张，虽被李秀成认为是不屑一读，但陈玉成却加以赞赏。资产阶级改良派容闳认为“洪仁玕对外面世界的了

解比其他诸王要多,甚至比洪秀全还要多”。容闳还向洪仁玕提出 7 条经济改革的建议,洪仁玕也是加以赞同的,但因当时处于战争年代,加上守旧势力的掣肘,未能实现。但这并不影响洪仁玕的光辉思想作为向西方学习真理的重要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第四节　壮烈殉国　浩气长存

《资政新篇》和《立法制宣谕》的提出,表明洪仁玕的抱负,他希望太平天国政权能通过改革变得更有活力。但是,当时的形势使他的抱负不能付之实现。不过,他作为太平天国的忠诚战士,仍然时刻在为太平天国的事业忘我奋斗。

洪仁玕不是一名行伍军人,但凭他的渊博知识,对敌对我知己知彼,在许多方面显露出他的军事才能。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部署第二次破江南大营,洪仁玕认为:“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围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也。”[1]因此他同意李秀成“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破京围获得成功。破江南大营之后,洪仁玕主张东征苏、常、上海。他说:“为今之计,自天京而论,北距川、陕,西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2] 正如英人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所说的,“太平军自起义以来,就想占有一个海口,以便可以和外国通商,并得到武器和军

①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 2 册,第 851—852 页。

② 同上书,第 852 页。

用品的供应”。洪仁玕希望攻克上海之后，即购买火轮装备太平军，然后“沿长江上取，另发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枝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1]。从这个军事部署看，虽然由于对侵略者可能助清守城甚至出面狙击太平军估计不足，但军事部署还是统筹大局的，是有一定的战略眼光的。上海没有攻下，当时安庆告急，洪仁玕立即又部署围武汉以救安庆的计划。他把安庆、武汉这两个上游阵地看得很重。他说：“夫长江者古号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省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2]这个见解也是有独到之处的，但围武汉救安庆的计划由于陈玉成到黄州后没有挥兵进攻武汉造成军事上失误，也由于李秀成配合不力而贻误战机，武汉没有攻克，安庆保卫战处于十分危急阶段。

正当陈玉成和清军在安庆城外激战之时，洪仁玕奉命到皖南和林绍璋、吴如孝筹兵，并率部两万余人前来救援。但这支部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洪仁玕有筹划之力，却无指挥作战的实践经验，救援部队指挥权借重老将林绍璋，而林绍璋又是早年湘潭失军酿成大祸的将领，生性怯弱又摆老资格，根本不听陈玉成的指挥。陈玉成在安庆大营《致章王林绍璋书》中曾指责林绍璋说：“殿下之兵，一战未开，即行自退，如误大事是殿下一人所误也。”陈玉成批评林绍璋是“轻举妄动，自惑军心”[3]。在这种情况下，洪仁玕两次救安庆都未能奏效。安庆失守后，洪仁玕十分痛心，

---

①②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2页。

③ 见《浙江日报》副刊，1956年9月23日。

他说:“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1] 洪秀全不分青红皂白,因安庆失守革了洪仁玕的职,由正军师降为副军师。大约在这前后,洪仁玕掌理的外交大权也被剥夺了。据说是因为和外国传教士关系过于密切,洪秀全不高兴,才不让他掌理外交的。

洪仁玕在天京的实际掌权时间并不太长,安庆失守被革职后,他虽然回到天京,但由于军事形势日下,也很难左右朝政了。天京失守的前一年十一月,洪仁玕便奉旨出京催兵催粮。天京陷落时,洪仁玕在湖州,幼主洪福瑱逃到湖州,洪仁玕就担负起卫护幼主的任务。他认为湖州势孤“恐难建都立业”,主张到江西联络侍王李世贤所部,然后北渡河南与陈得才部汇合,以图振作。但是,当他到江西时,李世贤早走赣南,洪仁玕、幼天王势单力薄兵败被俘。他履行了他早在咸丰十年(1860)的誓言:“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坚贞不屈,决心效法文天祥,“至于得失生死,付之于天”。临刑之前,曾写绝命诗一首,其中写道:“英雄正气存,有如虹辉煌;思量今与昔,忿然挺胸膛”;“一言临别赠,流露壮思飞;我国祚虽斩,有日必复生”[2],坚信革命事业最终要获得胜利。洪仁玕最后为清廷所杀,被杀前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

①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 2 册,第 853 页。

② 转引自牟安世:《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77 页。

第六章　杜　文　秀[①]

第一节　永 昌 惨 案

杜文秀是近代以回族为主体的云南各族人民联合反清起义的杰出领袖。

文秀字云焕，号百香，回族，云南永昌府保山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十一月初八日，幼聪颖负大志，应童子试，名列前茅。16岁补廪生，中秀才。

清朝政府自嘉庆、道光以来吏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危机四伏。又对回族实行空前的高压政策，民族矛盾日益严重。这时，云南地方回、汉民族经常以日常琐事发生冲突。永昌地处西南边陲，这种冲突尤为突出。地方官吏或敷衍塞责，不能认真办理；或挟私徇情，任意抑扬。于是是非混淆，舆论失实。回族人民衔冤难告，嫌怨日深，从而酿成了大规模的回汉械斗和屠回巨案。

嘉庆五年(1800)，顺宁府(今凤庆)悉宜银厂回汉民因口角争斗，事态扩大，回民被击杀18人[②]。道光元年(1821)，云龙州

---

① 本文原载《回族人物志》第4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 《白羊厂回汉械斗案》，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页。

白羊厂回民与湖广及临安汉人“因争厂地礌硐挟嫌”，发生械斗，双方死伤多人，其中回民居多。回民赴京控告，地方政府奉旨处理，给回民死者每尸给银9两，草草了事①。道光十九年(1839)，缅宁(今临沧)官府唆使地方恶棍屠杀城内回民1700人，同时将城郊五寨回民170余户，全部焚杀②。劫余回民在张富、马效青、黄巴巴、蔡发春率领下，聚众自卫。

清朝地方官府始则“助汉抑回”，终则公开屠杀回民。缅宁事件很快冲击到保山。保山县城内有回民4000余人，城外50余村均有回民居住。道光二十三年(1843)，汉人万春组织烧香会，将金鸡村等七哨汉民，组成数百人一香，或千人为一香。势力既成，目无官府，率众围困县城，企图尽屠城内回民。幸赖太守陈芝楣多方排解，虽未酿成大祸，但嫌怨已深。二十五年(1845)四月，保山城东板桥地方回汉青年因唱秧歌，发生口角，进而斗殴。回汉之不肖乘机煽惑，纠纷日益扩大。而保山县之官府已被汉绅所包围，与香哨首领呵为一气。始则拆毁板桥清真寺，焚烧当地回民房屋。接着又对金鸡村、八达营、乙丑村等处回民大肆屠杀，脱逃出来的回民前往保山城内避难③。

八月，张富等在距保山城六十里地的丙麻地方大败清军，邓川知州恒文据此以为保山城内回民“悉属匪类”，密召香首周

---

① 《白羊厂回汉械斗案》，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页。

② 《马文昭叩阍封章》、《缅宁回民叩阍稿》，白寿彝编《回民起义》第1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2年版。

③ 李丙元：《永昌回汉互斗及杜文秀实行革命之缘起》，《回民起义》第1册，第15页；盛毓华《永昌回汉互斗案节略》，《云南回民起义史料》第63—64页。

曰庠、练首沈聚成密谋策划，亲授屠杀回民机宜。九月初二日黎明，哨练入城。城内原住回民加上从城外逃进城的，共有8000余人，“无分老幼男妇，混行杀戮”。杜文秀阖家遇难，仅以身免。他的未婚妻马小有姑被恒文家奴黄贵掳匿。当时人即称此为“永昌惨案”。清吏昏庸，回汉之争，至此转为纵汉杀回的局面。风声四播，人心益增不安。保山以外各州县，也不时发生流血事件。

第二节　北上叩阍

道光二十六年(1846)，杜文秀星夜绕道至昆明，向云贵总督贺长龄上诉，长龄未能秉公办理。文秀与丁灿庭、白廷杨、刘义、沐文科北上京城叩阍。要求严惩永昌屠回案的凶犯，为死者昭雪。二十七年七月，道光帝命陕西巡抚林则徐为云贵总督“赴滇审办”。则徐抵滇，以“只问良莠，不分回汉”相标榜，实为永昌官绅所左右。道光二十八年(1848)，林则徐师次永平，判七哨凶徒430名；与此同时，他认为滇西回民“良善少而顽梗多”，判回民491名，还冤杀各县回族士绅76人[1]。更以“安抚”为名，将保山孑遗200户“难回”强迫押送瘴毒之地潞江西岸的官乃山居住。文秀于二十七年九月被刑部押解回滇，他看到永昌惨案如此了结，实出预料。冤案未雪，孑遗者又面临灭种之横祸。他在压力之下不得不书写“遵断甘结”，表示承认林则徐对此案

① 马元：《林则徐与“白绫血书”》，《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的判决，因此还落了个“状告失实”的罪名。他家资荡然，无以为生，又不愿迁居官乃山瘴毒之地，便辗转于成都、蒙化（今巍山）之间。在成都忧愤成疾，几乎病死。继至蒙化，暗中结盟，建立了“忠义堂”、“永胜堂”，联络各地义士，宣传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消息，俟机应变。

叩阍的失败，使杜文秀丢掉了对清廷的幻想，最终被迫走上了武装反清的道路。

第三节 丙辰惨案

咸丰六年（1856），有临安矿商与回民争楚雄石羊银矿，诉于官。官府裁决不公，见临安人势盛则扶临安抑回，回人势盛则扶回抑临安，导致流血械斗，互有死伤。临安人退出矿区，将其积恨转移于一般回族民众。二月，临安人尽屠南安、楚雄、三井、武定、广通、禄丰等处回民，并扬言要进省屠杀由楚雄逃至昆明的回民。于是，滇东南的新兴（今玉溪）、昆阳、澄江等地回民风鹤频惊，一如道光年间永昌的回民，人皆自危。

有新兴武举马凌汉，“恨临人之强横”，“怒官吏之不为保护”，便挺身而出，于四月初九日率众从海口到达昆明，驻顺城街清真寺内，意在堵御临安人，保护省城回民。省府不察，派昆明县王某、邑绅黄琮等出城弹压，令其解散。凌汉历诉回民受害情形，请求申雪，官府漠然视之，对临安人反行袒护。凌汉愤极大骂，官府对城内回民益加疑惧。

时藩司青盛，素歧视回民。黄琮奉旨团练，私意亦在制回。今见马凌汉此举，遂起剪除回民之心。碰巧马凌汉在城外打了一次

胜仗，有省城陕西回族武举妥福、妥寿前去慰劳。官绅对省城回民疑忌更甚，藉此诬告妥氏"造无门之锁，阴谋作乱"，胁迫巡抚舒兴阿密饬各府厅州县灭回。

初十日，舒兴阿召集临安人和各乡团练绅士入城，听号令。十六日，青盛自上院出，当众紧急宣布："凡遇回人，格杀勿论。"以黄琮为首的团练和临安恶霸，分头搜杀，"不论良莠男女老幼悉殄灭之"[①]。历时3日，杀犹未已。十九日，青盛母亲外出，道经沙腊巷口，见被杀的回族妇女剖腹衔头，卧于血泊之中，胎儿还蠕蠕转动，非常愤慨，回去责骂青盛说："男子作事与妇人何涉，乃惨毒至此也！"[②]因此，杀稍止。然回民仅剩余数十人，押禁在臬署中。妇女投水未死者，则囚禁于报国寺、荩忠寺。临安人见有姿色者，则割襟为记，然后抢劫而去，当时人称这种做法为"割襟"。

这次大屠杀，昆明回民被杀者2000多户，2万余口，较道光年间永昌惨案更加残酷，影响更为恶劣。云南地方最高当局在屠杀省城回民的同时，又传令各府厅州县"聚众杀回，须横直剿灭八百里"。各地官绅、团练便打着"奉宪灭回"的牌子，掀起"灭回"的恶潮。临安、昭通、腾冲、元谋、武定、元江、鹤庆、丽江、剑川等地回民先后罹难。各地回民得不到保护，只得奋起反抗以自卫。一场回民抗暴自卫的风暴席卷全滇。马敏功、马如龙、马德新起于临安；马二花、马连升起于东川、曲靖；马凌汉、杨振鹏起于昆阳、海口；徐元吉起于澄江；田余庆起于河西；马荣起于寻甸。于是，三迤糜烂，滇局不堪收拾。此年岁在丙辰，时人称这次大屠杀为"丙辰惨案"。

---

①② 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回民起义》第1册，294页。

第四节　大理政权的建立

杜文秀既结盟于蒙化，静观时变，及闻楚雄、昆明屠回噩耗，知大祸再起。

三月，滇西北鹤丽镇标千总张正泰聚集无赖游勇，歃血为盟，成立“合义堂”。七月，屠杀鹤庆、丽江、剑川回民，进围邓川、浪穹，兵锋指向大理。大理及郊区回汉冲突不断升级。八月初，大理回民惊恐万状。回民父老求知府唐惇培制止。唐惇培表面上召集回汉士绅商订“互保”条约，实则以堵防张正泰为名，将回族团练全部调往上关防守。回民又请求知县毛玉成保护，毛玉成率众向唐惇培和迤西道林廷禧请命，均遭拒绝。毛玉成垂泪而已。此时有贵州回民吕藩，住在丰城庄，素以多策谋称。情势危急，回民都来找他问计，表示愿意听从他的驱使。吕藩说：“某日黎明，团练汉人将来夺村。我们预先准备好引火之物，埋伏在附近汉村中。等到他们出兵，各村同时放火，他们会心慌意乱，不战自溃了。”大家按照他的主意办理，各个回民村庄幸得一时保存。大理城内回民看到求官府保护无望，只好分区设防，筑起木栅，防备攻击。

初九日，团练期满，迎团于四乡。火烧回族村寨、清真寺。初十日，团练围攻大理西门，回民拼死抵抗，血战数日。后赖有死士50余人，奋力占有武营军库，得火药若干、大刀多柄、陈旧火枪多枝，得以暂时勉强抗拒。

蒙化回民于事前两日得大理回民求救书。“忠义堂”的领导人即在清真寺开会，决议救援。他们通知各村共募得志愿青年近千人。共举马天有带队冲锋，蓝金喜、马朝珍、马金保统帅中军，

马三进士办下关粮草事务，马云霄督后队，杜文秀则订行军律例、掌军法。同时通知“永胜堂”，共起弥渡、赵州回众，会师大理。

八月初五，鸡鸣起行。卯时，已距下关不远，遥见关外汉团来屠下关、营头上、小关邑等处回民。红旗[1]业已进关，有即与城内汉团会合之势。马天有出其不意，挥众而上。红旗军惊溃，马天有遂入下关，进据大理。清军团练均未大战而散，知县毛玉成、迤西道林廷禧，死于乱军之中。知府唐惇培逃往宾川，死于途中。提督文祥时在姚州，分兵回救，为时已晚。其时，张正泰急向大理奔来，回民军分三路出击，大败张正泰军。

杜文秀暨蒙化回民，既据有大理，远近回民，应者日众，势力渐大。蓝金喜、马金保、马朝珍、马良、杜万荣、马名魁等，都自矜有功，各不相下；金喜贪财务得，御下寡恩，更失人望；更有甚者，借机报复，侵扰人民。回民内有识之士，都恐自开衅端，遗人间隙。便发起大会，共同商讨。会中金喜等竞相夸伐，独有文秀沉默不语，最后才说：“欲举大事，须收拾人心，不当专尚武力，且汉众我寡，尤须重用汉人。”大家都佩服他的见解，吕藩尤力赞其议。于是下令严禁杀戮无辜，掳掠民财，并厚葬知县毛玉成。对同情回民的文祥夫人予以抚慰。于是回汉仇杀的局面，顿成过去。而援回抗汉之师，转化成协和回汉各族共同对抗腐败的清朝地方政权的团体。

九月二十五日，文秀被推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升坛授命，授吕藩为军师，马金保为中军将军，杨荣为骠骑将军，刘纲为平东将军，陈义为镇西将军，马良为平北将军，朱开元为平南将军，蓝金喜为奋勇将军，杨德明为左翼将军，宝文明为右翼将军，马

① 当时清军团练执红旗，回民军执白旗。

天有为前军将军，马朝珍为后军将军，张子经为总理军机正参军，马国忠为总理军机左参军，马印图为总理军机右参军。马安国为都掌教，管理伊斯兰教事务。此后又陆续设官授职。大抵武职为将军、大将军、都督、中郎将、翼长、领军、指挥、先锋、统制等，文职为参军、大参军、参议、参谋、主政、主簿、司务等；又有大冢宰为文职之最高领导，大经略为武职之长，有大司马为军事要员，承审司为司法之官。任用之人，开始以回民为多，其后则汉人之数目大增。对各少数民族旧有之土司根据其原来职位之高低授以抚夷大都督、抚夷大将军、宣政司、副宣政司等职。做到"外连夷长，内结汉民，进无异心，退有余地"[1]。宣布起义军的纲领："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

文秀手订《管理军政条例》，内有关于帅府执行5条，关于镇守官吏执行14条，关于军令执行28条，关于行营23条[2]。略见其政治建树之大概。

一、保举官员，须审查才能，酌量功勋。果然堪授此职，方可保举前来。亦须循序渐进，勿得越级滥保。若有不论才能功勋，或私自受贿，或亲故滥行保举，实属不重名器。一经查觉，本人罢职，该保举官滥保一员，降一级，二员降二级；如至十员以上，罢职。

一、地方税课，旧有例者，方准抽收。不得私加名目，妄自征收。如土产等类，亦不准勒逼抽取。违者，一经查觉，小者记过，大者参处。

一、府厅州县各衙门内，不须多养闲人。至六房书吏，两班

---

① 《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47。

② 详见《回民起义》第2册，111—120页。

差役，以及门房签押各行，须择忠厚明白者用之。一切猾吏，不准任用，以为民害，并量其事之轻重劳逸，每月分别等第，给以工食，不准私索民间分文。如有私索一两至五(十)两者，杖一百追赃；自十两以至二十两者，杖二百，追赃抄家；自二十两以至五十两者，拟绞；至一二百两以上者，拟斩。

一、文武官员，无论镇守地方，或攻开地方，不准估娶民间妇女，为妻作妾。违者，罢职。

一、发兵征讨地方，须委统带官一员，即如元帅亲临。所有各将官，无论何职，务须听号令，勿得违抗。如违，准管带官按所订军令认真惩办，而统带官亦须秉公提调，量能委派，不得于所喜之人委以平顺之事，故意使之成功；亦不得于所恶之人，委以凶险之事，故意使之获罪。如违，实属存心偏袒，有负委托至意，应参处拿问。

一、带兵官经过投诚地方，如有擅入村寨，妄动一草一木，奸淫吓诈等情，查出，不论官兵，均枭首示众。

一、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既同营干事，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凌虐。违者，不拘官兵，从重治罪。

一、官兵如经过文武庙宇，不准驻扎。违者，治罪。

杜文秀深受清廷实行的反动民族政策之害，从永昌和昆明惨案中他认识到，直接下令杀害回族人民的罪魁祸首是清廷各级官吏，挑拨回汉“互斗”的也是清廷，汉族人民也“同受其害”，是无辜的。文秀为此制订和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大力改善回汉关系，加强民族团结。他“重用汉人”，“不分汉回一体保护”，“回人犯罪较汉人定罪加严”。在他的297名统属官职中，汉、白、彝、景颇、傈僳、纳西等族官员就有284名，回族官员仅13人。文职36名内阁参军中，大都为汉、白族。十八大司中汉族有大司寇

李芳园，大司成梁国玉，大司略董飞龙；白族中有大司卫姚得胜；彝族有大司防李文学。杜文秀指出："至若迤西，回之受职者数千，汉之受职者数万。"大理政权军队中，"汉兵十之七八，回民(兵)十之二三。"他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十分尊重。杜文秀在民族政策方面用力最勤，效果最突出。民族问题在当时当地是最不好解决的问题，杜文秀成功地解决了。从而实现了回、汉、白、彝、纳西、傣、傈僳、景颇各族人民联合反清的政治局面，为大理政权坚持 18 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杜文秀依李芳园的建议，"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废除府厅州县制，把属地改为 64 四衙，每衙设大使 1 人(镇守使)、参军 1 人(州县官)、主簿 1 人(管财务)、承审司 1 人(管司法)。进而严明法制，廉洁吏治，稳定了社会秩序。传说，当时滇西"偷盗绝迹，夜不闭户"。

杜文秀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对发展农业、商业、矿业、手工业生产极为重视。兴修水利，发贷耕牛、籽种给农民耕种。农忙季节则避免大量调动军队和征调夫役。规定"田赋征粮米，除丁银"。"地方税课，旧有例者方准抽取。不得私加名目，妄自征收"。"每年征粮一次，其余大小苛敛一律豁免"。并轻征商税招徕外地商人、商贩和手工业者免税；在交通要道或险要地带派兵保护，以利外地商人通行；在外商贸易之地设立专门办事机构；对进入滇西货物数量及其价值进行登记，如其在境内被盗或遗失，由地方当局负责赔偿；整修道路，促进滇西与四川和缅甸之间的贸易；在大理南门外、永昌、腾越等地设立行店和货栈为商人提供方便。滇西地区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较快，一些城市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大理城内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滇西地

区"百姓安居乐业"。

伊斯兰教受到了保护,还有了一些发展。掌教阿訇有一定的地位,有的大掌教直接参与政事①。文秀下令修复了各地被清军毁坏的清真寺,在大理城内新建了几座清真寺,各清真寺设立"经馆",聘请著名经师担任"经馆教谕"、"训导",发展经堂教育,培养伊斯兰学人。同治元年(1862)刊刻《古兰经》,名曰《宝命真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古兰经》刻本。

自咸丰六年(1856)杜文秀得大理建立政权,延揽人才,励精图治,扩充军队,向四方发展。经11年之久,至同治六年(1867)十月,大理政权已奄有云南之半。昆明西之镇南、姚州、赵州、弥渡、宾川、云南、邓川、浪穹、云龙、丽江、鹤庆、剑川、永昌、永平、龙陵、腾越、顺宁、云州、缅宁、永化、蒙化、大姚、姚安、广通、中甸、维西、禄丰、安宁;昆明南之思茅、普洱;昆明北之罗次、武定、元谋、禄劝,均已归大理政权掌握。其最盛时已占有云南53座城池。昆明东之曲靖、寻甸,阳受云南政府的任命,实亦阴听杜文秀的指挥。贵州方面,则有金万照、张翎翔、马河图等,占据新兴府及普安厅所属各州县。陕西、四川方面,则有蓝大顺、蓝二顺、蓝朝鼎等先后攻至绵竹、西安。这几方面都是大理政权的别动队。此时大理政权几近掌握西南各省。

① 田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后注文43引"印度事务部档案"称:大理文职官员等级表中包括一些宗教领袖的官衔,如维持清真寺都掌教(从二品),都掌教(正三品),副都掌教(正四品),都掌教典籍(从四品),都掌教中书(正五品),司经馆教□(谕)(正五品),司经馆训导(正六品),司经馆主簿(正八品),司经馆司务(正九品)等。这段记载的实施情况,尚不了解。

第五节　四反围剿

咸丰六年(1856),大理政权建立伊始,提督文祥奉朝廷命自姚州向大理进发。都司何有宝奉恒文命西上,与文祥会师。何有宝骁勇当前锋,所向披靡,从镇南直攻至红岩、赵州,距大理30里。杜文秀亲率大军前往迎敌。暗派吕藩诱说何有宝之子自清。文祥拟诱捕何有宝父子斩之。何有宝杀捕者,远遁。杜文秀挥兵掩杀,文祥营溃乱,退回镇南。清军第一次西征,被杜文秀击败。

十年(1860)二月,提督褚克昌倾师西犯,连陷姚州、大姚、云南等县后,又分兵进攻红岩、弥渡、宾川。大理震动。杜文秀亲率大军于红岩、赵州对敌,急调扬威大都督蔡发春于云州星夜来援,乘其不备,相继克复红岩、弥渡、云南县等要地。时迤东南友军马如龙率领东南回民义军赴迤西援助,自曲江出发,取道通海、嶍峨(峨山),出易门,入南安州(今双柏)。宜良汉族诸生李芳园亦率部由安宁经易门至南安州,联合攻取广通县,进占楚雄,截断褚克昌后路。褚克昌粮运不济,军心动摇。七月,蔡发春攻克褚克昌的宾川大营,褚克昌兵败身亡,全军覆没。清军第二次西征,也被杜文秀击败。

同治二年(1863)八月,署云南布政使岑毓英镇压了迤东曲靖等地回民起义军,率大军西征,破杜文秀于罗川,进占楚雄,分军取景东,复元谋、镇远。邓川、云南、赵州、浪穹、鹤庆、弥渡、宾川均不战而得。继陷永北,败杜文秀于镇南。岑毓英遂命张润、张愉等攻上关,钱大川攻下关。杜文秀督师力战,清军攻上下关者皆败。杜文秀挥兵追击,诸城已失复得。岑毓英腿部中伤,命

李惟述扼楚雄,余部退归省城。清军第三次西征,历时一年,终被杜文秀击败。

同治六年(1867)正月,马如龙已降清,为临沅镇总兵,继署提督,久久无功,不为清廷大吏信任,急于立功自效。清军分中路(西路)、北路和南路发起攻势。中路又分为二支:一由参将杨振鹏、副将李惟述指挥,自楚雄攻镇南;一由参将杨先芝、游击合安国指挥,夺取姚州。北路由昭通镇总兵杨盛宗指挥,自昭通进攻永北,再出鹤庆、丽江,攻占上关。南路由署腾越镇总兵田仲兴和署普洱镇总兵李锦文指挥。其一自景东攻蒙化,一自普洱攻威远、云州和缅宁。马如龙亲率兵9000,在楚雄、定远之间往来策应①。四月,杜文秀分三路反攻,一出大小骠川进攻楚雄;一援镇南,攻大姚;一驰援姚州。马如龙本与杜文秀同时起兵反清,其部下大都为回民,今马如龙同室操戈,屠杀同族兄弟,部下多不乐意。合安国、杨振鹏且与杜文秀暗有联络。马如龙军容虽盛,实无战志。未几,杨振鹏溃于宾川,合安国溃于姚州,李惟述退保楚雄。其北路杨盛宗溃于永北,撤回昭通。南路以"瘴疫盛行,粮饷不继"为借口,田仲兴退守新平,李锦文部撤归普洱②。马如龙称病,引兵东归昆明。清军第四次西征,又被杜文秀击败。

第六节　反　招　抚

清朝云南地方当局对大理政权实行军事围剿不能得手,巡

---

① 《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28,6页。

② 《云南通志》卷110,40—41页。

抚徐之铭奏请朝廷从事招抚。以马德新为云南伊斯兰教著名学者，人望甚著，马如龙与杜文秀同为回民，遂委马德新、马如龙出面遣人西上议和。同治元年(1862)二月，派马载堂抵大理，招抚未成，马载堂反被杜文秀说服留居大理任职。五月，遣督标中军副将杨振鹏奉命再赴大理劝降。行前马德新、马如龙分别致函杜文秀。杨振鹏尚未到大理，五月十五日杜文秀即致书杨振鹏，说明不可议和及难于议和之故，并劝其"无烦尊驾到榆"。其文云：

想滇南大势，自兴师以来，我等所据城池不少，所戕官员甚多，而今竟转和息，复予官职，是无异杀刺史者为刺史，杀宰相者为宰相。体制何存？在朝廷岂不虑贻笑于天下后世乎？推其心，不过因江南未靖，西洋复来，各省纷争，天下鼎沸，暂为缓此急彼。俟彼处稍定，必将举全师以压我境。迨至彼时，我兵已散，我将各离，始知朝廷包藏祸心，则谋不及施，勇不及逞，敫敫待毙，悔之晚矣。此不可和者，一也。

数年以来，我兵到处，杀其父母，夺其子女，搂其玉帛，焚其房屋。凡受害者，无不饮恨于心。所恃者，用威之后，继之以恩。纵有一二不平之人，亦因兵权在我，一切精壮尽为我用，彼即思逞，附和无人。若一从和，则精壮散，兵权分，不平之人于以得计，暗中调为，乘隙生变，以雪前仇，以报前仇。彼时外兵压境，内患迭兴，真使我等手足无措，必将坐受其困矣。此不可和者，二也。

当此时也，我以图谋大事，渐民以仁，摩民以义，凡有驱策，莫不听命。则此时之民，无不视我为父母，即视彼为仇雠。为我驱策，无不听命。若一从和，是为朝廷之民，归之朝廷。彼又将视朝廷为父母，视我为兄弟。一旦有变，犹欲驱

百姓以迫敌,则是驱兄弟以攻父母。有是理乎?有是理乎?况为兄弟也者,势必顾父母以攻抗傲之兄弟,未有顺弟兄以攻恃怙之父母。此不可和者,三也。

若一从和,则半年两载之后,或朝廷另委督抚,另委提镇,来滇视事,将现受其职者调往别省。欲不从,则抗违君命。欲从之,则虎已离穴。当乎其际,势必不从。不从,即叛矣。昔日之叛,实因灭回激成,犹可说也。后日之叛,必因违君命而起,有何言哉?则前日之误,犹为不误,后日之误,终为大误矣。此不可和者,四也。

天下黎民,本属一家,何分低昂,今之所设都督、将军、先锋、统制等官,外虽各有官职,而内实顾持教门。所以远近亲友,无不乐从。若一受大清之职,则某也身荣显贵,某也食贫居贱,富贵失望,贫贱攸分,人心含怨,势必至操戈入室,同类相伤,祸有不可胜言者矣。想朝廷以和相议,以官相饵者,尽在此矣。此不可和者,五也。

抑或谓:既受清职,权自我操。远近亲友,莫不尊亲。岂不思曩日之督提镇州县府厅,实因灭回之故,遂至戕杀多员。彼朝廷命官尚难免此,况由叛而得之官乎?异日人思报复,心怀不平,将谓我杀官而得官,彼又杀官而得官,又何不可乎?出乎尔,反乎尔,事有必至者矣。此其不可和者,六也。

至若迤西,回之受职者数千,汉之受职者数万。十八土司俱各袭职。文则划策,武则立功。三教同心,联为一体,纵不能远期大成,亦可以偏安小就,效法南诏,历年八百。其诸时势,差堪自信。若一从和,则回之受职者固无庸议,汉之受职者将置之于何地乎?富贵失望,贫贱交迫,势必至操戈入

室，同类相残，祸有不可胜言者矣！此难于和者，一也。

凡此旧官，秩然有序。若谓现在城池，即令守其土者仍旧职守，我迤西官多地少，安彼则此怨，安此则彼怨。况此同僚，视为手足，一切英雄，素有大志，誓不愿为贪官所屈。若一从和，则各率兄弟，分别四方。昨接来函，传集百议，无一应者。此难于和者，二也。

现在迤西边患已息，内政就绪。府厅州县安堵如常。士农工商，各归本业。同心捍卫，众志成功。一闻讲和，纷纷聚讼，情愿敌忾，不愿从和。犹恐误中奸计，别生事端，则已安之地，反遭蹂躏。揆之人情，和之一说，不惟回不愿，而汉更不愿矣。此难于和者，三也。[①]

文秀对于当时不能妥协的局势，洞若观火。大理政权领导集团反抗清政府情绪之炽烈，更跃然纸上。同年冬，徐之铭、马德新派田余庆三赴大理招抚，被杜文秀断然拒绝。三年(1864)四月，马德新亲赴大理"和谈"，当他劝杜文秀接受清政府委任的官职时，杜文秀义正词严地说："以一个合法运动的领袖，竟卑怯地放下武器，从压迫者手里接受一个平凡的职衔，我深深替这些人感到羞耻。"[②] 马德新大理之行也以失败告终。稍后杜文秀致马德新函说："官吏反覆无常，前车在鉴，未可信也。且满人夺我中夏，主政二百余年，今之官吏大都忘其根本。吾三迤，回汉一心，誓绝满虏，有进无退。况今者太平天国业已克复十有余省，石达开奉命来滇，将与吾歃血为盟，互相援助，扫尽腥膻，以安吾民，指顾

---

① 《覆杨振鹏书》，《回民起义》第2册，105—107页。

② 罗舍：《清季云南回民起义始末》。

间事耳。"① 这里指朝廷为"满虏",革命情绪堂堂正正,坦然无讳。徐之铭的招抚政策宣告完全失败。

第七节 东征昆明

同治六年(1867)六月,杜文秀以云贵总督劳崇光病卒,岑毓英引军征黔未归,马如龙围剿滇西"丧师而归,人望顿失",昆明空虚,遂决计东征。他调集20万大军,兵分五路,以扬威大都督蔡廷栋为大经略,大司戎马国春为总指挥,率大司平马兴堂、大司寇李芳园等十八大司② 统摄之。杜文秀誓师,云:

此次出师,本为兴汉,戒勿滥杀。如临其境,如遇其民,各当发明宗旨。但得回汉一心,以雪国仇,是为至要。统兵官等须知仁义之师,以道德为甲胄,以亲爱为戈矛,以相应之攻击。

我军有三事焉:始则锄满,次则拊汉,三则除奸。而彼军反对,然反戈矛相见。彼杀我先杀,彼止我先止。

战胜攻取之际:毋肆掳掠,毋贪财货,毋凌妇女。遇官吏顽梗不服者,杀之。良善被挟者,抚之。诸恶元凶,法所必诛,严加惩办,理宜不赦。③

又传檄三迤,宣布东征的原因、目的、任务和有关政策,号召

---

① 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回民起义》第1册,298页。

② 十八大司为大司戎马国春,大司衡杨荣,大司藩安文义,大司平马兴堂,大司寇李芳园,大司政刘诚,大司隶刘纲,大司令马清,大司勋米映山,大司阃马旭,大司徒马德才,大司卫姚得胜,大司疆段成功,大司征马德仲,大司防李文学,大司农刘应贵,大司定马德善,大司骑马国玺。记载稍有不同。

③ 杜文秀:《誓师檄文》,《回民起义》第2册,第127页。

回汉各族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清朝统治者，文云：

总统兵马大元帅杜，为兴师五路，收复全滇，除残暴以安良善事：

窃思滇南一省，回汉夷三教杂处，已千百年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尝有畛域之分？慨自满清僭位以来，虐我人民二百年余于兹矣。妖官偏袒为计，石羊起衅，池鱼皆殃；强者逞鸱张之威，弱者无鼠窜之地。尔时百姓危若倒悬，可恶妖官犹安然高枕，置苍生于不问，弃黎庶其如遗。甚至汉强则助汉以杀回，回强则助回以杀汉，民不聊生，人心思乱。

本帅目击时艰，念关民瘼，不忍无辜之回为汉所杀，更不忍无辜之汉被回所杀。爰举义师，以清妖孽。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汉。至大事之图成，惟天命之是听。无知妖官穷谋诡计，倒行逆施，杀协镇者封以协镇，杀都邮者授以都邮。高明退身，庸愚堕计。始也助汉以杀回，今也助回以杀汉；继也助汉以杀汉，今则助回以杀回。鸿沟之血未干，乌合之师突至；妄思螳臂以当车，奚啻鸡卵之击石。

今者小计略施，月奏三捷；雄师半出，功收数城。然妖官未除，祸根犹在；全滇不取，亿兆难安。况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用是师兴虎队，将选龙骧，粮运千仓，饷筹百万，枪炮在其前，弓弩列于后，长矛伏中，短刀相接，分五路以并进，效一怒而安民。剑戟横空，胜气腾云，千里旌旗蔽日，威镇雷动九天。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凡尔城乡绅耆，远近士民，达务知时，不乏俊杰，转祸为福，定有同心。或率众而来归，或开门而效顺，定当量才而录用，不别户而分门。自此烽烟永靖，同登衽席之安；如其天命

有归，共成王霸之业。岂不乐哉！岂不快哉！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机，行将后悔。况天命人心，去之久矣，纵背城航海，亦奚以为！檄文到日，凛遵勿违！此檄。①

五路大军出动，东北路由大司衡杨荣等指挥，出武定、禄劝，攻占富民，再东取嵩明、寻甸；东路由大司政刘诚、大司隶刘纲、大司勋米映山等指挥，沿滇西大道东进，经楚雄、禄丰，进攻安宁；东南路由大司戎马国春指挥，由禄丰下易门，占领昆阳、新兴，然后转战晋宁、呈贡；北路自鹤庆、丽江攻取永北；南路由顺宁、云州、缅宁攻取景东、镇远和威远等地。前三路为主力，后二路旨在防御清军两翼攻击。大军东下至楚雄，守将李惟述不能支，遂得楚雄。马如龙遣夏毓秀抵御于禄丰，未及战，退守安宁，再退守梁家河。七年正月，大军已迫近昆明近郊。二月，清军中回族将领杨振鹏、田余庆、杨先芝向义军投诚。至此，昆明西北南三面，悉在重围之中。大司政刘诚驻潘家湾、梨烟村、夏家窑、马街、渔村。大司平马兴堂驻柴村、麻园、黄土坡。大司勋米映山驻大小普吉、马村、小坝。大司疆段成功驻五华寺、西岳庙、土坝河。大司藩安文义、大司戎马国春驻万寿宫。大司卫姚得胜由呈贡据澄江。大司寇李芳园则奉蔡廷栋，由富民过寻甸，破嵩明，击杨林。清军自杨林退驻大板桥、小偏桥一带。清军仅余东路由昆明通宜良的粮道，"尚可绕越行走"。马如龙据守昆明，所部兵才15000人，署总兵合安国、守备马云龙、军功马学林等回族将领谋以献城。事泄，被马如龙诛杀。

清廷任命刘岳昭为云贵总督，岑毓英为云南巡抚。岳昭驻曲

① 杜文秀:《兴师檄文》,《回民起义》第2册,第131—132页。

靖以图寻甸。毓英西上赴援，取道宜良，攻陷小板桥、金马寺、古亭庵，进至大树营，得与如龙会合，打通了滇南与省城交通线。此时清军势稍振，连夺呈贡、武定、元谋、禄劝、罗次、晋宁等地。毓英四出督战，与义军激烈争战。澄江与杨林两地的争夺尤为剧烈。双方死亡惨重。杨林之战，义军枪弹伤毓英鼻部，几贯头脑。

同治八年（1869），清军调集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湘、川、黔、粤等省大军入滇，攻陷杨林后进攻嵩明。此处为义军东路指挥部，由大司寇李芳园、大司平马兴堂率 20000 精锐驻守。清军长期围困，城内粮械俱绝。李芳园、马兴堂被俘。寻甸陷于孤立无援，守将马天顺亦降。东征大军总指挥大司戎马国春闻讯后病逝于昆明城郊万寿宫。使东征大军由优势转为劣势。

此时，大司疆段成功与马如龙战于五华寺，马如龙腹部中炮伤。段成功粮尽，求于蔡廷栋。蔡廷栋与段成功素有隙，竟拒不与。复贷于马清，亦不得。段成功遂与如龙约降。八月十三日，段成功率所部 5000 人归清。所部有不愿降者，仍鏖战至两日，始定。清军以法国开花大炮轰击，起义大军在昆明近郊 200 座营垒全线瓦解。蔡廷栋诈降，逸归。自此各大司军心动摇，或败或退，义军最后在土堆地方激战两月余，十一月十六日土堆失守，义军将士壮烈牺牲。杜文秀多年培养的精锐，丧失几尽。义军历时一年十个月之久的围攻昆明战役，以失败告终。

第八节　大理保卫战

嗣后，清军得以从容整理昆明附近州县，并分遣杨玉科、李惟述等率师西进。大理方面由进攻转为防御。双方互有大胜负。

大司衡杨荣调度军事,杨荣骁勇有余,智谋不足,滇西军事部署大不如清,以致清军节节西上。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清军迫近大理。杨荣迎战,时败清军。董飞龙、蔡廷栋守下关,虽居重围,无怯色。杨玉科行反奸计,阴说董飞龙降。董飞龙焚屋庐,易红旗,清军遂入下关。上关守将马国玺见下关火起,亦纵火逃。两关俱失,大理的屏障尽撤,战事进入城郊。时杨荣以出卖杜文秀与大理政权为条件,暗中投降了杨玉科。杜文秀亲冒枪矢,指挥作战。十一月大理环城各垒尽失,外援已绝,然城内皆百战余生,誓死抵抗。清军用开花洋炮四面环攻,并挖地道穿城下点燃火药攻之,东城墙被炸毁10余丈。义军死守,清军仍不能进。清军以27门大炮排列城墙,向下轰击,义军退守帅府和几座清真寺内。

二十五日,杜文秀召开大理政权最高军政会议。杜文秀主战,杨荣主降,争论激烈。杨荣说:"今兵临城下,内缺粮草,外无救兵,如背城决一死战,吾所愿也。我毙清军多矣,我虽死,亦得所偿矣。惟兵败之后,玉石不分,鸡犬不留,恐吾人死后,游坟诵经之人亦不可得耳。"他要杜文秀"舍一人之身,救数万生灵"。文秀气愤地说:"汝言是也。吾愿舍我一身,救阖城百姓。我庇此侪十八年矣,但愿汝能庇之十八日也。今我当全体同仁,以阖城百姓交于汝,何如?"荣说:"卑职愿负此任。"此时文秀的子女已被骗作人质,帅印也被窃走献给杨玉科。会后,杜文秀家属、亲友、佣人共百余人,全部服毒自尽。杜文秀亲率将士数百人出帅府,配合义军,向清军猛攻,奋力血战,直至二十六日天明,撤回帅府。

杜文秀血战归来,按回民习惯换水(沐浴净身),请河州老巴巴念"讨白"(忏悔词),然后升帅座,再次嘱咐杨荣说:"我今以阖城百姓交汝矣。"遂升黄呢大轿,有经生二人随从。文武分班跪

送，哭泣不能成声。大理百姓堵塞街头哭送，他们都想最后再看一眼给他们带来10多年安定生活的杜大元帅。杜文秀不时揭起轿帘向沿途百姓点头致意。轿出大理北门，杜文秀取出胸前预藏的孔雀胆毒药，服之。转至萝卜营东，清军遣四轿夫来接，至五里桥下与杨玉科相会。杜文秀说："杨大人，本帅凑汝成功。不干城内百姓之事，汝须另眼相看。"杨玉科说："此事皆因受逼而起，奏明皇上，终须分辨。"杜文秀说："胜者为王，败者休。尚何言也。"言毕，杜文秀头渐垂于胸，毒发气绝。时在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午时，是年杜文秀50岁。杨玉科取其首级连同帅印、衣冠，派人送省。当地回民将其遗体葬于下兑村。

文秀有3子3女，长子宗杨、次庚杨、次成杨并次女，均于大理城破后被岑毓英处死。长女凤杨，任东征昆明的监军，同治八年(1869)五月于嵩明被俘，被马如龙杀害于昆明白鹤桥。幼女于襁褓之中被保姆从大理带出，逃至云州，得以长大成人。

十二月，岑毓英抵大理。初九日，杨荣等已降的大理政权高级军政人员尽被杀。十一日，清军将大理城内外回民驱赶至洛阳村，四面围困，一声炮响，开始屠杀，男女老少无幸免者，大屠杀持续了三天两夜，数万人倒在清军屠刀之下，洱水为赤。事后清军斩人耳人手，装满数十大筐，驰送昆明，炫耀战功。

杜文秀领导的反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的英名彪炳千古，永垂不朽！

第七章　慈禧太后

第一节　从兰贵人到太后

慈禧太后，那拉氏，祖居叶赫，故称叶赫那拉。满洲镶蓝旗人。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835年11月29日）生于北京。父惠徵，曾任安徽宁池太广道。咸丰元年（1851），咸丰皇帝诏选秀女。次年，那拉氏被选入宫，封兰贵人。咸丰四年（1854），晋封懿嫔。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1856年4月27日），生皇长子载淳，晋封懿妃。咸丰七年（1857），晋封懿贵妃。从此，她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咸丰帝的皇后钮钴禄氏。由于得到咸丰帝的宠幸，"时时披览各省章奏"[1]，开始干预朝廷政事。

咸丰十年七月（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占领天津，进逼北京。八月初七日（9月21日），清军与英、法侵略军大战于八里桥，清军失利，次日黎明，咸丰帝带着皇后、妃嫔、子女和一些贵族官僚匆匆从圆明园逃往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留下他的异母弟恭亲王奕䜣与英、法侵略军进行谈判。

---

[1] 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中华书局1917年版，第7页。

咸丰帝即将出逃时，懿贵妃极力谏阻，忤逆了咸丰帝的意旨。到达避暑山庄之后，肃顺乘机劝说咸丰帝像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那样杀掉懿贵妃。咸丰帝“濡需不忍”，没有按他的意见办[①]。但是，懿贵妃已“声势大减，诸所钻求，不敢轻诺”了[②]。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病死于避暑山庄，6岁的载淳即皇帝位，年号祺祥。尊皇后为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不久，又分别加上徽号，称慈安太后、慈禧太后，俗称东太后、西太后。

第二节　除“八大臣”，垂帘听政

咸丰帝临死的时候，一方面派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8人赞襄一切政务，另一方面又赐给皇后和载淳各一颗图章作为权力的象征。发布谕旨，均由赞襄政务王大臣草拟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曰“御赏”二字，下曰“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慈禧太后则以皇帝生母的身份代行皇帝的职权。当时人称这种体制是“垂帘辅政，盖兼有之”[③]。

但是，载垣等人为了独揽大权，不仅排斥远在北京的奕䜣，也不愿两位皇太后干预朝政。慈禧太后非常不满，她首先说服慈安太后，然后派人和奕䜣取得联系。奕䜣不顾载垣等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无庸前赴行在”的上谕，请求叩谒梓宫。八月初一日(9

---

①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430页。

②③ 《热河密札》第12函。

月5日),奕䜣到达热河,哭祭后,慈禧太后传旨召见,载垣等极力阻挠。但是,慈禧坚决要见,多次派太监传旨。奕䜣请端华作陪,端华目视肃顺,肃顺笑着说:“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于是,奕䜣单独进见,和慈禧、慈安太后秘密策划从载垣等手中夺权①。奕䜣认为,热河是载垣等的势力范围,要除掉他们,非回北京不可。慈禧太后担心外国人出面干涉,奕䜣满有把握地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② 这次密谈,长达两个多小时。在一切安排就绪之后,奕䜣离开热河,连夜赶回北京。

八月初六日(9月10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慈禧太后看后,非常高兴,召载垣等面谕照所请传旨。载垣等却以祖宗旧制向无皇太后垂帘之礼为理由,坚持写明发上谕痛加驳斥,并由焦佑瀛起草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上谕稿,送交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将它和董元醇的原折留下,不予发抄③。慈禧太后召见载垣等人,载垣等怒形于色,说他们是“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④。慈禧太后气得两手颤抖,小皇帝吓得直哭,把慈禧太后的衣服也尿湿了。慈安太后从中调停,劝双方“留着明日再说”。第二天清晨,慈禧太后没有传旨召见。载垣等以“搁车”相威胁,发下的折件,他们拒绝开视,说:“不定是谁来看。”到了中午,慈禧太后才将董元醇的奏折和焦佑瀛

① 薛福成:《庸盦笔记》卷1,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② 王闿运:《祺祥故事》。《东方杂志》第14卷12期。
③ 《热河密札》第4函。
④ 《上谕档》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六日。

所拟谕旨发下照抄。载垣等要求钤用图章，慈禧太后也照办了。载垣等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①]。载垣等以为，慈禧太后已经向他们屈服，不再把慈禧太后放在心上。而慈禧太后则利用对方的麻痹，积极进行政变的准备。九月十八日（10月21日），慈禧太后就在热河行宫让她的妹夫、咸丰帝的异母弟醇郡王奕譞草拟谕旨，准备回北京后发布。

根据奕䜣在热河时一同商定的日程，九月二十三日（10月26日），咸丰帝的梓宫从避暑山庄启运回京。慈禧、慈安太后和载淳在避暑山庄丽正门外恭送梓宫上车后，就从小路先行，同行的有载垣、端华、景寿、穆荫。肃顺则和奕譞等随梓宫后发。赞襄政务王大臣中的三位核心人物——载垣、端华、肃顺，被巧妙地分割开了。

九月二十八日（10月31日），慈禧太后到达石槽，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军务、兵部右侍郎胜保，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慈禧太后一行进德胜门回宫。三十日（2日），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4人联名上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纪纲而防流弊。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发布早在热河就已经拟好的上谕，以不能尽心和议、阻挠咸丰帝回銮、反对太后垂帘等罪名，将载垣、端华、肃顺解任，令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退出军机处。接着，慈禧太后又以载垣、端华“肆言不应召见外臣，擅行阻拦”，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②]。不久，

① 《热河密札》第4函。

② 《上谕档》，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

肃顺被斩首,载垣、端华赐令自尽,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均被革职。之后,决定改年号为同治,以翌年为同治元年。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一日(1861 年 12 月 2 日),载淳奉两宫皇太后在养心殿垂帘听政。奕䜣任议政王、军机大臣,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成为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

第三节 惩儆恭亲王奕䜣

慈禧太后登上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之后,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组织的地主武装湘军和淮军,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和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地的苗民、回民起义,使清皇朝的统治得到暂时稳定。在统治集团内部她一方面采用洋务派"自强"和"求富"的方针,购买洋枪、洋炮,训练海军、陆军,开办一些新式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加强清皇朝的实力,另一方面又支持顽固派对洋务派进行牵制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随着慈禧太后地位的巩固,她和奕䜣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同治四年三月四日(1865 年 3 月 30 日),编修蔡寿祺上疏弹劾奕䜣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并要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尽管所劾各款,均无实据,但是,慈禧太后于三月初七日(4 月 2 日)召见倭仁、周祖培等人时,却交给他们一份别字连篇的朱谕,指责奕䜣:"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

(制)。往往谙始(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中胡谈乱道。"[1] 谕令革去他的一切差使。这道朱谕,经周祖培等人修改后,当日由内阁颁发。

但是,这种做法,遭致许多亲王和大臣的反对。次日,惇亲王奕誴上书慈禧太后,说:"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惟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请求"饬下王公大臣集议,请旨施行"[2]。当天,慈禧太后召见孚郡王奕譓及军机大臣文祥等3人,令传谕王公大臣翰詹科道明日于内阁会议,将惇王、蔡寿祺的奏折发下,并对文祥等说:"恭亲王于召见时一切过失,恐误正事,因蔡寿祺折,不能不降旨示惩。惇王折亦不能不交议。均无成见,总以国事为重。朝廷用舍,一秉大公,从谏如流,固所不吝。君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于是,北京城内盛传慈禧太后的怒气已消,她对奕訢仍然信任。宫中甚至传说,恭亲王将再行辅政。

但是,在会议之前,慈禧太后召见倭仁、周祖培、瑞常、万青藜、基溥、吴廷栋、王发桂等时,却讲了另一番话,她说:"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即如载龄人材,岂任尚书者乎?而王必予之。惇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为我平治之。"召见后,倭仁等至内阁与王公大臣等会议,转述了慈禧太后的意见,文祥也转述了昨天慈禧太后召见时的谈话。这两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谕原件。

② 奕誴折,同治四年三月初八日。

种意见,截然相反。诸臣相顾愕然,无所适从,不成议而散,定三月十四日(4 月 9 日)再议[1]。

三月十三日(4 月 8 日),醇郡王奕譞自东陵赶回北京,急上一疏为恭王求情,他说:"恭亲王感荷深恩,事烦任重,其勉图报效之心,为我臣民所共见。至其往往有失于检点之处,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且被参各款,本无实据,若因此遽尔罢斥,不免骇人听闻,于用人行政,殊有关系。"请求慈禧太后宽其既往,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慈禧太后将这一奏折也发交王大臣会议。

三月十四日,王大臣等再次在内阁会议,仍然议论纷纭。倭仁按照前日慈禧太后的面谕,起草了一份疏稿,认为醇王等疏可置勿议。肃亲王隆懃等则赞同醇王的意见,写成另一疏稿,许多人表示赞同。倭仁不得不 4 次修改自己的疏稿。后来,军机大臣名列于倭仁折;礼亲王世铎及王公宗室大臣 70 余人则署名于肃王折;都察院、宗人府别有折;内阁学士殷兆镛、潘祖荫,给事中谭锺麟、广成,御史洗斌,学士王维珍等均有折上呈。慈禧太后感到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会遭到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而且会引起外国的干涉。既然惩儆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顺水推舟,于十六日发布上谕:恭亲王奕䜣著即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四月十四日(5 月 8 日),慈禧太后又以奕䜣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深自引咎,颇知愧悔为理由,让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议政王名目则不再恢复,奕䜣的权力,被大大地削弱了。

---

① 吴语亭:《越缦堂国事日记》第 2 册,第 159—160 页。

同治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同治帝亲政,两宫太后撤帘归政。

第四节　再次垂帘听政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一日(1874年12月9日),同治帝染病,御医诊断为天花。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所有内外各衙门陈奏事件,又由她批览裁定。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刻,同治帝死于养心殿东暖阁。戌刻,慈禧、慈安太后就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奕琮、奕䜣、奕譞、李鸿藻、徐桐、翁同龢等20余位王公大臣。慈禧太后首先发问:"此后垂帘如何?"一位军机大臣回答说:"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慈禧太后说:"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心,汝等敬听。"她选的这个人,就是醇亲王奕譞的儿子,她的侄子,年仅4岁的载湉。这个决定使与会诸臣都感到吃惊,醇亲王奕譞"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①]。

诸臣遵命,退至军机处拟旨。慈禧太后派遣御前大臣及孚郡王奕譓等以暖舆前往宣武门外太平湖醇亲王府迎接载湉。初六日(13日)凌晨,数百名侍卫和太监手提灯笼,簇拥着4岁的载湉,蟒袍补褂入大清门,从正路入乾清门,至养心殿谒见两宫皇太后,以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的名义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年号光

① 《翁文恭公日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绪。慈禧、慈安太后又一次垂帘听政。

光绪七年三月九日(1881 年 4 月 7 日),45 岁的慈安太后突然死去。她的死因引起人们的怀疑。有人认为,慈安太后是被慈禧太后毒死的[①]。光绪十年三月(1884 年 4 月),中法战争中,清军接连受挫。慈禧太后以奕䜣"因循委靡,决难振作"为借口,免去他的一切职务,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等四位军机大臣全部罢免。令礼亲王世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庆郡王奕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世铎、奕劻,才具平庸,惟慈禧太后之命是听。慈禧太后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 年 3 月),清军大败法军于镇南关(今友谊关),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慈禧太后不顾中国军民的反对,决意乘胜求和,下令撤军,并授权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于四月二十七日(6 月 9 日)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

光绪十二年六月十日(1886 年 7 月 11 日),慈禧太后面谕醇亲王奕譞及军机大臣世铎等: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并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光绪帝当即长跪恳辞,奕譞、世铎等也恳请从缓,都遭到慈禧太后的拒绝。不久,发布懿旨:"皇帝亲政典礼,于明年正月十五日举行。"[②] 王大臣等又纷纷上书恳请训政。经过再三请求。慈禧太后才表示同意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

光绪十四年十月五日(1888 年 11 月 8 日),由慈禧太后作

① 《慈安后薨逝二则》,《清朝野史大观》卷 1,第 86 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二年六月丁丑。

主，将自己的胞弟副都统桂祥之女指立为光绪帝的皇后，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同时入选，封瑾嫔、珍嫔。次年，大婚礼成。二月初三日（3月4日），慈禧太后撤帘归政。御史屠仁守请明降懿旨：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字样，恳恩批览，然后施行。慈禧太后斥为“乖谬”，将屠仁守开去御史，交部议处①。但是，慈禧太后的急于归政，并不是她自愿放弃权力，她的一再推辞，甚至处分屠仁守，只不过是企图使人们相信“垂帘听政，本非意所乐为”，她的垂帘听政、训政，都是“一时权宜”，出于“万不得已”。

第五节　六十寿典与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

光绪十一年九月（1885年10月），成立海军衙门，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他们禀承慈禧太后的意旨，以办海军的名义，修葺咸丰十年（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的清漪园。为了掩人耳目，恢复昆明湖水操，并设水师学堂于昆明湖。

光绪十四年二月一日（1888年3月13日），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将这一工程公开，取“颐养冲和”的意思，将清漪园改名颐和园。

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太后的60岁生日，准备在颐和园大规模地进行庆祝。光绪十八年十二月（1893年1月），委派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劻总办万寿庆典。

①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五年正月丁卯。

不久，又成立庆典处，专办庆典事宜。仿照乾隆年间为皇太后祝寿的成例，自紫禁城西华门至颐和园东宫门跸路所经，分设60段点景，建造各种不同形式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江南、杭州、苏州三个织造衙门，特造彩绸10万匹，以供庆典之需。

光绪二十年六月(1894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中外舆论都认为中国必胜。光绪帝主战，慈禧太后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①。但是，当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点景，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太后却非常生气，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② 后来，清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海军又在黄海之战中受到严重挫折，慈禧太后转而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幻想外国出面调停。由于形势日益紧张，慈禧太后不得不宣布："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③ 在大连陷落，旅顺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在宁寿宫度过了她的60岁生日。

十月二十四日(11月21日)，旅顺失守。美使田贝根据美国政府的指示为中日调处，先令停战，若议不成，再开战。光绪帝认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无以计误我耶?"④ 不愿接受。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珍妃之兄礼部侍郎志锐"上书画战守策，累万言"⑤。并与文廷式等弹劾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等主和派大臣。为了打击主战派，十月

①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五日。
② 转引自王芸生《六十年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222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年八月庚午。
④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⑤ 《清史稿》卷470《志锐传》。

二十九日（11 月 26 日），慈禧太后以“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为借口，将晋封不久的瑾妃、珍妃降为贵人①。一天之后，又说珍妃位下太监高万枝“诸多不法”，交内务府杖毙②。接着，将奉光绪帝之命在热河练兵的志锐召回北京，调充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并裁撤满汉书房以孤立光绪帝。但是，主战的呼声并未因之停止。十二月初一日（12 月 27 日），御史安维峻上书，请杀李鸿章并弹劾军机大臣，认为“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并托之传闻说，“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尽管他表示对于这样的传闻“未敢深信”，而“未敢深信”的理由则是：“皇太后既归政，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把矛头直接指向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大怒，将安维峻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③。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1895 年 2 月 7 日），刘公岛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清廷派往日本议和的使臣张荫桓、邵友濂又遭到拒绝，日本要求另派十足全权、曾办大事、名位最尊、素有声望的人为谈判代表。慈禧太后决定派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议。这时，李鸿章已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职留任。正月十八日（2 月 12 日），慈禧太后面谕军机大臣：“即著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奕䜣说：“上意不令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太后说：“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④次日，发布上谕，李鸿章著赏还

① 《清德宗实录》卷 352，光绪二十年十月壬申。

②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

③ 《清史稿》卷 445《安维峻传》。

④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

第六节 戊戌政变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掀起了一个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光绪帝锐意变法,遭到了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光绪帝曾对庆亲王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奕劻转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非常生气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奕劻再三劝说,慈禧太后才表示同意,“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①]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䜣病死。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慈禧太后面告光绪帝:“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②]于是,光绪帝发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定国是诏。四月二十五日(6月13日),诏命康有为等于二十八日(16日)进见。二十七日(15日),慈禧太后却迫使光绪帝下诏,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并接连发布几道上谕:命王文韶来京陛见,以荣禄暂署直隶总督,嗣后在廷臣工,如蒙皇太后赏加品级及补授满汉侍郎以上各官,均著于具折后诣皇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著一体具折奏谢。

①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②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又寄谕荣禄，定于本年秋间恭奉太后由火车路巡幸天津阅操。五月初五日(6月23日)，王文韶补授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荣禄补授直隶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北洋大臣，节制北洋三军；崇礼补授步军统领，将人事、财政和军事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当变法的诏书接连而下的时候，守旧官员非常惶恐，多跪请于太后，请她出面禁止，慈禧太后笑而不言。有人再三哭求，慈禧太后笑着说："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①] 七月十九日(9月4日)，礼部尚书怀塔布等阻格王照条陈事务，光绪帝一怒之下，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6人同时革职。怀塔布的妻子向慈禧太后哭诉，慈禧太后对怀塔布深表同情，"召赴颐和园，详询本末，令其暂且忍耐"[②]。二十日，光绪帝赏给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4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康有为建议仿先朝开懋勤殿故事，选举英才，并延请东西洋专门政治家日夕讨论，讲求治理。光绪帝令谭嗣同拟旨，并让他查阅历朝圣训，将康熙、乾隆、咸丰三朝开懋勤殿故事写进上谕。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光绪帝去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求开设懋勤殿，"太后不答，神色异常"[③]。光绪帝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召见杨锐，赐给密诏，要他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良策。谭嗣同建议争取正在小站练兵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的支持。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玉澜堂召见袁世凯，著开缺

---

① 梁启超:《戊戌废立详记》,《戊戌政变记》卷2。

②③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劝袁世凯于初五日(20日)请训时，请光绪帝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领本部兵赴天津，见荣禄，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禄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所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①]。袁世凯表示同意，并满有把握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②]但是，守旧势力并没有睡觉。早在七月二十日(9月5日)以后，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就先后前往天津与荣禄密谋。袁世凯奉诏入京之后，荣禄即假称有英国兵船数只游弋大沽海口，传令各营整备听调。令聂士成带兵10营来津，驻扎陈家沟，以断袁军入京之路，并派人给袁送信，要他立即回防。这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已到达北京，光绪帝准备于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召见。一些维新派人士认为，如果任用伊藤等人，就可以使新政成功，国家转危为安。守旧势力则认为："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八月初三日(9月18日)，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呈递密折，指控维新派"蛊惑人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贻误宗社"，并"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谋"[③]。这天，奕劻、载漪同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并说："伊藤已定于初五日(20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④]慈禧太后立即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提前于初四日(19日)由颐和园还宫。慈禧

① 袁世凯：《戊戌日记》。

② 梁启超：《谭嗣同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杨崇伊：《吁恳太后即日训政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

④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太后直入光绪帝寝宫，抄走了所有的奏折，当即令人将光绪帝送往瀛台。从此，光绪帝失掉了人身自由，尽管八月初五日(9月20日)袁世凯请训，伊藤博文觐见，都按原计划进行，但是，这些活动，都有慈禧太后的心腹严密监视。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由慈禧太后再行训政。就在这一天，慈禧太后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将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革职，并令步军统领衙门将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拿交刑部治罪。以"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的罪名，将御史宋伯鲁革职，永不叙用①。

八月初八日(9月23日)，慈禧太后在勤政殿举行训政大典。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慈禧太后已经知道康有为等的密谋。初九日(24日)，又下诏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未俟复奏，即以"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的罪名，于十三日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6人杀害②。康有为、梁启超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逃亡国外。许多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分别受到了降级、革职、流放的处分。一切新政全被废除，一场自上而下的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扼杀了。

但是，慈禧太后并不以此为满足，她还想以光绪帝病重为借口，另立新君。由于列强和一些地方督抚的反对，慈禧太后的计划没有实现。

---

①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丁亥。

②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乙未。

最后，慈禧太后采纳了荣禄的建议，以光绪帝“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为理由，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

第七节 对义和团的抚与剿，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

义和团运动刚刚在山东兴起、开展“灭洋仇教”的反帝斗争的时候，慈禧太后是一意主剿的。她曾多次谕令地方督抚“实力搜剿，毋得养痈贻患”①。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慈禧太后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四日(1899年12月6日)，慈禧太后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撤换了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毓贤而代之以袁世凯。但是，在十天之内，她接连三次发布谕旨，要袁世凯严饬各属，“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不可徒恃兵力”②。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③。这时的慈禧太后，既不敢得罪帝国主义，又害怕一味操切，会激成巨祸。她希望各省督抚慎选贤吏，整饬地方，与民休息。遇有民教词讼，持平办理，不稍偏重，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从而达到“固根本”、“联邦交”的目的④。后来，山东义和团由于袁世凯的镇压，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直隶的义和团却得到迅猛

① 《电寄档》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② 《上谕档》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③ 《电寄档》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④ 《上谕档》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的发展，并进入北京。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1900年5月22日)，涞水义和团杀死了前往镇压的清军副将杨福同。二十九日，义和团约30000人占据了涿州。各国驻华公使在照会清廷强烈要求镇压义和团之后，又不顾清廷的反对，坚持调兵进京保护使馆。五月初三日(5月30日)，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奏称：义和团声势浩大，"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①。对于这样的意见，慈禧太后非常欣赏。但是，义和团是否可靠，慈禧太后还没有把握。五月初九日(6月5日)，慈禧太后派遣赵舒翘、何乃莹前往涿州，"名为宣旨解散，实隐察其情势"②。次日，慈禧太后又加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前往涿州。当晚，慈禧太后召集王公大臣密议对付义和团的策略，经过激烈的争论，决定对义和团实行招抚。十二日(8日)夜间，各国驻京领事分别收到本国公使请即火速调兵进京的急电，立即举行会议，决定各派水师弁兵，组成近2000人的联军，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为统帅，美国海军上校麦卡加拉为副统帅，于五月十四日(6月10日)分批乘坐火车，自津赴京。行至廊坊，遭到义和团的阻击。十五日，义和团大规模地进入北京。第二天，北京义和团开始焚烧教堂。慈禧太后派遣启秀等以她的名义慰问各国公使和他们的夫人，并派许景澄、敬信、那桐、赵舒翘等赴英使馆会晤窦纳乐，再次劝阻各国调兵进京。各国公使却联名照会总署，声称"各国之兵

① 《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舒翘等折附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朱批奏折》。

②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现已决计入京，我等无力阻止，深为贵国惋惜"[①]。以保卫使馆为名强行进入北京的侵略军，在各国使馆官员的指挥下，在北京街头肆意抓捕、驱赶、枪杀甚至炮击义和团及中国居民。十八日，刚毅自涿州奏报察看良乡、涿州一带义和团情形，强调"蚩蚩之众，诛不胜诛"，"非推诚布公，剀切晓谕，使知改悔，不能期其相安，断无轻于用剿之理"[②]。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对帝国主义是战还是和的争论更加激烈。以载漪、刚毅、徐桐为代表的顽固派，主张招抚义和团，抗击列强；而奕劻、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中央大员和地方督抚，则主张痛剿义和团，避免列强的武装侵略。慈禧太后虽然倾向于前者，但是向列强宣战事关重大，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依违于剿抚和战之间。为了争取更多的人的支持，从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6月16日至19日)，慈禧太后连续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剿抚和战问题。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太常寺卿袁昶认为，义和团是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慈禧太后立即加以驳斥："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③]当天晚上，江苏粮道罗嘉杰派遣他的儿子面见荣禄，送上一份机密情报，据称得悉洋人照会，内容共有四条：(1)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2)代收各省钱粮；(3)代掌天下兵权；(4)勒令皇太后归政。荣禄得到这一情报，绕屋而行，彷徨终夜，次日黎明，即进呈慈禧太后。慈

① 佚名：《庸扰录》，《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51页。

② 《协办大学士刚毅等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

③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禧太后看后，悲愤交加，决心对列强宣战。二十一日（17日）申刻，在仪鸾殿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慈禧太后在宣读了所谓洋人照会的前三条之后，接着表明自己的意见："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与会诸臣纷纷表示愿效死力，有的甚至痛哭流涕。端郡王载漪、侍郎溥良，更是激昂慷慨，极力主战。慈禧太后又高声说道："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诸臣又叩头说："臣等同心报国。"于是，慈禧太后命徐用仪、立山、联元往使馆，谕以利害，若必欲开衅者，可即下旗归国。立山以自己不是总理衙门官员为理由，不愿前往。慈禧太后勃然大怒说："汝敢往，固当往；不敢往，亦当往。"立山只好与徐用仪、联元一起叩头退出。慈禧太后又令荣禄以武卫军备战守，并要他派兵遥护身入险地的徐用仪3人①。

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慈禧太后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筹议和战。二十三日（19日），慈禧太后已经得知罗嘉杰递送的情报纯属伪造。但是，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关于各国水师提督、统领限清军于二十一日（17日）凌晨两点将大沽口各炮台交出，否则以武力夺取的照会，已由直隶总督裕禄奏报清廷。杜士兰的照会表明，战争即将开始。当慈禧太后读到这份照会的时候，大沽口各炮台早已陷落了。这天未刻，慈禧太后在仪鸾殿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宣战，命许景澄等往告各国使臣，限他

①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们于24小时内离开北京。光绪帝不愿开战，拉着许景澄的手说："更妥商量。"慈禧太后怒斥道："皇帝放手，勿误事！"① 于是，总理衙门向各国使臣发出照会，令各国使臣及眷属人等，带同护馆弁兵，于24小时之内起行，前往天津。二十四日下午，董福祥所部甘军及武卫中军联合义和团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二十五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宣战诏书。慈禧太后明令嘉奖义和团为"义民"，并令各省督抚，将他们"招集成团，藉御外侮"。清廷对义和团的方针，由攻剿改为招抚。为了加强对义和团的控制，二十七日，慈禧太后派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京、津一带义和团，并派英年、载澜会同办理。但是，慈禧太后的决定，遭到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的反对。他们联名电奏清廷，力主剿团乞和，并积极活动，与列强订立条约，实行"东南互保"。慈禧太后的决心开始动摇。二十九日，慈禧太后电谕李鸿章、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等沿海沿江各督抚，说明此次宣战，并非衅自我开。当天下午，慈禧太后命荣禄前往使馆慰问各国使臣，并于北御河桥竖立木牌，牌上大书："钦奉懿旨，力护使馆。"六月初三日(6月29日)，慈禧太后在给各驻外使臣的谕旨中，虽仍然坚持此次兵端，并非衅自我开，但是，义和团则成了"乱民"，说什么"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要他们向各国外交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并表示对各国使馆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对"乱民"将"设法相机自行惩办"②。在帝国主义的进攻面前，慈禧太后一方面继续声称

①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② 《电寄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

"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要求各省将军督抚"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认真布置战守事宜[①]。另一方面,她却分别致国书于俄、英、日三国君主,请他们出面"排难解纷"[②]。接着,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准备与列强谈判。慈禧太后对义和团虽仍继续利用,六月初七日(7月6日),还出内帑银10万两,发给天津浴血奋战的义和团以示奖励。但是,在这之前,慈禧太后就已谕令载勋"务将假托冒充义和团,藉端滋事之匪徒驱逐净尽。倘仍有结党成群,肆意仇杀者,即行拿获,按照土匪章程惩办,以靖地方"[③]。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天津失陷。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又分别致国书于德皇和美、法两国总统,请他们"设法维持,执牛耳以挽回时局"[④]。令荣禄停止攻打使馆,并令总理衙门给各使馆送去西瓜、面粉、蔬菜、水果、冰块等物。但是,帝国主义并没有停止进攻。七月十八日(8月12日),八国联军攻陷通州。二十日,进入北京。二十一日(15日)凌晨,慈禧太后装扮成民间妇女,头挽便髻,身穿蓝布夏衫,带着光绪帝、皇后、瑾妃、大阿哥及王公大臣十二三人,在2000余名兵勇的护卫下仓皇出逃。行前,将请求让光绪帝留京的珍妃投入乐寿堂后的井中;令奕劻、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帝国主义进行谈判。八月十四日(9月7日),慈禧太后到达山西崞县,正式发布谕旨,说:"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划除不可。"[⑤] 由于慈禧太后的叛卖,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群

①② 《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
③ 《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
④ 《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⑤ 《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

众运动被断送了。

慈禧太后以为,只要她把责任推给义和团,就可以取得侵略者的谅解。但是,各国使臣却以请太后归政,严惩支持义和团的王公大臣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同时,要求慈禧太后、光绪帝及早回銮。在侵略者的压力下,慈禧太后于闰八月初二日(9月25日)发布上谕,以"纵庇拳匪,启衅友邦"的罪名,将载勋、溥静、载濂、载滢革去爵职,载漪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并著停俸,载澜、英年交宗人府、都察院议处,刚毅、赵舒翘交都察院、吏部议处[1]。对于回銮一事,慈禧太后却很不愿意。因为,北京在八国联军的控制之下,一旦回銮,光绪帝就可以恢复自由,行使皇帝的权力,慈禧太后则不能"再预国政",只有"退居深宫,以乐余年"了[2]。这样的条件,慈禧太后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她不仅不回銮,反而走得更远。闰八月初八日(10月1日),慈禧太后一行离开太原,前往西安。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交涉,参加武装侵略的国家除了俄、英、美、日、德、法、意、奥之外,又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它们共同拟定了议和大纲十二条草案。十一月初一日(12月22日),奕劻、李鸿章从美国使馆抄得这份"议和大纲",立即电告军机处,转呈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得知没有将她列为祸首,也没有要她归政光绪帝,如获大赦,当天就电复奕劻、李鸿章,对大纲十二条,原则上"照允"。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1年2月14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3]。为

① 《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二日。
② 《字林西报》1900年10月13日。
③ 《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了尽快达成和议，慈禧太后全部接受了帝国主义提出的条件。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 年 9 月 7 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廷与 11 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八月二十四日（10 月 6 日），慈禧太后自西安行宫启跸，取道河南、直隶回京，在开封度过了她 67 岁生日，并颁发上谕，撤去溥儁大阿哥名号，立即出宫。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02 年 1 月 7 日）午刻回到北京，结束了她一年零五个月的流亡生活。

第八节 施行“新政”和“预备立宪”

为了讨好帝国主义，缓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欺骗人民，抵制革命，慈禧太后在西逃的途中，就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罪己，下诏求直言，到达西安后，又下诏变法。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四日（1902 年 4 月 21 日），谕令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办“新政”的机关，派奕劻、李鸿章、昆冈、荣禄、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与。根据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建议，陆续实行了一些新政，诸如废科举、兴学校、派遣留学生、鼓励农工商业、编练新军、调整一些政府机构等。但是，这些新政并没有超出戊戌变法的范围。在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迅猛发展的形势下，点滴的改良已经无济于事。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但是“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①]。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1905 年 7 月 16 日），慈禧太后选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

① 《上谕档》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次年五月(1906年7月),载泽等先后回国,奏请宣布立宪。载泽在密折中说立宪有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渐轻,三是内乱可弭。经过激烈的争论,七月十三日(9月1日),慈禧太后发布了"仿行宪政"的上谕。但是,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1]实际上是以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并且以"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借口,没有宣布实行立宪的时间[2]。由于要求速开国会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参加这个行列的已经不只是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还包括一些驻外使臣、地方督抚、中央官员以至皇室成员。为了拉拢立宪派,共同对付革命党人,慈禧太后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一日(1908年8月27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且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

这时,清皇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慈禧太后"万几待理,心力俱殚"[3]。光绪三十四年(1908)夏天"时有不适",九月(10月)出现了腹泻。十月初十(11月3日),她在西苑度过了她的74岁生日。由于举行庆典,她的活动过多,病情继续发展。十月十四日(11月7日),出现了"头痛目倦,……烦躁不安,口渴舌干,咳嗽,时而恶寒发热"等症状。次日,又"周身疼痛,面目发浮"[4]。十月二十一日(11月14日),光绪帝在瀛台涵元殿含恨死去。慈禧太后为了继续掌握朝政大权,将光绪帝的异母弟醇亲王载沣之子、年仅3岁的溥仪立为皇位继承人,年号宣统,继承同治帝、兼

①② 《上谕档》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③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四年十月甲戌。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太医院档案》。

祧光绪帝，慈禧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仿照顺治朝故事，授载沣为摄政王。但是，一切军国政事，载沣都要秉承慈禧太后的“训示”，“裁度施行”[1]。她万万没有料到，第二天的未正三刻，她的长达47年的统治就随着她生命的终结而结束了。因为她和光绪帝的死仅相隔一天，所以光绪帝的死因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产生了种种传说，成为晚清的一大疑案。慈禧太后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她的丧礼，按照清朝列代皇帝的规格举行。她生前的徽号，已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十六字，她死后的谥号，将徽号全部保留，前面加“孝钦”二字，后面加“配天兴圣显皇后”七字，史称孝钦显皇后。宣统元年十月初四日(1909年11月16日)，葬定陵东菩陀峪，称定东陵。

---

① 《上谕档》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第八章　奕　　䜣

第一节　兄 弟 积 怨

奕䜣，号乐道主人，生于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道光帝第六子，由孝静成皇后所生，与咸丰帝(奕詝)属异母弟。但奕詝生母孝全皇后早死，是奕䜣生母孝静皇贵妃受皇后托孤遗命抚育奕詝。奕䜣与奕詝同在一母照拂之下，且年龄相仿，同在书房学文读经，无异于亲兄弟。

奕䜣从小受到极为严格而又特殊的封建教育。他天资聪颖，颇有才气，6岁进乾清宫上书房读书，拜状元翁心存为师。逾年，翁心存以母老乞养，告假归里，奕䜣乃师事贾桢。在名师教授下，他学习儒家典籍10余年，对于儒家学说是颇为精通的。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病逝，遗命奕詝即位。奕詝登基后，改元咸丰，封奕䜣为恭亲王。咸丰二年(1852)分府，命仍在内廷行走。翌年九月，太平天国北伐军打到天津附近，北京告警，咸丰帝命奕䜣署领侍卫内大臣，办理巡防，奉旨仍佩先帝生前所赐白虹刀，以示隆崇。十月，任军机大臣，旋兼任都统、宗人府宗令等职。

奕䜣的文才武功均在奕詝之上，道光帝也最钟爱这个儿子。按清朝传统，皇位传给诸皇子中才德兼优者，奕䜣有得皇位的可

能。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奕詝的智识才具都“万不敌”奕䜣，不能以条陈时政和骑马习武取胜，乃对奕詝面授机宜，以仁孝之心取悦于道光帝。一日，道光帝领诸皇子狩猎，奕詝故意一箭不发，“上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道光帝庙号）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①]道光末年，道光帝违和，缠绵病榻，自思多年痼疾，将不久于此位。其时，奕詝伏地流涕，痛切异常，“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咸丰帝得位有取巧之嫌，聪明的奕䜣未必服气。由此，兄弟俩猜疑不和，心存芥蒂，只是碍于君臣之礼，彼此心照不宣，加上咸丰帝乳母（已尊为康慈皇贵太妃）去世，失去中间调节人，双方感情日益疏远。咸丰五年（1855），恭亲王生母孝静皇太后崩。早在孝静病笃之时，奕䜣即请旨尊封皇太后，抚育之恩，咸丰帝不能不依奏，但奕䜣请封时不免冲动，形同挟制，咸丰帝心终怏怏。孝静皇太后死后，“帝虽持服百日如制”，但在给太后上谥时却不以本朝家法而沿用明朝故事，有意“减杀太后丧仪”，谥法有异，对孝静皇太后“不系宣宗谥，不祔庙”[②]，表示嫡庶究竟有别。对此，奕䜣深表遗憾和懊恼。手足参商，兄弟失和表面化。在奕䜣异常悲痛的时刻，咸丰帝却责其“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③]，降旨撤销其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等职，仍在内廷行走，回上书房读书，以示惩罚。咸丰七年（1857），奕䜣复起，受命为都统，九年授内大臣。

---

① 《清史稿》卷385《杜受田传》。

② 《清史稿》卷214《后妃传》。

③ 《清史稿》卷221《恭忠亲王奕䜣》，第9105页。

第二节 留守京师办理"和局"

时值内忧外患,纷至迭起,清皇朝险象丛生,危机四伏。太平军雄踞金陵,虎视江南,与清廷严重对峙,虽几经曲折,其势仍迅猛异常。江南未平,外患又起,英法联军由南犯北,进逼京师。奕䜣年轻气盛,主张左右出击,以消除内外两大敌人对清皇朝的威胁。咸丰帝对外态度矛盾,主战情绪时高时低,举棋不定。咸丰八年(1858)五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后,溯白河西上,直扑天津,摆出进攻北京的架势。在侵略军咄咄逼人的威慑下,咸丰帝速派员赴天津谈判。奕䜣对此表示不满,上奏《通筹大局不能稍涉迁就折》,反对对侵略者委曲顺从,指出"夷性无厌",倘若"因其桀骜,勉强议准,以图暂了目前,则无厌之求,转瞬又生枝节,日甚一日,仍归于战而后已。与其追悔于后日,不若坚持于此时"①。但咸丰帝无心抵抗,为解京畿之危,他采纳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等人力主妥协的意见,决定接受侵略者的无理要求,签订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奕䜣又立即提交了反对签约的《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指名道姓地指斥其岳父桂良的妥协言论和张惶恐惧的心理,并提出了一些制敌方针。咸丰帝则企图通过"和谈"方式促使英法联军退兵。但是,《天津条约》的签订助长了英法联军的嚣张气焰和侵略欲望,它们向清廷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主战派一片主战呼声。奕䜣也力言朝廷只要主战,对侵略军进行

① 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册,第367页。

坚决抵抗,"实可制其死命"[1],希望咸丰帝拿定主意,坚持对外作战,上下同心,统一意志,与敌军决胜于疆场之上。再次表达了他对外主战的态度。鉴于英法两国要价太高,"天朝体制"面临严重破坏,咸丰帝也表现出强硬态度,欲修改或废除《天津条约》,并表示英、法如果带兵前来,"惟有与之决战"。于是,咸丰九年(1859)发生了大沽口激战。咸丰十年(1860)八月,清军连连败北,九月下旬,英法联军向通州以西的八里桥清军防线发动总攻。清军一败涂地,死伤惨重,八里桥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进逼京师。咸丰帝闻讯,大为震惊,在慌乱中命奕䜣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留守北京,督办和局,自己则带着后妃和一批王公大臣,仓皇逃往热河。

清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战守均不足恃",于是奕䜣的主战热情开始冷却,倾向求和。尤其是太平天国在南方的迅猛发展,使他痛感"内忧外患,至今已极"。权衡利害,奕䜣得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结论,认为如不对外妥协,则内患不已,最终确定了对内镇压、对外乞和的方针。十月初,英法联军洗劫、烧毁圆明园,向清廷提出更为严厉的勒索和讹诈,促成奕䜣加快了对外妥协的步伐。十月下旬,他按照咸丰帝的旨意,全盘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苛刻要求,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了丧权辱国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接着,又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就这样以中国出卖大片领土主权结局。

---

① 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册,第367页。

第三节 中外"合作"镇压农民起义

《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退回天津,迅速南驶,表示并无取代清朝统治和占据土地的野心。奕䜣以为"外夷"尚执条约为据,战争的结果只是索取赔款和权益,"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产生了洋人"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1]的思想。英、法、俄等侵略者,出于各国私利,都曾先后主动表示"愿为中国攻剿发逆"[2],并多次派人向奕䜣表示这一愿望。"两害相权则取其轻",他愈发坚定了先对付人民起义的信念,强调要首先"安内",肃清"匪患",摆脱"捻炽于北,发炽于南"的困境。所以,在咸丰十一年(1861)初,他上疏奏陈:"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3] 在这份奏折里,奕䜣虽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列强窥伺中国的侵略嘴脸,看到了中国所面临的被侵略的险恶形象,包含着防范外来侵略的因素,但是,他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太平天国和捻军才是心腹之患,只有先消灭太平军和捻军,才能维护清朝统治的战略部署,开始酝酿"借师助剿"的计划,以扑灭人民革命的烈火。是年正月十一日(1861年2月20日),他和文祥、桂良等人向咸丰帝上疏建言,认为当今之势,必须采取三国时"联吴伐魏"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18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3,第54页。
③ 《洋务运动》第1册,第2页。

的策略，称“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彼其心岂一日而忘吞吴哉？”[1]要求咸丰帝和西方列强“约共伐魏”，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为了消除朝廷对英、法的疑惧，维持中外“和好”的局面，奕䜣还提出一个原则规定，即所谓“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2]。奕䜣的主张得到咸丰帝的批准，也得到地方实力派湘系军阀曾国藩等的支持，当太平军攻占宁波又连克镇海时，清廷害怕太平军会由海道北上。奕䜣派人与英、法联系，大沽海口各炮台拟由英法两国派兵防守，而清军则专守北塘。对清廷“助剿”的请求，英、法欣然同意，并表示“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以便尽早“扫除狂寇”。至此，中外反动势力终于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为进一步调整中外关系，便于与列强“合作”，奕䜣又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处理外交事务。此前，清廷并无专门的外交机构，《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向奕䜣提出专门设立外交机构的要求。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表示：如能设立专办外国事务机构，则数十年求之不得。奕䜣向咸丰帝多次请求，力陈此举势在必行。迫于大势，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于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日（1861 年 3 月 1 日）任命奕䜣、桂良、文祥等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对外交涉事宜。这是一个规模小、权力大的机关，它的职能除掌握清廷外交外，还逐渐总揽了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方面的大权，实际上，它是决策与

[1][2] 《洋务运动》第 1 册、第 5—6 页。

管理一切涉及洋务的总衙门,权势很大,地位突出。这样,在咸丰帝回銮以前,无形中在北京形成了列强支持的以奕䜣为首的另一个权力机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后,奕䜣在"自强"名义下积极倡导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增强清皇朝的军事实力,尽快"剿灭"太平天国和连绵起伏的各地农民起义。奕䜣在奏折中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1]。由此出发,奕䜣于正月二十一日(3月2日)向咸丰帝提出:"法夷枪炮均肯售卖,并肯派匠役教习制造,倘酌雇夷匠数名,在上海制造用以剿贼,势属可行,应请饬下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2] 咸丰帝再次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购买洋枪洋炮事宜立即进行,曾国藩很快便在安庆办起军械所,开始仿效西方自造洋枪洋炮。接着,以生产新式武器为基本内容,"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近代军事工业便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应运而生。奕䜣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力,首倡洋务运动,并积极地把其洋务思想播及臣僚,有关洋务事业的大计方针,差不多均由他参与制定和指示贯彻,各地的洋务事业也深得其支持。因而,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洋务派的首领。此外,奕䜣作为钦差大臣,曾负责抚办"和局",在与列强的频繁接触中,密切了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尔后又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迎合外国的需求,深受列强的赏识和信任。它们极力支持和

---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页。

② 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第354页。

培植奕䜣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增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声望，希图由他来掌握清政权的中枢机构，迅速接过军政大权。但是，清廷中掌握实权的另一股政治势力，即跟随咸丰帝逃往热河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以及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人，对外国侵略者的疑惧未解，对奕䜣鄙夷不屑，将奕䜣的内政、外交政策搁置不理。咸丰帝虽委托奕䜣办理和局，而且后来的和议经奕䜣办理结束，但咸丰帝与奕䜣的隔阂始终未能消除。和议成，奕䜣多次请求咸丰帝回銮，咸丰帝却一再延宕，迟迟不肯回京。七月初，咸丰帝病重，奕䜣力求到承德省侍，他强起倚枕，手书批示说："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①] 彼此的恶劣关系至死未曾改善。奕䜣对此十分伤感，并迁怒于咸丰帝所倚重的载垣、肃顺等左右权臣。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双方的斗争迅速激化起来。

第四节　发动"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儿子载淳继位，改年号为"祺祥"。幼主冲龄，咸丰帝遗诏令载垣、端华、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辅政。"祖制重顾命"，按亲疏远近关系，应该是奕䜣排在第一位，但咸丰帝余憾未释，把奕䜣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更加深了奕䜣与载垣、肃顺等人的矛盾。载淳的生母懿贵妃，本是咸丰帝的宠妃，她常代咸丰帝批阅奏章，与闻政务。肃顺精明干练，跋扈专擅，但深得咸丰帝信

① 王闿运:《祺祥故事》,《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期。

任。他对懿贵妃一直严加防范，每欲裁抑，懿贵妃因之恼恨，视肃顺为仇敌。幼主继位，母以子贵，懿贵妃被尊为慈禧太后。她想利用皇太后的地位，用心揽权。但“顾命”制度使慈禧太后大权旁落，因而与肃顺等人严重对立。面对“顾命”制度的挑战，慈禧太后与奕䜣均痛感自身的权势受到威胁。利害攸关，只有一个办法，即推翻“顾命”制度，除掉顾命大臣。于是，慈禧太后和奕䜣勾结起来，开始了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

在慈禧太后示意下，先是御史高延祐上请“垂帘”，接着御史董元醇又上疏说：“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并派近支亲王一二人辅政。”垂帘建议立即遭到载垣、肃顺等人坚决反对。慈禧太后虽然恼怒，但考虑时机尚未成熟，只好隐忍让步，把高、董分别治罪，平息风波。不久，在奕䜣授意下，大学士贾桢、钦差大臣胜保等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另简近支亲王辅政”。载垣、肃顺等顾命大臣以清朝家法，只有顾命辅政，向无女主垂帘为理由，痛加驳斥。慈禧太后和奕䜣表面上处处“示人以无为”，暗中却加紧部署。八月初一日(9月5日)，奕䜣以奔丧为名，到热河叩谒梓宫。为了取得列强的支持，事先他特派文祥拜访英、法等外国公使，说明意图。外国侵略者对肃顺这派政治势力的外交路线不满，深感这派势力是办理对华交涉中的障碍，他们决意扶植奕䜣为首的政治势力，故对奕䜣此举，明确表示赞成和支持。肃顺等人对奕䜣早有防范，曾以各种借口阻挠，不允许奕䜣到承德。奕䜣到热河后，肃顺又以太后无召见外臣之理以及叔嫂避嫌为词，阻止奕䜣和慈禧太后见面。慈禧太后设法拉拢、劝诱忠厚的慈安太后出面，两宫太后以垂询家属私事和叙说亲情为名，两次召见恭亲王，“奏对良久”，终于达成了默契。奕䜣认为，要发动政变，非早

日还京不可。慈禧太后对外国侵略者尚存恐惧、猜疑，怕回銮北京难保安全，奕䜣保证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1] 慈禧太后释此顾虑，遂与奕䜣密商了回京发动政变的计划。

奕䜣于八月初七日（9 月 11 日）兼程赶回北京。他凭着自己的特殊地位和亲信们的多方疏通游说，争取到了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和刑部尚书赵光、户部尚书沈兆霖等部院大臣的支持，还争取到了蒙古亲王和大臣的臂助。奕䜣又竭力拉拢统领重兵驻扎在京津地区的兵部侍郎胜保，并把胜保的部队布置在密云一带。同时，还笼络了拥有重兵的实力人物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这样，便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抓住了发动政变所必须的武装力量。

九月二十八日（11 月 1 日），慈禧太后携载淳从热河先行抵达北京。当天，她便立即召见奕䜣和其他亲信大臣秘密部署。次日黎明，奕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奉"特旨"捉拿了载垣、端华等人，并派睿亲王和醇亲王至密云迎捕了担负送咸丰帝灵梓重任的肃顺。顾命八大臣束手就擒，彻底失败。肃顺被斩决，载垣、端华"赐令自尽"，其余五大臣均"革职"，或充军，或"加恩免其发遣"。旋即废除"祺祥"年号，改元同治。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1861 年 12 月 2 日），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了垂帘大典。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奕䜣参与政变有功，"扶倾定危"，破例地以议政王的名义任军机处领班大臣兼摄

① 王闿运：《祺祥故事》，《东方杂志》第 14 卷，第 12 期。

首席总理衙门大臣,复授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赏食亲王双俸,王爵世袭罔替,等等。另外,慈禧太后特许他在紫禁城骑马,把只有中宫嫡长女才能享有的"固伦公主"称号授予他的长女,以示优礼。至此,两宫临朝称制于上,恭亲王总揽全局于下;慈禧太后攫取了清皇朝的最高统治权力,奕䜣在朝廷中的权势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五节 对外妥协与御侮的双重心态

辛酉政变的成功,使侵略者感到非常满意。事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说:由于支持奕䜣上台掌权,英国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声称由于这一"令人满意的结果",英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所以,英国在中国的喉舌《北华捷报》强调指出:在这个特别的关头,英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法国人对政变的结局也感到高兴,其驻华公使在日记中写道:"宫廷革命没有骚动地结束了","恭亲王成为执政者,以后的谈判将更易进行"。对于列强的扶植和支持,奕䜣自然心领神会,所以,当他执掌大权以后,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努力谋求与列强"和好"相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换约以来,事事皆推诚相待"①,满足侵略者的要求和贯彻侵略者的意图。他所倡导的洋务活动基本是围绕"灭发捻为先"的方针,"购洋枪、置洋炮、办机器、造轮船,凡力所能及、有益于战事者,无不随时筹画"。以其显赫的权势,支持曾国藩、李鸿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第26页。

章等人创办一批近代军用工业，借用“外夷”之力，生产枪支弹药以征剿农民起义。与此同时，奕䜣还积极实施“借洋兵助剿发逆”的计划，奏请朝廷对曾国藩、李鸿章、薛焕等东南疆吏“借师助剿”“有请必行，不为遥制”，严厉镇压太平天国，以“俾洋人益形鼓舞”。咸丰十一年(1861)，他同意委派李泰国和赫德相继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把中国的海关管理大权交给英人掌握。同年，奕䜣以巨款托付李泰国购买船舰，筹建海军。同治二年(1863)，这支舰队开到了中国，但舰队的指挥却是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还招募了600多个英国海员和水手。李泰国还私许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除清朝皇帝以外，他不接受任何中国官员的命令，并对皇帝的谕旨有权加以选择。这是由清廷出钱供养，归英国侵略者指挥、控制的一支舰队。奕䜣不但没有抵制，还准备接受英国侵略者这一无理要求，甘受外人挟制。这种对外一味顺从的懦弱行为，连曾国藩、李鸿章都感不满，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将舰队解散。清廷诏令遣散船员，留下船舰。英国方面无理取闹，坚持“既不用其人，则船炮亦应缴还本国”，还向清廷索取赔款。最后，奕䜣只好曲从其意，退还船只，向英国赔礼赔款。同治三年(1864)，奕䜣同意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大片领土割给沙俄。同治九年(1870)五月，天津爆发反洋教斗争，群众焚毁教堂，杀死法国领事和外籍教士多人。在处理这起重大涉外事件中，奕䜣明知“曲在洋人”，却在法国等列强的要挟下，一再迁就，息事宁人，支持曾国藩镇压群众，惩处天津知府和知县，了结天津教案，取媚洋人，与外国“曲全邻好”。奕䜣对外妥协的外交政策，连其弟奕譞也深为恼火，他诘问奕䜣说：“素日无备，故临事以‘无可如何’四

字塞责,自庚申至今十年,试问所备何事?"[1] 奕谖还指责奕䜣主持总理衙门以来,"夷务尚无起色",对"外夷"提出的要求"有可无否",全盘否定了奕䜣所执行的外交政策。

奕谖的指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应该看到奕䜣矛盾的对外态度。咸丰十一年(1861),他在奏请练兵"自强"的奏折中说道:"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后来,在谈到为什么要购造轮船以求"自强"时又说:现在"虽英、法渐见信服,有日匿而就我之意,而为国家谋久安之策,则防患正不可不深。"同治三年(1864)初,他见太平天国大势已去,"金陵死守孤城,断难久踞",对清皇朝构不成威胁了,便与英公使卜鲁斯言明:"金陵不用帮助,当议定撤退常胜军,专用中国官兵围剿",无须再借洋人之力,以免"地方被其蹂躏……城池未复而要挟已深"[2]。天京攻陷后,太平军余部转战福建、广东,福建巡抚徐宗幹慌乱中又奏请借师助剿。奕䜣极为恼火,上奏"请旨饬下福建、广东两省将军督抚,毋再仓皇议调洋兵,致滋流弊,贻患疆圉"[3],可见奕䜣借师助剿的程度是有分寸的。他在屈从列强、妥协退让的同时,又认为"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忿恨",声称英、法等侵略军"为我仇敌",只是"时事多艰",不得不忍辱退让,"隐消其鸷戾之气,尚未可遽张以挞伐之威"。事实上,即使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时候,奕䜣举办洋务的目的也有两重意思在内。在奕䜣看来,乘太平天国还没有被镇压的时候,"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如果太平天国业

① 《翁文恭公日记》第10册,第56页。

②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1分册,第204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5,第33页。

已荡平才去学习,"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故应乘此时机,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练兵与办军事工业,"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还说刻下列强凭强凌弱,"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倘若我能自强,器利兵精,则中外可以相安无事,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①。所以,他倡办近代军事工业,主要是消除内患,镇压农民起义,但也有攘外的准备,御侮的目的。同治二年(1863)五月,他在奏请购买洋舰时就指出:"如果用之得宜,则近之剿办长江逆匪,远之备御外侮,破浪乘风,纵横万里,实为长驾远驭上策。所最要者,在我须勤为学习,速得其法,庶不致日久为洋人把持。"② 奕䜣的这些政治见解和种种作为,既反映了当时洋务派的普遍思想,也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支持。

第六节　遭慈禧太后的惩儆

正当奕䜣势权显赫、"声誉日隆"的时候,慈禧太后突然对他施加打击,使他从权力的高峰滑了下来。辛酉政变后,奕䜣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慈禧太后为坐稳自己的宝座,需要奕䜣出力,对他极意笼络,百般优容恩礼。奕䜣主政期间,罗致了文祥、宝鋆等人内膺重任,作为他主持朝政国事的得力助手;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外膺封疆,兴办洋务,镇压农民起义。奕䜣在有分寸地惩办了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党羽后,继续执行肃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2—3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5,第33页。

顺重用汉人地主知识分子的政策,又将受肃顺排挤打击的部院大臣平反复职,安抚各方,收拾人心,迅速把政局稳定下来。由于奕䜣等人的通力合作,清廷暂时渡过了难关,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奕䜣因此博得朝野的一片赞赏。这对慈禧太后揽权是潜在的威胁。在慈禧太后看来,她要保持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必须依仗恭亲王奕䜣以控制、操纵朝政,驾驭群臣,但同时又害怕他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害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她有意识地扶植两派、甚至多派政治势力,使他们互相牵制。所以,她一面支持奕䜣为首的洋务派,一面又放任顽固派对奕䜣等洋务派的攻击和非难,力图控制和排挤奕䜣,削弱他的权势。这种局面的出现,奕䜣当然是不满的。况且他年轻气盛,踌躇满志,处于矛盾的漩涡之中,仍然是勇于任事和刚愎自用。工于心计的太后对此难以容忍,说他"狂妄自大,跋扈专擅"。于是,慈禧太后与奕䜣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彼此猜忌日深。

同治四年(1865)三月,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揣摩慈禧太后的意旨,上疏弹劾奕䜣,给奕䜣罗织了"贪墨、骄盈、揽权、徇私"等罪名。慈禧太后决计借此罢黜奕䜣,打掉他的威风。三月初七日(4月2日),慈禧太后召集大学士周祖培、倭仁、吏部尚书朱凤标等,公布一道由她亲笔书写的谕旨,斥责奕䜣"自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主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令其"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一纸严诏,笔挟风雷,令人悚然。满朝王公大臣惊诧万分,纷纷要求慈禧太后收回成命,任用奕䜣,而倭仁等人则对慈禧太后的谕旨表示附和。倭仁思想保守,对奕䜣迷恋"洋务",视洋务为"身心性命之学"的做法一向鄙夷不屑。他在这次

政潮中故意从中作梗，借以打击奕䜣。后来，慈禧太后虽难违众论，恢复了奕䜣的职务，但奕䜣议政王的称号从此取消了。经过这次打击，奕䜣在统治集团中的声望无可挽回地受到影响。

第七节　与顽固派的论争

不久，奕䜣和倭仁作为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代表，在同文馆要求增设天文算学馆的问题上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交锋。

同文馆设立于同治元年(1862)，主要任务是培养翻译人才。它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入学，注重外语的学习。这是奕䜣为首的洋务派早期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开始规模尚小，影响不大，倭仁等虽有异议，却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是，作为顽固派的首领，倭仁主张讲求“圣人之道”，严防“以夷变夏”，坚持以“礼义廉耻”、“天道人心”来维护封建统治，保存天朝的体制。他和醇亲王奕譞、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人过从甚密，联成一气，“以不谈洋务为高”，坚守封建的纲常名教。他们对奕䜣等人提倡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先进技术，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其外交政策强烈不满，认为是擅改祖制，以夷变夏，伺机进行攻击。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奕䜣以“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为理由，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指出“若不从根本上用著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①。为保证质量，要求招收30岁以下的满汉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的官员入学，并厚给薪水，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第3页。

住馆学习，聘请西人担任教师。还规定学习3年试居高等者，“均准各按升阶，格外优保班次”。对此，顽固派极为恼火，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奏表示反对，紧接着倭仁亲自出马，对奕䜣此举大张挞伐，兴师问罪。他向朝廷上了一份奏折，力言：“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指出令学士、大夫学习制器之理，且用升官、银钱去引诱他们，这是重名利轻气节，“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倭仁尤其反对“奉洋人为师”，他质问奕䜣：“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术，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①] 倭仁的保守思想和言论得到守旧的满族贵族、官僚士绅和许多八股士子的拥护。一批守旧卫道之士群起效尤。一时“谤议繁兴”，闹得“京师口语藉藉”。对倭仁等人的攻击、非难，奕䜣毫不示弱。他直截了当地斥责倭仁“守旧衰谬，不识时务”，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指斥倭仁“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徒以道义空谈”[②]，是极其谬误的。奕䜣故意将倭仁一军，请旨饬令倭仁“着即酌保数员”，并“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办讲求”，与同文馆“互相砥砺”。上谕发抄，卫道之士大哗，倭仁更是啼笑皆非，狼狈不堪，只好向朝廷明白回奏，“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恳求朝廷取消原来的奏议。奕䜣仍不罢休，决心再出个难题给倭仁去做，奏请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要他直接参与为其所深恶痛绝的“洋务”活动。急得倭仁食难下咽，夜不安

---

① 《洋务运动》第8册，第231页。

② 《洋务运动》第2册，第33页。

枕，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倭仁屡疏恳辞，奕䜣再三驳斥，致使倭仁无法申辩，十分尴尬，只好硬着头皮走马上任，“中途故坠马，遂以足疾请假”[1]。这场斗争，使顽固派的气焰有所收敛。是时，各地人民起义相继被镇压，奕䜣所谓的“心腹之患”暂时减轻了。于是他在处理朝政时，较多地注意“抵御外侮”方面。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奕䜣要他议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海防，以备御侮。为捍卫海疆起见，他支持左宗棠自行设厂造船的建议和实践，认为此时东南要务，以造轮船为先，倘若“制于人而不思制人之法与御寇之方，尤非谋国之道”。同治十年（1871）七月，沙俄乘中国西北边疆动乱之机，以“代为收复”为名，悍然出兵侵占伊犁。奕䜣认为“沙俄既于伊城遂其鸠居之计，复于各处冀为蚕食之谋，其心殊为叵测”[2]，赞同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匪帮的叛乱后，奕䜣又全力支持左宗棠大军屯兵新疆，准备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同治十三年（1874），日军入侵台湾，奕䜣奏请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防，指示沈葆桢“示以兵威”，决不能对日本示弱惧战。但他后来还是接受了李鸿章关于“兵端不可遽开”，只有“力保和局”的建议，向日本妥协，签订了屈辱的《台事专约》。这对奕䜣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深感自办洋务以来，往往“空言自强”，事实上“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乃至“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为有效地御侮，他提出了“练兵、简器、设厂、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具体建议，强调建设中国海军的迫切性和

---

①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8，第34页。

重要性。奕䜣的建议被各省督抚称之为“救时要策”和“切要之图”。福建巡抚丁日昌为此草拟了《海军水师章程》六条，奏请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经奕䜣敦促，清廷原则上采纳了筹建三洋水师的建议，但限于财力，决定“先于北洋创设一军，俟力渐充，由一化三”。于是，中国近代海军正式筹建了。同时，奕䜣还倡导和支持各地洋务派兴办近代民用企业，“以商为战，收回利功”，“以防外人争利”。

第八节　被罢黜闲置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同治帝崩。载淳无嗣，慈禧太后以旁枝侧出，立醇亲王奕譞之子、年仅4岁的载湉为帝，改元光绪，再度垂帘听政。为驾驭群臣，控制“内轻外重”的政治局面，慈禧太后暗中放任“清流”议论时政，裁量人物，“以清议维持大局”①，并进一步排挤和控制奕䜣。慈禧太后还笼络奕譞，利用奕譞与自己的姻亲关系，以及他政治上的幼稚短视、性格懦弱等特点，促使他们兄弟矛盾深化，手足参商。在慈禧太后的鼓弄和支持下，“醇邸挟太上之尊，树用私人，结党相倾”，“日伺恭王之短而攻之”②。奕䜣因遭慈禧太后的排挤，又迭遭奕譞和某些清流人物的交相攻击，“势渐孤”，在大臣中的威望日益下降。其间，奕䜣为重振势力曾作了些抗争。如同治八年(1869)，由慈安太后和年少的同治帝出面，命令山东巡抚丁宝桢以“内监擅离京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

② 胡思敬:《审国病书》,《国闻备乘》。

师，祖制当斩”的罪名，就地诛杀潜过山东境内的慈禧太后幸臣、总管太监安德海。慈禧太后当然知道其幕后策划者是奕䜣，表面上不能不承认斩杀安德海是正确的，心里却难免对此耿耿于怀。同治十三年(1874)，慈禧太后以“召对失仪”的罪名，把奕䜣降为郡王，并夺去他的长子载澂的贝勒爵位。但是第二天又恢复如故。慈禧太后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目的无非是让奕䜣明白只有她才掌握奕䜣及其全家的荣辱和生杀予夺大权。奕䜣在慈禧太后的打击下，忧虑自己的身家地位，对慈禧太后处处退让，竭力委曲求全。即使如此，奕䜣仍没有逃过慈禧太后对他的严重打击。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失败，奕䜣受到“言路交章论劾”。慈禧太后乘机将奕䜣等军机大臣全体罢黜，把他及其势力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全部清洗出去。这次奕䜣被罢官长达10年之久。在罢官期间，奕䜣过着“超然尘事外，……不知忧与患”[①] 的赋闲生活。只是于光绪十四年(1889)，光绪帝亲政后，他对慈禧太后明作撤帘而暗中操纵深为不满，曾上疏指责慈禧太后贪握权柄，有悖祖制。慈禧太后置之不理。

第九节　对日主和，反对变法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信任李鸿章，避战求和，又招败绩。清皇朝危机四伏，矛盾重重。慈禧太后被迫再次起用奕䜣，想借重其过去的声望来调和各种矛盾，打击帝党势力。八月底，她发布谕旨，令奕䜣“在内廷行走，管理各国

① 奕䜣：《萃锦吟》卷 6。

事务衙门，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①。十月初，清廷成立督办军务处，光绪帝发布谕旨，“派恭亲王督办军务，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旋复授其军机大臣职务。然而，此时的奕䜣年老多病，并无实权；多年失势，对政务亦有所隔膜，加以他一再遭受慈禧太后的打击，锐气大减。重新上台后，只敢顺着慈禧太后的意旨办事，不敢稍有出格。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清廷派李鸿章到日本马关谈判。四月初三日(4 月 27 日)，李鸿章电告清廷和约十条，奕䜣表示赞成，力主“再不能言战”②。四月十七日(5 月 17 日)，李鸿章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五月初二日(5 月 25 日)，奕䜣会同奕劻等人请求尚在迟疑的光绪帝批准条约，并派伍廷芳等赴烟台换约。未几，“三国干涉还辽”事起，翁同龢等人主张延期换约，奕䜣却以“不换约则兵端立至”③ 为由，赞成换约，出卖民族权益。

戊戌维新变法期间，奕䜣针对清廷某些弊端提出了诸如兴办学堂、修筑铁路、振兴工商、改革武科考制等主张。但它基本上是洋务派主张的老调重弹，实际上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等变法主张的抵制。他不仅利用自己的身份对光绪帝时加牵制，而且和“议论专主变法”的帝师和军机大臣翁同龢严重对立。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其僚属、户部主事陈炽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诏书，拟请光绪帝陆续颁行。翁同龢将这些新政诏书“商之于恭邸”，想争取他对变法的支持，殊料竟遭奕䜣的坚决反对。奕䜣还奏请慈禧太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 97，第 3 页。

② 《翁文恭公日记》第 34 册，第 25 页。

③ 同上书，第 38 页。

后，撤掉汉书房，将翁同龢赶出毓庆宫，使他失去了和光绪帝"造膝独对"的机会。此后，奕䜣和翁同龢"议事龃龉"，"论事不合"，对翁同龢的政治主张和赞助康、梁变法的行动很不以为然，往往从中作梗，阻挠变法。他还指斥翁同龢揽权、狂悖，每每对他裁抑、刁难，施加压力，阻止他对维新变法的帮助支持。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沙俄强占旅大事件发生后，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危，"以变法为急务"，立志改革。奕䜣"默然"不答。不久，康有为上书请开制度局，定国是，奕䜣也表示反对。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 年 5 月 29 日)，奕䜣旧疾复发，旋病重而死，时年 67 岁。清廷优加恩典，皇帝临奠，辍朝五日，赐谥曰"忠"，配享太庙。

第九章 光 绪 帝

第一节 冲 龄 即 位

光绪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满族，生于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4岁继承皇位，因在位年号为光绪而被称作光绪帝，是清朝自顺治帝以来的第九位皇帝。

载湉是同治帝载淳的七叔醇亲王奕譞之子。本来按清皇朝家法，在同治帝身后无子的情况下，应当从皇族近支中的晚辈里挑选一人立嗣继承皇位，然而载湉却是作为载淳的同辈接替了皇位，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事情是清廷内部矛盾与争斗的结果。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年仅19岁的同治帝病死，作为其生母的慈禧太后在悲痛之余关注更多的是怎样继续得以垂帘听政的问题。从慈禧太后的角度来看，假如从溥字辈挑选一人为帝，那么她就会因此被尊为太皇太后，这固然已很尊贵，但相差两辈的疏远会直接影响她对清朝统治大权的操纵，在权力欲的支配下，她决意从与同治帝同辈的人中选择了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为帝位继承人。为掩人耳目，慈禧太后在"懿旨"中称立载湉为嗣皇帝乃不得已之举，表示"俟嗣皇帝生有

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帝”①。此时载湉只有4岁，待他有子再承接同治帝的帝位，至少要有十几年的时间。慈禧太后立载湉为帝，以便继续垂帘听政。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1875年2月25日），清廷在紫禁城太和殿为载湉举行了登基典礼。接着，两宫皇太后又以皇帝年幼为名再度垂帘听政，重演同治帝即位时的故伎。载湉虽成了皇帝，而操纵政局的人物却仍是慈禧太后。

第二节　幼帝生涯

载湉经过嗣称帝，与慈禧太后形成了“母子”关系。本来，载湉作为咸丰帝的侄子和慈禧太后外甥的双重身份已与慈禧太后是亲上加亲，慈禧太后选中载湉为帝除了有揽权的用意之外，她也是考虑到由其胞妹之子接替皇位是最为合适的选择。小皇帝入宫后，离开了他的亲生父母，慈禧太后自然要对这个幼童予以关怀，据她自己对臣属说：载湉“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②。当然，这种爱怜是具有既出于对幼童体贴的人情味，而又试图通过不断调教使载湉依附于慈禧太后的双重含意。载湉入宫后，“其父母不敢给以食物”③，表明载湉只能与慈禧太后之间有“母子”之情。慈禧太后还叮咛载湉身边的侍从对载湉讲他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总第2页。

② 《戊戌变法》第4册，第223页。

③ 徐珂：《清稗类钞》第3册“宫闱类”，第36页。

已不是醇亲王的儿子,他应当"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①。随着载湉长大懂事,慈禧太后又搬出"家规"要求载湉每日向她问安一次,并常常用孝道来训导载湉对她要俯首贴耳,恭敬听命。作为皇帝的载湉在向慈禧太后请安时,不命之起不敢起,太后稍不如意,就罚令长跪。慈禧太后外出时,载湉"亦必随扈,炎风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②。以至于载湉每次面见慈禧太后,总是"战战兢兢","胆为之破"③。幼小的光绪帝迫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产生了对慈禧太后畏惧的心理,甚至听见锣鼓、吆喝、雷电等声都会感到震惊,这种怯懦的心理可以说对他的一生都带来了无法摆脱的影响。

在载湉即帝位11个多月后,慈禧太后于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二日(1876年1月8日)颁发"懿旨",称"皇帝冲龄践阼,亟宜乘时典学",决定让光绪帝在毓庆宫入学读书,并派内阁学士翁同龢、兵部左侍郎夏同善"授皇帝读"④,一切读书事宜由醇亲王奕譞管理。翁同龢当初曾在弘德殿为同治帝授读,他第一课所讲的明代张居正的《帝鉴图说》即以生动自然博得小同治帝的喜爱,由他再充任小光绪帝的师傅显然堪称此任。

在光绪帝入读毓庆宫前,翁同龢等人在养心殿对其进行了入学前的启蒙教育。光绪二年正月二十二日(1876年2月16日),为光绪帝开蒙的第一天,翁同龢先是握着光绪帝的小手临摹"天下太平"、"光明正大"8个字,然后教他认"帝"和"德"两个

①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74页。

② 徐珂:《清稗类钞》第3册"宫闱类",第45页。

③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57页。

④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23,第7页。

字，接下去讲解《帝鉴图说》的首篇《三皇五帝》。开蒙4个月后，5岁的光绪帝于四月二十一日(5月14日)在毓庆宫正式入学读书。根据清朝对幼帝进行教育的惯例，光绪帝所学的课程主要有“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圣祖圣训”等先帝治术，由满、汉师傅分别用满文与汉文讲解，还要由武臣教会拉弓射箭等武功。读书的头两年，以认字和听讲书为主，规定生书每日读20遍，熟书读50遍。小载湉起初厌烦读这么多遍书，经翁同龢的变通，采用以读会为准的办法，逐步使光绪帝喜欢上读书。翁同龢不仅教书，还从生活上关心体贴光绪帝，以长辈的厚爱跨越了君臣名份的阻隔，使光绪帝受到创伤的心感受到温暖，以至于他们二人通过毓庆宫的读书与教书关系而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翁同龢等人针对光绪帝伴随年龄的增长需要新知的特点，在光绪八年(1882)载湉11岁时，增添授课内容，讲解了贺长龄、魏源所辑《皇朝经世文编》，两三年后又进讲了越南、朝鲜、日本、中国台湾地图书和魏源撰《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随后又讲解有关洋务的折件，使光绪帝眼界大开。到光绪十二年(1886)载湉虚龄16岁时，即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已为成人之际，据称就已具备了“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①] 的能力。在告别幼帝生涯的当口，光绪帝所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能否顺利地亲政。

第三节　亲政波折

当初两宫皇太后立载湉为帝、再度垂帘听政之时，曾把听政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2119页。

解释为“一时权宜”之举，保证“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①。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十日(1886年7月11日)，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了前面所说的话，并宣布“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②。表面看来，慈禧太后是在信守诺言，而实际上幼帝长大后迟早都要面对亲政的问题，慈禧太后早做预谋，目的是在无可奈何地让光绪帝亲政后她仍然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方式操纵清廷大权。对于她的这个用意，醇亲王奕𫍽是心领神会的。奕𫍽在两年前的“甲申朝局之变”中取代了恭亲王奕䜣在朝廷的地位而成为慈禧太后的心腹。他在慈禧太后准备让光绪帝亲政的“懿旨”颁布后仅5天，就上奏称与各位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恳请慈禧太后“训政”，并表示皇帝“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教饬诫”。他提出的训政模式为：“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③。慈禧太后顺水推舟，表示接受奕𫍽的训政请求。这年十月，礼亲王世铎就训政的细则奏报慈禧太后允准，其中“凡遇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④一条，实质上与垂帘听政并没有什么区别。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清廷为光绪帝举行了亲政仪式。这与其说是光绪帝亲政的开始，倒不如说是慈禧太后通过训政的方式为其日后归政于光绪帝而铺平了一条能够长期对皇帝加以控制的通道。

在慈禧太后训政两年之后，光绪帝的大婚典礼于光绪十五

①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第1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2119页。

③ 同上书，总第2123—2124页。

④ 同上书，总第2180页。

年正月二十六日(1889年2月25日)在清宫隆重举行。此时,慈禧太后没有打破幼帝一经大婚便要亲理朝政的祖宗之法,只好搬出皇宫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已甘心地去让光绪帝行使皇权,而是在归政前后搞了一连串的活动,以便对亲政后的光绪帝加以控制,继续操纵清廷大权。为对光绪帝施加她的影响,在光绪十四年十月择定由她的侄女叶赫那拉氏为光绪帝的皇后。为加强对朝廷的控制,她在文武官员的安排任命上多用对其效忠之人,以至于光绪帝亲政之时所面对的几乎尽是太后听政与训政时期的重臣。为便于把握光绪帝的动向,她决定将光绪帝读书的书房由毓庆宫改在颐和园附近的西苑,要求光绪帝每日到颐和园向她请安,亲政后的光绪帝必须将朝中大事向她"禀白而后行"。显然,慈禧太后为光绪帝亲政设置了重重路障。光绪帝的亲政历程由酝酿到开始经过了两年半多时间,并且是一波多折。但是,已长大成人且渐渐成熟的光绪帝一经正式亲政,其所作所为则是慈禧太后始料不及的。尽管慈禧太后仍不断以各种方式箝制着他,然而作为一个年轻的皇帝,他总还要施展一下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第四节　甲午主战

光绪帝亲政以后,慈禧太后仍然时常干预朝政,从而引起了部分臣属的不满。一些大臣表示出对光绪帝的同情和支持,光绪帝也为冲破满朝多是慈禧太后旧臣的局面,相继提拔了志锐、文廷式等少数官员,总算有了一点政治势力。虽然慈禧太后多年所

卵翼的势力明显地大大强于皇帝,仍保持着“同、光以来,内外重臣,皆孝钦所亲拔”① 的状况,但光绪帝的亲政却不能不说对慈禧太后的独专朝政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年轻的皇帝经其师翁同龢多年的指点,已具备了掌理朝政的能力。尽管慈禧太后想把他培养成唯自己之命是从的皇帝,但他们两人在对施政方略认识上的不同迟早会发生争斗。到甲午年(光绪二十年,1894 年)就如何对待日本的侵略问题上,帝后之间就主战还是主和方面的矛盾公开化了,于是出现了帝党与后党之争。

所谓后党是指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一派政治势力,而帝党则是指以光绪帝为中心的另一派政治势力。慈禧太后多年操纵政局,不仅在王公中培植了醇亲王奕谖、礼亲王世铎等亲信,而且重用孙毓汶、徐用仪等人控制军机处,委任徐桐主管吏部,指使李莲英控驭紫禁城的深宫内院,并对封疆大吏中颇有实力的李鸿章加意笼络,形成后党势力。帝党的形成晚于后党,势力也明显弱于后党。帝党成员主要是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还有礼部侍郎志锐、侍读学士文廷式、翰林张謇、工部主事沈曾植等人。在甲午年面对日本的军事挑衅,慈禧太后及后党倾向于主和,光绪帝及帝党倾向于主战。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对外积极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加紧制订了侵略中国、称霸亚洲的所谓大陆政策。光绪二十年(1894)春,朝鲜发生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朝鲜政府请求清廷出兵帮助镇压农民起义。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

① 《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278 页。

口，乘机出兵朝鲜，屡向中国驻军进行挑衅，中日战争迫在眉睫。怎样对待这一局势，是对清朝统治集团的一次考验。

慈禧太后与后党主张对日妥协，加以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太后的六旬庆辰，在年初就已紧锣密鼓地开始修建颐和园的活动正在步步加紧进行。慈禧太后唯恐战争爆发会影响她的"万寿庆典"。因此，她一心力保和局。后党附和她的思路，由军机大臣孙毓汶等人操纵于上，直隶总督李鸿章执行于下，摆出主和姿态。光绪帝及帝党成员则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认识到日本进行战争挑衅的严重性，痛感"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①]，积极筹备抗战事宜，表示出主战的愿望。光绪帝多次下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备战守事宜，并命南洋各督抚大臣预为筹备，反对李鸿章恳求列强出面调停的做法。为了打破由世铎、孙毓汶、徐用仪控制下的军机处一再向清廷封锁有关中日战端消息的局面，光绪帝于六月十三日（7月15日）下令派翁同龢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参与军机处事宜，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中日朝鲜争端。军机处乃直接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为商承处理军国大事的中枢部门，非军机大臣不得参与军机处事宜。翁同龢、李鸿藻是奉特旨与会，非同寻常。在会上，翁、李二人提出备战御敌的方策，得到认可。会后第二天，与会诸臣联衔向光绪帝递上《复陈会议朝鲜事宜折》，折中采纳了翁、李的主战见解。对此，光绪帝大为赞同，于六月十六日（7月18日）再次下诏令李鸿章抓紧军事部署。李鸿章只好调派卫汝贵所部开往平壤，租用英轮"高升"号运兵增援驻牙山的清军。但在此之

① 《中日战争》第2册，第624页。

前,日本早已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正当“高升”号轮船于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在北洋海军“济远”、“广乙”舰护卫下运兵行至丰岛海面时,蓄谋已久的日本海军突然发动袭击,击沉“高升”号轮船,悍然挑起中日甲午战争。

面对日本已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朝野上下要求主战御敌的呼声日趋高涨,光绪帝也毅然决定对日宣战。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1894年8月1日),清廷发布对日宣战的“上谕”,指出日本“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决定“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①。自此,光绪帝的主战御侮愿望总算通过这份宣战书的颁布得以实现。许多帝党官员也希望“中国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图自强,亦未始非靖边强国之一转机也”②。

光绪帝颁布了对日宣战的谕旨后,期待着战况能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进展。于是,他于七月初二、初三日(8月2日、3日)接连旨令李鸿章迅速电催各军“星夜前进,直抵汉城”,“一俟诸军齐到,即可合力驱逐倭寇,以解汉城之围”③,希望能痛击侵朝日军。七月初四日(8月4日),卫汝贵和马玉崑率部始至平壤。随后,左宝贵部与丰升阿部也赶到平壤。各军期待着从平壤进军汉城。但李鸿章却在电文中指示卫汝贵称:“平壤要地,宜会商何军留守,方可前进”④,主张以防守为主。对此,光绪帝表示不满,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第3441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册,第42页。
③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6页。
④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6,第40页。

又在七月十六日(8月16日)谕令李鸿章“电饬各统将,筹商妥协,迅速进兵”[1]。李鸿章则在第二天请总理衙门代奏,强调目前只能坚扎平壤,待后路布置妥当再“相机进取”。七月下旬,叶志超率部抵平壤,光绪帝根据李鸿章的提议命其总统平壤各军。不料叶志超是一个畏敌怯战的统帅,他以“各军马步有未到齐者”为由,请求继续“筹调添募”军队,在平壤按兵不动。八月五日(9月4日),光绪帝再次谕令李鸿章称:“朕为军情至急,旰夕焦急。该大臣慎毋稍涉大意,致有疏虞,自干咎戾也。”[2]这次李鸿章未敢怠慢,电催叶志超出兵,叶志超也感到再不出兵无法向皇帝交待,随即先派骑兵一哨出探,方知日军已向平壤逼来。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日军向平壤发起总攻,叶志超率部望风而逃,而马玉崑、左宝贵则分别在船桥里、玄武门率部同日军进行了血战,终因寡不敌众,平壤陷于日军之手。这样,光绪帝设想在朝鲜战场抗击日军的计划落了空。

在日军进攻平壤的第二天,李鸿章调派的援军分乘5艘运兵船,由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12艘主力战舰护送,驶至鸭绿江口。当晚10营援军登岸,次日丁汝昌率航队返航。当北洋舰队行驶于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时,与日本联合舰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海战,是为黄海海战。海战中,邓世昌不畏牺牲誓与舰船同存亡的英勇表现感动了光绪帝,他亲赐挽联曰:“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3]就黄海海战的结局而言,中日双方舰船均有所创,并且是日本舰队先退出了战场,表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39页。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9,第13页。
③ 邓素娥:《邓世昌遗事及有关文献》,《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2期。

明这是一次未分胜负的海战。但这次海战后，李鸿章却极力主张“避战保船”，从而丧失了制海权，导致北洋舰队最终被日本舰队困扼于山东威海刘公岛基地而全军覆没。光绪帝壮海军之威的愿望只能成为泡影。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廷为招募军队、添购兵船积极筹款。作为光绪帝师傅又兼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更为筹款四处奔波，费尽心思。他在光绪帝的支持下，根据文廷式、安维峻等人多次上奏要求慈禧太后停办“万寿庆典”筹备的各折，于八月十四日(9月13日)以户部名义上奏请求停止为祝寿所搞的庆典工程，以节省经费。光绪帝不仅对此折大加称赞，而且又授意志锐、高燮曾等人上奏呼吁移祝寿工程之费为战费。慈禧太后在舆论压力之下，只好在八月二十九日(9月28日)宣布停办各点景、戏台，简化庆典活动，祝寿地点由颐和园改在宫中受贺。这算是光绪帝有生以来第一次迫使慈禧太后作出的让步。慈禧太后虽在无奈之中同意了移颐和园工程之费以作军费，但她却在内心里充满了不满，声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将使其终生不欢”，寻找报复的机会。

当日军继攻占平壤又将战火引至鸭绿江边时，慈禧太后感到惶恐不安，把求和的希望再次寄托到列强的出面调停上来。她听说俄国公使喀西尼假满回任将路过天津的消息，便在八月二十八日(9月27日)出面召集枢廷会议，主张由李鸿章出面与俄使交谈。因俄使不愿出面调停，慈禧太后的联俄制日求和活动未能实现。接着，她又鼓动恭亲王奕䜣与英使联系，寄希望于英国的调停。本来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帝党官员纷纷要求光绪帝起用已被闲置10年之久的恭亲王奕䜣。光绪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

九月一日(9月29日)任命奕䜣为总理衙门和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希望他能以老臣的资历对战局做些指导。不料这位在"甲申朝局之变"中被慈禧太后罢黜的恭亲王,竟在复出后又站到了慈禧太后一边,实令光绪帝恼火。但光绪帝仍幻想利用奕䜣与慈禧太后长期政争的矛盾,又于十月初五日(11月2日)任命奕䜣为新成立的督办军务处的首脑。光绪帝还在同日任用翁同龢为军机大臣,试图以此来改变军机处由后党操纵的局面。光绪帝的主战与慈禧太后的求和固然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他对奕䜣的重用却是一个失误。奕䜣在督办军务处仅两天后,就去商请英、法、德、美公使以赔偿兵费等为条件由列强出面调停。

也在日军逼近鸭绿江之际,光绪帝强调加强鸭绿江防线,在给李鸿章的谕令中称:"著李鸿章统筹进止机宜,妥为调度,朝廷不为遥制。"[1] 李鸿章在掌握统筹进止之权后,并未作积极的防守,以致日军在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强渡鸭绿江,接着连陷九连城、安东、凤凰城、金州、旅顺等地。光绪帝于十月二十七日(11月24日)旅顺失守后"责李鸿章调度乖方,褫职留任"[2]。于此光绪帝调两江总督刘坤一到山海关前线,负责指挥战事,试图用湘军取代淮军以改变不利状况。但湘军的战况依然不佳,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日军又接连攻占了山海关外的海城、营口、田台庄等要地,几乎控制了辽东半岛。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20日),日军又在山东荣城湾登岸,从后路包抄威海。光绪帝连发谕令,要北洋

---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0,第28页。

② 《清史稿》第4册,第908页。

舰队和陆军"奋力冲击","切勿再失事机,致以战舰资敌"[1]。但早已在李鸿章"避战保船"方针下躲在刘公岛基地的北洋舰队不仅无法控制制海权,还遭到日军在威海后路的合力夹击,最终以日本舰队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2月17日)侵入威海卫港和北洋舰队的覆灭而结束了威海卫之战。

日本军队向威海卫进攻之日,正是清廷遣使赴日求和之时。还在奕䜣要求各国公使出面调停的时候,他派出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去天津同李鸿章密商直接派员赴日求和问题。李鸿章建议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前往日本,结果日本以德璀琳不是清廷钦派大员为借口拒绝接待。慈禧太后又同奕䜣商定,由张荫桓作为全权代表赴日。正月初六日(1月31日),张荫桓一行抵达日本广岛。日本为全歼北洋海军,不愿在此时议和,便以张荫桓等人全权不足为由不予开议,日方表示只有奕䜣或李鸿章亲自赴日,才能作为谈判对手。在日军占领刘公岛的当天,慈禧太后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议和代表赴日谈判,李鸿章在旅顺失陷时所受的处分也予以撤销。慈禧太后作了这些安排之后,自己便抱病不出,把怎样议和的烂摊子甩给光绪帝。李鸿章于正月二十八日(2月22日)来京后,与枢臣讨论了议和中的有关问题。李鸿章起初表白"割地之说不敢承担",想把割地的责任推给朝廷。翁同龢认为"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这代表了光绪帝的意见。后党成员孙毓汶、徐用仪便称:"必欲以割地为了局"[2]。帝、后党之间在割地问题上分歧明显。后来李鸿章以如议和不成

---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30,第21页。
② 《中日战争》第4册,第538—539页。

日本将“照旧进兵，直犯近畿”[1] 相要挟，加以英、俄等国也胁迫清廷尽快议和，光绪帝只好作出妥协，命奕䜣代传口谕，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又“令其斟酌重轻，与倭磋磨定议”[2]。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在日本抱着“宗社为重，边徼为轻”[3]的宗旨，与日方草签了《马关条约》。由于该约内容苛刻，光绪帝以割地太多为由，表示对该约“不允”[4]，拒绝签字用宝。此时，爱国官员的谏诤和举人的上书活动风起云涌，光绪帝怀着通过迁都而与日本周旋的想法到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接受这唯一可行之策，结果遭到拒绝。四月初八日（5月2日），军机大臣孙毓汶拿着李鸿章从天津送来的和约稿本与奕䜣等人共同逼迫光绪帝签字，慈禧太后在这时也指令必须批准和约，光绪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第二天“和约用宝”[5]。

在甲午战争中力主抗击日本侵略的光绪帝，因战败而吞下了苦果。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却是以“不愿做亡国之君”的姿态迎合了正在兴起的维新变法运动。

第五节　下诏变法

在光绪帝被迫接受了《马关条约》并在该约文本上签字的当天，即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1895年5月2日），由康有为

---

① 《中日战争》第1册，第83页。

②③ 《中日战争》第3册，第609页。

④ 《中日战争》第1册，第126页。

⑤ 同上书，第128页。

联络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余名举人联名签字的以“拒和、迁都、变法”为主要内容的上清朝皇帝书正式呈递都察院，要求上达光绪帝，是为颇为有名的“公车上书”。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用宝为名，拒绝接受这份上书。但上书的内容却被广泛传抄和刊印，产生了深远影响。“公车上书 ”活动拉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接着，康有为又撰写了上清帝第三书，呈递都察院。五月十一日(6月3日)，这份上书送到了光绪帝的手中。此时，正在为甲午丧师痛感不安、为签约用宝深怀内疚的光绪帝，亟切需要的是怎样雪耻自强之方，康有为这份上书中所详细陈述的“富国”、“养民”、“教民”、“练兵”等实施变法的具体内容，所申明的必须“及时变法”，“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① 的剀切之言，引起了他的共鸣，对上书“览而喜之”，立即命令再抄录副本4件，以1件呈送慈禧太后，1件留存军机待日后发交各省督抚讨论，1件存放乾清宫南窗小箧，1件存勤政殿以备随时“览观”②。这是光绪帝同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透过紫禁城的高高厚墙，在思想上发生接触的开始。当然，在守旧官员把持朝政的情况下，这种接触是非常困难的。20余天后，康有为又写下呈光绪帝第四书，先后请都察院、工部等衙门代递，均遭到拒绝，表明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沟通道路障碍重重。

鉴于这种情况，康有为深深认识到：“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③ 于是，他把帝党官员视为靠山，同

① 《康有为全集 》第2集，第132页。
② 《戊戌变法》第4册，第131页。
③ 同上书，第132页。

翁同龢联系密切。翁同龢早在光绪十四年康有为第一次向清帝上书时就闻知了他的名字，当光绪二十一年的会试期间，翁同龢作为朝考阅卷大臣，对康有为加意赏拔，使其考中进士。出闱后，康有为拜访了翁同龢，反复向翁同龢讲述了变法的重要性，希望光绪帝能够“力任变法，推见贤才”。翁同龢感到康有为对宫中情况不甚了解，便对他说：“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芸阁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巡数之者。”① 临别时，康有为送给翁同龢两本他自己所写有关俄国、日本变法的书籍《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不久，康有为又引荐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人结识了翁同龢。翁同龢则将帝党官员文廷式、李盛铎、陈炽等人介绍给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这样，维新派与帝党的结合，对于维新运动的不断高涨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年夏季，《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的创刊和强学会的成立，有力地扩大了变法的宣传，壮大了维新的力量。

光绪帝能够对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进一步加深了解并逐步确立变法的信心，与帝党官员起到的纽带作用是分不开的。他第一次展读康有为的上书时，翁同龢在场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才华。随后“备以康之言达皇上，又日以万国之故，西法之良”来“辅导皇上”②，使光绪帝眼界大开。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德国强占胶州之际，康有为又呈上清帝第五书，痛陈中国面临被列强瓜

① 《戊戌变法》第4册，第132—133页。

② 《戊戌变法》第2册，第18页。

分的危局,要求光绪帝立即变法图存。这次上书又遭顽固大臣阻挠而未递到光绪帝手中。恰在此时,曾三次读过康有为上皇帝书的给事中高燮曾上奏为康氏的遭遇鸣不平,请求光绪帝亲自召见他,委以重任。这是清朝官员第一次正式在奏折中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翁同龢也鼓励光绪帝传旨召见康有为。光绪帝采纳了这些建议,不料却遭到奕䜣的反对,理由是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康有为是一个小臣,只能由大臣问话后传语。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 年 1 月 24 日),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西花厅问话。参与问话的翁同龢把康有为在问话时所陈言的有关变法重要性、内容及步骤向光绪帝汇报后,光绪帝命令臣属今后对康有为递上的条陈,要即日进呈,不得阻拦或积压。于是,康有为在问话后的第 5 天,向光绪帝上第六书,提出了下诏定国是的要求,强调中国变法"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要义有三点:"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三曰设待诏所"[1]。光绪帝读了这份上书后颇以为然,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二月二十日(3 月 12 日),康有为第七次向光绪帝上书,要求光绪帝以俄国彼得大帝为榜样,以君权厉行变法。三月二十七日(4 月 17 日),康有为等人组织了保国会,由御史李盛铎领首。守旧大臣攻击该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2],甚至要追究入会之人。光绪帝则指出:"会为保国,岂不甚善!"[3]有力打击了顽固势力的气焰,支持了维新派。

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夏之交,光绪帝既受到康有为等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 1。
② 《戊戌变法》第 2 册,第 485 页。
③ 《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143 页。

人力言变法图存主张的影响，又目睹这年春季俄国强占旅顺、大连后列强交迫、国势日蹙的严重状况，决心通过变法维新，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四月十二日(5月31日)恭亲王奕䜣的病逝，给光绪帝提供了一次实施变法的机会。他请庆亲王奕劻转告慈禧太后称："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1] 康有为也致函翁同龢，促其及时策动光绪帝变法，勿失时机。翁同龢便授意康有为代御史杨深秀、内阁学士徐致靖拟"请定国是"的奏折两件，由杨、徐两人分别于四月十三日(6月1日)、二十日(8日)向光绪帝进呈。光绪帝在二十二日(10日)令翁同龢代拟宣布变法的国是诏。经翁同龢一夜的努力，诏书撰就。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告变法。诏书中称："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2]

光绪帝在宣布变法两天之后，又下诏定于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召见康有为。慈禧太后却先发制人，迫令光绪帝在召见康有为的前一天以翁同龢"揽权狂悖"为由将其免职，逐回常熟原籍。光绪帝在一度"战栗变色"后，仍如期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了康有为，商讨变法事宜。康有为首先陈述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光绪帝表示同

---

① 《戊戌变法》第1册，第331页。

②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18，第15页。

意，他说："今日诚非变法不可"。为了减少顽固派的压力与阻挠，康有为建议"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①。召见之后，光绪帝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康有为充分利用皇帝赋予他的专折奏事之权，不断上奏，提出一系列有关新政的建议。光绪帝从下诏变法到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的103天中，先后发布了有关新政的各种诏令达180条左右，其主要涉及的层面和所包括的内容为：第一，文化教育方面，创办京师大学堂，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而改试策论，设立译书局，派留学生出国等；第二，经济方面，保护农工商业，成立农工商局，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发展铁路和采矿业，设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军事方面，裁减旧军，训练新式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等；政治方面，改革旧机构，裁撤闲散重叠的衙门，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允许自由创办报馆和学会等。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北京紫禁城发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诏令，毕竟是光绪帝革旧图新决心的体现，毕竟使维新派的变法愿望得到部分实现，这就在文教上打击了旧学，提倡了新学，经济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政治上给人们某些言论、出版、结社的权利，因而具有进步作用。新政诏令却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反对，许多顽固大臣引慈禧太后为奥援，唯"懿旨"是尊，不把光绪帝放在眼里，甚至明目张胆地阻挠新政，致使光绪帝的变法诏书大多成了一纸空文。

从新政诏令颁布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就预

① 《戊戌变法》第4册，第145页。

谋着对政局的控制。在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的谕令发布当天，慈禧太后又胁迫光绪帝宣布以后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官员，须到颐和园向她谢恩。同日，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大臣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以控制京津一带的兵权。光绪帝也未一味示弱，七月十九日（9 月 4 日），他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 6 人全部革职，并对王照予以奖赏。次日，他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赏给四品卿衔，参加新政。七月二十二日（9 月 7 日），把阻挠新政的李鸿章逐出总理衙门。光绪帝的这些反击措施，进一步引起慈禧太后的忌恨，她不断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策划，京津一带也盛传秋季慈禧太后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将废掉光绪帝。

随着天津阅兵日期的迫近，光绪帝惊慌不安，于七月二十八日（9 月 13 日）交给杨锐一道密诏，称："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1] 光绪帝这种置自身命运于度外的精神使康有为等人大为感动，但他们在捧诏痛哭之后，却是束手无策，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于东交民巷的公使馆和曾参加过强学会并握有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身上。各国公使只是虚表"同情"，不愿干预。康有为等人便策划了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的行动[2]；一方面敦请光绪帝于八月初一日（9 月 16 日）召见

① 《戊戌变法》第 2 册，第 92 页。

② 参见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光明日报》1985 年 9 月 4 日。

袁世凯并破格重赏侍郎候补；一方面物色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为捕杀慈禧太后的人选；又一方面则是由谭嗣同在八月初三日(9月18日)夜访袁世凯,鼓动袁世凯先诛荣禄,再兵围颐和园。毕永年进京与康有为交谈,认为袁世凯不可靠,此事不可恃,便径赴日本。袁世凯表面上答应了谭嗣同,却在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再次受到光绪帝召见后,于当日赶到天津向荣禄告了密。荣禄便连夜驰奔京城,向慈禧太后密报。慈禧太后闻讯,深夜从颐和园还宫。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晨,慈禧太后宣布重新训政,下令缉捕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在政变发生的前一天逃离北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君子"于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八日(9月23日)举行临朝训政礼后,囚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被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势力所扼杀。

第六节　曲折余生

慈禧太后在发动戊戌政变后,就一心想废掉光绪帝,却因遭到英、日等国的反对而未能得逞。当她令太医捏造"脉案",谎称光绪帝已病重的消息公布后,英国驻华公使窦乐纳就通知总理衙门称:"我坚信,假如光绪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①] 窦乐纳还派一名医生为光绪帝诊断病情,结果是宣布光绪帝无病。慈禧太后只好暂时

---

① 《英国蓝皮书》中国第1号,1899年,第303页。

忍气吞声，但与英、日的矛盾加深，并伺机再谋废立。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99 年 12 月 31 日），荣禄向慈禧太后密献计策："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① "大阿哥"，即皇位继承人。清朝在康熙帝晚年时已颁立下"永不建储之谕"，慈禧太后却背离祖宗"家法"，接受了荣禄的建议，以光绪帝无子为由，决定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于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1900 年 1 月 31 日）举行了立大阿哥的典礼。面对慈禧太后"名为立嗣，实则废立"的阴谋，舆论哗然。英、日、美等国驻华公使拒不参加典礼，列强的军舰也由上海北驶表示对此事要加以"干预"。慈禧太后策立了大阿哥，却未敢废掉光绪帝的帝位。但那位年方 15 岁、终日以玩犬为乐的溥儁却进了皇宫成了皇位继承人，而光绪帝仍然是被囚在瀛台的挂名皇帝。

通过废立问题的一连串闹剧，慈禧太后对列强的不断干预十分不满，于是便利用了义和团反帝风暴作为她进行报复的工具。本来，列强对光绪帝的支持，是担心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再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对列强在华的侵略权益不利。而光绪帝与维新派共同掀起的戊戌变法，又是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前提的，列强对此也并非完全赞赏。但就光绪帝的开明和慈禧太后的守旧而言，列强自然会选择前者。当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又发生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其盲目排外的一面却恰中守旧势力之下怀，慈禧太后便借以发泄了对列强在废立问题上对她屡次拆台的不满情绪。于是，她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中旬接受了协办大学士刚毅对义

① 《戊戌变法》第 1 册，第 478 页。

和团"宜抚不宜剿"的建议，一改过去"剿抚兼施"的政策，下了对义和团加以"招抚"的决心，默许义和团进入北京。与此同时，俄、英、德、法、美、日、意、奥八国拼凑 2000 余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由天津向北京进犯，开始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各国又继续向大沽增兵，试图不断扩大侵略战争。

面对八国联军的侵略，清廷必须在和与战问题上作出抉择。自五月二十日(6 月 16 日)至五月二十三日(6 月 19 日)，慈禧太后连续在 4 天之内召集 4 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光绪帝参加了会议，他不赞成对外宣战，认为顽固大臣所声言的"义民可恃，其术甚神"是靠不住的，指出"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奈何以民命为儿戏?"[①] 载漪、载濂、刚毅等顽固大臣则不仅一再申明要靠义和团的"神术"去"报雪仇耻"，而且还指使人编造出一个"请太后归政，废除大阿哥"的所谓"外交团照会"，使慈禧太后大为恼怒，声称:"外人无理至此，予誓必报之。"[②] 经慈禧太后与守旧排外大臣的反复密商后，于五月二十五日(6 月 21 日)颁布了宣战"上谕"。但就在宣战后仅 4 天，慈禧太后就向列强表示"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开衅"[③]。又过了 4 天，又表示"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④]。可见，利用义和团去同八国联军作战以实现慈禧太后报复外国人，又试图对义和团加以镇压，这就是慈禧太后宣战的实质。

七月二十日(8 月 14 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慌

① 《义和团》第 1 册，第 13 页。

② 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 67，第 2 页。

③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86 页。

④ 同上书，第 203 页。

忙挟光绪帝西逃。在此之前，她调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与列强议和。经李鸿章与列强的谈判交涉，慈禧太后得知"惩凶"的名单上没有她，对列强十分感激，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①，授权奕劻、李鸿章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随后，她与光绪帝返回北京，并将大阿哥溥儁废掉。

光绪帝返京后，不再被囚于瀛台，而是常常临朝，回复到以往的帝位生活，但慈禧太后对他仍严加控制。此时的清廷固然仍在推行着自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 年 1 月 29 日）开始下诏变法所实行的新政，似乎是把戊戌变法时期的新政措施又一步步恢复，然而光绪帝在颁发新政诏令时却不得不服从慈禧太后的旨意"先自骂两句"，说"康有为之变法，非变法也，乃乱法也"②。他在对德龄的自白中表达了苦衷："我有意振兴中国，但你知道我不能作主，不能如我的志。"③就是在如此心境之下，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 年 11 月 14 日），光绪帝怀着无限的惆怅逝于北京。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 945 页。

② 《德宗遗事》，第 49 页。

③ 德菱（龄）：《清宫二年记》，《东方杂志》10 卷 7 号。

第十章 曾国藩

第一节 获取功名，肆力理学

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811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县南的白杨坪村(今属双峰县)的一个中等地主家庭。祖父曾玉屏，为乡村的土财主。父曾麟书，是个多年不第的老童生，直到43岁才考中秀才。在家庭的严格督促下，曾国藩从小勤奋读书，熟悉了封建礼教纲常等一套儒家伦理道德，成为他以后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道光十年(1830)，他20岁时外出求学，先在衡阳唐氏家塾毕业，翌年改进湘乡连滨书院。道光十三年(1833)考中秀才，进入长沙岳麓书院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地接受了封建思想教育和湖南学风的熏陶，对他日后的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曾国藩于道光十四年考中举人。在以后的两三年间，他连续两次前往北京参加会试，结果都名落孙山。但是这两次北京之行，对促使他努力向学大有帮助。回到湖南家乡后，他闭门在家，发愤攻读，对历史和古文潜心研究，因而较大地提高了学识素养。

道光十八年(1838)正月，曾国藩第三次赴京参加会试，以第

38 名中试。四月，殿试三甲 42 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三名，以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道光二十年散馆，列二等 19 名，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

考中进士并被选入翰林院，对功名心切的曾国藩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早在道光十一年他便改号涤生，要求自己"涤其旧染之污"而新生[①]。中进士后又"更名国藩"，期望作为国家的屏藩，立功业于乱世。特别是选入翰林院后更是"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②]，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学习都进行严格的要求，从而更励志于探求学问。正好这时，湖南善化学者唐鉴由江宁藩司入官太常寺卿，曾国藩便"从讲求为学之方"。唐鉴是个理学家，"专以义理之学相勖"，在唐的带动影响下，曾国藩开始"肆力于朱学"。

这时中英鸦片战争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对于这一引起中国"数千年来大变局"的大事，曾国藩是很注意的。他当时对于英国资本主义势力之入侵持憎恶和反对态度，谴责他们"逆性同犬羊，贪求无厌"[③]。赞扬姚莹、达洪阿率领台湾军民击退侵台英国兵舰，俘获英国士兵多人的正义反抗是"大快人心"的举动[④]。

鸦片战争结束后，曾国藩更致力于理学，按照理学家的严格要求进行修身养性。他以倭仁为榜样，"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⑤]，将读书与修身结合起来。他在治理

① 《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卷上，第 27 页下"省克"。
② 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 1，第 6 页。
③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 1 册，辛丑（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初九日。
④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16 页。
⑤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 1 册，辛丑（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学的同时又治古文辞，追随桐城派学习古文、诗词等。几年以后又对考据之学感兴趣。于是他认为的“自西汉至于今识字之儒”的“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三途①，都已涉身其中，因而为进一步研究学问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第二节　上折陈言

然而，时事的变幻使曾国藩朝另一方向发展。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已升任礼部右侍郎。当时，经过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自沿海向内地而逐步深入，国内原有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面对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形势，曾国藩感到忧心如焚，因而在咸丰帝即位后连续上奏，提出不少建议。其中，《应诏陈言疏》关于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对咸丰帝有所震动，批示“切中情事，深堪嘉纳”，令有关部门“评议以闻”，但经“部议格不行”；《议汰兵疏》进呈后，帝“召见，嘉其切中时弊，谕以俟广西事定再行办理”②。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曾国藩在极其焦急之中又向咸丰帝陈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接向咸丰帝提出三条尖锐的批评意见。其一是“防琐碎之风”，批评咸丰帝“自去岁以来”只注重诸臣之“细节”，而疏于国家大计，表现在“发往广西人员，……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其二是“杜文饰之风”，批评咸丰帝

①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55页。

② 《国史本传》,《曾文正公全集》卷首、第13页;《曾文正公年谱》卷1,第21、25页。

"徒尚文饰",不讲实际,不能采纳好的建议,"自去岁求言以来",对一些"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其三是消"骄矜之气",批评咸丰帝去岁以来既下诏求言,结果却拒谏自专,无视百僚的意见。指出"目今警报运筹于一人,取决于俄顷,皇上独任其劳,而臣等莫分其忧,使广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虑也"①。也就是指责咸丰皇专横独断,致使太平天国起义不能很快镇压下去。曾国藩上奏此折是想效古忠臣之鲠直敢谏,自以为不失为忠心耿耿之诤言,但却差一点引起大祸,咸丰帝阅奏后大为震怒,"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②。由于周围大臣的劝说才作罢。这次事件对曾国藩教训很深,此后他再也不敢凭一片赤诚去"冒犯天颜"了。

咸丰二年六月,他被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七月,得悉其母病逝讯息,急忙回原籍奔丧。

第三节　组织湘军,屠杀会党群众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 年 1 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树起了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大旗。经过两年余奋战,自广西入湖南、进湖北,顺长江而下,经江西、安徽、江苏,于咸丰三年二月(1853 年 3 月)攻下江宁府城,随即将它定为国都,改名天京。

这时清皇朝的八旗兵早已腐败,继起的绿营兵也日趋衰败。

---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 1,第 32—38 页。

②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曾文正公别传》卷 1,第 3 页。

清廷先后调集大批军队前往广西、湖南镇压，结果纷纷败溃，只好寻求地方武装力量进行阻挡。当咸丰二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清廷便命令两湖督抚等地方官员劝谕士绅，举办团练。此时，曾国藩正因母丧在原籍守制。这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他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转来军机大臣转达咸丰帝十一月二十九日上谕，要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协助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曾国藩接旨后四天即前往长沙，着手筹办团练武装。

鉴于清朝原有军队已不足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实际状况，曾国藩认为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建立与培训起一支有严密组织并有顽强战斗意识和实战能力的新军。为此，他拟定了他的建军原则，竭尽全力组织起一支新的地主阶级武装湘军。

在湘军兴起前，湖南已有新宁举人江忠源兄弟等在本籍自募的楚勇和湘乡儒生罗泽南、王鑫师徒主持的湘勇，在镇压地方农民起义上都取得相当的成效。曾国藩与他们这些人有着师生或同乡的情谊，便在他们原有的基础上，吸收其经验并大加发展。他的湘军与旧军队比较，在兵源、选将、营制以至训练办法上都是“改弦更张”的。

首先，在兵源上，湘军的官兵来源采取逐级自行召募的办法，即：“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自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这个“帅”就是曾国藩，上一级负责挑选下一级，层层相连，最后归属曾国藩总指挥。当时湘军士兵只在湖南省内，主要在长沙、宝庆二府内召募，尤以湘乡人为多。这样的募集办法与清朝军队“将不必由帅选”，正好相反。它利用地域观念和同乡感情，促使彼此间团结合作，避免过去官兵“不相习”，上下缺乏感情联系，互不相干的冷漠状况，而

达到“一营之中，指臂相联”，使“弁勇视营、哨，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①。

其次，在将士素质上，要求“凡募勇，取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气者；其有市井衙门气者不用”②；而在将官上则选择绅士与儒生，其主要将领大多是有同乡、同学、师生、亲友关系，且是气味相投，讲求“忠君”、“卫道”的程朱理学忠实信徒。用曾国藩的话是，“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③，并具体要求“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归根结蒂是必须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作出个人牺牲，即具有“忠义血性”者，以能为封建主义制度效忠的政治标准为根本原则④。

再次，特别强调对士兵进行严格训练。在“训”字上，“以忠义激励将士”，进行封建伦理和纪律教育。“崇纪律，重廉耻”，要求“有勇知方”。严禁将士吸食洋烟（鸦片）、打牌押宝（赌博）、奸淫妇女和结盟拜会等；在“练”字上则加强练队伍和练技艺。每天必须按规定出操、练习各种武艺和阵法、巡逻放哨和列队点名等，要求行动整齐，勇于作战。

这样，曾国藩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维系湘军的纽带，使全军上下归他一人调度指挥，湘军成为以曾国藩为首领的私人武装。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军阀集团。湘军的骨干多是以各种封建关系纠集在一起的中下层封建知识分子。他们出身于一

① 以上见王定安：《湘军记》卷20，岳麓书社版，第338页。

② 《湘军记》，第340页。

③ 曾国藩：《与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32页。

④ 《与彭筱房、曾香海》，《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第2、3页。

般中小地主家庭，功名不高，或是诸生、文童，也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但这些人都浸透了封建正统思想，都以坚决维护封建名教和统治秩序为己任。这些人比腐朽的封建官僚有才干，他们兢兢业业，有一股拼命向上爬以取得功名利禄的顽强精神和野心。曾国藩正是带领这样一批儒生们，结成“誓不相弃之死党”[①]，而成为太平军的死敌。

在曾国藩组织湘军的过程中，即在咸丰三年间，尚未与太平军正式作战前，他就已指挥这些未成军的练勇在湖南境内多次镇压过会党起义，也曾派遣他们到江西支援过当地团练与太平军作战。在对待起义军上，曾国藩采取极为残忍的手段。早在咸丰三年二月他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就提出：对起义军“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主张“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并声言：“但得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②] 他的主张得到咸丰帝的积极支持，批示他“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③]，因而他更加放手大干。这年上半年，他在长沙设审案局，依靠地方绅耆，大批捕杀，立三等法：重则处以斩枭；轻亦立死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他不“拘泥常例”，借用巡抚令旗，捕人多，杀人快，“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心狠手辣，在百十天内，就屠杀了 200 多人。他这样大肆杀戮的暴行，遭到社会舆论的严正谴责，人们给他起了“曾剃头”和“曾屠户”的绰号。

---

① 《与文任吾》，《书札》卷 2，第 35 页。

② 《奏稿》卷 2，第 2—3 页。

③ 同上书，第 4 页。

第四节　镇压太平天国

湘军筹建于咸丰三年，原先只有陆师，以后为与太平军争长江水上优势又筹建水师。水、陆两支队伍于咸丰四年正月下旬分别建成。水陆各5000人，营制每营500人，各分为10营。水师拥有“快蟹”40号，“长龙”50号，舢板150号，拖罟1号（作为曾国藩的座船），又购民船120号改造为战船，另雇民船一百数十号，以载辎重。加上夫役水手7000余人，水陆共有员弁兵勇一万七千余人，自衡州（今衡阳）出发，会师于湘潭，声势浩大，欲“东征”与太平军决一死战。

曾国藩于出师时，发布《讨粤匪檄》，竭力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孔孟之道，同时也抓住了太平天国的某些弱点加以渲染。它充分反映了曾国藩对农民反封建斗争的仇恨，表明了他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镇压农民起义的顽固立场。

当曾国藩率领湘军大举“东征”时，太平军水师已据有长江天险，陆上则占有皖、赣、鄂三省的大部分。而这时安庆、九江早已在太平军手里，武昌也正处在太平军包围中，太平军显然占有绝对优势。曾国藩的东征，战略目的是在争夺武汉、九江、安庆这长江中游的三大据点，然后进军东南，包围天京。因此，此后七八年间，湘军便同太平军对这三大据点进行了激烈的反复的争夺。

曾国藩面对太平军强大的兵力及其所占有的优势，认为必须逐步推进，步步为营，而不能急于冒进。他首先着眼于两湖地区，与太平军展开了拼死的战斗。战斗最早于咸丰四年（1854）三月上、中旬在岳州府周围进行，老湘营王鑫兵败退守岳州，又缒

城逃跑，大部分被歼，太平军乘胜进占湘潭，钳制长沙。曾国藩以湘军主力力争湘潭，并自率水师攻打长沙北之靖港，结果湘军水勇溃败，战船三分之一被焚毁和为太平军所获。曾国藩羞愤交加，投水自杀，被随从救出。湘潭方面双方激战 7 日，太平军伤亡重大，被迫退出，长沙外围缓解。曾国藩利用 3 个月时间休整，于六月中重新出动，七月初一日夺回岳州府城。

这年八月，曾国藩督率湘军水陆师分三路进攻武汉。八月二十三日(10 月 14 日)攻陷武昌、汉阳，太平军停泊汉水的千余艘船只拟冲至长江，被截毁殆尽，湘军水陆东下，进攻江西。十月十三日(12 月 2 日)，湘军水师在彭玉麟、杨载福带领下又攻断湖北田家镇至半壁山的拦江铁链，焚毁太平军船只 4500 余艘。湘军大为得势。

然而，风云突变，这年十二月太平天国派石达开率军在江西湖口、九江焚湘军水师船只。特别是十二月二十五日(1855 年 2 月 11 日)在九江夜袭湘军水师，焚战船多艘，获曾国藩座船，尽得其文卷册牍，曾国藩走投无路，再次投水寻死，被人救起送罗泽南营中。紧接着咸丰五年春，太平军第四次攻占汉阳，并第三次攻克武昌城，曾国藩率部龟缩南昌城内不敢出来。下半年十一月石达开回师江西，在短短 3 个月里，赣中、赣北尽为太平军所得。

到咸丰六年上半年，曾国藩率湘军东征与太平军进行了将近 3 年的争夺战，彼此各有胜负，但总的形势对湘军是不利的，不仅长江中游三大据点都在太平军手里，而且太平军还控制了从武昌到镇江之间所有沿岸的城镇；安徽、江西、湖北东部以及江苏部分地区也都为太平天国所有。

然而不久,"天京事变"爆发,形势急转直下。曾国藩带领湘军趁机反攻。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56年12月19日),湖北湘军胡林翼、杨载福等攻陷武昌。咸丰七年九月初九日(1857年10月26日),湘军攻陷湖口,被阻隔3年之湘军水师彭玉麟部与杨载福部在外江会合。

在此期间,自咸丰七年二月到八年六月的一年四个月时间里,曾国藩因丁父忧回原籍守制。他与清廷的矛盾,也通过三四年来战事的进展而有所增长。以咸丰帝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对于曾国藩本来就怀有疑虑,始终都仅赐给他空头衔而不予以实权,使他感到处处都有阻力。他曾向咸丰帝提出至少授给他以巡抚职务以便于办理军务,调动粮饷等,但没有获得同意,而让他继续"在籍守制"。到咸丰八年元月,由于胡林翼、骆秉章先后奏请他统兵援浙,他才再度出山。

经过几年来与地方官吏和清廷的交涉折冲,又经过一年多来在原籍守制期间的反思,再度出山的曾国藩变得老练圆滑了。此后的曾国藩与清廷及与地方官吏的关系渐趋于合拍,他的职权地位也随着形势变化发展而不断有所提高。

太平天国的实力由于领导集团的内讧而大为削弱,使总的形势大有利于清廷,但就湘军与太平军的较量来看,在咸丰八年至十年的两三年间则仍有起伏。咸丰八年四月,湘军李续宾等会同水师杨岳斌(即杨载福)、彭玉麟联合攻下九江,太平军一万七千余人死难,长江中游第二据点又为湘军所得。但同年十月,三河镇之战,李续宾所部湘军精锐6000人为陈玉成、李秀成联军全歼,湘军悍将李续宾等被击毙,给曾国藩及其湘军集团打击之大,不亚于咸丰四年冬湖口、九江曾国藩座船被俘获之役,"不特

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1]。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部太平军拟行入川,骆秉章与胡林翼计议,通过湖广总督官文奏请清廷派曾国藩入川布置,以确保湖北饷源,而乘机为曾谋得川督。咸丰帝虽下令调派曾国藩率军入川,却无意授他以四川地方实权,因而胡林翼等又合计将曾国藩留驻湖北,共谋进军安徽。此后曾国藩便以攻取安庆作为湘军的战略重点和当务之急,把安庆之战看作是"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来考虑[2]。

曾国藩进攻安庆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他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实行力取上游,逐渐及于下游,也就是先取安徽,再及于江、浙的方针,始终坚定不移。即使是咸丰十年春夏之间江南大营再次解围,和春、张国樑兵败身死,苏常危急,咸丰帝一再催促曾国藩率湘军东下支援,他都拒不从命,安然不动。咸丰帝万不得已,只好赐曾国藩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并连下谕旨,令他撤安庆之围,驰援苏常。他也还是奏称"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3],坚持原来的观点。最后清廷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见。由于坚持先打安庆再及江南的战略方针,在此后安庆攻陷后,湘军在围攻天京上拥有更加有利的形势。

但是,太平天国晚期洪秀全重用洪仁玕,辅以陈玉成、李秀成二人的善于带兵和富于实战经验,使曾国藩的战略意图不可能轻易实现,而且经常陷于困境。咸丰十年夏至十一年初夏,曾

---

① 《复刘霞仙》,《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7、第23页。

②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第44页。

国藩坐镇祁门近1年，调兵遣将与太平军争夺皖南。在十年十月和十一年四月，曾国藩就曾先后两次因太平军李秀成和李世贤分别率部逼近而惊慌万状，两次都写了遗嘱安排后事，只是因为太平军没有进一步进攻而使之度过了危机。事后他还心有余悸，再不敢身临前线指挥作战了。

安庆经过长期的围困，于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61年9月15日）终于被湘军曾国荃等部攻陷。在曾国藩支持下，曾国荃纵兵杀掠，乘机大发横财。

安庆的失陷，使天京失去重要的屏障。太平军从此居于守势，湘军与太平军的主要战场也由安徽转移到江苏。

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死于热河避暑山庄。这年十月，慈禧太后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与恭亲王奕䜣发动了“辛酉政变”，夺取了政权。为了尽快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慈禧太后任命曾国藩管辖苏、赣、皖、浙四省军事，自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皆归节制；同治元年（1862）更加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官衔。这时曾国藩渴望多年的宿愿得以实现，军、政、财大权一手在握，积极性也大为提高，从而加紧对苏南、浙江进兵，为最终攻取天京作好布防。在他的支持下，曾国荃部湘军包揽了对天京的围攻。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天京沦陷，曾国荃部抢得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头功，并纵兵对天京大肆掳掠烧杀。清廷论功行赏，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衔，赐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赏加太子少保衔，赐一等伯爵，其余湘军将领也都赏赐有加。

在慈禧太后把持下的清廷，对曾国藩虽然委以重任并给予

实权，但实际上还是很不放心的。特别是在曾国荃进兵雨花台以后，湘军自数万增至十余万人，曾氏兄弟手握重兵，对清廷不能不是一大威胁，因而清廷对曾国藩的态度便有所改变，不像以前那样支持了。曾国藩凭其多年的政治经验，意识到要保存性命，只有退让。于是在攻陷天京后便主动提出裁撤湘军和为曾国荃代请回籍养病，以消除清廷的疑虑。具体办法是裁撤他所直接统率的湘军主力二万五千名，但保留后建的淮军以“御寇”；曾国荃辞去浙江巡抚的职务。对于曾国藩的自释兵权和曾国荃引疾自请开缺，清廷很快便予以批准。

第五节　从主张抵抗到外敦“和好”

当曾国藩正率领湘军与太平军激烈搏斗期间，发生了英法联军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时，曾国藩在对待外来侵略的问题上仍然是主张抵抗。两年以后，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五日(1859 年 6 月 25 日)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一阶段战役结束，《天津条约》已经签订，英法侵略者北上换约，他们故意不按清廷规定的路线，擅自闯入大沽口，遭到大沽驻军的痛击。曾国藩在得到消息后，认为这次胜利大快人心。他在写给当时在僧格林沁营中当幕僚的郭嵩焘的信中说：“五月二十五日之战，自庚子、辛丑(1840、1841)夷务初起后，至是始一大创之，中外人心为之大快。”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了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结合

---

① 《复郭筠仙》,《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8，第 35 页。

起来以对付农民起义的新局面，这便是“借兵助剿”的问题。

在“助剿”问题上，外国侵略者是很积极主动的。咸丰十年冬，俄、法驻华公使便连续向清廷表示愿意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这时通过第二次战争的再次接触，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某些重要成员对于西方侵略者的认识已有较大转变。他们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军是“心腹之害”，而外国侵略者不过是“肢体之患”或“肘腋之忧”[①]。于是借洋兵“助剿”便提到会议桌面上来。在谈判桌上，俄、法、英、美很主动，而清廷则处在被动地位。就清廷方面而言，它未尝不想借洋兵以镇压农民起义，但又感到“流弊滋多”，因而迟疑再三，最后只是在太平军占有苏、常，再次进攻沪、杭的严重形势下，才不得不被迫接受。

但是，对于借洋兵“助剿”，曾国藩却另有一番考虑。同治元年正月(1862 年 2 月)，他以两江总督的身份在给江苏巡抚薛焕的信中，就曾很不客气地责问道：“其借助西洋一事，未经奉商，遽行举办，此等情形鄙人前皆未闻。”[②]而当清廷表示“嘉其助顺，听其进兵”，逼他表态时，他在给同治帝的奏折中表示不同意和洋兵联合进行全面会剿，认为“目前权宜之计，只宜借兵守沪城，切勿遽务远略”，始终强调“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③]。

由此可知，曾国藩对于洋兵“会剿”事是有条件的，他在给薛焕的信中曾直截了当声称：“弟所谓愿执其咎者，专指保上海而

---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8 册，第 2675、2674 页。

② 《复薛觐堂中丞》，《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版，第 27 页。

③ 《复潘玉香观察》，《曾国藩未刊信稿》，第 7—8 页；《议复借洋兵剿贼片》(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 15，第 19—20 页。

言,而必欲攻取金陵、苏、常,则始终不敢与闻。"①

正是由于曾国藩等的反对,清廷最后没有接受英、法、俄、美等国大规模的洋兵联合会剿,而在同治元年夏的一个上谕宣告:"借洋兵助剿之议,迭经曾国藩等先后复奏,佥称有害无利,前因上海吃紧,英、法两国情愿帮同战守,是以姑事羁縻,未经阻止。"表示以后当主要依靠官军②。

曾国藩之所以反对"洋兵会剿",认为"只宜借兵守沪城",真正的原因是:第一,他不愿洋人分占其利,特别是不甘愿洋枪队分占由他和其弟曾国荃湘军主攻天京的头功。这是最主要的。第二,这也是从清朝统治者的实际利益考虑。尽管这时这个政权已开始半殖民地化了,但它在能够保有的独立限度里,还是尽量想多维持一点自己的封建主权。

值得注意的还有阿思本船队的事件。这事也发生在咸丰、同治之交,与借洋兵助剿差不多同时。咸丰十一年(1861),总理衙门大臣奕䜣、桂良、文祥等首先奏请购置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患",曾国藩很表赞同,称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③。第二年,经清廷批准,由总理衙门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趁休假回国之便,代购中号兵船3艘、小号兵船4艘。但李泰国违反总理衙门与他的协议,不仅多购1艘,船价由原定60万两增至107万两,而且擅自招募600余名英国人为船队水手军官,聘请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任船队的司令。更严重的是他竟以中国代表

① 《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7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第18—19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第10页;《上恭亲王》,《曾国藩未刊信稿》,第176页。

自居，与阿思本订立了十三条协定，“依据这协定的条款，司令除了皇帝之外，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皇帝的命令要有李泰国副署才能有效”[1]。同治二年八月（1863 年 9 月），这支新购的船队到达中国，俨然是一支外国的海军小舰队。与曾国藩“原期操纵自如，指挥由我”的设想完全不是一回事。奕䜣等“再四向李泰国严词驳诘”，议定折衷办法，订立章程五条，“由中国选拔武职大员，作为该师船之汉总统，以阿思本为帮总统，均听当地所在用兵地方督抚节制调遣 ”[2]，但遭到曾国藩等湘淮系的坚决抵制，最后不得不将阿思本船队解散。

曾国藩对阿思本船队的抵制，含有维护中国民族尊严的积极因素，但同时也反映曾国藩等湘淮军实力派与外国侵略者之间尚存在一定的矛盾。

然而不管怎样，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曾国藩对于西方国家的言论和对策，确实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在根本态度上，反复强调“与洋人交际，要言忠信，行笃敬”，“要开诚布公，与敦和好”。

曾国藩之所以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有如此大的转变，是因为他的认识有了根本的转变。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1862 年 6 月 3 日），他的日记记载了他与幕僚们的谈话：“洋人（咸丰）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3]

由于曾国藩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认识和态度在第二次

---

① 何天爵：《中国的海陆军》，《洋务运动》第 8 册，第 474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21，第 2 页。
③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 13 册，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

鸦片战争后有了如此截然不同的转变,因而促使他由宋明理学的信仰者变为主张“师夷智”以“自强”的洋务派大员。

第六节　举办洋务

举办洋务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实权人物被迫学习西方科技以巩固其政权的活动,曾国藩是其中主要的倡导者。在当时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为了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等,洋务活动必然首先是从兴办军事工业开始。因此在咸丰十年提出借洋兵“助剿”和委洋商运米粮问题时,曾国藩就表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以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①。咸丰十一年,他就在安庆军营里设内军械所,召募科技人士开始制造洋枪洋炮。第二年,“试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在徐寿、华蘅芳等中国科技人员努力下造成第一艘木质轮船“黄鹄”号,他计划“以次放大续造多只”②。为此,同治二年冬,他派遣早期留美学生容闳到美国购置机器,进行扩充。两年后机器运到,在上海创建江南制造总局,“始以攻剿方殷,专造枪炮,亦因经费支绌,难兴船工”。至同治六年(1867)曾国藩奏留海关洋税二成,以其中一成充作造船费用,至第二年建造成一艘较“黄鹄”号大五六倍的木壳轮船,取名“恬吉”,时速也较前大有进步③。此后,直到曾国藩去世前,江南制造总局又陆续推出“操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2,第58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10页;《清史稿·艺术传四》;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15;《手书日记》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页。

江”、“测海”、“威靖”三艘轮船，体积、吃水马力与载重，一艘超过一艘。同治十二年又制造成一艘“海安”轮，马力达1800匹，载重达2800吨。“在外国为二等，在国内为巨擘。”[①] 但是曾国藩死后，制造局全由李鸿章管辖，改变了以自制轮船的方针为以买船为主，致使江南制造局在培养本国技术力量和技术设备上的发展受到相当的影响。

除了制枪炮、造船，曾国藩在江南制造局还设置了翻译机构，“另立学馆，以习翻译”。他对于主持编辑翻译的徐寿大加赞许，认为“此举较办制造局为尤要”，强调“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只有通过翻译，才能“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并聘请英、美传教士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等人专事翻译制造的科技书籍多种[②]。此外，他还接受容闳的建议，在江南制造局兵工厂旁建立了一所兵工学校，以培养机械制造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

曾国藩还接受容闳的建议与李鸿章联名奏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1871年8月18日），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李鸿章联衔会奏，委派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选带聪颖子弟赴美国肄习自然科学技术，具体办法为：“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去外国肄习十五年后按年分起，挨次回国。”[③] 120名青少年后来虽因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破坏，未能按预定15年的期限学完，而于光绪七年（1881）便全

① 《江南制造局记》，《洋务运动》第4册，第125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10页。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91页。

部提前撤回,但通过这6到9年的学习,还是培养出一批中国近代早期的外交、海军、航运、电报、路矿、教育等方面的新式人才,其中包括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等优秀科技工程人员,并且对以后中国派遣留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曾国藩办理"洋务"的时间不长,所办的洋务内容比起李鸿章、左宗棠和后起的张之洞等,要少得多。但是他起了创始者与带头人的作用,在近代中国洋务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七节 "剿捻无功"

曾国藩在功名仕进上曾一帆风顺,但在镇压捻军中因"无功"而招致清廷的不满。

同治四年四月(1865年5月),捻军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剿捻主力吸引到山东菏泽西北高楼寨,利用有利的地形进行伏击,使僧军被大量歼灭,僧格林沁本人也被击毙。清廷大为震动,赶紧调派曾国藩督师北剿。清廷颁给曾国藩以钦差大臣关防,任命他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所有三省八旗、绿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由他节制。

针对捻军流动作战、行踪不定的特点,曾国藩采取重点设防,坚壁清野,画河圈围的对策。他先驻扎在徐州,作为指挥中心,并在临淮、周口、徐州、济宁(以后加上归德)等地驻防重兵,进行堵截,以后又分别移驻这些据点,重点围攻,另外派遣精锐马队对捻军进行跟踪追击,以达到最后聚而歼之的目的。为了割断捻军与群众的联系,他实行查圩政策,进行坚壁清野,严禁群众接济捻军,并采取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的政策,企图

彻底孤立捻军。他以水师炮船封锁黄河,防止捻军北上,又利用运河、淮河、沙河、贾鲁河等河流的自然地形,挖壕筑墙,进行设防,企图限制捻军的流动。但所有这些,都没能奏效。捻军这时已分东、西两支,仍然往来穿插,驰骋南北东西,使清军经常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同治五年八月(1866 年 9 月),赖文光部东捻与张宗禹部西捻在河南开封大会师,一举冲破曾国藩布置的沙河及贾鲁河防线,大败河南巡抚李鹤年的河防军。然后乘胜东向,突破运河防线,进入山东水套地区。九月,自山东回师,再破清军河防,重返河南,如入无人之境。这使曾国藩煞费心机辛苦经营的合围河防"剿捻"计划破产,不得不自认"剿捻无功"。

由于曾国藩劳而无功,清廷决定以李鸿章来接替他。曾国藩自己也深感这种局面难以维持,便于同治五年十月自请开缺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等职衔,另派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己以散员留营效力,并附片暂将封爵注销。清廷只撤换了他的剿捻钦差大臣,命令他南返两江总督原任。

同治六年正月(1867 年 2 月),曾国藩由周口剿捻据点,途经徐州,二月返抵江宁,还驻两江总督衙门。此后两三年间,清廷为了对他进行安抚,先后补授他以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等头衔,并于同治七年七月调他任直隶总督。这年十二月至翌年二月,他在北京受慈禧太后与同治帝的数次接见,并在国宴上班列汉官之首,与满大学士倭仁东西相对,享受清廷的最高荣宠。然而在骨子里,曾国藩通过实际的观察体会,对清皇朝之前途及其当权人物深感失望,心情十分凄凉阴暗。还在同治六年六月间二十日晚(1867 年 7 月 21 日),他就私下与他的机要幕僚赵烈文在闲谈时透露出自己的忧虑。他对赵

烈文的清廷"根本颠扑",命运"殆不出五十年"的估计,起先不肯相信,以后觉得赵的分析有理,而希望速死,免得看到清朝的崩溃而难过[①]。以后他北上到京、津等地,通过亲自考察和直接了解,对清廷及主要当权人物更是失去信心,感到清廷大势已去,更增添了心头的愁闷[②]。

第八节 "曲全邻好"

同治九年五月(1870年6月)天津发生了重大教案,爱国民众愤怒惩罚欺压中国人民、无视中国主权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等侵略分子,焚毁教堂和外国驻津机构多处。事件发生后,清廷派遣曾国藩前往处理。曾国藩到天津后,明知这次教案"曲在洋人",但为了讨好侵略者以维持"中外和好",他不惜违心地大肆惩办中国人民,将"启衅"的罪名硬加到天津老百姓头上。

当时,在中法代表交涉期间,法国公使罗淑亚声势汹汹,以武力进行威胁,企图迫使清廷完全接受其极为苛刻的条件,连清廷都感到事态严重,"有诏备兵以待",而曾国藩却说:"百姓小忿,不足肇边衅"[②]。他的对外既定方针是"即令审得确情,实系曲在洋人","吾辈亦宜含浑出之,使彼有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如其曲不在洋人,凭谣言以煽乱,尤须从重惩办"[③]。在他主

①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27,《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411页。

② 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曾文正公全集》卷首,第62页。

③ 《复崇地山宫保》、《复恭亲王》,《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2,第12、43页。

持下，完全满足了法国侵略者的要求，任意逮捕了80余名无辜群众，重刑逼供。“先后两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县发配边疆，赔款四十九万七千余两”①，还由清廷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专使到法国赔礼道歉。曾国藩这种视人民如草芥、曲意讨好外国侵略者的卑劣行为，不能不引起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对，甚至连旅居北京的湖南士大夫也气愤地砸掉他悬在湖南会馆上的匾额，声言开除他出同乡会。在社会舆论的共同谴责下，曾国藩不得不承认对于这一事件“办理过柔，寸心抱疚”，“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为一生憾事”。以后还再三写信对人表示“神明内疚，至今耿耿”。但实际上他又认为从维护清朝统治利益上讲，是做得对的。他在向清廷奏报对天津教案一事的处理时说，“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②，认为“兵端一开，不特法国构难，各国亦皆约从同仇。能御之一口，不能御之于七省各海口；能持之于一二年，不能持之于数十百年，而彼族则累世寻仇，不胜不休”③。他进而提出“皇上（指同治帝）登极以来，外图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④。他认为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惟有采取对外屈辱乞和的妥协方针。也就是在这个奏折中所说的，今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兵端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

---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7，第14—15、42—43页。

② 《复陈津案各情片》，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页。

③ 《复刘霞仙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第4页。

④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9页。

此后,他更与郭嵩焘、李鸿章往复讨论。李鸿章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长久。今之各国,又岂有异。”① 曾国藩答复道:“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② 他们总结出的“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作为他们对外行动指南,并成为清廷对外关系的总方针。

曾国藩按以上指导思想办理天津教案是完全得到清廷同意的,但是由于舆论的指责集中在曾国藩一人身上,使他一下子由“中兴名臣”变成“卖国贼”。为了缓和“清议”,减少自己所受压力,曾国藩上疏请求另派大臣到天津协同办理。清廷接受他的请求,派遣工部尚书毛昶熙、江苏巡抚丁日昌赴津会办教案。这时正好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死,便下令调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而派李鸿章接替他为直隶总督,复查天津教案。这实际上等于宣布曾国藩没有处理好天津教案。清廷把曾国藩推出来当替罪羔羊,使曾国藩深感难堪,并为之寒心。

曾国藩于同治九年(1870)九月下旬离津入京,十月十五日(11月7日)由京南行,闰十月二十日(11月12日)抵江宁。此后他于同治十年十月曾乘船到江苏长江南北诸城镇巡视军营,并到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所属各厂。由于重病缠身,加上长期的精神抑郁,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衙门,终年62岁。

---

① 《复曾相》,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27—28页。

② 《复李中堂》,《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第10页。

他死后，清廷给他以最高嘉奖，在专发的上谕和祭文中对他大加赞扬，称他“公忠体国”，追赠太傅，谥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将其生平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

第十一章　李　鸿　章

第一节　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家

李鸿章，字子黻，号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1823年2月5日)出生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父李文安曾官刑部郎中，记名御史。李鸿章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举人。翌年，通过父亲与曾国藩同年的关系，师事曾氏，“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过了两年，李鸿章考中进士。道光三十年(1850)，授翰林院编修。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李鸿章曾多次率领团勇协助安徽地方官员对抗太平军。咸丰八年(1852)，李鸿章奔江西晋谒曾国藩，入其营幕。次年十月，被任命为福建延建邵遗缺道，未曾到任。在曾幕期间，李鸿章郁郁不得志，师徒之间微有龃龉，曾一度拂袖他去，“闲居一年”。咸丰十一年(1861)秋，湘军攻陷安庆，他又回到老师的营幕，这时，曾国藩对他另眼相看，举凡“军国要务，皆与筹商”。李鸿章受到重用，从此成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左右手。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进军苏、杭，威胁上海。李鸿章奉命回安徽招募淮勇，皖籍地主武装张树声、周盛波、潘鼎新、刘铭传等人纷纷响应，不久，一支拥有6500余人的淮军正式编成。淮军

建立之初，“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军章程”①。曾国藩调拨湘军数营并入该军，又以湘军悍将程学启、郭松林等人充当军中头目。同治元年(1862)夏，李鸿章统率淮军由安庆乘英轮来到沪上，旋奉命署江苏巡抚。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下的一个幕僚，一变成为清朝统治集团重要的一员，并在军事上取得独当一面的指挥权。

淮军抵沪后，曾国藩谆谆告诫李鸿章对待侵略者要恪守“忠信笃敬”信条。李鸿章又看到外国军队拥有新式枪炮，叹为“神技”，“日诫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②。他一面以重金聘请洋教官到各营教习；一面向侵略者购买新式武器。此外，他还“全神笼络”华尔，企图通过他向外国聘请“铁匠制炸弹，代购洋枪”③，并以他“一人之心”去“联络各国之好”④。

为了认真训练淮军，并与外国侵略者协同作战，李鸿章与何伯以及英国陆军提督士迪佛立订立会商攻打太平军协议，规定：(1)李鸿章派出淮军 6000 人与侵略军“共维大局”，其中 3000 人进驻南桥，3000 人由英国军官负责严加训练；(2)作战中夺取的军需品应归淮军所有；(3)双方军事调动必须互相通知，并互相供给军事情报。这样，李鸿章与资本主义侵略者正式建立了共同镇压太平军的军事合作。

同治二年(1863)春，李鸿章与士迪佛立订立《会同管带常胜军条约十六款》，议明：(1)全军编制 3000 人，暂以奥伦为统领，清军以副将李恒嵩会同管带；(2)常胜军及统带官由抚台(李鸿

---

① 梁启超：《李鸿章》，第 26 页。

②③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2。

④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

章)指挥;(3)军费开支由海关收入供应,军火由李鸿章购买拨给。常胜军整顿后不久,戈登取代奥伦为统领,李鸿章很快“成为戈登的好友和赞助他的人”①。

常胜军整顿后,的确帮了李鸿章的大忙。同治二年三月(1863 年 5 月),太仓陷落,太平军被“追斩殆尽”②,李鸿章赞扬戈登“坚忍镇定”。不久,昆山失守,太平军 7000 余人被俘,3 万人遭杀害,李鸿章对戈登的“奋勇”表示“殊堪嘉尚”③。十月(12 月),苏州被攻占,李鸿章率军大肆抢劫财物,并发给常胜军 7 万元,后奉旨另犒赏戈登银 1 万两,以资鼓励。次年四月,攻陷常州,常胜军宣告解散,留洋枪队 300 人、炮队 600 人并入淮军。

攻陷苏、常后,清军加紧进攻天京。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 年 7 月 19 日),攻陷天京。李鸿章又调派淮军追杀太平军余部。由于平定“粤寇”有功,清廷赐封李鸿章“一等肃毅伯”。他的淮军由原来的 6000 余人逐渐扩充到六七万人,逐步取代湘军成为清廷所倚重的一支凶恶军队。在劫掠人民财富方面,李鸿章也并不比曾国藩兄弟逊色,李家兄弟数人在绞杀太平军期间,就兼并土地约 60 万亩。

太平天国起义被扼杀后,清廷集中兵力围剿捻军。同治五年(1866)秋,李鸿章吸取了曾国藩失败的教训,认为要扑灭“倏忽无定”的捻军,必须增添马队,马步配合,左右夹击,前后堵截,才能扭转尾随追逐、劳而无功的局面。在战略上,他坚守曾国藩“画

① 《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 182 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3。

③ 金毓黻、田庆余:《太平天国史料》,第 371 页。

河圈地”的主张，实行“扼地兜剿”，驱逐捻军到“山深水复之处”[①]，重重围困，加以歼灭。与此同时，还“阴招其饥疲裹胁之众，使其内乱残杀”[②]。同治六年十二月（1868 年 1 月），赖文光被俘就义，东捻军为李鸿章所扑灭。同治七年正月（1868 年 2 月），西捻军进入直隶，“京师大震”，清廷急调李鸿章、左宗棠进行镇压。七月（8 月），西捻军进入山东境内黄河、运河和徒骇河之间的狭窄地带，被清军围困，无法突围失败。

李鸿章在镇压捻军中立下汗马功劳，于同治六年（1867）被清廷实授为湖广总督，西捻军覆灭，又赏加“太子太保衔”，成为当时一个握有军政实权的封疆大吏，也是为清廷所倚重的一个“中兴名臣”。

第二节　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

李鸿章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还开始积极推行洋务运动。所谓洋务运动，是清廷在同治年间兴起的“求强”、“求富”活动。从事这一活动的官员被称为洋务派，李鸿章就是洋务派的首领。

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接触中，李鸿章深感当时清皇朝存在的不仅是“内忧”，而且还有“外患”。他认为外国侵略者“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③]，“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他又目睹欧美各国“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

---

①② 《捻军》第 1 册，第 141—142 页。

③ 《洋务运动》第 1 册，第 41—42 页。

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1]。为了巩固清朝统治，李鸿章提出变"成法"、立"奇业"的主张，即是在不变更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略事变革，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加强内部统治，对付新的"变局"和"强敌"。

李鸿章到达上海之初，"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2]，为了学到洋人"长技"，屠杀人民，开始向外国购买洋枪炮。继购置之后，他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3]，决定自己设厂制造。

最早创办的军事工业，是同治元年到同治二年在上海、苏州设立的洋炮局，规模不大，却给淮军提供了一部分枪炮弹药。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又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前者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个军火工厂。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接办了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这时捻军和少数民族起义已相继被镇压，但他认为："北省伏莽甚多，匪徒乘机思逞，时需分头防剿，设军火无措，必致贻误大局"[4]，因而对该厂进行整顿，扩大生产。

筹建北洋海军是李鸿章"求强"事业的重要内容。同治末、光绪初，资本主义侵略者加紧窥伺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当时，加强海防，保卫边疆，刻不容缓。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分析了这一危险形势，并向清廷提出建设新式海军的建议。从光绪元年(1875)开始，李鸿章先向英国订购一批炮

---

① 《洋务运动》第1册，第41—42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④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1。

船，但他认为一支像样的新式海军，“非有铁甲船数只，认真操练，不足以控制重洋”①，于是向德国订制定远、镇远两只铁甲船和一艘钢甲船。中法战争后，李鸿章以中国海军实力单薄为理由，又向英、德等国订购船舰快艇，加强海军实力。光绪十一年(1885)，清廷设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会办。经过陆续添购船只，到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正式建立，拥有大小军舰雷艇等25艘。这期间，李鸿章还筹措巨款修建旅大、威海卫军港和旅顺船坞。

李鸿章在举办军事工业过程中，时常感到经费不足，使局务难以维持和发展；原料燃料不能自给，不得不向外国购买；缺乏新式交通工具，在运输上碰到很多困难。为此，他决定创办民用企业，以“求富”促进“求强”。

李鸿章创办的第一个“求富”企业是轮船招商局。同治十一年(1872)，他招集商股，借用官款，采用官督商办形式经营航运业，办起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民用工业。光绪三年(1877)，他举办的开平矿务局，成为中国第一个采用机器生产的大型煤矿企业。由于煤的蕴藏丰富，质量较好，产量日增，被李鸿章称为“成效确有可观”的一个企业。光绪六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电报总局。光绪八年，又奏准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十九年(1893)，该局遭火焚，李鸿章派盛宣怀设立华盛纺织总厂，并拟另设10个分厂于上海、宁波、镇江等地。李鸿章在《妥议铁路事宜折》中，向清廷提出铺设铁路有利于国计、民生、军务、漕务、通讯、交通等九大好处，并强调指出：“西洋诸国所以勃焉兴

---

① 《洋务运动》第1册，第41—42页。

起者,罔不慎操此术。"[1] 他还拟定一个修筑铁路的计划,由于当时清廷财力竭蹶和顽固派的阻挠,未能实现。到光绪七年,才修成一条由唐山到胥各庄、全长11公里的短程铁路。光绪二十年,唐山至山海关铁路建成,全长128公里。此外,光绪十四年(1888),李鸿章成立漠河矿务局,开采黑龙江漠河金矿,成绩卓著,是一个经营比较成功的新式矿业。

在"民用"企业中,采用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厂内设有总办、会办、帮办等大小官员,"一切惟总办之言是听"[2],其他商股无权过问。正如梁启超批评的:"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斫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之厉阶可也。"[3] 李鸿章自己和他的亲信唐廷枢、盛宣怀等人,依靠政治特权操纵局务,贪污中饱,一个个成为拥有巨大财富的暴发户。

李鸿章从事军火生产时,说是"为今日御侮之资"[4],他筹办海军,明确指出"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5],但是他在大谈军事对外的同时,却又宣称"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可信"[6]。他也准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
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26。
③ 梁启超:《李鸿章》,第72页。
④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
⑤ 《洋务运动》第2册,第498页。
⑥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备与来犯之敌交战，却又说不能“自我开衅”，要等到对方“万分无礼相加”时，才不得已与之一战。这种消极态度，导致了每战必败，所谓“御侮”实际上成了一句空话。至于兴办民用企业，李鸿章也标榜“杜外人觊觎之渐”，创办轮船招商局，声称“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设立开平矿务局，他说“亦可免利源之外泄”[1]；集资兴建煤铁矿，又说有“堵塞漏卮”的好处。当然，在这一方面虽然也多少起了一些作用，但在当时国家不能独立自主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真正去挽回洋商专擅之利权的。实际情况是，只能在承认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海关、航运、市场以及洋货大量涌入内地的前提下，通过微弱的竞争，与外商共分一部分利润。

李鸿章办洋务固然是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各厂局也存在种种腐败现象，但他能够面对现实，比较清晰地观察当时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积弱贫穷的落后状况，尖锐批评各种陈腐观点，慨然以举办近代新式工业为已任，提出谋求富强的方案。终于在他的倡导下，逐步建立起中国早期的军事工业、新式海军以及民用企业。就此而论，李鸿章与愚昧落后、闭目塞听的封建顽固官僚比较，显然是有所作为的。

李鸿章创办的军事工业，虽然不可能起到真正抵御侵略的作用。但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淮军和北洋舰队还是被迫应战，李鸿章控制的军火工厂，“昼夜不停”，“加倍赶制”枪炮，运赴前线。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曾经重创敌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于民用企业尽管管理落后，经营腐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但由于仿效西方先进生产方式，引进新

---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0。

的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毕竟使中国出现第一批近代企业,反映了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新式工业和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愿望。此外,在各类企业中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为了举办洋务的需要,李鸿章还设立一些新式学堂、翻译机构以及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在客观上不能不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某些有利的条件。

第三节 办理外交事务

正当李鸿章热衷于大办洋务事业时,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相继进窥我国沿边和邻邦,造成严重的边疆危机。对于凶恶贪婪的资本主义侵略者,李鸿章缺乏足够的认识,坚守"力保和局"宗旨,奉行"外须和戎"外交方针。

同治九年五月(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清廷命直隶总督曾国藩主持办案,其判处20人正法,25人充军,赔款49.7万余两。曾国藩的举措,受到舆论的谴责。八月,李鸿章奉命接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集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权势显赫、举足轻重。他在天津设立的衙门,号称"第二中央政府"。到任后,李鸿章完全支持曾国藩的原判,正式议结天津教案,先将判处正法20人中的16人处死,另4人由于天津群众的坚决要求,李鸿章不得不从轻判决。在办理天津教案中,李鸿章与曾国藩忠实执行清廷媚外政策,天津人民恨之入骨。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借口出兵大举进犯台湾,遭到高山族人民的顽强抵抗。李鸿章唯恐扩大事件,说什么"台湾系海外

偏隅"①，不值得大动干戈，主张与日本签约息事。九月二十一日(10月30日)，总理衙门与日本签订《台事专约》三条，赔款50万两，承认日本出兵侵台是"保民义举"。中日谈判期间，英国提出台湾对外通商，李鸿章竟说："与其听一国(指日本)久踞，莫若令各国(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均沾"②。意欲通过开放台湾，利用其他国家的力量，阻止日本独占，这就是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外交的首次运用。总理衙门让步订约后，日本得寸进尺，意图并吞琉球。李鸿章认为琉球是个"黑子弹丸之地"③，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光绪五年(1879)，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

在日本出兵侵犯台湾的同时，英国军官柏郎率领武装探路队由缅甸闯入云南，意在开辟入侵西南各省通道。英国驻京公使馆派翻译马嘉理前往迎接，在腾越西南蛮允地方，武装队伍悍然开枪击毙群众多名，当地人民立即将马嘉理打死，这就是所谓"马嘉理事件"。英国侵略者乘机进行讹诈，清廷派李鸿章与英国进行谈判。开始时，李鸿章认为英国武装队伍擅自入境，"不独有违条约，亦显悖万国公法"④。及后，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恫吓威胁下，李鸿章怕"和局"破裂，便改变了态度，于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六日(1876年9月13日)与威妥玛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赔款20万两；清廷派大臣赴英"谢罪"；允许英人前往云南、青海、甘肃、西藏等省"调查"、"游历"；开辟印藏交通；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外货运入内地免纳各项内地税以及扩大领事裁判权等，为英国入侵云南、西藏等

①②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2。

③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8。

④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5。

地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纷至沓来的边疆危机中,李鸿章对俄国于同治十年(1871)悍然出兵强占新疆伊犁这一严重事件,也表现得十分怯弱。俄国军队侵占伊犁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左宗棠为代表的部分官员纷纷要求进兵新疆,收回失地。然而,李鸿章却大唱反调,理由是:第一,新疆是一块旷僻无用之地,“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①。出师远征,竭尽财力,势必影响东南海防建设。第二,英、俄久思染指新疆,他们已扶植阿古柏作为傀儡,中国贸然出兵,必定祸不旋踵,“别生他变”②。第三,中国“兵将皆单,军器不精”,“实不及专顾西域”③,而且统兵主帅“左公已老”,将士率皆疲弱。在军需给养方面,由于路途遥远,无法源源运济,纵然克服了重重困难,恢复失地,“势必旋得旋失”④。据此数端,李鸿章主张对已出关或准备出关的清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⑤。

李鸿章力主放弃新疆的言论,受到朝野的强烈谴责,清廷最后采纳了左宗棠等人的意见。光绪四年(1878),左宗棠率军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全部领土。但俄国赖在伊犁不走,清廷派崇厚赴俄交涉,并于光绪五年签订《交收伊犁条约》,虽然索回了伊犁,却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以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领土给俄国,另赔款 500 万卢布,俄国还获得蒙古、新疆贸易免税以及由西北经天津到汉口进行贸易等特权。消息传来,舆论

---

①②③⑤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4。

④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7。

哗然，纷纷要求改约。清廷表示不承认这个条约，并将崇厚革职问罪。俄国立即摆出不惜诉诸武力的架势。李鸿章被吓坏了，坚主崇厚不可问罪，俄约不能推翻，劝告清廷速予批准。

在"边务迭兴"中，李鸿章忠实执行了清廷"保全和局"这个既定方针。对外交涉时，总是借口中国的军事力量大不如人，决非西方国家的对手，因此，抱定逆来顺受，忍辱息事的宗旨。退让的结果是接受无理要求，签订屈辱条约，一步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的程度。

第四节　在侵略战争面前节节退让

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他避战求和，含忍妥协，最后向法国、日本屈服投降，签订卖国条约。

同治、光绪之际，法国多次进犯越南。其时，法国金融资本发展迅速，积极对外扩张，叫嚣"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①]，显然，法国是企图以越南为基地，侵略中国。光绪八年(1882)，法军进攻越南北圻，清军出境援越。但清朝统治者害怕由此危及自身的安全，授权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在天津谈判。双方议定：清军撤出越境；以红河中间之地划界，中法两国分别保护；开放保胜为商埠。

李鸿章的退让，"招引法国以为中国将不会反抗"[②]。法国内

① 鲍维：《茹费理与法兰西帝国主义的复兴》，第169页。

②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4编，第140页。

阁总理茹费理撕毁了协议,大举进攻越南,同时,派驻日公使脱利古来华向李鸿章施加外交讹诈,李鸿章为了保存军事力量和淮系地盘,主张继续执行"永保和局"的外交方针。他认为中国"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①,声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②,开战后,"兵连祸结","一发难收"。李鸿章的宜和不宜战的论调,在中法战争期间发挥得淋漓尽致。

光绪十年(1884),法军向北越发动进攻。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通过粤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向李鸿章诱和。李鸿章函告总理衙门,务必含忍与议,同时强调指出:"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摇动,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③。清廷接受了李鸿章"兵心民心摇动"的警告,命他与福禄诺在天津举行谈判。四月十七日(5月11日),双方签订《天津简明条约》,规定:法国"保护"越南;滇桂边境通商;中国撤回军队。

条约签订后,法国又以清军未能及时撤退、双方发生冲突为借口,蓄意扩大事端。闰五月二十二日(7月14日),法舰开入福建闽江口,李鸿章"自度兵船不敌",一面拒绝清廷调拨北洋船舰增援福建;一面致函会办海防大臣张佩纶,要他勿向法船开炮。七月初三日(8月23日),法舰进攻福建海军,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在李鸿章的影响下,也"严谕各舰,不得妄动"④,致使马尾

---

① 《中法战争》第4册,第45页。
②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4。
③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5。
④ 《中法战争》第1册,第18页。

海战失败，福建海军覆没。

法国的侵略暴行，激起全国军民极大的愤慨，前线广大将士斗志昂扬。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年3月)，老将冯子材率领清军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中法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当时的局势对中国极为有利，但清廷缺乏胜利信心，李鸿章则认为镇南关大捷不过是“偏隅偶胜”，应该知足罢兵，趁胜求和。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正式订立《中法新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允许法国在我国西南开埠通商；中国兴办铁路应与法人“商办”等，使法国得以插足中国滇、桂等省，西南边疆危机日益严重。

日本从同治年间开始，多次入侵朝鲜，蓄谋大规模进攻中国。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李鸿章调拨部分淮军赴朝，日本也派兵前往。朝鲜局势稳定后，清廷向日本提出双方同时撤兵，日军拒不撤走，阴谋挑起战争。

在中日关系恶化、战争大有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李鸿章为了保住他的权位和军事力量，外交上，他玩弄“以夷制夷”伎俩，先后乞求英、俄等国出面斡旋，阻止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把希望寄托在欧美各国的“干涉”和“调停”上，结果一一落空。军事上，他一面命令驻朝清军“镇静勿妄动”，“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切记勿忘”[1]，想以“万国公例”去制止日本的军事行动；一面表示不派兵增援朝鲜，说什

[1]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6。

么:“我若添兵厚积,适启其狡逞之谋”[①],企图以中国停止派兵的行动遏制日本增兵朝鲜。李鸿章在外交上的畏葸怯弱和军事上的按兵不动,必然导致中国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

然而,这时清廷内部主战派坚主对日采取强硬态度,人民群众要求抵抗的呼声也很强烈,李鸿章不得不派兵往援牙山中国驻军。运兵轮系用重金租雇的高升号等 3 艘英国商船。六月二十三日(7 日 25 日),高升号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遭到日本海军的突然袭击。

牙山战役后,李鸿章惟恐北洋海军与日作战遭到损失,丢掉个人政治资本,因此,只是“令游弋渤海内外,做猛虎在山之势”[②],八月(9 月)中旬,日军在平壤大败清军。接着,又挑起黄海海战。这次海战,中日双方各有损失,胜负未定。李鸿章却故意夸大败绩。借口船舰陈旧,武器落后,不能与日继续作战,命令北洋舰队全部躲藏在威海卫军港,造成了中国海军坐以待毙的局面。

九月(10 月)下旬,日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金州告急,旅顺守将徐邦道力主派兵增援,李鸿章斥之为“糊涂胆小”。十月(11 月),日军攻陷大连,进犯旅顺,海军提督丁汝昌“自赴天津请以海军全力援旅顺”,李鸿章又训斥说:“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③] 于是,号称东方第一要塞的旅顺军港落入日军手里。光绪二十年十二月(1895 年 1 月),日本海军进攻威海卫。这时,北洋舰队尚有战舰炮艇等 20 余艘,重整旗鼓,仍

---

①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 15。
② 《中日战争》第 3 册,第 172 页。
③ 《中日战争》第 1 册,第 69 页。

可与日一决雌雄，但李鸿章不敢一试，终于在次年正月(1895 年 2 月)，北洋海军连同威海卫军事要地全部落入敌手。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895 年 3 月 19 日)，李鸿章作为清朝的“全权大臣”到达日本马关。翌日开始谈判，日本提出许多苛刻条件，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曾力争“请让少许”，没有结果。三月二十三日(4 月 17 日)，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赔款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这是继《南京条约》后又一个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占有辽东半岛，俄、德、法三国表示反对。在“干涉还辽”事件中，李鸿章又被迫对日让步。九月(11 月)，他与日本代表在北京签订《中日辽南条约》，订明中国“报酬”日本 3000 万两，收回辽东失地。

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紧要关头，避战自保，消极应战，屈辱妥协，忠实奉行清廷的投降路线，造成中国惨败，签订牺牲民族利益的条约。战败投降固然是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决策，但李鸿章也应负重大的罪责。

第五节　从签订《中俄密约》到出任两广总督

李鸿章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遭群议指摘。他失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权势很重的职位，留京“入阁闲居”。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清廷拟派王之春赴俄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礼，

俄国想借此机会迫使清廷派能订立条约的使臣,实现久已垂涎中国东北的侵略野心,因而指名要"李中堂"亲自出马,清廷只好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国。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李鸿章在莫斯科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主要内容有两国共同防日,一旦有事,双方派兵互相"援助",俄方军舰可以进出中国一切港湾;中国允许俄国穿过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修造铁路,并在该路运送军队粮食。不久,根据密约,清廷又与俄国签订一个《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这样,俄国在攫取中东铁路修筑权的同时,还掠夺了铁路沿线的采矿、伐木、行政、派驻警察、驻军及减免税厘的特权。俄国在"共同防日"幌子下面,将侵略魔爪伸入我国东北地区。八月二十七日(10月3日),李鸿章返回天津,大肆宣扬中俄关系已是"如胶似漆"[1],"中国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2]。

办完"联俄"外交后,李鸿章奉命在总理衙门行走。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德国出动军舰,强占胶州湾。第二年春,李鸿章会同翁同龢与德国驻华公使订立《胶澳租界条约》,德国以"租借"名义强占胶州湾,并取得在山东境内开矿筑路等权利。不久,俄国海陆军纷纷出动,摆出剑拔弩张的架势,要求清廷将旅大"租借"与俄国。三月初六日(3月27日),李鸿章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下,会同张荫桓与俄国驻华代办巴甫洛夫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俄国不仅"租借"旅大,而且取得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直达旅大以及铁路沿线权益不得让与他国等权利,其势力从东北北部伸展

① 《中东战纪本末》卷2,第4页。

②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第54页。

到南部，整个东北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民族危机严重。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救亡图存”口号，要求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场新与旧的斗争中，李鸿章采取了先是反对、继而暗中回护的态度。

长期以来，李鸿章坚认现行的封建专制统治是“唯一可行的制度”①，并紧紧依靠慈禧太后，受其驱使。因此，当康有为等人抨击他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和拒绝他加入强学会时，忿恨不已，与维新派之间一度形同水火。他向慈禧太后进谗说：“此曹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② 光绪二十四年初，总理衙门邀请康有为征询改革大端，李鸿章也出席问话，他竭力反对改革法律官制。

然而，到百日维新前后，李鸿章的态度却起了变化，原因有三。其一，在“变法”的途径和方法问题上，洋务派同维新派是有根本区别的，但在要求“改革”这一点上，却是相互一致的，这就成为李鸿章一度支持维新派的思想基础。其二，在顽固势力的阻挠下，维新派的“变法”要求不得不略作修改，提出“君权变法”，“乾纲独断”以及“开制度局于宫中”等“温和”主张。这些倒退的政见，意味着他们与洋务派的距离缩短了，李鸿章与维新派之间的隔阂也就随之逐渐消除了。其三，签订《中俄密约》后，李鸿章在总理衙门仅仅做个“伴食之宰相”③。为了改变这个处境，在戊戌变法后期，他一面继续依附慈禧太后，一面又或明或暗地给维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63页。

② 《戊戌变法》第1册，第467页。

③ 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新派一定的支持，希冀事成之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并借助维新派力量，实现其洋务抱负。

基于上述原因，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诏令，李鸿章并不反对，或保持缄默，或表示赞同。关于加强军事建设、发展农工商业，以及废除八股、兴办学校等项改革措施，在不同程度上李鸿章均抱支持态度。尤其对于设立京师大学堂，他更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①，甚至还推荐康有为出任总教习，难怪后来康有为向别人说：李鸿章“助吾革政”②。戊戌政变发生后，李鸿章一面不敢违抗慈禧太后捕杀维新派的通缉令；一面派人慰问康有为等人。康有为出走时，他“遣人慰行”③；梁启超逃亡日本，他托人转言相慰。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南下就任两广总督。到任后，李鸿章采取严厉镇压“盗匪”、会党起义的措施，“募巡警”，“办团练”，“昼夜梭巡，随时警察”，在街道“遇有身带火器刀械，立即擒捕”④。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后，李鸿章电奏清廷，要求迅速剿办团民，保护使馆，以免中外失和。五月十九日(6月16日)，清廷谕令李鸿章到京主持大计，他借口“粤人呼吁攀留”，暂难北上。实际上他是要等待帝国主义军队开抵北京城下，经过“一二恶战”⑤，清廷改变态度时，再决定自己的行动。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颁布了“宣战”上谕，命令各省督抚集义民成团，“借御外侮”。但李鸿章拒不执行，宣称“廿

① 姚崧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第31页。

②③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30页。

④ 《义和团》第3册，第335页。

⑤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3。

五(阳历21日)矫诏,粤断不奉"[1],并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共同宣称:长江一带只有"会匪盐枭","并无拳会之党可招"[2]。可见,李鸿章是东南督抚违抗"宣战"命令的首倡者。他还积极参与了刘坤一、张之洞发起的"东南互保",以破坏义和团在南方的发展。

李鸿章在广东如此卖力保护洋人,英国就提出广东"需要这位总督坐镇"[3],并认为他是建立"华南独立政权"的理想人物,因而千方百计不让他北上,要他与孙中山"合作",在粤"宣告独立"。李鸿章则认为此事必以"清帝后存亡为断"[4],在联军未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尚未"遇难"之前,不能贸然从事。因此,他一面坐观局势的发展,一面假意邀请孙中山前来与他"合作",阴谋一举搞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这时,孙中山已应邀来港,抵岸后,得到革命党人密告,获"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阱诱捕"[5] 之意,急乘原船转赴越南。

第六节　最后的对外屈服妥协

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后,李鸿章在两广总督任上,一面压制和破坏群众反帝爱国斗争,一面观望形势,等待时机北上,扑灭义和团斗争烈火,同帝国主义妥协议和。

---

①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2。
② 《义和团》第3册,第333页。
③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46页。
④ 转引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87页。
⑤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8页。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初,慈禧太后授命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催他迅速兼程北上。李鸿章仍是踌躇不动。六月十九日天津陷落,李鸿章在清廷的催促下,于二十二日首程赴沪。但到上海后,借口“感冒腹泻”,寸步难行,盘桓申江,继续观望。七月十三日(8月7日),清廷授予李鸿章“议和全权大臣”,他还是没有立即动身赴京。二十日,帝国主义军队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狼狈西逃。三十日,清廷授给李鸿章“便宜行事”、“不为遥制”的更大权力。八月十四日(9月7日),清廷又发布“剿匪”。于是,“养疴”沪上的李鸿章欣然出发赴京。

八月二十三日(9月16日),李鸿章离开上海,二十五日抵达塘沽,俄国军队将他护送到天津。下车伊始,他便命令直隶官员认真剿灭“拳匪”。半个月后,李鸿章在俄军的保护下来到北京,连日“拜会”各国公使,急谋议款订约。但帝国主义在拟订议和条件问题上分歧较大,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还准备扩大军事侵略,因此,各国驻京公使“不甚与全权见面,亦不与议公事”[1]。

为了迫使清廷接受苛刻条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四出攻掠,扩大侵略范围。李鸿章唯恐清军进行还击,影响和议进行,有负清廷对他的重托和期望,因此,他命令各地驻军“在一切场合只要碰到外国军队就撤退”[2]。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将中国兵队之防线形势,制成报告给瓦德西”[3],使侵略军对清军的布置了如指掌。

帝国主义的军事压力吓坏了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她授意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4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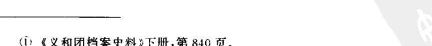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39页。

③ 《义和团》第1册,第114页。

荣禄电告李鸿章"早安大局"。在慈禧太后催促下，李鸿章加紧进行议和活动。十一月初三日（12 月 24 日），北京公使团提出议和大纲后，李鸿章立即电奏西安，要慈禧太后"迅速乾断，电示遵行"[1]。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01 年 1 月 15 日），李鸿章与奕劻奉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

议和大纲签订后，接着与帝国主义议订条款细目。李鸿章害怕"和局中败"，因此处处让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 年 9 月 7 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与 11 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有：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各国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拆除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沿线全部炮台，准许各国军队驻扎在京榆铁路沿线的山海关等十二个战略重地；清廷要严防和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帝行动。从此，帝国主义又在中国人民身上套上一付沉重的锁链，清廷堕落成为列强的驯服工具，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九月二十七日（11 月 7 日），李鸿章病死于北京，清廷赐谥"文忠"。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 840 页。

第十二章　左　宗　棠

第一节　究心经世之学

左宗棠，字季高，一字朴存，早年自号湘上农人。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1812年11月10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左家塅一个下层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

从4岁开始，左宗棠就随祖父和父亲学习儒家经传。19岁时，才正式到城南书院读书，受教于名儒贺熙龄。贺熙龄主张经世致用，左宗棠受他的影响很大，一直以宗师事之。贺熙龄的哥哥贺长龄，是著名的《皇朝经世文编》的主编，时为江苏布政使，在回乡时见到左宗棠，对这个年轻人很为器重。贺的藏书很多，左宗棠每次借书，他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①]，还经常同他讨论问题。通过贺氏兄弟，左宗棠逐渐密切了与封建统治阶级中士大夫集团的关系，思想逐步向经世致用发展。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20岁时，参加了本省的乡试，与他哥哥同榜中举。这是左宗棠在科举道路上获得的唯一一次功名。同年，他与湘潭一位富室千金周诒端结婚。由于家境清寒，

---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7，第30页。

此后就以招赘女婿的身份一直住在周家。

当时的左宗棠，年轻气盛，自负不凡，极想由此一举登上仕途，曾三次赴京会试，但连遭失败。科举的失意使他愤懑不平，“遂绝意进取”，“弃词章为有用之学”[1]，精力完全集中到经世致用方面来。由于外患日深，不少士大夫特别注意边疆史地的研究，左宗棠也深受影响。他17岁时，即从书肆中购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以及《齐氏水道提纲》等书，“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2]。科举失意的几年中，他悉心钻研地学，尤其是西北、西域的史地著作，加深了对社稷安危的关切和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形成了比较远大的政治眼光。

道光十七年(1837)，左宗棠担任了醴陵渌江学院的主讲。这年，两江总督陶澍“乞省墓道”，回湖南安化，路过醴陵。左宗棠应醴陵知县之请，为陶澍的公馆作了楹联。联中巧妙地嵌入道光帝钦赐“印心石屋”予陶澍之事，大得陶澍的赏识，特地邀见左宗棠，“倾谈竟夜，与订交而别”[3]。此后来往不断。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病殁，与陶澍有深交的贺熙龄要左宗棠担负起教育陶子(陶桄)的责任，于是左宗棠于次年来到安化小淹陶澍家教学。

在小淹八年之久的教馆生涯，对左宗棠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陶澍家中所藏书籍，特别是“本朝宪章”十分丰富。左宗

---

① 贺熙龄：《寒香馆诗钞·舟中怀左季高》，《左文襄公全集·年谱》卷1，第16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年谱》卷1，第14页。

③ 同上书，第10页。

棠"课读之暇,博观纵览"①,阅读了大量有关水利、田赋、盐政的书籍,探求如何上慰宸衷、下安百姓、振刷纲纪、济世匡时的途径,以挽救正在衰落的封建皇朝。同时,又从陶澍的往来书信中开始知道了林则徐,并产生了仰慕之情。林、陶都是当时的重要人物,他们关心民情,刚直不阿,主张改革弊政和抵制外来侵略。这些,对左宗棠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第二节　御"外患"与除"内忧"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军犯浙江,陷定海,进逼天津、海口。消息传到湖南,激起了左宗棠的爱国热情。于是他研究了反侵略的"战守机宜",写出了《料敌》、《定策》、《海屯》、《器械》、《善后》诸篇,并在给贺熙龄的几封长信中,详细讨论了这些问题。其中不少主张与林则徐在广东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策略不谋而合。他还尖锐地指出:"方今时事之坏,无过上下相蒙,贤奸失别",必须对琦善这样"以奸谋误国,贻祸边疆"的罪魁祸首"驰使封剑,斩首军前","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胆"②。对于被无辜问罪、发配新疆的林则徐,他则寄予满腔的同情,心"如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心神依倚,惘惘相随"③,表现了对这位民族英雄的高度敬仰。

但是,左宗棠在主张抵御"外患"的同时,又深为农民起义的"隐忧"而焦虑。特别是《南京条约》签订后,由于清廷的屈辱求

---

① 《左文襄公全集·年谱》卷1。

② 《致贺蔗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③ 《复胡润之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和，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而国内的阶级矛盾又因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而尖锐化。面对岌岌可危的局面，他常与好友胡林翼(陶澍之婿)在小淹“彻夜长谈”，深为“国威屡挫之余，乱民益无所忌”而“百忧攒集”①。地主阶级的立场、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以及自负不凡的性格，都使他“梦卜夐求”干一番为“圣君”清除“内忧”的大事业。这正是他不久后与曾国藩、胡林翼等“中兴名臣”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共同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林则徐引疾还闽，经过长沙时，特遣人召左宗棠一见。左宗棠“谒之长沙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及”②。林则徐很赏识左宗棠，称他为“不凡之才”③。

咸丰二年(1852)，左宗棠接受湖南巡抚张亮基的礼聘，入张幕充当谋士。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左宗棠在省城内为张亮基调兵遣将进行顽抗，还献“河西合围之策”，企图一举包围、歼灭太平军。在太平军久攻长沙不下，毅然撤围北上后，左宗棠又协助张亮基训练兵丁、整饬吏治，并对响应太平军的广大群众进行报复。他以“首先决策”镇压浏阳秘密会党“征义堂”有功，升任直隶州同知。

不久，张亮基调任湖广总督，左宗棠随往湖北，与江忠源等一起，抗拒太平军的西征。后张亮基又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不愿随往，而在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中，一连干了6年。

从咸丰四年(1854)至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的主要活动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② 《与贺仲肃》，《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③ 胡林翼：《启程晴峰制军》，《胡文忠公遗集》卷54。

是为清皇朝坚守湖南。当时的湖南，是曾国藩湘军的发源地，是支持东南五省反动力量的重要基地。在湘军已经倾巢出省镇压太平军，而湖南又受到来自邻边各省和本省农民起义军不断冲击的形势下，左宗棠既要为出省的湘军筹办粮饷、船炮、军械，又要设法抵挡纷至沓来的打击，确是不遗余力，费尽心机。

左宗棠在湖南所显示的才干，为统治阶级所赏识。潘祖荫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连最高统治者咸丰帝也特意"垂询及之"。左宗棠对咸丰帝的"特达之知"，刻骨铭心，感激涕零。

咸丰六年(1856)，左宗棠以接济曾国藩军饷攻占武昌有功，"诏以兵部郎中用"，"赏戴花翎"，不久，又加四品卿衔[①]。正当他得到咸丰帝的青睐，飞腾有望之时，却突然被湖广总督官文奏劾，几遭不测。虽由于胡林翼、曾国藩、潘祖荫等人的力争才免于一死，但不得不退出骆幕。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使左宗棠初次尝到"世网之险"。他知道，即"匿影深山"，也不一定能躲过对方再下毒手，因此转而投靠为他脱险出过力的曾国藩。

第三节　参与镇压太平天国

咸丰十年(1860)六月，左宗棠奉诏命以四品京堂从曾国藩治军。他招募了 5000 人，组成了"楚军"，这就是左系湘军的起点。

左宗棠这次因祸而投靠曾国藩，是他经历中的一个转折。过

① 《清史稿》卷 412《左宗棠》、《清史列传》卷 51《左宗棠传》。

去8年，他虽然倍受重用，名声不小，然而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高级师爷而已；而这一来，却真正成了一员拥兵带队、手握实权的将领。以后，正是凭着这一资本，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以至与曾国藩等并驾齐驱，成为同治年间的“中兴名臣”。

“楚军”组成后，在长沙金盆岭练军。年底，由江北战场西进的李秀成大军，包围了曾国藩指挥机关所在地——安徽祁门。曾国藩惊恐万状，四处呼救。于是左宗棠不得不率领刚刚练成的楚军出湘，进入江西，在皖、赣交界的德兴、婺源一带与太平军交锋。这一地区是曾国藩大营的粮道，已被太平军拦腰切断。左宗棠的任务就是要打通这一粮道，“严防大营后路”，以解曾国藩之围。他知道，初次出阵的成败，关系今后的命运，因此势在必争。而太平军方面，由于李秀成对救援安庆并不积极，与湘军稍一接触后，就绕过祁门，过浙江，入江西招兵去了。因而左宗棠得以比较顺利地占领了德兴、婺源，接着又在东平、鄱阳击败了准备深入江西腹地的侍王李世贤部，从而打通了曾国藩大营的后路。清廷为对左宗棠表示嘉奖，命其帮办江南军务，并授太常寺卿。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底，从湖北回师的李秀成与李世贤会合，一举攻克浙江省会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清廷大震。这时，曾国藩虽受命节制浙江军事，但他占领安庆之后，正集中力量进犯天京，无暇顾及，故一再推荐左宗棠去收拾残局。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同治元年(1862)春，左宗棠率军自江西入浙。这时，清廷多次令他率兵进驻清军在浙西的唯一据点衢州城，并迅速拿下金华、杭州。但左宗棠是十分谨慎的，他知道在当时的形势下，要马上进攻金华、杭州，固然是“痴人说梦”，就是进入衢州城，也十分

危险。因为太平军“每遇坚城,必取远势包围,待其自困而后陷之”,必须“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固之计”[①]。于是他决定采取“置于四旁,渐进中央”的策略,先不入衢城,而是分兵拔除赣、皖边境的太平军据点,扫清后路,步步为营,逐渐往前推进;然后避开坚城,从侧路进攻杭州。在英勇善战的太平军面前,他的如意算盘实现得并不顺利。直到同治二年(1863)初,左军虽然竭尽全力,但仍然停滞在龙游、汤溪、兰溪一带,进展缓慢。但后来太平军整个战局逐渐恶化,外国侵略者公开与清军联合,并在浙东开辟了第二战场,攻占了宁波,因而浙西战场的太平军内部发生动摇,出现了火并、叛变。而这一切,都被左宗棠乘机利用,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攻占了处州、严州和龙、汤、兰三城,并进一步占领了金华,军锋直逼杭州。接着,这时已是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派蒋益澧率军进攻“为杭州锁钥”的重镇富阳。坚守此城的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在富阳、新城之间大破蒋军。左宗棠急于事功,在久攻不克的情况下,竟不惜“兼募外国军助之攻”[②]。同治二年八月,左宗棠军与法人德克碑率领的 1500 人“常捷军”勾结在一起,向富阳再度发起攻势。德克碑以重炮轰城,终于夺取了富阳。

攻占富阳后,左宗棠兵分两路:一路由蒋益澧等率领,直驱杭州;一路由魏喻义、康国器率领,进犯余杭。在左军的围困下,杭州城内弹尽粮绝。同治三年(1864)二月,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突围出走,比王钱桂仁投降,杭州陷落。余杭汪海洋弃城北走,也为左军所占。六月,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攻陷了天京。轰轰烈烈的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1。

② 《清史稿》卷 412《左宗棠》。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终于被血腥地镇压下去。清廷论功行赏，左宗棠被封为一等恪靖伯。

但是太平天国的战斗并未结束。在天京失陷后突围的各支部队分别转战江西、福建、广东各地，继续坚持斗争。清廷授权左宗棠节制福建、江西、广东三省的清军，策划最后消灭太平军的余部。同治四年底(1866 年 1 月)，在左宗棠的统一部署下，闽、浙、赣、粤的清军合围汪海洋的最后据点——广东的嘉应州。汪海洋、谭体元壮烈牺牲，长江以南太平军的英勇斗争至此方才结束。同治五年(1866)元月，左宗棠从广东"凯旋"而归，回到福州。在镇压太平天国的罪恶活动中，他与曾国藩、李鸿章一样，用大量起义者的鲜血染红了顶子，换来了"中兴名臣"的桂冠。

第四节　创办福州船政局

在闽浙总督任上，左宗棠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计划。这一举动，使他成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当左宗棠军攻占杭州后，他即派人仿造轮船，但是没有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后，他开始筹办福州船政局。法国洋枪队将领德克碑和税务司日意格表示愿"代为监造"。由于在浙江战场上形成的特殊关系，也鉴于上次华人自制失败，左宗棠决定接受他们的建议。同治五年五月，双方达成协议，并奏报清廷批准。日意格到福州同左宗棠"详商一切事宜"，同赴罗星塔，选择了马尾山下一处地方作为厂址。在初步规划就绪后，左宗棠任命日意格为福州船政局正监督、德克碑为副监督，"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

员承办"[①]。船厂的生产指标是:在五年中,应照"外洋兵船样式",制成 150 匹马力的大轮船 11 艘和 80 匹马力的小轮船 5 艘。

正当左宗棠兴致勃勃地大搞造船的"五年计划"时,清廷却调他任陕甘总督,以镇压西北的回民起义。左宗棠不得不匆匆去西北赴任。但他"身虽西行,心犹东注"[②],仍然恋恋不忘于船政局。他推荐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并派他的亲信胡光墉直接督察筹划。因此,在左宗棠离开后,船政局的建设仍在他的"遥控"下继续进行。至同治十三年(1874),船政局共建有工厂 16 座、船台 3 座、船槽 1 座,并附设艺局等,成为洋务派兴办的最大的船舶制造厂。

福州船政局与其他洋务派军事工业一样,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腐朽性和对外国的依赖性。但比较起来,船政局还有自己的几个特点:

第一,从造船的目的和作用看,它比较突出"御侮",也就是针对外国侵略的一面。筹建之始,左宗棠就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明确指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③] 自造轮船,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此后,他又反复重申:英、法、俄、德等国"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因此,"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④]。

---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20,第 64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8,第 59 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18,第 1 页。
④ 《艺学说帖》,《左文襄公全集·说帖》。

第二，在造船方针上，左宗棠强调自造，反对“造船不如买船”的谬论。他认为，中国自己造船，是“欲得其造船之法，为中国永远之利，并可兴别项之利”，“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一时可比”①。还进一步提出附设艺局，聘请西洋技师，派中国工匠、学员学习西洋语言文字、标法画法等，为中国培养造船、驾驶人才。同治十二年十二月(1874 年 2 月)，船政局与法人合同期满，日意格、德克碑均退职回国，其他洋匠也逐渐减少。从此，技术设计改由中国技术人员担任。因而福州船政局对外的依赖性较少。

第三，从成绩看，福州船政局前后共成船 34 艘，其中为南洋海军建造的 3 艘 2400 匹马力、排水量 2400 吨的巡海快船，是当时中国自己修造的最大军舰。因此，从客观上说，福州船政局的设立毕竟为中国建立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打下了基础。

第五节　用兵陕甘

同治五年十月，左宗棠离开福建，赴陕甘总督任。他的西征部队，一部分是自己带去和调去的楚军、湘军，又在陕甘等地招募了一部分兵勇，总共在 4000 人左右。加上原在陕甘和陆续增调的其他清军，共达 12 万人左右。

左宗棠在西北面临着两支相互联系着的起义军——西捻军和回民起义军。他镇压的战略是：“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② 这是因为西捻军的

---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8、第 49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21、第 20 页。

战斗力更强,活动范围更广,对清皇朝的威胁也比回民起义军更大。左宗棠的镇压,就是根据这个"先捻后回"的步骤进行的。

同治六年(1867)二月,左宗棠军从汉口出发,分三道入陕。六月,左宗堂到达潼关,正式督办陕西军务。他一面派兵沿渭水扎营,一面兵分两支,渡过渭水,进攻西捻军。但灵活的西捻军转而西进泾阳、咸阳,渡过泾水,集中主力于蒲城一带,有意识地让出泾水西岸地区。左宗棠连忙亲自赶到泾西,策划包围西捻军,企图消灭他们于泾水、洛水之间。不料西捻军突然以马队猛攻渭北地区的清兵,突破包围圈,粉碎了左宗棠的围歼计划。他们进入陕北后,连克安塞、延川等城。与西捻军相呼应的陕西回民军也乘势攻占了重镇绥德,并邀西捻军共同防守此城。由于连失延川、绥德等地,清廷震怒,左宗棠上书请罪。左宗棠不得不承认捻军"飙忽驰骋,避实就虚","遇官军坚不可撼,则望风远行,瞬息数十里;俟官军追及,则又盘旋回折"①。

西捻军进驻绥德后,考虑到陕北山地较多,不适宜于马队驰驱,同时又接到东捻军在运河地区失利的告急信,于是在同治六年十一月,利用黄河冰冻已合的机会,一举突破了左宗棠所布置的河防,浩浩荡荡渡过黄河,一直打到保定,使清廷大惊,"切责督兵大臣,自宗棠、鸿章及河南巡抚李鹤年、直隶总督官文,皆夺职"②。左宗棠闯了这个大祸,"忧愤欲死",连忙派了刘松山、郭宝昌两军日夜穷追,自己也随后亲自追赶,狼

---

① 《谨拟分别剿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5。

② 《清史稿》卷412《左宗棠》。

狈不堪。

但是，捻军进行游击战争而不建立作为战略基地的根据地，总是难以持久的。李鸿章、左宗棠都看出了捻军这个弱点，力求改变紧跟追击的笨办法而采用“画河圈地”、逐步缩小包围圈的策略。当西捻军深入京畿后，即遭到清军的重重包围，几经转战，逐渐被清军封锁在冀、鲁边界沿海狭小地区内，终于在同治七年(1868)六月，全军覆没于徒骇河边。

左宗棠在镇压西捻军中立了功，得以第一次“入觐天颜”，受到慈禧太后的“天语褒奖”。

同治七年十月，左宗棠回到西安，集中力量镇压回民起义。这期间，由于西捻军的转移，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声势已开始衰落。陕西的回民起义军被压入甘肃境内，以宁州的董志原为主要据点。甘肃回民起义军，以马化龙为首，表面上接受了宁夏将军穆图善的“安抚”，实际上仍暗中积蓄力量，继续进行斗争。左宗棠首先用“剿抚兼施”的手段镇压了陕西境内各股零星的起义队伍，收降了董福祥部，然后进入甘肃境内。

同治八年(1869)初，左宗棠军攻占了董志原。以此为据点的陕西回民起义军被迫向金积堡方向转移。五月，左宗棠到达泾州，部署了三路进军：南路从宝鸡和清水出发，作进攻凉州的准备；中路从泾州出发，进袭平凉和固原；北路从陕西西北出发，进袭定边和花马池，而真正的目标是陕甘回民起义军的中心——以马化龙为首的金积堡。

但左宗棠军对金积堡的进攻，遭到了起义军的坚决抵抗，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年半之久。其间，左宗棠的爱将刘松山被打死，死亡极为惨重。左宗棠悲叹：“一年之间，连丧大将，人心震

骇，谣诼繁兴”，“十余年剿发平捻，所部伤亡之多，无逾此役者”①。同时，清廷也一再严诘：金积堡“一隅之地”，“何以日久未见成功，糜饷老师，该大臣难辞其咎”②。左宗棠受到严责，不得不一面哀求清廷“稍宽时日”，一面更加紧了对金积堡的围攻。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金积堡“粮已净尽”，马化龙“自诣军门，哭泣请罪”。接替刘松山的刘锦棠(刘松山之侄)，接受了马的投诚，令马化龙招各地回军来金积堡就抚。当目的达到后，即将马化龙及其一家全部诛杀。

此后，左宗棠军又镇压、收抚了河州、西宁的回民起义军，并于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攻占了陕甘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肃州城。

由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获得“全功”，清廷对左宗棠大加褒奖，赏加协办大学士。次年，又晋为东阁大学士。但经他镇压后的西北，却是“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③。这种惨状，固然是历届地方官员和清军共同造成的，但作为灾难制造者之一，左宗棠也是难辞其咎的。

第六节 收复新疆

同治、光绪之际，中国的边疆危机接踵而至。其中尤以新疆的情况最为突出。

同治四年(1865)初，中亚的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与民族败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34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58页。

③ 《回民起义》第3册，第243页。

类金相印、思的克相勾结，入侵中国新疆南部地区，先后侵占了喀什噶尔、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库车和喀喇沙尔（今焉耆）等城。同治六年（1867），建立了反动政权，阿古柏自称"毕调勒特汗"（意即"幸运之主"）。同治九年（1870），阿古柏进占乌鲁木齐。阿古柏政权不仅残酷地压榨和奴役新疆各族人民，而且勾结英国和俄国，妄图利用他们作靠山，分裂中国领土，成为在英、俄庇护下的一个独立王国。

野心勃勃的俄国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与英国争夺对阿古柏的控制，一方面策划侵占伊犁。同治十年（1871），当阿古柏兼并了乌鲁木齐不久，俄国就打着代中国"收复"的幌子，武装占领了伊犁，还扬言要"代收"乌鲁木齐。新疆面临着被外国侵略者瓜分的严重危险，收复失地，捍卫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

当新疆危机日趋严重之时，左宗棠已年逾花甲，打算"乞病还乡"，但是，祖国西北边陲发生的事变，点燃了他心中的爱国之火，他坚定地表示："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①

同治十三年（1874），正当新疆的局势危急之时，东南沿海的防务也由于日本侵略台湾而告紧张。受英国影响的李鸿章借全国注视东南之机，提出了放弃新疆，移西征之饷作为东南海防之用的谬论。说新疆这个贫瘠之区"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广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他认为，"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48页。

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①。这就意味着，玉门关以外的中国领土都可以拱手送给别人。李鸿章的谬论，得到相当多的支持者。但也有一些“塞防论”者起而反对。于是，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就此掀起。

在争论中，清廷的态度摇摆不定，于是“密询”在西北边防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左宗棠。左宗棠慷慨陈词，坚决反对放弃新疆。他针对清廷的心理状态，高度赞扬了乾隆帝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和坚定态度，指出“当时盈廷诸臣，颇以开边未已，耗敹滋多为疑，而圣意闳深，不为所动”。同时，他特别从饷需的角度驳斥了李鸿章的谬论，指出“若此时而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②，把收复新疆提到保障全国安全的高度。左宗棠的结论是：“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可偏废。左宗棠的精辟议论，把“海防”、“塞防”之争推向了高潮。从本质上看，这场大辩论是关系到要不要收复新疆，要不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问题。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海防并重论”，是符合中国人民长远利益的。

左宗棠发表意见后，清廷不仅坚定了不放弃新疆的决心，而且也意识到：在全国大吏中，既有力量和信心，又有胆识和魄力，足以担负起这一重大任务者，左宗棠一人而已。光绪元年(1875)三月，诏命左宗棠为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得到指挥进军的全权，开始了收复新疆的大业。

---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9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6页。

光绪二年(1876)三月,左宗棠从兰州进驻肃州(酒泉),以此为西征大本营,并督饬刘锦棠率精锐20余营西进出关。五月,刘部抵达济木萨。此时,连同从同治十三年(1874)起陆续出关的金顺、张曜部和整编的新疆原有驻军,全部近100营,约五六万人。

关于具体的作战部署,左宗棠的方针是:先北路而后南路。首先拿下乌鲁木齐,克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北路,然后挥师南下,直捣阿古柏的老巢,收复整个南疆。全部收复新疆的战斗,正是在这一正确部署下一步步进行的。

六月,刘锦棠与先期西进的金顺部同时进驻距古牧地(米泉)最近的阜康城,建立了自己的前哨阵地。在很短的时间里,接连收复了乌鲁木齐及昌吉、呼图壁诸城。不久,又攻克了"城小而坚"的玛纳斯。于是,整个北疆,除伊犁之外,均为清军收复。第一战役胜利结束,对南疆的进军已是箭在弦上。

就在这时,英国以"调停"为名,妄图阻止左宗棠大军收复南疆的正义行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李鸿章表示,英国愿出面"调停"中国与阿古柏的关系,阿古柏"作为属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①]。随后,英国又向总理衙门正式提出这一荒谬主张。左宗棠得知这个情况后,极为愤慨地说:"帕夏(即阿古柏)窃据南八城及吐鲁番",为"中外共知",而威妥玛却故意"称为喀王","若不知吐鲁番、南八城为我疆土,帕夏为我贼也",其卑劣的目的不过是"图保其印度腴疆"而已[②]。针对李鸿章"专一示弱"的做法,他义正词严地向总理衙门表示:阿古柏"为我必讨之贼",

①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6,第28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7,第31页。

“战阵之事，权在主兵之人”，非他人所参与，亦“无须英人代为过虑也”。左宗棠的坚定态度，挫败了英国的“调停”阴谋，从而为第二战役铺平了道路。

收复新疆的第二战役是整个进军中的关键战役。阿古柏利用天山关隘重点设防于达坂城，并由他的儿子和亲信防守吐鲁番和托克逊。三者互为犄角，是阿古柏顽抗的希望所在。

光绪三年(1877)三月，在避开了冰雪封山的冬季之后，根据左宗棠“分道并规”的部署，刘锦棠部从乌鲁木齐往南，翻过天山向达坂城和托克逊挺进；张曜从哈密往西，先屯盐池；徐占彪从巴里坤往西在盐池与张曜会合后，再往西向七克腾木和辟展(鄯善)前进。三军最后会师吐鲁番。初三日(4月16日)，刘锦棠军向达坂城发起进攻，初七日，“歼尽守城之寇，杀尽外援之寇”，一举攻克了达坂。初九日，徐占彪军与张曜部前锋会师，攻占了辟展。接着进攻吐鲁番。十三日，刘锦棠的援军也已赶到，于是在一天之内连克吐鲁番满汉二城。这一天，刘锦棠部还收复了重镇托克逊。

关键性的第二战役，不到半个月即胜利结束。三城全克，歼灭阿古柏主力1万余人，打开了通向南八城的门户，为直捣阿古柏的老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西征军摧枯拉朽的打击下，阿古柏走投无路，服毒自杀。阿古柏之死，又引起了反动集团更严重的内讧。阿古柏的小儿子海古拉与大儿子伯克胡里火并，被伯克胡里打死。许多人见大势已去，纷纷作鸟兽散。在这种形势下继续进兵，彻底摧毁阿古柏集团，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了。但这时狡猾的英国再度登场。它通过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要求中国允许阿古柏反动政权保留喀什噶

尔数城，“使可立国”。不久，英国代办傅磊斯又向总理衙门转告三项无理要求：“（一）阿古柏承认中国为上国，命使臣入贡；（二）中国与喀什噶尔将地界划清；（三）两边议合后，永远和好。”① 显然，直到这时，英国仍想通过“议和”、“划界”的阴谋，分裂中国领土，保存阿古柏集团的政权。李鸿章也再次出来为英国帮腔。他讽刺说：“左帅新复吐鲁番、托克逊等城，自谓南路折箠可下，朝廷日盼捷书，催协饷如星火，更无以雅可刊（阿古柏）投诚之说进者。然将来势必旋得旋失，功不覆过。”② 左宗棠面对这些压力，仍然寸步不让。他反驳说：收复吐鲁番等地后，“逆夷震慑异常”，“此时机有可乘，乃为画地缩守之策，何以固边圉而示强邻？异时追咎贻误之人，老臣不能任也”③。对于英国的阴谋，他严正指出：英人要别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为索我腴地以示恩？”他告诉刘锦棠，如遇英国遣说客去啰嗦，则以“我奉令致讨侵占吾宇之贼，以复我旧土为词，别事不敢干预。如欲议别事，请赴肃州大营！”④ 他的凛然正气，既打击了英国，又回击了李鸿章，从而又一次粉碎了英国的阴谋。

光绪三年八月，收复新疆的第三战役开始了。这一战役的目标是全部收复南疆，彻底消灭阿古柏集团。刘锦棠率西征军各部从吐鲁番、托克逊出发，兵分两路，在不到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长驱近 2000 里，全部收复了南疆的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及附近各城镇。接着，又以破竹之势于十二月攻克了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 11，第 32 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7，第 13 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8，第 48 页。
④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 1982 年版，第 333 页。

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莎尔、和田西四城，并穷追狼狈逃窜的伯克胡里等人。但俄国却居心叵测地把这些残渣余孽收留下来，拒不交出。这时，新疆已是冰雪世界，左宗棠西征大军不顾断指裂肤之痛，勇往直前，为祖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新疆除了伊犁地区以外，又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清廷晋封左宗棠二等侯爵，以为奖励。

左宗棠督军讨伐阿古柏，反映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热烈的拥护和支持。在整个进军新疆的过程中，各地各族人民，或为向导，或随同攻伐，积极支持清军。正是这个最重要的因素，为左宗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使他能够凭借这个舞台，导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同时，也应该肯定，在整个收复新疆的斗争中，左宗棠的个人作用也是突出的。他不仅在政治上有力地粉碎了英、俄两国的政治阴谋，在政策上采取了有利于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对敌的方针，在物质供应上解决了"兵、饷、粮、运"四大困难；而且在军事指导上，也十分出色。除了制订"先北后南"的正确的战略部署外，他还巧妙地运用了"缓进速战"的原则。在用兵新疆的 3 年中，真正作战的时间不过 4 个来月，其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物质准备，选择战机，对敌人的动态进行周密的研究和计算。他的用兵，的确达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地。

当左宗棠的军队收复南疆各地，消灭了阿古柏集团后，进一步从俄国手中收复伊犁的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俄国虽然失掉了可以霸占伊犁的借口，但仍然千方百计地拖延。光绪四年(1878)，清廷不得不派专使崇厚到俄国谈判。昏庸无能的崇厚堕入了俄国精心设计的圈套，未经请示清廷，就擅自签订了出卖大

量权益而仅仅收回一座空城的《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怒，要求杀崇厚"以伸公愤"。左宗棠也接连上书，痛陈此约的危害，指出：俄国虽名曰归还，而实际上伊犁"四面俄部环居"，"孤注万里，何以图存？"将来"虽得必失，庸有幸乎？"他还揭露俄国的贪欲永无止境，"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①]。因而，必须重新交涉，"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以挽回崇厚造成的恶果。

光绪六年(1880)一月，在全国上下舆论的压力下，清廷不得不拒绝批准"崇约"，将崇厚撤职定罪，另派曾纪泽赴俄谈判改约。俄国得知崇约被拒，一面摆出断交的架势进行政治讹诈，一面派兵遣将，大搞武力威胁。在全国军民反侵略精神的推动下，清廷命令各地加强边防，以准备对付俄国可能挑起的侵略战争。

二月，左宗棠提出了准备三路出兵，武力收复伊犁的方案，以配合曾纪泽的谈判。为了就近指挥这一重大行动，并向全军将士表达自己的决心，年近七十的左宗棠，不顾体弱多病，不畏风沙严寒，从肃州出发，随将士穿过千里戈壁，把大本营设在新疆哈密的凤凰台。他的这种精神，充分显示了反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但正在这时，清廷突然以"现在时事孔艰，正需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为由，把左宗棠调回北京。左宗棠迫于朝命，不得不离开新疆，但他到北京后，仍然"力持正论，与此事相始终"[②]。

虽然左宗棠调回北京，但他在伊犁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对曾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5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4，第82页。

纪泽的谈判仍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迫使贪婪成性的俄国不得不将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城及通往南疆的穆扎尔山口归还中国。在这方面,左宗棠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新疆建省,是左宗棠长期关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他多次向清廷陈述新疆建省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建省的具体方案。光绪十年(1884),清廷正式批准新疆建省,任命刘锦棠为首任新疆巡抚(时左宗棠已在两江任上)。这是新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实现了新疆与全国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统一;它大大加强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于恢复和发展遭到破坏的经济、对于保卫祖国西北边防,都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左宗棠作为创议者,显示了他远大的政治眼光,确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新疆期间,左宗棠还重视屯田开荒,安置难民;推广蚕桑事业,发展地方经济;修筑道路,便利交通,做了一些有利于新疆各族人民的好事。此外,他还在光绪六年(1880)创办了兰州机器织呢局,希望利用西北盛产的羊毛与外国输入的毛织物竞争。

第七节　督办福建军务

光绪七年(1881)正月,左宗棠回京觐见后,诏命入值军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不久后,又调任两江总督。这时,中俄条约已定,左宗棠不可能在抗俄斗争中再出什么力,他只得把注意力转向国计民生,期望在有生之年追随陶澍、林则徐之后,做一些利民、惠民的事情。但由于疾病缠身,他已有力不从心之

感了。

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这位曾在反侵略斗争中大显身手的老将坚决主战,并慷慨激昂地表示,为“西南数十百年之计”,愿亲往抗法前线视师,“不效,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①]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还要已退休的老部下、英勇善战的王德榜挑募旧部,组成“恪靖定边军”,前往前线参战。此后,正是这支部队,在镇南关(今友谊关)一役,配合老将冯子材,大败法军,为祖国建立了功勋。

光绪十年(1884)七月,法军偷袭我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厂,福建水师几全军覆没。闽、浙前线形势紧张,台湾危急。清廷不得不起用已于年初“因病开缺”的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这时的左宗棠,已是72岁高龄,然而“闻命之余,慷慨戎行,冒暑数千里”,率部兼程赶到福州。到达福州的当天,就命令迅速集中帆船,准备亲自冒险东渡。在被劝阻后,他调王诗正率“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与法军交战,并“购军火”、“雇商船”,“昼夜孜孜,以谋援台”。当澎湖失守时,左宗棠气愤得“椎胸顿足”,以至“咯血时发”。但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他仍然坚持主持战备事宜,不肯休息。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清廷出卖了冯子材等英雄将士用鲜血换来的巨大胜利,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并不顾广大爱国军民的反对,严令各地撤兵。左宗棠“以此行未能破敌大加惩创引为恨事,肝疾牵动,愤郁焦烦”[②],病势剧增。同年七月二十七日(9月5日),逝于福州。清廷予谥“文襄”。

---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6,第46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2002—2003页。

第十三章　张　之　洞

第一节　清流派的首领

张之洞，字孝达，一字香涛，号壶公，晚年自号无竞居士，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日（1837年9月2日）生于贵州兴义府。曾祖父张怡熊，曾任浙江山阴县知县。祖父张廷琛，曾任福建古田县知县。父亲张锳，曾任贵州兴义府知府。

张之洞从小读书用功，才思敏捷，受过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他先后从好几位老师就学，其中丁诵先、韩超两位老师给他的影响较大。丁诵先，道光十八年进士，翰林院侍读。韩超累官至贵州巡抚。咸丰二年（1852），张之洞应顺天乡试，中式第一名。同治三年（1864）参加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以后，他曾担任浙江乡试的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职务。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整顿学风，建立经心书院，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人，颇得众望。他任四川学政时，在成都建立尊经书院，延请名儒，分科讲授，仿照阮元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的例规，手订条教，并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两本书，以教导士子应读什么书，应怎样做学问以及修养品德等。这两本书在当时

和以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书目答问》至今仍是近代目录学的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书。他还聘请通才宿儒，如缪荃孙、樊增祥、王文锦、王懿荣、蒯光典、易顺鼎等，教士子以治经门径，通达时务。在四川尊经书院的学子中，他推荐五少年，第一名是杨锐，后来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六君子之一；第二名是廖登廷，即后来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廖平。

光绪五年(1879)，张之洞补国子监司业，补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同年，清廷因俄国侵占新疆伊犁，派左都御史崇厚赴俄国交涉索还伊犁。崇厚昏庸无知，与俄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这一条约名义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被沙俄宰割，伊犁处于俄国包围的危险境地。消息传来，舆论大哗。群臣上疏，张之洞上《熟权俄约利害折》、《筹议交涉伊犁事宜折》，分析俄约有十不可许，坚持必改此议，宜修武备，缓立约，并要求治崇厚罪。折上，被慈禧、慈安太后召见，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他同张佩纶、陈宝琛共同起草奏折19件，提出了筹兵筹饷、筹防边备的积极建议。光绪六年(1880)，清廷派曾纪泽赴俄，重订伊犁条约。

当时，张之洞、宝廷、张佩纶、黄体芳称翰林四谏，号为清流派。他们拥戴军机大臣、大学士李鸿藻为领袖，而实际上张之洞是清流派的首领。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张之洞的政治声望提高了，并且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

第二节　整顿山西吏治，严禁鸦片

光绪七年至十年(1881—1884)，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当时，

山西吏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鸦片流毒严重。张之洞给友人书云："山西官场乱极，见闻陋极，文案武案两等人才乏极，吏事民事兵事应急办之事多极。竟非清净无为之地也。""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景象，有如鬼国，何论振作有为，循此不已，殆将不可国矣，如何如何。"①

张之洞注意整顿吏治，一上任便勤考吏属，振作革弊，劾罢贪纵害民的县官，奖励好的官吏，严禁鸦片，胪举人才，编练军队，清查仓库。山西的铁运销奉天、上海等地，陆运成本很高，他改由天津出海，海运降低运费，又在产地筹办冶炼局。他创办令德堂，也是仿照阮元诂经精舍、学海堂的例规，聘请王轩为主讲，杨深秀为襄校兼监院。杨深秀后来成为戊戌变法运动六君子之一。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山西传教，刊行《救时要务》等小册子，并举办仪器、车床、缝纫机、单车的展览和操作表演。张之洞会见了李提摩太，读了他的书，受其影响，拟筹建洋务局，未及实现。

光绪十年(1884)，法国侵略越南，边疆告急。张之洞上疏建议战守，请严督滇、桂之战，急修津广之防。四月，清廷召张之洞晋京。张之洞陈抗法事，多所谋划，被任命署理两广总督，不久实授。

---

① 《与张幼樵》,《张文襄公全集》卷214《书札一》,北平文华斋戊辰刊本。

第三节　筹划抗法，兴办洋务企业

张之洞到达广州后，便加强防务，饬沿海督抚，严密防守。六月，法国侵略军占台湾基隆，张之洞奏请饬吏部主事唐景崧，往会刘永福，合击法军。他认为："援台惟有急越，请争越以振全局。又言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图越以用刘为实济。"① 清廷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加刘永福为提督记名。刘永福率领黑旗军骁勇善战，屡创法军。但由于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云南布政使唐炯所率军队在抗法战争中配合不力，打了败仗，唐炯军逃走，使黑旗军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唐、徐被撤职查办，张之洞因荐徐延旭不当而交部察议。

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法军侵占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形势危急。张之洞奏请调前任广西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援桂，驻镇南关。70岁的老将冯子材率军，奋力殊死抵抗，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但是清廷却决意乘胜求和，命令前线各军停战撤兵。前线将士闻讯，"皆扼腕愤痛"。张之洞接连电奏缓期撤兵，竟遭李鸿章传旨斥责。

在中法战争中，张之洞筹饷运械，给岑毓英军200万元，桂军200万元，唐景崧、刘永福40万元，台湾40万元。朝廷表彰他筹济军事，不分畛域。

这一时期，他在广东开设水陆师学堂，创设枪弹厂，疏请大治水师、专款购兵舰，设缫丝局，创办机铸制钱局及银元局，筹办织布局和制铁厂，这是他办洋务企业的开始。

---

①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3，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42页。

光绪十二年，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广东原有端溪书院，在肇庆，他聘请梁鼎芬主持端溪书院，后来梁鼎芬率师生来到广雅书院。张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广雅书院主讲。当时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主和而获罪，朱一新因弹劾太监李莲英而降职。张之洞不怕非议，敢于延聘他们，显示了他的不凡气度。

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一条芦汉铁路，自芦沟桥至汉口，以贯通南北。他认为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他提出芦汉铁路是“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萃也”①。朝廷准奏，计划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筑。于是，清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

光绪十五年冬，张之洞到了湖北。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办起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首先是筹建汉阳铁厂。张之洞办企业，也曾闹过一些笑话。他电驻英公使薛福成购炼钢厂机炉，英国梯赛特工厂厂主回答说：“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以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张之洞大言曰：“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英国厂主只得从命。结果，机炉设在汉阳，铁用大冶的，煤用马鞍山的。马鞍山的煤，灰矿并重，不能炼焦，不得已只好从德国购焦炭数千吨。从光绪十六至二十二年(1890—1896)，耗资560万两，还没有炼成钢。后改用江西萍乡的煤，制成的钢太脆易裂。张之洞才知道他所购的机炉采用酸性配置，不能去

① 《洋务运动》第6册，第254页。

磷，钢含磷太多，便易脆裂。于是又向日本借款300万元，将原来的机炉改用碱性配置的机炉，才制出优质的马丁钢。宣统元年(1909)，汉冶萍公司的经理叶景葵评论道："假使张之洞创办之时，先遣人出洋详细考察，或者成功可以较速，縻费可以较省。然当时风气锢蔽，昏庸在朝，苟无张之洞卤莽为之，恐冶铁萍煤，至今尚蕴诸岩壑，亦未可知，甚矣功罪之难言也。"①

汉阳铁厂是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光绪十九年(1893)建成，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大小工厂10个、炼炉2座，工人3000，采煤工人1000。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钢铁工业，而且在亚洲也是首创的最大的钢铁厂，日本的钢厂建设还比这晚几年。

张之洞还办了湖北织布局。光绪十八年(1892)在武昌开车，纱锭3万枚，布机1000张，工人2000。织布局是盈利的。但是张之洞却将织布局的盈利去弥补铁厂、枪炮厂的亏损，使织布局一直处在高利贷的压迫下，无从发展。

张之洞看到棉纱销路很广，便决定开设两个纱厂。他致电驻英国公使薛福成向英商订购机器。光绪二十三年(1897)建成北厂，纱锭5万多枚，为湖北纺纱局。南厂一直没有建成，机器停放在上海码头任凭风吹雨打，后来张謇领去办了南通大生纱厂。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转租给广东资本家组织的应昌公司承办。

张之洞还创办了制砖、制革、造纸、印刷等工厂，还有湖北枪炮厂。他在湖北还注重兴修水利，光绪二十五年(1899)前后修了

① 《洋务运动》第8册，第525—528页。

三条堤。一条是武昌武胜门外红关至青山江堤30里;一条是省城之南的提坝,自白沙洲至金口江堤52里;一条是从鲇鱼套起至上新河为止的10余里堤岸。这三条堤的修筑使常受洪水威胁的地区成为良田、市镇。

张之洞到了湖北,其中光绪二十年(1894)调署两江总督,任期一年多。他十分重视湖北、江苏的教育,创办和整顿了许多书院和学堂。在湖北,有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又设立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在南京,设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他派遣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在学堂、书院的学习科目方面,他针对社会需要有所改革,添增了一些新的学科。他也注意训练军队,在两江总督任职期内,曾编练过江南自强军,人数1万,地点在徐州,军官全部用德国人担任,采用西法操练。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回任湖广总督,将自强军交给两江总督刘坤一。

张之洞在积极兴办洋务企业的同时,对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和农民起义进行了残酷镇压。

第四节 同维新派的联系与分歧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虽然也筹饷筹军械,但他练的军队没有发挥什么实际作用。朝廷旨调4艘兵舰,他致李鸿章电说:"旨调南洋兵轮四艘,查此四轮既系木壳,且管带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甚至故意凿沉、搁浅皆难预料。"[①]

① 《致天津李中堂》,《张文襄公全集》卷139《电牍十八》。

甲午战争失败后，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希望朝廷总结失败教训，变法图治。由于他慷慨激昂讨论国家振作，主张反抗侵略，又办洋务企业，因此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称张之洞“有天下之望”，对这位封疆大吏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崇敬。谭嗣同也说：“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济者，要惟香帅一人。”① 这是当时维新派的共同看法。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张之洞表示赞助和同情，捐 5000 两以充会费。帝师翁同龢也加入了强学会，当时有“内有常熟（翁同龢），外有南皮（张之洞）”之称，翁、张成了强学会的两大支柱。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康有为南下到了南京，去拜谒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康有为准备在上海设强学会，推张之洞为会长，并代张之洞起草《上海强学会序》。张之洞当时答应了。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请他列名，张复电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② 他以会外赞助人的身份，捐款 500 两，拨公款 1000 两，表示赞同。上海强学会成员中有汪康年、梁鼎芬、黄体芳、屠仁守、黄绍箕，都和张之洞关系相当密切。但是，后来他看到慈禧太后采取了行动，逼令光绪帝封闭了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便借口康有为谈今文经学、主张孔子改制说和他平素的学术主旨不合，停止捐款。

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1896—1897），维新派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梁启超主笔，汪康年为经理。张之洞以总督的名义，要湖北全省各州县购阅《时务报》，捐款千元，给予报纸以经济上

---

① 《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58 页。

② 《张文襄公年谱》卷 5，第 96 页。

的支持。后来,《时务报》发表了关于中国应争取民权的文章,使张之洞大不高兴。他授意屠仁守写了《辨辟韩书》,批判严复的《辟韩》一文,在《时务报》上发表。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湖南掀起了维新运动。他在湖南的新政,包括办厂、改革教育等,得到张之洞赞同。在张之洞的影响下,陈宝箴也命令全省各州县书院的学子阅读《时务报》。湖南成立南学会,创办《湘学报》、《湘报》,张之洞利用政治力量,推销《湘学报》于湖北各州县。自第十册起,《湘学报》刊载了关于孔子改制和鼓吹民权思想的文章,这使张之洞大为不满。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张之洞电陈宝箴说《湘学报》议论悖谬,饬局停发。他还告诫陈宝箴说,这件事"关系学术人心,远近传播,将为乱阶,必宜救正"①。对湖南维新运动施加压力。

是年三月,张之洞刊行《劝学篇》。翰林院编修黄绍箕以《劝学篇》进呈。光绪帝发布上谕称是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② 由于清廷的赞许,这本书风行海内。张之洞自言其书主旨在"正人心,开风气"。所谓正人心,就是提倡三纲五常,维护君主专制制度,批判维新派的民权观。所谓开风气,就是学习西方办铁路、商务、矿务、学堂等,并没有超出洋务运动的范围,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劝学篇》的出版,受到守旧派的赞扬,遭到维新派的严厉驳

---

① 《张文襄公年谱》卷 6,第 115 页。

② 《劝学篇》,光绪戊戌三月两湖书院刊本,卷首。

斥。顽固派苏舆所编《翼教丛编》，收入了《劝学篇》中的几篇文章，并赞叹说："疆臣佼佼厥南皮，劝学数篇挽澜作柱。"[①] 章太炎则毫不客气地批评《劝学篇》上篇，"多效忠清室语"[②]，宣扬封建的忠君思想。维新派梁启超评论此书道："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何足道？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③]

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张之洞和维新派有较多的联系。他自己也是相当活跃的人物。张之洞曾让陈宝箴推荐杨锐和刘光第。杨锐是张之洞的弟子和幕僚，到京后，与张之洞保持密切联系。后来杨锐、刘光第以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与要政。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张之洞奉调晋京，因湖北沙市发生焚烧洋房事件，中途折回。八月，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夕，陈宝箴曾奏请光绪帝速调张之洞入京"赞助新政"，但未成。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到北京，曾对总署说："变法不从远大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④] 不久，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杀害了"六君子"，百日维新失败。张之洞急电挽救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而不得，为此，他深感痛惜。

第五节　镇压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中国北方掀起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

① 《翼教丛编·序目》。
②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③ 《自由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7页。
④ 《张文襄公年谱》卷7，第120页。

动。一开始，张之洞便主张坚决镇压。他先后镇压了湖北天门县、荆州府等地的人民焚烧教堂、医院的行动，还会同沿江各省奏请力剿“邪匪”，严禁暴军，安慰使馆，致电各国道歉，完全站在保护帝国主义利益的立场。英帝国主义为了保全长江流域一带的既得利益，便同张之洞、刘坤一等有实力的总督联络，签定了《东南互保章程》。条款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总宪允认切实保护”[①]。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都表示赞同，加入了“东南互保”的行列。

七月，张之洞在武汉逮捕并杀害了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等20余人。戊戌变法失败后，唐才常等人联络会党和清军部分官兵组织自立军，准备在安徽、湖北、湖南几省起义，建立君主立宪的“新自立国”，请光绪帝复辟。他们还想通过日本劝说张之洞，拥戴他建立“东南自立之国”。张之洞得知消息，并未立即表态。这时，英国也正在活动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等拉拢孙中山，准备在华南策动李鸿章“独立”。李鸿章也在观望。于是出现了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在自立军起事迫在眉睫，而慈禧太后也未失去对清廷中枢控制时，张之洞动手捕杀了唐才常等人。

张之洞剿灭了自立军后，发现参加上海张园国会的有许多著名士绅、学者以及留学生。于是他起草了一份《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留学生文》，文中列举了自立军是康党的罪状，劝戒国会中的士绅、学者以及留日学生，以分化瓦解革命队伍。留日学生看了大为气愤，他们公推沈翔云写了《复张之洞》一信进行批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968页。

驳。沈翔云在信中以大量篇幅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普遍流行的公理，并不能称为康、梁邪说；揭露张之洞说："公之定此狱也，一则曰领事恨之，再则曰教士恨之，三则曰洋官、西士无不恨之，公以为领事、教士、洋官、西士，其为中国乎？其为彼国乎？何大惑不解如是也。"[①] 据说张之洞看了这信十分窘迫，便指使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学生撰写驳文，抵挡一阵才算了事。

第六节　"变通政治"的《江楚三折》

清廷在经过了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战争以后，不得不"变通政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遥为参预"。五月、六月，张之洞会同刘坤一连续上了三道奏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这就是有名的《江楚三折》。第一折，是关于办学堂、废科举事，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建议。第二折，言整顿中法，提出了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建议。在这个奏折中说："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旧，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金之刁难，夸租界之整肃而苦吏胥之骚扰，于是民从洋教，高挂洋旗，士人入洋籍，始由隔寝成涣散，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770页。

乱民渐起，邪说乘之，邦基所关，不胜忧惧。”[1] 这里反映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深度和毒害，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痛恨清朝政治腐败的程度和心理。第三折言采用西法，提出了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等建议。在这个奏折里，他说："施之实政则不至于病民，至若康有为之邪说谬论，但以传康教为宗旨，乱纪纲为诡谋，其实与西政、西学之精要，全未通晓，兹所拟各条皆与之判然不同。”[2] 他还特地申明他采用的西法内容和实质同康有为维新派的毫不相同。

《江楚三折》仍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具体化，在不变更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方法。虽则如此，但改革的一些项目，如废科举、兴学堂、奖励留学、设商部、学部、兴办实业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和新文化传播的。

第七节 废除科举制度，实行“癸卯学制”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张之洞被赏加太子少保衔。次年十月，他上《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提出兴办各类学堂，包括师范、小学、文普通中学、武普通中学、文高等学堂、武高等学堂、方言学堂、忠学堂、工学堂、勤成学堂、仕学院、省外中小学、蒙学等。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 年 1 月)，张之洞奉旨入京，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 53,《奏议五十三》,第 32 页。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 54,《奏议五十四》,第 32 页。

清廷批准张之洞等《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在全国范围推行的学制。当时称为“癸卯学制”。内容是把普通教育分为初等、中学、高等三级，修业期长达25年；与此并行的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以兴学校。清廷诏准，自翌年始，所有乡试、会试及各省岁考一律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结束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

废科举、兴学校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张之洞在这方面的提倡和努力，在客观上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的。

第八节　督办铁路

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十分重视兴建铁路，他认为：“铁路为自强第一要端，铁路不成，他端更无论矣。”① “西法富强，尤根于此。”② 他所建议并监修的芦汉铁路，自光绪二十四年兴建，到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完成，命名为京汉铁路。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张之洞又奉旨督办粤汉铁路。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早在7年前就被美国所控制。光绪二十四年(1898)，美国合兴公司同清廷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控制了粤汉铁路的筑路权。光绪二十六年(1900)又订立续约，规定借款为4000万美元，由合兴公司在5年内筑成，不得转让他国。但

① 《为筹办芦汉铁路情形并议借比国洋款折》，《张文襄公全集》卷46，《奏议四十六》，第2页。

② 《铁路第十二》，《劝学篇·外篇》，第42页。

3年过去,到光绪二十九年铁路尚未动工。光绪三十年,合兴公司又将股票的三分之二卖给比利时的万国东方公司。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人民获悉这个消息,非常愤怒,要求废除原订合同,收回路权自办。此时,张之洞奉旨督办粤汉铁路,经过与美国公司一年多的交涉,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他以675万两的高价赎回路权。随后,张之洞以高股筹集不易为由,于宣统元年(1909)四月与德、英、法三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550万英镑筹建粤汉铁路。这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

第九节 任中枢重臣

清廷眼看资产阶级革命派势力愈来愈大,为了维护其统治,拉拢资产阶级,欺骗全国人民,便声称"预备立宪"。光绪三十一年(1905)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各国宪政。第二年宣布官制改革,编纂宪法大纲。对于"预备立宪",一开始,张之洞听到一些风声,感到惊讶,等到五大臣回国到上海,征求他意见时,他回电说:"立宪事关重大,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自当竭其管蠡之知,详晰上陈,此时实不敢妄参末议。"[①]态度暧昧。他对外官改制更持反对态度,认为"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大乱",还说:"事关二百余年典章,二十一省治理,岂可不详慎参酌,何以急不能待,必欲草草尔定案耶?"[②]

清廷通过官制改革,欲加强皇权,削弱地方官吏的权力,便把当时地方督抚中权力最大的袁世凯和张之洞调到北京。光绪

①② 《张文襄公年谱》卷9,第206页。

三十三年(1907)六月,张之洞由协办大学士充体仁阁大学士,七月入京,补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这时,张之洞年已七十一。清廷四面楚歌,处境危急。张之洞到了北京,竭力为清朝的腐败政治补苴罅漏。为了应付日益高涨的"革命排满"的形势,他再次向慈禧太后提出"化除满汉畛域",说:"欲御外侮,先靖内乱,探原扼要,唯有请颁谕旨布告天下,化除满汉畛域。"这一建议被采纳。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溥仪继位,改年号宣统。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监国,满族亲贵乘机集权,排斥汉官。袁世凯是当时权势显赫的汉族大官僚,加上戊戌变法时出卖光绪帝,为载沣等皇族亲贵所忌恨。于是,载沣等密谋杀袁。对此,张之洞表示反对,认为"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宣统元年(1909)正月,清廷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让他回河南养疴。

六月,张之洞病重。八月二十一日(七月初六日),奏请开去各项差额,摄政王载沣亲临探视。当天,张之洞在哀叹"国运尽矣"声中去世。清廷谥以"文襄"。

第十四章　郑　观　应

第一节　从买办生涯到投资洋务企业

郑观应，又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偫鹤山人。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1842 年 7 月 24 日）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郑观应的家境并不富裕，祖父郑鸣岐是一位"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1] 的普通文人，父亲郑文瑞终身未获科名，长期作乡村塾师。鸦片战争以后，在广州、上海等口岸，买办成了时髦的职业，成为发财致富的捷径。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同宗兄郑济东都作了上海外国洋行的买办。

郑观应幼承庭训，攻读四书五经，企图博取功名。但是，16 岁那年应童子试名落孙山后，他"即奉严命，赴沪学贾"[2]，走上当买办的道路。

初至上海，郑观应先寄居在任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边听差，边习英文。咸丰九年（1859），入英商宝顺洋行作低级

---

① 郑观应：《先考荣禄大夫秀峰府君行状》，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22 页。

② 郑观应：《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郑观应集》下册，第 619 页。

雇员，担任管丝楼兼管轮船客载的工作。在公余之暇，他与广东乡友梁纶卿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开办的英华书馆夜课学习英文。在宝顺期间，他为洋行开辟了江西、福州等处揽载行，还投资加入中外商人合办的公正轮船公司。

同治七年(1868)，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改任和生祥茶栈通事，代两湖、江西、徽州茶客沽茶，兼营荣泰驳船公司。同治十一年(1872)和生祥茶栈停业后，他又当上扬州宝记盐务总理。这时的郑观应不仅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富商，而且是一位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企业经营家了。

同治十二年(1873)，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成立。第二年，郑观应被聘任为该公司总理，兼管账房、栈房等事务。他后来回忆道："该公司所有轮船揽载用人事务，归余与美人晏尔吉商办。"[①] 可见其在该行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郑观应等人的苦心经营，太古轮船公司营业规模不断扩大，盈利丰厚。光绪三年正月(1877年2月)，郑观应与太古签订的雇佣合同期满，因公司当局欣赏他的才干，又与他续订了为期五年的合同。

自光绪初年始，郑观应投资于清廷所办的洋务企业，在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局，山东登、莱、青、沂四府和东北锦州的五金矿等企业中都有他的投资或股份。此外，他还联络同人集股开办造纸公司和开垦公司。

清代的富商通常兼有官僚身份，郑观应也不例外。同治八年(1869)，他在皖营报捐员外郎，次年捐升郎中。光绪四年(1878)，

---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船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1页。

他在上海与盛宣怀、经元善等人劝募款项，资赈晋、豫、直、陕灾区难民，受到清廷褒奖，膺受道员衔。

第二节　撰《救时揭要》和《易言》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俄、美等国再次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国蒙受割地赔款、主权受损的耻辱。郑观应受到很大刺激，开始在爱国思想指导下“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①，逐步形成社会改良思想。就他当时的思想状况来说，旧的封建传统观念，特别是道教思想占有重要地位。郑观应好道教有家庭根源，其父即是“善青乌术”的好道儒者，并用它来教化子弟。缘此，郑观应“童年好道”②，“尝读《性理全书》、《五子近思录》、《唱道真言真诠》诸丹经”③。在同治、光绪间，他除了出资镌刻刊印道教典籍外，还编辑了一些宣扬因果报应、神仙侠客等迷信说教的小册子，如《陶斋志果》、《富贵源头》、《剑侠传》等。由于时代和经历的不同，郑观应的思想并没有重蹈其父旧辙，而带有了更多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忧国忧民之情。他在咸丰、同治间陆续写成的《救时揭要》一书，就集中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思想状况。这部书主要包括反对外国侵略者贩卖华工、禁止鸦片烟、救灾恤贫、劝人行善和办近代航运业等内容。作者以满腔愤慨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一些腐败现象，描绘出鸦片泛滥、江河水决、哀

① 郑观应：《禀商部条陈六弊请通饬各总商会举调堂员互相砥砺事》，《郑观应集》下册，第604页。

② 郑观应：《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郑观应集》下册，第100页。

③ 郑观应：《重刊慧命经序》，《郑观应集》下册，第30页。

鸿遍野、人民苦不堪言的悲惨情景。他尤其愤恨的是外国侵略者竟然明目张胆地“拐贩华人过洋为奴，……被骗出洋而死于难者，每年以千百计”，幸存者亦“贱同蝼蚁，命若草菅”[①]。他质问当道：对这件大失“中朝之体统”之事，“各国禁之于先，而中土不闻禁之于后，抑独何欤？”[②] 在《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一章，他提出发展近代航运业的主张。针对官办造船企业存在的弊病，他要求“改官造为商造”。因为企业由商人自办，“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只有这样，才算“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③]。这是他最初提出的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

郑观应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解救社会积弊的主张还是陈旧的。他把社会治乱兴衰归结于人心的善恶，“此心不治，而可以自立于人世者，未之有也”。据此，他主张救世之法，惟有劝人“一心向善，积现前莫大之功”[④]。这些观点还没有摆脱劝善积德、善恶报应的说教。

在以后的几年中，郑观应的思想不断发生着变化，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改良主张。成书于同治、光绪间的《易言》，就是他改良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易言》基本上扬弃了《救时揭要》中善恶有报的消积因素，贯穿着改革变法、学习西方的积极精神。他在序言中指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

① 郑观应：《救时揭要·澳门猪仔论》，《郑观应集》上册，第6页。
② 郑观应：《救时揭要·论禁止贩人为奴》，《郑观应集》上册，第13页。
③ 郑观应：《救时揭要·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郑观应集》上册，第55页。
④ 郑观应：《救时揭要序》，《郑观应集》上册，第4页。

而夺其所恃。"① 这正是《易言》一书写作的宗旨。

《易言》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充满着对西方列强侵略罪行的谴责。郑观应认为,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中国的出路"一言以蔽之曰:莫如自强为先"②。他说的"自强"与洋务派片面发展军事工业的"自强"不同,重点强调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他指出:"欧洲各邦皆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盖纳税于货,而寓兵于商也。"③在该书的《论商务》、《论开矿》、《论火车》、《论电报》、《论机器》、《论船政》等篇中,他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和具体办法,积极主张近代企业由商民自办,认为中国商政不兴,主要在于政府官员的巧取豪夺和官场腐败积习的干扰。一旦企业归商民自办,"彼将视为身心性命之图,制造必精,程功必速,成本必廉,虚费必省"④。在政治改革方面,他大胆地提出设议院的主张,批评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病,"于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唯在上之人权衡自秉",上下"情谊相隔",不如西方议院制度优越。他把西方议院制度比附为士大夫所向往的尧舜"三代制度",希望中国能够"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实现"长治久安之道"⑤。

《易言》成书后,郑观应即将手稿邮寄客居香港的名士王韬。王韬阅后赞叹不已,遂由他主持的中华印务总局刊印发行。后来,《易言》还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在这些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①② 郑观应:《易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63页。
③ 郑观应:《易言·论商务》,《郑观应集》上册,第92页。
④ 郑观应:《易言·论船政》,《郑观应集》上册,第92页。
⑤ 郑观应:《易言·论议政》,《郑观应集》上册,第103页。

第三节　任职轮船招商局。为抗法战争作贡献

光绪初年，郑观应在清廷开办的企业中兼职。光绪四年(1878)和光绪六年(1880)，他两次襄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七年总办上海电报分局，光绪八年二月接受北洋大臣李鸿章委任，就职轮船招商局帮办，正式脱离太古轮船公司。郑观应辞去待遇优厚的买办职务而投身于创办伊始的中国近代企业，主要出自振兴民族经济、挽回国家权利的考虑。

郑观应初到轮船招商局上任，正值该局处于困难时期。当时具有10年历史的招商局外受怡和、太古洋行的排挤倾轧，内受官场积弊侵蚀，连年亏耗，难以维持。李鸿章不得不下令整顿。郑观应在了解到招商局的弊端之后，拟订了救弊大纲16条，包括用人宜贤、合理调度、减少消耗、加快船运周转、赏罚分明、禁止工作人员舞弊等措施。与此同时，他偕唐廷枢于光绪九年与怡和、太古签订为期6年的齐价合同。这一合同虽然向外商作了某些妥协，但也起到一定的限制外商倾轧的作用。经过上述整顿，招商局业务颇有起色，出现了“股票价大涨”[①] 的局面。因此，郑观应被擢为该局总办。

光绪十年二月(1884年3月)，郑观应被督办粤防军务大臣彭玉麟奏调赴粤，会办湘军营务处。在中法战争期间，他多次给

① 郑观应：《禀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招商局与怡和太古订立合同》，《郑观应集》下册，第790页。

醇亲王奕谖、两广总督张树声、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及彭玉麟上书言战。是年五月,他受彭玉麟派遣,"往西贡、暹罗(今泰国)侦探敌情"①。郑观应此行历时64日,往返水路行程两万余里,历尽艰辛,为抗法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同年秋,他被札委办理援台事宜,到香港租轮船运送军队粮饷,接济沿海和台湾的抗法将士。

第四节　扩编《易言》为《盛世危言》

郑观应从广州抵达香港,因太古洋行索欠款事被拘留在港,再加上上海机器织布局亏欠事件的纠缠,他便辞去各项差委,归乡闲居。在乡居期间,他从事撰述,扩编《易言》,于光绪十八年(1892)成书,定名为《盛世危言》。他不断根据变化的形势,对此书一再增补。《盛世危言》版本很多,经郑观应手订的版本有光绪二十年5卷本、二十一年14卷本和二十六年8卷本。

《盛世危言》以"图强御侮"为宗旨。郑观应认为,中国若与强敌相处,自己必须要有力量,"所谓势均力敌,而后和约可恃,私约可订,公法可言"。而要强盛就必须变法,"非变法不能富强,非富强不能合纵连横"②。他的改革主张就是紧紧围绕着这一宗旨而展开的。他提出的主张概括起来是:经济上开展"商战",军事上练兵造械,政治上设立议院,文化上推广西学。其中开展"商战"和设立议院是其主要内容。

---

① 郑观应:《南游日记》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941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边防六》,《郑观应集》上册,第801页。

所谓“商战”，就是采用西方国家的先进经济技术，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维护中国的民族经济。郑观应认为，实行“商战”的首要前提是改变中国传统的“重本抑末”经济政策，建立保障工商业利益的制度和法律。他指出：中国传统的思想，视工商为牟利之贱业，“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①

郑观应很重视发展近代机器工业。他说：“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并从争取民族独立的角度强调发展机器工业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没有自己的机器工业，机器一旦损坏，仍然依靠洋人，“设洋人不肯修理，则有机器如无机器同，其有不受制于外人者乎？”这样一来，“商战”就成了一句空话。他主张中国宜专设机器制造厂，先仿造各种机器，使“中国之利自不至外溢矣”②。

郑观应看到，西方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发达，“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③。日本近代工商业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大力“讲求格致、制造、机器、种植、矿务诸学”④。因此，他极力主张改革中国的传统教育，推广西学。他对八股制艺深恶痛绝，认为“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⑤，建议改变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的内容，鼓励士人学习西学，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在政治上，郑观应对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实行议院制表现出

①④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郑观应集》上册，第609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五》，《郑观应集》上册，第626、627页。

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274页。

⑤　同上书，第280页。

更加强烈的愿望。他明确表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① 唯有这种制度可以避免暴君权臣“施其虐”、“擅其权”,作到“君民共治,上下一心”。他根据中国的实情提出了具体建立议院制度的方案:“本中国乡举里选之制,参泰西投匦公举之法,以遴议员之才望,复于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② 认为实行这一办法的结果,将使中国转弱为强。

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郑观应的改良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陷。郑观应虽然提出社会改革的主张,但是,他并没有新的理论武器去批判封建传统思想和论证自己的主张,所依据的理论还是儒学的道器观、变易思想和历史循环论。他说:“拙作《盛世危言》首篇,亦尝论法可变而道不可变。”③ 他所说的“道”是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大道”④,也就是延续几千年之久的封建传统思想体系。这些是不能改变的,要变更的只是具体的“治法”和“器用”。

尽管如此,《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戊戌维新运动兴起,《盛世危言》受到维新志士的欢迎。蔡元培称赞其“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⑤。梁启超把它列入《西学书目表》,向社会大力推荐。渴求新

---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下》,《郑观应集》上册,第316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13页。

③ 郑观应:《答潘兰史徵君论读经书》,《郑观应集》下册,第250页。

④ 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郑观应集》上册,第242页。

⑤ 蔡元培:《杂记》手稿,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页。

知的青年，把它看作“把上天书”[1]。《盛世危言》还直接影响到统治阶级的上层，礼部尚书孙家鼐、安徽巡抚邓华熙都把它推荐给倾向变法的光绪帝。光绪帝对该书作了朱批，发到总理衙门，印了2000部，分给各省有司。《盛世危言》的影响很深远，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受过它的启发。他回忆说：“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2]。

第五节　再度任职企业与信仙求道

光绪十七年(1891)，郑观应重被起用，出任开平煤矿粤局总办。次年，清廷为了扭转招商局在与怡和、太古洋行航运竞争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再次请他入局，就任帮办。郑观应入局后，对招商局内部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改进了经营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与外国船商竞争的能力。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上书当道，进献应敌之策，并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日军情报，揭穿敌人“虚声恫喝之词”[3]。

郑观应再度出山，受到重用，主要借重于盛宣怀的举荐。因此，他对盛氏深怀厚谊。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宣怀准备接办连年亏损的汉阳铁厂，郑观应鼎力相助，并兼任该厂总办，竭尽全力地经营操劳。从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1897—1903)，他先后担任过粤汉铁路总董、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上海医局总

①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

②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1页。

③ 郑观应：《上两江总督列论中日战务书》，《郑观应集》下册，第486页。

董等职。

郑观应对戊戌维新运动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他介绍康有为谒见王韬，与维新派发生联系。以后，他与康广仁、经元善等人创办上海《自强报》。戊戌政变后，他对罹难的维新志士表示同情，称赞他们有“救国之心”[1]，资助和掩护被清廷缉拿的有关人员。不过，他的支持仅此而已，却始终没有成为戊戌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其原因在于：第一：他对康、梁等人的变法理论和政治活动并不完全赞成，认为他们的作法“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第二：畏惧封建顽固势力的强大，担心“改革甚难有效”[2]。再加上他与洋务派官僚在政治思想上的密切联系，使他基本上置身于维新运动之外。

光绪二十九年，郑观应被广西巡抚王之春奏调札委统领三江缉捕，后又代理左江道篆兼办左江营务处，参与镇压当地的会党起义。不久，王之春被革职，郑观应辞官回粤。同年六月，郑观应被盛宣怀札委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东设立商务总会，他担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东、湖北、湖南三省人民要求废除向美国借款修筑粤汉铁路合同，收回利权，掀起了粤汉铁路风潮。郑观应一方面撰文揭露美国侵害中国主权，迫害华民的罪行，一方面参与交涉事宜，表现出爱国热情。

粤汉路权收回后，继续由湘、鄂、粤三省分别出资筑造，但在筹款的问题上遇到了麻烦。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主张派捐加税，

---

① 郑观应：《致何君穗田书》，《郑观应集》下册，第1166页。

② 郑观应：《致经君莲珊书》，《郑观应集》下册，第1165页。

受到绅商们的抵制，筹款工作一时陷于僵局。担任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的郑观应及时提出用印发小股票的办法来征集民资，得到采纳。这项建议实行的结果，民众购买踊跃，“数月之间，集股八百余万元”①，大大超过原拟招股四百万元的额数，而且股票随即上涨。正当他要大显一番身手的时候，发生了粤路风潮。有人罗织罪状对他进行攻击，新任两广总督周馥也施加压力，迫使他不得不辞职，归居澳门。

在澳门居住期间，郑观应主要从事《盛世危言后编》的编辑整理。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被粤商会举为总商会协理兼工艺院、保险公司董事。次年，他第三次入轮船招商局。当时，招商局已被袁世凯把持多年。但在光绪帝、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遭到罢黜，盛宣怀便乘机利用商股的不满情绪，企图将招商局重新夺回自己手中。郑观应入局后，以盛氏支持者的身份卷入了这场争夺。在盛宣怀的支持下，郑观应等人设股东维持会，成立董事会，力争招商局归“商办”。郑本人也是董事之一。是年九月，为争取招商局商办事，他代表局商赴京，到商部催请注册。经过激烈的争议，终于被批准注册商办。宣统二年十月(1910年11月)，他被委为厦门招商局总办，三年改任上海招商局职事稽查的会办，维持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招商局。

在辛亥革命前的几年，郑观应仍然保持着改良的政治立场，对清廷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很感兴趣，积极参与了资产阶级立宪派掀起的国会请愿运动。光绪三十四年，清廷颁布《钦定宪

① 郑观应：《致九善堂总商会请粤路董事会开股东大会时提议》，《郑观应集》下册，第765页。

法大纲》，宣布“预备立宪”，预备期为9年。郑观应不以为然，要求速开国会，缩短“预备立宪”期。宣统二年，他给摄政王载沣上书，批评清廷的拖延态度，陈述了“锐行宪政，速开议院”的道理。他警告清廷说：“若不及早立宪，效法强邻，尚自因循粉饰，必致内乱，四面楚歌，悔之无及！”[①]他的目的是既要乞求清廷向资产阶级开放政权，争得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又要抵制革命的发展，维护清朝的存在。

宣统三年八月(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巡察长江各埠分局的郑观应当时正在重庆乡间避乱。十一月(1912年1月)，他返回上海，支撑招商局的局面。1913年5月，招商局在上海张园开股东常会，他当选为董事。1914年，他因年迈多病，向招商局提出辞呈，并于冬月写好遗嘱，准备修身静养，安度晚年。晚年的郑观应对教育事业倾注了很大热情，曾长期担任招商局公学的住校董事兼主任、上海商务中学的名誉董事。由于他在商界深孚众望，1919年6月招商局股东常会改选董事时，他仍继续当选。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胜利的成果，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共和国名存实亡。严酷的社会现实，使郑观应的改良思想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为了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求仙信道。他声称“名利二字久已看破，等诸过眼之浮云矣”[②]，表示今后“凡入世出世之方，治家治国之道，均不敢再谈，当学金人之三缄其口，敬谢亲

① 郑观应：《上摄政王请速行立宪书》，《郑观应集》下册，第287页。
② 郑观应：《致万雯轩先生书》，《郑观应集》下册，第86页。

友，觅地潜修"[1]。郑观应不再从昔日的改良思想中找救世良方，而是乞求神灵，"由仙佛法力，慑服乱世魔王，消灭各种火器，务使五大洲生民安居乐业"[2]。

1922 年 5 月，郑观应在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与世长辞，终年 81 岁[3]。第二年，他的灵柩移葬于澳门。他的著作除了《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外，还有《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罗浮偫鹤山人诗草》等多种。

---

① 郑观应：《答张君弼士并录寄香港张君润生、星加坡何君善园》，《郑观应集》下册，第 73 页。

② 郑观应：《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郑观应集》下册，第 101 页。

③ 郑观应的卒年说法不一，这里从夏东元《郑观应传》说。

第十五章 康 有 为

第一节 勤学与苦闷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张勋复辟覆败，又号更甡；晚号天游化人。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1858年3月19日）生于广东南海西樵山银塘乡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赞修，官连州训导；父达初，江西补用知县；从叔祖国器，护理广西巡抚，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康有为5岁"能诵唐诗数百首"。6岁，从简凤仪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11岁，父亲去世，跟随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攻读经史。这时，太平天国失败不久，他"频阅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①]。

同治十一年（1872），康有为再应童子试不售，致力于考试和八股文。十三年（1874），"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

光绪二年（1876），他应乡试不售，从朱次琦（九江）学习。朱

---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同治七年戊辰，十一岁"。

次琦教学重“四行五学”: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是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主张“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又攻读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论述历史的著作,于是“议论宏起”。

光绪四年(1878),继续跟随朱次琦读书,攻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诸书,以及《楚辞》、《汉书》、《文选》诸文,“大肆力于群书”。不久,以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乃“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①]。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传统的文化学术发生怀疑。

光绪五年(1879),入西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家、佛学之书,“养神明,弃渣滓”。刚好在北京任职的张鼎华(延秋)偕四五人来游西樵山,使康有为接触到当时正在酝酿的改良主义思潮。不久,康有为“薄游香港”,亲眼看到英国侵略者所建立的殖民统治秩序,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要好得多,从此,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

第二节　“参中西之新理”

光绪八年(1882),康有为赴顺天乡试,“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

---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四年戊寅,二十一岁”。

光绪九年(1883),“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创《不裹足会草例》,规定入会的人皆不裹足,凡已裹而复放的,“贺而表彰”。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两广受到侵扰。康有为“感国难,哀民生”,独居一楼,“所悟日深,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为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①。俯读仰思,“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

光绪十一年(1885),从事算学,撰《人类公理》,后来又编“内外篇”。康有为自称是“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赜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古,穷察后来”的作品。《人类公理》未见手稿,“公理书”的修订稿《实理公法全书》②和《内外康子篇》尚有存留。在《实理公法全书》的《凡例》中说:“凡天下之大,不外义理、制度两端。义理者何?曰实理,曰公理,曰私理是也。制度者何?曰公法,曰比例之公法、私法是也。实理明则公法定,间有不能定者,则以有益人道者为断,然二者均合众人之见定之。”他以为几何公理是“一定之法”,如1、2、4、8、16、32,是“必然之实”,但它“不足于用”,于是“不能无人立之法”。“人立之法”,“其理较虚”,本来没有“定则”,只是“推一最有益于人道者,以为公法而已”。什么是“最有益于人道”的“公法”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年甲申,二十七岁”,又康有为有《显微》手稿,藏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② 《实理公法全书》和《康子内外篇》,未刊,原藏康同璧先生处。194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制成显微胶卷,后美国加州大学刘广京教授将该片影印本复制赠予康同璧先生。又《康子内外篇》共15篇,内9篇曾在《清议报》发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予辑入。

呢？那就是平等。

康有为以为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所以要“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要“以互相逆制立法”，使之平等。他认为现实不合几何公理，如“人不尽有自主之权”，如“君主威权无限”等，认为“实理公法”是“天地生人，本来平等”的。

这种“平等”思想，在康有为《自编年谱》和《康子内外篇》中也有反映。他这时的著作，除存有封建学说外，还渗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康有为“公理书”、“内外篇”的酝酿和撰述，象征着一个封建知识分子走向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历程。他忧患人生，向往平等，孕育有一种“大同境界”。

第三节　从崇古文经学到尊今文经学

光绪十二年(1886)，撰《教学通议》，列目二十，在序文中标明撰书的目的是：“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教学之不修”，“患其不师古也”。而所学只是“师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认为“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它的宗旨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

康有为认为，周公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的典范。经书中的典章，是“周公经纶之迹”，“周公以天位而制礼，故范围百世”。他“熔铸一时”，“以时王为法”，从而“制度美密，纤悉无遗，天下受式，遏越前载，人自无慕古之思也”。周公不是空洞说教，而是“有德有位”，用以“纲维天下”，使“教学大备”、“官师咸修”[①] 的。

① 分见《教学通议》中《六经》、《从今》等篇，稿本，上海市文物保管会藏。

《周礼》是古文经典，周公是古文经学崇拜的对象，康有为讲《周礼》官守，崇周公权威，渴望能有“有德有位”的周公其人，以“时王为法”，颁行新政，“天下奉行”，敷教言治，“易民观听”。

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鉴于中法战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南边境，民族危机严重，趁赴京应试的机会，于十月初八日(12月10日)上书变法，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次向清廷正式提出的建议。他痛言帝国主义的侵逼，指责顽固派的“酣嬉偷惰，苟安旦夕”，批评洋务派的“洋差、洋务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张。但这次上书为顽固派所阻，光绪帝没有看到。康有为且备受顽固守旧分子的嘲笑和攻击。这使他认识到找寻新的思想武器的必要。

光绪十五年(1889)秋，康有为离开北京，年底，回到广州。次年春，移居徽州会馆。这时，他晤见了廖平，廖平是今文经学家。今文经学是讲究“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的。康有为一方面感于“外患日深”而上书不达，另一方面受了廖平的启示，觉察陆、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但不如今文经学的“灵活”；佛教哲学虽讲“慈悲普渡”，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①。这样，他便从今文经学中汲取可资运用的东西进而论政，由以往的崇《周礼》、尊周公而崇《公羊》、尊孔子，将今文“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将今文“三世”说推演为“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系统，“愈改而愈进也”。还写了《毛诗伪证》、《周礼伪证》、《说文伪证》、《尔雅伪证》等攻击

① 梁启超:《康有为传》第三章《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

古文经传之书。

光绪十六年(1890),移居广州云衢书屋,在学海堂肄业的高材生陈千秋听到康有为的声名,前往谒见,大为钦仰。是年秋,陈千秋告诉梁启超,康有为的学说"乃为吾与子所未见,吾与子今得师矣"。梁启超随同往见,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梁启超感到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对康有为极为佩服,"自是决意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①。

第四节　长兴讲学,撰《伪经考》、《改制考》

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徇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讲学内容主要是"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公法比例推断之"②,"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③。次年,"移讲堂于广州卫边街邝氏祠。十九年(1893),仍讲学于卫边街。冬,迁草堂于府学堂仰高祠,这时已有100多个学生了。

康有为在长兴讲学时,"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主张治学要"逆乎常纬",反对"积习"。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之外,增加"经世之学",以"通变宜民"。认为孔子"因时立教","天下道术至众",而应"以孔子为折衷"。后来,还到广西桂林讲学,鼓吹孔子改制。这几年中,他在弟子的帮助下,刊行了

---

①② 梁启超:《三十自述》。

③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七年辛卯,三十四岁"。

《新学伪经考》,并从事《孔子改制考》的编纂准备。

《新学伪经考》大旨谓: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刘歆伪造,“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所以叫做“伪经”;刘歆“饰经佐篡,身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所以叫做“新学”。“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①。这种“逆乎常纬”的反抗,予汉学、宋学以根本的打击,予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思想以大胆的扫荡,它在学术意义上是推翻古文经学的“述而不作”,在政治意义上是打击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准备了理论条件。

《孔子改制考》的“立例编括,选徒助纂”,始于光绪十七年,而正式出书则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革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都是茫昧无稽。中国历史,从秦、汉以来才可考信。周末诸子纷纷起来创立教义,企图凭自己的理想来建立自己认为最好的社会制度,并把自己所建立的制度托为古代曾经实施,借以争取人们的信仰。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创造的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作六经以为“托古改制”的根据。经过诸子争教,儒墨“显学”,从战国历秦到汉,孔子成为全国教主。他打通了《春秋公羊传》、《王制》、《礼运》、《论语》以及其他各经各子,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把孔子装扮成为“托古改制”者,成为变法改制的张本。

①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序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第92—93页。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在戊戌时期两本最主要的著作，它不是一般的“考辨专著”，而是冲击封建势力提出改制变法的理论著作。它是披着经学外衣，把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拿孔子来对抗孔子，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从而为变法维新创造条件的著作。

第五节　发动“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又一次惨败；次年三月二十三日(4 月 17 日)，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瓜分危机更是迫在眉睫。康有为趁入京应试的机会，联合各省应试举人 1300 余人，于四月初八日(5 月 2 日)联名请愿，发动“公车上书”。他在“公车上书”中，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改良派的救国纲领。认为变法着重在富国、养民和教民三方面。提出富国之法有六：一、钞法，户部用精工造钞票，设官银行，以扩充商务；二、建筑铁路，收我利权；三、制造机器、轮舟，奖励新制造，并发展、保护民营工业；四、矿务，开设矿学，请比利时人教导勘测，选才督办，不滥用私人；五、铸银，各省设铸银局，以塞漏卮；六、邮政，设邮政局。养民之法有四：一、务农；二、劝工；三、惠商；四、恤穷。教民之法则为分立学堂、开设报馆，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这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也是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

“公车上书”被拒绝代呈，光绪帝没有看到。不久榜发，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康有为又于同年五月初六日(5 月 29

日)呈送《上清帝第三书》,提出了变法的步骤,指出自强雪耻之策有四:即富民、养民、教士、练兵,而如何审端致力于上述四策,则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以求"人才得,左右贤,下情达"。这次上书由都察院代呈,光绪帝第一次读到他的上书。

接着,他又上《第四书》,再次吁请"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并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但又被顽固派拒绝代呈。

康有为在不断上书光绪帝,以争取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时,又"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认为"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于是先办《万国公报》,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95 年 8 月 17 日)创刊于北京,"遍送士夫贵人",使之"渐知新法之益","告以开会之故",并于十月初(11 月中)成立了强学会,又名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参加强学会的还有梁启超、陈炽、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丁立钧、杨锐等,翁同龢等也予支持,强学会成为改良派与帝党相结合的政治团体。《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于十一月初一日(12 月 16 日)正式出版,双日刊,有阁抄、新闻及"译印西国格致有用之书",译印后每加附注,论说不多。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96 年 1 月 20 日),后党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请饬严禁"。强学会被改为官书局,专欲"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这样,"专为中国自强而立"的强学会已违失原旨。

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筹组强学会后,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1895 年 10 月 17 日)出京,至南京游说张之洞,在南北

之汇的上海设立强学会,“以上接京师,次及于各直省”。十月,上海强学会成立,拟定章程,说明设立的目的是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扶“圣教”。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刊《强学报》,以孔子纪年,欲“托古以改今制”,宣传设会办报,倡导维新变法。北京强学会被劾奏,上海强学会也遭封禁。不久,在此基础上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主笔,鼓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议论敏锐,文字新颖,在当时影响广泛。

第六节　推进戊戌变法维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舰队驶入旅顺湾,强租旅大,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深。康有为赶回北京,于十一月第五次上书光绪帝,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提出亡国危险的严重警告说:如果现在再不变法强国,“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还提出国事付国会议行,并请颁行宪法。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理衙门,“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康有为批驳了荣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思想与李鸿章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讲述了变法的具体措施。旋又上书统筹全局,说明推行新政,就要走明治维新的道路,认为明治维新的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设待诏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制度局下分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局,分别推行各项新政。

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结合各省旅京人士纷纷倡设学会，“以续强学会之旧”。于是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先后成立。此时需“成一大会，以伸国愤”，遂于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开会，拟定《章程》三十条，主要内容是：一、“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二、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三、讲求变法、外交、经济，以协助政府治理国家。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略具政党规模。共集会三次，意在合群策、群智、群力，发愤救亡，推动维新。接着，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成立。吏部主事洪嘉与怂恿浙江举人孙灏出面攻击，说康有为是“厚聚党徒”，“辩言乱政”，“形同叛逆”。御史潘庆澜也上疏弹劾，说康有为“聚众不道”。御史黄桂鋆参劾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认为是“乘机煽惑，纠合不第举子，逞其簧鼓之言”，“若准各省纷纷立会，恐会匪闻风而起，其患不可胜言”，要求严禁。这样，保国会虽未封闭，然已形存实散，但它“合群结社”，表达了御侮图存的爱国意愿，促使了各省自保的救亡运动和“诏定国是”的实现。

这时，康有为又上《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又代杨深秀拟《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代宋伯鲁拟《请讲明国是正定方针折》。光绪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并于二十八日(16日)召见了他。此后，康有为迭上奏折，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面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包括拟定宪法、开制度局、禁止妇女缠足、裁冗官、置散卿、废漕运、撤厘金、裁绿营、放旗兵、废

八股试帖楷法取士、改书院、废淫祠等，希望中国有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要求保护工商业，予中国资本主义适当的发展；要求重练海陆军，挽救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要求废科举、办学校，以培养新的人才。这时，他还和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等积极策划推行新政。

“百日维新”期间，新旧斗争异常尖锐，例如废八股疏上，后党即多方阻挠，公开宣称嫉恶康有为如仇敌，说是“摇惑人心，混淆国是”①；还有人严参康有为，说其“聚集匪徒，招诱党羽”，“遍结言官，把持国是”②。康有为和御史宋伯鲁、杨深秀等予以反击。但是，后党掌握了军政实权，而光绪帝则只有起草上谕权。七月中旬，后党怀塔布、杨崇伊先后到了天津看荣禄，阴谋策划政变，推翻新政。光绪帝先后发出两次“密诏”，担心“今朕位几不保”，并明谕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康有为离京南下。次日，慈禧太后再出“训政”，政变发生。

第七节　流亡海外，创设保皇会

九月初十日（10月24日），康有为经由吴淞、香港到达日本，他在途中发表公开信，说是“天祸中国，际此奇变”，称慈禧太后为“伪临朝”，称幽废光绪帝为“罪大恶极”，并将“密诏”改窜露布，提出“无徐敬业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③，表示要“奉诏出

① 许应骙奏，《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4100—4101页。

② 文悌严参康有为折，《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116—4121页。

③ 《新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参见汤志钧撰《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外求救”。

接着,康有为发出《奉诏求救文》,首数慈禧太后大罪十条,继言光绪帝“勤政爱民,大开言路”等“圣明”。说明自己“过承知遇,毗赞维新,屡奉温室之言,密受衣带之诏”,准备“奉诏求救”。当他在香港时,就想“动身到英国去”,并“先告英使署参赞及上海领事、香港总督,请其电英廷相救”。还谒见英国子爵柏丽斯辉,“请其出力相救”[1]。他的弟子梁启超在逃亡途中上书伊藤博文,请他与英、美诸公使商议揭破慈禧太后“欲杀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2]。等到了日本,康有为又请文部大臣犬养毅予以支持[3];又上书同文会领袖近卫笃麿,说明“受衣带之诏,万里来航,泣血求救”[4]。

这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陈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曾托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为示意。康有为表示自己奉有“密诏”,不便和革命党人往来,拒绝合作。孙中山又通过日本人的关系,组织一次孙、陈、康、梁的会谈,商讨合作方法,康有为不到会,派梁启超为代表,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孙中山复派陈少白往访,梁启超导陈见康,陈少白反复辩论至 3 小时,请康有为“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

---

① 康有为:《谢奉到衣带密诏折》。

② 梁启超、王照:《致伊藤博文书》,《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外国人书简”八,日本塙书房版,第 413—414 页。

③ 康有为、犬养毅笔谈记录,共二版,日本冈山县木堂纪念馆藏。

④ 《近卫笃麿日记》第 2 卷,日本鹿岛研究所出版社昭和四十三年六月版,第 184—185 页。

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①。

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廷向日本交涉，不准康有为留日。二月二十三日（4 月 3 日），由日本外务省赠以旅费，康有为自横滨乘和泉丸渡太平洋，抵加拿大，在温哥华、乌威士晚士打等地演说：“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希望华侨“齐心发愤，救我皇上”②。旋渡大西洋赴美国，企图运动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帝重掌政权，未能实现。又重回加拿大，于六月十三日（7 月 20 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亦称中国维新会。《会例》指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黄种为主”，准备在美洲、南洋、日本、香港、澳门各埠设会，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宣传机关，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一伙顽固势力为宗旨。同年，印有《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说要保国保种非变法不可，要变法“非上圣如皇上不可”，凡是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的都是会中同志。他把“忠君”和“救国”联系起来，把光绪帝和变法联系起来，“救圣主而救中国”，在海外颇有一些号召力。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康有为由香港抵达新加坡，正式接受英国政府保护。这时，义和团运动展开，他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③，“先订和约以保南疆，次率劲旅以讨北贼”④，说是光绪帝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

② 康有为：《在乌威士晚士打埠演说》，《清议报》第十七——十八册，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出版，罗裕才笔记，见《康有为政论集》，第 407 页。

③ 康有为：《致各埠保皇会公函》，《康有为政论集》，第 414 页。

④ 康有为：《上粤督李鸿章书》二，《知新报》第 126 册，光绪二十六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复位，就能“辑睦外交”，“中国可安，亿兆可保”①，酝酿“讨贼勤王”。结果，实际活动的唐才常在汉口事泄被杀，演成自立军悲剧。

第八节 反对民主革命

义和团运动以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逐渐成为时代主流。光绪二十七年(1901)，章太炎在东京《国民报》上发表《正仇满论》，指出：“夫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也”，清廷腐败，“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不能“隐爱于光绪皇帝一人”，处于今日，“革命固不得不行”。“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②。

革命形势的发展，连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欧榘甲都有些摇惑，康有为很是焦虑，连函切责。光绪二十八年(1902)，发出《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二文，前文对梁启超等“摇于形势”，“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予以驳斥，主张“今合举国之力，日以击荣禄请归政为事，则既倒伪政府之后，皇上复辟，即定宪法变新政而自强，是则与日本同轨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满洲，是师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则其收效亦与印度同矣”。

① 康有为：《托英公使交李鸿章代递折》，《知新报》第133册。

② 章太炎：《正仇满论》，《国民报》第4期，1901年8月10日出版。

后文以为:“谈革命者开口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能之事”,“吾四万万人之必有政权自由,必不可待革命而得之,可断言也”;“且舍身救民之圣主,去数百年之敝政者,亦满人也”;“吾今论政体,亦是‘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八字而已!故满汉于今日无可别言者也,实为一家者也”;“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

康有为以为革命自立是“求速灭亡”,而立宪可以避免“革命之惨”,不准各埠再言革命,不准保皇党人稍涉游移,再三“布告同志”:“本会以保皇为宗旨,苟非皇上有变,无论如何万不变。若革命扑满之说,实反叛之宗旨,与本会相反者也。谨布告同志,望笃守忠义,勿听莠言,仆与诸公既同为保皇会人,仆以死守此义,望诸公俯鉴之。”① 表示死守此义,保皇不变。

这时,康有为写了《孟子微》、《论语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以及《大同书》。随着他的政治思想的日趋沉沦,“大同”三世学说也起了变化,说是孔子之时,“身行乎据乱”,是“乱世”,如果能循“孔子之道”,推行至于隋、唐,应该进化到“升平世”(“小康”)了;隋唐以后,“至今千载”,中国应该“先大地而太平矣”,但因秦、汉的崇“刑名法术”,王莽、刘歆的“创造伪经”,晋代以后的“伪古学大行”,以致“微言散绝”,“三世之说,不诵于人间;太平之种,永绝于中国”,而二千年的中国,只是“笃守据乱之法以治天下”。据此而言,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不过是“乱世”,并非“小康”,与戊戌变法前的“三世”说已不同了。

过去,他以为“今者,中国已小康矣”,通过变法维新,就可逐

① 康有为:《与李福基等书》,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六日。

渐达到他所向往的"大同"境界。现在却以二千多年的中国是"乱世",而以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为"升平世"(小康)。"乱世"的中国,要经过"公议立宪",才能符合世界潮流,进入"升平";至于"太平"(大同),是必需"假梯级",必需循序渐进,不能"躐等"的,如仍"据乱"则"大乱生";"而欲骤期至美国、瑞士之界,固万无可得之势,不待言也"①。以喻中国只可实现"小康"(升平世),只可采取由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实现君主立宪,"万无一跃超飞之理,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②。

光绪二十九年(1903),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把康有为等人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沉重打击了改良主义。接着,孙中山发表《敬告同乡书》,明确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③。号召划清革命与保皇的界限。而康有为则漫游各地,离印度、居香港。光绪三十年(1904),自香港至槟榔屿,自槟榔屿赴欧洲,重渡大西洋去美洲。

第九节 成立帝国宪政会,开展立宪运动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康有为自加拿大南游美国。秋,赴欧洲,旋回美国,撰《物质救国论》,以为"中国之病弱",在于"不知讲物质之学"。这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为了抵制革命,清廷于

① 康有为:《大同书》,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3页。

②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书》,《政论集》,第476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0—232页。

次年七月十三日(1906 年 9 月 1 日)颁布“预备立宪”。正在欧洲漫游的康有为大喜过望，九月四日(10 月 21 日)，发出《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蔵，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谓：“仆审内外，度形势，以为中国只可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则内讧纷争，而促外国之瓜分矣。”“今者举国同心，咸言宪法，遂至使臣周咨于外，朝廷决行于上。顷七月十三日明谕，有准备行宪政之大号，以扫除中国四千年之秕政焉。”说是“今上不危，无待于保”，准备于“丁未新年元旦行大庆典”，宣布旧保皇会“告蔵”，新开国民宪政会。说什么“向日之诚，戴君如昔”，“开天之幕，政党我先”[①]，希望重温立宪之梦。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日(1907 年 3 月 23 日)，保皇党人在纽约召开大会，康有为自欧洲赶来，“议行君主立宪”，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则称中华帝国宪政会。在章程第二条中申明：“本会名为宪政，以君主立宪为宗旨，鉴于法国革命之乱，及中美民主之害，以民主立宪万不能行于中国，故我会仍坚守戊戌旧说，并以君民共治、满汉不分为本义，凡本会会众当恪守宗旨，不得误为革命邪说所惑，致召内乱而启瓜分。”第三条申明：“本会以尊帝室为旨。”[②] 帝国宪政会成立后，康有为企图回国从事政治活动未果，指使梁启超等与清朝皇室贵族、国内立宪分子联系，又借用侨商名义，写了请愿书，“乞立开国会而行宪法”。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1908 年 8 月 27 日)，清廷宣布

① 民意:《希望满洲立宪者之翻案》,《民报》第 13 号。

② 《帝国宪政会大集议员会议序例》,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日。

自本年起第九年召开国会,再于下月颁布《宪法大纲》。这个《宪法大纲》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存封建专制制度。革命派采取了坚决反对的立场,而保皇派则表示拥护。《宪法大纲》颁布不到两个月,光绪帝就"龙驭上宾"了。康有为又说帝国宪政会"本以保皇为事,忠义昭著","应发讨贼之义",但是荣禄早死,慈禧太后也卒,谁是贼呢?"查大行皇帝之丧,实由贼臣袁世凯买医毒弑所致",于是"签名上书监国公,请杀贼以报先帝之仇"①。

宣统二年(1910),康有为用帝国宪政会名义草书请开国会,指出"若待九年,恐国非其国",请"立下明诏,定以宣统三年开国会"②。这时,保皇会与国内的国会请愿会联系频繁,拟于年底改帝国宪政会为帝国统一党,向清民政部申请注册,说是"不曰会而曰党,乃合全国人士与蒙古藩王共之","故益光明广大之"③。

宣统三年(1911),清廷严制国会请愿。四月,组织皇族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康有为对奕劻并不信任,一些保皇会员在海外制造舆论,散布揭贴,说是"今举中国之败坏危亡,非他人,皆奕劻一人为之而已;阻挠立宪,阻挠国会,非他人,皆奕劻一人为之而已"。警告奕劻:"若不即开国会,则为举国公敌,为卖国大贼"④。五月,赴日本,初住箱根,后移居须磨。八月,武昌起义。康有为听到消息,"忧心如焚",仍持"革党必无成"之说,想"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还想"乘此以建奇功"。自我陶醉地说:"人知革之无成,士大夫皆思吾党而归心","他日

① 康有为:《光绪帝上宾讨贼哀启》,《戊戌变法》第1册,第433—434页。

② 康有为:《代美国宪政会请开国会书》,宣统二年。

③ 《民政部准帝国统一党注册论》。

④ 《奕劻卖国揭贴》,宣统三年。

国会开时，吾党终为一大政党，革党亦自知无人才，不能为治也”①。

第十节 鼓吹尊孔，拥护溥仪复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结束，康有为已无皇可保了，但他仍恋栈旧制，眷念君主，是年冬发表《共和政体论》，说“专制君主以君主为主体，而专制为从体；立宪君主以立宪为主体，而君主为从体；虚君共和，以共和为主体，而虚君为从体。故立宪犹可无君主，而共和不妨有君主”。又说：“中国乎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全废之，甚非策也。况议长之共和，易启党争，而不宜于大国者如彼；总统之共和，以兵争总统，而死国民过半之害如此。今有虚君之共和政体，当突出于英、比与加拿大、澳洲之上，尽有共和之利，而无其争乱之弊，岂非最为法良意美者乎？”② 混淆民主制与君主制度的界限，以最彻底的民主制度为最坏，越不彻底、封建残余保存越多的就是最好；并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想挂一个“共和”的招牌，恢复清朝的统治。

此后，发表《救亡论》和《中华救国论》③，妄说：“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立宪国之立君主，实为奇妙之暗共和国”，而“满族亦祖黄帝”，还应由清朝复辟。

① 康有为：《致衷孟、慧儒书》，辛亥十一月九日，手迹。广州中山图书馆藏。

② 康有为：《共和政体论》，《康有为政论集》，第689—691页。

③ 《救亡论》撰于1911年冬，发表于1912年，《康有为政论集》，第652—678页；《中华救国论》撰于1912年，载《不忍》第1册，《康有为政论集》，第699—731页。

1913年,以母丧归。在国外15年,至此归国。去国时是一个进步的维新运动领袖,回国时却是一个保守的人了。袁世凯邀请他去北京,作为反动政权的点缀。康有为没有答应,这是为了记住袁世凯出卖戊戌变法的旧恨,反对袁世凯乘着革命危机逼垮了清朝。葬母毕,移居上海,办《不忍》杂志,主张"以孔子为国教,配享天坛",说是"若今不尊孔,则何从焉,将为逸居无教之民欤?暴戾恣睢,以快嗜欲,而近于禽兽乎,则非待烹灭绝种而何?"[①]戊戌变法前的孔子,在康有为的心目中是"维新"的孔子;这时的孔子,却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者了。

1916年3月,电请袁世凯退位。6月,袁世凯死,康有为电黎元洪,"望早召正式国会"[②],又请"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保守府县学宫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勿得荒废污莱,勿得以以他职事假赁侵占"[③]。

1917年,张勋拥护溥仪复辟,康有为于事先《拟复辟登极诏》,说是"民主政体只能攘乱,不能为治,不适于中国"[④],并受弼德院副院长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康有为发表《请诛国贼救学生电》,首谓"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卖国,以自刈其人民,断绝其国命久矣"。继称"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章宗祥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快心","政府宜亟释放被捕学生而诛卖

---

① 康有为《孔教会序二》,载《不忍》第1册,《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2号,见《康有为政论集》,第740页。

② 《康有为政论集》,第945页。

③ 《致北京电》,《康有为政论集》,第957页。

④ 见《康有为政论集》,第990页。

国贼"①。

1922年，游曲阜、登泰山，反对联省自治，认为"分裂则必争而大乱，统一则必治而修明"②。11月，杭州别墅一天园建成迁居。12月，溥仪"大婚"，康有为在杭州"望阙叩贺"。溥仪赏以"御书"，他又赋诗志庆。

1923年，游开封，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往还，又至陕西演讲数次，夏历年底返沪。

1924年，冯玉祥部入京，把溥仪赶出清宫。康有为电北京当局，说是"挟兵逼宫"，"何以立国?"次年，从上海去天津"觐见"溥仪，漫游各地后返沪，办天游书院。

1927年2月，赴天津祝溥仪寿。旋上《追述戊戌变法经过并向溥仪谢恩折》，表示"以心肝奉至尊，愿效坠露轻尘之报"③。3月8日(二月初五日)，70寿，溥仪"赐寿"。康有为有诗谢恩。18日，赴青岛。31日(二十八日)，病逝。

康有为所写论著，据《万木草堂丛书》目录所列，经部有《孔子改制考》、《伪经考》、《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礼运注》、《大学注》、《中庸注》、《论语注》、《孟子微》等19种；史部有《时务刍言》、历次上书、《戊戌奏稿》、《政见书》、《官制考》、《物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论》、《理财救国论》、《救亡论》、《共和政体论》、《中华救国论》、《共和平议》等64种；子部有《大同书》、《诸天讲》、《长兴学记》、《桂学答问》等26种；集部有文集、诗集等28种，共137种。

---

① 见《康有为政论集》，第1066—1067页。

② 康有为：《斥赵恒惕联省自治电》，《康有为政论集》，第1076—1084页。

③ 《康有为政论集》，第1125页。

第十六章　梁　启　超

第一节　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曾以士绅参预乡政，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

梁启超自四岁起居家就读，跟祖父识字。在早年所接受的启蒙教育中，梁启超不仅学到了不少传统的文史知识，而且还听到了许多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祖父经常给他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①，朗诵激动人心的诗歌篇章。这种带有爱国情感和思想倾向的课外教育，对梁启超有着重要影响。历代杰出人物忧国忧民的风范、舍生忘死的品格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有清一代自乾嘉以降，知识分子的出路越来越狭窄，只有通过科举，由学入仕，才被视为“正途”，而用其他方法取得功名的机会很少。这就迫使许许多多的青年学子不得不以全部精力去

---

① 《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5—16页。

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时文，希冀沿着科举的阶梯步步攀登，获取功名利禄。梁启超在少年时代，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光绪八年(1882)，梁启超年仅10岁，就去广州应童子试，结果不中。两年之后，再到广州应试，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少年登第，这对梁家来说，确实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亲期望儿子能学优登仕，耀祖光宗，因此对他管教十分严格，而这时候的梁启超也如井底之蛙，“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①，整天都在潜心钻研八股文。

光绪十一年(1885)，梁启超进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前两广总督阮元所办，“是省城专治经学之所”。梁启超在这里学习汉学。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汉学家注重考据、广征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形之下，格式、内容都有严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气和枯燥无味了。在学海堂学习时期，梁启超逐渐萌发了“弃帖括之志”②。

光绪十五年(1889)，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八。主考官李端棻欣赏其才华，以亲妹相许。这时候，展现在梁启超前面的，是一条“金光大道”，沿此而行，完全可能由学入仕，平步青云。然而，光绪年间，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野蛮蹂躏。面对严峻的形势，梁启超逐渐抛弃了昔日的追求，走上一条充满坎坷曲折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光绪十六年(1890)春，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不中。回来路过上海时，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以及介绍世界地

①② 《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6页。

理情况的《瀛环志略》。这些书籍，开阔了梁启超的视野，从此他便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同年秋，梁启超与陈千秋结交，并通过陈千秋认识了康有为。曾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在当时名声很大。梁启超对他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动十分钦佩，以至“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①]。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光绪十七年(1891)，梁启超、陈千秋等人请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里万木草堂讲学。康有为强调“逆乎常纬”，独辟新路。其讲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与传统规矩不同。“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学生除听讲外，“主要是靠自己读书，写笔记。当时入草堂，第一部书就是读《公羊传》，同时读一部《春秋繁露》。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此外，学生每人还有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再由康有为一一批答[②]。这种新颖生动的教学方法和与时代要求、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教学内容，使习惯于读经诵诗、死记硬背的梁启超感到新奇而兴奋。他勤奋学习，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在此期间，他还协助康有为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

---

①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 61 页。

② 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 25 辑。

制考》这样的重要著作，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

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是梁启超由书斋向社会跨出的重要一步。在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涯中，梁启超不仅了解了天下大势和民族危难，立志为改良救国、振兴中华而奋斗，而且由于广泛涉猎中西书籍，大大地开拓了知识面，这为他今后在思想舆论界大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节　宣传维新变法和君主立宪

梁启超最为自信并常常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他激扬文字、驰骋舆论阵地的宣传才能。从登上政治舞台起，梁启超就与新闻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撰写了大量的文章。特别是在维新运动时期和流亡日本之初，他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统治，极力宣扬改良和变革，热心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舆论界的骄子。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廷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愤慨。梁启超受康有为之命，"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①。四月初八日(5月2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邀集10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重要助手，不仅协助组织会议，联络人士，而且还撰文誊录，起草奏书，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六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30页。

国公报》(不久改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①],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鼓动舆论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报开两月,舆论渐明",那些士大夫"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②]。梁启超在办报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显示了才华。他那高度的热情和出众的能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梁启超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了。

光绪二十二年(1896),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梁启超应邀前往主持笔政。在主编《时务报》时期,他以新颖犀利的议论和通俗流畅的文字,写出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他指出:中国要强盛,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③]梁启超在这些文章中,还大力介绍西学,明确提出要改革中国羸弱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他还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和议会制度,竭力宣扬"民权论",痛驳"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说教,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把历代帝王斥为"民贼",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

①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2页。

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33页。

③ 《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

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①]，呼吁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并且强调，这是维新变法中最为根本的问题。他满怀信心地说："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而勃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②]

梁启超擅长用浅显流畅的文字来阐述重大的时事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带感情，有很强的鼓动性。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大胆抨击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力宣扬，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连严复这样著名的学者也评价"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③]。由于梁启超的参加，《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几个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④]。梁启超的名声也随之日重。

变法理论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开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对维新运动人物的不满和嫉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授意汪康年进行干预，力图控制《时务报》，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启超难与其争，遂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离沪赴湘，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由办报改而教学，条件和环境都不同了，但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宣传工作。在讲学过程中，他大力阐述康有为的改制理论，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特别是在批答学生札记时，梁启超往往借题发挥，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他甚至大胆宣布，"二十四朝其足当

---

① 《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28页。
② 《与严又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9页。
③ 《与熊纯如书(三十九)》，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648页。
④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4。

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1]。这些激昂的言辞,对于那些深受封建思想禁锢的青年学子来说,犹如是出征的战鼓,激励他们投身到改造社会、拯救民族的历史洪流中去。事实上,梁启超的不少学生,如李炳寰、林青、秦力山、蔡锷等,后来都参加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非常险恶的局势。清廷的腐败和无能,通过这次战争暴露无遗。帝国主义各国趁火打劫,力图扩大自己在华的势力范围。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 年 11 月),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康有为赶到北京,积极组织救亡活动。梁启超由于在湖南受到反维新势力的攻击,也于次年二月返回上海,随即辞去《时务报》主笔之职,于三月初来到北京,跟随康有为奔走呼号,决心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撰文演说,呼吁要使全国民众"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梁启超反复强调,只有如此,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2]。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超的作用和名声也越来越大。在"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笔。五月十五日(7 月 3 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变法通义》,大加奖励"[3],赏六品衔,并让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他

---

① 《觉迷要录》卷 4。

② 《保国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 28 页。

③ 《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 28 页。

的流亡生活。严酷的现实已经证明，改良的道路在近代中国是走不通的。不推翻腐败的清朝统治，不摧毁封建的专制制度，所谓救亡图存也就只能落空。然而谭嗣同等“六君子”的鲜血并未能使梁启超醒悟过来。尽管初到日本之时，他一度与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为去加拿大组织保皇会的机会，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往来密切，并试图联合立会，“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后因康有为得知此事，严厉反对，联合立会才告作罢。但是，梁启超与革命派毕竟不是同路人，他继续追随康有为，坚持改良立场。他们公开提出“保皇”的口号，四处建立保皇组织。特别是梁启超遵从师命来到檀香山后，以“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为幌子，积极扩大保皇会，以致当地许多兴中会员也受到蒙蔽而加入保皇会，给革命运动造成了很大危害。

为了控制、利用舆论，扩大保皇派的影响，梁启超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 年 12 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为改良活动摇旗呐喊。他竭力宣扬“光绪圣德”，说什么“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①] 尽管与此同时，梁启超在一系列文章中也抨击封建主义，宣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是“改良”与“尊皇”，却仍然被他看作是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推翻清朝统治政权的呼声日益高涨，

① 李华兴等编:《尊皇论一》,《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90 页。

一批宣传爱国思想、号召救亡图存的刊物相继创刊,民主革命的思想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为了与革命派争夺舆论阵地,光绪二十八年一月(1902 年 2 月),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与以前不同的是,梁启超迫于形势,已不得不放弃"保皇"口号,而代之以"新民"之说。他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①]。此后,梁启超又在一系列文章中,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当然,梁启超把中国贫弱的原因归咎于国民缺乏公德和知识,这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不过他所指出的中国国民性中的许多弱点,确实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因此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文章,在体裁上打破了死板古文的形式,能够用通畅易晓的语言,表达其思想内容,而且很有气势、富于感染力。当时成为一种新文体,以至于"学者竞效之"。

由于康、梁等人顽固坚持改良立场,仇视和抵制民主革命,并且通过自己所控制的舆论工具,攻击革命。为了批驳改良派的谬论,消除改良思想的不良影响,进一步推动革命运动的顺利开展,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作了坚决的斗争和有力的批判。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盟会成立以后,双方的论战达到了高潮。

在这场激烈的论战中,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文章,鼓吹"开明专制"论。仍然强调中国国民程度太低,"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他攻击革命派要求推翻清朝统治是一种"复

① 《本报告白》,《新民丛报》创刊号。

仇主义”，污蔑同盟会提出的“平均地权”是为了“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类悉为我用”①。通过这场论战，梁启超及其所代表的改良派企图以改良的君主立宪来抵制民主革命，以所谓“开明专制”来抵制民主共和的面貌暴露无遗。如果说，在维新时期，梁启超还是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在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的话，那么此时他已经由于不能与时俱进而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了。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社会面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愈趋尖锐。清朝统治阶级为了平息不断高涨的反清浪潮，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博得帝国主义欢心，以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开始推行“新政”；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表示要仿行宪政，并派五大臣前往欧、美、日本等国“考察政治”。五大臣回国后，密奏实行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主张先宣布立宪，“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②。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906年9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同时又强调，由于“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不能“操切从事”，而要“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③。实际上清廷根本没有打算实行立宪，只不过是妄图用“立宪”的招牌继续维持封建专制统治。

然而对于改良派来说，清廷的“预备立宪”却是很有诱惑力

① 《开明专制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53、74页。

② 戴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29页。

③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页。

的。因为他们不仅始终对清朝统治者抱有幻想，而且与国内的一些士大夫和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因此便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来挽回自己的颓势，阻止革命力量的发展。光绪三十三年(1907)，康有为宣布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九月，梁启超也与蒋智由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他在《政闻社宣言书》中写道："所谓改造政府，所谓反对专制，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立而已"，表示了拥护清廷"仿行宪政"的立场。梁启超甚至还明确宣称："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①。但是，梁启超的这些表白，依然只是一厢情愿。清廷所标榜的立宪，完全是为了迷惑民众，混淆视听，在行动上始终没有什么实际的表示。立宪派对此渐感不满，各团体多次联名上书，并开展请愿活动。梁启超控制的政闻社，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致电宪政编查馆，请定3年内召开国会。他们哀恳陈词，乞求清朝统治者赐予一些政治权力。清廷本来就对立宪派组织的请愿活动心怀忌恨，伺机镇压，于是便藉口政闻社内有梁启超等"悖逆要犯"，下令查禁政闻社。这对梁启超来说，无疑是一个意外而沉重的打击，他极力挽救，但毫无效果，政闻社最后不得不宣告解散。

然而这些沉痛的教训，仍未能使梁启超从希望清朝立宪的迷梦中清醒过来。溥仪即位后，梁启超又上书摄政王载沣，为清廷实行立宪出谋献策。他写道："今日中国之病，不在宪法之未颁，不在国会之未开，而在人才之委靡，人心之败坏。""今日欲举

①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3、28页。

预备立宪之实，万事皆枝叶，惟此养人才、正人心之一事，实为本原”[1]，婉转地表示了自己这个人才愿为清廷实行立宪效力的心情。此后，梁启超着力宣传立宪政治，撰文介绍欧、美、日本各国宪政，说明君主立宪政体最适合于中国国情。但是，梁启超的政治主张，毕竟是与清朝统治者的愿望相抵触的，他利用舆论工具敦促清廷加快立宪，企图模仿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来治理中国；而清朝政府的本意则是以立宪为名，扩大皇权，强化封建专制，梁启超的主张，自然不会被接受。因此，直至清朝灭亡，梁启超苦心设计的救国方案一直未被采纳；他本人作为清廷的“悖逆要犯”，也始终没有得到赦免。

第三节　民初政坛的风云人物

戊戌以后，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大都是在海外进行的，与国内政界的联系，只能以其他人物或团体为中介。因此，尽管梁启超凭其卓越的才能，在鼓动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统治集团中却始终没有扮演过什么显赫的角色。随着武装起义的爆发，清廷被迫开放党禁，这为梁启超跻身政界提供了机会。

面对蓬勃开展的武装斗争和日益高涨的反封建浪潮，梁启超不得不承认，“今后新中国之当采用共和政体，殆已成为多数之舆论”。但为阻止革命势力的扩展，梁启超与康有为又提出了“虚君共和”的主张，意欲使革命派与清廷实行妥协。他牵强附会地解释说：在共和政体中，中国必须选择“虚戴君主共和政体”，

① 《上摄政王书》，《梁启超选集》，第549、550页。

"此虽未敢称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①。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 年 11 月 16 日)，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任梁启超为法部次官。对此，梁启超感到十分欣慰。在他看来，自己和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个关键人物，只要能够联合起来，那么社会就会出现转机。所谓"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②。梁启超自视甚高，他认为自己若以局外人的身份出现，才便于控制舆论，影响国民。"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③他对袁世凯的邀请推辞不就，而继续坚持为鼓吹"虚君共和"奔走呼喊，实际上是在观察形势，等待时机。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但革命的胜利果实，却为袁世凯所篡夺。1912 年 2 月清帝退位，3 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权力的法码，似乎倒向了袁世凯一边。为了博得袁世凯的信任，梁启超对这位新的当权者大加吹捧，说什么："欧阳公有言：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公之谓矣。三月以前，举国含生，汲汲顾影。自公之出，指挥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岂俟鲰生揄扬盛美者哉。今者率土归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国家者，实仅发端，而国民所责望于我公者，益将严重。"他表示，"今感情之时代既去，建设之大业方始，谣诼之集，当不如前，驱策之劳，略堪自贡，亦拟俟冰泮

① 《新中国建设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 34、43 页。

②③ 《致罗惇曧书》、《梁启超选集》，第 605 页。

前后，一整归鞭，尽效绵薄，以赞高深，想亦为大君子所不弃耶？”① 这些言辞，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梁启超急于投靠袁世凯的心情。“虚君共和”的调子收起来了，与政府的关系也不“断绝”了，梁启超改而要为袁世凯政府效力了。

1912 年 10 月，梁启超结束了长达 14 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由于他声望很高，名声在外，所以回国以后受到许多人的热烈欢迎。他也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做出一番事业来。

这时候的中国，刚刚经过了一场改朝换代的巨大变动，各派政治力量不断分化，新的政党相继成立。主张实行议会政治的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几个小政党合并在一起，组建了国民党，以期扩大力量，参加竞选，控制内阁。为了与国民党对抗，梁启超也积极活动合并政党，他先是组建了民主党，1913 年 5 月又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成为民初唯一能与国民党对抗的大党。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办报撰文，鼓吹集权，竭力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服务。特别是在“二次革命”爆发之后，梁启超利用他所控制的舆论工具，肆意诋毁革命党人，反对革命运动。他在《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一文中，以先觉者的口吻说道：“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涂辙，据国家正当之机关，以时消息其权限，使自专者无所得逞。”② 他把革命斗争说成是“暴民政治”，攻击革命党人是“乱暴派”，声称“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并公开表示他要以“乱暴派”“为第一

①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15、618 页。

②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 57 页。

敌,先注全力以与抗”[1]。梁启超及其领导的进步党,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摇旗呐喊,因而得到袁世凯的赏识。1913 年 7 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9 月内阁组成,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

但是,袁世凯的真正目的,是要独揽大权,做一个新的独裁者,梁启超所醉心的“改良政治”,是他根本不愿也不可能接受的。当袁世凯利用进步党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之后,熊希龄的所谓“人才内阁”,对他来说就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碍事的了。1914 年 1 月,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仅三个月,就下令取消国会。2 月,熊希龄内阁倒台。尽管袁世凯改任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但这个没有多少实权的职位,实在难以引起梁启超的兴趣。12 月,他辞去币制局总裁之职,携家迁往天津。以后,袁世凯又任命梁启超为政治顾问,委派他考察地方司法教育事宜,梁启超都推辞未就。

在此期间,梁启超与袁世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既不满于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又对他寄于希望。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和企图帝制自为的行径,梁启超是反对的。当日本政府迫胁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梁启超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等一系列文章,抨击日本的扩张政策和侵略野心。他在文中正告日本政府:“我国虽积弱已甚,而国民常自觉其国必能岿然立于大地,历劫不磨,此殆成为一种信仰,深铭刻

① 《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 20 页。

于人人心目中而未由拔。"[1]"若欲并其不可屈者而屈之，吾劝日本人亦勿作此妄想也。"然而梁启超在指责袁世凯为一己私利而不惜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同时，又不时为他作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辩护。他说："四月来之交涉，我政府尽瘁事国之诚，良不可诬；其应付之方略，亦不得云大误。"[2] 似乎袁世凯及其政府不仅没有多大罪恶，而且还有很大的功劳。

由"二十一条"引起的政治风潮刚刚开始消歇，袁世凯就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他的一些外国顾问相继撰文，鼓吹中国应当实行帝制。受袁世凯控制的筹安会也宣告成立，公开打出了复辟帝制的旗帜。只是到这时候，梁启超才对袁世凯完全失望。面对全国已经蓬勃开展起来的反袁斗争，梁启超恐为"牛后"，终于发出了讨袁的檄文。8 月 20 日，梁启超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毅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猛烈抨击袁世凯及其同伙鼓吹帝制的谬论，强调当今中国决不可行君主之制，正告袁世凯之流不要"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3]。文章义正辞严，犀利尖锐，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与此同时，梁启超又与蔡锷密谋，积极策划武力讨袁。

12 月 25 日，蔡锷在云南组成讨袁"护国军"，随即成立云南军政府，与袁世凯进行军事抗争。为策应云南的起义，梁启超于 1915 年底从天津来到上海。他与蔡锷等人函电往来，帮助护国军拟定计划，起草文告；又与广西都督陆荣廷秘密联络，促其独立。1916 年 3 月，梁启超应陆荣廷的邀请，绕经香港、越南赶到

---

① 《中日时局与鄙人言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第 96—97 页。

② 《痛定罪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 1—2 页。

③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 95 页。

广西,直接参加"护国"起义。他一方面向北京施加压力,要求以袁世凯辞职作为停战的条件;一方面又全力策划广东独立。4 月 19 日,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宣告成立,梁启超任都参谋。随后,他又积极筹备组织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联合政府,以期扩大势力,与北洋政府抗衡。5 月 6 日,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梁启超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在职期间,军务院的布告、文电大都由梁启超亲自执笔。

护国运动高举反对复辟帝制的旗帜,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继云南之后,贵州、广西、广东、陕西、浙江等省也相继宣告独立。一心想要黄袍加身的袁世凯,陷入了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窘境,因而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护国运动打破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迷梦,结束了袁氏的反动专制统治,又一次显示了时代车轮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梁启超作为这次运动的核心人物,在发动、组织、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而有效的工作,为护国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护国运动以后,梁启超就深深地陷入北洋军阀的内部纷争之中了。1916 年 6 月 6 日,袁世凯病死。之后,北洋派系的另一个军阀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主持国务院事务,成为新的实力人物。梁启超很快成为段祺瑞的支持者。他在给南方各都督司令的电文中说: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维持危局,非彼莫属",否则"大局将不可问",要他们协力予以援助[①]。在北京政府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召集国会复会,并表示要惩办帝

---

① 《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六月三十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 70 页。

制祸首之后，梁启超便活动撤销军务院，以避免与北方对峙而发生冲突。在梁启超的一再催促下，军务院于7月14日宣告解散，南北"合作"，段祺瑞轻而易举地"统一"了中国。

复会以后的国会，议员主要由原进步党和国民党成员组成。随着北洋军阀内部矛盾的加深，国会也形成了两派主要势力。进步党议员组成宪政研究会(通称研究系)，支持总理段祺瑞；国民党议员组成宪政商榷会，依靠总统黎元洪。两派力量互相对抗，矛盾重重。梁启超是宪法研究会的领袖人物，他凭藉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地位，全力为段祺瑞张目。1917年3月，段、黎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发生尖锐冲突，梁启超不顾全国多数人的反对，支持段祺瑞对德宣战。当参战案被国会否决后，梁启超甚至指示研究系议员辞职，以向黎元洪和国会施加压力。在两派互相倾轧的斗争中，段祺瑞及梁启超运用各种手腕，先借助张勋"辫子军"赶走黎元洪，然后又反过来讨伐张勋复辟清室的罪行，最后，段祺瑞又以"再造共和"为资本，重新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大权。梁启超和研究系，也因拥段有功而成为新内阁的重要成员，梁启超还挂上了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的头衔。这时候的梁启超，可以说是志满意得，雄心勃勃。然而他却再一次错估了局势，委身投靠腐败透顶的北洋军阀，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梁启超在任职期间，极力为段祺瑞扩充军备、巩固统治效劳，并代表北京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两笔以损害民族利益为代价的借款。这些军阀及其同伙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遭到舆论界的严厉谴责。11月15日，段祺瑞政府被迫辞职，梁启超也递送了辞呈。从此以后，梁启超就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转而以主要的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

第四节 多变的政治思想和卓越的学术成就

近代中国是一个风云激荡、发展迅疾的时代。面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许许多多的热血之士都在进行努力的奋斗和艰苦的探索,寻求有效的救国方案。而随着中西文化交流范围的扩大,各种各样的西方政治理论和思想学说也相继传入我国,这为那些先进的政治家、思想家构筑自己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可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之快,变化之大,又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以至于一些人对自己刚刚提出的主张、见解还来不及细细回味,就又要忙于修改订正了。多变的时代造成了多变的思想,梁启超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称自己"保持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①。而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

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

①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3页。

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①] 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 270 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尽管梁启超在不断地变,然而历史似乎在与他开着玩笑,无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怎样变,时代潮流却总是毫不留情地把他抛到后面。这当然不能说是历史的不公平,而是梁启超的种种变化,归根到底都不能超出改良主义的樊篱,改良、渐进,是他政治思想的基本点。而近代中国恰恰是一个呼唤革命、变化急遽的时代。因此,梁启超的落伍,也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1918 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与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前往欧洲。梁启超的欧洲之行,长达 1 年之久,先后到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诸国。在国外,梁启超

---

① 《破坏主义》,《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 25 页。

除游览名胜古迹，了解风土人情外，还旁听了英国国会会议，参观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看到了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听到了列强在巴黎和会上为争权夺利而发出的吵闹。1年多的实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许多严重社会问题。他所崇仰的西方社会，他所宣扬的西方文明，原来也充满了弊端和罪恶。梁启超认识到："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① "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② 他由此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固有文明"，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梁启超从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成为一个旧传统的提倡者，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失望，以及对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忌恨与反对，而且也有力地说明，在近代中国，找不到出路的改良主义者，在时代浪潮的冲击和对社会现实的迷惘中，只能回转身来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宣传家，而且也是一位知识广博、学有专攻的大学者。他的学术成就，是相当广泛而巨大的，涉及到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其中尤以在历史学和中国思想史方面的贡献为多。梁启超早年投身于政治运动，从欧洲回来之后，他虽然仍不能算作一个自

①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7页。
② 同上书,第12页。

甘寂寞、潜心书斋的学者,但确实是用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他的一些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大部分都是在欧游归来之后写成问世的。

梁启超的学术研究和活动,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学术与政治的密切结合。在从维新运动至他辞去财政总长这一期间,梁启超一直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作为一个宣传家,他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其中许多论著,都是通过介绍国内外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社会政治制度,来阐发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同时,他的一些学术研究,也往往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例如他对管子、王安石等历史上改革人物的研究,对中国民族关系和先秦政治思想的探讨,就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明显的政治目的。梁启超积极参与、鼓动的"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也不仅仅是文学史上关于文学体裁和作品风格的争论,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①]。可见其在文学领域所进行的"革命",是与他的政治改良相辅相成的。即使梁启超晚年所醉心的对佛学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是与他鼓吹要以东方文明来拯救世界的政治主张密切关联的。

梁启超学术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来从事研究工作。他所写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著作,用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揭起了"史学革命"的旗帜。他以进化论解释历史现象,套用

①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6、10页。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模式来研究清代学术。他以资产阶级史学家的价值观念,对历史上的民主精神和改革人物大加称颂,而对专制制度和独裁暴君则攻击无遗。尽管梁启超的研究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有时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还不惜对事实进行牵强附会的引申和无中生有的发挥,然而他毕竟是近代中国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来比较全面地从事学术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梁启超自称是晚清"新思想界之陈涉"①,事实上,在学术研究中,他也往往开一代之风气。梁启超的许多精辟分析和独到见解,不仅给当时,而且也给后来的学者以重要的启示。他所留下的累累硕果,为中国近代学术史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梁启超晚年曾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并在一些著名大学任教。除了著述和讲学外,他还先后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务,为培养人才和发展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

1929 年 1 月 29 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 57 岁。他的遗著,由友人林志钧编成《饮冰室合集》,共 148 卷,1000 余万字。

①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 65 页。

第十七章 严 复

第一节 弃科举，习海军

严复，初名传初，乳名体乾，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晚年号瘉壄老人，别号尊疑、尺盦、辅自然斋主人、观我生室主人，别署天演宗哲学家，门人谥为文惠先生。福建侯官（后并入闽县，称为闽侯，今为福州市）人。祖父严秉符是一名医生，父严振先继承祖业。咸丰三年十一月十日（1853 年 12 月 10 日），严复生于福州南台。咸丰九年（1859），“始就外传”①，先后从师数人，中间曾从五叔父严厚甫（光绪年间举人）受业就读。同治二年（1863），严父聘请同邑黄少岩（昌彝）在家设立学馆。黄是“闽之宿儒”②，治学以汉宋并重，平时严复跟他学儒家经典，闲时听他讲述宋元明儒学案，因而为学“明汉宋源委，听指日异”③。越三年，黄少岩去世，其子孟修（拔贡生）继续设馆。同治五年（1866），

---

①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5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545 页。

② 林耀华：《严复社会思想》，《社会学界》第 7 卷（1933 年 6 月）。

③ 王允皙：《侯官严先生行状》，闵尔昌纂：《碑林补集》卷末，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印，线装石印本。

严复的父亲病逝,学馆中辍。由于生活困难,严复不得不放弃走科举的"正途"。

同治六年(1867),严复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在后学堂学习驾驶。同治十年(1871),他从船政学堂毕业,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由于他实习认真,成绩优秀,被选派去英国深造。

光绪三年二月(1877年3月),严复到英国后,先在抱士穆德(Portsmouth)学习,后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Greenwich Naval College)。尽管严复是抱着学习海军知识的目的来到英国的,然而到了英国之后,使他感兴趣的不是西方军事知识与技术,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思想。在英国期间,除了认真学习军事学校规定的高等数学、格致、海军战术、海战公法以及建筑海军炮堡诸学等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外,他十分注意接触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和阅读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并曾去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早的法国游历。由于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中西学问同异",探索中国富强之道,"穷日夕弗休"①,因而他的学习往往与其他中国留学生不同,引起了清朝出使大臣郭嵩焘的注意。他每逢假日,辄至使馆,与郭嵩焘论析中西学术和中国富强之道,并论及去英国法庭听狱的收获,说:"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② 郭嵩焘听了大为惊奇,"引为忘年交"③。

---

① 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第1541页。

② 孟德斯鸠著、严复译:《法意》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重印版,第224页。

③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47页。

第二节　走“变今”维新的道路

光绪五年五月(1879年6月),严复以各科考试成绩“屡列优等”毕业回国,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或称北洋水师学堂),严复被调任水师学堂的总教习(教务长)。光绪十五年(1889)升为会办(副校长)。次年任总办(校长)。严复出于爱国热情,到天津水师学堂后,一心想把学校办好,多培养人才,建设强大的海军,使中国独立富强起来。但官场的腐朽,使他感到办理海军教育无法施展政治抱负,有意退出海军界,另谋发展。他在中法战争至甲午战争前10年间,曾捐监生,参加举人考试,先后于光绪十一年(1885)、光绪十四年、光绪十五年、光绪十九年4次参加乡试,但都未考中。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严峻的现实,令严复清醒,他决然放弃追求个人前途的科举仕途,走上了“变今”维新的道路。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评论历史,针砭时事,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光绪二十二年,赞助梁启超、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同王修植、夏曾佑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竭力鼓吹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西学”,以解救民族危机。在严复的一系列文章中,较重要的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四篇政论文。严复在这些政论文中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猛烈地抨击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倡资产阶级民

主，提倡新学，主张变法救亡。在《辟韩》中，他抨击封建君主专制说："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他还进一步揭露这伙"最能欺夺"的"大盗"，是"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①，有力地鞭挞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揭露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同时，鼓吹"尊民叛君，尊今叛古"，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他说：君主不是天生的"圣人"，天然的统治者，"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②。只是由于人民终日从事耕、织、工、贾"相生相养"的事，才"择其公且贤者"③，立之为君。君主既然是共举出来的，也就有权废除他。他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君主立宪制度。怎样才能获得民主？他认为"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④。这样可以使"君与民皆有权"，君与民"共治"，国家就能独立富强，民族危机就可以解救。他还抨击科举制度"牢笼天下"，"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⑤，批评八股取士制度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害处，主张废八股，倡西学。他认为中学"好古而忽今"，西学"力今以胜古"⑥。讲西学之后，就可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提出要救亡，要富强，"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并且断言"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大声疾呼："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⑦ 严复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

①②③　严复：《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4—36页。

④　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32页。

⑤⑥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1—2页。

⑦　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50页。

说来反对封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超过了康有为。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鲜明地把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对立起来，要求人们不要再走老路，必须改弦易辙，另走新路。这就从思想上武装了进步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使爱国救亡运动有了新的理论基础。

严复除积极宣传变法维新主张外，还积极参与创办新式学校。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担任了新成立的俄文馆总办，亲拟课程，延聘教师。他主持的这所学校，成为我国最早的俄语学校。与此同时，他还协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专讲泰西诸学”[①]，培养维新人才。

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急于选拔新政人才，贵州学政严修建议，除八股取士普通科外，另设特别进士科——经济特科，作为选拔人才的途径。凡是长于内政、外交、理财、军事、科学、工程等人员，仿照博学鸿词科的成例，由大臣推荐考试。光绪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并说：“俟咨送人数汇齐至百人以上，即可奏请定期举行特科。”严复先被顺天府尹胡燏芬推荐参加考试，后由詹事府詹事王锡蕃直接向光绪帝推荐。王锡蕃在奏折中说：“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候选道严复，本船驾驶学生，出洋学习，于西国典章名理之学，俱能探本溯源，精心研究，中学亦通群籍，著述甚富，水师情形，尤其所熟知专习，久在北洋供差，奉公之外，闭户寡合，其立品尤为高卓”，请“量才器使”[②]。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

---

① 《通艺学堂章程》，铅字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② 王锡蕃：《奏保人才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375页。

严复被光绪帝召见回寓后,将在当年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至十四日(1月27日至2月4日)《国闻报》连载的《拟上皇帝书》加以修缮,送呈光绪帝。《拟上皇帝书》的中心思想是提出"谋国救时之道"。他说:"今日之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也。其在内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变也。"因而"谋国救时之道","不外标、本两言而已。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所以他主张未变法前先"治标",变法后才"治本"。他又提出"治标"三策、"治本"四策。"治标"三策是:(一)"联各国之欢";(二)"结百姓之心";(三)"破把持之局"。严复认为:"不联各国之欢,则侮夺之事,纷至沓来,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涣,士气衰靡,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1] 至于"治本"四策,在《拟上皇帝书》中没有具体说明,但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七日(1898年8月23日)《吴汝纶答严幾道书》中,可知其端倪。书中说:"所示四事,皆救时要政,国势陵夷,万物坐敝,条举件论,不可一二尽。又风俗不变,不惟满汉畛域不能浑化,即乡举里选,亦难免贿赂请托、党援倾轧之弊。而土著为吏,善则人地相习,不善则亲故把持,此皆得半之道。"[2]

同年三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号召人们于覆屋漏舟之中,合群以救之,激耻以振之,厉愤气以张之[3],以保国、保种、

① 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1册,第63—77页。

② 《严复集》第5册,第1562—1563页。

③ 康有为:《保国会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1页。

保教。严复于四月在《国闻报》上连续发表《有如三保》、《保教余议》等论文，对保教予以批评。他说：惟于“以孔子之道律今人，乃无一事是皈依孔子，以此而云保教，恐孔子有知，不以公等为功臣也”①。“孔子虽正，而支那民智未开，与此教不合。虽国家奉此以为国教，而庶民实未归此教也。”② 但是，严复的万言书还未送到光绪帝面前，慈禧太后就发动了政变。

严复是当时著名的维新人物，政变时却免受株连，主要原因在于他只是在文字上宣传维新思想，不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再加上《国闻报》背后有日本人的支持，慈禧太后、荣禄惧怕日本的干涉，不敢轻易对他下毒手。

第三节　翻译西书

严复在积极鼓吹变法维新的同时，决心致力于翻译著述，介绍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和政治学说以“警世”。从光绪二十年(1894)开始，他先后翻译了 11 部外国著作，约 170 多万字，其中《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最为有名，人们通称为严译八大名著。

严复译著多是用意译。在译述过程中，常常参照自己的见解，用夹译夹议的方式，或者用按语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所以，他译的书，不能看成一般的译著，在很大程度上应视为他的著作。他对译书要求很严，主张译书要忠于原著，准确地表达原

① 严复：《有如三保》，《严复集》第 1 册，第 82 页。

② 严复：《保教余议》，《严复集》第 1 册，第 85 页。

意,文字要清晰流畅优美。这三点要求,他概括为"信、达、雅"三原则[①]。他的翻译,被誉为"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②],被称为"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③],康有为称颂他"译才并世数严林",把他与林纾并称。

严复译书是有所选择的,既不同于洋务派偏重在天文、数学、机械、汽轮制造等科学技术,又不同于林纾主要在文学艺术,而着重在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方面,他又把重点放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经典著作上,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政治学等等。他认为只有从这些著作中才能找到西方国家强盛的真正命脉之所在,其他那些都不过是"形下之粗迹"。他把译书与寻找救国道路结合起来,翻译《原富》是为了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翻译《名学》是为了用新的思想方法打破程朱理学的束缚,翻译《法意》是为了反对君主专制主义,倡导君主立宪制度等。在这些译著中,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是《天演论》。

《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选译的,原篇名叫《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用文言文意译了它的主要内容,并附加了自己的许多见解,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年12月)开始在《国闻报》上陆续发表。次年三月正式出版。《天演论》的基本思想是阐述达尔文的进化观点,认为生物不是自古不变,而是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所谓"物竞",就是生物之间"生存竞争",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所谓"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

① 〔英〕赫胥黎著,严复译:《天演论·译例言》,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② 吴汝纶:《答严几道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一。
③ 吴汝纶:《天演论序》,《严复集》第5册,第1318页。

就是说，生物的进化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发展变化的。在严复看来，《天演论》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质力杂糅，相剂为变”①。他反复宣传和强调这种“变”的观点，并利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向中国人民敲起了祖国危亡的警钟，大声疾呼：要顺应“天演”的规律，改革现状，变法维新，才能避免危亡之祸，否则，就会在“生存竞争”和“天然选择”中，被“优胜劣败之公例”所淘汰。严复以生物的“自然竞争”、“适者生存”来代替社会的阶级斗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在当时的中国，即将被列强瓜分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号召学习西方，“与天争胜”，“自强保种”，对唤起人民的觉醒，振奋民族的精神，变法自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启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打击了那些高唱“夷夏之辨”的封建顽固分子，揭露了他们愚昧腐朽的真面目，确有振聋发聩之作用。所以，《天演论》一发表，震动全国，“风行海内”。它给处于“学问饥荒”环境中的思想界，输送了新鲜的食粮，使人们禁锢的思想，为之一振。康有为读到这部译稿后，推崇严复所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②，并在《孔子改制考》中吸取了进化论的观点。如梁启超所说：“（康有为）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③梁启超根据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在《时务报》上大做文章，许多爱国志士纷纷以进化论为武器，要求改弦更张，另谋新路。人们和学校纷纷用“竞存”、“适者”、“演存”、“进化”、“进步”之类的词汇命名，一

① 《天演论》，第6页。

② 康有为：《与张之洞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525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时成为时尚。

《天演论》的发表,不仅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而且对行将到来的革命起了极大的影响。正如革命派所指出的那样"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①。

第四节 反对民主革命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其间,曾参与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并被推选为副会长。此外,他还开名学会,讲演名学(逻辑学)。从此,他脱离了海军界,离开了工作20多年的水师学堂。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严复被开平矿务局总办张翼邀去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这个局是在英国控制下的所谓"中外合办"企业。严复担任该局总办期间,"名为总办,其实一无所办,一切理财用人大权,都在洋人手里"。后来他自己说:"此来徒为五百番(银元)月入耳,其是非乐也。"

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准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李希圣为京师大学堂附设编译书局总纂、严复为编译书局总办。严复担任编译书局总办后,与吴汝纶同处京师,过从甚密,朝夕研讨新旧学问。光绪三十年(1904),严复辞去编译书局总办职务,回到上海。

① 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之政见》,《民报》第2期(1905年)。

光绪三十年(1904)冬,发生了开平矿业局诉讼事件,严复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次年,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获悉严复在伦敦,想争取他参加民主革命,特意去拜访了他。二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严复认为:"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①也就是说,严复坚持"渐进"的观点,认为应从教育着手;孙中山主张"急进",认为应立即进行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由于双方之间的观点、立场相距甚远,因而未能联合。

严复回国后,恰逢马相伯在上海筹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他在积极协助马相伯筹办学校的同时,应友人的邀请在上海青年会作了8次政治学讲演。他的讲演稿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政治讲义》。在讲演中,严复以政治同历史的关系及社会的演变来宣传他的"渐变论",抵制行将到来的民主革命。

严复协助马相伯创建复旦公学后,第一任校长为马相伯。光绪三十二年(1906)马去日本考察,由严复接替,成为第二任校长,但他仅接任几个月就辞职了②。严复辞去校长职务后,又被安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他在学校又大讲"立宪之君",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恩铭被刺,才离开这个学校。其间他曾去北京一次,被外务部尚书唐绍仪任命为游学

①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50页。
② 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第214—218页。

生毕业考试同考官，共录取了陈锦涛、颜惠庆等十三人，分别赐予进士和举人出身。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1905 年 12 月)，清廷增设学部，任命荣庆为尚书，主持学政。光绪三十四年(1908)，严复被荣庆聘为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宣统元年四月(1909 年 5 月)又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1910 年 1 月 17 日)，清廷赐予他文科进士出身。

宣统二年(1910)，清廷成立预备立宪机构资政院，严复"以硕学通儒"的名义，被"钦选"为资政院议员。同年十一月，清廷设立海军部，由于严复在海军工作多年，特授予他海军协都统衔。宣统三年(1911)，清廷又特授予他海军部一等参谋官等职务。

严复从戊戌维新变法失败以后，到辛亥革命前 13 年间，他虽表示"罢政归第"，不涉足政治，一心一意从事翻译著述，但并没有完全脱离清廷，相反，在清廷担任的职务比戊戌变法失败前更多。这时严复的思想不仅没有随时代的前进而进步，反而日益趋于保守。在《译〈群学肄言〉自序》中这样写道："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其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① 他一方面批评改良派，"攘臂疾走"，"旦暮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一方面攻击革命派，"搪撞号呼"，"盲进破坏"，从一个进

① 《严复集》第 1 册，第 123 页。

步的思想家走向保守的营垒。

1912 年 1 月 1 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结束了清朝 260 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严复虽然对清朝统治不满，但又认为“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富强之可跂乎？”又说：“吾国形势程度习惯，于共和实无一合。”①

第五节 保守复旧的落伍者

1912 年 3 月，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严复被任命为署理北京大学校长。11 月，他辞去校长职务。在辞职前的 9 月，还被北洋政府海军部编译处聘为总纂，辞职后又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统府顾问。

1913 年 9 月，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10 月 6 日，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后，感到国会是他搞专制独裁的障碍，竭力攻击国会的存在，是使“政权无由集中”，“不宜统一国家”，“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②。1914 年 1 月 10 日，下令解散国会，以“中央政治会议”来代替。但是，中央政治会议来历不明，不合乎法律手续，于是又制造一个“约法会议”。约法会议如同中央政治会议一样，是袁世凯一手操纵的御用工具。1 月 26 日，严复被举为约法会议的议员。3 月 18 日，会议正式成立，议员们按照袁世凯的旨意，炮制了一部专

① 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 3 册，第 603、660 页。

② 白蕉编：《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 111—112 页。

制独裁的《中华民国约法》,使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按《中华民国约法》规定:袁世凯政权的立法机构是立法院,同时设立一个被总统咨询的参政院。立法院议员由选举产生,参政院参政由总统简任。但即使由袁世凯一手包办选举的立法院,也始终未成立,一直由参政院代行职权。严复又被袁世凯简任为参政院参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严复将外国报纸上关于战争的新闻和文章,译成中文送给袁世凯备览。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当他知悉袁世凯有想当皇帝的意图时,就苦心相劝:"吾固知中国民智卑卑,号为民主而专制之政不得不阴行其中,但政体改变,已四年矣,袁公既有其实,何必再居其名。且此时欲复旧制,直同三峡之水,已滔滔流为荆、扬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必欲为之,徒滋纠纷","于袁氏有大不利也"。但袁世凯还是执迷不悟。1915年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时,严复与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6人被列为"筹安会六君子"。而列名筹安会,是杨度等强加给严复的,公诸报端也未取得他的同意。虽然,严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未赞一词",但这并不表明他认清了时代的潮流,反对帝制,赞成共和。相反,他仍然坚持君主立宪制度,只是反对操之过急,"窃意当时,假使政府绝无函电致诸各省,选政彼此一听民意自由,将赞成者,必亦过半。然后光明正大,择期登极,彼反对者,既无所借口,东西邻国亦将何以责言。释此不图,岂非大错",结果,"欲速不达","弄巧成拙"①。

在辛亥革命后,严复不仅在政治上倒退到顽固坚持复辟君

① 严复:《与熊纯如书(二十九)》,《严复集》第3册,第629页。

主，反对民主，而且在文化思想上由主张学习西方蜕变成提倡尊孔读经和维护封建道统。1913年，他同马其昶、夏曾佑、姚永概、林纾、吴芝瑛、梁启超等200余人发起组织孔教会，并以他为首领。孔教会成立后，他在《庸言报》上发表《孔教会序》，同年又在中央教育会发表《读经当积极提倡》的演说，以后又写《导扬中华民国精神议》，鼓吹尊孔读经，倡导忠孝节义，维护封建道统。他说："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①] 这样，由一个热心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积极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的革新者，变成了主张复古的落伍者。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各阶级各阶层都在作各自的表演。严复完全抛弃了宣传西学、提倡新学、追求光明与进步的革新精神，以维护旧思想、旧传统、旧观念的姿态出现，放言无忌，竭力反对"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他说："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②] 就是说，学生起来进行爱国运动，是徒劳的，无济于事的。他还辱骂攻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支持学生运动是："人格虽高，然于世事，往往如庄生所云，'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则人虽良士，亦与汪精卫、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诸公同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无

① 严复：《与熊纯如书(七十五)》，《严复集》第3册，第692页。
② 严复：《与熊纯如书(七十九)》，《严复集》第3册，第695页。

补，且有害也。”①

严复晚年患有哮喘病，久治无效。1921 年 10 月 28 日，这位名噪一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 69 岁。

① 严复：《与熊纯如书(八十一)》，《严复集》第 3 册，第 696—697 页。

第十八章　谭　嗣　同

第一节　为维新改革而献身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通眉生、寥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1865年3月10日）生于北京宣武城南烂眠胡同。谭嗣同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其父继洵（字敬甫），官至湖北巡抚。他幼年随父在京读书，师从浏阳学者欧阳中鹄。欧阳甚为推崇王船山的学术和气节，嗣同后来亦十分敬仰王船山，当受其影响。

光绪二年（1876）北京发生流疫，谭嗣同被染，昏死三日，后又苏醒，所以取号复生。在这次流疫中，他母亲和姐姐、哥哥等相继染疾而逝。其母死后，谭嗣同备受庶母虐待，亦遭其父歧视，心灵上受到极大创痛，后来他曾追述："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①] 他憎恨封建伦理，勇于为理想献身等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与他早年的遭遇不无关系。

谭嗣同早年就在京城结交了专以"锄强扶弱为事"的义侠王

---

① 《仁学·自叙》，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页。

五(世称大刀王五,名正谊,回族),向他学习拳击和剑术,后来"于文事之暇,喜欢技击,会骑马,会舞剑"①,即由此奠定了基础。王五虽为正统的封建士大夫所不屑,谭嗣同却与之始终保持了密切的友谊。王五那种桀骜不驯,英勇慷慨,以及对世俗的反抗精神,对谭嗣同当然也有影响。

光绪三年(1877),其父由京官外放,补授甘肃巩秦阶道。此后谭嗣同曾多次来往并居住于其父兰州任所,继续读书求学。他还常与父亲的役属奔驰于西北原野,穿山爬岭,踏沙涉水,打野生充饥,吃雪块解渴。晚间则架起帐篷,点起篝火,斗酒纵横,奏琴高歌。这种豪放不羁的生活与勇敢坚毅的精神,促使其喜"为驰骋不羁之文",好"讲霸王经世之略"②。

谭嗣同作为一个封建达官之子,其父迫切期望他通过科举道路,步入当时的统治集团。而就其个人说来,要施展自己的"经世之略",也难以抛弃科举之道。因此,他从光绪十年起至二十年止,10年之间,曾往来南北各地,主要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不料,却屡屡败北。但由此,往来南北各地,遍观社会风土,广览"形势胜迹",又目睹哀鸿遍野、灾民流离之状,大大加深了他对社会的了解,对下层苦难群众的同情,不禁产生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誓志做一些有利于振兴祖国的事业,因自号"壮飞"。

光绪二十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者,又于次年和日本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消息传

---

① 欧阳予倩:《上欧阳瓣薑师书序》,《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36页。

② 《报刘淞芙书一》,《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8页。

来，举国愤慨，康有为联合各省赴京应试举人，发动了有名的"公车上书"，揭开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深重的民族灾难，使谭嗣同受到极大刺激，以致悲愤高歌："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①]爱国主义激情促使他的思想起了急剧变化，他在给其密友唐才常的信中说："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②]他追悔自己"三十年前之精力，弊于所谓考据辞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③]，痛感到再不能抱残守阙，决心弃旧图新，走维新变法的道路。此间，他写了一系列论文，阐发其维新变法的观点和主张，脚踏实地地开始具体的改革活动，从"开风气"、"育人材"出发，联合有识之士，从本县、本省着手，筹办和创立算学格致馆、《湘学报》、时务学堂等。

正当谭嗣同积极地在湖南、湖北等地从事维新活动之际，他的父亲却为之捐资取得候补知府的官衔，且一再催促其到南京候补。为此，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离开武昌，北游访学。他先到了上海，访见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看到了万年化石、爱克斯光照相，还购买了一批西书，引起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再到天津，看到那里的机厂、轮船、船坞、火车、铁桥、电线、炮台，还参观了唐山的煤矿和漠河的金矿，认为"无一不规模宏远，至精至当"，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向往。在天津，他还加入了当地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在理教。继而，又到了北京，谒见了帝党要员翁同龢。

① 《有感一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40页。

② 《与唐绂丞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59页。

③ 《莽苍苍斋自序》，《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154页。

七月,谭嗣同到南京候补,在官场往来答拜中,他深察官场的黑暗与腐败。此间,他与精通佛学的杨文会“时相往还”,潜心研究佛学。同时,又到上海与梁启超、汪康年、吴雁舟等相交往。梁向他介绍了其师康有为的思想,使正在追求新知识的谭嗣同对康十分钦佩;梁启超也向康有为称赞谭嗣同“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公子之中,此为最矣”[①]。和梁启超的结识,使谭嗣同在官场的“空寂”中找到知音。因于这段时间,他多次往来南京、上海,一方面从事维新活动;另一方面与梁启超研讨学问,探讨变法理论,着手撰写其代表性著作《仁学》。

当维新变法运动日益发展起来之后,热心于维新事业的黄遵宪、徐仁铸、江标等先后到湖南任职,湖南巡抚陈宝箴也“一意振兴新学”。加之,当地的维新之士唐才常、毕永年、易鼐、樊锥等,也迫切盼望谭嗣同回湖南共谋维新事业。因此,谭嗣同应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毅然弃官,回归湖南,全身心地参加筹划湖南的维新之举:兴矿务、建铁路、创学会、办报纸,使湖南的维新活动大大向前推进。此间,谭嗣同尤为致力于《湘报》、时务学堂、南学会。如为《湘报》撰写《湘报后叙》近20篇文章,竭力使《湘报》成为维新事业的喉舌,为变法革新、提倡民权制造舆论。再如南学会成立后,谭嗣同亲任主讲,每到会“必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畅论当时中国情势之危急,激发听讲者的爱国主义热忱。当时,在南学会听讲的毕永年深有感受地说:“闻复生先生讲义,声情激越,洵足兴顽起懦。”[②] 谭嗣同期望通

① 叶德辉:《觉迷要录》卷4。

② 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08页。

过南学会等阵地,"群湖南者智湖南,又以智湖南者智中国。"①尔后,湖南各地的学会,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正由于谭嗣同等人的努力,使湖南的新学、新政广为推行,风气大变。曾有人评论说:"全省风气大开,君(指谭嗣同)之功居多。"②

湖南因"大行改革,全省移风",当地的顽固士绅、守旧党徒对此"疾之特甚"。王先谦、叶德辉等气焰嚣张,或"屡遣人至京参劾",或直接攻击维新党人"首倡邪说","背叛圣教","乃无父无君之乱党"③,甚至施展种种阴谋手段,"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④,还扬言要杀谭嗣同。张之洞也针对《湘学报》、《湘报》经常发表阐述民主、民权思想的文章,横加指责:"《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至匪人邪士,倡为乱阶"。面对顽固劣绅、达官权贵的破坏和威胁,谭嗣同义无反顾,毫不动摇。在反动势力的打击迫害下,当时时务学堂的教习,有的被解聘,有的因畏惧而离去,同时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对此,谭嗣同毅然表示:"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⑤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帝"诏定国是",明令变法维新。谭嗣同因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荐,被擢为四品军机章京,至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参与维新,时号

① 《群萌学会叙》,《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 430 页。
② 梁启超:《谭嗣同传》,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 546 页。
③ 苏舆:《翼教丛编》卷 5。
④ 梁启超:《戊戌政变纪》卷 3,《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 71 页。
⑤ 《上欧阳中鹄书(二十一)》,《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 474 页。

“军机四卿”。他应诏入京师，天真地认为“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决心“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①]，致力于变法维新。然而，随着维新改革的推进，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手无实权的光绪帝感到“朕位几不保”，密诏谭嗣同等设法营救。紧急无策之中，谭嗣同对袁世凯作了错误估计，深夜贸然私访，请其出兵营救。阴险奸诈的袁世凯，虚与应付之后，即叛卖告密。一场宫廷政变终于爆发，光绪帝被废禁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谭嗣同的密友义侠王五愿作保镖，护送其出京。日本公使馆也派人会见谭氏，愿设法保护。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谭嗣同大义凛然地表示：“大丈夫不做事则已，做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②]，并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③] 旋被执入狱。他在狱中犹题诗于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④] 在刑场上，他不顾监斩官刚毅的拦阻，临终犹自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⑤] 八月十三日(9 月 28 日)，谭嗣同被杀害，死时，年仅 34 岁。

谭嗣同的论著主要有：《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石菊影庐笔识》、《兴算学议》、《思纬壹壺台短书》、《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壮飞楼治事十篇》、《仁学》，以及大量

① 《致李闰》，《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 531 页。
②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国闻报》，《戊戌变法》第 3 册，第 423 页。
③ 梁启超：《谭嗣同传》，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 546 页。
④ 《狱中题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 287 页。
⑤ 《临终语》，《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 287 页。

书信与报章论文等。今人辑有《谭嗣同全集》。

第二节　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

谭嗣同作为戊戌维新运动中激进派的代表，其思想中最有积极影响的是他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由于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清朝统治的衰败腐朽也进一步暴露，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①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出现了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人物。谭嗣同的思想，正是作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又是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潮走向高潮的产物。谭嗣同进步社会思想中最主要、最深刻的内容，是鲜明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封建君主专制与纲常名教的猛烈批判的激进的民主思想。

爱国主义是谭嗣同进步社会政治思想产生的基础和出发点。他之所以走上维新变法道路，就是在甲午战争民族危亡的形势下，为救亡图强而弃旧图新。他在甲午战后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总结回顾过去，深深地探索、思考救国救民的方案。从爱国主义出发，他愤怒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约（指《马关条约》）中通商各条，将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4页。

兵权利权商务税务一网打尽";"自古取人之国,无此酷毒者"。[1] 为了使国家摆脱奴役地位,谭嗣同主张对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都必须针锋相对"以相抵御",而清朝统治者却一味割地赔款,屈膝求和。他们不仅不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反,却将"中国之生死命脉,惟恐不尽授之于人"[2]。谭嗣同还敏锐地看到,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紧逼,"台湾沦为日之版图,东三省又入俄之笼网,广西为法所涎,云南为英所睨。迩者胶州海湾之强取,山东铁路之包办,德又逐逐焉"[3]。中国实在是面临着"瓜分豆剖"的局面,因此,他在南学会的讲演,鼓动性很强:"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仆、当牛马的。诸君诸君!我辈不好自为之,则去当奴仆、当牛马之日不远矣!"[4] 他自己正是从爱国主义出发,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积极参加维新变法的实践,探研维新变法的理论,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

谭嗣同从历史的总结与现实的感受中,深深感到,要救国,要维新,必须冲破封建君主专制的牢笼禁锢。他在从事维新变法的实践活动与理论著述中,都对封建君主专制及纲常名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斗争。

谭嗣同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他对秦汉以来的封建社会作了鸟瞰式的考察后,概括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二者间的相互关系是"相交相资","惟大盗利用

---

①② 《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155页。
③ 《壮飞楼治事十篇》(增订本)下册,《谭嗣同全集》,第444页。
④ 《论全体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05页。

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1]，也就是说，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是强盗政治；专制主义的文化是奴婢文化。这些分析批判，一定程度上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十分尖锐和深刻。

封建专制主义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特征是君主独裁专制。对于君主专制的弊端，谭嗣同也予以尖锐揭露。他指出君主把天下作为囊橐中之私产，他们"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而且"供一身之不足，又滥纵其百官，又欲传之世世万代子孙"。专制君主几乎是封建社会中一切罪恶的渊薮。谭嗣同谴责专制君主是"独夫民贼"。君主既是"独夫民贼"，那么"彼君主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这些揭露批判，实质上是对君主专制的大胆否定，为其先辈和同时代的思想家所不及。

针对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种种倒行逆施，往往打着"君权神授"的招牌作为挡箭牌和护身符，谭嗣同吸收、利用了王夫之、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以及西方民约论的社会政治思想，论证了君的产生，以及君与臣民之间的关系。他详细论证了君的最早出现与举、废，悉听民意，并非君权神授。在君主专制的淫威笼罩一切的时代，谭嗣同敢于否定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剥落罩在君主脑门上的神光圣圈，无疑有进步历史意义。

对于维护封建专制的纲常名教，谭嗣同的批判尤为深刻有力。他说："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又说："君臣之祸极，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

---

①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37页。以下引自《仁学》者一般不另注，均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89—374页。

为害也”,“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倡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惨祸烈毒的纲常名教,不但压制了人们的自由言论,也禁锢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心灵。

在批判揭露封建专制与纲常名教的基础上,谭嗣同大声疾呼:要冲决封建君主之网罗,冲决封建伦常之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词章之网罗,冲决天命之网罗,总之,网罗重重,都要速其冲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冲破封建专制制度及其在各方面的束缚。因此,谭嗣同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誉为“冲决网罗”的反封建斗士。

谭嗣同作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自然要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争权力。他从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中得出结论:“中国所以不可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称赞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学说,认为“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倡民主之义”。

谭嗣同还赞美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认为机器、轮船、铁路、电线、矿山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与封建主义落后的生产技术和工具相比,“一世所成就,可胜数十世”。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谭嗣同建议“尽开所有之矿以裕富强之民”,广开财源,奋兴商务。这些思想主张,都是想要以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代替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

谭嗣同还把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直接与反清革命结合起来。他指出“《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他还指名道姓地揭露乾隆帝,“观《南巡录》所载淫掠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他甚至痛骂整个满族贵族为

"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反之，对于奋起反抗的太平天国革命，深表赞扬和同情，他说："洪杨之徒，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并驳斥封建统治者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诬蔑和诽谤，根据调查的事实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①

从谭嗣同对太平天国与湘军泾渭分明的不同评价，他对奋起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太平天国以同情赞扬；而对于死心塌地效忠于清朝封建统治的湘军进行公开的鞭笞和揭露，再联系到他曾表示："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表明他已萌生推翻清朝统治的民主革命思想。谭嗣同还曾热烈赞扬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遍地球，以泄万民之恨"，洋溢着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向往。这些都表明，谭嗣同正在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转化。梁启超曾评论谭嗣同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②

然而，具有反清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谭嗣同，在政治实践上却参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的变法改良活动，并在变法过程中殉难。这种矛盾现象，正是谭嗣同思想矛盾的反映。谭嗣同毕竟是个由改良派向革命派过渡的人物。他的思想中，充满了革命与改良、激进与缓变的矛盾。这些都反映了谭嗣同及其所

① 《上欧阳中鹄书（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66页。

② 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54页。

代表的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性和软弱性，正是这种矛盾性、软弱性的一面，造成了谭嗣同的历史悲剧。

谭嗣同固然在戊戌政变中殉难，但我们却不能像康、梁那样把谭嗣同的死简单地视之为“酬圣主”而殉节。从谭嗣同一贯的思想与行动看，他的死既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绝不只是为“酬圣主”而殉节。他的死既体现了他思想上的激进色彩，也是他那勇于献身思想的升华。

第三节　复杂多变的哲学思想

谭嗣同既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又是长于思辨的哲学家。《仁学》是谭嗣同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他本人在叙述其思想渊源时说：“凡为仁学者，于佛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①] 这里开列的书目和人物，既有属于唯物主义，也有属于唯心主义；既有自然科学，也有宗教神学；既有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也有中国传统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将彼此对立的思想熔于一炉，势必使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带有矛盾、复杂的特征。

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矛盾性、复杂性，表现在哲学体系的各个方面。他所运用的哲学概念，既有中国哲学特有的传统概念如

①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3页。

"仁"、"性"、"理"、"气"、"道"、"器"等，又有佛学的"唯识"、"法界"、"性海"，还有西方传来的"以太"、"原质"，乃至他个人造出来的"心力"等等。他在运用这些概念时，有时有明确的质的规定性，有时却又含糊不清。即以其两个主要概念"以太"和"仁"为例："以太"一般说来基本上是一个物质性的概念，是一种微粒子性的东西，如说："剖其质点一小分，以至于无，察其为何物所凝结，曰惟'以太'"；"更小之又小以至于无，其中莫不有微生物，浮寄于空气之中，曰惟'以太'"[①]。谭嗣同还说："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筦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立，众生由是出。"[②]这里所讲的"以太"显然是一个物质性的概念，而且是万事万物的本源。但在另外的情况下，他却又说："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③]；甚至说："以太者，亦唯识之相分，谓无以太可也。"[④]这里，"以太"又为精神性的"心力"所规定所支配，不过是心力的幻想和假借而已，或者是用以作为注释佛教的粗陋工具，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显然，"以太"又成为精神的从属品。"仁"也是谭嗣同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把这个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伦理学范畴，抽象提升为客观世界的规律。关于"仁"和"以太"的关系，通常情况下，谭嗣同讲得很明确："夫仁，以太之用"，"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佛谓之'性海'"，"耶谓之'灵魂'"[⑤]。就是说物质性

---

①②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4、295、293—294页。

③ 同上书，第291页。

④ 同上书，第331页。

⑤ 同上书，第293页。

的“以太”是规律性的“仁”的体，而“仁”则是“以太”的用，“以太”是本源的，第一性的，“仁”则是派生的，第二性的。“仁”和“以太”的关系，类似于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和“器”的关系，这当然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有时谭嗣同却又把“仁”抬到“以太”之上，认为“仁”比“以太”更为根本，“仁”是本源，是第一性的，“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①，“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②，又表现了唯心主义的观点。在认识论上，谭嗣同的思想也表现出尖锐的矛盾，他一方面认为“耳目之所构接，口鼻之所接受，手足之所持循，无往而非实者”③，认为感观认识的对象，都是客观实在。他还看到人的认识的相对性和客观真理的不可穷尽，强调“学当以格致为真际”，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点。但他却由强调认识的相对性，怀疑以致否认感性认识，认为“仅凭我所有之五(指五种感观)，以妄度无量无边，而臆断其有无，奚可哉”④，况且“眼有帘焉，形入而绘其影，由帘达脑而觉为见，则见者见眼帘之影耳，其真形实万古不能见也”⑤。他看到感观认识的局限，走向否认感观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可靠性、可能性，并进而陷入神秘主义，提出：“不以眼见，不以耳闻，不以鼻嗅，不以舌尝，不以身触，乃至不以心思，转业识而成智慧，然后‘一多相容’、‘三世一时’之真理乃日见乎前。”⑥竟连理性认识也否认了，企图以神秘的“智慧”，在冥蒙中达到对真理的“顿悟”，陷入了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泥坑。在谭嗣同

①②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2、291页。
③ 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4册，第248页。
④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17页。
⑤⑥ 同上书，第317、318页。

哲学体系中也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承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天阳也，未尝无阴；地阴也，未尝无阳。阳阴一气也，天地可离而二乎？”①。他还认为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体貌颜色，日日代变，晨起而观，人无一日同也。……则日日生者，实日日死也。天曰生生，性曰存存。继继承承，运以不停”②，又说：“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所谓新理、新事必更有新于此者。”③ 谭嗣同还认识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是通过对立面的矛盾斗争向前推进的，他说：“有好恶，于是有攻取；有攻取，于是有异同；有异同，于是有分合，有生克”④。他还认为大、小；长、短；多、寡；生、死；真、幻；彼、此；庸、奇等矛盾对立的方面，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但是，他不承认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夸大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否认了质的相对稳定性，不承认相对之中有绝对，如说：“何幻非真？何真非幻？”“何奇非庸？何庸非奇？”“无彼复无此，此即彼，彼即此焉”；又说：“何以有大？比例于我小而得之；何以有小？比例于我大而得之。然则但有我见，世间果无大小矣！多寡长短久暂，亦复如是。”⑤这就又走向了形而上学的相对主义诡辩论。梁启超曾评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

① 《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七)》，《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125页。

②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15页。

③ 《〈湘报〉后序(上)》(增订本)下册，《谭嗣同全集》，第417页。

④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10页。

⑤ 同上书，第316页。

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①

虽然,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从思想来源,到哲学概念的运用,以及其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无不充满矛盾,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学问饥荒”的时代,他的思想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有的早期民主革命者在回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时就说:“我们在最初,都是看了《仁学》一类的书,才起来革命的。”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71页。

第十九章 黄 遵 宪

第一节 “伸自主之权”、“保公众之益”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黄遵宪，字公度，号东海公、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布袋和尚、公之它、观日道人、拜鹃人。清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1848 年 5 月 29 日）生于广东省嘉应州（今梅州市）攀桂坊。高祖、曾祖、祖父均从商。父鸿藻举人出身，先后督办广西南宁、梧州厘务，署思恩府知府。

黄遵宪 9 岁即以“春从何处去，鸠亦尽情啼”诗句，对“一路春鸠啼落花”命句；又以“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破“一览众山小”题。同治九年（1870）始读《万国公报》和江南制造局译书，研究时务。同治十年以岁试第一名补廪膳生。翌年取拔贡生。同治十二年应广东省乡试。次年北上京师应廷试，在京结识友人，颇受同乡先辈何如璋（子峨）等推重。光绪二年（1876）中举，捐知县、道员。光绪三年随何如璋使日，任参赞官，开始了外交官生涯。

中国和日本具有悠久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而首次正式建交，是在光绪二年十二月（1877 年 1 月）。当时，清廷任

命何如璋为驻日公使。何如璋早闻黄遵宪“谈论时务之言论”①，奏请他为使日参赞。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77年11月26日)，黄遵宪随从何如璋等由上海登“海安”号兵轮赴日。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8日)，他随何如璋及副使张斯桂向日本天皇递交国书。

黄遵宪使日之时，正是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之初。几年间，日本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带有很大的封建性和军国主义性。日本明治维新后一直企图吞并我国琉球。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以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条约称日本吞并琉球的武装行动是“保民义举”。日本进而阻挠琉球向清政府进贡。光绪四年四月初七日(1878年5月8日)，何如璋致书李鸿章，主张“对此不得隐忍”，如若听之任之，日本“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轻，今日弃之患更深。”② 梁启超查阅过当时何如璋致总理衙门及北洋大臣文牍有关琉球事件的全案，往返数十函，十余万字，力主采取积极保护手段，其中出自黄遵宪之手者十之七八。十一月二十一日(12月14日)，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石川鸿斋笔谈，当谈到琉球问题时，黄遵宪指出：琉球“近为贵国小辈(执政之流)所欺凌。彼臣服我朝五百余年，欲救援之”，谴责日本统治者吞并琉球的企图，

① 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8，第2—4页。

"专属鼠偷狗窃之行,可耻孰甚"①。而掌握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却认为"琉球地处偏隅,当属可有可无",主张退让。光绪五年(1879),日本终于吞并琉球,将其改为冲绳县。

同治、光绪之际,俄国在我国西部侵略新疆的同时,又派遣海军游弋东部日本海和黄海,由北向南扩张势力,朝鲜面临俄国侵略的威胁。光绪六年(1880),黄遵宪在《朝鲜策略》引言中指出:俄国"十余年来,得桦太洲于日本,得黑龙江之东于中国,又屯戍图们江口","其经之营之,不遗余力者,欲得志于亚细亚耳",而朝鲜"实居亚细亚要冲,为形势之所必争"。"俄欲略地,必自朝鲜始"。因此,他认为"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黄遵宪主张朝鲜与中国、日本实行联合,以便抵御俄国的南侵,这表明他试图运用外交活动中的"抵制之法"②。

光绪八年三月(1882 年 2 月),黄遵宪奉命调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至十一年八月(1885 年 9 月)黄遵宪驻美期间,正是美国掀起排华高潮之时,黄遵宪针对美国排华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维护华侨利益和国家权益的活动。

光绪八年七月(1882 年 8 月),美国政府以从巴拿马来美的华商未领取中国官员的执照为词,对华商予以扣留。黄遵宪延请美国律师哈门,向美国司法部门据理力争,美国政府终于允许该华商上岸。经过黄遵宪的交涉,此后由他国来美的中国商人,不领取中国政府的执照,亦均准上岸③。黄遵宪兴奋地禀告郑藻

---

① 实藤惠秀、郑子瑜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 1968 年版,第 20 页。

② 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三十一号》,梅州市档案馆藏。

③ 参见黄遵宪:《上郑钦使第十九号》。

如:“自新例以来所蒙之耻辱,赖以一洒,差强人意。”①

美国排华新例不准华人假道美国。黄遵宪指责这是“背条约,妨国例,且有违公法”的,表示要“与之力争”,“争之亦终必收效”②。例如:有华人从旧金山出境,船经英属域多利,绕至飘地桑,美国海关不许入境。经黄遵宪驰电说明,其人系由美境过美境,获准放行。又有华人从呢托来出境,车过英属问拿打,到亚加拉格,被关吏阻留。中国户部以其车票为凭,证明这也是由美境至美境。黄遵宪认为这两例“可以引作华工假道榜样”。又如:有由古巴领取护照来美的华商,纽约海关不许放行。黄遵宪认为这“可作华工假道的引线”③,交涉的结果,美国司法总长通知外交部:“华工假道美境与续来佣工不同,不能作为有犯限禁华工新例。华商人等由他国来美,及曾居住美国再来与执领事护照而再来者,均得通行;华工假道旧金山往他处者,亦由领事给照,不受留难。”对此,旅美华商华工,“无不感戴恩泽”,“忻慰之至”④。

旧金山从事洗衣职业的华人,据黄遵宪当时统计,有五六千人。美国排华期间,便以洗衣馆衣服堆积,易于火灾,用水过多,洗涤不净,喧扰邻居等理由为借口,限制华人以洗衣为业。黄遵宪一方面聘请律师与当局争讼,一方面要求洗衣馆“妥立章程,自行检点”⑤,以免授柄于美国当局。

美国官吏还以不卫生为由,逮捕了许多华侨。黄遵宪亲自到监狱看望被捕华侨。他让随从人员测量关满华侨监狱的面积,质

---

① 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二号》。
②③ 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八号》。
④⑤ 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九号》。

问美国官吏:“此处卫生,顾右于侨居耶!”[①] 美官吏理屈辞穷,只好释放被捕华侨。

光绪八年,美国商人要在上海使用机器纺织绸缎,上海海关出于保护民族手工业考虑,加以阻止。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照会总理衙门,加以指摘。总理衙门指示驻美公使郑藻如了解旧金山华商购买土货制造销售的情况,以资交涉参考。黄遵宪经认真调查研究后认为:“在中国地方容外国商民以手艺改造土货销售犹可,用机器则万万不可”。其理由:一是西方商务发达,商人“类皆能尽智能,以争锥刀之利”,外商购买土货制造物在本地销售,本国商人则以雄资与之竞争,外商便无法获得利权;反之,中国商人资金薄弱,彼此之间又“分门别户,各行其业,势如抟沙,团结又万不能敌西人纠股公司之力之大”。二是西方各国关税自主,而中国的现状是,“税权既不能自主,洋商又无从管辖”。如准许外商以手艺制物,中国商民具有工贱耐劳的优势,尚可与之竞争。外商若采用机器织造绸缎,进而缝制衣裳,再进而制作靴帽,“乃至一切以人工制造之物均可以机器夺之,中国商工恐将尽失其业,流离失所”[②]。黄遵宪支持抵制外商在上海采用机器制造商品销售的主张,这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带有保护本国土货,维护民族工商业利益的意义。

光绪十五年(1889)冬,经袁昶向驻英法比大臣薛福成密荐,黄遵宪被任命为驻英使馆二等参赞。光绪十六年正月十六日(1890年2月5日),黄遵宪由香港登轮赴英,三月抵达伦敦。次

---

① 《清史稿》卷464《黄遵宪传》。

② 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三十一号》。

年七月，薛福成推荐黄遵宪任新嘉坡总领事，兼辖槟榔屿、马六甲和附近各岛，以代替原驻新领事左秉隆。薛福成认为黄、左二人“历练有识，持己谨严，接物和平，允堪胜任”①。

黄遵宪到任伊始，即指出国内存在视归国南侨为“鱼肉”，“每每勒索讹诈”的现象，达不到目的，“则有以富商而指为贩卖猪仔者，以良民而诬为曾犯奸盗者”②。光绪十九年(1893)，黄遵宪又上书薛福成，申述这样的情况：侨居南洋的华人，居有百年，他们的“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丧宾祭，亦沿旧俗”。他们对国内“筹赈筹防，多捐巨款”，表现出“拳拳本国之心”。然而他们却受到国内某些“官长之查究，胥吏之侵扰，宗党邻里之讹索”，有的被“指为逋逃者”，有的被“斥为通番者”，有的被诬为“偷运军火、接济海盗者”，有的被告为“贩卖猪仔，要结洋匪者”。他们在国内受到迫害“有强取其箱箧，肆行瓜分者；有拆毁其屋宇，不许建造者；有伪造积年契券，借索逋欠者”。这些华侨“一遭诬陷，控诉无门，因是不欲回国”。黄遵宪针对上述对待华侨的错误行为，提出“今欲扫除积弊，必当大张晓谕，申明旧例既停，新章早定，俾民间耳目一新，应有裨益”③。薛福成在黄遵宪申述上加“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批语，并上奏光绪帝。同年八月初四日(1893年9月13日)，光绪帝下谕准许华侨归国，严禁骚扰勒索华侨。

光绪二十年(1894)，黄遵宪从新嘉坡离任回国后，奉命办理

① 《薛福成日记》第4卷(光绪十六年十月二十日)。

② 高维廉：《黄公度先生就任新嘉坡总领事考》，见郑子瑜：《人境庐丛考》，香港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6页。

③ 《人境庐丛考》，第129—130页。

江苏、江西、浙江、湖南、湖北5省未结的教案。清政府地方官吏往往不认真研究中外约章，对外国传教士不分别情况，一律视为外国所派的官吏，视教民如本国化外之民，因而“教士之把持，教民之恃势，平民之积怨者，固不能为外人咎，而教士之横行图赖，伪造契据，借端恐吓，甚至擅用平移总督之官封文套者，亦未尝无人”。黄遵宪依据有关约章，检查证据，区别对待，“应予则予，应斥则斥”①，数十年悬而未决的江南5省教案，在几个月内得到妥善了结。

光绪二十一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授予黄遵宪为全权代表，与日本领事、“第一流外交家”珍田舍己交涉苏州通商口岸事宜。在交涉过程中，黄遵宪“一月三往来”于苏、杭、沪之间，同珍田“斗唇舌”②。他戳穿日方对《马关条约》有关条文的歪曲，指出条约所载添设通商口岸，只许日本通商，所云“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是承接上文日本臣民“从事商业、工艺制作”而言，并没有允许苏州成为日本租界地。他还提出了一份通商议案，其主要内容有：日商需地多少，许其随分租赁；道路各项，许其不纳地租，租期十年以内，留给日本，杂居华人，归中国自管；道路公地归中国自筑③。这些内容实际上否定了日本租借苏州的要求。黄遵宪据理力争，珍田莫能反驳。日本政府以珍田在交涉过程中“辱命”而撤职调回日本。然而，最后清政府屈服于日方压力，黄遵宪苦心拟定的草约终被作废。

---

① 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人境庐集外诗辑》“附录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7页。

②③ 《寄女》，《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23页。

第二节 著《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

黄遵宪踏上日本国土，目睹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新貌，如同看到“中华以外天”①，视野为之扩大。他立志撰写一部《日本国志》，以备“朝廷咨诹询谋”，帮助朝野上下了解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的过去和现在，改变“狭隘”的思想，打破“荒诞”的闭关自守局面。他在繁忙的外交活动之余，主动结交日本朋友，采风问俗，网罗旧闻，参考新政，查阅资料，克服语言文字障碍、参考资料欠缺和校雠编辑等困难，“朝夕编辑”，在离开日本时，《日本国志》“甫成稿本”。他调往旧金山后，因总领事的政务忙碌，编撰工作几至中辍。光绪十一年(1885)秋，黄遵宪由美请假回国，先去梧州看望其父，接着回到嘉应州。他集中时间和精力，修改《日本国志》，终于在光绪十三年四月(1887 年 5 月)完成了《日本国志》的撰写。全书包括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和工艺志等 12 类，共 40 卷，约 50 余万字。这是中国人纂写的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和介绍日本的通史。黄遵宪坚持“详近而略古，详大而略小”② 的原则。特别强调“牵涉西法，尤加详备”③，把介绍日本学习欧美、进行“革故鼎新”的明治维新以后的现状作为重点，以期适用于中国社会的需要。

① 《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 340 页。

② 《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 284 页。

③ 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

《日本国志》写就后，曾呈送总理衙门，希望引起清政府有关当局的重视，但却被束之高阁。光绪十六年(1890)始由广州富文斋出版初刻本，同年又出改刻本。其后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浙江官书局的重刻本，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的排印本和汇文书局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书局的石印本等，均从光绪十六年的改刻本。

《日本国志》考察了日本历史，指出日本的发展，"无一事不资之外人"：明治维新前，日本"无一不取法于大唐"；明治维新后则"无一不取法于泰西"①，从而使国家由贫变富，由弱变强。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尤注意于求富"②，把"繁殖物产、保护本国物产"作为"先务"③，"观其学校，分门别类，亦骎骎乎有富强之势"④。与之相反，中国长期以来"视一切工艺为卑卑无足道"，把"制器利用之事，第归于细民末匠之手"，"士大夫不复身亲"⑤。他认为"今之中国，在兴物，以保商务"⑥。为此应该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应当"降心以相从"，借资于欧美之法，"以中土之才智，迟之数年，即当远驾其上，内则追三代之隆，外则居万国之上，吾一为之，而收效无穷"⑦。

黄遵宪在书中介绍了日本的财政状况，他主张中国一方面可以对西方国家实行的租税办法，"择要而行之"，一方面要取国

---

① 《日本国志·邻交志》。
② 《日本国志》卷15《食货志》一。
③ 《日本国志》卷38《物产志》一。
④⑦ 《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一。
⑤ 《日本国志》卷40《工艺志》。
⑥ 黄遵宪致蔡毅若观察书。

内“旧有之利,祛中饱之弊,还于朝廷,而公于天下”,使岁入常税“骤增五六倍”,这样“国用匮乏,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即可克服,而制造轮船、铁路等“一切富强工具”[1]的经费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日本国志》还介绍了祭祀、婚娶、丧葬、服饰、饮食、居处、乐舞、游宴、神道、氏族和社会等历史状况及明治维新后的变化,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礼和俗“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是“因人情而为之”。所谓“人情”,就是人们的习惯。因而治国化民,必须重视人们的习惯。一种风俗一旦形成为习惯,就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故于习惯之善者导之,其可者因之,有弊者严禁以防之,败坏者设法以救之”[2]。黄遵宪之意显然是希望改变当时中国的风俗习尚。

黄遵宪把撰写《日本国志》搜集到的“旧闻”和“新政”中的“杂事”,以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为次,“衍为小注,胪之以诗”[3],集成一本七言诗集《日本杂事诗》。光绪五年(1879),北京同文馆聚珍本《日本杂事诗》是最初版本。翌年,香港循环报馆重印,继而日本凤文馆,中华印务局,日本东京、京都,广西梧州,湖南长沙等先后翻印,均为二卷本,卷一73首、卷二81首,凡154首。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任驻伦敦参赞期间对《杂事诗》进行了修改,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长沙富文堂出版修订本。他郑重声明:“此乃定稿,有续刻者,

---

① 《日本国志》卷16《食货志》二。

② 《日本国志》卷34《礼俗志》。

③ 戊戌四月《日本杂事诗·后记》。

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①] 定本把原本诗154首中删去12首，修改了28首，增补了58首，共辑200首。

《日本杂事诗》是一本介绍日本历史的史诗，其目的是用以答"友朋贻书询外事者"[②]。它与备"朝廷咨诹询谋"的《日本国志》是姊妹篇。这两部著作在中国近代史学史和诗歌史上都是开创性的著作，对帮助中国朝野上下了解日本和世界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作了舆论准备。

第三节　"欲捐其躯以报国"，"志在变法、在民权"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爆发，清军屡遭挫折。十月，黄遵宪奉新任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之命，由新嘉坡总领事任上回国，协助筹办军务。他到南京(江宁)谒见张之洞时，"昂首，足加膝，摇头而大语"。张之洞对他目无权贵的表现颇为不满，于是"置之闲散"，改委其为江宁洋务局总办，办理江南5省未结的教案。黄遵宪对此委任虽"甚不乐"，但他仍然关注着中日战争的形势。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1895年3月23日)，他听到日舰侵占澎湖的消息，以沉痛的心情写下《乙未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肃公祠》诗，缅怀曾坚决反对日本吞并琉球、抵抗日军侵犯台湾的沈葆桢，歌颂正在中日战争前线为国捐躯的将士，谴责"仰求敌国垂哀怜"的官吏。五月，他到湖北办理教案，与友人游览黄鹤

①② 《重刻日本杂事诗自序》。

楼,"忽闻台湾溃弃之报,遂兴尽而返"①。

中国战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黄遵宪痛心地指出,这个条约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赔款二万万两,不仅把"东南诸省所恃以联络二百余年所收为藩篱者","拱手而让之他人","而且敲骨吸髓,输此巨款,设机造货,夺我生产",损失巨款,后患无穷。他叹息"新约既定,天旋地转","时势至此,一腔热血,无地可洒"!想想自己"为一卑官,不与闻其事",不知当道者将"何以善其后"。他"不忍见此净土化为腥膻",以至于一时产生过"被发入空山"② 的消极念头。

甲午战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一个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高潮也随之涌起。黄遵宪也在战后从爱国逐步走上变革社会实践的道路。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设立了北京和上海强学会。在当时黄遵宪的心目中,康有为"聪明绝特,其才调足以鼓舞一世",表示"强学会之设,为平生志事所在,深愿附名其末"③,嘱梁鼎芬"代签名"④,参加上海强学会,成为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强学会被迫解散后,光绪二十二年,他联络梁启超和汪康年等创办上海《时务报》,带头捐款 1000 元作为经费,继续鼓吹变法图存思想。

是年九月,黄遵宪由上海北上京师,受到光绪帝的破格召见,并询问政见。光绪帝问:"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黄遵宪答:

---

① 《上黄鹤楼》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 764 页。

② 黄遵宪《致建侯书》,转引自麦若鹏:《黄遵宪传》,第 67 页,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③ 《黄遵宪致梁鼎芬书》,首都博物馆藏手稿。

④ 《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 842 页。

"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泰西之强，悉由变法"①。他在京期间还会见了户部尚书翁同龢。翁称赞他诗文皆佳②。

黄遵宪到日本后，"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主张中国实行民主国政治。经过驻美三年，所见所闻民主国的弊病甚多，使他"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改变主意，主张采取"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③。他曾向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说出了蓄积胸中多年的观点："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④ 光绪二十三年，黄遵宪出京师，赴湖南长宝盐法道任。他抵湘后，与巡抚陈宝箴以及江标、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梁启超、皮锡瑞等人密切合作，积极推行新政，从光绪二十三年八月至二十四年三月间，先后设立了湖南南学会、湖南保卫局、湖南迁善所、湖南课吏馆，开办时务学堂，组织不缠足会等。他亲自为湖南南学会发表讲演，公开鼓吹"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敝"。一时湖南成为戊戌变法运动中声势最大、影响最大的省份，对全国变法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黄遵宪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受到光绪帝等人的重视。光绪二十四年二月（1898 年 3 月），光绪帝命翁同龢再索一部《日本国志》。四月，徐致靖上奏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光绪帝谕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无论行抵何处"，"传令

① 《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 838 页。

②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③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④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新民丛报》第 13 号（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一日）。

攒程迅速来京"[1]觐见。六月，授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充任出使日本大臣。黄遵宪因病，未能立即就道，留沪治疗。

戊戌变法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是年闰三月(1898年5月)，张之洞幕僚梁鼎芬就攻击康、梁"昌言变教"，"乘机煽动"，黄遵宪与他们"同恶相济"，"名为讲学，实与会匪无异"[2]。他致电威胁黄遵宪"勿从邪教，勿昌邪说，如不改，弟不复言"[3]。五月二十二日(7月10日)，王先谦等湖南绅士函告在京湘籍官吏，指责黄遵宪和陈宝箴等在湖南实行新政，"不守祖宗成法"。湘籍京官便通过徐树铭"据情揭参"黄遵宪等。戊戌变法后，工科给事中张仲炘上奏慈禧太后，说黄遵宪"与康有为、孙文同为日本兴亚会总董，现皆将来京，预备召见，不可不防"[4]。黄均隆奏称黄遵宪的"奸恶与谭嗣同辈等者"，"请旨饬拿"，"从严惩办"[5]。还有人谎报康有为藏在上海黄遵宪住处。上海道蔡钧派兵200多人包围黄遵宪寓所，"捧枪鹄立，若临大敌"[6]。由于日本使馆的干预，并且已知康有为逃往香港，蔡钧方才撤围。最后，清廷给黄遵宪罗列了散布"非圣无法之言"，"推崇西教"，"诋毁朝政"，"创为民主民权之说，尊康有为曰'南海先生'"等罪名，撤销驻日公使的任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1898年10月11日)，

---

① 《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40页。

② 《梁节庵太史与王祭酒书》，《翼教丛编》卷6。

③ 《致湖南署臬使黄公度》(闰三月二十四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1页。

④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71页。

⑤ 同上书，第472、473页。

⑥ 《放归》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76页。

黄遵宪怀着“欲捐其躯以报国”、“志在变法在民权”[1] 而壮志未酬的心情，拖着憔悴的病体，被“放归”广东嘉应原籍。

第四节　倡导“我手写我口”的晚清新派诗人

黄遵宪是清末著名的新派诗人。他十五六岁“即学为诗”[2]，一生诗作除史诗《日本杂事诗》外，还写有题材广泛的诗篇，但“所作诗多随手散佚”。光绪十五年使英期间，他“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荟萃成编，借以自娱”[3]。光绪十八年编成《人境庐诗草》4 卷，收录此前的诗 247 首，未曾刊行。光绪二十四年，黄遵宪“放归”嘉应，购筑“人境庐”，继续编著《人境庐诗草》，辑成 11 卷，按年编次，生前亦未印行。宣统三年，诗集首次刊印于日本，由从弟黄遵楷初校，部分经梁启超复校。之后有 1926 年出版的古直笺注的铅印本，1930 年北平文化学社印行的高崇信、尤炳圻校点本，1931 年上海出版的黄能立重校本，1936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钱萼孙（仲联）笺注本，1957 年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钱仲联新式校点笺注本，198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重排本，共收古今体诗 641 首。此外，1960 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人境庐集外诗辑》，辑录《人境庐诗草》以外的黄遵宪诗 260 首，其中 94 首系《人境庐诗草》初稿所辑，定稿本删去的。

---

①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② 《人境庐诗草自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 3 页。
③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三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4 页。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1] "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2] 这是黄遵宪诗歌创作的主要思想。

黄遵宪的许多诗充满炽热的爱国激情和忧国忧民的情感。同治十一年他到香港，眼见30年前被英国割让去的香港如今"居然成重镇，高垒矗狼烽"，不禁感叹"山头风猎猎，犹自误龙旗"，认为割让香港，是因清政府的"自误"。《琉球歌》，记述光绪三年使日抵达神户时，一位"颓髻斜簪衣惨绿"的琉球"白头老臣"，登上使团轮船"倚墙哭"，出示国王密敕，诉说琉球受日侵吞之苦，恳请清皇朝援救。《冯将军歌》歌颂冯子材在中法战争镇南关龙州战役中，英勇打击法国侵略军的爱国行为。《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降将军歌》、《台湾行》和《度辽将军歌》等，讴歌了甲午战争中坚持抗日的爱国将士，鞭挞贪生怕死的文官武弁。《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闻车驾西狩感赋》、《闻驻跸太原》、《闻车驾又幸西安》、《聂将军歌》、《奉谕改于八月二十四日回銮感赋》、《和议成志感》、《启銮喜赋》和《车驾驻开封》等，是一组反映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往西安，清将领聂士成抗击侵略军，为国捐躯，以及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史诗。晚年他还写有《出军歌》八首、《军中歌》八首和《旋军歌》八首，每首末字联起来为"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3]。这是鼓舞斗志的爱国主义战歌。

---

① 《杂感》,《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42页。

② 《人境庐诗草自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页。

③ 《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1264页。

黄遵宪认为变法维新已成为一种趋势，并且积极参与维新活动。戊戌政变，一批维新志士或流血牺牲，或受到迫害。《己亥续怀人诗》抒发了黄遵宪对维新派人物陈宝箴、徐致靖、张元济、江标、徐仁铸、严复、夏曾佑、皮锡瑞、欧阳中鹄、唐才常和麦孟华等的深切崇敬和怀念之情。

黄遵宪的诗继承了中国传统诗歌的优点，不仅反映社会生活，而且善于吸收民歌风格。他在《山歌》序中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采其能笔于书者得数首。"[①]他的《新嫁娘》、《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②] 等，也都是有浓厚民歌色彩的作品。

黄遵宪的诗在晚清有重要的影响。康有为说："公度之诗乎，亦如磊砢千丈松，郁郁青葱，荫岩竦壑，千岁不死，上荫白云，下听流泉，而为人所瞻仰徘徊者也。"[③] 梁启超的评价是："近世诗人，能熔铸新思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④] 胡适认为"黄遵宪是有意作新诗的"[⑤]。郑振铎认为，"欲在古旧的诗体中，而灌注以新鲜的生命者"，"惟遵宪是一个成功的作者"[⑥]。

黄遵宪诗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他写的关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的作品，则表现了他对民众斗争的错误态度。

---

① 《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 54 页。

② 《人境庐集外诗辑》，第 8—11、62—67 页。

③ 《人境庐诗草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 1 页。

④ 《饮冰室诗话》(四)，第 3 页。

⑤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118 页。

⑥ 《文学大纲》(4)，商务印书馆 1927 年版，第 611 页。

第五节 革职回乡,未忘尽"生人应尽之义务"

黄遵宪被革职回乡后,遂退出了政治舞台。两广总督李鸿章屡次请他协办广东巡察和矿务,均被谢绝。但他犹未忘欲尽"生人应尽之义务"①。

兴办教育是黄遵宪放归后的重要活动。"深知东西诸大国之富强由于兴学,而以小学校为尤重,名之曰普及教育。"② 他认为应通过普及教育来提高人们的爱国心和团结力,"虽责效过缓",然而"此乃救中国之不二法门"③;并奉劝同乡有识之士"同心协力,亟起而图之"④。光绪二十九年,他曾联络一批地方文人,设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所长。

黄遵宪主张发展教育,"必须先开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年,他把原东山书院改为师范学堂,计划一年免费培养各乡推荐的师范生 200 人左右。他还派遣杨徽五、黄之骏去日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为东山师范学堂培养师资。

黄遵宪还要求各村乡成立兴学公所,做好 6 至 14 岁小学适龄幼童人数的调查工作,选择好办学处所,必要时可借用乡村神庙佛寺,扩大小学入学人数。其目的"系专为大局计,专为将来计"⑤。为解决"有心向学之士,现在年既长成者无地就学"的困难,黄遵宪还打算设立补习学堂,"兼综各科而择行之"。对那些偏僻闭塞的村邑,黄遵宪提出开设讲习会的设想,"略仿专门学

①③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②④ 黄遵宪:《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⑤ 《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校，俾分科肄业，以期速成”[1]。

黄遵宪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中国革命与立宪之说开始进行激烈论争的时候。他曾抱着中国应“以立宪为归宿”的信念投身于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失败被放归数年后，他的信念依然“未改”。然而，他既对当时盛行的“立宪之说”“缄闷而不敢妄言”；又对“提倡革命、主持类族”，“闻之而不以为妄”。黄遵宪持这种态度，是因为他认为，“必有此数说者各持戈矛，互相簧鼓，而宪政乃得成立”[2]。

在对待中西学问题上，黄遵宪指出：“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他主张“中国固有之学”要在“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3]中加以发扬光大。晚年，他把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供养案头 3 年，还阅读了严译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名著《原富》和《名学》[4] 等。

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慈禧太后宣布实行“新政”，以遏止革命运动的兴起。黄遵宪对“新政”曾抱有幻想，“私谓我目的庶几可达矣”。然而事实很快令他失望。次年，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今回銮持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辗转迁延，卒归于绝望。”[5]他还表示：“今日当道实既绝望，吾辈终不能视死不救。”他以为挽救的宗旨、方法和策略，“当避其名而行其实”[6]。黄遵宪在伦敦曾染上了肺病，光绪三十年底(1904)，病情加重，他作《病

---

① 《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②③⑤⑥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④ 《黄遵宪致严复书》，吴天任：《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178 页。

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诗,写道:“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① 他断言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势必取代封建帝制,中国将如睡狮惊醒。

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黄遵宪知道自己的病“在今日医术中,尚无治疗之方”,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表示:“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灭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无益于群,则颓然七尺,虽躯壳犹存,亦无异于死人。无辟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② 黄遵宪临终前的这段话,可以说是他对自己晚年生命价值的评价。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905 年 3 月 28 日),黄遵宪病逝于故乡。

① 《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 1075 页。

②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第二十章 张　謇

第一节 从状元到资本家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通州(今南通)人。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出生于一个富农兼小商人家庭。5岁就读于乡间私塾。16岁考取秀才。19岁以后热衷于攻读桐城派古文和宋儒著作。

同治十三年(1874)，因家道中落辍学。22岁的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原通州知州孙云锦，在孙所负责的江宁发审局任书记。当时南京有几个大书院，山长都是国内知名学者，张謇经常向他们请教"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其中尤以凤池书院山长桐城派大师武昌张裕钊对他影响最大。光绪二年(1876)夏，张謇应庆军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幕府，是为他政治生涯之始。

光绪六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在京师结交袁昶等名士，见闻渐广。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当时边疆危机已渐趋严重，日、俄加强侵略朝鲜，意在染指中国东北。光绪八年(1882)，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张謇随庆军从海上疾趋汉城，协助朝鲜国王恢复统治，暂时杜绝了日本发动侵

略战争的口实。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增长了阅历，并且以处事冷静而又干练受到赞誉。他曾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

吴长庆、张謇的建议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但却受到对外主张妥协的李鸿章等实权人物的冷遇。吴长庆于光绪十年(1884)奉调回国，驻防金州，不久郁郁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基本上结束了长期寄人篱下的游幕生涯，重新致力于科举考试。

张謇于光绪十一年前往京师参加顺天乡试，以第二名中举，时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四次参加会试均遭蹉跌，这不能不使张謇为之心灰意懒。他回顾自己从同治七年(1868)到光绪十八年(1892)，总共25年的时间，经县、州、院、乡、会等各级考试20余次，其中仅直接消磨在考场中的时间就有120天之多，结果无非是供考官"喜怒而寒燠之"。失意之余，他把自己多年所用的一套考具也丢掉了。

但是，这些年张謇也不是毫无作为。光绪十三年(1887)曾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以后，又曾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洲书院，讲学著述之余还兼事县志纂修工作。同时，张謇又开始了"经营乡里"的活动：一是办理通海地区的花布减捐；二是提倡改良和发展蚕桑；三是协助筹办滨海渔团，防范法国侵略者从海上侵犯。他明确提出"欲固国必去厘捐"的口号①，并且主张改良农

① 《张季子九录·文录·致黄学使函》。

业、采用机器和集资兴办公司，说明他已初步具有维护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倾向。同时，通过这些活动，张謇与通海地区的花布商、典商、木商、烟商、纸商、洋药商和一般中小地主及富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正是这些人，以后成为大生纱厂创办时期的主要支持力量。

光绪二十年(1894)春，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会试，一举高中一甲一名，循例授翰林院修撰。不久，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九月，他单独上《推源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悲愤陈言："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但能漫为大言，……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① 在对李鸿章罪行的愤怒谴责中，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精神。但是，"清流"们的激昂议论往往流于迂阔的空谈，提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他们自身缺乏实力作为后盾。

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张謇认真组织训练民团，曾起草《海门团防营制》、《民团续议》等条例文

①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件，还写过一首《通海劝防歌》。歌词以通俗的语言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残暴罪行，激发人们奋起保卫乡里，鼓舞练勇战斗信心。但由于清廷很快就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通海团练未及接受实战检验便半途而废。

张謇愤于清廷的“昏聩”，同时又深忧外资于内地设厂，将会导致“尽撤藩篱”、“喧宾夺主”的恶果，因此产生“实业救国”的思想。他在光绪二十一年夏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比较明确地主张：尽速讲求商务、工艺、采取保护政策，各省设立商务局、工政局，提倡招商设局、建立公司，以谋抵制洋货倾销。他认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应该奉行“商办官助”的方针以发展民族近代工业。次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和在籍前国子监祭酒陆润庠、在籍前礼科给事中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丁立瀛在镇江无所作为，可是张謇与陆润庠却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这就是清末流传一时的“状元办厂”的故事。

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请领“官机”折价作为“官股”，以求解决集资难题。所谓“官机”共 4 万余纱锭，原系张之洞于光绪十九年(1893)为湖北南纱局向地亚士洋行定购，闲置堆放在杨树浦江边已经整整锈烂了 3 年。就这样几经周折，拖到二十四年(1898)，大生纱厂才正式在通州城西唐家闸破土动工。次年(1899)，大生纱厂总算建成投产。但开工以后需用棉花日多，资金周转更加困难。张謇再次向官府求援，结果碰壁而归；请求另派股富绅商接办，又未能得到许可。张謇等走投无路，只有“定计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至不能有花纱，则停车而闭厂，

以还股东"①。纱厂刚刚开工就准备出让、停车、闭厂，可见幼弱的民族近代工业前景是多么暗淡。

幸好这几年华洋机纱已经在通海地区畅销，纱价一直看涨。大生纱厂利用当地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而且又可以节省大量长途运费，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当年秋天，卖纱所得价款日益增多，原料得以供应不缺，大生纱厂总算初步站稳了脚跟。大生纱厂的利润逐年增长，光绪三十年(1904)，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三十三年(1907)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县)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这就是张謇进一步创办各种企业的本钱。

为了给大生纱厂提供廉价原料，张謇着手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光绪二十六年(1900)秋，洋纱进口由于义和团运动而锐减，大生纱厂产品畅销，促使张謇急于用企业方式解决原料基地问题。在此后将近1年的时间里，勘测地界，起草章程，并初步筹集到一批资金。基建工程于光绪二十七年冬正式开始，整整花去10年时间才算粗具规模。垦牧公司在创建阶段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地权纠纷，一是风潮灾害。

垦牧公司以平均每亩一钱九分低廉地价领得的12万多亩土地，看来好像是无人过问的荒滩，实际上原有产权关系却极为复杂。其中既有属于淮南盐场的"荡地"，属于苏松、狼山两镇的"兵田"，又有属于民间"坍户"、"酬户"、"批户"等原业主或土地实际占有者的各种名义土地，而且犬牙交错、界限不清。张謇依

① 《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上册，大生纱厂。

靠刘坤一等高级官员的支持,并且通过当地豪绅大户的斡旋,整整花去8年时间才把这些土地的产权逐个清理收买完毕。

狂风巨潮给公司和垦区农民、民工带来更大的危害,堤、闸、渠、路等基建工程经常是在与狂风急雨、骇浪惊涛相搏中进行。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夏,好不容易修成7条堤和一部分河渠,并且开垦了7000亩土地。可是一场持续5昼夜的大风暴突然降临,新成各堤都被冲毁,牧场羊群散失殆尽。这场特大灾害也冲掉了股东们继续投资的勇气,张謇只得再次向刘坤一求援,向江宁藩库等单位筹集一批款项,购运棉衣、粮食到垦区实行"工赈"。次年春,3000多通海移民在暴雨肆虐的恶劣条件下陆续修复各条干堤。又经过两年的辛勤劳作,修复工程基本结束,承佃垦荒者合共1300余户,丁口6500余人,植棉初见成效。

垦牧公司除少量"岸台"(堤面)土地系户工自行经营外,绝大部分是佃给赤贫移民耕种。承佃者每亩需交"顶首"(押租)钱2000文,田地收获"公司得四,佃人得六",说明封建租佃制仍占主导地位。但垦牧公司毕竟从资金到产品都是为大生纱厂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者的发展。同时,公司的地租收入大部分用于河、堤、闸、路等大规模围垦工程,具有扩大再生产的意义,而且在棉种改良方面也作了一些努力。垦区所产棉花在南洋劝业会上得到优等奖牌,说明公司的成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从光绪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1901—1907),张謇先后创办了19个企业单位。这些企业和通海垦牧公司一样,主要也是为大生纱厂服务。就这样,在张謇的努力经营下,在辛亥革命前夜出现了一个粗具规模的大生资本集团。

发展民族近代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而他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他认为："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① 因此于光绪二十八年着手创办通州师范学校。

通州师范学校属于寻常（中级）师范性质，主要是培养小学教师。初期教员有著名学者王国维等以及日籍教师合共10余人，学生则是原来的"贡、监、廪、增、附五项生员"。学制分本科（4年）、速成（2年）、讲习（1年），并附设实验小学。以后又陆续创办测绘、蚕桑、农、工等科。这是清末第一所师范学校。同时还创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

光绪三十年(1904)，设"通州五属学务处"，作为统筹推广新式教育的办事机构，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

为了给各项企业提供技术力量，张謇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1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张謇在外地还先后参与或协助创办了复旦学院、吴淞中国公学、南京高等师范、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大专院校。

张謇也比较重视社会教育，光绪三十一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苑（馆）。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更俗剧场、伶工学社等，这些在当时都是开风气之先的新事物。他特地从上海招聘欧阳予倩主持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并多次

① 《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师范学校开学演说》。

邀请梅兰芳、程艳秋前往南通演出。伶工学社在课程、教材和管理制度方面都采用新的方法,废除了旧科班的体罚恶习。更俗剧场是新式建筑,台上除演员外无闲杂人出现,台下禁止吐瓜子壳和乱扔果皮,确实起了一些移风易俗的作用。

随着通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张謇在东南以至全国的声望日益增高。同时,他自己也从一个忠君爱国的封建士大夫,逐步转变成为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实业家。

第二节 在两个世纪之交

张謇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前进步伐,要比他兴办实业的速度缓慢得多,这主要是由于所受封建文化习染太深。

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张謇与维新派之间已经有所往还。梁启超曾通过张謇建议翁同龢电促李鸿章赞同抗战,而张謇亦曾列名强学会的上海分会。张謇的步调与整个帝党是一致的,他们在主战问题上与维新派有共同语言,而为了救亡图存又产生一定程度革新倾向。

但是,张謇的政治思想与维新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第一,维新派宣传近代民权思想和国家学说已有 10 年以上的历史,他们变法纲领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希望把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让资产阶级部分地参加各级政权。而张謇则与其他帝党分子一样,他所主张的变法大体上限于经济、文化方面,并且唯恐要求过高将会触怒当权的守旧势力。第二,维新派(特别是其左翼)比较急于实现全面变法的主张,因此在与守旧派斗争激烈的时候,不惜铤而走险,诉诸宫廷政变。张謇则坚持温和缓进,唯

恐维新派的“鲁莽”行动会引起政局大的动荡。

张謇很快就从变法运动中游离出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后党突然罢黜帝党领袖翁同龢。张謇对此不胜忧虑，很快也请假离开了北京，基本上结束了他与戊戌变法这一段历史因缘。

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决不仅仅是维新派的失败，它同时也是帝党的失败。不过到义和团运动期间，由于京师政局的异常动荡，他们又有所策划，而张謇则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

先是许多帝党骨干分子，如沈曾植、黄绍箕、沈瑜庆、陈三立等，他们和张謇一样都投奔托庇于张之洞、刘坤一的羽翼之下。光绪二十五年(1899)底，盛传慈禧太后即将正式废黜光绪帝，另立溥儁继帝位。这些蛰处东南的帝党分子忧心忡忡，唯恐光绪帝祸生不测。张謇在日记上充分流露出这种心情：“闻今上有立端王子溥儁为子承穆庙(指同治帝)为嗣统之诏，岁晏运穷，大祸将至，可畏也哉！”他们与东南绅商联络，由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发出了列名1231人的谏阻废立电报。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也上疏劝止废立，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这样强硬的口气向慈禧太后施加压力。后党知时机尚未成熟，废立阴谋暂时中止。

正当统治阶级忙于内部纷争之际，义和团反帝风暴席卷着北中国，帝国主义侵略联军进犯津、京。慈禧太后携带光绪帝逃往西安。张謇主张对义和团严行镇压，唯恐群众反抗潮流蔓延南方，将会冲击刚刚创办的大生纱厂和正在筹建的垦牧公司。因此，他积极支持东南督抚向帝国主义谋求妥协，共同维护长江中下游的统治秩序。

张謇参与“东南互保”的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策划招抚以徐宝山为头子的大股“盐枭”;第二步是促进刘坤一等订立《东南保护约款》;第三步则是所谓“退敌迎銮”,幻想让光绪帝重新当政。

徐宝山绰号徐老虎,是长江下游著名的“盐枭”,一向被江苏绅商视为“心腹大患”。光绪二十六年初,他曾接受唐才常联络,随即以“两江两湖大元帅徐”的名义发出布告,假借光绪帝密诏号召人们:“会师两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奠国基”。张謇对维新派的“勤王”未尝不感兴趣,但是却深恐秘密会社乘机暴动可能触怒帝国主义,引起规模更大的武装干涉。因此他决心拆自立军武力“勤王”的台,于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亲往南京向刘坤一“陈招抚徐老虎策”。刘坤一接受了张謇的建议,对徐部加以招抚改编。徐宝山本来就缺乏明确的政治意识,自此变成封建统治者的一条走狗。

五月底,另一帝党分子、时任正阳关淮盐监督的沈瑜庆,在上海与盛宣怀等议定电请“东南各省一律合订中外互保之约”。沈随即回到南京,与张謇、汤寿潜、陈三立等秘密计议,然后由张謇出面劝说刘坤一联合张之洞“保卫东南”。关于这件事,张謇自订年谱有一段很生动的记述:“刘犹豫(因有某幕客持异议),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其客曰:‘头是刘姓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之洞)。”这段话虽然不免夸大了张謇个人的决策作用,但确实反映了帝党分子、东南绅商与洋务派督抚串连起来,立足于保存自身经济、政治实力,决心违抗慈禧太后发布的

宣战上谕。

"东南互保"促成以后，张謇等感到长江中下游市场稳定有了保障，于是进一步策划所谓"迎銮南下"。就是打算把光绪帝营救出来，在南京成立新政府，然后逐步实现他们期望已久的各项温和改革。当时，他们风闻慈禧太后即将挟持光绪帝逃往西安，而另一帝党分子郑孝胥又正好被派任主持湖北营务处并奉诏北上。张謇等很想利用这支部队，阻止皇室前往西安，并把光绪帝迎接到南京来。同时，他们对奉旨北上的巡阅长江水师李秉衡也寄予希望，决定由汤寿潜"追谒李帅陈安危至计"[1]，企图利用李所带的部队实现"易西而南"计划。此后，张謇在南京、上海与汤寿潜、沈瑜庆等频频密商，并且劝刘坤一、张之洞公推李鸿章带兵北上"勤王"，一则借以保全光绪帝，再则加强镇压义和团以谋向帝国主义求和。

张謇等人之所以在政治上这样活跃，不仅由于他们得到刘坤一、张之洞的庇护与器重，而且还显然从英帝国主义方面得到启发与支持。当时，上海的英国侵略分子公然叫嚷，要求本国政府"采取措施来明确主张英国在扬子江的宗主权"。甚至建议：支持各省总督反对北京，"第一步是弹压西太后和她的谋臣"，然后争取"将首都迁到南京"[2]。这当然大大增强了东南督抚和绅商界的亲英倾向。不过由于北京很快失陷，洋务派督抚举棋不定，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亡西安已成事实，张謇的"易西而南"计划无从付诸实施。所以，此后他又不得不将"迎銮南下"方案改为

---

① 《张謇日记》庚子六月二日。

② 参见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中译本，第323—325页。

"退敌迎銮"。

所谓"退敌迎銮",包括"退敌、剿匪、请两宫回銮议约"三件大事。具体做法是:首先恳求联军退出北京,尽早接回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然后再"徐议除匪定约事"。他们认为:关键在于"罢斥端、刚(指载漪、刚毅)以谢天下",也就是必须改组朝廷。如果朝廷仍然把持在清一色的顽固派手中,那么"回銮"、"除匪"、"议约"就根本无从谈起。八月中旬,张謇详尽地向刘坤一陈述了上述意见,并且得到刘的同意。不久后党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剿匪、定约"也逐步实现。所以,庚子闰八月之后,张謇除了一度参与劝阻签订中俄东三省条约以外,政治活动已大为减少,转而以主要精力投入垦牧公司创办工作。

尽管张謇仇恨义和团,但义和团却帮了大生纱厂一个大忙。由于战事的影响,洋纱进口明显减少,机纱市场价格挺俏。这年秋天,张謇在日记上高兴地写道:"厂事复转,销路大畅。"[1]据统计,大生当年获纯利达11.8万余元。第二年,通海垦牧公司的基建工程又开始紧张进行。因此,张謇更加幻想清廷有可能接受教训,在"回銮"、"议约"以后有所振作革新。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01年1月29日),清廷正式下谕表示将要变法和实行"新政"。十二月二十三日(2月11日),刘坤一电邀张謇等前往南京讨论如何响应清廷"维新"诏令。张謇与汤寿潜、沈曾植、郑孝胥等反复磋商,在二十七年正月廿五日(1901年3月15日)以后陆续到达南京。他与刘坤一商谈以后,整整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成《变法平议》,比较详尽地阐

① 《张謇日记》庚子闰八月九日。

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变法平议》根据封建政府的结构，把要求变革的 42 条事宜，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类，然后又汇总区分为进行步骤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请设议政院，各府、州、县城设中学堂，先教测绘、师范、警察，各省设局编小学堂、中学堂课本书，译各史及各学科书，户部及各省布政使、各府、州、县行预计表。"

第二阶段："分职、省官、定俸，各府、州、县实行测绘、警察，订税目，增法律章程，罢厘金，停捐纳，变科举，行决算法。"

第三阶段："令各府、州、县分设各乡小学堂，兴农、工、商业，抽练营兵，减官府仪卫。"

显然，《变法平议》所提出的要求，低于维新派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水平，而整个进行步骤也更为迂缓，但就连这样的改良方案，不仅不能被后党把持的北京政府所接受，而且也没有被标榜"新政"的东南督抚所采纳。张謇"意绪为之顷索"。而后，他对全国政局暂时持消极观望态度，而以更大的热情从事以实业和教育为中心的通海"地方自治"。

不过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的思想产生较大变化，在政治上又重新活跃起来，而且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

这年四月，日本邀请包括张謇在内的一批东南名流前往参观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张謇在日本各地访问了两个多月，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获得极为深刻的印象。回国后，他把参观期间的日记编辑刊印，题为《东游日记》。他最感兴趣的，是日本天皇政府对本国大资本集团的极力扶植，而其所以能够如此，则是由于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和政党政治，国家大事得到国

民的关心和支持。张謇一贯反对日本侵略，但他认为中国应该取法日本的优长之处以求富强，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进步。

同年年底，日俄战争爆发。张謇看到岛国日本居然敢于向地跨欧亚两洲的沙皇俄国宣战，而且一开仗便取得胜利。他感到既羡慕又惭愧，在除夕日记上写道："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指南洋大臣辖地)则倍之矣。一则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絷。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而无人能举以为圣主告也。可痛！可恨！"① 此后，张謇日益明确地以君主立宪派的面貌出现于政治舞台。

光绪三十年(1904)春，清廷驻各国使臣孙宝琦、胡维德等联名电请变更政体，此后朝野要求立宪的呼声渐高。张謇也参与了君宪论的各方应和，并且对清廷再次寄予期望。清廷在实行所谓"新政"过程中，设置了商部，颁布了若干奖励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章程条件，并且特别注意拉拢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这更增加了张謇的幻想。这年正月，商部命张謇主持全国商会并组织"丝茶大公司"。他认为"此所谓务虚名而无实效者也"，婉言辞掉了。但不过一个多月，上谕赏给张謇三品衔商部头等顾问官的名义，他却又欣然接受了。

五月以后，张謇应两江总督魏光焘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参与为他们起草要求清廷立宪的奏稿。此外，他又组织翻译刻印日本的《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书，分送各方面重要人士，甚至还秘密托人送入清宫12本。这时，全国范围的

① 《张謇日记》癸卯十二月三十日。

立宪运动已经逐步展开了，而张謇则在这个运动中崭露头角。

第三节　辛亥革命前后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是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进入高涨的一年，同时也是清廷开始伪装“预备立宪”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认真发起立宪运动的一年。

张謇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展开了频繁的政治活动。除协助张之洞、魏光焘向清廷上书以外，他还积极联络各省督抚，特别是直隶总督袁世凯，以寻求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袁世凯是他在庆军幕中教读过的学生，后因张謇不满于袁之骄横跋扈而绝交已达20年之久。光绪二十七年(1901)秋李鸿章死后，袁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声势显赫的大人物。清皇朝的摇摇欲坠和革命潮流的高涨，促使张、袁捐弃前嫌，重新携手以应付危局。从此，北袁南张，一个在朝，一个在野，遥相呼应，纵横捭阖，在晚清政局中起了重要作用。

次年(1906)六月，出国考察宪政大臣端方和戴鸿慈回到上海。张謇替端、戴起草《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吹嘘只要仿行日本宪法，就可以得到三大好处：“君权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七月中旬，清廷迫于内外形势，正式谕令“预备仿行宪政”。国内外立宪派欢欣鼓舞，纷纷“开大会，举祝典”。张謇立即写信恭维袁世凯的“功烈”“足以伯仲大久保矣”，袁的复信则再次吹捧张“英绝领袖之才，……鼓吹群伦，隐然为舆论之母”①。

① 张一麐：《拟复张季直殿撰》，《心太平室集》。

由于得到袁世凯等有权势的督抚支持，张謇一伙的劲头更足，就在这年冬天正式组成了预备立宪公会。

预备立宪公会推定郑孝胥为会长，汤寿潜、张謇为副会长，成员多数为苏、浙、闽三省绅商名流，而其中骨干分子则大多为张謇的密友和亲信。在成立大会上争论颇多，大体上可以区分为“急进”和“缓进”两种主张。张謇显然倾向于缓进，认为：“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① 这可以看作是张謇一派在整个立宪运动中的方针路线。

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谕令设立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宣统元年(1909)八月，江苏咨议局正式成立，张謇当选为议长，随即发起国会请愿运动。他与江苏巡抚瑞澂商定：由瑞澂出面联络各省督抚，要求组织各省内阁；张謇则负责联络各省咨议局，敦促从速召开国会。他还应汤寿潜的邀请，专程前往杭州说服浙江巡抚增韫。江、浙两省地方当局和谘议局步调协同一致，因而能够在全国立宪运动中处于倡导地位。是年冬，16 省谘议局代表齐集上海，举行国会请愿代表团谈话会，并组成 33 人国会请愿代表团。张謇在代表团出发时赠言：“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②

但是，以醇亲王载沣为首的清廷并没有为张謇的“输诚”所感动，连缩短 4 年预备立宪期限这样有限的要求也未能接受。宣

① 张謇：《自订年谱》丙午十一月。

②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疏序》。

统二年春，张謇召开江苏咨议局会议，决定再次请求速开国会。五月，又发动了第二次国会请愿。此次请愿除各省咨议局代表外，还有各省商会、华侨商会及其他政团代表参加，一时号称有20余万人参加，很有一点声势。但清廷顽固如旧，不仅坚持9年预备立宪原议，而且严厉告诫请愿代表："毋得再行渎请。"但张謇等仍不死心，紧接着又为第三次国会请愿作准备。

八月，新成立资政院正式开议，国会请愿代表团乘机再次向清廷上书，并到处游说宣传。资政院一致通过速开国会的决议，各省督抚也联名奏请立即召开国会。清廷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于十月初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由9年改为5年，预定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并预行组织内阁。张謇满足于清廷这样微不足道的让步，中止了原来打算亲自北上活动的计划。但国会请愿代表团却深感不满，继续要求立即召开国会。清廷恼羞成怒，驱逐请愿代表，并逮捕惩办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彻底失败。张謇对此不能不感到沮丧。

清廷继续倒行逆施，于宣统三年(1911)四月组成所谓"皇族内阁"，实际上是进一步实行集权专制，同时又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全国舆论为之哗然。立宪派与清廷对立已达到极其尖锐程度，不少人已倾向于铤而走险，另作他图。张謇虽然也感到清廷"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但仍然没有放弃劝说清廷回心转意的幻想。因此，他到上海邀集汤寿潜、赵凤昌、沈曾植等联名向载沣上书，劝他"危途知返"，改组内阁，"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指袁世凯)"。不久，他又代表沪、津、粤、汉四地商会进京，与美国达赉财团商谈合办中美银行与太平洋航业公司问题，并借此机会对清廷作"最后之忠告"。

四月二十七日(5月25日),张謇偕江谦、孟森等从上海乘轮船溯江而上。五月十一日(6月7日),张謇于北上途中特地下车看望蛰居彰德的袁世凯,两人“道故论时”,对政局显然有所计议。据当事人回忆,张謇回车时含笑说:“慰廷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①]五月十二日张謇抵京,受到载泽、端方等人的热烈欢迎,并被特意安排在翁同龢故居住宿。十七日,载沣召见,任命为中央教育会会长。张謇则建议清廷注重民生,实行宪政,政府承担川路亏空,并全部收购商股以平息保路风潮等。随后又曾分别与奕劻、载泽、盛宣怀等有所磋商。张謇在北京奔走近两个月,并未获致任何具体结果,但载沣等这种“求贤若渴”的姿态却赢得了他的知遇之感。他除派雷奋作为代表参加直省咨议局联合会外,自己并不直接参与活动。

六月回到上海,仍集中精力筹议中美合资兴办实业事宜。当四川保路风潮已经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全国革命大风暴即将狂飙突起的时候,他还和赵凤昌认真起草《报美团人(指东方商团)书》,准备组织代表团到美国“报聘”。

为了庆祝大维纱厂正式开工,张謇于八月十三日(10月4日)又赶到武昌。十六日,大维纱厂、布厂同时开工,紧接着便是频繁的宴会,以欢庆他的经济势力伸入华中地区的中心。丰厚的利润几乎使他陶醉忘忧。直到十八日,也就是汉口宝善里革命党总机关被破获的那一天,他兴致勃勃地参加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举行的午宴,甚至还派专人护送孔雀、锦鸡各一对给通州博物苑。晚间又和湖广总督瑞澂畅谈到深夜。十九日(10月10

① 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80—182页。

日）上午过江在汉口等船，晚八时登轮返沪。船开动时已发现长江对岸起火，“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上烛天也”①。张謇最为害怕的景象终于出现了，这就是辛亥武昌首义的烽火。

十九日深夜船到安庆。他本来是应邀前来和安徽巡抚朱家宝商谈导淮问题的，可是革命的步伐究竟要快得多，当地新军已在酝酿起义，还有什么导淮可言呢？二十日，他连夜挤进塞满人群的江轮，第二天赶回南京。他先后劝说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出兵镇压湖北革命运动。铁、张自顾不暇，无以为应。他又赶到苏州，连夜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建议立即解散皇族内阁，组织责任内阁，严惩“酿乱首祸之人”（指盛宣怀等），“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②。

但是，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各省区的纷纷独立，终于使张謇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清朝大势已去。他重新判断时局，决定放弃君宪，转向共和，从“和平光复”中另谋出路。上海、浙江光复后，他即支持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九月十八日（11 月 8 日），通州也宣告独立，“地方秩序如常”，大生资本集团毫无损失，张謇的哥哥张詧且出任总司令。在此前后，他还打电报给已经奉命进攻湖北民军的袁世凯，劝他认清国内大多数人“趋于共和”的严酷现实，应赶紧前往北京，防止王室逃亡，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以确定共和政体，稳定全国局势。并分别写信给铁良和张人骏，劝他们断然放弃武装反抗。十一月初一日（11 月 21 日），他当选为由咨议局改组的江苏临时议会议长。十月中旬赴沪，与章太

① 《自订年谱》辛亥八月。

②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晤谈。他拒绝接受清廷授以农工商大臣、东南宣慰使的任命,公开表明了与清皇朝决绝。他接受了江苏军政府两淮盐政总理的委任,但这并非是真心实意支持革命。因为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欲江宁之回复秩序,须设置民事(指政府):欲设置民事,须客军(指各地民军)出发;欲客军出发,须财政先得数十万。财政之大者在盐,为乡里计,不得不为任盐事。"[①]总之,他是希望清朝和革命同时结束,由袁世凯出来收拾残局,恢复秩序。

当时,各省纷纷独立,不相统率;就是江苏省内,也出现了都督、司令如毛,各自为政、相互争持的现象。张謇第一步是力主程德全移驻南京,"并宁、苏为一",逐步恢复江苏全省政令的统一。第二步是进而力争以上海为政治中心,把操纵全国局势的主动权掌握在手中。而第三步则是通过"南北和谈",把独立各省的政权汇总起来,统统移交给袁世凯。根据赵凤昌遗留的各种函电文稿,可以知道张謇等人曾经设计一个政治方案,即模仿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十三州会议总机关",尽快在上海设立各省代表临时会议机关,以便于南北议和并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经过他们的多方面活动,到十月底,各省代表终于由武汉改在南京会议,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所正式开议,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的临时中央政权也正在筹组之中。而赵凤昌的惜阴堂,则是操纵所有这些活动的幕后中心。

可是,孙中山于十一月六日(12 月 25 日)到达上海,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他们的计划。由于这位革命领袖在同盟会内外享

① 《张謇日记》辛亥九月二十日。

有崇高的声望，同时也由于黄兴等人极力维护革命阵营的统一，很快就在南京成立了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导的中央临时政府。张謇被任命为实业总长，可是他从一开始就持消极态度。他很快就离开南京，而且不再到职，随后更借口汉冶萍公司抵押借款问题正式辞职。同时，他高唱“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并联络章太炎等建立中华民国联合会，随后又改组为统一党，用意都是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相对抗，以拥立袁世凯为职志。所以当他获悉南方同意以清帝退位为条件而改选袁世凯为临时总统时，便连忙密电告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①

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 年 2 月 12 日），袁世凯逼迫清帝逊位。张謇认为“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②。所谓难，是指结束革命远远难于结束清朝。次日，孙中山辞职，参议院经孙推荐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革命派仍想以迎袁南下就职，使之离开北方巢穴，以便对他有所约束。而袁世凯一手导演的“兵变争都”丑剧，以及中外反动势力的“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等鼓噪，大体上都与张謇的意愿相吻合。

1912 年 3 月 10 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张謇自然感到满意，但也没有马上参加袁记内阁。这是由于他刚刚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职务，“今若忽焉而北，则浅见者必以为有轻重向背于其间，而无识者且可造为种种荒诞离奇之语”③。说穿了，就是想掩盖自己反孙拥袁的政治立场，而以在野的身份为袁“拾遗补阙”和“遥为声援”。他先后参与了共和党、进

①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② 《张謇日记》辛亥十二月二十八日。

③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为时局致袁总统函》。

步党的建立,以对抗同盟会及其改组而成的国民党,还为南京临时政府、留守府和上海军政府的结束及遣散民军有所策划张罗。直到 9 月初,他感到江苏以至南方局势已经初步稳定,才亲自北上拜会袁世凯,表面上仅仅是就盐法改革有所陈说,实际上是参与共和党筹谋如何分化革命派并支持袁政府"集权统一"。

正当张謇认为"统一"、"秩序"在望,将可大展"棉铁主义"宏图的时候,1913 年 3 月 20 日出现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惨遭暗杀的案件,整个政局重新动荡,南北战争一触即发。张謇不分是非曲直,反对武力讨袁,力主"持以镇静"和"法律解决"。他夸大革命代价的高昂,并且丑化与诋毁革命的领导人,说是孰肯以汗血多得之金钱,供二次、三次革命不已之挥霍,自买今年、明年纠缠不了之苦痛。人心如此,钱从何来?无所得钱,凭何革命?"[①]他以"调停"人自居,实际上都是利用汪精卫、陈陶遗等妥协分子,拉拢并影响黄兴等人,孤立孙中山并反对他所领导的"二次革命"。张謇这种政治态度,同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大多数人倾向于妥协是相一致的。

及至袁世凯将"二次革命"镇压下去以后,张謇立即于 10 月中旬前往北京,就任熊希龄主持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农林工商总长。他不明白袁世凯无非是把这个"名流内阁"作为一种装饰品和通向独裁帝制道路的垫脚石,幻想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他梦寐以求的"棉铁主义"。在两年任期中,他"延揽通晓工商法之人",认真编辑 20 余种法令条例。他主张应把工业发展的重点确定为纺织和钢铁,提倡和保护民营工商业,强调吸

①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调和南北致孙少信、王铁珊函》。

收外资须注意“条约正当，权限分明”[1]，并拟订了各种雄心勃勃的发展实业的计划。张謇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是具有进步性的，而且他还懂得经济不能离开政治的道理：“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他很希望出现一个能够保护本国农、工、商业发展的“贤良”政府，可是他没有想到袁世凯所最关心的却是复辟帝制，两年来努力制定的20来种法令条例往往流于空言。

1914年2月，熊希龄内阁被迫总辞职，张謇虽然暂时留任，但已不安于位。在“名流内阁”垮台5天以后，他就写信劝告袁世凯说，“解散国会、改总统制、祀天用衮冕”等，已经在国内外广泛引起“帝制复活”的流言，并且将会诱发新的动乱。他借用苏轼的话以示讽喻：“操网而临渊，自命为不取鱼，不如释网而人自明也。”[2] 可是袁世凯决不“释网”，5月以后干脆撤销国务院，改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1915年春，又不惜就“二十一条”与日本进行无耻交易。帝制复辟迫在眉睫，张謇深表不满，正式辞去农商总长职务。

张謇回到南方以后，并没有参加反袁斗争，但对帝制的抵制态度是比较明确的。1915年11月20日，张謇看到上海报纸上有袁世凯将封他为“太傅”的消息之后，在日记上写道：“何为若是之纷纷逼迫耶！”1916年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以后，曾通过徐世昌再一次邀请张謇北上为之转圜。张謇断然拒绝。

但是，张謇在政治上的失意却在经济上得到补偿，他的企业在欧战期间得到空前发展。截至192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资

---

①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
② 《张謇未刊函电》。

本增加到360多万两,历年纯利累增总额共为1660余万两。到1924年,大生已增加到4个厂,资本总额达770多万两,纱锭共15万枚,布机共1500余台,同时着手兴办了金融业(淮海银行),扩充了航运业(大达轮步公司),此外还增设了一批大小不等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盐垦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公司林立,垦区扩展,南到长江口附近的吕泗场,北到海州以南的陈家港,包括南通、如皋、东台、盐城、阜宁、涟水等县,在濒临黄海的200余英里沿岸冲积平原上,占有土地总面积达455万亩,已垦面积70万亩,投资总额共2119万元①。张謇的经济事业在1920年前后达到顶峰。

但是好景不长,欧战后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再次使民族工商业陷于凋敝。而袁世凯死后,军阀统治由表面统一转入公开混战,更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灾难,同时也使大生资本集团很快由盛而衰。张謇被迫把全部企业交给债权人江浙财团接办,将近30年苦心经营的企业体系濒于土崩瓦解。

张謇晚年思想更加保守。他周旋于各派军阀之间,反对共产主义和群众运动,提倡尊孔信佛以谋抵制方兴未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也应该看到,他期望祖国富强之心始终未泯,曾撰文指责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要求废止不平等条约,主张取消租界、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他还希望结束军阀混战,让民族资本主义有一个得以顺利发展的和平环境。只是由于他已经游离于时代潮流之外,这些梦想的幻灭是必然的结果。

1926年7月17日,张謇病故。这年春天,他"慨世乱之未

---

①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如通泰各盐垦公司募集资金之说明》。

已，悲民生之益穷”，曾赋长诗以寄孤愤。结尾几句是：“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①]这便是他暮年处境的自我写照。

① 《张季子九录·诗录》。

第二十一章 李 善 兰

李善兰(1811—1882),原名心兰,字竟芳,号秋纫,别号壬叔①。浙江海宁县人。中国微积分学的先驱,近代科学的先行者。

第一节 雅志说算术,心志穷专一

浙江省海宁县,位于钱塘江口,杭州湾北岸。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物产丰富,是一个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县境内东北部的硖石镇,沿河两岸有审山、紫微山之胜,俗呼东山、西山,灵秀所钟,代有传人。山下有一李姓读书世家,溯其先祖,乃南宋末年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人李伯翼,他一生读书谈道,不乐仕进。元初,因其子李衎举贤良方正,授朝请大夫嘉兴路总管府同知,迎养来浙,旋即定居硖石。五百年来,传至十七世孙,名曰李祖烈,号虚谷先生,乃经学名儒。李祖烈初娶望海县知县许季溪的孙女为妻,不幸许氏早逝;继娶妻妹填房,又病故。后续弦崔氏,系名儒崔景远之女,知书达理,性情贤淑。婚后二人感情

---

① 《海宁州志稿》、《清史稿》、《畴人传》及其后诸书均误作"李善兰,字壬叔,号秋纫",今据原始资料《苞溪李氏家乘》(柯堂藏版,1890)卷六改。

甚笃，相敬如宾。1811 年 1 月 2 日凌晨子时，崔氏生下一子。斯时，李祖烈已年逾 40，中年得子，欣喜若狂。他捋着唇边不多的几根胡须，一眼瞥见案头平素最心爱的一盆兰花，正早早地开出了几朵淡红色的花星星儿，竞吐芬芳，于是给刚刚呱呱下地的胖儿子取名叫心兰，字竟芳。这个孩子，就是日后成为我国近代科学先驱者的李善兰。

心兰自幼就读于私塾，改取庠名善兰。他资禀颖异，勤奋好学，于所读之诗书，过目即能成诵。

9 岁那年，有一天他从父亲的书架上取下来一本古书，一看封面，"九章算术"四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他平时接触的都是四书五经，还从来没有见过数学书呢。打开书本一看，没有"子曰"，没有"之乎者也"，却有什么"方田"、"粟米"、"方程"、"勾股"之类的词儿，令他感到十分新奇有趣。从此他便迷上了数学。

到他 14 岁的时候，又靠自学读懂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 6 卷。这是明末徐光启(1562—1633)和利玛窦(M. Ricci，1552—1610)合作翻译的古希腊数学名著。书中欧氏几何学严密的逻辑体系、清晰的演绎推理，与偏重实用解法和计算技巧的中国古代传统数学异其旨趣，自有它的特色与长处。李善兰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又吸取了《几何原本》的新鲜血液和养料，这使它的数学造诣日趋精深。

又过了几年，作为州县的生员，李善兰到省城杭州参加乡试，结果因做不好八股文章，未曾中举。虽落第而归，但却在杭州的书坊摊头买到了金元数学家李冶关于"天元术"的名著《测圆海镜》以及清初学者戴震的《勾股割圆记》，带回家来，仔细研读，数学水平有了更大的提高。

海盐人吴兆圻《读畴人书有感示李壬叔》诗中说:"众流汇一壑,雅志说算术。中西有派别,圆径穷密率。""三统探汉法,余者难具悉。余方好兹学,心志穷专一。"①李善兰很重视从实践中学习数学和天文知识,他的经学老师陈奂说他"熟习九数之术,常立表线,用长短式依节候以测日景,便易稽考"②。

有一次,李善兰与学友们同游东山。有人问他东山有多高?他立即从地上拾起一根草芥,平伸手臂,眯着眼睛,沿着草芥顶端对准东山一瞄,随即脱口而出:"二十六丈!"同行者无不惊讶。原来他是用相似勾股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原理目测心算算出了东山的高度。

李善兰结婚那天的晚上,要拜堂了,却不见了新郎,大家都很着急。他的二弟心梅和小弟心葵却心中有数,他们跑上二楼的阁楼上一看,大哥正猫着身子,探头于窗外,聚精会神地看着天上的星星呢!原来李善兰为了研究数学和天文历法,平时经常独自上东山,观测象纬躔次。当晚,他来不及上山去了,只好跑到阁楼的窗台上进行每天例行的天象观测。

第二节　朝廷养兵本卫民,临敌不战为何哉

1840年,李善兰29岁的时候,鸦片战争爆发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帝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① 《硖川诗续钞》卷五。

② 陈奂:《师友渊源记》。

1842 年 5 月，英军攻陷江浙海防重镇乍浦。乍浦离李善兰的家乡硖石只有几十里的路程。他耳闻目睹了侵略者烧杀淫掠的血腥罪行，满怀悲愤，奋笔疾书《乍浦行》一诗："壬寅四月夷船来，海塘不守城门开。官兵畏死作鼠窜，百姓号哭声如雷。夷人好杀攻用火，飞炮轰击千家灰。……饱掠十日扬帆去，满城尸骨如山堆。朝廷养兵本卫民，临敌不战为何哉？"[①]鲜明地表达了他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对老百姓的深切同情，对清政府临敌不战的强烈谴责，以及他对敌主战的坚决态度。

人民群众不堪忍受侵略者的凌辱。当时有一个名叫刘七姑的女子，在敌人的淫威面前，宁死不屈，投井自尽。李善兰写了一首民歌体裁的《刘烈女》诗[②]：

夷船海上来，将军不敢守。

炮声一震魂魄丧，骑马掩耳出城走。

呜呼！将军性命重如此，烈女乃于井中死。

用通俗明白的语言对比描绘"将军"和"烈女"的形象，褒贬爱憎的感情色彩何其鲜明！李善兰还在《汉奸谣》[③]一诗中痛斥那些"割民首级争献功"的民族败类，对于"街头义勇捉汉奸"、"为尔良民一雪仇"的举动则表示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鸦片战争血淋淋的事实，激发了李善兰忧国忧民和科学救国的进步思想。他说："呜呼！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其制器之精，算学明也。"[④]为了国家的强盛，他希望"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⑤]。

---

①②③　李善兰：《听雪轩诗存》，汲脩斋校本，北京图书馆藏。

④⑤　李善兰：《重学》序，1866 年。

从此,他自己便身体力行,在家乡刻苦从事数学研究工作。

第三节　步算中西独绝伦,小李将军算法奇

1845年前后,李善兰在嘉兴陆费家设馆授徒,得以与江浙一带的学者(主要是数学家)顾观光(1799—1862)、张文虎(1808—1885)、汪曰桢(1813—1881)等人相识,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数学问题。此间,李善兰有关于"尖锥术"的著作《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等问世。

李善兰的尖锥术,可以说是具有中国传统数学特色的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由于清政府长期奉行闭关自守政策,包括微积分学在内的西方近代科学一直未能传入中国。当时的中国数学界,除了见到零星几个由传教士带进来的三角函数无穷级数表达式和对数计算方法之外,其余则一概不知。就是这些公式和方法,也只有结论,没有推导的过程和计算的原理。在这种情况下,李善兰异军突起,独辟蹊径,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在中国传统数学中垛积术和无穷小极限方法的基础上,发明尖锥术,不仅创立了二次平方根的幂级数展开式,各种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和对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而且还具备了解析几何思想和一些重要定积分公式的雏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首先,李善兰所创立的尖锥概念,是一种处理代数问题的几何模型。它由互相垂直的底线、高线和凹向的尖锥曲线所组成,并且在考虑尖锥合积的问题时,也是使诸尖锥有共同方向上的底和高,这样的底和高具有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纵、横两个坐标的作用。

其次，这种尖锥是由乘方数渐增渐叠而得，尖锥曲线是由随同乘方数一起渐增渐叠的底线和高线所确定的点变动而成的轨迹。由于李善兰把每一条尖锥曲线看作是无穷幂级数中相应的项，实际上他给出了直线（长方、平尖锥）、抛物线（立尖锥）、立方抛物线（二乘尖锥）……的方程。他的对数合尖锥还相当于给出了等轴双曲线的方程。

再次，李善兰的尖锥求积术，实质上就是幂函数的定积分公式和逐项积分的运算法则。同时，李善兰用这种积分的方法，配合还原（级数回求）、商除等代数运算方法，卓有成效地展开了许多超越函数的研究，这也是属于微积分学早期阶段的工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善兰的对数论，它建立在尖锥术的基础上，独具特色，受到了中外学者的一致赞誉。伟烈亚力（A. Wylie，1815—1887）说："李善兰的对数论，使用了具有独创性的一连串方法，达到了如同圣文森特的 J. 格雷戈里（Gregory，1638—1675）发明双曲线求积法时同样漂亮的结果。""倘若李善兰生于 J. 纳皮尔（Napier，1550—1617）、H. 布里格斯（Briggs，1556—1631）之时，则只此一端即可名闻于世。"①顾观光发觉李善兰求对数的方法比传教士带进来的方法简捷、高明，认为这是洋人"故为委曲繁重之算法以惑人视听"，因而大力表彰"中土李（善兰）、戴（煦）诸公又能入其室而发其藏"，大声疾呼"以告中土之受欺而不悟者"②。

在李善兰尖锥术的基础上，解析几何思想和微积分方法的

① A. Wylie，Chinese Researches，Shanghai，1897.

② 顾观光：《算賸馀稿》卷下，《武陵山人遗书》，1883 年。

萌芽，是可以生根长叶、开花结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数学也可能以自己特殊的方式走上近代数学的道路。只是几年以后，到了1852年，李善兰便接触到了大量从西方传进来的近代数学，并参与了把解析几何和微积分介绍进中国的翻译工作。从此，中国传统数学逐渐汇入世界数学的发展洪流之中。

清初有两位天算大师王锡阐(字寅旭，号晓庵，1628—1682)、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1633—1721)，当时号称“二庵”。蒋学坚说：“李先生算学为中外所共仰，国初王晓庵、梅勿庵二先生后，当首屈一指。”① 又有诗称李善兰“步算中西独绝伦”、“王梅而后此传人”，“二庵之后更推谁，小李将军算法奇”②。

第四节 朝译几何，暮译重学

1852年夏天，李善兰到上海墨海书馆，将自己的数学著作给主持书馆的英国传教士W. H. 麦都思(Medhurst，1796—1857)展阅，其时住于墨海书馆的伟烈亚力见之甚悦，出了几道数学难题请教李善兰，李善兰一一作了正确的解答。于是伟烈亚力便请他留在上海合作翻译西方数学书籍。

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作翻译的数学书有《几何原本》后9卷、《代数学》13卷和《代微积拾级》18卷等。

据伟烈亚力说，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英文版本“校勘未精，语讹字误，毫厘千里，所失匪轻”，而“(李善兰)君固精于

① 蒋学坚：《李壬叔先生〈则古昔斋遗诗〉跋》，《怀亭文录》。

② 蒋学坚：《闻李壬叔丈讣音》，1882年。

算学，于几何之术，心领神悟，能言其故。于是相与翻译，余口之，君笔之。删芜正讹，反复详审，使其无有疵病，则李君之力居多。余得以借手告成而已”①。看来，这并非谦虚之词。因为翻译的过程是伟烈亚力口述，李善兰笔录。这种笔录，是对口述的再翻译，整理、加工、乃至创造的比重是很大的。李善兰自己也说：“当笔受时，辄以意匡补”，如此“屡作屡辍，凡四历寒暑，始卒业”，“伟烈亚力君言，异日西士欲求是书善本，当反访诸中国矣”②。该书于1856年译毕，1857年出版发行。

英国数学家A. 棣么甘(De Morgan，1806—1871)的《代数学》(1835)内容包括代数方程、方程组、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及其幂级数展开式等。这是我国第一部符号代数的译本，西方通用的一些代数符号，例如＝、×、÷、()、＞、＜、$\sqrt{\quad}$、……，都被直接引用。但＋、－被译作⊥、⊤。阿拉伯数码字用一、二、三、四……，26个英文字母用中国传统的十天干(甲、乙、丙、丁……)十二地支(子、丑、寅、卯……)外加四元(天、地、人、物)来表示。

美国E. 罗密士(Loomis，1811—1899)的《代微积拾级》(1850)是一部高等数学的教科书，内容包括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初步，“由易而难若阶级之渐升”。译文用“微”的偏旁“彳”表示微分符号d，用“积”的偏旁“禾”表示积分符号$\int$，再配合其他相应的表示方法，像这样的积分式

$$\int \frac{dx}{a+x} = \ln(a+x) + c$$

① 伟烈亚力：《几何原本》译序，1856年。

② 李善兰：《几何原本》译序，1856年。

便被译为

$$禾\frac{甲\perp天}{彳天}=(甲\perp天)对\perp丙$$

虽然同当今通用的数学符号和表达方式相比还相差甚远,但这是高等数学第一次被介绍进中国,在中国近现代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翻译《几何原本》的同时,李善兰和伟烈亚力还翻译了西方力学著作《重学》,真所谓"朝译几何,暮译重学"[①],十分紧张和辛苦。《重学》是我国近代科学史上第一部力学译著,也是当时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部物理学著作,"制器考天之理皆寓于其中"[②]。

从1852到1859年,李善兰除了翻译出版上述数学和力学的著作外,还同伟烈亚力合作翻译出版了天文学著作《谈天》(英国赫歇耳的《天文学纲要》)和植物学著作《植物学》(英国林德利的《植物学基础》),这也是西方近代天文学和植物学首次全面系统地传入中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翻译过程中,大量的近代科学名词,在汉语中都没有先例供参考。本着对后人负责的精神,李善兰仔细思考,反复斟酌,十分贴切恰当地创译了一大批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植物学中的科学名词,例如:代数、常数、变数、已知数、未知数、函数、系数、指数、级数、单项式、多项式、轴、切线、法线、渐近线、微分、积分;历元、方位、视差、章动、自行、摄动、光行差、月行差、月角差、二均差、蒙气差、星等、变星、双星、三合

①② 李善兰:《重学》序,1866年。

星、本轮、均轮;分力、合力、质点、刚体;细胞、植物;等等。100多年来,这些科学名词不仅在我国流传下来,扎下了根,还飘洋过海,东渡日本等国,沿用至今而勿替。如今,当我们天天和这些熟悉的科学名词打交道时,饮水思源,李善兰的开创之功是应该永志不忘的。

李善兰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翻译工作,加上七十年代初徐寿(1818—1884)翻译《化学鉴原》,华蘅芳(1833—1902)翻译《地学浅释》等,20年间,西方近代科学中,数、理、化,天、地、生,各大门类的先进知识都介绍进了中国,这为中国的近代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第五节 辅佐洋务新政,实施科学救国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清皇朝中一部分善于通权达变的封建政治家,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䜣、文祥和拥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代表,主张和实施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设备和科学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建立起新式的海军和陆军。这些活动,史称"洋务运动"。此时,李善兰投身洋务派官僚集团,积极参与洋务新政中的学术活动,试图以此实现他的科学救国的理想。

1861年秋,曾国藩在安庆筹建一个试用机器生产的兵工厂——安庆军械所,先邀著名化学家徐寿和数学家华蘅芳到内军械分局研制机动船只,后又将李善兰"聘入戎幄,兼主书局"①。

① 崔敬昌:《李壬叔征君传》。

李善兰一到安庆，就拿出因战乱初刊版已毁的《几何原本》等数学书籍对曾国藩说："此算学家不可少之书，失今不刻，行复绝矣！"[①] 在曾国藩的支持下，于1865年在金陵(南京)出版了15卷足本《几何原本》。曾国藩亲自为之作序，推荐此书。这对当时中国的数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是有很大影响的。

1866年，曾国藩在上海筹建一个更大规模的兵工厂——江南机器局，他"邮致三百金"[②] 到南京，资助李善兰出版算书，这样就有了1867年金陵刊本的李善兰数学著作《则古昔斋算学》付梓问世。与此同时，在南京开办金陵机器局的李鸿章也资助李善兰重刻《重学》8卷附《圆锥曲线说》3卷。

李善兰的《则古昔斋算学》收有他20多年来的各种数学著作等13种，除前述关于尖锥术的《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外，还有关于等差级数求和问题的《垛积比类》[③]，关于行星运动轨道研究方面的《椭圆正术解》、《椭圆新术》和《椭圆拾遗》，提出别具一格的图解法、堪称我国第一部精密科学意义上的弹道学著作《火器真诀》，在我国级数研究史上带有开创性的《级数回求》，解决了若干有关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问题的《天算或问》，诠释和发扬中国传统数学和历法的《四元解》、《麟德术解》，以及融会中西数学方法的《对数尖锥变法释》。

张之洞也很钦佩李善兰的学识。他在1875年编写《书目答

---

① 曾国藩：《几何原本》中译本序，1865年。

② 李善兰：《则古昔斋算学》序，1867年。

③ 其中，现被普遍誉称为"李善兰恒等式"的一个组合公式驰名中外，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不断引起数学界的广泛兴趣，我国数学家章用、华罗庚和匈牙利数学家图兰·帕尔(Turan Bel)等人都研究和证明过它。

问》，卷后附有“清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注称：“此编生存人不录。”但却破例在“算学家”条下列了李善兰，并特别加注说明：“李善兰乃生存者，以天算为绝学，故录一人。”①

第六节　合中西之各术，绍古圣之心传

1861年，洋务派奕䜣等奏请开办京师同文馆，1862年成立，直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只设有外语课程，培养办理洋务所需的翻译人才。1866年又因制造机器必须讲求天文算学，议于同文馆内添设一馆，即天文算学馆。1867年起招收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以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吏入学，厚给薪水，住馆学习数学，学制7年。起初，在物色主持者的人选时，广东巡抚郭嵩焘就上疏举荐了李善兰。但李善兰忙于在南京出书，翌年才得以北上，就任同文馆天文算学总教习，直至1882年去世。其间所教授的学生“先后约百余人。口讲指画，十余年如一日。诸生以学有成效，或官外省，或使重洋”②，知名者有席淦、贵荣、熊方柏、陈寿田、胡玉麟、李逢春等。晚年，获得意门生江槐庭、蔡锡勇二人，即函致华蘅芳，称“近日之事可喜者，无过于此，急欲告之阁下也”③。这些人在传播近代科学特别是近代数学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1880年，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W. A. P. Martim，1827—1916）因此说：“是皆李壬叔先生教授之力也。呜呼！合中西之各术，绍古圣之心传，非壬叔吾谁与

① 张之洞：《书目答问》，1875年。
② 崔敬昌：《李壬叔征君传》。
③ 李善兰：《致华蘅芳函》（严敦杰收藏）。

归?”①

所谓“合中西之各术,绍古圣之心传”,实际上是发扬中国古代数学的优良传统,并将之纳入当时世界通行的近代数学体系之中。李善兰身处新旧交替、中西融合的历史时期,眼光敏锐,思想活跃,既不盲从,又不保守,是很有胆略、很有气量的。在中国古代数学名著中,他选定了金元时期李冶的《测圆海镜》为同文馆的数学教材,这是因为李冶的“天元术”就是西方的代数学,“立天元一”即“设未知数 x”,而且《测圆海镜》中由 170 个勾股容圆问题归纳出来的“九容公式”,也是与几何图形有关的代数运算的基本技能和技巧训练。李善兰高度评价《测圆海镜》这部书,说他自己“译西士代数、微分、积分诸书,信笔直书,了无疑义者,此书之力焉”。他撰《测圆海镜解》,取《测圆海镜》中的原题,“今以代数演之,则合中西为一法矣”②。数学是没有国界的。当时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近代数学,本身就是吸取了大量包括中国在内的东、西方各民族的数学成果的产物。尽管自代数学和微积分传入以后,中国古代的天元术和传统的幂级数研究难以再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但中国古代传统数学汇入世界近代数学洪流之中,这是中国数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李善兰是顺应这种历史潮流,起着推波助澜作用的。

第七节 学问量天测地赅,诗文余事亦恢恢

李善兰的科学著译,特别是他的数学著作,“仰承汉唐,荟萃

① 丁韪良:《同文馆算学课艺》序,1880 年。

② 李善兰:《测圆海镜细草》序,1880 年。

中外，取精用宏，兼综条贯”，“业畴人者，莫不家庋一编，奉为圭臬”①。而他业余从事的诗、文创作，也是内容丰富、洋洋大观。蒋学坚写诗赞他“学问量天测地赅，诗文余事亦恢恢”②。

李善兰自谓“十三学吟诗”③，虚岁15时便有“膝下依依十五秋，光阴瞬息去难留。嗟余马齿徒加长，爆竹惊心岁已周”和“数声爆竹岁朝天，惭愧平舆会讲年。一岁功程今日始，急须早著祖生鞭”的佳作。他年轻时写的《夏日田园杂兴》、《田家》等诗，如“提筐去采陌头桑，闭户看蚕日夜忙。得到丝成空费力，一身仍是布衣裳”④，颇为体贴劳动人民的辛苦。此外，他还写了大量咏史咏物咏景的抒怀之作，文字清新，思想深邃，颇具哲理。

李善兰的杂文思想性、艺术性兼备。例如，他年逾花甲后写了一篇《星命论》⑤，用确凿有力的证据，通俗生动的比喻，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利用星象搞封建迷信活动的荒诞无稽。文中有这样一段：

> 大挠造甲子不过记日而已，并不记年月与时也。亦无所谓五行生克也。其并记年月与时且以五行配之，皆起于后代，古人并无此意也。而术士专以五行之生克判人一生之休咎，果可信乎？且五行见于洪范，不过言其功用而已，言其性味而已，初不言其生克也。是干支之配五行，本非古人之意矣，而谓人之一生可据此而定，是何言欤？至五星偕地球同

---

① 李善兰：《听雪轩诗存》识语，汲脩斋校本。

② 蒋学坚：《闻李壬叔丈讣音》，1882年。

③ 李善兰：《听雪轩诗存》。

④ 本段引文均见李善兰：《听雪轩诗存》。

⑤ 李善兰：《星命论》，《中西闻见录》第12号，1873年。

绕日而各不相关。夫五星与地球且不相关,况地球之上一人而谓某星至某官主吉,某星至某官主凶,此何异浙江之人在浙江巡抚治下,他省之巡抚于浙江无涉也,今试谓之曰某巡抚移节某省,于尔大吉,某巡抚移节某省,于尔大凶,有不笑其荒诞者乎?五星之推命何以异是乎?

对此,时人赞曰:"其论真属透辟,足以启发溺惑。"

李善兰生性豪迈,洒脱不羁,潜心科学,淡于利禄。曾国藩很赏识他,"屡欲列之荐牍,皆力辞"①。他痛恨贪官污吏,在晚年所写的《陈君锡麟行状》②中,表彰为官清廉、体恤民情者,而叹曰:"呜呼!今之号称能吏者,吸民膏髓以善事上官得真除显要者,比比也!"在《倪君经朝传》③中,赞扬"倪氏子弟皆矫矫立气节,不屑与俗儒争进退"。在描写一穷苦诗人潦倒致死的《陈愚泉传》中,论曰:"吾谓愚泉虽饿死……视士大夫之庸庸老寿并不能雕章镂句者可当何如耶!"④表现了他对当时封建社会处于穷途末路之下官场的腐败深恶痛绝,对儒林的迂腐则嗤之以鼻。晚年,他虽官居高位(1882年授三品卿衔户部正郎、广东司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但从未离开过同文馆教学岗位,也没有中断过科学研究工作。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即1882年夏,还在写新的数学著作《级数勾股》。他自署对联"小学略通书数,大隐不在山林"贴在门上,表明他仍然以在野之隐士自居,而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

李善兰一生嗜酒。年轻时在家乡常与"鸳湖吟社"的诗友"一

① 崔敬昌:《李壬叔征君传》。

②③ 李善兰:《则古昔斋文抄》,汲脩斋丛书,第9册。

④ 李善兰:《陈愚泉传》,《中西闻见录》第33号,1875年。

笑且痛饮，醉卧沧江月”[1]。中年在上海译书时，则与王韬、蒋敦复“同至酒楼轰饮”[2]，因“以诗酒徜徉于海上，时人目为三异民”[3]。晚年在北京，仍好饮，结果患风痹症，“家山成久别，杯酒了余生”[4]，于1882年12月9日辞世。次年归葬家乡海盐县。当地现已建立了他的纪念陈列室。作为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人们将永远纪念他。

① 李善兰：《听雪轩诗存》。
② 王韬：《淞滨琐话》。
③ 《淞南梦影录》卷3。
④ 蒋学坚：《李壬叔丈灵柩南还，诗以哭之》，原注：“公误饮冯了性药酒而卒。”

第二十二章　徐　　寿

第一节　研读科技典籍，善制工艺器械

徐寿，字生元，号雪村，江苏无锡人。清嘉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818年2月26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县社岗里。徐氏世居无锡，“力田读书”[①]，是一个比较贫苦的农民家庭。徐寿的祖父审发务农的同时兼作商贩，家境日渐富裕。徐寿的父亲文标大概是徐家的第一个读书人，但不幸的是年仅26岁过早去世了，徐寿时年仅4岁。母亲宋氏含辛茹苦，将他和两个妹妹抚养成人。在他17岁那年，他的母亲也去世了。在此之前，他已经娶妻，并有了一个儿子。

徐寿早年也习举子业，“尝一应童子试，以为无裨实用，弃去”[②]。显然，八股诗文无法解决他一家人的生计问题。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一面务农，一面经商，往上海贩运粮食。难能可贵的是，徐寿并没有就此放弃对知识的追求。生活的磨难和务农经商的实际经验，使他痛感时文词章毫无用处，因此，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转向了经世致用之学。那时正是鸦片战争前夜，清皇朝

①② 华翼纶：《雪村徐征君家传》，《碑传集补》卷43。

已经走向衰亡，社会矛盾日益突出，青年徐寿立下了"不二色，不妄语，接人以诚"和"毋谈无稽之言，毋谈不经之语，毋谈星命风水，毋谈巫觋谶纬"的座右铭①，抱定了经世致用的宗旨，开始在经籍中学习研究有用之学。他研读《诗经》和《禹贡》等经书时，将书中记载的山川、物产等列之为表，研读《春秋》、《汉书》、《水经注》等历史、地理著作，则注意古今地理的沿革变迁。凡是有用之学，他无不喜好。

徐寿的家乡无锡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手工业之乡。那里有许多能工巧匠。这种风气也影响了徐寿，他从小就爱好工艺制作，"少好攻金之事，手制器械甚多"②。大概正是由于这一爱好使他由博览群书逐渐转而致力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徐寿在科技方面的兴趣极为广泛，举凡数学、天文历法、物理、音律、医学、矿学等等，他无一不喜，无一不好。他不仅潜心研究中国历代的科技典籍，对于明末清初从欧洲翻译过来的西方科技著作也认真加以研究。他认为工艺制造是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而科学的原理又藉工艺制造体现出来，所以他总是"究察物理，推考格致"③。结果，这不仅使他的科学修养大为提高，也使他制作工艺器械的水平日趋精湛。据记载，他曾制作过指南针、象限仪，还会制造结构很复杂的自鸣钟，而尤其善于仿铸墨西哥银元。他还研究制造过好几种古代乐器，据说都一一符合乐理。他善于制器的名声逐渐传播开来，引起本县的学者兼画家华翼纶慕名探访，由此，徐寿与华翼纶之子青年数学家华蘅芳

---

① 程芳：《徐雪村先生像序》，《格致汇编》第二年(1877)第9卷。

② 华世芳：《记徐雪村先生轶事》，《碑传集补》卷43。

③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第三年第五卷。

(1833—1902)相识，成为终身不渝的朋友。

徐寿和华氏父子联络了几位对科技有共同兴趣的人，经常切磋讨论。他们到处访书求友，往往弄到一本科学书就相互传抄，每见新学新知，总是相互交流，遇到疑难问题，就反复研究，直至大家都明白。他们对明末清初的西方天文学、数学和技术之类的译书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这些书往往有理有法，不仅论述知其然，而且阐述其所以然，给徐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在这些切磋交流中，徐寿从研究中国传统科技转而致力于西洋科技。

1855年，上海墨海书馆(英国伦敦布道会在中国的出版机关)出版了英国在华传教医师合信(B. Hobson，1816—1873)编译的《博物新编》。不久，徐寿和华蘅芳到上海访书，读到了这部新书。这是一部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的书，是最早向中国人介绍近代化学知识的一部书。其中还论述了蒸汽机原理，哥白尼和牛顿天文学等。尽管《博物新编》不过是一部科学常识书，但它介绍的却是近代科学常识，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介绍的西洋科学的水平。徐寿和华蘅芳他们一读到这部书，就好像一下子跨越了200多年，猛然间发现近代科学的新知新理。这种新鲜和敏感，如果不是对科学精研有素，是难以想象的。

回到无锡，他们按照书中所论自制器具，验证书中的一些科学理论和实验。徐寿因陋就简，自制了不少仪器。如他曾用水晶印章磨制成三棱镜，以检验光的折射定律在三棱镜中的特殊现象和光分七色的原理。为了搞清楚光在三棱镜中的折射问题，他和华蘅芳多次通信讨论。更为难得的是，徐寿还触类旁通，“引伸

其说"①,试做了《博物新编》中还没有加以讨论的实验,并将书中的结论推而广之,得到了某些新的结果。可惜的是,这些实验和研究的笔记后来毁于1860年太平天国军进攻无锡、苏州之时。这一时期,徐寿还研究了轮船的制造。他认真研读了《博物新编》中的有关论述,并考察过停泊在上海的外国轮船,所以在1860年之前,就传说他能够制造轮船,称他"登西人火船,观其轮轴机捩,即知其造法"②。

1861年秋冬之际,两江总督曾国藩向清廷特片保举6人,徐寿和华蘅芳作为江浙的"才能之士,能通晓制造与格致之事者",名列其中。清朝中央政府即命江苏巡抚薛焕将他们护送至曾国藩军营。次年三月,徐寿和华蘅芳抵达安庆曾氏军中,成为曾国藩军中的技术幕僚,在安庆内军械所着手试制轮船。

徐寿等人白手起家,自制了必要的工具,然后用这些工具制造出一系列零部件,仅用3个月的时间,船用蒸汽机的模型就制造出来了。该机汽缸直径为一寸七分,引擎速度为每分钟240转。1862年7月30日,徐寿和华蘅芳等将该机试演给曾国藩及其幕僚观看,一试即获成功。曾国藩对此极为满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随即令徐寿等正式开始制造轮船。这项工作以徐寿和华蘅芳为主,徐寿负责总体设计和制造,华蘅芳负责有关的测算工作。此外还有吴嘉廉、龚芸棠等。徐寿的次子徐建寅(1845—1901)虽然才17岁,但在造船过程中也"屡出奇计"③,

①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② 《王韬日记》1859年3月9日。
③ 孙景康:《仲虎徐公家传》,见杨模等编《锡金四哲事实汇存》。

帮助徐寿解决了某些疑难问题。

1863年11月,徐寿等人试制出一艘小型的木质轮船,该船使用暗轮,长约3丈。可是试航时,它只行驶了一里左右就熄火了。徐寿等很快就查明了问题之所在,原来是由于锅炉中没有设置锅炉管,因此汽锅无法连续供给蒸汽。他们很快更改了设计。一个多月之后,该船又在长江上进行了试航,获得圆满成功。该船身长近3丈,航速为每小时12至13里。曾国藩随即指示制造更大的轮船。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占天京(即南京)。不久,曾国藩从安庆移驻南京,内军械所也从安庆迁至南京。徐寿等人也搬到南京继续造船。由于船大,零部件的加工制作耗费时日,而人手有限、工具简陋,所以进展不快。直到1865年底,一艘明轮式的木质蒸汽船才终于完工。该船后被命名为"黄鹄",船身长55尺,载重量为25吨,引擎使用高压蒸汽机,淘汰了先前的低压蒸汽机。其蒸汽机为单汽缸,倾斜装置,汽缸直径为2尺,长为2尺。主轴长14尺,直径为2寸4分。汽锅长10尺,直径2尺6寸。锅炉管有49支,各长8尺,直径2寸。船舱设在主轴位置之后,机器部分占去了船体的前半部分。推进器为设于两舷的腰明轮。1866年4月,"黄鹄"号在南京下水试航,其顺逆水平均船速为每小时22.1里。总的说来,"黄鹄"号轮与当时国外制造的内河航行的轮船在设计、性能上都是很相似的。其全部制造工作,无论是各项设计,还是工具、机器、零部件的制作,完全由中国人一手完成,没有假手外人。所用材料,除了用于主轴、锅炉和汽缸的铁系进口货之外,其余均为国产。在当时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徐寿等人克服了重重困难,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而终于大

功告成，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就称道“黄鹄”号的制造成功是“显示中国人具有机器天才的惊人的一例”。徐寿因此被曾国藩誉为“江南第一巧人”。在中国科技史上，“黄鹄”号的制造开创了我国的近代造船业。

第二节　一代翻译名家

在研制轮船的过程中，徐寿深感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迫切性。早在1863年春，徐寿等技术幕僚就向曾国藩建议设立一个采用西方先进技术的机器厂，后来容闳赴美采办机器即由此而来。容闳购买的机器于1865年秋运抵上海，被安置在李鸿章新设的江南制造局。该局原来是一家美国人经营的轮船修造厂旗记铁厂，有几位外国技师和一批修造轮船的设备留用。因此，1866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后，即着手在该局制造轮船。为此，他很快就将徐寿父子和华蘅芳等人调到制造局，襄助造船事宜。1867年4月，徐寿到该局就职，任江南制造局委员，负责领导和监督造船工作。在徐寿领导沪局造船之初，该局的造船工作主要依赖留用的原旗记铁厂的外国技术人员。他们利用外国轮船的现存图纸，按图制造，自己无法设计。这些人大多不过工匠水平，若要制造样式比较先进的船型就无处措手了。有鉴于此，徐寿更觉必须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他以自己的亲身经验，认识到必须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把西方科学技术各门类的著作择要翻译过来，供人学习研究，自然能造就一批中国自己的科技人才。那时，曾经在输入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

墨海书馆早已解散。西方近代科学的绝大多数学科还没有相应的中译本,至于学习西方制造技术所急需的技术科学还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种情况,同方兴未艾的求富求强事业的实际需要是太不相适应了。可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却急功近利,急于购买和仿造洋枪洋炮和轮船,还没有将科技知识的引进和科技人才的培养纳入其议事日程上来。经过慎重的考虑,徐寿建议在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专门翻译西方科学技术著作。他的这一设想得到了该局负责人冯焌光和沈保靖的支持。为了争取曾国藩的支持,徐寿起草了一个条陈,由冯、沈转呈曾氏。

徐寿的条陈内容有四点:一为开煤炼铁,二为自造大炮,三为操练轮船水师,四为翻译西书,而其真意还是在第四事。但是,曾国藩认为徐寿的建议都是"揣度之词,未得要领"。关于译书一事他批复道:

> 至外国书不难于购求,而难于翻译,必得熟精洋文而又深谙算造且别具会心者,方能阐明秘要,未易言耳……该员等此番赴局宜遵谕专心襄办轮船,能于一年内赶速制造一二只,乃不负委用。其轮船以外之事,勿遽推广。[1]

看来,曾国藩造船心切,对徐寿等人的能力估计不足,将译书之事看得太难了。幸而冯焌光和沈保靖是支持徐寿的,经过他们的请求,曾国藩允许徐寿"小试"译书。

徐寿物色了上海英华学塾校长兼《上海新报》编辑英国人傅兰雅(J. Fryer,1839—1928)担任专职口译,并聘请富有译书经验的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和美国人玛高温(D. J. Macgowan,

[1]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6。

1814—1893)担任兼职口译。于是，徐寿与伟烈亚力合作翻译《汽机发轫》，华蘅芳与玛氏合译《金石识别》，而徐建寅与傅兰雅试译《运规指约》，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事业就此开始了。这几部书都是由徐寿等中国笔述者赶到西人口译者的租界住处翻译的，来往费时，很不方便，因此，制造局拨出房屋作为翻译之处。1868年6月，在中国近代科技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就这样成立了。

1868年8月，在江南制造局制成第一艘轮船“恬吉”号下水的同时，《汽机发轫》等四部译书也均告译出，并呈送给曾国藩“鉴赏”。曾氏对轮船制成极为满意，对于四部译书也非常欣赏。要知道李善兰、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花了七八年才译出七八部书啊。从此，他对译书事业的态度立即转变为大力支持，指示扩大翻译馆的规模，同意徐寿等人的建议，兴建翻译学馆。徐寿等翻译委员制订了翻译馆的长期规划——《再拟开办学馆事宜章程十六条》[①]。这一计划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招收学生，培养翻译人才和技术人才。1870年初翻译学馆建成之后，新任上海道兼江南制造局总办涂宗瀛认为翻译学馆与培养外语人才的上海广方言馆“事属相类”，他请示曾国藩后，将广方言馆搬进了新落成的翻译馆，结果徐寿等人的科学教育计划化为了泡影。不过，这一计划的另一半内容，即译书计划基本上得到了落实。如按照第七条“测经纬以利行船”，此后每年即由贾步纬编译《航海通书》；据第八条“译舆图以参实测”，李凤苞等编译了世界地图纸、中国沿海海道图和长江图等几种地图；而《西国近事汇

① 《广方言馆全案》。

编》、《西国近事》和《翻译新闻纸》等送呈各省官员的定期出版物，则是按照第十条"录新报以知情伪"的计划编译的；至于科学技术书籍的翻译，则在第五、六、九条"编图说以明理法"、"考制造以究源流"、"广翻译以益闻见"等条文中规划周详了。这是清末洋务运动时期我国引进西方科技的最大的一项计划。正是这个计划的实施，使江南制造局成为十九世纪下半叶我国译书最多、质量最高、影响最大的科技著作编译机构。徐寿也是在翻译馆建成以后，由"制造名家"转变为"翻译名家"。此后，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翻译馆与傅兰雅合作翻译科技著作，直至其去世。作为翻译馆的创始人和主要译者，徐寿为翻译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最后 17 年生命。

徐寿先后与傅兰雅合作翻译了近 30 种科技著作，约 250 万字。其中，最有名的是几部化学书，此外，《汽机发轫》、《西艺知新》正续集和《宝藏兴焉》等也很重要。

第三节　中国近代最早的化学家

徐寿的第一本化学译书是《化学鉴原》，是根据当时美国流行的一部化学教科书翻译的。此书译于 1869 年，是最早译出的一部专门的化学书籍，于 1871 年作为江南制造局的首批译书出版。那时，许多化学术语还没有现成的汉语词汇来表达，因此，必须拟定一套元素、化合物和化学概念的汉语译法。为此，徐寿和傅兰雅经过认真研究，解决了这一翻译难题。其中最为成功的是化学元素名称的翻译。他们首创了以元素英文名的第一音节或次音节译为汉字再加偏旁以区分元素的大致类别的造字法，

巧妙地将元素英文名译为汉字。他们根据这一原则新造的化学元素汉字如硒、碘、钙、铍、锂、钠、镍等字，几乎难以看出是新造的汉字。这一元素译名原则不仅能对已知的元素拟定合理的译名，而且为后来拟译新发现的元素译名提供了如法炮制的规范，其基本原则为后来的化学家所继承。目前的化学元素中文译名原则就是在徐寿的基础上制订的。至于化合物的译名，他们除对某些常见者采用意译之外，一般都译其化学式，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译法。在徐寿和傅兰雅翻译《化学鉴原》的同时，在广州的美国传教医师嘉约翰（J. G. Kerr，1824—1901）与其学生何然也根据同一底本在进行翻译。他们了解到徐寿的译名之后，就在其译本《化学初阶》中采用了《化学鉴原》的一些译名。不过《化学初阶》的译文比较简略，文字也不如《化学鉴原》那么通畅，因此远不如《化学鉴原》在读者中影响深远。《化学鉴原》被时人誉为“化学善本”①，是近代化学传入中国早期时影响最大的一部译书。

徐寿等在翻译《化学鉴原》时只译出了原书的无机化学部分，在介绍有机化学时，他们选用了英国新出的一部化学教科书，书名定为《化学鉴原续编》（1875 年）。由于那时有机物的英文名称也还没有统一，徐寿和傅兰雅在翻译有机物时采用了音译，因而该书比较难读。《续编》译出之后，他们见原书的无机化学部分的内容比《化学鉴原》更丰富，更有条理，于是又将其译出，定名为《化学鉴原补编》，于 1879 年出版，其中还加入了论述新发现的元素镓及其化合物的内容。

徐寿非常重视分析化学，称之为“化学之极致”。在翻译完

① 《格致课艺汇编》卷 4 己丑（1889 年）春季超等第一名孙维新课艺。

《化学鉴原》不久，他就让其子建寅与傅兰雅翻译了一本简明的分析化学著作《化学分原》。但他不以此为满足。1879年，年已61岁的徐寿又开始与傅兰雅合作翻译德国分析化学大师富里西尼乌司(Karl R. Fresenius，1818—1897)的两部最有名的分析化学著作《定性分析化学导论》和《定量分析导论》。这两部著作的德文原版分别于1841年和1848年初版，后来一再修订重版，并被译为欧洲各国文字。它们在分析化学的学科建立和系统化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其作者富氏被誉为近代分析化学之父。这两部书的篇幅都不小，译成文言共有75万字之多。徐寿和傅兰雅是依据其英文新版翻译的，前后历时约4年之久，译本分别定名为《化学考质》和《化学求数》，于1883年出版。

徐寿还翻译了一册《物体遇热改易记》(1899年出版)，它是根据英国出版的一部著名的化学词典中的部分条文翻译的，介绍了气体、液体和固体受热膨胀理论，气体定律，理想状态方程和绝对零度等概念和理论，详细罗列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西方科学家研究液体和固体热膨胀率的实验结果。

这些无机、有机和分析化学译著的翻译出版，以及他们翻译的《宝藏兴焉》(1884年)、《西艺知新》中的化工著作如《造硫强水法》等的出版，将西方近代化学比较系统地引进到中国，极大地促进了近代化学知识在清末的传播，为化学学科在我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些译著的翻译出版也改变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化学知识引进的落后状况。随着它们的问世，化学知识的引进甚至可以说走在了数学和物理学等学科的前头。

就徐寿自己而言，通过翻译化学书籍，也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科学水平，成为我国近代最早的化学家之一。早在译书之前，

他就从英国订购了全套的化学实验仪器和化学药品。在译书的同时，他往往要将书中的重要的化学实验亲手做一遍。因此，每译完一书，他也就掌握了书中的化学知识，并能将有关知识运用于实践之中。他曾为江南制造局的龙华火药局建成硫酸厂，制造过硝化棉和雷汞等炸药。

徐寿在翻译化学书籍不久就开始试制硫酸。最初，可能是由于生产规模过小，制得的硫酸的成本较高①。1873 年之后，他和傅兰雅翻译了一本介绍英国用铅室法制硫酸工艺的《造硫强水法》，同时，徐建寅等也翻译了一本《造硫强水法》(后来没能出版)。在此基础上，徐寿改进了工艺，扩大了生产规模，使成本大为降低。其所制硫酸不仅在质量上与西方所产不相上下，在成本上也比进口货便宜不少。所以从 1876 年起，龙华火药局所需硫酸即全系自产，不再依赖进口。徐寿研究制造硫酸可以说是我国近代硫酸工业的开端。他摸索的一整套制造工艺在龙华火药局长期延用，后来还载入 1905 年出版的《江南制造局记》之中。

徐寿对矿冶也很有研究。也是在译书之初，他就从国外订购了各种各样的矿石样品和金属样品。后来，他又一面译书，一面研究辨识矿藏，提炼金属。他的有关知识，在开平煤矿、徐州煤矿和漠河金矿的开发和建设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第四节　乐律研究的成就

徐寿一生都爱好研究乐律之学。他年轻时以复制古乐器开

①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 431 页。

始为人所知,晚年又因研究律管的管口校正而赢得了西方科学界的赞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研究了律管的半黄钟与正黄钟不相应的问题。这是中国律学史上一个困扰了人们上千年的老问题。中国古代向来以弦定律,以管定音。古人认为管弦同律,依此,则黄钟律管与长为其一半的半黄钟管应该刚好相差八度音,可是实际则不然。在中国古代,只有晋代的荀勖(? —289)和明代的朱载堉(1536—1611)研究过律管的校正问题。徐寿研究了朱载堉的成果,认为其结果"理虽近似",但"尚未密合"[1]。他从缩小管长来研究这个问题,用九寸长的开口铜管(即清制黄钟管)实验,发现截去其一半,无法得到八度音,但再截去半寸稍长一点,则能准确地得到八度音。他用不同管径的铜管实验都得到了一致的结果。徐寿这项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他用简单的实验得到了律管管口校正的一个经验数据,并以实验否定了弦管同律论。然而,他的这一结果却与英国物理学家丁铎尔(J. Tyndall,1820—1893)《声学》(由徐建寅和傅兰雅译出,1874 年出版)的有关论述相矛盾。1880 年 11 月,徐寿让傅兰雅将他的实验结果翻译成英文,报告给丁铎尔,就为何他的实验与《声学》不符,管口校正的科学计算以及弦管不同律的真实原因等问题向丁氏求教。显然,徐寿和傅兰雅都感到这一实验结果是一项有意义的科学发现,因此,他们将信同时也寄到了英国著名的科学刊物《自然》(Nature)杂志社。那时,关于管口校正的研究在欧洲正引起许多科学家的研究兴趣。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物理学家博赞基特(R. H. M. Bsanquet)的系列研究和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瑞

① 徐寿:《考证律吕说》,《格致汇编》第三年(1880)第 7 卷。

利勋爵(Lord Rayleigh, J. W. Strutt,1842—1919)在其巨著《声学理论》(*Theory of Sound*)中发表的理论推算公式。他们的研究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基本上解决了管口校正的问题。徐寿的研究几乎与他们同时,尽管结果比较粗略,但仍然引起了英国科学家的极大兴趣。《自然》杂志于1881年3月10日以《声学在中国》为题,发表了上述信件。编者在按语中指出:"我们看到,对一个古老定律的现代的科学的修正已由中国人独立地解决了,而且是用那么最简单、原始的器材证明的。"在西方科学大举进入中国的十九世纪后半叶,徐寿的管口校正结果在《自然》杂志上的发表,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科学家在西方科学杂志上第一次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第五节 创办格致书院

徐寿晚年的另一项重要的事业是创办上海格致书院。该书院最初由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Sir W. H. Medhurst,1823—1885)倡议建立。由麦氏和傅兰雅等外国热心人士组成了董事会。1874年11月,徐寿受邀为董事。以后又陆续增加了几位华人董事,结果中西董事各占一半。而徐寿是格致书院早期的最为重要的一位董事。徐寿首先着手的是筹款。他先后上书李鸿章等官绅,得到李鸿章、冯焌光等有力者的大力支持,为书院筹集到了大量的钱款。据记载,在全部7700两建院款项中,其中百分之八十即6000余两是由徐寿募集而来。为了格致书院的建设,徐寿还拿出自己多年节衣缩食积攒的一点钱财。他捐献了原本为其母亲修建旌节坊而准备的一笔钱,为此,他不得不将母亲牌

坊的修建一再推迟。格致书院的房舍是一幢上下两层的中式楼房,也是由徐寿设计的。书院于 1875 年底建成,次年 6 月 24 日正式开院。

格致书院开院后不久,由于经费短缺,很快就陷入了财政困难。又是徐寿多方活动,从著名的红顶商人胡光墉那里募得 5000 银元,加上他个人的 1000 两捐款,才使书院摆脱了财务困难。1878 年,他用这笔钱偿还了书院的债务,购置了一批科学仪器,并用其中的一部分在书院的空地上修建了数十间房屋,作为出租之用,每年的租金有 800 多两。这笔收入后来成了书院的一笔固定财源,使书院的财务状况大为好转。从此,董事会授权徐寿住进院内,以便就近管理院务。他的第二任夫人韩氏早在他到江南制造局之前就已去世,以后他不再续娶。此时就由其第三子徐华封(1858—1927)在身边照料,一起住在格致书院。

但是,徐寿在办院方针等方面同书院的外国董事发生了分歧。徐寿想把格致书院建成一个培养专门的科技人才的学校,而以担文(W. V. Drummond,英租界工部局律师,1788 年起任董事会主席)为首的外国董事则对此不大热心,他们不过想办个展览,开几次科学讲座,引起中国的士人对西方事物的兴趣爱好。因此,他们对徐寿的所作所为多方干涉,横加指责。后来,徐寿干脆撇开了外国人控制的董事会,独立行事。但是,由于风气未开,徐寿想把格致书院建成一个专门的科技学校的计划,在他的生前没有实现。

不过,徐寿毕竟为格致书院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由于筹建书院的推动,徐寿的合作者傅兰雅还发起编辑出版了最早的中文科技期刊《格致汇编》。这一刊物于 1876 年 2 月开始

出版。徐寿对该刊的编辑给予了宝贵的支持。他为之撰写了发刊词，并在上面发表过《考证律吕说》等论文。他和傅兰雅的一些译作，也在《格致汇编》上刊出。《格致汇编》在清末深受读者的喜爱，其发行量远比江南制造局的译书为多，对近代科技知识在清末的传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徐寿等中国友人的大力支持，傅氏是不可能将《格致汇编》办成的。

1884 年 9 月 24 日，徐寿病逝于格致书院寓舍，享年 68 岁。

徐寿的经历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坎坷历程。徐寿早年受到的是旧式教育，他转向科学研究是受到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的影响。他最早接触的也是中国固有的传统科学技术，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然而徐寿绝不保守，他一旦接触到西方近代科技，认识到其先进性之后，就转而以引进和传播近代科技和发展中国的科技事业为己任，他的朋友张文虎(1805—1885)说他"服膺西学"，这在清末是非常难得的。但是，他并不盲信西方科学，他在乐律研究中用实验发现丁铎尔《声学》中的错误就是有力的例证。徐寿也没有因西方科技的先进而弃传统科技如敝屣。在他的研究之中，总是因陋就简，尽可能利用传统的材料、手段和方法推陈出新，表现出很高的创造性。徐寿一生的科学成就，放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考察，也许微不足道，但在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上却是举足轻重的。正是徐寿这样一些人，开创了中国近代的科技事业，使中国科技的发展逐渐靠近世界科技的潮流。

第二十三章 詹 天 佑

第一节 留学十载，“学有其成”

詹天佑，字眷诚，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七日（1861年4月26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1919年4月24日病逝于湖北汉口。詹天佑祖籍安徽婺源县（今属江西省）。他的家庭是一个已经没落的儒商之家。曾祖父詹万榜（号文贤）于乾隆二十五年（1761）携家由婺源迁居广州南海，经营茶叶外贸生意[1]。祖父詹世鸾、父亲詹兴洪都继承家业，开设茶庄。但鸦片战争以后，原曾一度兴盛的茶行生意到詹兴洪时已一落千丈，生活日益困难，詹兴洪甚至不得不依靠代写书信和刻制印章等收入来维持日常生活。

同治六年（1867），詹天佑6岁时，入私塾读书。他自幼身体虚弱，但聪颖豁达，好学深思，个性沉毅。其父詹兴洪的挚友谭伯邨，广东香山人，常到香港、澳门做生意，时常接济詹兴洪。他很喜欢詹天佑聪明坚毅，便将四女儿许嫁于他。同治十年（1871），谭伯

---

① 詹天佑手立《徽婺庐源詹氏支派世系家谱》（以下简称《詹氏家谱》），清光绪十年（1884）。

邨在港澳经商时，获悉朝廷欲在香港招考幼童出洋留学，便劝说詹氏夫妇，送子报考。詹兴洪遂送詹天佑去香港应试。

詹天佑报考了“技艺门”，并被录取。他与第一批录取的出国少年共30名，在上海经过几个月的短期培训以后，于同治十一年七月八日（1872年8月11日），由留学生事务所正监督陈兰彬率领，乘船赴美。为办理赴美留学生的学习、生活事宜，时任留学生事务所副监督的容闳已先行赴美联系安排。容闳按计划，将30名留学生分成十余组，每组两三人，分散寄居在新英格兰区各州的美国友好人士家庭中，以熟悉美国的饮食起居和便于英语听、说、读、写的学习。詹天佑和另一位留学生欧阳赓，被安排居住在康州威士哈芬（West Haven）海滨男生学校（Seaside Institute for Boys）校长诺索布（L. H. Northrop）先生的家庭里。同治十二年（1873），詹天佑进该校读书，这是一所私立的预备教育性质的学校，主要是训练从中国、南美洲等国来美国留学的少年。诺索布毕业于耶鲁大学，其夫人玛莎（Martha）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对詹天佑循循善诱，关怀备至，从吃饭、睡觉、读书、写字、讲话、外出，直至体育锻炼等都无微不至地照料，因而他进步很快。

同治十三年（1874），经李鸿章批准，在容闳主持下，于美国哈特福德城的柯林斯（Collins）街，建造起一座三层楼的中国留学生事务所。该事务所除设有办公室、课堂、书房外，尚有卧室、餐厨等生活用房，“可容监督、教员及学生七十五人同居”[①]。次年正月，多数留学生从美国友人家中搬入新居，但詹天佑和欧阳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

赓仍和诺索布全家同住,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多年以后,詹天佑仍一直怀念这两位美国的启蒙老师——诺索布夫妇。他在给诺索布夫人的信中深情地写道:

> 自我离美,至今未曾忘记您,我常忆起您对我们的慈爱和您为教育我所受到的辛苦。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向您学更多的东西。……
>
> 知道您、威利和苏非(按:诺索布夫妇的儿子和女儿)的近况,我们很高兴。很难过您将旧居出卖,因为它曾是我们愉快的家。① ……

1875年5月,詹天佑以优秀成绩考取了纽哈芬(New Haven)希尔豪斯高级学校(Hillhouse High School,亦译为丘房高级中学),并被编入特别班。在学习过程中,他对自然科学深感兴趣,表现出过人的才华。1878年,是高中最后一年,詹天佑选修代数、自然哲学和化学。期末考试,他成绩优异,全部学业操行总成绩获得476分,为全班第一名、全校第二名,成为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詹天佑原打算中学毕业后,报考美国陆海军学校,但经咨询,美国政府的回答是:"这里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中国学生"②,被轻蔑无礼地拒绝了。诺索布夫人对詹天佑非常关心,她鼓励他好好学习,争取报考耶鲁大学的理工科,这对詹天佑一生影响

---

① 1896年2月15日,詹天佑致诺索布夫人的信,见勒法吉(Thomas Lafargue)编,高宗鲁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

② 茅以升:《中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詹天佑》,见《人民日报》,1961年4月27日。

很大。

詹天佑来美国的几年，正是美国大规模修筑铁路和电器等工业有重大突破的时期，这期间电话、留声机、电灯等相继发明。美国科学技术和经济飞速发展的现实，引起了詹天佑的注意和思考。加之在容闳等老师的教导和影响下，使他认识到，只有通过发展科学技术，修筑铁路，建设工厂，开发矿藏，才能使祖国富强起来。因此，他决心学习科学技术，将来为祖国服务。

1878年8月，詹天佑如愿以偿地考入耶鲁大学的雪菲尔德理工学院(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土木工程系(Civil Engineering Course)。该校入学资格极严，必须要通过英文、美国史、地理、拉丁文、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各科考试，并要熟悉英国史。詹天佑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入学考试。耶鲁大学学制三年，功课扎实，极重视基础课教学。詹天佑攻读土木工程系的铁路专业，其课程为：

第一年上学期：德文、英文、解析几何、物理、化学、工程制图。下学期：英文、物理、化学、球面三角、力学、自然地理、植物学、经济学、等角投影绘图学。

第二年上学期：微分学、测量学、投影几何学、德文、法文。下学期：积分学、力学、投影几何、地形测量学、德文、法文。

第三年上学期：野外工程学、铁路路线勘测学、路基土方计算、桥梁及房屋结构学、工程材料学、凿岩工程学、地质学、矿冶学、法文。下学期：桥梁及房屋结构学、工程材料学、蒸汽机动力学、水力学、天文测量学、地质学、矿冶学、法文。

詹天佑在该校整个学习过程中，各门功课成绩优秀，尤其是数学课程，在一、二、三年级均获得数学优秀奖章而受到学校的

表扬。在最后的一学年,他去纽哈芬港口海陆联运码头作实地调研,对港口使用的巨型起重机作了分析研究,完成了题为《码头起重机研究》(Review of Large Wharf Crane)的毕业论文。

光绪七年夏(1881年6月),詹天佑于耶鲁大学雪菲尔德工学院土木工程系铁路工程专业毕业,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在他的毕业证书内有如下一段说明文字:

> 康奈迪克州纽哈芬耶鲁大学校长及教授们向所有阅读本证书者宣告:
>
> 詹天佑是获得大学学位荣誉的第一流考生,被光荣地授予哲学学士名衔,并按惯例得到凡升为学士者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和声誉。

詹天佑原打算大学毕业后,先用五六年时间在美国进行考察、实习和深造,然后再回国效劳。但是,陈兰彬与容闳分别调任清廷驻美正、副公使后,新任留学生事务所的正监督吴子登对留学生怀有偏见,对认真学习自然科学、思想活跃的青年学生,扣以"离经叛道"的帽子,并向清廷控告:留学生不尊师,不读中国书,甚至信了洋教,如果再让他们久居美国,放任自由,必将成为异端,日后学成归国,则祸害无穷。他对学生百般教训,加以"整顿",将10名所谓"活跃分子"遣送回国。这样还不甘心,1880年他去华盛顿,对陈兰彬说:"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固,极应将局裁撤。"① 于是陈兰彬等守旧派与他密切配合,上奏清廷,要求解散留学生事务所,撤回全体官费留美学

①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165页。

生。昏庸腐朽的朝廷不作任何调查，竟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1881年，正当詹天佑欢庆大学毕业之际，清廷下达了全体留美学生撤回中国的命令。当时尽管遭到容闳等人和留学生们的坚决反对，尽管许多支持留学教育的中美人士竭力呼吁、设法挽回，但终不能使清廷改变其决定。至此，先后四批赴美的120名留学生，除少数病故、因故已先回国和拒绝回国者外，其余94名，均被迫辍学，于1881年夏，分三批回国。其中获得大学学位者仅詹天佑和欧阳赓两人。1881年7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在美国》(China in the U.S.)的社论，赞扬中国留学生："机警、好学、聪明、有智慧，这些由古老亚洲帝国来的幼童，如此努力克服外国语言困难，且能学有其成，我们美国子弟是难以做到的。"对使他们中途辍学表示惋惜。容闳毕生为之奋斗的留学教育计划中途夭折了。

第二节　驾舰绘图，"技艺素优"

1881年8月8日，詹天佑等取道旧金山回国。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备受封建官吏的歧视和冷遇。他们一到上海，就被水兵"押送"至衙门后院，派兵看管，不准随便外出，视同异己。然后乘招商局轮船到天津，由李鸿章接见他们。这些学生，在美国生活多年，早已剪去发辫，穿惯了西服，但接见时，仍要求他们穿长袍马褂，戴上假的发辫，行旧礼节。这使他们很不习惯，詹天佑甚至连假发辫也不肯戴。李鸿章见时甚为不悦，斥骂他们"离经叛道，无父无君"。接见之后，让他们等候分配工作。而分配时，又不考虑所学专业和个人爱好，随便发派。

是年8月底,詹天佑和另外15名留美学生一同被派往福州船政局马尾水师后学堂学习海轮驾驶。这对曾在美国专门攻读铁路工程技术的詹天佑来说,无疑是一次严重打击,他失望地流下泪水,但也别无门路可走,只得强忍着去福州报到。

福州船政局是两江总督左宗棠所创办,附设前、后水师学堂,培养和储备水师人才。前学堂学造船,开法文课;后学堂学轮船驾驶,开英文课。后学堂的课程有:算术、几何、三角、代数、航海、天文、地理、气象等,计划二年半学完。詹天佑用不到一年时间,学完全部课程,并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于光绪八年(1882)毕业于后学堂。同年11月派往扬武号兵舰任驾驶官。光绪十年正月(1884年2月)"升授船政局水师学堂教习"①,即提升为水师后学堂的英文教师。

光绪七年(1881)十一月间,福州船政大臣代表清廷在船政局水师学堂颁发奖赏,詹天佑以"技艺素优","赏给五品军功"。光绪十年(1884)八月十四日,又追补奖赏,以"后学堂教习詹天佑教导出力,实堪嘉赏,赏给五品顶戴"②,并颁发了军功奖状。

光绪十年(1884)春,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后,大力兴办洋务。为培养洋务人才,创办了广东水雷局黄埔博学馆。为对付外敌入境,又积极筹办琼、廉、潮沿海各州防务,加强沿海炮台和陆军营垒的建设。还设立海图馆,以奉令勘测沿海各口地形并绘制海图等。为此,张氏广泛网罗科技人才。

是年10月,詹天佑被张之洞调至广州,出任黄埔博学馆英

---

① 詹天佑立《詹氏家谱》,转引自《詹天佑生平志》。

② 詹同济、黄志扬、邓海成编:《詹天佑生平志》,第58页。

文教习。他工作认真，教学有方，“官称其能，士服其教”，被尊为导师。

光绪十二年(1886)正月，海图馆派员勘测广东沿海地形，并委派詹天佑选带测绘生员随同前往，以周历各海口，逐一详加测绘。在詹天佑等人的率领下，其测绘人员“出入风涛，无间寒暑，候朝夕，测沙礁，辨岛屿，凡轮帆可达之处，战守缓急之宜，靡不周历审视，反复推求”[①]。于十三年(1887)七月终于测绘完毕，并成《粤海险要图》一套，呈交张之洞。是年冬，张之洞携测绘者乘轮亲自巡海，对所绘各图详加校核，认为比较精确。然后呈送清廷军机处及总理衙门，是为中国较早的完备海图。詹天佑认真努力的工作，丰富的学识和才华，给张之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其日后力主派员留学起了一定作用。

次年，黄埔博学馆改为广东水陆师学堂，詹天佑继续担任该校的英文教习。詹天佑在用非所学的岗位上度过7年，无论是驾驶军舰、从事水兵教习，还是测绘海图、修筑炮台等，都努力奋斗，克服困难，做出了优异的成绩。

光绪十三年(1887)，詹天佑在澳门与谭伯邨的女儿谭菊珍结婚。

第三节　筑路七载，初露才华

詹天佑自光绪七年(1881)回国后，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才有机会用其所学，从此，他为中国铁路建设事业披荆斩棘，奋

① 《进呈粤海图说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奏议二七》卷27。

斗终生。

河北开平煤矿因运煤需要，于光绪七年(1881)建成唐山至胥各庄全长约9公里的唐胥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正式用于运输的铁路，以后由此路两端逐步展筑成关(山海关)内外的干线铁路。詹天佑在建筑这条大干线及其支线的过程中，开始崭露头角。

光绪十三年(1887)，唐胥铁路通车至芦台(即唐芦铁路)后，因沿海水兵用煤需要，清廷海军总理衙门奏准将其继续展修至天津。为此，将开平矿务局铁路公司改组为中国铁路公司，设于天津，由伍廷芳任总理，英国人金达(C. W. Kinder)任总工程师。光绪十四年(1888)，经留美学生邝景阳(孙谋)向伍廷芳推荐，中国铁路公司遂聘请詹天佑任其帮工程师。于是，詹天佑离开广州，北上天津。此时中国铁路公司正紧张地忙于修筑塘沽至天津的铁路，詹天佑到任后，被分派到此段工地负责铺轨任务。这是詹天佑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他充分发挥筑路专长，指挥作业，塘津铁路全长40多公里，仅在80天内就完成全部铺轨工程。直隶总督李鸿章亲往查验，认为线路"平稳坚实"。因此，唐山至天津的铁路，于是年九月初五日提前竣工通车。

唐津铁路通车，收益显著，于是继续向东展修。在总工程师金达率领下，詹天佑总是被派往最艰苦的工段。光绪十五年(1889)勘测唐山至古冶的铁路，十七年(1891)建成通车。

光绪十八年(1892)，古冶至滦县铁路建成通车。光绪十九年(1893)是关内铁路滦县至山海关段的修筑时期，其中的滦河大桥是这段路的关键工程。这是一座2000余英尺长(合617米)的17孔钢桥(其中跨长200英尺者5孔，100英尺者10孔，30英

尺者2孔)，共有桥墩16座，桥台2座，工程相当艰难。金达先后聘请英国工程师喀克斯(Cox)以及日本和德国的工程师来承担这项工程，但结果都失败了。因为滦河水流湍急，桥基所在的河床流沙层甚厚，所设桥墩几次遭洪水冲毁，致使工期难以保证。后来金达将这一难题交给詹天佑去试行解决。詹天佑调查分析了滦河水流及河床地质情况，经过缜密的测量后，决定改变桥址，并在桥墩施工中引进当时的最新技术——气压沉箱法，并结合中国传统的打桩方法施工，结果一举成功。当16座基础桥墩露出水面后，钢梁架设、铺轨工程顺利完成。次年，滦县至山海关铁路迅速建成通车，至此，关内铁路竣工。

滦河大桥的建成，不只保证了关内铁路如期建成，詹天佑及时运用最先进科学技术的筑路才能，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光绪二十年(1894)，他当选为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员(MICE)，是为中国工程师被选为国际学术团体会员的第一人。

关内铁路通车后，继续向关外展筑。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关外段工程只筑至出关数十里的中后所(今辽宁绥中)即被迫停工。甲午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危机进一步加深。铁路修筑，是列强在中国争夺和巩固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此后，列强在华投资，争夺铁路修筑权的斗争更趋激烈。

光绪二十一年(1895)，津卢铁路开工，詹天佑奉调修筑该路，率队测量线路，并提出报告，但未被有关方面采纳①。由于清廷软弱无能，不仅大举外债，而且重用外国工程师，致使学有专

① 1896年2月15日，詹天佑致诺索布夫人的信。

长的詹天佑久居人下，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以帮工程师身份参加该路修筑工作。

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决定恢复从山海关至沈阳的关外段铁路工程，并先完成锦州段工程。当时有关官吏，因恐怕雇用外国工程师勘测线路会激起民变，故不得不起用詹天佑。于是詹天佑被调任山海关至锦州段的驻段工程师。奉天将军曾祺为使铁路早日通车，破例保荐詹天佑升为关内外铁路帮办，委以大权。詹天佑负责主持锦州段铁路的修筑任务，其工程相当艰巨。它包括锦州铁路和营口支线两部分。前者自绥中向东展筑，经锦州至新民屯，沿线需建大小桥梁 90 余座，其中六股河大桥 25 孔(跨长 100 英尺者 24 孔，60 余英尺者 1 孔)、大凌河大桥 24 孔(每孔跨长 100 英尺)；线路还要跨越干柴岭山沟，沟深 48 英尺，长 1 英里，石质坚硬。后者自沟帮子修至营口的支线，全长 73 公里，沿途地势低洼、水质含碱量大，不宜饮用和作机车用水，为此，需建数座水塔和蓄水池，以引辽河淡水储蓄备用。这些都加大了修路难度。詹天佑精心勘测筹划，日以继夜，深入工地，指挥修筑。工程虽然艰巨，但进展较快，光绪二十五年(1899)关外铁路通车至锦州，次年通车至大虎山，营口支线也全部通车，仅大虎山至新民屯一段尚未完工。正当此时，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关内外铁路被英、俄两军占领而被迫停工，筑路人员只好撤出工地。

关外铁路停工后，詹天佑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应盛宣怀和铁路总公司聘约南下，主持恢复萍醴铁路工程。在督修中，他坚持用 4 英尺 8 寸半(1.435 米)的标准轨距进行修筑，使全国铁路轨距统一，以便互相连接，使运输畅通。萍醴铁路于光绪二

十九年(1903)竣工通车。此后该路展筑至株洲,成为连接湖南、江西、浙江等省铁路干线的组成部分。

关内外铁路被英俄两国占领后,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关内外铁路督办大臣,胡燏棻为会办,负责与英俄交涉,收回所侵占的铁路。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詹天佑奉命离开了萍醴铁路工地,返回关外,接收被俄国强占的关外铁路。以往詹天佑主持修建的线路、桥梁、机车等,由于帝国主义者的践踏此时大多已经损坏,尤其是车辆遭受的破坏极为严重。詹天佑抓紧时间,日夜抢修,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使关外铁路恢复通车了。

是年,詹天佑的官阶,由报捐而得的选用州同升为候选同知。

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清廷宣布于次年春季拜谒西陵。为便于慈禧太后等人"御驾"往来,决定从河北新城县高碑店到易县良各庄修筑一条新易铁路(也称西陵铁路),全长43公里,限期六个月完成,并拨官银60万两作为筑路费用,由直隶总督兼关内外铁路督办大臣袁世凯主管筑路之事。他原拟把工程交给英人金达主持,法国公使闻讯起而抗争,认为卢汉铁路是用法国借款修筑的,新易线系其支线,坚持要由法国工程师来设计建造,英法两国为争夺筑路权而相持不下。在无可奈何情况下,袁世凯只好放弃任用外国工程师的打算,改任詹天佑为新易铁路总工程师。詹氏仓促受命,经过周密策划,于是年十一月动工,次年三月谒陵前竣工。这是中国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慈禧等乘坐火车谒祭西陵后,甚为满意,对詹天佑和司机进行嘉奖,将其乘坐的火车车箱中的全

部陈设品作奖品,奖给詹天佑。詹天佑认为,此路建成是众人之功,非一人所为。因此,他只取其中一个小座钟作为建路纪念,其余则都分给筑路员工。此后,清廷又奖励承造新易铁路出力人员,以“候选同知詹天佑,曾在外洋学习工程专门多年,为中国工程中杰出之才,此次承修路工,正值隆冬天气,措手綦难,该员不避艰辛,督率各匠役勤奋趋事,得以迅速竣工,而用费亦极节省,实属异常出力”。而“提升为选用知府”①,其余出力承修路工及官员均获奖励和提升。

光绪三十年(1904),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聘请詹天佑为中国铁路总公司(设事务所于上海)工程顾问,以协助筹划卢汉、沪宁、粤汉等南北干线铁路。

自 1888—1905 年间,詹天佑除了 1901 年奉命督修萍醴铁路外,主要参与修建关内、关外铁路及营口支线,共长 940 余公里。尤其是新易路的建成,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自力修建铁路的勇气和信心,詹天佑也因独立设计和主持修成这条铁路而蜚声全国,这些都为他日后主持京张铁路工程创造了条件。

第四节　修筑京张铁路,大展宏图

张家口是屏藩北京西北的军事重镇,也是重要的南北贸易要冲。为繁荣经济、巩固政权,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批准督办铁路大臣袁世凯及其会办大臣胡燏棻的奏请,拨用关内外铁路的部分余利,修建北京至张家口的京张铁路。这一消息传出后,

① 詹同济、黄志扬、邓海成编:《詹天佑生平志》,第 56—57 页。

英俄两国为争夺筑路权而互不相让。因关内外铁路余利存在英国汇丰银行里，如要拨用，必须先同中英公司协商，于是他们乘机要挟，举荐英人金达担任总工程师。俄国公使则出面反对，声明以往清、俄两国有约，规定长城以外铁路不能由第三国承建，并乘机胁迫清廷指派俄人担任总工程师。英、俄两国相持不下，最后清廷决定不用洋人，全由中国“官款自办”，并委派詹天佑负责京张铁路的筹建工作。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1905 年 5 月），京张铁路局在天津成立，同时又在北京成立工程局，任命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局务会办。1906 年詹天佑接任总办。1905 年 5 月，当詹天佑奉命率队由丰台出发勘踏路线时，金达竟然同时由唐山出发，以行猎为名，别有用心地秘密勘测这条线路，5 月 20 日两人在南口不期相遇，金达对詹天佑说：“从南口到岔道城之间的路线（关沟段）困难程度大大超出他的料想，……中国人不能承担开挖山洞工程，……必须采用外国包工。……他愿招人投标承揽合同。”詹天佑明确告诉他，此线“袁总督已奏明皇上……不使用外国人”。金达说“不使用外国人一事乃是谎言！”[①] 国外还有一些人和报刊公开宣称：“中国能开凿关沟段之工程师尚未诞生于世！”[②] “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要过五十年才能实现！”[③] 等等，国内也有一些丧失民族自

① 詹天佑 1905 年 5 月 20 日的日记，见詹同济编译：《詹天佑日记书信文章选》，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9 年版。以下所引日记，皆引自此书。

② 詹天佑：《京张铁路工程纪略・京张铁路调查报告》（光绪三十一年），中华工程师学会出版 1915 年版。

③ 引自 1961 年 4 月 27 日《人民日报》茅以升文。

尊感的崇洋媚外者嘲笑詹天佑“自不量力”、“胆大妄为”等等。这些蔑视和嘲笑没有影响詹天佑的坚强信心，他怀着强烈的爱国心和事业心，毅然承担了这项具有国际影响的筑路任务。

詹天佑认为，修筑铁路，选线最为重要。为了寻找一条理想路线，詹天佑不仅多方搜求资料，实地考察勘测，而且还亲自访问当地农民，征求意见。他常常骑着毛驴在崎岖的山路上勘查。白天翻山越岭，晚上还要伏在油灯下计算、绘图、撰写工程日记。历时40多天，往返行程千余里，于6月24日终于完成全线初测任务。当时，对京张铁路勘测了三条比较线：一是由京奉铁路柳村车站起，经西直门到南口，沿关沟越岭，在八达岭过长城，出岔道城，再经康庄、怀来、沙城、宣化而达张家口。这条线峰峦起伏，尤其是从南口到岔道城一带的关沟地段，要在悬崖绝壁上修筑一条陡险的铁路，穿过古称“天险”的长城要塞居庸关、八达岭。铁路通过八达岭，必须开凿一座很长的隧道，坡度极陡，工程浩大，而运输量又受到限制。二是从张家口，经怀来县、延庆州、小张家口，沿着热河至北京的大路，经得胜口过山，再过明十三陵、黄土梁到北京。这条是由老乡所说可绕过关沟地带的线路，但路程绕远，坡度也很大，工程并不简单。三是从北京西直门向西40里，绕石景山、经过三家店，沿永定河，从青石到沙城附近的猪河口出山，到张家口。这条线坡度较平缓，但永定河峡谷河道迂曲，山崖陡峭，工程比关沟段更艰巨，但通过能力较高，运输量大。但其造价和工期都会超过当时清廷的规定而不能实施。这条线路后来建成现在的丰沙线。

詹天佑结合当时实际情况，对这三条比较线反复论证、筛选，最后决定采用第一条比较线。此后对关沟的困难路线又勘测

过多条局部比较线，经过分析，最后选定了在当时条件下较为理想的一条比较线。

对所选的比较线还要进一步复勘定线，詹天佑把通过关沟的全线分成三大段，调派人员，分段仔细勘定。第一大段从柳村到南口，由他亲自率领工程人员插标定线。他背着标杆与经纬仪在峭壁上定点制图。塞外常有狂风，满天灰沙，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他都坚持作业，并鼓励大家也坚持工作。他常勉励工程人员："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

通过勘测得知，京张铁路，全长200余公里，"中隔居庸关、八达岭、层峦叠嶂，石峭弯多，遍考各行省已修之路，以此为最难，即泰西铁路诸书，亦视此等工程至为艰巨"①。面对如此艰巨的工程，詹天佑深感责任重大。他说："此路又中国筹款自办，为各省倡，惟责重益觉才轻，而图终必先虑始，固不敢铺张从事，致巨款虚糜，亦不敢苟且速成，贻外人口实。"②他在致诺索布夫人的信中也写道："全体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那就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因若如此，中国工程师将失掉大众的信任。"③詹天佑深深认识到京张铁路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民族自信心的问题，因此，在筹划整个工程时，他丝毫不敢掉以轻心，经过缜密而慎重的研究，提出将京张铁路分三段兴修的方案：第一段由丰台至南口，长约60公里；第二段由南口至岔道城，长约33公里；第三段由岔道城至张家口，长约128公里。其中第二段因关沟阻隔，地形复杂，需要开凿大量隧道，工

①② 詹天佑：《京张铁路工程记略·修造京张全路办法》，《詹天佑文选》，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

③ 詹天佑致诺索布夫人信函，1906年10月24日。

程最为艰巨。

在修筑京张铁路的过程中,詹天佑充分展示了他出众的才能。首先他应用超群的定线知识和丰富的勘测经验,在地形险峻、工程艰巨的关沟段采用1∶30即33.3‰的大坡度和半径为600英尺(183米)的曲线,在青龙桥车站巧妙地设置"之"字形展线,使八达岭隧道长度由1800米缩短至1091米,既解决了最困难的越岭问题,又节省工程,降低了造价。

其次,在关沟段设保险岔道(避难线)和引进先进机车。为保证在陡坡上行车安全,詹天佑设置了12条保险岔道,站内4处,区间8处。为了适应在大坡度线路上行车的牵引吨数,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马莱(Mallet)复式活节蒸汽机车,以用机车的较大牵引力(42000吨)克服陡坡的坡道阻力,以解决在"之"字形线路上的行车问题。

在开挖隧道时,詹天佑还率先采用了直井开凿隧道技术。京张铁路有四座隧道,即八达岭、居庸关、石佛寺和五桂头。其中以八达岭隧道开凿最难,山势崎斜,石质坚硬,隧道长度大,詹天佑巧妙地从隧道中部开凿两个直径为10英尺、深为84英尺的直井,使隧道的开挖工作面从原来的2个增为6个,大大地缩短了施工期限,同时通过精密测量,随时校正隧道开凿方向和水平高低,保证了施工质量。

同时,詹天佑还注意就地取材,节约工程费用。如在桥梁工程中,他一面选用国外新型钢梁,一面又因地制宜,在山区尽量修建拱桥,既坚固耐用,又减少进口材料,以节约费用。在关沟段的20座桥梁中,有13座是混凝土拱桥。又如怀来河大桥工程艰巨,桥长212米,7孔钢梁。为了不误工期,詹天佑令先用骡车将

钢梁杆件运至桥头，拼铆成桥，节约了架梁铺轨时间，加快了工程进度。

在京张铁路修筑中，詹天佑还厘定了标准，首定工程规范。他非常重视工程标准化，主持编制了京张铁路工程标准图，包括京张铁路的桥梁、涵洞、轨道、线路、山洞、机车库、水塔、房屋、客车、车辆限界等，共49项标准，是为我国第一套铁路工程标准图。它的制定和实行，加强了京张铁路修筑中的工程管理，保证了工程质量，为修筑其他铁路提供了借鉴。1906年，他就当时中国铁路无统一标准的纷乱状态，写了有关标准说帖三份，上书清廷商部，以统一全国铁路建设的技术标准。其中提出了全国铁路车辆使用姜坭(Janney)自动车钩；统一采用标准轨距，即1.435米(英尺为4尺8寸半)，以使全国"车同轨"，畅通无阻。

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斗，京张铁路在1909年9月24日全线通车。京张铁路于1905年10月2日动工兴修，原计划6年建成，在詹天佑等人的努力下，只用了4年时间，提前两年完工。原预算的工款为纹银7291860两，清廷实拨7223984两，而决算的实际支出仅为6935086两，较实拨工款节余288898两，较预算节省356774两。每公里造价比当时修筑较易的关内外铁路线还低。

1909年10月2日，在南口举行盛大的京张铁路通车典礼，与会的中外来宾1万余人，很多人纷纷挤向詹天佑祝贺，詹天佑谦逊地说："这是京张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成绩应该属于大家的！"京张铁路的建成，完全打破了外国报刊的预言，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受到中外各方面的赞誉。清廷也予以特别褒奖，颁授詹天佑工科进士第一名的荣誉称号。1909年11月，詹天佑被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吸收为会员。

这是加入该会的第一位中国工程师。

从 1888 年起,詹天佑先后从事津榆、津卢、锦州、萍醴、新易、潮汕、沪宁、沪嘉、京张、张绥、津浦、洛潼、川汉、粤汉、汉粤川等铁路的修筑,为开创和发展中国铁路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此外,1905 年詹天佑被任命为商部路务议员,1907 年任邮传部路务议员。1908 年,被派任邮传部二等顾问官,加二品衔,后任邮传部参议行走等职。

1912 年,辛亥革命不久,詹天佑发起组织了"中华工程师会"(后改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并被选为会长。他希望通过学会把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组织起来,为建设富强的祖国而共同努力。他积极主持学会的工作,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创办出版《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等。

詹天佑还亲自编撰出版了《京张铁路工程纪略》、《京张铁路标准图》、《华英工学字典》、《告青年工学家》等论著,这些著作曾在我国工程技术界起过重要作用。

1919 年 2 月,詹天佑抱病参加了协约国在哈尔滨召开的"国际联合监管远东铁路委员会"会议,对"万国共管中国铁路计划"的阴谋予以坚决反击。由于操劳过度,病情加重,不幸于 4 月 24 日"悒郁以终"。临终时,他"语不及私,为国家陈述三事:一、振奋发扬工学会活动,以兴国富民;二、慎选人才以管理[中俄合办的]中东铁路;三、就款计工,唯力是视,尽速建成汉粤川全路"①。

1922 年中华工程师学会和京绥铁路同人会在青龙桥车站

① 引自宓汝成文,见《中国科技史料》1996 年第 17 卷 3 期,第 40 页。

上，建立了詹天佑全身铜像。1966年，其坟墓迁葬于此。近年在八达岭长城脚下建造了詹天佑纪念馆，以纪念他在中国铁路建设事业中的不朽功绩。

第二十四章　孙　中　山

第一节　探索救国的途径

孙中山，名文，幼名帝象，谱名德明，字载之，又字公武，号日新，嗣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之名由此而来。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时，还曾化名陈文、陈载之、张宣、吴仲、高达生、萧大江、杜嘉诺、高野长雄、Dokans、A laha 等。笔名则曾用“南洋小学”。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 年 11 月 12 日）生。

孙中山之父孙达成是佃耕农，早年在澳门当鞋匠。母杨氏、姊孙妙茜均参与农业劳动；兄孙眉曾受佣于邻村大户。因家境困苦，孙中山自幼参加农业辅助劳动，10 岁始入塾，据他自称“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1]，他的国学知识主要是长成后补习自修所得。

孙眉于同治十年（1871）赴檀香山为雇工，数年后自营牧场，孙家境况日趋改善。光绪四年（1878），孙中山远涉重洋至檀香

---

① 《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 2 卷，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59 页。

山，在孙眉开设的商店协理店务，旋入意奥兰尼(Iolani)学校(男子中学)学习3年，毕业后又就读于奥阿厚(Oahu)书院(高级中学)数月。孙中山从这些英美教会所办、以英语授课的学校中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开始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所熏陶，并对西方教育制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记述："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甚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周围同学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①

光绪九年(1883)，孙中山自檀香山归国。他对祖国的贫困落后颇感不满。居翠亨期间，在他倡议下，村里采取了一些兴革乡政的措施，"如教育、防盗、街灯、清道、防病，皆为筹办"②。为破除封建迷信，他又与同村好友陆皓东毁坏了北帝庙偶像。这种渎神行为遭到村民的指责，他被迫赴香港。年底，孙中山在香港入基督教。

孙中山先后进入香港的中等学校——拔萃书室(Diocesan Boy's Home)、中央书院(Central School)，即后来的维多利书院(Victoria College)、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读书。此期间爆发了中法战争，民族危机激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孙中山受到香港工人反法爱国斗争的鼓舞，觉得这个斗争"证明中国人已经有相当觉悟"，"表示中国人还有种族的团结力"③。他对清廷在打胜仗的情况下卑怯求和的行径深感愤慨，从而滋生了"倾覆清

① 《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9页。

② 郑东梦编：《檀山华桥》，檀香山1929年版，第11页。

③ 参见[美]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上海三民公司1926年版，第157—161页。

廷”的意念。

光绪十一年(1885),孙中山与卢慕贞结婚,后生有一子(孙科)二女。卢氏乃一无文化的家庭妇女,因孙中山长期在外求学和从事政治活动,双方甚少在一起共同生活。

孙中山想以治病造福人群,遂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习。同学之中,他与同会党关系密切的郑士良志趣相投,并得以了解会党的反清宗旨及其组织情况。翌年,孙中山转学到香港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经常名列前茅。且于课余博览中国经史和西方的政治、军事、历史、物理、农学等类书籍,特别喜读达尔文《物种起源》、《法国革命史》以及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家传记。时值资产阶级维新爱国思潮鼓荡全国,孙中山颇受早期维新思想家何启、郑观应等人的影响,曾撰写政论投寄港、沪各报刊,并于光绪十六年(1890)致函香山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退职官员郑藻如,提出振兴农桑,戒绝鸦片,遍设学校三项建议,希望先在本县倡行,再向全国推广。与此同时,他常对亲友发表不满清朝的言论,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人尤为投契,互抒救国抱负,倾慕洪秀全,被人称为“四大寇”。他与香港知识分子的爱国小团体辅仁文社成员杨衢云等也颇多往来。

光绪十八年(1892),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他到澳门镜湖医院任西医师,并自设中西药局。次年,因受葡籍医生排挤,转赴广州开设东西药局。行医期间,他以更大的热情努力探索各种救国途径:一方面加强与会党等反清力量的联系,甚至曾与陆皓东、郑士良、尤列等数人共同酝酿冀图建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名为“兴中会”的反清组织;另方面又打算制

订一项全面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计划，争取统治集团中开明人士的支持，并通过他们在全国实行，而他本人还准备前往法国等国考察发展农业的经验。

光绪二十年五月（1894年6月），孙中山偕陆皓东至天津上书直隶总督李鸿章。在由他起草的达8000余字的长函中，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体制，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即从发展教育事业、农业、工矿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企业四个方面着手，作为中国“富强之大径，治国之大本”①。但孙中山未受李鸿章接见，上书亦未被理睬，深感失望。当时，适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即甲午战争），孙中山对清廷在战争初期的颟顸无能尤感愤懑。于是，他毅然抛弃了对清廷的幻想并摆脱了改良主义的羁绊，成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开拓者。

第二节　创立兴中会

光绪三十年十月（1904年11月），孙中山重抵檀香山。20多名华侨青年接受他的倡仪，举行会议，成立了兴中会，选举刘祥（商店司理）、何宽（银行经理）为正副主席。孙中山起草了《兴中会章程》，强调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规定以“振兴中华”作为立会的主要宗旨。他还起草入会的秘密誓词，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② 的革命主

① 《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18页。

② 《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页。按：史学界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此誓词乃于香港兴中会成立后提出的。

张。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建立新制度为目标的民主革命纲领。兴中会成立后又在夏威夷一些地方建立分会,会员增至百余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兴中会曾组织会员进行军事训练,向爱国侨胞募集资金,以为反清武装起义作准备。

孙中山曾决定在广州举行起义,为推翻清朝建立第一个据点。于是,他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回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机关,随后又到广州建立了兴中会组织。孙中山亲自修订兴中会章程,进一步揭露了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反动统治所造成的亡国危机,号召人民团结奋起以拯救祖国。数月之内,秘密入会者达数百人,大多为会党分子,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包括辅仁文社部分成员)则是兴中会的骨干。孙中山以全力投入了武装起义的筹划和准备工作。他与陆皓东、郑士良等在广州建立秘密机关数十处,并遣人联络城郊、顺德、香山、潮州、北江、西江等地会党、绿林,在广州城内策反一部分防营和水师官兵,结纳中日战争中被裁撤的游勇,又通过杨衢云、黄咏商等在香港筹集经费,购置军火,招募起义人员,通过何启(香港议政局议员,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老师)、谢缵泰等争取香港舆论界的支持;并商定以重阳节(阳历 10 月 26 日)为起义日期。但在发难前夕,清广东当局侦知孙中山等的起义图谋,并接获香港政府提供的情报,乃出动军队封闭革命机关,搜捕起义人员。这样,经半年多惨淡经营的第一次反清起义未及发动即遭失败,陆皓东等被捕殉难,孙中山则从广州出走,经澳门、香港逃往日本。自此以后,孙中山成为清廷以重金悬赏通缉的"要犯",长期流亡海外,在海外继续组织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1896 年 10 月),孙中山在英国伦敦为

清驻英公使馆所绑架，面临被偷运回国处死的危险。旋得他的老师、香港西医书院前教务长康德黎(Cantlie，Sir James)等奔走营救，英政府根据国际公法向清使馆提出交涉，始获释放。伦敦蒙难13日，使孙中山名驰中外。此后他以半年多的时间，在大英博物馆等处认真研读欧美各种思想流派的著作，并就地考察英国的社会状况，思索着西方各国政治制度的得失。他后来自述：此期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①。他在理论上的探讨导致了日后三民主义学说的形成。

从光绪二十三年七月(1897年8月)起，孙中山居日本历4年余。他广泛结交日本朝野人士，与部分旅日华侨和留学生建立联系，支持菲律宾、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国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一度争取与逃往日本的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联合，但因双方在对待清朝的态度上存在着原则性分歧而未能实现。他又派遣兴中会同志在香港创办革命喉舌《中国日报》，并加紧联络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会党组织。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兴中会、广东三合会和两湖哥老会的代表在香港举行会议，联合建立了"兴汉会"，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是时，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疯狂掠夺，侵占中国领土和划分势力范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华北蓬勃兴起。帝国主义列强拼凑八国联军发动大规模

①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2页。

侵华战争。孙中山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在广东起事,以挽救民族的危亡。他计划同与清廷有矛盾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合作,先实现两广独立,再由南到北建立全国性共和政权。为了推进这个计划,一面与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曾广铨联系,一面通过何启要求香港总督卜力(H. A. Blake)给予支持。与此同时,孙中山积极筹备武装起义,派遣郑士良在惠州集结会党力量,史坚如、邓荫南在广州设立策应起义、实行暗杀的机关,其他同志分头联络各府、州、县,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等则在香港筹饷购械。不少日本人也参与起义的筹划和募款工作,其中包括真诚帮助中国革命的宫崎寅藏等以及抱有不同动机的人士。日本政府曾一度想利用孙中山,后因内阁更换,乃禁止武器出口和日本军人参加起义活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由于英国政府不同意香港总督支持两广独立的计划,李鸿章又应诏北上,孙中山遂转而全力准备在内地起义,往返于西贡、台湾等地就近进行部署。同年闰八月十三日(10 月 6 日),郑士良率 600 人在惠州三洲田起义,攻占一些村镇,起义军发展至 2 万人。但起义队伍粮械不继,被数量上占优势的清军包围,在坚持了 10 多天后,乃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予以解散。史坚如则在广州谋炸署两广总督德寿未成,被捕牺牲。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又告失败。

就在惠州起义前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会在海外的势力迅速膨胀,处处侵占革命派的阵地。甚至连孙中山亲手创立的檀香山兴中会,也因受梁启超的影响而变质和瓦解。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孙中山前往檀香山,在改组兴中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名为"中华革命军"的组织,并在入会誓词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 16 字纲领。与原来的兴中

会主张相比，这个新纲领的民主共和要求更为明确，而且增添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内容。他为了争取华侨更广泛的支持，还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被授予"洪棍"之职。与此同时，他在《檀山新报》上撰文与保皇派论战，批判君主立宪的主张。次年春，他转赴旧金山，协助致公堂(洪门堂号)在美国各城市对其会众实行注册，并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孙中山的这些活动，虽对削弱保皇派的影响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却未能取得华侨对民主革命事业的有力支持。

第三节　组织中国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学说

正当孙中山在美国努力寻找革命的支持力量时，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办学堂和出国留学风气的盛行，已经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民主革命觉悟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从爱国走向革命，在东京、上海等地编撰和出版了大量革命书刊；由他们所发起组织的民主革命团体，如湖南的华兴会、湖北的科学补习所、江浙的光复会等也相继成立。不少革命者在国内策划反清起义失败后，又纷纷逃到了日本。孙中山深受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鼓舞，认为中国革命必须以这些知识分子为主要依靠力量，必须把他们联合到一个大团体内以协调全国的革命运动。于是，他离开美国往欧洲，先将旅居比、德、法等国数十名中国留学生组织起来，然后在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 年 7 月)来到了当时中国留学生和革命流亡者的集中地——日本东京。

孙中山一到东京，便前往拜访华兴会领袖黄兴，商谈联合，

深得黄兴赞同。随后又与其他革命者和进步留学生频频磋商，取得了一致意见。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孙中山约集倾向革命的留学生(其中有兴中会、华兴会部分会员)共70余人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并以孙中山提出的16字纲领作为同盟会宗旨。七月十三日(8月13日)，1000多名留学生隆重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发表了充满爱国激情的演说，号召与会者以革命手段在中国“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1]，并争取在20年内把祖国建设成为超过日本和西方的强国。这次集会，起了从思想上动员留学生参加同盟会的作用。七月二十日(8月20日)，孙中山主持了约100人出席的同盟会成立大会，通过同盟会总章，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同时确定了各部职员的人选。同盟会成立初期的领导核心由孙中山、黄兴、汪精卫、邓家彦、张继、朱炳麟、陈天华、田桐、胡汉民、程家柽、廖仲恺、何天瀚、宋教仁、朱执信等组成。

中国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它的诞生使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有了一个指导中心。数年之内，海内外纷纷建立同盟会支部和分会，会员激增至数万人。“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2]，孙中山对此甚感快慰。

同年十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16字宗旨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此时的三民主义学说，其核心内容是要通过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达到一个政治目的，即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来取代

①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9页。
②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7页。

清朝君主专制统治；至于民生主义，则企图通过“平均地权”防止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祸害。三民主义是一面富有号召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旗帜，它把散居各地的广大革命者集结成为具有共同理想基础的伟大战斗力量。《民报》在孙中山的思想指导下，以大量篇幅阐发同盟会的政纲即三民主义学说，论证以革命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必要性，并对保皇派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它广销海内外，对提高人们的民主革命觉悟起了重大作用。

第四节　策划反清武装起义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策划反清武装起义的实践中。他和黄兴派遣一部分同盟会员秘密回国筹备起义，自己则先后赴越南西贡以及南洋各埠建立同盟会分会，并募集起义经费。他还与黄兴、章太炎等一起制订了由10余篇文件组成的《革命方略》，以备在各地发动起义时应用。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1906年12月)，少数同盟会员联络湘赣边境洪江会、洪福齐天会，发动萍浏醴起义，遭清廷镇压。日本政府徇清公使之请，要求孙中山离开日本。光绪三十三年二月(1907年3月)，孙中山抵越南河内建立了领导武装起义的总机关，以广东、广西和云南作为起义地点。他认为这三省地处边陲，群众基础较好，易于举义；地域宽广，利于迂回作战；又便于从国外输送武器和人员。他计划首先在广东潮、惠、钦、廉四府同时发动，再把起义烽火引向广西、云南，以南方数省为根据地，向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推进。孙中山在河内、海防、南圻等地相继成立了

同盟会分会，还接纳了广西著名会党首领王和顺、游勇首领黄明堂等加入同盟会。他分别派遣许雪秋、邓子瑜等赴潮州、惠州联络会党，黄兴、胡毅生赴钦州、廉州运动新军，汪精卫、黄隆生等赴南洋一带劝募军饷；日籍同盟会员萱野长知、宫崎寅藏等则在日本购运军械，胡汉民、冯自由在香港做策应联络工作。

但是，起义的实际进程并未按照孙中山的预想发展。革命党人往往准备不周，起事仓促，且为清军所迅速镇压。是年共发动了四次起义：陈涌波、余既成指挥的潮州黄冈之役，邓子瑜指挥的惠州七女湖之役，王和顺指挥的防城之役，黄明堂指挥的镇南关之役。镇南关之役爆发的次日，孙中山曾偕黄兴、胡汉民等自河内赴前线参战。这次起义失败后，清廷要求法国殖民当局把孙中山驱逐出境。孙中山乃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1908 年 3 月)离越南前往新加坡，而委托黄兴、胡汉民继续主持起义工作。孙中山走后不久，又发动了由黄兴指挥的钦、廉和广西上思之役，以及由黄明堂、王和顺指挥的云南河口之役。这两次起义坚持的时间较久，但在清朝重兵包抄和因法国封锁边界而断绝后援的情况下，辗转苦战，最后仍然溃败。孙中山在西南边境领导的以会党、游勇为主力的 6 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

起义的接连失败，丝毫动摇不了孙中山继续革命的坚强意志。他在当时指出："吾党经一次失败，即多一次进步"，失败之后必须"谨慎戒惧，集思补过"，这样"则党力庶有充实之时"①。他在新加坡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时已意识到了依靠会党为主力所产生的弱点，认为它的纪律松弛，战斗力不及新军，预言"今后军

① 《〈支那革命实见记〉序》，《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375 页。

队(按指新军)必能继起”。因此,他密令一些同盟会员分头运动新军①。这是孙中山关于武装斗争方针的一个重要转变。

当时,新加坡的保皇派报纸对孙中山起义屡次受挫进行嘲讽和中伤,并趁机大肆攻击中国民主革命道路。孙中山在《中兴日报》上连续发表3篇文章给予坚决反驳,从而在南洋各埠掀起了一场革命派对保皇派的激烈论战。影响所及,使更多的侨胞投向了革命营垒。在孙中山及其战友的努力下,同盟会在各埠建立了数十个分会,吸收了数千名会员,并在这一基础上成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他为了筹集更多资金以组织新的起义,于宣统元年四月(1909年5月)赴欧美。

同年九月,胡汉民按照孙中山的部署在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用数月的时间筹集资金,运动以广州新军为主的武装力量,准备再次起义。孙中山也从旅美华侨中募得港币8000元,汇回以充军需。宣统二年正月(1910年2月),广州新军与巡警发生冲突,同盟会员、新军排长倪映典率领3000名士兵仓卒起义,当天即遭镇压。

孙中山得悉新军起义失败后并不灰心,为筹划新的起义而继续努力,他在美国的一些城市建立同盟会分会,又在旧金山成立了美洲同盟总会(即同盟会美洲支部)。在由他起草的入会盟书中,将同盟会的名称改为“中华革命党”,将16字纲领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②;并发函通知南洋的同盟会组织照此办理。但他指出,今后对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

---

①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5年版,第401页。

② 《中华革命党盟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39—440页。

的名称"两者俱可并用"①,而纲领的措辞虽有不同,仍是反映了三民主义的内容。孙中山之所以作此改变,与同盟会内部矛盾的激化有密切关系。早在光绪三十三年他到河内领导西南边境武装起义时,留在东京的一部分同盟会员章太炎(《民报》主笔)等,便曾因《民报》经费和起义受挫等问题,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两年后,陶成章(原光复会员)又因孙中山不愿再为《民报》提供经费,拒绝帮助他为在江浙举事筹款,而纠集了一部分同盟会员对孙中山大肆诋毁攻击,再次要求罢免孙中山,并于宣统二年正月在东京重建了独树一帜的光复会。这两次倒孙风潮,虽由于黄兴等的坚决抵制而平息下去,但孙中山因此不再承认设在东京的同盟会本部的领导作用,而是以总理名义建立自己的权力中心,直接领导同盟会南方、南洋美洲各支部的活动。改变组织名称和纲领措辞,便是他试图改组同盟会所采取的措施。

孙中山除了动员旅美华侨为国内革命运动提供财政支持外,还与美国退休银行家布斯(C. B. Boothe)和军事研究家咸马里(Homer Lea)订立协议,拟向纽约财团借贷巨款以发动大规模起义。宣统二年(1910)夏,他到达马来半岛等候数月而接不到布斯等的任何汇款,原因是纽约金融界不愿贷款给孙中山。正当此时,孙中山从外国报章获悉日、俄两国为进一步掠夺中国东北地区而重订了密约的消息,感到祖国危亡迫在眉睫,便决定尽速组织起义。同年十月,他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黄金庆、邓泽如等革命骨干在槟榔屿举行秘密会议,批评部分同志的悲观消极

① 《复邓泽如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47页。

情绪，剖析“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的种种有利条件，提出了在广州再举的意见①。会议接受孙中山的主张，决定集中全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夺取广州后分兵两路向湘、赣进发，同时组织长江流域各省起兵响应，会师北伐。会后，众人分赴南洋英、荷各属筹款。而孙中山因在一次募捐会上发表演说，竟被英国殖民当局以所谓“妨碍地方治安”为由勒令离境。孙中山被迫重赴欧美，并于次年初到加拿大各埠演说募款，一共筹集了港币 7 万余元。

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受孙中山的委托，在香港成立了统筹部。数月之间，为准备起义做了大量工作。但因不断发生意外事故和困难，起义未能按预定计划发动。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 年 4 月 27 日），黄兴率领百余名“选锋”队员在广州举事，与敌人浴血奋战一昼夜，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事后收得 72 具烈士遗骸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之役”。

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听到了起义失败的消息，对殉难烈士表示深切哀悼，同时给予这次起义以极高的评价。他指出，“革军之敢勇英烈，为全球各国所……未曾有，革命之声威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②。他随即向芝加哥同盟会分会提出了“集合巨款，分途举义”的新计划。同年夏天他到旧金山，努力促成设在那里的美洲同盟总会和美洲致公总堂联合起来，消除门户之见，协力筹饷救国。进而在他倡议下成立了美洲洪门筹饷局（又名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孙中山自任“演说员”，与筹饷局职员一起赴

①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 6 卷，第 242 页；《在槟榔屿与中国同盟会骨干会议的讲话》，《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493 页。

② 《复谢秋函》，《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518 页。

美国各城市募款。与此同时,他一再发函指示国内及香港等地同盟会员,加紧调查和联络南北各省新军,做好起事的准备。这时他的起义战略已有所改变,曾设想在广州、武汉、南京等城市同时发难,推动驻北京附近的新军起而响应,以便一举摧毁清皇朝。而当时国内各地发生了风起云涌的抗捐、抢粮暴动和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更使他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他在闰六月所写的一封信中对全国革命形势作了如下估计:"现时各省民心之望革命军起,以救彼等脱离清朝之苛政者,已若大旱之望云霓。而十八省之新军,亦多欲倒戈相助。……吾党无论由何省下手,一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①] 这一预见,已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

第五节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八月十九日(10 月 10 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于 3 天之内占领武汉三镇。1 个月后,南方已有 12 个省脱离清廷宣告独立。十月底,光复省份更增加到了 17 个。这场遍及全国的革命风暴因发生于旧历辛亥年,史称"辛亥革命"。

八月二十一日(10 月 12 日),孙中山在美国中部得悉革命军占领武昌,喜出望外。他立即中止了美国各地演说筹款的计划,决定回国前作一番重大的外交努力,避免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军事干涉,并争取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在政治上、财政上支持中国革命。

① 《复郑泽生函》,《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534 页。

是月二十九日(10月20日),孙中山到达纽约,向美国人介绍中国革命的宗旨,希望他们对革命同情与帮助。并发表告各国书,宣布承认外国在华的一切既得权益,同时警告各国不得给清廷提供军事援助,否则将以敌人相待。九月二十一日(11月11日),孙中山抵伦敦。他与四国银行团主任举行两次会谈,要求停止对清廷贷款,并给予即将成立的民国政府以财政援助。他还写信给英国等国的金融资本家,呼吁他们借款50万英镑给民国政府。又委托友人拜会英国外交大臣,提出了停止对清廷一切贷款,制止日本援助清廷,取消英属各殖民当局的放逐令以让他取道回国等三项要求。十月初一日(11月21日),孙中山抵巴黎,访问法国众议院时,请议员们促进法国政府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又在与东方汇理银行经理的会谈中,要求贷款给民国政府,表示将收回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并希望法国能阻止俄、日勾结干预中国革命。孙中山在欧美三国办理外交历时1个多月,由于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革命采取观望和敌视态度,致使他屡遭冷遇,并未取得显著的效果。

孙中山因一再接到革命党人催促他回国的电报,便缩短在欧洲的行程,于十月初四日(11月24日)从马赛港启航回国。十一月初六日(12月25日)抵达上海。初十日,他被17省代表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当天晚上,孙中山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他当众庄严宣誓,决计履行"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的责任①。同日颁布大总统宣言书,宣告临时政府

① 《临时大总统誓词》,《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页。

的施政方针:“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实现各民族的统一和各省领土、军事、民政、财政的统一,在全国范围内奠定中华民国的牢固基础①。5日发表对外宣言书,宣布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建立“平等睦谊”,并应取得国际承认,共同为促进世界文明而努力;同时,承认革命前清廷与各国缔结的条约及所让与的种种权利继续有效②。

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陆续颁发了数十道民主改革的法令。保障人权方面,禁止对犯人刑讯体罚;废除奴婢卖身契约;禁止买卖人口和贩卖“猪仔”华工;取消对广东、福建的“疍户”,浙江的“惰民”,河南的“丐户”以及理发匠、优伶、娼妓、杂役、兵卒等歧视,规定他们享有同等的国民权利。改良社会习俗方面:禁止赌博,劝禁妇女缠足,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刷新吏治方面:禁止徇私枉法,取消“大人”、“老爷”称呼。改革教育制度方面:普及教育,取消学校祭孔读经,删改教科书中忠君和其他违背民主共和原则的内容。发展生产方面:鼓励华侨投资,保护工商业,振兴农垦,等等。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北方仍是清朝统治范围,全国存在着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孙中山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结束清朝帝制,在共和制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而当他还在国外时,南北议和已经开始,南方代表在黄兴、黎元洪等人的赞同下曾与北方代表约定:如果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由他担任民国大总统。因此,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日便致电

①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2页。

② 《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0—11页。

袁世凯,表示"虚位以待",盼他"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1]。但袁世凯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极为不满,悍然中断谈判,唆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共和。孙中山乃于1月11日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制订六路进军计划,下令出师北伐。北伐军在津浦线上首战告捷,占领徐州,在其他战场上也取得了一些胜利。

但是,当时北伐军的实权为各派系的军人所掌握,孙中山无法实行统一指挥。临时政府又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不仅无法保证军饷的供给,连日常的行政经费也难以支持。同盟会大多数领导骨干又都不赞成武力统一,而是极力主张与袁世凯妥协。加以帝国主义列强竭力支持和扶植袁世凯,利用临时政府要求取得外交承认和它的财政困难来施加压力,催促孙中山尽快与北方达成和议。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继续派人与袁世凯谈判,但坚持一切解决办法均须在中国建立共和制度为前提。袁世凯急于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玩弄了各种政治权术,在设法使南方作出更大让步的同时,又指使北洋将领接连发出几道催逼清廷立即"宣布共和"的通电。2月12日,清宣统帝下诏退位。至此,宣告了统治268年之久的清皇朝的灭亡,也宣告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这个历史的大变化,是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所造成的。

清帝退位的第三天,孙中山即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4月1日,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袁世凯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至北京,继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了防范袁世凯背弃民

---

① 《致袁世凯电》,《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6页。

主共和原则,于卸职前主持制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并通过各项条文保证国民应享的民主权利,确立共和政体的有关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①。卸职后,他以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目标已经达到,便致力于民生主义的宣传,提倡在中国兴办实业和修筑铁路,并为此前往国内各地和日本访问考察。

第六节 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

8月,同盟会与另4个小党在北京合并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选为理事长。担任代理事长的宋教仁为争取成立“政党内阁”而积极活动,并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袁世凯视宋教仁为眼中钉,于1913年3月20日派刺客在上海车站暗杀了他。接着又不惜出卖国家权益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的协议,企图用作镇压南方革命党人的军费。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闻悉宋教仁被刺的消息,立即于25日赶回上海,力主“先发制人”,组织南方各省武力讨袁。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誓师,宣布独立,揭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接着,江苏、上海、安徽、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等各省市也先后宣布独立。在北洋军队的攻击下,南方各省讨袁军在短短一个月内相继失败。孙中山原打算到广东直接领导讨袁,因大势已去,不得不于8月再度流亡日本。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了由他担任总理的中华革

① 《公布参议院议决临时约法》,《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20—224页。

命党，继续部署反袁斗争。这期间，孙中山与原配卢慕贞离婚，并于 1915 年 10 月在东京与他的忠实助手宋庆龄结婚。1916 年，反袁护国运动的激流冲毁了洪宪帝制，袁世凯也随即殒命。孙中山回到了上海。然而，掌握北京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承袭了袁世凯的衣钵，对外卖国，对内毁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继续推行独裁统治。孙中山乃于 1917 年南下广州，联合西南军阀势力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发起了“护法”运动。但他没有自己的军队，不久便遭到桂系军阀的排挤，不得不于次年再赴上海。在上海期间，他撰写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重要著作。1919 年 10 月，他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继续担任总理。1920 年，命粤军陈炯明部驱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势力，11 月重回广州。次年 4 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孙中山被选举为非常大总统。5 月 5 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再次揭橥护法旗帜，部署北伐。1922 年 6 月，陈炯明部在广州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在白鹅潭的军舰上坚持战斗 50 余天后退居上海。在此前后，孙中山曾与俄国共产党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有所接触，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1923 年，陈炯明的部队被滇军逐出广州，孙中山第三次回到广州建立革命政权，任陆海军大元帅，重新部署北伐。

1924 年 1 月，孙中山主持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同年 6 月创办黄埔军校，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军队政治工作制度，训练培养革命武装干部。10 月，亲自作出有力部署，平息了广州的商团叛乱。11 月，应北京政变领导人冯玉

祥等的邀请,北上商谈国是。他提出了对内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并同北洋军阀进行不调和的斗争。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临终时留下了“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宝贵遗嘱。

孙中山的著作甚丰,版本不少。中华书局 1981 年至 1986 年出版的《孙中山全集》(凡 11 卷),是迄今为止收录著作最多的全集版本,共收入孙中山的论著、文告、公牍、函电、演说、谈话纪录等约 8200 篇,400 余万字。



第二十五章　黄　　兴

第一节　走上革命道路

黄兴，原名轸，字廑午，从事革命活动后改名黄兴，字克强①。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1874 年 10 月 25 日）生于湖南善化（今长沙市）。5 岁时，跟随父亲黄筱村发蒙读书，随后又入附近的私塾就读，学习勤奋。童年时代，喜欢听乡间老辈讲洪秀全、杨秀清的革命事迹，“稍长，喜读太平天国杂史”②。他还师从浏阳李永球学乌家拳术，从小练就强健的身体。

光绪十九年（1893），黄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考中秀才。光绪二十四年，黄兴由长沙湘水校经堂新生，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两湖书院在当时是一所比较新式的学堂，课程除经史文学外，还有天文、地理、算学、测量、化学、博物学以及兵操等新学科。黄兴在校期间，“笃志向学，而于地理一科及体操尤为精勤”③。他还于“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

① 1904 年起义失败、东渡后始改名，取“兴我中华，兴我民族，克服强暴”之意。

② 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 13 页。

③ 张知本：《国庆日忆黄克强先生》，载 1959 年 10 月 10 日香港《时报》。

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①，初步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学说。

光绪二十六年(1900)，唐才常、林圭等在长江流域组织自立军起义，黄兴曾与闻其事，帮助他们运动清军中的湘籍军官保持中立，不加阻碍。这是黄兴第一次运动军队，初步了解到当时清军的内部情况。但自立军起义很快被张之洞镇压，唐才常等英勇就义。黄兴痛悼唐才常，并萌生了革命思想。

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选派学生30多人，赴日本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留学。黄兴这位两湖书院的优秀毕业生，成为这批留学生中唯一的湘籍学生。是年五月(1902年6月)，黄兴抵东京。

黄兴到日本后，很快就被留学生界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所吸引。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1902年12月)，他与杨笃生、樊锥、蔡锷等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以翻译为主，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黄兴为扩大影响，在年底又与蔡锷、张孝准、杨笃生等发起组织“湖南编译社”，大量从事译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黄兴还支持湖北留学生创办了《湖北学生界》，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宣传“排满”的民族主义。他还领导宏文学院的湘籍学生组成“土曜会”，鼓励挺身杀敌，“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②。

黄兴虽然学的是师范，却特别留意于军事技能的学习。他

① 《黄克强先生荣哀录》，第21页。

② 石陶钧：《六十年的我》，见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45页。

请日本退伍军官教授军略，学习兵法；利用空闲时间参观日本士官联队各种兵操；每天清晨起来，到神乐坂武术会参加射击比赛。

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生了拒俄运动。俄国在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趁机占领了整个东北。光绪二十九年三月，第二期撤兵期满，俄国却仍然不履行条约，企图永久霸占东北。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因而爆发了拒俄运动。黄兴积极参加了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他在拒俄运动中看清了清廷的腐朽与反动，愤慨地指出："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① 于是他自认为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指归国发动革命之人员)，准备回国策动反清革命。黄兴在回国前夕与刘揆一讨论进行方略，认为除在军学界普遍发动外，目前更应注意团结会党兄弟，共谋反清革命。他自东京启程回国后，便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第二节　创立华兴会

黄兴回国后，先到上海，与当时《苏报》的主笔章士钊会晤，并结识了沪、宁等地一些人士。光绪二十九年七月，黄兴返湘途经武汉，"在两湖书院演说满汉畛域及改革国体、政体之理由，与顽固派辩论终日"。湖广总督张之洞闻讯大怒，立即命首府兼院长梁鼎芬出告示将黄兴驱逐出境。黄兴仍"留连八日，以携带邹容所著之《革命军》、陈天华所著之《猛回头》二书，零星赠送军学

① 《黄克强先生荣哀录》，第25—26页。

各界至四千余部之多"①。

黄兴回到长沙后，在明德学堂主持新开办的速成师范班。明德学堂是长沙城里新办的一所私立学校，教员中许多人都富有革命思想。如张继教历史，周震麟教地理，苏玄瑛教国文等。黄兴除在明德学堂任课外，还在长沙的经正、修业、实业等学堂和民立第一女学、安徽旅湘公学兼任教员。他利用教书的机会，向学生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以教书为掩护，暗中从事革命活动。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1903年11月4日)，黄兴以过30岁生日为名，邀陈天华、张继、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等人秘密集会，商定创立华兴会，众人公举黄兴为会长。为避免清廷的注意，对外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业务是"兴办矿业"。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黄兴提出"雄据一方与各省纷起"的方案，即从湖南发难，然后谋各省的响应。先后参加华兴会的两湖革命知识分子有四五百人。黄兴和华兴会的同志印发宣传品，鼓吹反清革命。他还在明德学堂的理化实验室里，和日本教员一道秘密制造炸弹，并派人出省购置军械。黄兴还变卖祖遗田产，以解决经费的需要。为了联络会党和军队，黄兴又设立两个小团体：一是同仇会，专为联络哥老会；一是黄汉会，专为运动军队，重点是联络会党。

光绪三十年(1904)，黄兴曾亲自会见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商讨起义计划，决定于十月初十日(11月16日)慈禧太后70寿辰

①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册，第276页。

那天在长沙起义，常州、衡州等五路同日举事，公推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

华兴会在湖南部署稍有头绪之后，便加强与外省的联络工作，派宋教仁、胡瑛到武昌，着重运动武汉三镇新军；派陈天华、姚宏业游说江西防营统领廖明缙，劝其届期响应；派周维桢、张荣楣接洽四川会党，促其与两湖会党合作；派杨毓麟、章士钊负责沪、宁地区的策应工作。黄兴则来往于湘、鄂之间，统筹指挥全局。

这个起义计划不幸临期泄漏，马福益手下的人被清地方当局所捕，供出了起义计划和首领"长沙黄厘午老师"。于是长沙府、县衙门开始在省城搜捕革命党，特别要捉拿黄兴归案。事态急转直下。九月十六日(10 月 24 日)，黄兴于差役来捕时乘间避往开明绅士、明德学堂校董龙绂瑞家，后又转移到圣公会牧师黄吉亭处，至十八日(26 日)化装成海关员司，潜出长沙，逃往上海。华兴会的其他重要骨干也先后避于上海。长沙起义计划遂陷于流产。

黄兴创立华兴会后，策动的首次武装起义未及发动即陷于失败。主要是由于未能严加保密，革命机关处于半公开状态，招集人员仍采取旧式会党散发票布的落后办法，致使起义走漏风声。长沙起义事泄后，会党虽然受到严重损害，但华兴会却保存了元气，黄兴及华兴会骨干纷纷离开长沙。

第三节　参与组织中国同盟会

黄兴避居上海后，因万福华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案的牵

连,被捕入狱。后经多方营救,得以出狱。后避难到东京,过着流亡生活。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7月),经日本人宫崎寅藏介绍,黄兴与孙中山初次会见。二人畅谈革命大势,交流思想,共议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六月二十七日(7月29日),黄兴约集华兴会骨干商议与兴中会合组革命团体问题。会上,陈天华明确主张"以吾团体与之联合";刘揆一主张"不入孙会";黄兴则主张"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宋教仁认为"既有入会不入会者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之关系如何"①。众说纷纭,最后在东京的华兴会员除少数人外,其他都决定参加统一的革命团体。

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分头邀请各省倾向革命的留学生,到东京举行建立统一革命团体的筹备会。与会者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留日学生中其他团体的部分成员和日本人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共计70余人。会上,确定新成立团体的名称为"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议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黄兴在会上发表演说,慷慨陈述革命大义,并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

七月十三日(8月13日),黄兴、宋教仁等在东京发起组织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到会者达1300余人。孙中山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说,指出当前民族思想蓬勃发展,号召到会者摒弃改良主义道路,采取革命手段,致力于反清斗争。

---

① 宋教仁:《宋渔父日记》,《辛亥革命》第2册,第210—211页。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在东京举行,到会者约百余人。黄兴首先在会上宣读章程草案30条,经大会讨论修改后通过。章程规定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本部机构遵循三权分立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在选举总理时,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①]提议获得一致通过。黄兴还提议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后改称《民报》),得到与会者赞同。

黄兴在与孙中山共建同盟会上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同盟会是以孙中山、黄兴为轴心建立起来的。同盟会的成立,加强了革命力量的团结和统一,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四节　领导武装起义

同盟会成立后,黄兴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武装起义上。他首先在学习军事的留日学生中建立"丈夫团"秘密组织,积极培养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同时,在日本横滨设立"制造弹药机关",聘俄国革命党人为教授,对同盟会员进行军事训练。为保密起见,他还亲自掌握留日陆军学生中同盟会员的会籍。

光绪三十一年冬,黄兴化名张守正,潜回国内,至广西桂林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军中进行策反,发展官佐多人参加同盟会。因郭人漳犹豫不定,黄兴于次年秋返回日本。即派刘道一、蔡绍南

---

① 田桐:《同盟会成立记》,《革命文献》(二),第143页。

等回国，运动军队、会党，策划起义。临行前，"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1]。指出革命之目的决不是单纯推翻清朝，而是要建立民国，争取民权。这里所说的"国民主义"，即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刘道一抵长沙后，邀集革命同志数十人秘密开会，传达黄兴的意见。会后，刘道一留在长沙掌握全局，蔡绍南等则往萍乡一带联络会党。十月十九日(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起义者在颁发的檄文中，第一次打出了"中华民国"的旗号。起义虽然失败，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黄兴赴越南河内，与孙中山商议策划两广起义。当时，广东钦州、廉州(今属广西)爆发了抗捐斗争。清军郭人漳部移驻钦州，镇压抗捐斗争。黄兴冒险去钦州，策动郭人漳起义。郭人漳表示，"如有正式革命军起，必反戈相应"。七月，王和顺率会党起义，占领防城，直逼钦州。郭人漳看到革命力量有限，改变主意，按兵不动。起义军作战失利，退入两广交界的十万大山。黄兴出走越南河内，和孙中山商讨下一步的计划，准备在广西边界的镇南关(今友谊关)发动起义。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1907年12月2日)，黄兴派同盟会员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进攻镇南关，占领了山顶上的3座炮台。镇南关起义爆发后，黄兴和孙中山从河内前往指挥。起义军跟清军激战几昼夜后，终以弹药缺乏，援军未到，不能坚守，只得自动放弃，退入越南境内。

是年，章太炎、陶成章、张继、宋教仁、谭人凤等在潮惠起义

---

①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册,第284页。

失败后，鼓动同盟会内一部分人主张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举黄兴担任。黄兴致信在东京同盟会总部以庶务代行总理职权的刘揆一，表示反对，信中说："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① 黄兴以革命大局的利益为重，一直注意维护同盟会的团结，使其免于发生重大分裂。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1908 年 3 月 27 日），黄兴率退入十万大山的会党部众和越南华侨等 200 余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发动了著名的钦、廉、上思起义。这支队伍，凭着 200 多支杂枪和为数不多的弹药，转战于钦州、廉州、上思一带 40 多天，大小数十战，先后击败清军 1 万余，声威大振。孙中山曾赞誉说："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今越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望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② 四月初，因势单力孤，弹尽援绝，黄兴等不得不退返越南。适值云南河口起义爆发，孙中山即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河口起义诸军。黄兴不顾鞍马劳顿，迅即前往河口前线督师。到河口后，因起义军内部指挥不灵，调度不动，便决定重回河内，征集旧部组织基本队伍，然后再赴前线。在返回河内途中，被法警截留，遣送出境。河口革命军失去统帅，起义又归于失败。

宣统元年四月初一日（1909 年 5 月 19 日），孙中山由新加坡启程赴欧美筹款，以济革命之进行，而将国内革命运动委托黄兴、胡汉民负责。十二月（1910 年 1 月），黄兴应同盟会南方支部

①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 4 册，第 289 页。

② 《辛亥革命》第 1 册，第 14 页。

的邀请,赴香港主持策划广州新军起义。经商议,决定次年元宵节(2月24日)前后举事。不幸消息泄漏,革命党人不得不提前发动起义。宣统二年正月初三日(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等率新军千余人在广州城郊起义。清军出城镇压,倪映典中弹牺牲,起义失败。孙中山、黄兴并不因历次起义失败而灰心,决定"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1]。

宣统二年十月十二日(1910年11月13日),黄兴赴槟榔屿,出席孙中山召开的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广州起义。十二月十八日(1911年1月18日),黄兴返抵香港,主持广州起义筹备工作。商定成立统筹部,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部长。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五日(1911年4月23日),黄兴致绝笔书于孙中山及南洋同志说:"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2]是日晚,由香港乘轮船潜入广州,设起义指挥部于越华街小东营五号。由于几经周折,起义一再改期,原来的部署被打乱,遂将进攻计划由原定十路改为四路。他自己担任进攻两广总督衙门的指挥工作。三月二十九日(4月27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率领林觉民、方声洞等敢死队100余人攻打总督衙门,其余三路未见行动。攻入总督衙门后,发现总督张鸣岐已逃跑,遂放火烧了总督衙门。起义军撤出时,遭到巡防营的堵击,许多革命党人牺牲,黄兴右手二指被击断。但他忍住剧痛,用断指的第二节扳枪机继续射击。眼见敌人渐渐合围,黄兴遂下令分三路突围,自己带领一路奋勇冲杀,且战且走。在突围中,队

---

① 《辛亥革命》第1册,第16页。

② 《黄兴集》,第40页。

伍散乱，只剩下黄兴1人。他改装逃到暗设于广州河南的革命机关女同志徐宗汉处，由她护送至香港就医。广州起义失败。后收殓殉难者，得尸体七十二具，合葬在黄花岗，世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虽然又失败了，但在全国起了极大的革命激励作用。黄兴是这次起义的总指挥，他勇敢无畏，身先士卒，在国内和旅居国外的华侨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在香港养伤，曾一度灰心，想冒险去暗杀李准等清朝官吏，为死难烈士报仇，被谭人凤等人劝阻。闰六月初六日（7月31日），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鉴于南方起义一再失败，主张将革命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中部地区发动起义。黄兴支持他们的计划，并设想“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①]。这个预计，为后来革命实践证明基本是正确的。他还应允湖北革命党人的邀请，准备赴武汉主持起义大计，但未及动身，武昌已爆发起义。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非常恐慌，派陆军大臣荫昌带兵前往镇压，溃败而还。清廷只好起用掌握北洋陆军的袁世凯出马。袁世凯集中精锐部队猛攻汉口，局势对革命军非常不利。黄兴在香港得悉武昌起义的消息后，随即离开香港，赶赴武昌前线。九月初七日（10月28日），黄兴抵达武昌。据记载：“正当前线紧急之际，黄兴由上海乘轮船到达武汉，旋赴都督府与黎元洪会晤。黎闻黄兴到后，即下令做一面大旗，上写‘黄兴到’三个大字，派人举着大旗，骑马在

① 《黄兴集》，第67页。

武昌城内和汉口没有被清军攻陷的地方跑一圈。前线将士听到黄兴来了,士气高涨,军心大振,居民铺户也纷纷鸣放鞭炮,表示欢迎。"① 黄兴立即渡江赴前线督师,在汉口与清军展开剧烈的争夺战。九月十二日(11 月 2 日),清军将领冯国璋攻入汉口,革命军退守汉阳。九月十三日(11 月 3 日),湖北军政府举行"登坛拜将"的隆重仪式,任命黄兴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他率领革命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奋战 20 余日,由于清军占优势,十月七日(11 月 27 日)汉阳失陷,革命军退守武昌。黄兴认为继续作战无法取胜,不如放弃武昌,转攻南京,等占领南京后,再训练一支精锐部队来收复武昌。他的主张遭到武昌地区革命党人的坚决反对。黄兴便于同日辞职,离武昌去上海。

黄兴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坚守汉阳 20 余日,使各省得以乘机大举,次第响应,革命军声势一天天壮大,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黄兴作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在推翻腐朽的清朝统治、结束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五节 民国初建

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1911 年 12 月 1 日),黄兴由武昌返

① 周武彝:《陆军第三中学参加武昌起义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7 集,第 17 页。

抵上海。次日，江浙联军即攻下南京。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临时政府暂设南京，公举黄兴为大元帅，负责组织临时政府。因黎元洪反对，于是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代大元帅职权。十一月初四(12月23日)，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遂推辞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并向众人解释："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以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以为戒。"① 初六日，孙中山抵达上海，黄兴和陈其美等人前往迎接。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黄兴担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兵站总监，负责全部军事工作。陆军部成立后，立即制订出分兵六路北伐的计划，准备在南北和议破裂时，立即宣战，分兵合击，直捣北京。当时，属于南京临时政府领导下的军队虽号称17个师，但战斗力较强的仅有不满万人的粤军2个师，其他各师战斗力很差，有的将领专横跋扈，不听命令，而军饷又十分拮据，黄兴的处境很困难。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南北和议就在上海开始了。袁世凯依靠他的北洋军队，凭借帝国主义列强做靠山，一方面利用革命派的势力逼清帝逊位，一方面对革命派耍弄武力和"议和"的两面手法。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迫清宣统帝退位。13日，孙中山实践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推荐袁世凯接任。15

①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196—197页。

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4 月 1 日，南京临时政府宣告结束。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重新组阁。南方各省和许多团体纷纷致电袁世凯，要求留任黄兴为陆军总长。但袁世凯不愿放松对军队的控制，命其亲信段祺瑞任此职，另任黄兴为无实权的参谋总长。黄兴辞不就任。袁世凯随后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府留守，办理政府机关的结束事项和接收管理驻南京的军队。南京驻扎有 10 多万人的军队，袁世凯却不发给军饷，存心与黄兴为难。黄兴为了保存革命实力，选择优秀军官和精良武器组成第八师。这个师的中上级军官，大多数是同盟会员，有的还是“丈夫团”的成员。黄兴想用全力把第八师组织起来，作为革命军队的一个中心堡垒，对其余部队则分别进行裁撤或调拨出去。裁兵任务完成以后，留守府就被取消了。

袁世凯为了麻痹和笼络革命党人，于 1912 年 8 月邀请孙中山和黄兴到北京会谈。黄兴继孙中山之后，于 9 月 11 日到北京，袁世凯给予隆重接待。黄兴一时受袁世凯的蒙蔽，对袁深表信任，声称“袁公确是英雄，民国第一流人物”①。这时，宋教仁在北京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黄兴被推举为理事之一。黄兴积极推行政党政治的主张，他甚至劝说袁世凯也加入国民党，袁世凯自己虽未加入，但他的亲信、代理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大多数阁员都填写了国民党入党誓愿书。黄兴天真地认为这样就可以维持民国前途，于是萌生功成身退之意。他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便转而积极鼓吹和致力于发展实业和教育。

---

① 《民立报》1912 年 9 月 4 日。

1912 年 8 月，他在《铁道杂志序》中写道："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末由。"主张"先以铁道为救亡之策，急起直追，以步先进诸国后尘，则实业庶几兴勃也乎！"[①] 为了发展实业，他曾发起创办拓殖协会和拓殖学校，旨在开发国家资源，发展农业，移民实边；大力提倡国民捐，倡议创设国民银行和国民银公司，发行不兑换券，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他担任过铁道协会副会长和汉粤川铁路督办，赴萍乡、安源、湘潭等地调查过矿务；参与发起中华汽船股份有限公司和洞庭制革公司，等等。这些活动和主张，目的在于发展经济，收回外溢利权，具有鲜明的爱国色彩和进步意义。

黄兴十分注重教育。他说："欲言建设，当得人才；欲得人才，当兴教育。"[②] 又说："兴思二十世纪世界共同解决者，实为发展国民生计问题；而本问题锁钥，则在国民之企业力与日俱高。……夫发达国民企业力，其途亦多，而有良好之中小学以植其基，则为天经地义之不容或易。"[③] 为此，他主张"普通教科材料应取实利主义"，并"可以实业教育定为全国女子教育方针"[④]。此外，他还主张延长教育年限、小学用国语教学，提倡军事的国民教育。

由于政局的动荡和变化，黄兴发展实业和教育的主张大都未能实现。这使他对实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曾说："兴以为吾国人今后当各存责任心，有责任心，则纯

---

① 《黄兴集》，第 252 页。
② 《黄兴集》，第 240 页。
③ 《黄兴集》，第 244 页。
④ 《黄兴集》，第 267 页。

以国家为前提,而私见自泯。且所谓责任者,其途甚宽,除政治方面外,尤以实业为发展国力之母。"① 可见,黄兴在谈论实业的重要性时,并没有脱离政治,而是要"以国家为前提"。

第六节 南京讨袁

1913 年 3 月 20 日,代理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身亡。国民党人集议对策,孙中山主张立即起兵讨袁。黄兴认为掌握兵权的人不肯在此时出兵讨袁,只好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与孙中山的意见发生分歧。不久,谋杀宋教仁的凶犯在上海租界落网,并搜出有关案件的函电多件。4 月 25 日,在黄兴、陈其美的敦促下,江苏都督程德全公布宋案证据 44 件,直接布置暗杀宋教仁行动的是国务总理赵秉钧。真相大白,舆论哗然。作贼心虚的袁世凯,一面替赵秉钧狡辩,反对黄兴提出成立特别法庭公开审理的要求;一面不经参议院议决,不顾黄兴等人的反对,擅自同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2500 万英镑的协定。袁世凯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后,立即扩充军队,准备向南方革命派进攻。同时,袁世凯借口破获"血光党",诬陷黄兴,并指使北方都督通电攻击黄兴等人。6 月 14 日,袁世凯下令免去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三省都督的职务。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处于被动地位的革命派,在袁世凯的进攻面前,不得不奋起反抗。江西都督李烈钧在上海会见孙中山、黄兴后,于 7 月 12 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首先竖起了讨袁的旗帜。袁世凯随即派

① 《黄兴集》,第 243 页。

兵南下，步步进逼，战事危急。7月14日，黄兴自上海赶到南京。15日，迫使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黄兴被举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通电誓师讨袁。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和上海先后响应，是为“二次革命”。

讨袁战争开始后，南京方面，由于一部分军队被袁氏用金钱收买，发生内变；作为基本队伍的第八师又因拨出两个团，仅剩2000人左右；其他部队大都未经训练，战斗力薄弱。7月22日，徐州失守。25日，江西湖口被袁军占领，李烈钧败退。上海讨袁军久攻制造局不下。而南京讨袁军的后方湖南军械库又被袁世凯的奸细纵火焚毁，饷械不支，声援断绝。黄兴见大势已去，只得于29日乘日本煤轮离开南京，流亡日本。随后，安徽方面也因内部意见不一，而自行瓦解，柏文蔚出走。福建、湖南、四川又相继宣布取消独立。“二次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第七节　流亡日、美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流亡日本，国内参加讨袁失败的国民党人也陆续来到东京。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宋案发生后，即应兴师讨袁，但党人多不听从他的指挥，坐失良机，致使袁世凯得到了“大借款”，可以从容布置，因此对黄兴颇多责难[①]。孙中山认为党员不听他的号令，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分子太复杂，已不能起作用，主张解散国民党，另行组党。并表示他要做真党魁，不愿做假党魁，党员必须绝对

---

① 参见《黄兴集》，第458页。

服从党魁的命令。黄兴对孙中山的责难做过些解释,但仍表示:“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生之责,固所宜然。”[①] 对于“二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黄兴认为:“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②] 黄兴不赞成另行组党,主张国民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以整顿、扩充,在原有基础上发展反袁的其他革命分子,以团结更多的力量共同奋斗。

1914 年春,孙中山在东京筹备成立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入党一定要写誓约,并且一定要写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按上中指指模。孙中山自己的誓约则为“统率同志,再举革命”。经孙中山审定的《中华革命党章程》规定 :党员分为三等,即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首义党员是元勋公民,协助党员是有功公民,普通党员是先进公民;在革命时期内,非党员不得有公民资格[③]。黄兴对此很不赞成,他认为无论仍用国民党的名义或者另组新党,领袖非孙先生莫属。但若要在誓约上写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这就是服从一个领袖,为一个人干革命;如果还要在誓约上按指模,那就像犯罪的人写供词一样,两者都违背了自由平等的精神。至于党员入党之后,都是共患难同生死的革命同志,应该一律对待,而不应划分等级,更不应以所谓“功勋”、“有功”、“先进”公民享有权利不同相号召。因为党员是为尽革命的义务而入党的,不应当贪图个人的权利

① 《黄兴集》,第 356 页。
② 《黄兴集》,第 357 页。
③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 1 册,第 162 页。

和享受。①

黄兴当面向孙中山陈述过这些意见,但孙中山表示,一切要按他的计划进行,愿附从者,必须绝对听他的号令。并写信要求黄兴"静养两年",以便他发动"三次革命"②。黄兴于是决定远游美国,"静养"一个时期,以便孙中山发展抱负。黄兴在动身前夕,在寓所与孙中山话别,孙中山写了一副集古句对联相赠:"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③对联意味深长。1914 年 6 月 30 日,黄兴从横滨乘轮船赴美。

黄兴于 1914 年 7 月抵达美国,在旧金山和纽约稍作停留后,居住在费城郊区。他同日本及国内一些革命同志经常有函电往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发表演说、编印资料、撰写文章,向美国公众舆论和华侨宣传反袁。1914 年秋,黄兴还发起抵制袁世凯向美国政府借款的运动,对于美国政府中止与袁世凯的代表接洽借款条件,产生了一定影响。他还在美国展开筹款工作,在给国内友人的信中写道:"关于此间筹款等事,弟能力所及者,当尽力为之,冀为公等之助。华侨筹款已经发起,当嘱其随集随汇。"④ 在旧金山居留时,黄兴曾聘一美国教师讲授美国政治及地方自治情况,以为将来建设作准备。

黄兴虽身居美国,但仍一直与国内反袁势力保持较密切的联系,共同策划反袁斗争。1915 年 9 月底,蔡锷派专人送封密信

---

① 参看黄一欧:《护国运动见闻杂忆》,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8 辑,第 79—80 页。

② 《黄兴集》,第 360 页。

③ 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 430 页。

④ 《黄兴集》,第 413 页。

给黄兴,信中谈及国内形势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他自己准备秘密出走和在西南发难的计划,征求黄兴的意见。黄兴接信后,立即命儿子黄一欧和秘书石陶钧先后离美回国,参加倒袁运动。在黄兴所派的石陶钧、张孝准等协助下,蔡锷从天津经日本、上海、香港秘密到达昆明,组织和领导了云南护国战争。为了扩大讨袁战线,黄兴于云南起义前夕,写信给不甘附逆的社会名流,如张謇、汤寿潜、唐绍仪等,以及可争取的地方将领,如广西的陆荣廷,动员他们反对袁世凯称帝。1916 年 1 月,黄兴电促柏文蔚等在南洋筹款接济云南护国军;又密令刘揆一、居正等联合北方同志,"图谋直、鲁革命,以响应南方"。护国战争进展顺利,袁军溃不成军,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先后宣布独立。

这时,国内各方面的函电纷纷飞来,要求黄兴早日回国,主持讨袁运动;孙中山也电邀他回国并肩讨袁。黄兴遂于 1916 年 4 月 22 日自旧金山启航,5 月 9 日到达东京,即发表讨袁声明。5 月下旬收到先期返沪的孙中山来信,分析了反袁形势,嘱其向日政府借款,购买军械,以建立革命新军。此后,黄兴多方奔走,并不断为此事与孙中山电商。至 5 月底,日方允借 500 万日元。1916 年 6 月 6 日,袁世凯因举国声讨,众叛亲离,忧惧而死。黎元洪代行大总统职。于是借款练兵之事乃作罢。

1916 年 7 月 8 日,黄兴回到上海,和孙中山一道致力于讨袁善后和党内团结的工作。两人商谈国事,一如往昔。

10 月 10 日,黄兴胃病复发,吐血数盂,卧床不起,延至 10 月 31 日溘然长逝。1917 年 4 月,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

第二十六章　邹　容　陈天华

第一节　留 学 日 本

邹容，谱名桂文，曾改名绍陶，字蔚丹，或书为威丹、味丹，留学日本时改名邹容，四川巴县人。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父邹子璠，经商致富，期望儿子通过科举博取功名，在仕途上平步青云。

光绪十七年(1891)，邹容随大哥蕴丹入私塾发蒙。十一二岁的时候，他就已熟读"四书"、"五经"，能诵读《史记》、《汉书》等名著。此时，正当维新运动高涨之时，邹容逐渐接触到以推介"新学"、"西学"为主的书刊。他于是开始接受另一种启蒙教育，并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萌发了蔑视封建文化、科举制度的感性认识，觉察到清朝统治的腐败，对中国面临的遭受帝国主义瓜分的险境也深感忧虑。这样，邹容的思想和志趣，就完全和父亲的期待相左，新旧冲突，很快就在父子之间爆发。

满12岁那年(光绪二十三年)，邹容奉父命偕大哥应巴县童子试。刚进头场，就因为试题很生僻，他当即同主考官顶撞起来[①]，于是愤而罢考离去。回到家里，他遭到了父亲的责打。但邹

---

① 邹传参:《先祖邹容及其家书》，周永林编:《邹容文集》，第133页。

容并不服气,倔强地向父亲申辩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愿入。衰世功名,得之又有何用?"[①] 事后,邹子璠虽迫令儿子进入重庆经学书院继续接受儒学经典的教育,但邹容仍不就范,在书院"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②]。"攻击程朱及清儒学说,尤体无完肤"[③]。因此,被书院开除。

次年,戊戌维新运动遭到扼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伏尸都门的讯息传到四川。邹容不胜愤慨,在谭嗣同的遗像前题诗悼唁:"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④]这时,邹容还算不上成年人。

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川省首次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在成都举办考试。邹容要求前往应考。邹子璠感到无法使儿子流连在科举的道路上,于是允诺他去一试,其目的在于让他留学回来获得朝廷赐予举人、进士的功名,仍旧跻入官场。因为,清皇朝业已下诏"变法",盛传已有授予留学生功名官职的措施。是年六月,邹容冒着盛暑从重庆步行到成都参加考试。试后获录取,由主持此次考试的候补知府李立元领着晋见四川总督奎俊。奎俊"勉励数语,旋命归渝治行装,于八月中旬同往日本"[⑤]。可是,就在临行之前,邹容被某些顽固分子诬为"聪颖而不端谨",予以除名[⑥]。但邹容毫不气馁,怀着渴望摆脱传统桎梏,探索新知的心情,在父亲面前犯颜力争,要求自费留日。当年深秋,他从亲戚处

①④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列传",《邹容传略》。
② 章太炎:《赠大将军邹君墓表》,《太炎文录续编》第5卷。
③ 《〈革命军〉作者邹容》,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
⑤ 《家书二》,《邹容文集》,第34页。
⑥ 《关于邹容书信的几个问题》,《邹容文集》,第129—130页。

借得路费，乘船发自重庆，穿过三峡，顺流东下，到达上海。不久，进入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补习日语。邹子璠旋经亲戚劝说，答应支付留日费用。邹容遂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到达日本①。入东京同文书院。

此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有500余人，思想远较国内活跃，其中已有一部分显露了革命的倾向，并开始对改良派的保皇论调加以抨击。邹容到了日本，就将在国内被压抑的思想感情尽情地抒发出来。“凡遇留学生开会，容必争先演说，犀利悲壮，鲜与伦比。”② 倡言对待清皇朝，“不变法当革，变法亦当革”③。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激进的反清立场，充沛的爱国热忱，经常见于形色，溢于言表。在留日学界，他很快成为大家所熟知的革命分子。

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邹容将他的革命激情和爱国赤诚凝聚到笔端，全神贯注地撰写《革命军》一书。二月，清廷派到日本管束留学生的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因奸情事被揭露，准备回国。此人多方箝制言论，屡屡迫害学生，为留学界所痛恨。邹容于是偕张继借端发难，于三月初三日(3月31日)约集几个留学生，直入姚的寓所，历数其劣迹，将其辫子剪下，悬挂到中国留学生会馆的正梁上示众。清驻日公使蔡钧闻讯，立即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引渡邹、张二人。为暂时避祸计，邹、张遵友人规劝，离日

① 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四川学务处》、《四川游学诸生调查表》，均在邹容名下到东京年月一栏内填写“二十八年八月”，参阅何一民：《邹容留学日本时间考》。

②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列传》，《邹容传略》。

③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辛亥革命》第1册，第466页。

回国,于三月十九日(4 月 16 日)返抵上海①。

邹容惩处姚文甫的前四日(二月二十九日),陈天华偕刘揆一、仇亮、杨昌济等湘籍留学生到达东京。

陈天华,原名显宿,字星台、过庭,号思黄,湖南新化县人。生于光绪元年(1875)。父陈善,是一个贫寒的乡村塾师。陈天华 5 岁随父读书。嗣以家贫,被迫“废学营小卖自给以求学”②。喜读历史书籍和传奇小说,尤其爱好民间传唱的话本弹词。稍长,清朝官场暴戾贪墨的景象,广大劳动人民啼饥号寒、备受荼毒的境况,经常激起陈天华的愤慨,从而使他对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深表景仰。故“少时即以光复汉族为念,遇乡人之称颂胡、曾、左、彭功业者,辄鄙弃不顾,而有愧色”③ 。

光绪二十一年(1895)前后,陈天华随父徙居新化县城,仍以营小贩糊口。嗣得族人周济,入资江书院求学。他深感读书机会难得,越发勤奋努力,把“书院里的一部二十四史,整日整夜,细

---

① 冯自由撰《〈革命军〉作者邹容》称,邹容是日本留学生义勇队的发起人之一,并任队员,“遂日从众会操”(《革命逸史》第 2 集第 47 页),实系误记。查邹容自述:“予于今年中历三月间去日本而至上海,即与友人章炳麟同寓”。(《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吴稚晖《自苏报案至赴欧日记》则记载邹、章系三月十九日抵沪(《吴稚晖先生全集》卷 12,第 698 页)。四川荣昌谢健撰《四川诸君公鉴》(载《苏报》四月十五日)提到四月初一日张园拒俄大会,“盖我四川簿中除健以外,仅巴县邹君一人而已”。说明邹容确曾出席张园聚会。又遍查东京留学生拒俄义勇队(成立后二日改名学生军)的队长、区队长、分队长、队员全部名单,亦无邹容之名(《苏报》四月二十二日)。冯自由记述的讹误,近年尚在有关论著中沿袭,故仍有澄清之必要。

② 杨源濬:《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

③ 冯自由:《〈猛回头〉作者陈天华》,《革命逸史》第 2 集。

心研读"[1]。二十三年，维新变法运动急剧高涨，湖南因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倡导，更称一时之盛。影响所及，新化县进步人士也相继进行维新活动，以开风气。二十四年闰三月，若干士绅上禀请禁幼女缠足，陈天华以童生名义参与其事[2]。当时，新化县仿时务学堂例在县城设实学堂，聘请的教习也都倾向于维新。陈天华考入实学堂肄业。

二十五年(1899)，陈天华偕父亲以及残废的长兄同在县城廪保公所教小学生，同时在实学堂作通学生。次年春，他得友人资助，到长沙入岳麓书院就读。盛夏时，因父丧返乡，忧伤过甚，又染痢疾，仅免于死。二十七年(1901)，"入省中求实书院，以文章名。莅湘某令，欲妻之，君毅然却之曰：'天下方多故，安能再以儿女情累我乎！国不安，吾不娶"[3]。

光绪二十八年(1902)，湖南巡抚俞廉三令举办咨送出洋游学和咨送京师大学堂的考选事宜，规定凡在岳麓、城南、求实等各书院肄业者，择优录送；当年壬寅科乡试落榜后，可调卷评阅，以定是否录送；各县、府、道也可保送少量名额。陈天华由长宝道以新化监生名义保送，经考核，调入省城师范馆。旋以留学生尚有余额，因而陈天华、肖仲祁、袁宗翰、成凤韶等得补为官费游学师范生[4]。翌年初，湖南省官费、自费留学生50人领咨启行，二月二十二日(3月20日)由上海乘日轮博爱丸号东渡，二十九日抵达东京。陈天华入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

① 罗元鲲：《陈天华的少青年时期》，《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
② 《湘报》第149号。
③ 杨源浚：《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
④ 《湖南官报》第204、211、261、325号。

这时,“拒俄”运动大起。邹容刚返上海,陈天华乍到东京,都积极投身于这个炽热的反帝爱国运动中。

第二节 《革命军》和“苏报案”

邹容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中旬返抵上海,就读于爱国学社。当时,学问文章已负时誉的章太炎在学社任教,他同邹容交往几次,就发现这个年近弱冠的青年才思敏锐,胆识超群,于是结为忘年交,并邀约章士钊、张继四人结盟,以“排满”革命相勖勉。

清末,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以及新式学堂的兴办和留学风气的大盛,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羁绊,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愿望,在上海表现得日益明显;偕同这一新的经济和新的政治力量迅速成长的新式知识分子,也纷纷汇集上海。于是,新旧冲突,新兴力量反抗封建桎梏的斗争,都渐次以“学界风潮”的形式滋生踵接。爱国学社就是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南洋公学退学风潮的产物。因此,学社里的政治空气异常活跃,师生们经常在上海著名的张园集会,演讲时事。这类引人瞩目的社会动态,也推动了一些报刊的政治态度的转变。上海一份创刊于光绪二十二年名为《苏报》的日报,就反映了这种现象。二十八年冬,它增辟“学界风潮”专栏,销路大为改观。翌年初,《苏报》主持人陈范与爱国学社订约,由章太炎、蔡元培等轮流撰稿,销售量更有所增长。

二十九年(1903)三月,传闻广西巡抚王之春将借法兵平定该省会党起事,东京留日学生即致电爱国学社及中国教育会,盼相互响应,亟起抵制。二十八日(4月25日),上海爱国人士在张

园开"拒法"大会。不旋踵，又传来俄国违约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协议，妄图独占东三省权利的消息。上海人士又于四月初一日(4月27日)会于张园，通电"拒俄"。初三日，为抗议侵略暴行，留日学生议决组织"拒俄义勇队"。初四日，上海千余人又在张园集会，蔡元培当场宣读东京留学生电文，群情益愤。爱国学社师生旋即仿东京留学生的作法，组织义勇队(嗣亦改称军国民教育会)，计96人，分8个小队，朝夕操练。安徽、湖北、江西等省省会学堂的学生相继仿效。"拒俄"运动迅猛发展。

在狂飙乍起的"拒俄"运动中，邹容越加意气奋发，积极参与张园集会和义勇队的操练。四月二十八日(5月24日)，中国教育会在张园开四月月会，邹容作《论改革中国现时大势》的演说，爱国热望，意切情深。同时，他还提出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的倡议，号召全国学生结成大团体。邹容迫切地期望新兴的、最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乘时振作，肩负起反清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正是在这种爱国激情驱使下，邹容写完了《革命军》一书，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持请章太炎修改。章看过后，击节赞赏，认为正是这样直率豪放、通俗的文字，能够发挥广泛的宣传作用，因而不作任何修饰，提笔书写一篇序文，称许《革命军》是"义师先声"。随即由柳亚子等筹集印刷费用，交大同书局排印，于五月初出版发行。

正当《革命军》问世之际，《苏报》因章士钊接充主笔，于五月初六日(6月1日)宣布"大改良"，言论更趋向激进，"排满"、"仇满"的文词，连篇迭出。初六日刊登《康有为》一文，痛斥康有为力倡保皇、抵拒革命的言行。十四日(9日)，刊登《读〈革命军〉》，将该书誉为"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又在"新书介绍"栏

评论说,《革命军》"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闰五月初五日(6 月 29 日)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摘登章太炎《驳康有为书》,指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对康有为的保皇谬论痛加批驳。《苏报》迅即成为举国瞩目、独步一时的革命报刊。

五月初,江苏巡抚恩寿即据商约大臣吕海寰的咨文,着上海道向租界当局交涉,捉拿张园集会的倡首诸人,计有蔡元培、章太炎、黄宗仰、吴稚晖等。租界捕房曾几次按名传讯。及《革命军》和《驳康有为书》相继面世,《苏报》连日刊登"排满"文字,清廷即电令两江总督魏光焘、苏抚恩寿查禁爱国学社的活动及《苏报》,饬令"严密查拿,随时惩办"。魏、恩奉旨,即派候补道俞明震到上海,会同上海道袁树勋向各国驻上海领事团交涉,请为首领事在拘票上副署,持票捉人。领事团为了维护租界的特权,答应由租界捕房拘人,交会审公廨审理,如应判刑,也在租界内执行。闰五月初五日、初六日,《苏报》馆帐房程吉甫和章太炎以及陈范的儿子陈仲彝、办事员钱宝仁等被捕。初七日(7 月 1 日),邹容自投捕房,以与章太炎共患难。蔡元培事前离沪赴青岛,陈范、黄宗仰、吴稚晖等避匿,旋出国远走。随后,领事团徇上海道的请求,于十三日将《苏报》封闭。

闰五月二十一日(7 月 15 日),会审公廨开始审讯。清廷雇请的两名外国律师和章、邹雇请的两名外国律师,在会审公廨当堂对簿,二十七日(21 日)续审。嗣又在会审公廨开"额外公堂",继续审讯。清廷首先是企图使租界当局应允将章、邹二人引渡到华界,按清律处以极刑,未果;于是退而要求公廨判以永远监禁

之罪。租界当局并不是对章、邹等有所袒护，而是坚持租界内享有“治外法权”，拒绝按清律判决。故这一案件迁延近1年，至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七日（1904年5月21日）才得以结案，判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监禁2年，罚作苦工。程吉甫等已具保释放。这就是轰动清末的“苏报案”。

清廷本拟藉“苏报案”以兴大狱，杀害章太炎、邹容等一干革命人士，使参与爱国学社、张园集会、拒法抵俄等活动的人们畏惧后退，并遏制《革命军》、《驳康有为书》、《苏报》等反清书刊的流行。因此，它不惜放弃历来矜持的天朝体统，雇请律师，作为原告一方，在上海租界与章、邹公堂对簿。孰料事与愿违，“苏报案”荏苒经年，本身就成了一次持久的反清革命宣传，《驳康有为书》、《革命军》及其他革命书刊，流传更广。

邹容自入狱起，即抱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他同章太炎在狱中赋诗明志，互相砥砺。闰五月二十八日，章吟《狱中赠邹容》一首：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宜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即赋《狱中答西狩》相唱和：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充分表现了革命者临危不惧，勇于献身，对前途充满信心的

高尚情操和英雄气概。

不幸的是，邹容距出狱只有两个多月，即被折磨致病，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1905年4月3日)在狱中逝世，年仅20岁。噩耗传出，中国教育会立即为他开追悼会。遗骸由革命志士刘三(季平)冒险运出，安葬于上海华泾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示：邹容"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①。

邹容以短暂的年华，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自由幸福，建立了不朽的勋绩。

邹容所撰《革命军》风行国内和海外华侨中，销售达110万册，对鼓动清末革命高潮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孙中山看到《革命军》后，赞赏不已，认为"此书感动皆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他对邹容和章太炎身陷牢狱，异常关切。二十九年初冬，他又到檀香山，改组兴中会，建立"中华革命军"，确定"今后同志当自称为军，所以记邹容之功也"②。迄1917—1919年期间，孙中山著《建国方略》，还言之谆谆："《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者大。"③ 在清廷制造的"苏报案"里，邹容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沉毅果敢的胆略，挫败了清廷妄图遏抑革命潮流的企图。经过"苏报案"，清皇朝愈益被人民所憎厌，革命浪潮更澎湃高涨。

《革命军》计7章2万余言。它开宗明义就以火热的激情，锋利的笔调，谱成了革命的颂歌："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

①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51号。

② 《复某友人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版，第228页。

③ 《建国方略》第八章《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6页。

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接着，邹容用许多事例，历数清朝统治者对内暴戾恣睢，荼毒人民，对外卖国求荣，引狼入室的苛政罪行，阐明中国已处于“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强之驱迫”的危险处境，将要落入“十年灭国，百年灭种”的万劫不复的深渊。而当务之急，在于“欲御外侮，先清内患”。这样，人们读了《革命军》，就能获得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必然性、紧迫性的结论。那么，中国所要进行的是什么样的革命呢？邹容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明确地答复：“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邹容对于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尤为倾慕，着重“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制订了在中国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共和国”的 25 条纲领，号召人民奋起，“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最后，邹容在《革命军》中以激昂慷慨的口号表述他对祖国、对人民的诚挚热切的祝愿：

“中华共和国万岁！”

“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

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

吴玉章的这首挽诗，公允地评价了邹容和他的《革命军》的历史功勋。

第三节 为警醒同胞而蹈海

东京留学界的“拒俄”运动以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三日(1903年4月29日)开会于锦辉馆伊始。当日到会500余人,一致议决组织“拒俄义勇队”,开赴疆场,与俄国侵略者决一死战。陈天华到日本刚满1月,立即投身于义勇队,加紧操练。同时,他怀着极度愤恨的心情,书写《敬告湖南人》的公开信,号召群起拒俄救亡。义勇队旋改称学生军,又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陈天华自认为“运动员”,愿自备费用返湖南筹措经费,开展活动。嗣因故未成行。

拒俄运动遭到清廷的暴力压制,天华越发愤懑焦急,寝食不安。从当年初夏至仲秋,挥笔撰写《猛回头》、《现世政见之评决》,冀以唤醒国人,奋起反抗侵略,“排满”革命。是年冬,俄国大量增调军队侵入中国东北,国难日亟。陈天华闻讯,“如疾如狂,如孤儿弱女之新丧考妣,奔走徬徨于故旧间,相见无一语,惟紧握友人之手,潸潸然涕泪交横而已”①。悲愤至极时,乃啮指作血书,备述亡国惨祸,寄回国内。“革党之名,遂震照一世。”②

先是,黄兴于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不久,亦自认为运动员,于五月间返国。初秋,回到长沙,着手筹组革命团体。陈天华应邀回国,于九月间到达长沙参加商议成立华兴会。他“日与下等社会谈论种国大事,虽目不识丁者,闻之皆泣下。所著《猛回头》

---

① 杨源浚:《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

② 《陈天华事略》,万沅编纂《新华会虚无党史》。

及《现世政见之评决》风行于世，湘赣间尤甚。三户之市，稍识字者，即朗读《猛回头》。至有小学校之丱角少年，募资广刷，其感化力之深类者。……此时所云，多散见于《俚语报》中”①。因此，湘中反动官绅借端罗织，查封《俚语报》，准备陷害陈天华。经友好催促，陈天华于三十年暮春再次东渡，入东京政法大学，又著《警世钟》一书。六七月间，终因爱国情炽，深虑瓜分豆剖的横祸已迫近眉睫，因而又不辞跋涉，回到祖国。

时华兴会已联络洪江会首领马福益，确定乘十月间慈禧太后70“万寿”，长沙文武官员聚于皇殿行礼时，一举炸毙，发动起义；马福益率洪江会众分五路响应。陈天华返湘，即由黄兴派往江西，游说防营统帅廖名缙届时发难。随后由江西吉安转到醴陵，会同刘揆一等前往浏阳普迹市，藉开牛马交易集市的机会，举行授予马福益少将仪式，发给枪械、马匹。九月中旬，计谋泄露，黄兴、刘揆一等先后脱险逃出湖南。天华“独正襟危坐待捕，曰：‘事不成，国灭种亡，等死耳，何用生为？’逾日，友人劝以他往，留身有待，始从容束装”②，间道逃江宁，得冯蚀寰等资助，再一次去日本。适在日本的葛谦、仇亮、刘道一、张秀钟等组织新华会，以“推倒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民国”为宗旨，因钦仰陈天华的为人，遂邀约入会。③

陈天华因苦心策划反清革命遭受挫折，一度心情抑郁。经原华兴会会员徐佛苏、罗杰介绍，与梁启超有所往来，颇受梁的影响。光绪三十一年初，陈天华在留学界散发一份《救亡意见书》，

---

①② 杨源濬：《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

③ 《陈天华事略》、万沅编纂《新华会虚无党史》。

建议由留学生选派代表归国，向清廷请愿，立即颁行立宪，以救危亡。当他正准备返国上书时，事为宋教仁所知。宋于是约同黄兴，恳切劝告陈天华摆脱保皇派的诱惑，对清廷勿存幻想①。陈天华这才消释了请愿的念头，同梁启超等改良派人士疏远起来。

三十一年夏，孙中山又一次来到日本，在留学生当中展开建立联合的革命团体的活动。六月二十六日(7月28日)，宋教仁、陈天华等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同孙中山会面。陈天华谈到去年华兴会起事的大略情况。孙中山则详尽地阐明了各省革命团体、革命同志结成大团的必要。次日，华兴会领导人聚谈于黄兴寓所，商决加入孙中山所倡议的联合团体问题。陈天华主张华兴会作为一个团体加入。黄兴建议形式上加入，精神上仍保留华兴会。刘揆一则认为可不加入。由于意见不一致，最后是以“个人自由”为据②。二十八日(7月30日)，陈天华出席了孙中山召集的同盟会筹备会，被推举偕同黄兴、宋教仁、马君武等8人起草会章。七月十三日(8月13日)，由黄兴、宋教仁等发起的欢迎孙中山大会在东京举行，到会1300余人，盛况空前。陈天华撰写一篇《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刊于《民报》第一号)，对孙中山的远大理想、恢宏抱负、爱国赤诚和革命业绩备加推崇，断言孙中山“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在《民报》第一号上，陈天华还发表了《论中国宜改制民主政体》、《中国革命史论》两篇政论文，《怪哉上海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丑哉金邦平》、《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等三篇时评，还

① 参阅《宋教仁日记》第2卷，1905年1月28日至2月2日。

② 同上书，1905年7月28、29日。

有一篇《周君辛铄事略》。同盟会成立伊始，陈天华就以踔厉风发的姿态，出现在宣传阵地的前沿。他的文章清新流畅，激情洋溢，感人至深，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1]

该年夏秋间，日本报刊披露日本政府行将颁布"清韩学生取缔规则"的消息。中国留日学生群情愤激，认为日本政府将中国置于它的保护国同列，实属不堪忍受，要求清廷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本外务省提出质询。外务省答称并无其事。实际上，这是日本政府正在策划的一个侵略阴谋，事过两个月，它就暴露出来了。

原来，清廷鉴于留日学生中革命分子急剧增多，曾强烈要求日本方面实行取缔办法。夏秋间日本报刊披露的消息就具有试探意味，并向清廷示意，日本将会应允此项要求。适日俄战争结束，订立《日俄朴茨茅斯条约》，日本攫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长春以南的各项侵略权益。接着，日本政府派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前来北京谈判，迫使清廷承诺日俄之间上述侵略权益转让为有效。就在小村寿太郎来华之际，日本政府文部省于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六日(1905 年 11 月 2 日)发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即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对中国留学生的集会、结社、言论、通信等横加限制、取缔。其用意显然是允诺清廷的要求，以利于小村寿太郎在谈判桌上施加压力[2]。故《取缔规则》中主旨尤在于阻禁和迫害中国留学生的革命宣传和活动，这一点，文部省次官木场在谈到《取缔规则》时就直言不讳地承认："留学

①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册，第 4 章《陈天华投海》，上海书店印行，第 25 页。

② 永井算已：《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四性格》，永井算已著《中国近代政治史论丛》，东京汲古书店 1983 年版，第 164—166 页。

生之中，属于革命派者甚多，这次文部省颁布的规则，将使他们蒙受一大打击，殆无疑义。”① 所以，《取缔规则》的发布，并不是一般地取缔留学生的“性行不良”，而是旨在打击中国留学生的反清革命活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是藉此作为一个条件，以诱胁清廷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东三省事宜”中作出更多的让步。

多数中国留学生当然也看出了文部省发布《取缔规则》的意图，对日本和清朝双方政府这桩卑鄙的交易深表愤慨，于是群起奔走呼号，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取缔规则》的运动。日本各报竟肆意讥嘲，指为“乌合之众”。1905年12月7日《朝日新闻》发表一报道称：

> 东京市内各校之清国留学生八千六百余人集体停课……此盖由于清国留日学生对文部省命令之解释过于褊狭而生不满，以及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性情所促成，惟其团结之力则颇为薄弱。

事件初起时，陈天华虽异常愤慨，但又怕留学界不能团结一致，所以对罢课抗议尚心存犹豫。及至见8000余留学生竟能同心协力地实行罢课，而日本报章却肆行诽谤，他不禁又惊又惧：惊的是留学生果真能团结一致；惧的是罢课难于持久不懈，以致证实了日本报道的谰言蜚语。为此，他忧心如焚，愤恚难消。及至十一月十一日(12月7日)读到《朝日新闻》的恶意攻讦，就更感到无法忍受，痛不欲生，遂于晚间伏案疾书，写下了一份悲壮凄怆的《绝命辞》，情深意切地激励学生界坚持一心，贯彻始终，

---

① 永井算巳：《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四性格》，永井算巳著《中国近代政治史论丛》，东京汲古书店1983年版，第142页。

做到"坚忍奉公，力学爱国"，使日本报章的种种诬陷伎俩不能得逞。在《绝命辞》里，陈天华还告诫国人，决不能相信改良派的说教，"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他又谆谆规劝人们不要听从那些亲日的主张，"彼以日本为可亲，则请观朝鲜！"次日晨，他将《绝命辞》挂号寄留学生会馆杨度收，随即到大森海岸投海自尽。噩耗传出，留学生群聚会馆前，《绝命辞》"一人宣读之，听者数千百人，皆泣下不能仰"[①]。留学界同声哀悼，罢学返国者，络绎不绝。

陈天华在《绝命辞》里劝告人们："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他声明，主要是对日本报章侮为"放纵卑劣"极为愤慨，"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又称："中国去亡之期，极少须有十年，与其死于十年之后，曷若于今日死之，使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亟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因此，陈天华的投海，不能认为是意志薄弱，灰心丧志，而是以一死来警醒同胞，"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②]。无疑，誉为蹈海英雄，陈天华是当之无愧的。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一日（1906 年 5 月 23 日），陈天华的灵柩运返长沙。革命党人禹之谟、陈家影、宁调元等首倡将陈的灵柩与在上海投江的姚宏业的灵柩一同葬于长沙岳麓山，遭

---

① 《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民报》第 2 号。
② 《绝命辞》，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到官方阻挠,于是发动各学堂学生群起抗争。初七日(29日)长沙全城学生出动,护送陈、姚的灵柩,首尾绵延十多里,哀歌动地,鞭炮震天,分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江。"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观之,全山为之缟素。"[①]"公葬陈姚"的事件,成为一次震惊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

陈天华的著作,大部分通俗易懂,激情洋溢,悲壮感人。而蕴蓄在他的著作里最为昂扬生动的内容,又首推强烈的反帝爱国主张。听听他在《猛回头》里一段怵目惊心的唱词吧: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
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
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
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
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
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
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分?
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
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②]

面对如此危如累卵的处境,陈天华并不感到气馁,而是豪迈沉毅地号召人们奋起反抗。他在《警世钟》里写道:

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

① 曾杰:《乙戌集》,《黄花岗与中国同盟会》。
② 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35—36页。

> 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杀！杀！杀！[1]

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危急之秋，这种豪言壮语，是何等的扣人心弦，令人血涌肺张啊！

在陈天华的著作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也是很警世醒目的。他把清皇朝称作"洋人的朝廷"，而且严肃地指出："中国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一个号令，满洲政府就立刻奉行。……故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因他不要你勤王，你从何处勤哩？"[2] 他也如同孙中山、章太炎、邹容一样，把民主革命看作顺天应人，符合历史进化规律的运动，认为"质而言之，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因此，在他的著述里，也充满着讴歌民主，盛赞共和，期待步武泰西革命的文词，宣称"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3]。所以，他在《绝命辞》里又谆谆相嘱："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

由于陈天华"所著咸用白话文或通俗文，务使舆夫走卒皆能

① 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 71 页。
② 同上书，第 76 页。
③ 《中国革命史论》，《陈天华集》，第 215 页。

读之了解,故其文字小册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最为盛行,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革命军》,有过之无不及。……其中以《猛回头》、《警世钟》二种为效力至伟"①。尤其在湖北新军里,流传最广,"各兵士每每读《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即奉为至宝,秘藏不露,思想言论,渐渐改良。有时退伍,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而文学堂之青年,亦时以偷看《猛回头》为乐"②。清廷也早有察觉,故广张文网,严行查禁,但却事与愿违。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浙江金华龙华会员曹阿狗公开演唱《猛回头》,被劣绅告发。金华知府嵩连将曹惨杀,"广出告示,严禁逆书《猛回头》,阅者杀不赦,以曹阿狗为例。然此告示一出,而索观此逆书之人转多,于是革命之风潮乃又加紧一度矣"。③

辛亥革命时期两个卓越的革命宣传家——邹容和陈天华,虽然因尽瘁革命大业而过早地舍身成仁,没有亲身参与推翻清廷、创立共和国的决战,但辛亥决战的伟大胜利,是与他们屹立于宣传阵地的前沿,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地唤起民众,激励民众投身于这次决战的劳绩分不开的。他们前驱先路,号角警钟的殊勋,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丰碑上。

① 冯自由:《〈猛回头〉作者陈天华》,《革命逸史》第2集。
②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第七章《武昌日知会之破案》上册,第130页。
③ 陶成章:《浙案纪略》上卷,第1章第4节《猛回头案》。

第二十七章　章　太　炎

第一节　从埋头"稽古之学"到主张"革政"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因仰慕顾炎武（初名绛，入清后改名炎武）的为人，更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曾用名和笔名有绛叔、西狩、末底、戴角、独角、蓟汉阁主、台湾旅客、支那夫、刘子政私淑弟子、刘子骏之绍述者等。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1869年1月12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章太炎初从外祖朱有虔（左卿）受业，自称："余十一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①

光绪十六年（1890），到杭州诂经精舍受业。诂经精舍的主持人是俞樾，俞樾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下

---

①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制言》第25号。

来的清代著名朴学大师，撰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校正群经、诸子句读，审定文义，并分析其特殊文法与修辞，治学方法缜密，章太炎受其影响，埋头"稽古之学"，"出入八年，相得也"。[①]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被日本侵略者打败，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章太炎毅然走出书斋，听到康有为设立强学会，"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②]。并于二十二年(1896)岁阑，辞别俞樾，来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编务。

章太炎当时的办报主张是"驰骋百家"，"引古鉴今"，"证今则不为卮言，陈古则不触时忌"[③]。他在《时务报》任职不久，文章也只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两篇。他认为，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殊方异俗")的"长技"，可资中国"借镜"，可以作为改变成法("益损政令")的参考，例如举办"有益于黄人"的学会。应该"修内政"，行"新制度"，不能"惟旧章之守"，而须"发愤为天下雄"[④]。他认为："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⑤]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应该"以革政挽革命"，亦即实施政治改革。

与此同时，章太炎又编撰《经世报》、《实学报》和《译书公会报》。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书李鸿章，企求他能"转旋逆

① 章太炎：《谢本师》，《民报》第9号。

②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谈》，查章太炎参加的是上海强学会。

③ 章太炎：《致汪康年书》，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4页。

④ 章太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章太炎政论选集》，第7页。

⑤ 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3页。

流"[1];也曾跑到武昌,帮张之洞办《正学报》,幻想借助他的实力推动变法。

不久,"百日维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湾。他对"六君子"的惨遭杀戮深表愤慨;对康有为"内不容于谗构"而"见诋于俗儒乡愿者"为之解脱;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专制骄横极为仇恨,"讨之犹可,况数其罪乎?"[2] 经历维新新政的破灭,他的"革政"思想较前又有发展。

既不满清朝统治,又同情康、梁;既孕有民族思想,又没有转向革命。章太炎将怎样"革政"呢?他提出了"客帝"和"分镇"的课题,认为满洲贵族,是客帝;中国的"共主"应为"仲尼之世胄"。只要清朝皇帝承认过去民族压迫的错误,拥护孔子后裔,做"虚君",自己退居为齐桓、晋文般的霸主,发愤自强,那么反满情绪可以平息,可以防止"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分镇"也是章太炎在外国侵略、清政腐朽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改良设想。认为政治危急之际,"犹赖有数镇稍自奋起,足以扶危而定倾"。因此,不能削弱藩镇,而"甘心于白种之陵籍"。藩镇和立宪政并不矛盾。"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他举明治维新为例,"若皇德贞观,廓夷旧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归之一宪,藩镇将奔走趋令,如日本之萨、长二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何患自擅?"[3] 此后,进而指出:"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4] 他反对满洲贵族统治的丧权辱国,而对汉族地

① 章太炎:《上李鸿章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4页。

② 章太炎:《答学究》,《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2页。

③ 章太炎:《藩镇论》,《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02页。

④ 章太炎:《分镇》,《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07页。

主阶级还存幻想。他向往的还是明治维新式的“革政”。在旅台期间,他曾将所写论文汇成《訄书》。光绪二十五年五月,由基隆去日本,七月下旬,由日返国。

第二节 鼓吹反清革命和“苏报案”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一伙的卖国原形暴露无遗,章太炎受到极大震动,从维新梦中醒来。七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议会”上,他激烈反对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口号,“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撰《解辫发》以明志。对过去设想的“客帝”、“分镇”也予“匡谬”,说是“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进而提出:“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①]

接着,章太炎树起反清的旗帜,开始向改良派展开斗争。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东京《国民报》发表《正仇满论》,尖锐批判梁启超:“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1902 年 2 月),章太炎再次被追捕,流亡日本。初住横滨,后入东京,和孙中山“定交”,他们共同商讨“开国的典章制度”和中国的土地赋税以至建都问题,《訄书》重印本《相宅》和《定版籍》中,就记录了他俩当时的讨论情况。

六月,章太炎返国,为上海广智书局“藻饰译文”,曾译述日

① 章太炎:《客帝匡谬》、《訄书》重印本“前录”。

本岸本能武太所著《社会学》。他还“删革”《訄书》,并立“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①。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1903 年 3 月),章太炎到中国教育会赞助成立的上海爱国社任教。这时,抗法拒俄运动展开,革命形势发展,而康有为却发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反对“革命者开口攻满洲”,以为“立宪”可以避免“革命之惨”,鼓吹光绪帝复辟。章太炎看到后,公开批驳,指出康有为所谓“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实际是“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光绪帝只是“未辨菽麦”的“小丑”,他当初赞成变法,不过是“保吾权位”,如果一旦复辟,必然将中国引向灭亡。章太炎赞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② 他又为邹容《革命军》撰序,说是“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③。

《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先后在《苏报》发表④,立即引起中外反动派的仇恨,于是发生了震动全国的“苏报案”。

“苏报案”发生,章太炎英勇就逮,慷慨赴难。他除在敌人的

---

①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 107 页。

②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 204 页。

③ 章太炎:《革命军序》,《章太炎政论选集》,第 192 页。

④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苏报》发表的是其中主要部分,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

法庭上和监狱中愤怒地斥责中外反动派的卑劣勾当，宣言“不认野蛮政府”外，又继续撰文，申斥改良派“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说：“新者，一人一代，不过一新而不可再。满洲之新，在康熙、雍正二世，今之政府，腐败蠹蚀，其材已不可复用，而欲责其再新，是何异责垂死之翁以呱啼哺乳也。”[①] 又力言反清革命的必要。说：“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②]

章太炎入狱三年，潜心佛学，读《瑜珈师地论》、《成唯识论》，而革命之志毫不动摇，曾支持光复会的成立。

第三节　主编《民报》，讲授国学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八日(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出狱，中国同盟会派员至沪迎章赴日。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述“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认为最紧要的是：“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认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

① 章太炎：《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43页。

② 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33页。

人爱国的心思”。①

章太炎主编《民报》,自第七号起(1906年9月5日出版),编至第十八号(1907年12月25日出版),以脑病辞职,由张继接办1期(十九号),陶成章接办3期(第二十——二十二号)。二十三号起(1908年8月10日出版),仍由他主编,出至第二十四号时(1908年10月10日出版),《民报》被封禁。

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了不少政论,基本上是宣扬同盟会的革命纲领的。在《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中强调:“扫除腥羶,建立民国。”②《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说:“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华民国,不怕不立。”③ 由章太炎手撰,以“军政府”名义发表的《讨满洲檄》,更明确指出:“自盟而后,为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有谕此盟,四万万人共击之。”④

章太炎在论文中强调革命党自身的建设,认为“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较然明矣”。指出革命者必须“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应该做到“知耻”、“重厚”、“耿介”、“必信”,要有“革命之道德”⑤。

章太炎在论文中深刻揭露改良派“竞名死利”、“志在干禄”的丑态。并说:“夫其所操技术,岂谓上足以给当世之用,下足以成一家之言耶?汗漫之策论,不可以为成文之法;杂博之记诵,不可以当说经之诂;单篇之文笔,不可以承儒、墨之流;匿采之华

①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72—276页。
②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26页。
③ 同上书,第330页。
④ 《民报》临时增刊《天讨》,收入《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2。
⑤ 《革命之道德》,《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09—323页。

辞，不可以备瞽蒙之颂；淫哇之赋咏，不可以瞻国政之违。既失其末，而又不得其本，视经方陶冶之流，犹尚弗及，亦曰以是哗世取宠而已”①。指出改良派的“谋立宪”，只能使“豪民得志，苞苴横流，朝有党援，吏依门户，士习嚣竞，民苦骚烦”，表示坚决反对②。他还在《民报》上刊发别人批驳《新民丛报》的文章。

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大都针锋相对，文字锐利，“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③。

章太炎在主持《民报》期间，还与张继、刘师培、苏曼殊、陶冶公等在日本发起亚洲和亲会。在他手拟的《约章》中标明：“本会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约章》还提出：一，亚洲被侵略各国，先以中国、印度组织成会，“亦谓东土旧邦，二国为大，幸得独立，则足以亚洲屏蔽”。二，入会各国，应该“互相扶助，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如果“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三，入会会员，应“捐弃前嫌”，“互相爱睦”。虽则各国教术各异，“种族自尊”，但应“相知益深”，共同“排摈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亚洲和亲会成立活动的时间虽只1年多，但它以“反对帝国主义”载入《约章》，反映了亚洲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意愿。

与此同时，章太炎还在东京组织国学讲习会，编国学振兴社讲义，并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起为青年讲学，讲《说文解字》、《庄子》、《楚辞》、《尔雅》、《广雅疏证》、《汉书》、《文心雕龙》、

① 章太炎：《箴新党论》，《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38页。

② 章太炎：《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75页。

③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册，第4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毛诗》、《文史通义》等，早期前往受业的有黄侃、朱希祖、龚宝铨、钱玄同、周树人、许寿裳等。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10月），日本政府“徇清政府之请”，下令封禁《民报》，章太炎三次致书“移让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进行批驳：“私谓贵国自有历史以来，以刚毅恺明称于天下，必不茹柔吐刚，以纤毫之利、圭撮之害，而俯首以就满洲政府之羁轭，以挠邻国士民之气。”[1]并亲莅警廷，责问裁判长：“我言革命，我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我之文字，即鼓动人，即扇惑人，扇惑中国人，非扇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与？于贵国之治安何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我何罪？”“我言革命，我本国不讳言革命，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我国圣人之言也。故我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我何罪？”问得“厅长无言”[2]。

《民报》“封禁”，章太炎在东京继续讲学，“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3]，主要是“文字音韵之学”。他还写了大量学术著作《新方言》、《国故论衡》、《刘子政左氏说》、《庄子解诂》、《小学答问》、《齐物论释》、《文始》等陆续刊行。这些专著，种类繁赜，字数众多，在语文、历史、哲学方面，均有创获，对近代学术产生很大影响。而宣统元年（1909）以后，他的政治论文却相对减少。

还在《民报》“封禁”前，章太炎和孙中山发生矛盾。此后，汪

① 章太炎：《为民报封禁事移让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485页。

② 《章太炎先生答问》，《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58页。

③ 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制言》第25期。

精卫续办《民报》,章太炎作《伪民报检举状》,又和陶成章重组光复会,闹派别纠纷。但他反清革命的大方向还是没有变,没有暌离"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同盟誓言,"同盟之好,未之敢忘"[①]。他在主办的《教育今语杂志》上以"共和纪元",在《缘起》中叫人要"爱祖国"、"爱中夏"、除"外祸"、"辟邪辞"[②]。武昌起义前夕,还写了《诛政党》,揭露"竞名死利"、"同为民蠹"的立宪党的各种表现[③]。武昌起义消息刚传来,"满洲留日学生,惊慌万状,有主张向日本借兵者",章太炎作书正告:"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怒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④] 他没有忘怀革命,他与同盟会之间的争论,也只能说是革命派内部的派别纠纷。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对敌斗争的英勇,攻战文字的犀利,至今犹感生气勃勃。这些正是他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第四节　在袁世凯统治时期

武昌起义胜利,章太炎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⑤] 的错

---

① 章太炎:《复孙中山书》,1912 年 1 月,《大中华》2 卷 12 期。
② 《教育今语杂志》第 1 册,1910 年 3 月 10 日出版。
③ 章太炎:《诛政党》,槟榔屿《光华日报》1911 年 10 月 26、28、31 日,撰写则在武昌起义前。
④ 章太炎:《致留日满洲学生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 519—520 页。
⑤ 《章太炎之消弭党见》,天津《大公报》1911 年 12 月 12 日。

误口号，主张解散同盟会，并和一些立宪党人在一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聘任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他不愿常驻南京，返回上海。2 月中旬，在讨论建都问题时，章太炎主张建都北京，认为“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则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①。他依恋旧制度，说“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政治法律，皆依习惯而成”②，主张中央“特建都察院”，“限制元首”，地方“废省存道”，而对代议民主制则表示反对，主张“限制财产”，又以“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为“大悖乎理”③。

南北和议告成，袁世凯上台，章太炎幻想袁世凯“厉精法治”，“以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④。在用人问题上，以为“同盟会人材乏绝，清流不归”⑤。反对“政党内阁”，提出“取清时南方督抚有材名者以充阁员之选”⑥。说什么：“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主张“循旧贯”，用“老吏”⑦。将中华民国联合会与一些小政团合并，改组为统一党，以后更与民社等并为共和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

袁世凯给了章太炎一个总统府高等顾问的空衔，不久又委

---

① 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 532 页。

② 章太炎：《大共和日报发刊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 537 页。

③ 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 533 页。

④ 章太炎：《致袁世凯论治术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 584 页。

⑤ 章太炎：《上大总统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 612 页。

⑥ 《民立报》1912 年 6 月 25 日。

⑦ 章太炎：《内阁进退论》，《章太炎政论选集》，第 606 页。

任为东三省筹边使，调出北京。章太炎兴致勃勃地跑到东北去“兴办实业”，设东三省筹边使署于长春，拟《东三省实业计划书》，提出“设立三省银行，以圆易吊，使民易知”，并铸造金币。“欲铸金币，又不可不预浚金源，非开办金矿，收买金砂，不足以供鼓铸。又请开浚松花江、辽河，去其淤梗，以利交通”。还拟“组织报馆”，“设会研究”①。但没有多久，宋教仁被刺，血的教训使他猛醒过来，他沉痛地《挽宋教仁》：“愿君化彗孛；为我扫幽燕”，对袁世凯不信任了。4 月，“托事南行”。次月，赴武昌，谒黎元洪，在鄂致电袁世凯，请去梁士诒、陈宧、段芝贵、赵秉钧“四凶”②。接着，由武汉到了北京，袁世凯设法笼络。5 月 25 日发令“章炳麟授以勋二位”③，“冀以歆动”。6 月 4 日，离京来沪。而他早先提议在东北筹设实业银行的借款，财政部长梁士诒不肯盖章，章太炎“实业计划”落空，感到“大抵政府之与我辈，忌疾甚深，骂亦阻挠，不骂亦阻挠”，于是决计“辞差”，“奉身而退”。④

1913 年 7 月，孙中山、黄兴举兵武力讨袁，章太炎却不信赖，说什么“讨袁者亦非其人”⑤。他既骂袁世凯“用心阴鸷，正与西太后大同”，又说孙中山“与项城一丘之貉”⑥。“谓宜双退袁与孙、黄，改建贤哲，仆则承命”⑦。以为“若为久远计，凡一政党，非有实业为中坚，即有侠士为后应，无此即不足以自树。非实业则

① 《大共和日报》1913 年 2 月 1 日。
② 《民立报》1913 年 5 月 14 日。
③ 《民立报》1913 年 5 月 27 日。
④ 章太炎：《致伯中书四》，《章太炎政论选集》，第 655 页。
⑤⑦ 章太炎：《致伯中书九》，《章太炎政论选集》，第 666 页。
⑥ 章太炎：《致伯中书八》，《章太炎政论选集》，第 661 页。

费用不给，而政府得以利用之矣；非侠士则气势不壮，而政府得以威喝之矣"①。以为总统改选，"大抵仍宜推举黄陂，必不肯任，然后求之西林"。"黄陂之廉让，可望责任内阁；西林之果毅，可望廓清贪邪"②。黎元洪（黄陂）也好，岑春煊（西林）也好，都是清朝旧官僚，民国新军阀，章太炎对这些人寄以厚望，他已彷徨歧途了。

8月，章太炎"冒危入京师"，一方面看到"京邑崎岖，道路以目"，以为"吾虽微末，以一身撄暴人之刃，使天下皆晓然于彼之凶戾，亦何惜此孱形为"③，表示不畏强暴，敢临虎穴；另一方面又以为"共和党势渐扩张，此为可熹"④，"连日议员入党者，已增三十人矣，骥老伏枥，志在千里，况吾犹未老耶？"⑤但是，袁世凯对章太炎还是不肯放松，对他加紧迫害，把他软禁起来，梁士诒、赵秉钧等还欲"捏造证据，置章于死"⑥。

1914年1月，章太炎欲乘车离京，为军警所阻。7日，"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仍被监禁。曾决意绝食，"以死争之"，自云："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吾何言哉！"⑦ 直到1916年袁世凯死后，才被释放。在监禁期间，编成《章氏丛书》初编。

---

① 章太炎：《致伯中书十四》，《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77页。
② 章太炎：《致伯中书八》，《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61页。
③ 章太炎：《致伯中书十三》，《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75页。
④ 章太炎：1913年8月17日《家书》。
⑤ 章太炎：1913年8月26日《家书》。
⑥ 《民立报》1913年8月23日。
⑦ 章太炎：1914年5月23日《家书》。

第五节 参与护法运动,反对国共合作

1916年6月,章太炎由京南返。这时,孙中山也在上海,曾两电黎元洪"规复约法,尊重国会";章太炎也认为"约法、国会,本民国固有之物,为袁氏所摧残",主张"维护"①。此后,他多次和孙中山一起参加会议,基本主张与孙中山尚相契合。8月,章太炎南赴肇庆,视"云阶"(岑春煊),更"出游南洋群岛,岁晚始归"。孙中山致电黎元洪,认为章太炎"硕学卓识,不畏强御,古之良史,无以过之,为事择人,窃谓最当",推举章为国史馆长。②

1917年3月,段祺瑞召集督军团在北京开会,商讨对德宣战。5月7日,国会讨论参战案;10日,段祺瑞组织"公民请愿团"等,包围国会,殴辱议员。章太炎和孙中山两次致电黎元洪,要求严惩"伪公民犯法乱纪之人","严惩暴徒主名","勿令势要从旁掣肘"③。6月7日,张勋率军北上,与段派集议,电黎"调停须先解散国会"。孙、章联电陆荣廷等南方各省督军、省长,指出:"调停战事之人,即主张复辟之人;拥护元首之人,即主张废立之人。""叛人秉政,则共和遗民必无噍类"④。又联名致电陈炯明:"国会为民国之命脉,调和乃借寇之资粮","今者群盗鸱张,叛形

① 1916年7月3日章太炎在浙江国会议员欢迎会上讲话,《中华新报》1916年7月4日。

② 《中华新报》1916年12月14日。

③ 《时报》1917年5月12日、14日。

④ 《时报》1917年6月10日。

已著，黄陂与之讲解，实同降伏”①。

7 月 1 日，张勋复辟。3 日，章太炎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等“集议孙公邸中”，“协议扫穴犁庭计画”②。接着，与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乘海琛舰由上海启程赴广州，于 7 月 17 日抵粤。当有人询以讨逆计划时，章即答以：“余此次偕孙中山来粤，所抱之希望颇大”，“讨逆之举，即为护法而起，惟不违法之人而后可以讨逆”③。永丰、同安、豫章三舰抵达黄埔，孙、章一起前往迎迓。广东各界开欢迎海军大会，孙中山、程璧光到会，章亦参加。9 月 1 日，国民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章太炎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大元帅就职宣言》就是章太炎起草的。《宣言》中说：“民国根本，扫地无余，犹幸共和大义，浃于人心，举国同声，誓歼元恶”，誓“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④此后，因护法军政府中派系斗争激烈，章“欲西行”，孙中山劝以“不当先去以失人望”，章太炎表示愿为军政府争取外援，到云南联络唐继尧。当他抵达昆明后，多次向唐进言，促唐东下，但“唐终托故不出”。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人民革命运动日渐发展，章太炎却由反对军阀割据逐渐演变为赞成军阀割据。1920 年 11 月，湖南通电“湘省自治”，章太炎随即在北京《益世报》发表《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认为“宜虚置中央政府”，“军政则分于各省督军”⑤。

---

① 《时报》1917 年 6 月 10 日。
② 《时报》1917 年 7 月 4 日。
③ 《时报》1917 年 7 月 28 日。
④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 744—745 页。
⑤ 同上书，第 752—753 页。

接着,又主张使“地方权重而中央权轻”,“各省自治为第一步,联省自治为第二步,联省政府为第三步”,还“必以本省人充军民长官”①。这种“联省自治”说,和孙中山的统一主张背道而驰。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职,章太炎以为“非法”,并以“联合自治不可反对为献”②。

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和平统一宣言》,章太炎以为“统一利害,久处南方者自知,若谓借此以缓最高问题,则亦非计”③。次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分析和批判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错误的、反动的政治流派,包括“联省自治派”,宣告取消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又系统讲述了三民主义。10日,决定应冯玉祥的电邀,“即日北上”。章太炎对改组后的国民党表示不满,在国民党右派冯自由等的怂恿下,发出《护党救国宣言》,“冀以同盟旧人,重行集合团体”。不久,冯自由组织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章太炎也组织了辛亥革命同志俱乐部,背离孙中山,反对共产党。

第六节 晚年主张抗日

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章太炎发出《为上海英租界巡捕惨杀学生之通电》。“以为英捕而不治罪,固不足以肃刑章;英捕而果治罪,亦未必足以防后患。惟有责成外交当局,迅速收回租

① 《申报》1921年1月6日。
②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华民国十年,五十四岁”。
③ 章太炎:1923年1月21日《致李根源书》。

界市政，庶几一劳永逸，民庆再生"①。

1927年，赋诗自述："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②。晚年在苏州讲学，组织国学会，欲"甄明学术，发扬国光"。1933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

但是，当帝国主义蹂躏祖国，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章太炎起来谴责国民党"怯于御乱而勇于内争"。1932年，北上见张学良；次年，又与马相伯等联合发表"二老宣言"、"三老宣言"："对于当前日本之侵略暴行，不仅作消极之抵抗，同时更应动员全民族积极收复失地、根本消灭伪国"③，呼吁抗日。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宋哲元进行压制。章太炎致电宋哲元："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④

12月24日，上海学生北上请愿，国民党加以阻挠，章太炎"对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但认政府当局，应善为处理，不应贸然加以共产头衔，武力制止"⑤。请愿学生经过苏州时，又"派代表慰劳，并嘱县长馈食"⑥。他"瞻顾民族之前途，辄中心忉怛而未能自已"⑦，临终前，在《答友人书》中还说："北平既急，纵令勉力支持，察省必难兼顾。盖非常之时，必以非常之事应之。令共

①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12—813页。
② 章太炎：《生日自述》，《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20页。
③ 章太炎：《与马相伯、沈恩孚联合宣言》，《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34页。
④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72页。
⑤ 《申报》1935年12月26日。
⑥ 浙江图书馆：《追悼章太炎先生特刊》。
⑦ 章太炎：《与马相伯、沈恩孚联合宣言》，《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35页。

党之在晋北者,其意不过欲北据河套,与苏俄通声势耳。此辈虽多狙诈,然其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伏明甚"①。尽管章太炎不可能对共产党有真正认识,但他对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还是觉察的。尽管章太炎晚年的行为也有使人失望之处,却仍保持了爱国主义晚节。1936 年 6 月 14 日,章太炎病逝。

鲁迅评述章太炎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又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受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② 鲁迅的评价是中肯的。

第七节　著述的编印

章太炎的论著,很多散见于各种报刊。辛亥革命前,他曾先后在《时务报》、《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昌言报》、《清议报》、《亚东时报》、《五洲时事汇报》、《台湾日日新报》、《国民报》、《苏报》、《国民日日报》、《浙江潮》、《复报》、《民报》、《汉帜》、《国粹学报》、《学林》、《教育今语杂志》等报刊撰文。辛亥革命后,他的文章又散见于《民国报》、《大共和日报》、《民立报》、《申报》、《民国日报》和他自己主编的《雅言》、《华国》、《制言》中。

---

① 章太炎:《答某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 874 页。

②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 6 册,第 444 页。

章太炎论文最早的结集是《訄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付梓，次年出书，苏州木刻本，录《尊荀》等50篇，另“补佚”2篇。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从日本返国，将《訄书》“删革行于世”，于光绪三十年出版重印本，把《客帝》、《分镇》改为“匡谬”，作为“前录”，又将篇目调整为63篇，以《原学》、《订孔》始，以《解辫发》终。光绪三十四年(1908)，《民报》封禁前后，章太炎着手编辑《太炎集》，所录以学术论文为多①。不久，他又手改《訄书》，准备增加《原儒》、《原经》等学术论文，对重印本革命之作每加删削。

1914年，章太炎在被袁世凯幽禁期间，手定《章氏丛书》，包括《春秋左传读叙录》1卷，《刘子政左氏说》1卷，《文始》9卷，《新方言》11卷、附《岭外三州语》1卷，《小学答问》1卷，《说文部首韵语》1卷，《庄子解故》1卷，《管子余义》1卷，《齐物论释》1卷，《齐物论释》重定本1卷，《国故论衡》3卷，《检论》9卷，《太炎文录》文录2卷、别录3卷、补编1卷，《菿汉微言》1卷。有上海右文社铅字排印本、浙江图书馆刊本、上海古书流通处印本和上海世界书局石印本。右文社本刊行最早，多误字；浙江图书馆本刊印最精，收录较多②。所收大都是学术专著，《太炎文录》也只收录了一些诗文，而先前登在期刊上的斗争文章竟被刊落，如发表在《浙江潮》的《狱中赠邹容》等诗，发表在《苏报》的《狱中答新闻报》、发表在《民报》的《复吴敬恒书》以及许多“时评”，《文录》多未收载。《检论》是他就《訄书》增删而成的，但《客帝匡谬》、《分

---

① 《太炎集》，抄本，北京图书馆藏，系年编次。

② 上海右文社本，印于1915年，章太炎曾有手校本；浙江图书馆本刊于1919年，其中《齐物论释》重定本、《太炎文录补编》、《菿汉微言》3种，为右文社本所无。

镇匡谬》和《解辫发》等篇也被删落了。

1933年,章太炎弟子吴承仕、钱玄同校刊《章氏丛书续编》,收《广论语骈枝》1卷,《体撰录》1卷,《太史公古文尚书说》1卷,《古文尚书拾遗》2卷,《春秋左氏疑义答问》5卷,《新出三体石经考》1卷,《菿汉昌言》6卷,共7种,所收不多,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战斗之作。

章太炎逝世后,章氏国学讲习会编印《章氏丛书》三编,1938年在武汉排印《太炎文录续编》,对《太炎文录》初编、补编不收之作,"不敢续录",《华国》、《制言》所载书札也未阑入。

因此,《章氏丛书》初、续、三三编,并未曾把章太炎文章搜集完备,特别是有关政论性的诗文、演说辞、时评、函电等,刊落很多。

至于时人编辑或坊间流行的,则有《章太炎文钞》5卷,静莽编辑,1914年3月上海中华图书馆石印本;《太炎最近文录》1册,钱须弥编辑,1915年4月上海国学会书室铅字排印本;《章太炎的白话文》1册,吴齐仁编,1921年上海泰东书局铅字排印本;另有《章太炎先生尺牍》、《章太炎尺牍》、《章太炎文选》等。其中《章太炎文钞》出版在《章氏丛书》初编之前,掇拾《訄书》和《民报》、《国粹学报》诸文,间有《章氏丛书》未收之作。《太炎最近文录》一书,据编者称:"与右文社近刊之《章氏丛书》无一重复",其实只是章太炎1911年到1913年间在报刊上发表的宣言、函电等的汇辑;"附录"虽也曾录有载于《民报》的文字,但数亦寥寥。《章太炎的白话文》都是章太炎发表在《教育今语杂志》上的讲演记录。至于《章太炎先生尺牍》等,则校印多讹,很少可取。

解放后,学术界曾注意搜集和整理章太炎的遗文。1979年,

由有关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章太炎弟子，分工编辑《章太炎全集》，已出 6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华书局 1977 年曾出版了《章太炎政论选集》。

第二十八章 秋 瑾

第一节 抱“匡济艰危”之志

秋瑾，原名秋闺瑾，小名玉姑，字璿卿，号竞雄、旦吾、鉴湖女侠、汉侠女儿，浙江省山阴县(今绍兴市)人。清光绪元年十月十一日(1875 年 11 月 8 日)生于福建闽县。祖父秋嘉禾多年仕宦福建，父秋寿南同治年举人，母单氏出身浙江省萧山城内望族。

秋瑾在福建度过童年时代。她曾在祖父官衙耳闻目睹外国侵略分子的飞扬跋扈，深以为忧地对母亲说：“这样下去，中国人要成为他们的奴隶了。”① 从幼年起，秋瑾与兄秋誉章在家读书，由父母课督。她读书用功，天资聪颖，除读四书五经外，还广泛涉猎各种诗词、小说、史书，对一些描述古代游侠，特别是女杰的作品，怀有浓厚兴趣。

光绪十六年(1890)，秋瑾由闽返浙，居绍兴城内和畅堂，除继续读书外，又向其萧山外婆家表兄弟单老四习武艺。

光绪二十年(1894)夏，秋寿南任职湖南湘潭县厘金局，一家随往。经媒人说合，父母作主，秋瑾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五日

---

① 秋高：《秋瑾遗事》。

(1896年5月17日),嫁湘潭城内大富商王黻臣之子王子芳(字廷钧)为妻。王子芳为不学无术的纨袴子,秋瑾对这桩婚事本极不愿,婚后夫妻感情淡漠,秋瑾抑郁不欢,激起对封建纲常之痛恨。

戊戌变法失败后,王子芳入资为工部主事(后迁户部郎中),赴京任职,秋瑾同往。在北京,秋瑾闻见官场种种污秽,十分愤慨,曾写《黄金台怀古》讥讽之:"蓟州城筑燕王台,招士以财亦可哀!多少贤才成底事,黄金便可广招徕?"[①]

不久,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秋瑾与王子芳匆忙离京返湘避难。其时秋瑾以强烈的忧国心情,写了《杞人忧》:"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②] 她后来回顾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③]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1901年11月),王子芳赴京复职,秋瑾也重到京华。但不久其父在湖南桂阳知州任上病逝,秋瑾又返湘居丧。其母、兄则在湘潭城内赁屋开设"和济钱庄",但开张不到一年便本金亏尽,被迫关闭。不久,其母、兄等皆离湘回浙。秋瑾在夫家更感寂寞苦闷。

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秋瑾携女儿王灿芝,再次赴京,与王子芳一同生活。这时,秋瑾结识了与王子芳同在户部任职的廉泉之妻吴芝瑛。吴氏是当时著名的"桐城派"学者吴汝纶之侄女,思想开通,精于书法、诗词,比秋瑾年长7岁。二人结识后感情日

---

① 《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8页。

② 同上书,第60页。

③ 《致王时泽书》,《秋瑾集》,第47页。

笃,几乎“无一日不相见”[1]。至次年正月,即立盟结拜为姊妹。此外,秋瑾还结识了绍兴同乡陶大钧之妾陶荻子,以及其夫在京师大学堂执教的日本人服部繁子等人。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国内很快传播,大批中国青年出国留学,前往日本留学者尤多。秋瑾在吴芝瑛、陶荻子等处,常看到一些宣传革命和救国的新书报,眼界为之大开,忧国之情更趋强烈,便更加不安于过碌碌无为的生活。她表示:“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2] 乃决心摆脱依附丈夫生活的地位,出国留学。王子芳极力反对,竟窃走秋瑾自筹用作留学费用的珠宝财物,以阻其行,引起秋瑾极大反感,从此夫妻反目成仇。秋瑾另筹学费,脱下红装,丢掉女子裹脚布和三寸弓鞋,换上全副男装,直至牺牲,终未再穿清朝礼服。

从准备出国留学遭丈夫阻止这件事,使秋瑾认识到,女子“革命当自家庭始”的道理[3]。

第二节　东渡日本,参加反清革命

光绪三十年五月(1904年6月),秋瑾离国赴日。她先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经半年刻苦努力,至年底结业。在此期间,一度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旋因对校方的教学方法、生活管理等不满而退出。

在努力完成学业的同时,秋瑾在这半年间还积极参加留日

① 吴芝瑛致徐寄尘书,《民主报》1912年7月2日。
② 徐自华:《鉴湖女侠秋君墓表》,《秋瑾集》,第188页。
③ 吴芝瑛:《记秋女侠遗事》,《秋瑾集》,第189~190页。

学生各项活动。她广泛结交进步留学生和革命志士，与周树人、陶成章、宋教仁、王时泽、何香凝、冯自由等都有较多往来。她把志在反清革命的青年引为同志；对浮薄轻佻、吃喝玩乐者深恶痛绝；对那些顽固透顶、借留学为升官发财途径的人，更“自始至终口诛笔伐，面对面地展开斗争”①。她积极发起或参加各种革命团体，开展革命和妇女解放活动，其中包括与留日女生陈撷芬等人一起，对拒俄运动时留日女生成立的“共爱会”进行改组，改名“实行共爱会”，举陈撷芬为会长，秋瑾为“招待”，欲办成一个团结全国妇女的团体，引导妇女们参加社会活动，争取妇女解放。这是秋瑾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最初实践活动之一。秋瑾还与人组织“天足会”，提倡妇女放脚②。又曾发动留日女生，开展反对纳妾的斗争。她自己则写信回国，请其兄作代表，与王子芳家“开谈判离婚”③。这些均表现了秋瑾敢于向当时统治中国的封建礼教大胆挑战的勇气。

这年秋，冯自由、梁慕光奉孙中山之命，在日本横滨成立秘密反清团体“三合会”，作为“交通内地秘密会党之导线”④。秋瑾得讯后，即与王时泽、刘道一、仇亮、刘复权等共10人，一同加入此会。秋瑾被封为“白扇”(俗称军师)，刘道一被封为“草鞋”(俗称将军)，刘复权被封为“洪棍”，是为“洪门三及第”⑤。加入横滨

① 王时泽:《回忆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7页。

② 周建人:《回忆鲁迅》。

③ 《致秋誉章书》,《秋瑾集》,第39页。

④ 冯自由:《朱少穆事略》,《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2页。

⑤ 王时泽:《回忆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第225页。

三合会,是秋瑾日后广泛结交秘密会党的开始。

在参加上述各项活动同时或稍后,秋瑾还积极与人创办“演说练习会”。在该会所订十三条简章的第五条中,规定“会中当附属一普通语研究会,凡演说皆用普通语”,这是中国近代最早正式提出并实行推广普通话的组织之一。演说练习会每月开会演说一次,秋瑾尽管浙江口音很重,但努力学习用普通话进行演说。这个组织在留学生的进步青年和革命青年中,有很好的声誉,如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宋教仁曾亲自向秋瑾提出加入该会的要求①。演说练习会提倡演说技巧,把演说作为革命斗争的一种武器,用以使无钱订报或没有文化的人能了解革命的道理,同情和参加革命斗争。因此,创办演说练习会是秋瑾投入民主革命的组织活动的正式开始。

在参与创办演说练习会同时,秋瑾还积极参与创办《中国白话报》。该报附设在留学生会馆内,光绪三十年八月十五日(1904年9月24日)创刊(月刊),内容包括论说、教育、历史、实业、地理、时评等十几个项目,全用白话文,它实是一种宣传反清革命的刊物,从目前所能见到的第一至三期内容看,充满了激烈反满的言论。秋瑾以“鉴湖女侠秋瑾”署名,在第一期上发表《演说的好处》,大力宣传用演说“开化人的知识,感动人的心思”②,并尖锐揭露了清朝官场种种腐朽不堪的丑事。在第二期上,秋瑾发表了《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揭示当时中国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种种事实,大声疾呼提倡男女平等。在第三期上,她发表了《警告

① 宋教仁:《我之历史》,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0页。

② 《秋瑾集》,第3页。

我同胞》，针对中日两国军人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发出强烈感叹。

在日语讲习所毕业后，秋瑾又报名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乘学校放假，她决定回国探亲和续筹留学费用。实践女校托她顺便在国内招收师范、工艺两科女生留日。动身回国前夕，遇到刚在浙江各地联络秘密会党，并参与在沪创立光复会的陶成章。陶成章向秋瑾详细介绍了浙江各地秘密会党的情况，并为之写了介绍信，给当时在国内的光复会领导人蔡元培和徐锡麟。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秋瑾回到上海。她先在上海爱国女校找到蔡元培，然后去南京，运动资本家辛某之子辛汉，无结果，乃返绍兴走访徐锡麟。四月，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从此秋瑾全身心地投入民主革命事业。五月，秋瑾由绍兴到沪，准备再去日本。陶成章这时正在上海，把秋瑾介绍给在沪的浙江处州会党头目丁镂、吕熊祥等人，这是秋瑾与浙江秘密会党有正式联系之始。六月，秋瑾第二次到达日本。七月五日（8月5日），到青山实践女校注册，开始新的学习生活。她在此只读了1个学期，修读了9门功课，每周上课达33课时，另加6课时自修课。秋瑾以顽强刻苦精神，坚持学习，还在课外坚持体育锻炼，又学会了制作炸药之法。

这年七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八月，秋瑾经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宣誓加入同盟会，随即被指定为同盟会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

十月，日本政府应清廷要求，发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当时中国报刊一般称之为《取缔规则》），剥夺留日中国学生言论、集会、结社、通信的自由权利。日本有的报

纸且发表文章,恶意诋毁中国留学生为“乌合之众”、“放纵卑劣”。中国留学生停课抗议《取缔规则》,陈天华且以蹈海自尽抗议日本报纸的诋毁。秋瑾与宋教仁、胡瑛等力主全体停学回国,另一些留日生则认为这样做不妥。两派激烈争辩,最后由于中国留学生的激烈抗议,《取缔规则》没有实行,多数留学生仍留下学习,秋瑾则与易本羲等人于十一月底离日,十二月回到上海。这时,秋瑾的情绪已平静下来,她写信给留在日本的王时泽说:“诸君诚能忍辱以成其学者,则辱也甚暂,而不辱其常矣。”承认留日学习也可救国。她在信中还切望“诸君之无忘国耻”,表示自己归国以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①。

回上海不久,秋瑾首先积极参与创设“中国公学”,用以安置反对《取缔规则》而回国的学生。不久,经同盟会员褚辅成介绍,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1906 年 3 月)到浙江湖州南浔镇,执教于浔溪女校,任日文、理科、卫生等课。在浔溪执教期间,秋瑾积极向师生宣传男女平等、兴办女学和民主革命。在她影响下,该校主教务的徐自华及其妹徐双韵和学生吴珉(以后改名惠秋)等都参加了光复会和同盟会,成为秋瑾的莫逆之交和革命同志。

第三节 创《中国女报》,宣传男女平等

秋瑾在浔溪女校执教两月后,因该校校董金子羽散布流言蜚语,乃愤而辞职赴沪。同年夏,她赴浙东一次,“阴求死士,

① 《致王时泽书》,《秋瑾集》,第 46~47 页。

得吕东升诸人”[1]。八月间，与光复会员尹锐志、陈伯平、张剑崖、姚勇忱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祥庆里，以锐进学社之名联络浙江和长江各地会党，并在此试制炸药以备起义之用。有一次试制炸药不慎爆炸，“伯平伤目，瑾伤手”[2]，幸伤势很轻，不久即康复。

与此同时，秋瑾为了向广大妇女宣传男女平等，组织妇女斗争，积极筹创《中国女报》杂志。她原拟集股万元，“租座房子，置个机器，印报编书，请撰述、编辑、执事各员，象象样样、长长久久的办一办”[3]。乃在虹口北四川路厚德里 91 号设立蠡城学社，筹集股金，先在《中外日报》刊登章程、广告，并将另印的章程，分寄各地女学堂。但过了不少时间，入股的除四五人以外，连问都没有人问起，秋瑾极为痛心。在计无可施之下，她邀嵊县平阳党首竺绍康，于秋冬之间同往湖南，以计向王黻臣诱得一笔款子，终于在十二月初一(1907 年 1 月 14 日)在沪出版《中国女报》创刊号。次年正月二十日(1907 年 3 月 4 日)又出了第二期。第三期亦已排好，惜因经费拮据，秋瑾又无暇顾及，故未能印行。

秋瑾在《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中，开宗明义地揭示创设该刊物之宗旨，是“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这个宏愿在当时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但在中国历史上，秋瑾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要成立“中国妇人协会”，亦即全国妇女协会的人，仅此即可说明她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突出地位。

---

① 陈去病:《鉴湖女侠秋瑾传》,《辛亥革命》第 3 册，第 185 页。

② 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革命逸史》第 2 集，第 165 页。

③ 《敬告姊妹们》,《秋瑾集》,第 15 页。

在所出版的这两期《中国女报》上,秋瑾发表文章四篇,即《中国女报发刊词》、《敬告姊妹们》、《看护学教程》和《补登创办中国女报之章程及意旨广告》;诗四首,即《感时》、《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感愤》、《剑歌》;歌曲一首,即由她一人作词谱曲的《勉女权歌》。这些文章、诗歌,连同她前此发表在《白话报》上的文章,以及在留日时已开始、回国后继续创作的弹词《精卫石》和其他不少诗词、书信,是秋瑾宣传妇女解放的杰作,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珍贵史料。

在这些诗、文、歌、词中,秋瑾对广大妇女在婚姻、家庭、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受到的压迫、歧视,进行了全面的、淋漓尽致的揭露、控诉,对各种歧视妇女的纲常礼教、社会陋习和荒谬论调,进行了有力的批驳、鞭挞。特别是,她深刻地揭示了妇女受压迫之因在于未能自谋生计,经济没有独立,并针对这个原因而探索了妇女争取解放之途:“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①]“求学艺”的办法是大兴女学,使女子学得文化知识,然后“做教习,开工厂”以便自立;“合群”则是妇女们联合起来,依靠自己的斗争来争取平等的权利。更为可贵的是,秋瑾还把妇女解放与民主革命事业联系起来,号召妇女们积极投入反清革命,与男子一起战斗:“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男和女同心协力方为美,四万万男女无分彼此焉!”[②] 秋瑾关于妇女解放的这些思想、理论,达到了同时代中国人的最先

① 《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秋瑾集》,第32页。

② 《精卫石》,《秋瑾集》,第130～131页。

进水平，正如郭沫若评述的："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1]

第四节 组织反清武装起义

在创办《中国女报》后，秋瑾即以全部精力投身于组织反清革命的活动。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1906 年 12 月)，萍浏醴大起义爆发期间，光复会员集议于上海，谋在东南地区起兵策应，秋瑾参与密议。其时，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已不多过问会务，实际主持光复会的徐锡麟则已捐得道台，正拟赴安徽任职。在浙江方面亟需有既具威望，又富才干者主持。陶成章乃派王文庆赴沪，与秋瑾商议组织浙江起义之事；徐锡麟也派王金发到沪，邀秋瑾回浙主持。秋瑾欣然接受，即以浙事自任，偕王文庆回浙，筹划浙江武装起义活动。

浙江是秘密会党分布很广的一个省份。清末，浙江各地的会党主要有：以沈荣卿、张恭、周华昌为首的龙华会(以金华为总部)，以王金宝、吴应龙为首的双龙会(以丽水为总部)，以竺绍康、王金发为首的平阳党(以嵊县为总部)，以敖嘉熊为首的祖宗教(活动在浙北地区)，等等。势力遍布全省，其中尤以金华府之武义、永康、东阳等县，台州府之仙居县，绍兴府之嵊县，处州府之缙云、青田、松阳、宣平等县为最。这些秘密会党都反对清朝统治，在鸦片战争后外国教会势力大举入侵中国，它们曾一度以反

[1] 郭沫若：《秋瑾史迹·序》。

洋教为主要斗争目标。但到辛亥革命时期,因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的影响,反满色彩又浓厚起来,因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争取和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秋瑾之前,陶成章、魏兰、敖嘉熊等已经在联络全浙各地会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秋瑾回浙,主要是在已有基础上把各地会党进一步组织起来,并予以必要的训练。

从上海回浙到达杭州时,正值徐锡麟由绍兴去安庆之际。秋瑾与徐锡麟乃在杭州西湖白云庵会商,粗略地拟定皖、浙两省同时起义的计划:以安庆为重点,以绍兴为中枢,金华、处州等同时发动,占领皖浙两省重镇后,分路会攻南京;安徽方面由徐锡麟主持,浙江方面由秋瑾主持,两地分头同时抓紧筹备;两地间的联络工作则由陈伯平负责。商定以后,秋瑾即回绍兴。这时,萍浏醴起义业已失败,但皖浙起义的计划照旧进行。秋瑾即于十二月中旬(1907 年 1 月下旬至 2 月上旬间)往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县联络会党。光绪三十三年正月(1907 年 2 月),秋瑾回绍兴,正式接任绍兴大通学堂督办,主持各项校务,并以此为中心,加紧组织浙江革命势力。

大通学堂全名"大通师范学堂",由徐锡麟、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创办。该校普通班设国文、英文、日文、历史、地理、理化、算术、博物以及体操等 14 门功课。此外,为了培训浙江会党骨干熟习军事,特设体操专修科,只学习军事体操、进行军事训练,不学别的课程;专招收金华、处州、绍兴三府的会党骨干人物,入校进行为期半年的训练。徐、陶等人还设法以合法和公开的方式,从上海购买了后膛 9 响枪 50 支、子弹 2 万发。并拟定章程,规定凡大通学员,一律得加入光复会,毕业以后仍受学堂办事人员的节

制。从而大通学堂成了浙江各地会党的联络中心，光复会本部也由上海转移到了绍兴。

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后，首先整顿纪律，消除内部宗派纠纷，严格各项管理制度，培养学员刻苦勇敢的精神。接着，她在绍兴城内诸暨册局（科举时代诸暨县考生到绍兴参加府试时住宿之地）设立体育会，拟招收一批女生，教以兵式体操，由秋瑾自己率领，组成一支女国民军。但因绍兴绅、学两界强烈反对，无报名者，只得作罢。秋瑾乃改招金、处、绍三府会党骨干 60 多人入会习军事。对于大通学堂普通班，秋瑾也主张努力扩大招生，特于二月二十五日（4 月 7 日）《绍兴白话报》第 131 号附张上，刊登《大通师范学堂第二次招生广告》。其目的也在于扩展光复会，增强革命势力。为了掩护革命活动，秋瑾还在大通学堂的开学典礼上，特邀绍兴知府，山阴、会稽知县[①]到校致词，并与师生拍照留念。绍兴知府贵福见秋瑾办事能干、认真，很为满意，特将其别号"竞雄"二字拆开，凑成"竞争世界，雄冠地球"的对联，送给秋瑾[②]。这样，经秋瑾积极整顿，大通学堂面目一新，规模也有了新的发展。

正月下旬和三月上旬，秋瑾又两次深入浙东诸暨、义乌、金华、东阳、永康、缙云等地，广泛联络会党，并在会党人员众多的嵊县设立光复会秘密机关[③]。

秋瑾在积极联络各地会党的同时，还抓紧了另一条战线的工作，即利用各种关系在驻杭州新军、浙江武备学堂和弁目学堂

① 当时绍兴府治所在地及周围郊区，即今绍兴市、县，分山阴、会稽二县。

② 陶成章：《秋瑾传》，《秋瑾集》，第 185 页。

③ 尹锐志：《锐志回忆录》，《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 485 页。

中发展光复会员。

秋瑾于上年冬由沪回浙时,即在杭州与新军及武备、弁目二学堂中的革命党人联系,并通过他们发展了一批人加入革命党。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前后,她又到过杭州几次,继续在新军及武备、弁目学堂中发展革命党。经她前后几次发展入光复会的新军官兵和武备、弁目二学堂师生有几十名,其中重要的有吕公望、叶颂清、朱瑞、周凤岐、陈国杰、许耀、夏超、虞霆、黄凤之、张敢忱、傅孟、俞炜、裘绍、周亚卫、陈礼文等人,他们后来都参加了辛亥革命在浙江的起义活动,有的并成为主要领导人。连同在会党中发展入光复会的在内,秋瑾在主持大通学堂的前后半年内,共发展了光复会员 600 多人①,从而使光复会的势力得到很大发展。

在联络会党和新军等取得顺利进展的基础上,秋瑾于三月间将光复会职员编为 16 级,以"黄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的七绝诗为表记。从"黄"字起至"使"字止共 16 级,以"黄"字为首领,推徐锡麟担任;"祸"字为协领,由秋瑾自己担任;"源"字为分统,由会党头目竺绍康、王金发、张恭、吕熊祥等担任;"溯"字为参谋,以会党头目充任;"浙"字以下为部长、副部长等等。各级职员均以金戒指为记,在戒指中嵌入代表自己职衔之代名词或 A、B、C 等英文字母。经此编组,上自处州府之缙云,亘金华全府,下及绍兴之嵊县的会党,都被编组起来了。

四月初,秋瑾又把浙江会党和光复会员数千人,按照"光复

---

①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卷,第 140 页。

汉族，大振国权"8个字，分别编成8个军，总称"光复军"，每军都设置大将、副将，参谋、副参谋，中军、左军、右军，中佐、左佐、右佐，中尉、左尉、右尉等13个军职，以白底黑色"汉"字旗为军旗，以黄色小三角形、内书黑色"复汉"二字并盖上图章的旗帜作为顺旗。还规定了军服、头布、肩章、胸带、图章、令符等的具体式样①。至五月间，光复军初步编成。与此同时，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和发动日期也初步拟定：五月二十六日（7月6日），先由金华府发难，继而处州府响应，以吸引杭州方面派清军前往镇压；绍兴的光复军即渡过钱塘江袭击杭州，在事先约定的驻杭新军及武备、弁目学堂师生的配合之下，一举夺取杭州；若攻夺杭州的计划受挫，则光复军立即返回绍兴，经金华出江西，进入安徽，与徐锡麟会合再图进取。在浙江发动起义的同时，徐锡麟在安徽亦发动起义，浙皖两省配合，各自得手后合力会攻南京。

在进行这些组织活动时，秋瑾还手订了《普告同胞檄稿》、《光复军起义檄稿》等文件，以备起义时张贴。在这些文告中，秋瑾以强烈的忧国之情，痛切指出当时中国的险恶处境，怒斥清朝统治者各种罪恶。

光复军起义计划和发动日期拟定后，秋瑾即派陈伯平报告徐锡麟，约定两省配合行动。

这时，徐锡麟在安庆担任掌握全省巡警、治安大权的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兼安徽巡警处会办，他利用职务之便，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向巡警学堂学生宣传革命，在安庆新军中争取进步官兵，为武装起义加紧积聚力量。

---

① 见秋瑾：《光复军军制稿》，《秋瑾集》，第23—26页。

但是,在尚未得知秋瑾在浙江的行动计划之前,徐锡麟在安徽的革命活动暴露,乃匆忙决定起义。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907 年 7 月 6 日),徐锡麟借安徽巡警学堂举行预定的毕业典礼之机,与光复会同志陈伯平、马宗汉突然发难,枪杀安徽巡抚恩铭,率三十几名学生冲出学堂,前往军械库,激战四时失败,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捕。当天,徐锡麟即遭惨杀,安庆起义失败。接着,清军在九江逮捕到徐锡麟之弟徐伟,并得知秋瑾是徐锡麟同志,安徽新任巡抚冯煦立即将此电告浙江巡抚张曾敭。

此时秋瑾正在对浙江光复军作最后部署,从大通学堂选派了 32 人,由俞炜、叶颂清和龙华会头领周华昌率领,前往杭州,潜伏待命;让周华昌招部下 200 人,驻伏杭州江干(钱塘江沿岸一带),以"伺动静为内应"①。此外,秋瑾还派周亚卫去嵊县,让竺绍康发动同志作准备。

然而,浙江的一些会党和光复军,未及等到规定的六月十日起义之期,就纷纷行动。五月上旬,裘文高在嵊县西乡二十八都村首先发难。之后,金华府的武义县、金华县、兰溪县、汤溪县、浦江县等地的光复军亦因泄密或叛徒告密,遭到清廷地方当局的重大破坏。恰在这时,绍兴劣绅胡道南等人又向知府贵福密报:"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凤樵(按即吕熊祥)、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日起事。竺号酌仙,平阳党首领,羽党万人,近已往嵊县纠约来郡,请预防。"② 贵福即于五月二十七日(7 月 7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 4 篇,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第 1291 页。
②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 3 册,第 43 页。

日)进省向张曾敭面陈。

安徽新任巡抚冯煦的来电,浙江各地接连发生的事件以及贵福的报告,使张曾敭确信主持绍兴大通学堂的秋瑾是浙江革命党的首要人物,便立即派兵赴绍兴捕拿、镇压。

五月底六月初,秋瑾从报纸上得悉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被杀的消息。她强忍悲痛,立即烧毁光复会来往函件和干部名册,指挥转移大通学堂所藏的大批枪支弹药。有人向她建议提前起义,但秋瑾以嵊县和绍兴各地的光复军尚未集结就绪,坚持待到六月十日预定之期再发动起义。

六月二日(7月11日),浙江官府从杭州派遣新军300多人,由第一标第一营管带徐方诏率领赴绍兴,因担心官兵中有革命党人,行前对全体官兵进行搜身检查,引起骚动,为附近武备学堂学生听到,立即向绍兴通报。大通学堂方面在次日得报,许多人恳劝秋瑾乘早出走避祸。但秋瑾已置生死于度外,且早认为"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①]。决心以自己的流血,来一洗"女界之羞",唤起广大妇女的觉醒。她还给在浔溪女校执教时的学生徐双韵寄去一诗,表示自己"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满,中原回首肠堪断!"[②]因而她坚决拒绝出走。她命当时从嵊县赶来劝她出走的王金发快离开绍兴,并要他和竺绍康等人在她牺牲后另谋再起。

---

① 《致王时泽书》,《秋瑾集》,第47页。

② 徐双韵:《记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第218页。

六月四日(7月13日)下午,贵福、徐方诏和山阴知县李钟岳、会稽知县李瑞年等人,率清军包围大通学堂。此时学堂内还有三十几人,秋瑾要他们逃出去,有两名学生在冲出去时被清军枪杀。最后只大通学堂教员程毅等6人和秋瑾留在学堂内。清军攻入,逮捕了秋瑾等7人,并搜去一些枪支弹药、马匹驴子和秋瑾所写的诗词、文告等。

秋瑾被押至绍兴知府衙门,当晚即由贵福、徐方诏、李钟岳、李瑞年等对她进行了会审,第二天又继续进行审讯,在审讯中,不论敌人怎样花言巧语,或是严刑逼供,秋瑾始终以凛然不可冒犯的英雄气概对付敌人。她斩钉截铁地告诉敌人:"论说稿(即清军从大通学堂内搜去的革命文告)是我所做,日记笺折亦是我办,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敌人逼她说出王金发、竺绍康等人的去处,她以对敌鄙夷、不屑一顾的口气回答"不知道"三字。敌人刑逼她供出"匪党共有几人"时,她再也不予理睬,任凭敌人怎样软硬兼施,她始终"坚不吐供"[1]。最后她只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7个大字,以表示对祖国、民族所处险境的无限忧虑,对革命未成、壮志未酬的无限惋惜。

清廷对秋瑾和她主持的革命活动极为害怕。浙江巡抚张曾敭上奏朝廷说:"此次秋瑾等,乃以学界女子,于国家预备立宪时代,提倡革命,借体育会聚众谋乱,私蓄军火马匹,勾结土匪同时滋事,金华、武义、永康等属,以及绍兴之嵊县,各处响应,拒捕戕弁,又分遣竺绍康、王金发等赴嵊纠匪,谋劫郡城,其意固不专在掳抢,……非寻常盗贼可比。"两江总督端方在给张曾敭电文中

---

① 《辛亥革命》第3册,第96、193页。

也说："匪首乃系女犯，党羽多至万人，闻之深为骇异。"①

在用尽各种方法皆不能迫使秋瑾屈服之后，贵福决定尽快杀害秋瑾，以免浙江各地光复军，特别是嵊县竺绍康、王金发带人进攻绍兴，营救秋瑾。于是他一面命幕僚编造一份《秋瑾口供》向上司交账，一面电请张曾敭批准杀害秋瑾。张曾敭立即复电同意。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六日（1907 年 7 月 15 日）晨，秋瑾在绍兴城内轩亭口就义，年仅 33 岁。

秋瑾从光绪三十年投身社会活动起，在 3 年时间里，为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都作出了杰出贡献，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女英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妇女的楷模"②。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 1960 年出版了《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79 年增补重印。

① 故宫档案馆：《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 3 册，第 213、211 页。

②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 87 页，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

第二十九章 宋 教 仁

第一节 踏上革命征途

宋教仁，字钝初（也作遯初），号渔父，光绪八年二月十八日（1882 年 4 月 5 日）生于湖南桃源上香冲的一个地主家庭。从 4 岁起，他就入塾读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转入桃源县城里的漳江书院读书。

清末政治的腐败，外国资本主义的频频入侵，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再不能安坐于书斋中。基于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宋教仁产生了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强烈不满，如何对中国进行政治改革，成了他与同学经常谈论的主要内容。有一次，他与同学文骏等人登上院东的漳江阁，纵论中西政治的得失、关塞险厄以及古今用兵的胜败，大有感慨地说："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击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得志于天下。"[1] 因此，虽然他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奉母命参加了县试，考中了秀才，但他并没有把继续博取科举功名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

---

① 文思：《故农林总长宋教仁传》。

光绪二十九年(1903)，宋教仁到武昌投考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文普通学堂。主持这次考试的武昌知府梁鼎芬出的作文题目是《汉武帝论》，宋教仁下笔千言，洋洋洒洒，极力推崇汉武帝“经营西域、扩张国土、奠定大汉族之基础”的历史功绩①，深得梁鼎芬的赞赏，被取为第一名。然而，革命潮流的激荡，使宋教仁在入学以后无法再埋头书案，他经常思索的是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这年6月，黄兴从日本回到武汉，在文普通学堂发表演说，痛斥清廷的无能，提倡进行政治改革。宋教仁听了大为叹服，立即同黄兴结识。从此，他便经常与同学田桐等人在一起，密传反清革命的思想。清朝官吏对他的言行非常忌恨，打算将他逮捕。学堂监督纪巨维十分喜爱他的才学，却又担心无力庇护，便暗地讽示他迅速逃走。于是，他就在七月间离开武昌，回到湖南。九月二十六日(11月4日)，他在长沙参加了黄兴所召集的华兴会筹备会议，同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年2月15日)，他又参加了华兴会的正式成立大会，并被推为副会长，从此便走上了革命道路。

以推翻清朝为目标的华兴会，把湖南先发动、各省继起，然后“直捣幽燕”作为自己的斗争方略。所以，在华兴会成立不久，他们就派遣“对于本省外省各界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宋教仁和胡瑛奉命到湖北开展活动，“设支部于武昌，结纳同志，运动武阳夏三镇新军”②。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1904年7月3日)，他又和湖北进步学生吕大森等联

① 荆嗣佑:《辛亥革命见闻》。

②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册,第278页。

合，组织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湖北支部互通声气，吕大森被推为所长，宋教仁则担任文书。

在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华兴会决定在当年十月十日(11月16日)慈禧太后70岁寿诞于长沙发动起义，以武备堂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力，以会党为辅助力量，省内分浏阳、衡阳、常德、岳州(今岳阳)、宝庆五路同时响应。宋教仁除了负责与科学补习所进行联系外，具体主持常德一路的组织与发动工作。九月间，他在家乡变卖家产，为革命筹措经费，后经常德到长沙，才知道起义事机已经泄露。在曹亚伯等人的劝说与资助下，他搭乘一条运煤船前往武汉，追寻黄兴。

十月初十日(11月16日)，宋教仁安全地到达武昌，改换姓氏住在一家客店里。他从同学口中得悉“此间风潮颇大，科学补习所已闭，武昌梁知府正访查经武(即胡瑛)的来历”①。而此时黄兴等人在上海新创办了一个启华译书局作为革命机关，准备日后举事。宋教仁第二天搭乘日本“瑞和”号轮船顺流而下，于十五日到达上海。可是，因受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案的牵连，启华译书局遭到破坏，黄兴等人已经被捕入狱，宋教仁在上海无法立足，经朋友们的帮助，十二月二十九日(12月5日)浮槎东渡，前往日本。

第二节　宣传爱国民主思想

宋教仁从长沙起义失败中认识到，在发动起义之前，必须首

①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02页。

先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人们的革命情绪。因此，他到东京不久，就为创办一个面向全国的综合性杂志而积极努力。光绪三十年底（1905 年 1 月），他与陈天华等人联合组成“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并以此作为杂志的名称。他被推为总庶务，负责组织与联络工作，为建立舆论阵地而整天忙碌。但他还抽出一定的时间，埋头为其他杂志撰写稿件。经过半年时间的辛苦张罗，《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一期在五月二十二日（6 月 24 日）出版，他一个人所写的文章几乎占了整本杂志四分之一的篇幅。

踏实的工作和犀利的文笔，很快就使宋教仁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博得了声誉。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 年 7 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通过宫崎寅藏的介绍，结识了黄兴，计议建立一个全国性革命团体。接着，黄兴约集了宋教仁等华兴会骨干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社，详谈了联合各省人才进行革命的事。但是，在要不要参加孙中山所倡导的新的革命团体问题上，华兴会主要领导成员之间意见很不一致。陈天华主张以团体与之联合，刘揆一表示坚决反对，黄兴则提出在形式上加入“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宋教仁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声言：“既有入会不入会者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与不入会者之关系如何”①。似有缓冲分歧之意。

在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些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宋教仁和孙中山完全一致。因此，在六月二十八日（7 月 30 日）下午，他如约参加了孙中山所召集的同盟会筹备会议，被举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员。为了扩大革命的影响，壮大革命的声

① 宋教仁：《宋渔父日记》，《辛亥革命》第 2 册，第 210—211 页。

势，他和“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的同人共同发起，在七月十三日(8月13日)召开了中国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他担任大会主席，并致欢迎词。七月二十日(8月20日)午后，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的住宅内正式召开，到会者共有100余人。会上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的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相当于协理)，宋教仁则当选为司法部检事长，随后又被推为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根据黄兴的提议，同盟会同意接收《二十世纪之支那》为自己的机关报。可是，就在双方准备交接的时候，刚刚印就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因刊载《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隐情，被日本政府硬栽上“妨害公安”的罪名强行没收。宋教仁向日本有关当局再三交涉，终归无效。同盟会决定改名《民报》，另行出版，仍由宋教仁担任庶务，兼撰述员，主持社内的日常事务。

同盟会成立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迅速展开。这不仅使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廷十分恐惧，而且也使对中国包藏祸心的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本政府在清廷的要求下，于十月初六日(11月2日)颁布了《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规定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集会和结社，检查书信来往，强迫他们遵守清朝法令，妄图以此压制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中国广大留日学生义愤填膺，纷纷自动停课退学，不少人登上轮船回国，对日本政府表示强烈抗议。由于孙中山和黄兴都不在日本，同盟会本部对此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主张继续忍辱求学，宋教仁则坚持进行斗争。他和胡瑛等

人发起组织联合会，对继续留日斗争的学生统一领导，对归国的学生进行安排，直到他认为"此次风潮……现已无可如何，于情于理于势皆不可久持"时[①]，才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1906年1月13日）决定将联合会解散，二十二日全部复课。

宋教仁认为，革命既要从事破坏，更要进行建设，这些都离不开大批人才和高深的知识，所以，他立足于现在，放眼于未来，辞去了《民报》的职务，改名宋炼，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八日（1906年2月1日）进入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预科，准备系统地学习政法知识。但在听课温课之余，他仍然坚持翻译和写作。在此期间，他先后翻译了英、美、德、俄、澳、比等国的官制和政治制度概要，还翻译了日本宪法和各国的警察制度。这不仅提高了他的外文水平，而且增进了他对资本主义各国政治状况的了解，为他后来规划中国政治改革的蓝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时势的急剧变化，使宋教仁的攻读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光绪三十二年底（1907年初），黄兴离日归国，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委他代理庶务总干事，协助孙中山处理同盟会东京本部的日常工作。光绪三十三年正月（1907年2月），黄兴返回东京，同宋教仁协商如何组织东北的"马侠"，与革命党人在南方发动的起义遥相呼应问题。在宋教仁看来，这些所谓"马侠"都是被迫走上"梁山"的，只要晓以大义，完全有可能变成一支革命力量。因此，他决心亲赴东北，去完成这一使命。正月中旬（2月下旬），黄兴和孙中山在讨论国旗图案时意见不一致，孙中山坚持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黄兴则主张采用象征"平均地权"的井

① 《宋教仁集》下册，第563页。

字旗。孙中山固执己见,黄兴怒而宣布要退出同盟会。宋教仁同情黄兴,认为这次事件之所以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实因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①。正月下旬(3月初),日本政府接受清廷的要求,劝令孙中山离开日本,并赠款5000元;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又赠款1万元。孙中山拨出2000元给《民报》,其余的全部带走作为发动起义的经费。担任《民报》主编的章太炎对孙此举不满,大起风波,宋教仁颇袒章太炎。

二月十三日(3月26日),宋教仁和白逾桓及曾在东北"马侠"中担任过头目的日本退职军曹古川清一起,乘船离开日本的门司港,二月十九日(4月1日)到达安东(今丹东市)。他在给大孤山"马侠"首领李蓬春等人的信中说:"仆等向在南方经营大业,号招党徒,已不下数十万众,欲扶义兴师久矣,而山川隔绝,去京绝远,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视公等所处之地,形势不及远矣。欲与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图大举。……若不嫌微末,而以提倡大义之事互相联合,则不独仆等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也。"②李蓬春等把他们邀到山上,表示赞成同盟会的宗旨。宋教仁便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作为东北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机关。随后,他们准备响应广东的惠州起义,古川清向当地清朝官吏告密,白逾桓在碱厂招兵时被捕,起义计划遭到破坏,宋教仁逃奔大连。他极力设法营救白逾桓脱险,毫无结果。他不甘心就此罢休,便潜入啸聚于吉林夹皮沟一

① 《宋教仁集》下册,第718页。

② 同上书,第727—728页。

带的韩登举处，继续活动。

宋教仁受到韩登举的热情款待，并且得知，日本军国主义成立长白山会，制造所谓"间岛问题"，妄图侵占我国延吉地区。他满怀爱国热情，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把自己打扮成日本人，化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内部，将这个会所伪造的关于延吉地区原属日本的保护国朝鲜的证据全部拍摄下来，带回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有关资料，写了《间岛问题》一书，用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证明，延吉地区从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并且指出，保护这一地区不受侵犯，对于巩固中国的国防安全和开展东北地区的革命运动，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间岛问题》写成之时，正是日本政府向清廷提出所谓"间岛问题"交涉之际。日本政府曾经设法用重金收买宋教仁的书稿，遭到宋教仁的坚决拒绝。清廷得到这个消息，立即由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出面，通过驻日公使杨枢将宋教仁的书稿索去，并且赠款千元，授予四品京堂的官职，要宋归国任职。宋教仁征得孙中山和黄兴的同意，想利用这个机会深入清廷内部从事革命活动，为部分同盟会员反对，才没有成行。但是，他的《间岛问题》的书稿帮助清廷在对日谈判中获得了胜利，维护了中国对延吉地区的领土主权，却使他得到很大安慰。他把清廷的千元赠款大部分给了清寒的中国留日学生，他对别人说："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赚几文钱也。"[1]

宋教仁在"间岛问题"上得到清廷的奖赏，引起了革命队伍内部不少人的猜想和怀疑。有的人认为他在勾结清朝官吏，也有

① 徐血儿等编：《宋渔父》第1集后编《宋渔父先生遗事》。

人推测他出卖了党。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他于光绪三十四年给清廷写了一封公开信，重申他在国内事务上同清廷不可调和的对立立场，要清廷取消他的留学生资格，撤掉他所享受的月费金。日本政府对他大为光火，把他看作是清廷的密探，对他进行多方刁难，他并不放在心上。而同盟会组织的逐渐涣散，所发动武装起义的接连失败，使他感到心灰意冷，一度变得异常忧郁和消沉。他寄情于烟酒，狂歌当哭，甚至不惜向日本使女借钱买得一醉。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没有推卸自己所担负的革命责任。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10月)，日本政府以煽动暴乱的罪名将《民报》封闭，他运用各种合法手段进行挽救，都没有成功。宣统二年(1910)，在谭人凤的劝说之下，他曾两次同化名潜入日本的孙中山商谈整顿党务问题，结果都是不欢而散。他看到在南方边远地区发动起义无法取胜，建议把革命的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成立中部同盟会，作为直接领导机关，得到谭人凤等许多同盟会员的赞成。谭人凤出面召集在东京的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开会，讨论革命诸事，宋教仁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之次善者也；就瓯脱地，密布党羽，进居边要，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东三省或云南、广西，此策之又次者也。"[①] 经过全面分析，他认为上策最难，下策已败，唯有中策最为适宜，并且提出：应该"分步作法，从长江结合，以次推行河北为严密之组织，期以三年，养丰毛羽，然

① 《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总10号。

后实行”。只是由于到会者“咸主急进”，最后才由谭人凤拟出“以事权统一，责任分担，不限时期为原则”的进行方案①。

第三节　筹谋民国大业

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宋教仁回到上海，应于右任的邀请，担任《民立报》主笔。于是，他那丰厚的学养和远见卓识，就化成一篇篇笔锋锐利的时论文章，通过《民立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他指斥清廷对国际形势的蒙昧无知，而且“因循苟且，视国事若传舍”，从而把中国推到危险的境地。他认为，日俄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均势”局面决不会维持长久，日本正想独吞中国，俄国在觊觎中国的东北与新疆地区，英国企图继续控制长江流域，还窥伺西藏和云南，美国则运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拼命向中国内地各省扩张势力，一旦这种“均势”遭到破坏，帝国主义各国就会大动干戈，“共逐中原之鹿”，“不出五年，日英同盟及其他各种协约条约则尽解散，不出十年，日本与美国则干戈相见于太平洋之间，而竞争之目的，则必为极东问题之支那，而为导火线者，又必为满洲问题，或监督支那财政问题”②。他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暂时维持这种“均势”，以便乘此机会迅速改革国政，扩建国力，等到国势强盛以后，再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较量。

揭露清廷立宪的骗局，是宋教仁时论文章的另一个主要内

① 居正:《辛亥札记》。

② 《宋教仁集》上册，第221页。

容。他指出,清廷的预备立宪,实际上是一种骗人伎俩,他们肆意侵犯资政院应有的权限,擅自成立皇族内阁,都从根本上违反了立宪的原则。他们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纯粹是日本"钦定主义"的仿制品,其中所规定的"大清皇帝万世一系,永远尊戴",同秦始皇的"朕为始皇,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一脉相传。所谓"臣民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均准自由",所谓"臣民非按法律不加逮捕监禁处罚",以及"臣民之财产居住无故不加侵扰"等等,都是十足的空话。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其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者也。"① 他反对实行君主立宪,同时也反对在当时就实行社会主义政策,认为"凡一主义之推行,每视其客体事物之现状如何以为结果,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相适者,则其结果良,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不相适者,则其结果恶"②。

宣统三年三月(1911 年 4 月)中旬,宋教仁在谭人凤的敦促之下,奔赴香港参加即将发动的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代替陈炯明担任编制课课长。他草拟了文告、约法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制度方案,准备在起义胜利之后颁布实施。二十九日(27 日)傍晚,他与何天炯等人乘晚班轮船离开香港,次日凌晨到达广州,不幸起义已经失败。他们无法上岸,只好原路返回香港。

但是,宋教仁并没有因为广州起义的失败而灰心丧气,他还劝说其他革命党人鼓起勇气,继续斗争。他说:"此次虽失败,然得许多之经验,足以为他日之预备者。"因此,他回到上海以后,

① 《宋教仁集》上册,第 215、254、255 页。

② 同上书,第 289 页。

仍然担任《民立报》主笔，一方面在政治思想上向清朝封建统治者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一方面同往常一样，照旧从事革命的组织活动。闰六月初六日（7 月 31 日），中部同盟会在湖州会馆召开正式成立大会，谭人凤撰写了《宣言》，宋教仁拟订了总会、总务会和分会的各项章程，并且当选为总务会的干事，分掌文事部，负责处理参谋、立案、编辑与其他一切事务，成了中部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

根据宋教仁提出的方略，中部同盟会决定在武昌首先起义，然后组织各省立即响应。为了做好准备工作，他们派曾杰去湖南，与焦达峰组织湖南分会，令范鸿仙、郑赞永去安庆，筹建安徽分会。而作为重点区域的湖北，则由谭人凤亲自前往，要居正促使共进会与文学社迅速联合，成立湖北分会，属上海总机关直接领导，分别运动当地清军，主持当地起义诸事。除此以外，他们又让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吴玉章和张懋龙回到四川建立四川分会，和长江中下游各地遥相呼应。

随着四川保路运动的迅速发展，革命时机日渐成熟。宋教仁担心革命会受到帝国主义各国的干涉，特于八月初四日（9 月 25 日）在《民立报》发表《葡国改革之大成功》一文，要革命党人吸取葡萄牙改革成功的经验，采取革命手段，应当“以务使现状不致大变动而容易恢复的宗旨。约而言之，有三：一革命之时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战事）；一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狭（宜于中央）；一革命之力宜借旧政府之所恃者（用政府军队），使为己用，而收事半功倍之效”①。同一天，联合后的共进会与文学社所派代表居正

① 《宋教仁集》上册，第 327—328 页。

和杨玉如来到上海，向中部同盟会汇报了湖北近况及其起义计划，要求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去武汉主持大计。因为黄兴远在香港，近日之内无法赶到，谭人凤生病住进医院，行动很不方便，宋教仁便立即准备西行，但就在这时，被关押在武昌狱中的胡瑛派人送来一封密信，说湖北形势极为险恶，不能在近期之内发难。宋教仁对居正和杨玉如的报告疑信参半，已经下定的决心又发生动摇。谭人凤坚信武昌发动在即，再三催促宋教仁赶快上路，并于八月十七日(10 月 8 日)先自抱病登程，而宋教仁却仍然迟迟未动。

八月十九日(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了。由于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均不在场。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宋教仁得到这个消息，悔恨不已。他认为，根据同盟会的一些规定，革命的领导大权一定要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所以他极力设法进行挽救。九月初三日，当黄兴从香港来到上海时，他就劝黄兴去南京率领第九镇新军起义，夺取东南诸省，以扩大革命党人的势力，削弱黎元洪的影响。黄兴不仅没有同意，而且还把宋教仁拉上轮船，一起西上，前往武汉。到武汉后，黄兴仅被黎元洪任命为战时总司令，到前线去指挥革命军同清军作战，宋教仁则协助胡瑛办理外交事务，没有得到任何正式职位和实权。宋教仁看到黎元洪的都督地位已经巩固，他的政略在武汉无法施展，所以在为湖北军政府起草《鄂州约法》之后，就于九月二十三日(11 月 13 日)乘船东下，去策划占领长江下游地区，以便成立一个由革命党人直接控制的中央政权。

宋教仁心事重重地回到上海，以湖南都督府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他一再强调："目下大局安危，不在

一时一地之胜负，实在统一机关之成否。"[①] 他努力调解江苏各军之间的纠纷，以稳定江苏的局势。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以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定将中央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他便为推举中央临时政府的革命首脑而积极活动。十月十四日(12月4日)，他和上海都督陈其美等人组织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以投票的方式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但因黄兴坚辞不就，黎元洪来电要求取消，各省都督府代表又在南京集议，改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黎元洪仍驻武昌，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南京组织中央临时政府。黎元洪表示赞同，黄兴也勉强接受。恰在这时，孙中山即将归国的消息传来，黄兴立即改变了马上赴宁就职的原议，继续留在上海等候孙中山到来再作决定。

孙中山于十一月初六日(12月25日)到达上海。宋教仁开始并不欢迎。后经张继等人出面劝解，他才改变了态度，从南京赶到上海，和孙中山一起筹商建立一个怎样的中央临时政府。面对当时的局势，他同意建立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革命中心，但在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还是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问题上，他却同孙中山发生了严重分歧。孙中山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他则坚持要实行法国式的内阁制。黄兴劝他取消自己的提议，他拒绝。最后由黄兴把两种意见提交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进行讨论，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的提议被否决。

宋教仁的主张未被采纳，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他认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很不完备，必须进行修改，应增设临时副

---

① 《宋教仁集》上册，第369页。

总统，规定临时大总统有自由制定官制官规而不必经过参议院同意的权力。十一月初九日，他在南京宴集各省代表，发表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说，阐发他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思想。然而，附和者寥寥。直到次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也同样感到这个大纲有修改的必要时，他的修改方案才获得多数代表的通过。可是，仅仅过了3天，这个修正方案又被推翻了。

在筹建南京临时政府的过程中，宋教仁费尽心思，出力不少，但他那急于要挽回革命党人已经失去的对革命的领导权的心情，却无法被别人充分理解。特别是因为章太炎在十月十一日(12月1日)发表的九则《宣言》中曾经写道："至于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为此，宋教仁招来不少人的嫉妒，而他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提出修正，又引起这个大纲起草者们的强烈不满，因此，他的一切言行，都被看作是出于争当总理、捞取大权的私心，使他有苦难吐，百口莫辩，连孙中山也无法坚持任命他为内务总长，最后只好让他担任总统府法制院院长。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抵挡不住国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很快就被迫向帝国主义与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妥协，推荐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同时，孙中山还提出定都南京、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个条件，以维护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防止袁世凯背叛民国。1912年2月18日，孙中山特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专使，宋教仁和汪精卫等为欢迎员，前赴北京，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狡猾的袁世凯表面上表示"极愿南行"，暗中却密令陆军第三镇的部分士兵发动"兵变"，为其不能南下制造借口。淳朴忠厚的蔡元培识不破袁世

凯的阴谋诡计，便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要求对袁世凯进行迁就。袁世凯又请宋教仁提前回南，报告一切。宋教仁知道袁世凯品行不端，“北京兵变”的发生，肯定是袁世凯要弄的手段，但他从抵制俄国和日本的侵略阴谋考虑，却同意把北京作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由于他在入京时“多所结纳”，马君武“谓其卖党于袁世凯”，他知道后怒不可遏，在南京总统府打了马君武一记耳光。马君武立即还击，打伤了他的眼睛，被送入医院，“旬日始愈”。事后，马君武十分惭愧地说：“因不识钝初政治之手腕，故有是言。钝初诚愿始终忠于党，我甘承其过。”①

第四节　为宪法而牺牲

1912 年 3 月 10 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命唐绍仪组织第一届内阁，宋教仁被任为农林总长。尽管他最有兴趣并努力学习和研究的是政治和法律，农林非其所长，“然犹以为既列阁员之群，亦参赞大政方针之一人，则主持所信之政见，以期见诸实行，或亦易事，故姑且承乏其间，以图展布有日”②。然而，仅仅过了两个多月，他这美妙的想法就被打得粉碎。由于袁世凯的专横跋扈及其爪牙的从中破坏，这届内阁一事无成，形同虚设，唐绍仪不得不在 6 月间就宣布辞职，宋教仁也随即向袁世凯递上了辞呈。但是，这种严酷的现实未能使宋教仁意识到必须设法组织政治军事实力同袁世凯较量，只是令他感

---

① 《胡汉民自传》。

② 《宋教仁集》下册，第 405 页。

到，仅仅组成责任内阁，还不能保证政府内部意见的一致，所以，在6月28日同盟会再次开会讨论组织内阁问题时，他进而提出了组织纯粹政党责任内阁的主张。

纯粹政党责任内阁是同政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时候，一部分同盟会员和立宪派与旧官僚为了能在新政府中争得一席之地，或者达到其他政治目的，纷纷组织公开政党或政治团体，致使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而同盟会虽然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就变成一个公开政党，但在宋教仁看来，它已远远不能适应政党政治的需要。他公开宣称："统一、同盟两党，政纲本无不同，故与两党皆有关系。惟同盟会分子复杂，本非政党组织，前此勉强改为政党，原非余之本意；且同盟会多有感情用事之举，尤非政党所宜出。然感情用事，统一党人亦有不免，如将来两党均不能化除意见，余意于两党外另求同志，更组织一党，以为国家效力之地。"[①] 尤其是这年5月，统一党又和国民协进会以及民社等几个小党派联合在一起，组成共和党，充当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在临时参议院中和同盟会对抗，更使宋教仁感到，组织一个大党，在国会中造成多数党的声势，已经刻不容缓。

7月16日，宋教仁主持召开了同盟会本部全体职员大会，讨论同盟会的改组问题。多数人主张仍然沿用同盟会旧称，宋教仁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只是作了两点原则性说明：一是对于赞助同盟会的其他政党要极力联络；二是要注意国会的选举，"必使会员能于国会占多数席位。彼时无论政府如何，可以会员力量改

① 《宋教仁集》下册，第390页。

良之，是皆扩张势力之最要者也”[1]。他所要极力联络的其他政党，主要是指参议院中的第三大党统一共和党。这个党的不少党员过去都加入过同盟会，与同盟会有着一定的联系，后来虽然独树一帜，并在参议院中对共和党颇为偏袒，但因袁世凯要陆征祥于继唐绍仪之后组织内阁，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立场已经开始动摇，只是由于他们还不赞成宋教仁提出的不参加陆征祥内阁的建议，所以两党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到了7月26日，袁世凯用武力强迫临时参议院通过陆征祥出任总理，统一共和党不仅没能将陆征祥否决，而且受到共和党与军警界的攻击，许多党员都非常气愤，便决定和同盟会一起参加正式国会的竞选。于是，两党合并的问题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宋教仁组织大党的心情十分迫切。统一共和党提出，要实行两党合并，必须改变同盟会的名称，废除民主主义纲领，改良内部组织。宋教仁征得孙中山和黄兴的应允后，在8月5日，双方代表进行正式谈判。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得到讯息，也先后派出代表前来参加，表示愿意一起实行合并。经过反复商讨，他们决定以“国民党”作为这个新党的名字，并且通过了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厉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和维持国际和平等五条政纲。在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宋教仁被举为理事，不久，又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

国民党的成立，使宋教仁踌躇满志。他以喜悦的心情写信对海外的同盟会员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

① 《民立报》1912年7月28日《同盟会大会纪事》。

横,其能与我争乎?"[1] 可他并不知道,组织庞大的国民党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活动时期"平均地权"的纲领,取消了同盟会公开以后的"男女平等"主张,把原来的"力谋国际平等"改成了"维持国际和平",从而失去了积极的斗争意义。他还把社会上一大批官僚政客也拉入国民党内,使国民党的成分更加复杂,这就大大削弱了它的战斗力量。

凡是企图实行专制独裁的人,总是容不下有抱负有才望的政治家。袁世凯除了蒙骗孙中山和黄兴以外,对宋教仁更是大费心机。他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的灵魂,政治手腕比较灵活,比起孙中山和黄兴来更加难以对付。正是因为这样,他对宋教仁很不放心,总想把宋教仁控制在自己手中,为己所用,最低限度也要使宋教仁无法施展本事。所以,他曾对宋教仁赞扬不已,百般笼络,甚至放出空气说,他很有可能要宋教仁出任总理,继陆征祥之后组织内阁。

宋教仁没有理睬袁世凯的拉拢,决心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努力奋斗。10月18日,他离开北京,沿京汉铁路南下,去探望别离8年的老母和妻子,同时布置南方诸省的国会议员选举事务。临行之前,袁世凯送上50万元交通银行支票,他原封退回,拒不收受。袁世凯知道宋教仁决"非高官厚禄所能收买,乃暗萌杀意,密令心腹赵秉钧谋之。赵又委其走狗洪述祖、程克二人主其事"[2]。洪述祖和程克寻找到上海流氓头子应桂馨,由应桂馨负责物色执行暗杀的凶手。

---

① 《宋教仁集》下册,第419页。

② 《辛亥革命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59页。

宋教仁在桃源老家只住了1个多月，就重新踏上了政治斗争的巇崄征途。从1913年1月开始，他由长沙到武汉，过九江到上海，又到杭州和南京，到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到处都发表竞选演说，对北京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猛烈抨击，对袁世凯的阴险奸诈进行无情揭露。他在2月1日国民党湖北支部的欢迎会上说："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① 10天以后，他又在国民党鄂省交通部的欢迎会上再次点了袁世凯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名，他说："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在内政方面，"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对于财政之将来全无丝毫计划，司农仰屋，惟知倚赖大借款，以为补苴弥缝之术。……殆以临时政府期近，敷衍了事，以塞国民之责，不惜以万难收拾之局贻之后人，此则政府罪无可逭之处也"。在外交方面，"自库俄事件发生以来，国人嚣嚣然群起诘责，而荏苒至今，将及一载，不闻有当解决之法。……兄弟(宋教仁自称)彼时亦在北京，见事情重大，曾屡次警告袁世凯总统及赵总理，促其从速设法解决此问题"。然而，"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处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他明确指出，北京临时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②。3月9日，他在国民党南京支部的欢迎会上，则简单扼要地阐述了自己的全部政治主张："现正式国会将成立，所纷

① 《宋教仁集》下册，第456—457页。

② 同上书，第457—458页。

争之最要点为总统问题，宪法问题，地方问题。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国之良好制也。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混合、超然诸内阁之弊，现已发露，毋庸赘述。宪法问题，当然属于国会自订，毋庸纷扰。地方问题，则分其权之种类，而为中央地方之区别。”①

任何政治家的思想，总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这个时候的宋教仁已经不再以组织一个纯粹政党责任内阁而满足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要使袁世凯担任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总统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选举“最为愚昧脆弱之黎元洪”为总统，才能“组织同志内阁”，充分发挥责任内阁的作用。因此，当他去武昌访问黎元洪的时候，就对黎元洪说过：“我们不能使袁世凯做我们听话的工具，我要我党党员选你当总统。”② 这个消息很快就在社会上流传开来，2 月 18 日北京的《亚细亚日报》就对此作了公开报道。

宋教仁的这一计划，对袁世凯无疑是个威胁，况且国会选举已经揭晓，国民党在每个选区都高奏凯歌，在参众两院 870 个议席当中，国民党独得 392 席，占议席总数的 45%，而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所得议席总和只有 223 个，还不到议席总数的 26%，国民党取得了压倒的多数，宋教仁的这一计划是很有可能实现的。从此，袁世凯杀害宋教仁之心益坚，其行动的速度也大大加快。2 月 1 日，洪述祖密电应桂馨，声称“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价值”。第二天，洪述祖又在给应桂馨的一封密函中

① 《宋教仁集》下册，第 467 页。

② 刘基胜：《为民主而斗争：宋教仁与辛亥革命》，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英文版。

说："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桂馨）须于题前径电老赵（指赵秉钧），索一数目。"[1] 其中所谓"紧要文章"，"激烈举动"，就是指的暗杀宋教仁的事。与此同时，袁世凯还指使其大小喽啰，匿名投稿全国各报，并以"救国团"的名义通电全国，对宋教仁进行恶毒攻击。尤其卑鄙的是，袁世凯购求宋教仁在日本时的所谓"劣史"资料，编印成册，大量散发，妄图彻底毁坏宋教仁的名誉。结果，前者遭到宋教仁的驳斥，后者也未收到什么效果。袁世凯在收到应桂馨 3 月 14 日发出的"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的密电以后，18 日拍了"寒（即 14 日）电应即照办"的复电[2]，正式下达了暗杀宋教仁的命令。

宋教仁完全陶醉于国会选举，他在上海与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商讨在国会中应当施行的党略，起草国民党大政见，准备带到北京国民党本部议决实行。他的好友陈犹龙和谭人凤发现，袁世凯已有图谋不轨的端倪，劝他应该有所戒备，他却认为那是"蛇影杯弓之事"，全不放在心上。他只考虑到，袁世凯一旦大总统落选，倒很有可能要同国民党最后摊牌，所以他对他的党员们说："在不久的将来，（袁世凯）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3] 这时袁世凯来电，催他赶快进京，他便决定于 3 月 20 日乘夜车同其他几个新当选的议员一起北上。

---

①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 171—172 页。

② 同上书，第 172—173 页。

③ 《宋教仁集》下册，第 457 页。

这天晚上,宋教仁来到《民立报》社,向他的同人友好辞行话别。徐血儿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先生此行,责任甚重,顾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测之危险,愿先生慎重防卫。"他若无其事地笑着回答:"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然并力赴之。"①

10时45分,宋教仁和黄兴等人走出沪宁车站议员休息室,准备上车。他们刚刚走到剪票处,就听到低低的一声枪响,随后便是第二声、第三声。宋教仁摇晃了一下,便倒在旁边的一张铁椅子上,说道:"吾中枪矣。"由于前来送行的人忙于救护,竟使凶手武士英逃去。

宋教仁被送到车站附近的铁路医院里,他不知道向他开枪的主谋人就是袁世凯,还请黄兴代笔,给袁世凯拍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他的不幸,提出他的要求,希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②。延至22日凌晨,这个年仅32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便与世长辞了。

① 徐血儿等编:《宋渔父》第1集后编。

② 《宋教仁集》下册,第496页。

第三十章　袁　世　凯

第一节　在朝鲜的政治活动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慰亭），别号容庵，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人，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叔祖袁甲三官拜漕运总督，生父袁保中为本县著名豪绅，胞叔袁保庆官至道员，从叔袁保恒历任户、吏、刑部侍郎，袁保龄为候补道。袁世凯行四，约在同治三年（1864）过继给胞叔袁保庆为嗣子。

同治五年（1866），袁世凯随嗣父袁保庆至济南任所，开始读书。后迁江宁。同治十二年袁保庆病逝后返回原籍，与嗣母牛氏一起生活。

同治十三年（1874），袁保恒将袁世凯带到北京，聘请严师授读。但袁世凯纨袴子弟的习性甚深，以读书为虚应之事，故成绩不佳。光绪二年（1876）秋回籍应乡试，结果落第而归。次年夏，随袁保恒至河南办理赈务，历练做官本领。光绪五年（1879）秋，他又一次应考乡试，仍名落孙山。其后曾报捐中书科中书。继之，捐纳实缺，不果，于是决心投笔从戎，于光绪七年（1881）至山东登州投奔其嗣父的至交、淮军统领吴长庆，获得帮办文案之职，

开始踏入仕途。

光绪八年，与清廷有宗藩关系的朝鲜发生兵变，国王李熙和闵妃集团被围攻，向受闵妃排斥的大院君李昰应(李熙之父)重握朝政。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命令吴长庆率淮军六营至朝平乱。七月东渡前，幕府名流张謇等人推荐袁世凯任执行前敌营务处事。平乱后，吴长庆对袁的表现十分赞赏，为之上报请奖。经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的李鸿章奏准，九月初一日(10 月 12 日)袁以同知补用，并赏戴花翎。不久，应朝鲜请求，吴长庆命袁帮助朝鲜整顿军队。

光绪十年(1884)当法国侵略者将战火由越南引向中国边界时，李鸿章为加强边防，奏调吴长庆率兵三营驻防奉天金州，其余三营留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统带，命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由此袁在朝鲜成为一个握有军事实力的人物。十月，朝鲜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在日本配合下发动政变，迫李熙改组了政府。袁世凯果决地说服吴兆有统兵击退日军，赶走亲日派。此次胜利大大助长了袁的政治野心，他自作主张，搬进王宫，以监国大员自居。由于吴兆有反对其企图独掌军权，揭发其挪用军饷等罪状，加之日本扬言要清军从朝鲜撤退，袁心灰意冷，于光绪十年十二月(1885 年 1 月)请假回国，返回原籍。

为了进一步控制朝鲜，李鸿章采取了两项具体措施，一是释放被软禁在保定的李昰应回朝，利用其影响和力量抵制闵妃集团依赖俄国的倾向；二是以袁世凯接替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的职务。光绪十一年九月李鸿章奏准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以提高其地位，使其参与外交事务。并以知府分发，补缺后以道员升用，赏加三品衔。从此，他开始崭露头角，成为中外所知的人物。

清皇朝对朝鲜本来只有宗主之名，而无其实。而袁世凯自抵新任后，为维护“上国”尊严和“属邦体制”，时时摆出监国大员的架势，专横武断，盛气凌人，事事插手，并于光绪十二年(1886)两电李鸿章，请废黜李熙，另立新君。袁世凯的行为促使朝鲜宫廷产生更大的离心倾向，严重损害了中朝关系。

日本自确定霸占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后，一直积极进行备战和煽惑发动侵略战争。袁世凯起初对日防制甚力，但后来即为盲目乐观、麻痹轻敌思想所支配，对日本的动向懵无所知。

光绪二十年二月(1894年3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四月，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助剿。袁大力支持，屡电李鸿章出兵，且云日本并无出兵之意，接着又将军机泄漏给日本。当日本出兵朝鲜后，袁仍对形势的危机无所认识，一心想着镇压起义。直至日本大兵压境，始请求增兵备战。五月下旬，战争一触即发，袁为脱离险境，再三电李请求回国。经清廷批准，袁于六月十七日(7月19日)改装易服偷偷回到国内。

第二节 小站练兵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奏派袁世凯仍任总理交涉通商大臣兼办辑抚事宜，令其驰赴平壤一带联络官军，协筹粮运。袁对这场战争毫无信心，始终主张议和，一闻败讯，立即逃窜。清军的屡次败北，彻底暴露出旧有军队的腐朽，朝野上下群起呼吁必须改革旧军，建立新军。基于这种形势，袁世凯也向盛宣怀建议改革军制，募练新军，并毛遂自荐要当监督。光绪二十一年又

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提出同样意见。六月十二日(8月2日)袁被召见，奉派督办军务处差委。他用钻营请托等手段，并拟订新军营制饷章和聘请外国军官合同，请人译撰兵书，博得知兵之名，终于受到权贵荣禄等的激赏，十月二十二日(12月8日)获得到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的权柄。

十一月初一日(12月16日)，袁世凯至小站接管原定武军4000余人，旋派人选募2000余人，全军共7000人。军队设督练处，袁自领督练官。新建陆军采取德国和日本建制，营制分左右两翼，每翼分统步、炮、马、工程、辎重各兵种；教官多自德国聘任，新式武器多从德国购置，全军一律习洋操，实开中国陆军近代化的先河。袁世凯在军队中大树特树个人绝对权威，通过官禄利诱，严刑峻法，以及灌输封建伦理、升官发财、宿命论等反动思想，很快培植起一批亲信死党，把军队训练成带有浓烈人身依附性质的武装。

由于袁世凯作风跋扈，嗜杀擅权，营私受贿，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御史胡景桂对其进行参劾。查办此案的荣禄极力包庇袁世凯，使其度过了难关。经此事，袁越发投靠荣禄，依荣而自固。

次年，清廷以袁世凯练兵有功，晋其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第三节 出卖维新志士 剿灭义和团

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发动具有进步意义的变法运动。对此，袁世凯佯为赞成，阴实

反对。七月,变法达到高潮,顽固势力频频密谋破坏。维新派为了将变法进行下去,同时出于对袁世凯的表面认识,乃建议光绪帝召袁进京,结以恩遇,以备不测。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擢其为候补侍郎。袁恐引起顽固派怀疑,接连拜谒权贵解释,并探听风声。初三日夜,维新派中最为激进的谭嗣同只身至法华寺见袁世凯,坦率地告以直隶总督荣禄和慈禧太后欲废光绪帝的阴谋,请其竭力相救,否则便向慈禧太后出首,求得富贵。袁世凯正言厉色地表示:"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当谭说荣禄不易对付时,袁怒目而视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① 初五日(20日),光绪帝再次召见袁世凯。当日下午,袁世凯回天津后立即向荣禄告密。次日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②。袁世凯进一步获得慈禧太后和荣禄的信任。十月,荣禄奏设武卫军,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武卫右军"。光绪二十五年五月(1899年6月),袁世凯晋升为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六月,袁世凯率军由山东操演行军阵法回到天津,开始组织人员编纂《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七月进呈御览。该书强调练兵必须把封建宗法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军事训练放在第二位,首次系统地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方略和训练技术,成为清廷以后训练新军的重要军事教科书。

---

① 梁启超:《谭嗣同传》,《戊戌变法》第4册,第52页。

②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具体日期,尚有几种说法,此说较为流行。

是年底,山东人民掀起的反抗帝国主义教会侵略的斗争已经遍及全省,不久便爆发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十一月初四日(12 月 6 日),清廷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他在抵达济南任所的次日,即颁布《禁止义和拳匪告示》,坚决主张剿团保教。由于清廷再三谕令不可一意剿击,袁世凯开始尚未完全采用高压政策,而是严缉首要,查禁瓦解。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四日(1900 年 3 月 14 日),清廷实授袁为山东巡抚。五月,直隶义和团大批涌进北京,慈禧太后宣布义和团众为"义民"。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联合侵略军由天津向北京进犯。慈禧太后命袁世凯派兵火速驰援。袁不敢与列强开战,仅派少数人马搪塞。继之,参加"东南互保",任列强向京津侵犯、屠杀中国人民而不抵御;通饬全省严密保护洋教士和一切洋人,护送到通商各口;保护教会,优恤教民。而对义和团则极端残忍,山东境内团民为其剿灭殆尽。

第四节　在直隶推行"新政"

同年十二月(1901 年 1 月),慈禧太后宣布筹办"新政"。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 年 4 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推行"新政"。同月,袁世凯提出治国十策,即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裕度支、修武备,以"求富"、"求强"。八月以后,在山东开始整饬杂税厘捐,设立银元局,开办课吏馆、校士馆,创立商务总会和大学堂,力行"新政"。九月二十七日(11 月 7 日),经荣禄、奕劻等推荐,晋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居各省督抚之上。十月十八日(11 月 28 日),清廷以其"共

保东南疆土"，"卓著勋劳"[1]，加其太子少保衔。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四日(1902 年 6 月 9 日)，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袁世凯督直以后，身兼清廷参预政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办理京旗练兵事宜大臣、督办电政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津镇铁路大臣、京汉铁路大臣、会议商约大臣八大要差，极力迎合清廷，加紧推行"新政"，成为清廷的重要决策者。

首先，增募新军，改革军制。光绪二十八年(1902)修订募练新军章程十一条和募兵格式八条，仿行外国的征兵制度，开始招募新军。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共练成北洋常备军六镇。北洋六镇新军的编练，使袁世凯的兵力骤增至八九万人。六镇的军官除第一镇外，皆其嫡系，加之在政界网罗培植的许多党羽，逐步形成一个以袁世凯为首脑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其次，创办巡警。光绪二十八年四月(1902 年 5 月)，袁世凯率先在保定创设警务总局 1 所，分局 5 所，开办巡警学堂。七月接收天津时，又将在保定训练好的 3000 名巡警调进，设南北巡警局，同年冬成立巡警学堂，后又增添马巡、河巡、暗巡和消防队，将巡警制度推广到乡村和铁路，在直隶全省建立起警察网。光绪三十一年，又利用革命党人企图炸毙考察宪政大臣事件，建议清廷设立巡警部，预防革命党人潜伏，维持治安。并推荐亲信徐世昌任该部尚书、赵秉钧为侍郎，控制了警政。

第三，整饬吏治。他饬令道府厅州县一律将所得陋规交公，酌给公费，以杜绝受贿，止官之贪；设立官吏考验处，考验甄别初到和新选新补官员；设立调查处，采访舆论，了解官员政绩，调查

---

[1]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 488，第 17 页。

案件,以便举劾;设立法政学堂和胥吏学堂,招收候补官员和幕僚入校学习,命未赴任的州县实缺各员先赴日本参观,以开官智。但这些措施根本不起作用,吏治依然腐败如故。

第四,提倡实业。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在保定创立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购买农业机械,聘请日人南原正三指导种植。并附设农业学堂,教授蚕桑种植和糖酒制造。在天津设立直隶工艺总局,作为官办实业的总机关,诱掖奖励全省绅民兴办实业。派人到外国和外省学习工业技术,批准给发明者以专利权。在袁世凯的大力提倡下,直隶近代工商业得到一定的发展。

第五,广兴教育。袁世凯坚决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二十八年在保定成立学校司,次年奏请递减科举中额,改学校司为学务处,领导全省教育。饬令该处设置研究所,研究学校编制和教授方法,派员考核官绅办学情况,令各地设劝学所、宣讲所,筹备公款,积极办学;分批派遣人员赴日考察教育,选派留学生赴日学习师范,并捐银2万两表率群僚和士绅出资办学。光绪三十一年,又领衔与其他督抚合词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经其提倡,直隶办学之风大兴,在各省之中成绩名列前茅。

第五节 回籍“养疴”

清末,国内出现了革命和立宪两股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潮流。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秘密组织团体,开展推翻清皇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活动,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另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认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达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目的。他们反对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皇朝,提出废除封建专制制

度，人民参与政权，设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制定宪法，实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治的迫切要求。某些官僚也奏请实行立宪。清廷为消弭革命，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在大势所趋下，决定派遣载泽等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袁世凯对革命运动坚决主张镇压，而对立宪运动却不敢公然反对。光绪三十一年(1905)，当立宪的声浪愈来愈大时，他便与周馥、张之洞联名奏请实行立宪。其后立宪的调子越唱越高，力图把自己装扮成立宪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以保住本人地位，进而攫取更大权力，同时抵制革命。光绪三十二年六七月间，考察宪政大臣回国，奏请立宪。袁世凯奉命设立天津自治局，拟定章程，首先试办地方自治。旋入京参加清廷召集的宪政会议，面奏慈禧太后，请改革官制，组织责任内阁。七月，清廷发布上谕，仿行宪政，首先改革官制，以为预备立宪基础，任命袁世凯参预编纂官制。讨论官制改革时，袁世凯力主实行责任内阁制，企图与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出组内阁，掌握中央政权，实行独裁统治，并借以限制君权，免遭光绪帝将来报复，后因多数官员抵制，未能得逞。会上，一些满族亲贵提出实行立宪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削夺督抚权力。对此，他因关系自身利害，大加反对。九月二十日(11月6日)，清廷公布中央官制，强调"专责成"，袁世凯被迫于十月初三日(11月18日)上折辞去各项兼职，并交出四镇兵权给陆军部。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日(1907年4月2日)，清廷改革东三省官制，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署理吉林巡抚，段芝贵赏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此四人均属袁党，是由袁世凯推荐给奕劻的。任命一公布，举朝哗然。三月二十五日(5月7日)，御史赵启霖上折参

劾段芝贵向奕劻送寿礼10万两,并向其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献歌妓杨翠喜,词连袁世凯。慈禧太后大怒,立即撤销对段芝贵的任命,令醇亲王载沣和大学士孙家鼐查办。袁世凯极力包庇,查证毫无结果,奕劻父子安然无恙,赵启霖竟遭革职处分。参案一结束,袁世凯即与奕劻勾结发起反击,进行报复。他们认为赵启霖上参折系军机大臣瞿鸿禨和邮传部尚书岑春煊所指使,便将矛头指向瞿、岑,掀起"丁未政潮"。首先借机奏请授岑为两广总督,将其排斥出京。继之贿买御史恽毓鼎捏词参劾瞿鸿禨,使瞿于五月开缺。最后又诬蔑岑春煊为康有为、梁启超同党,阴谋要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蒙蔽慈禧太后将岑开缺。

五月,清廷公布地方官制,谕令官员条陈预备立宪意见。六月十六日(7月25日),袁世凯以日法协约订立,上密折请求"赶紧认真预备立宪",其实质是企图将铁良和凤山攻倒,夺取陆军部和业已交出的四镇兵权,成立既代君主负责又不对资政院负责的内阁,实行假立宪欺骗人民。3天之后,又奏请派遣大臣前往德国、日本考察宪法,简择王公近支赴英国、德国学习政治、兵备。七月,成立天津议事会和董事会,通令全省以天津为模范,办理地方自治。

袁世凯与奕劻狼狈为奸,结党营私,遭致御史的交章弹劾。慈禧太后疑虑丛生,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1907年9月4日)免去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调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

是年九月,清廷不顾浙江、江苏绅民业已奏准招股修筑沪杭甬铁路的事实,颁发借款修路谕旨,把筑路权送给英国。两省人民痛路权丧失,立即掀起坚拒借款、铁路商办的

热潮，争相集款自办。袁世凯以“外交首重大信，议约权在朝廷”[1] 为理由，不准江、浙人民反对。十一月两省代表进京力争，他仍坚持借款筑路，遭到国内舆论的强烈谴责。

光绪三十四年，立宪派人士为了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度，不满意清政府宣布的“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要求在二三年内召开国会。江苏、安徽、北京、直隶、吉林、山东以及八旗士民代表均呈递国会请愿书。袁世凯反对召开国会，阴阻都察院代奏。同时因衔恨于康有为、梁启超和马良密结亲贵排斥自己，挑唆慈禧太后将梁启超组织的立宪团体政闻社加以“煽乱”罪名，勒令解散，从而撕下了他积极倡导立宪的伪装。

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逝后，3 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摄政王载沣监国，执掌政权。新朝优赏军机大臣，袁世凯加太子太保衔。载沣深切痛恨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出卖其兄光绪帝，对其贪权植势亦极疑忌，极想把袁除掉。因遭到奕劻坚决反对和军机大臣张之洞劝阻，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909 年 1 月 2 日），载沣借口袁患足疾，下令将其开缺，命回原籍休养。袁世凯携眷返河南，最后定居彰德（今安阳市）城北门外的洹上村。表面上过着隐逸生活，实际上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连克武汉三镇，建立湖北军政府，推举原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都督。清廷举朝惶惶，命陆军大臣荫昌督率陆军两镇前往镇压。袁世凯见时机已到，立即活动布置。帝国主义也广造“非袁不能收拾”的舆论。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一向与袁

①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 8，1947 年版，第 40 页。

沆瀣一气,此时同时提议起用袁世凯,向载沣施加压力。载沣起初不允,他们便以辞职不上朝议事相要挟,迫使载沣于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嫌官微权轻,复奏足疾未愈,不能立即受命。

第六节 东山再起 攫取民国总统

二十八日,袁世凯电奏招募防军1.25万名。次日,电奏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等北洋高级将领归己指挥。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湖南、陕西同时光复。载沣被迫再作让步,九月初六日(10月27日)授袁为钦差大臣,节制调遣所有赴援水陆各军。初八日,山西独立,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屯滦州,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等十二条政纲,清皇朝在迅速崩溃。袁世凯见此,初九日离开彰德,南下视师。十一日,奕劻内阁总辞职,载沣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其进京组织完全内阁,仍旧节制调遣原管各军。袁世凯称非国会公举,不敢奉诏。十七日凌晨,他派人在保定暗杀了准备进军北京推翻清室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①,解除了吴禄贞对他的严重威胁,并避免了清廷立即覆亡的危险。次日,资政院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二十六日,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不久又在责任内阁的名义下逼迫载沣辞去摄政王,不再预政,最终夺取清廷政权。

袁世凯出山后即确定了利用革命势力要挟清廷交出政权,以清廷为工具逼迫革命势力就范,最后由自己窃取全国政权的

① 一说吴禄贞为良弼派人暗害。

总方略。他对革命势力软硬兼施，又打又拉，主动提出议和，十月十二日（12月2日）同南方达成武汉地区停战3天的协议。十七日，清廷授袁世凯为对民军和谈全权大臣，他即日委唐绍仪为总代表率代表团南下议和。十一月初十日（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日，唐绍仪和南方代表伍廷芳达成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的协议。袁世凯认为孙中山已当选总统，国民会议召集办法于己不利，窃取总统无望，不承认唐、伍达成的协议。十二日，准唐辞职，使议和濒临破裂。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袁世凯唆使部将冯国璋、段祺瑞等40余名高级将领叫嚣维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1月3日，南方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通过各部总长，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袁世凯向伍廷芳提出无理质问，被伍驳得理屈辞穷。14日，唐绍仪探询南方清帝退位后举袁为总统有何把握，孙中山等作了绝对肯定的回答。袁世凯遂下定决心，迫清帝退位。

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入宫奏请隆裕太后实行共和。中午出宫行至东华门，遇到革命党人张先培等的袭击，侥幸脱险，从此称病不朝，把逼宫任务交给民政大臣赵秉钧等执行，同时贿买太监小德张恐吓隆裕。26日，又授意段祺瑞等40余名高级将领电奏，指斥载泽、溥伟等亲贵阻挠共和，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同日晚，发生革命党人彭家珍炸伤宗社党头子良弼的重大事件，隆裕太后特降懿旨，封袁世凯一等侯爵，以示羁縻。袁接连四次上奏力辞。在此期间，又指使杨度等人组织共和促进会，制造舆论；同时亲自奏请速定国体。隆裕太后万般无奈，终于做出皇帝退位、颁布共和的决定。2月3日授袁世凯以全权，与南方协商清帝退位条件。11日，袁将清帝退位诏旨电达南京临时政府，并表

明政治态度,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表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1]。次日,清帝宣布退位。

2月13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辞职,举荐袁世凯自代。1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建都南京,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他怕受革命势力挟制,不愿南下就职,指令曹锟的第三镇士兵29日晚在北京东城发动"兵变",制造拒绝南下口实。南方让步,允其在北京受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月底,唐绍仪内阁组成。4月,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南北统一。

第七节 镇压"二次革命" 摧毁共和制度

袁世凯一当上临时总统,即别有用心地下令裁军,借口军饷困难,无法供给,对南京留守黄兴施加压力,迫黄兴辞职。接着便命江苏、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等省将大部军队遣散,使南方革命武装力量大大削弱,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力量作好准备。

不久,袁世凯与内阁总理唐绍仪发生尖锐矛盾。《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家政体采取内阁制,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必须经国务员副署,方能生效。袁世凯最初提名让老友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原冀其唯命是从,得心应手。不意唐绍仪接受新思想较快,辛亥革命开始后倾向共和,以后加入同盟会。就任内阁总理又主张与同盟会合作,强调遵守《中华

① 《临时政府公报·电报》,1912年2月14日。

民国临时约法》和内阁的责任，时常与袁意见相左。于是袁世凯利用各种手段架空、刺激唐绍仪，促其去职。6 月，袁在王芝祥督直问题上蓄意与唐闹翻，坚决反对唐提出让王督直的意见，15 日竟擅自将不经内阁副署的任王为南京宣抚使的委任状交王。唐愤而辞职。月底，陆征祥出任总理。内阁有 6 位总长相继辞职。7 月 19 日，袁世凯提出补充阁员名单，让陆征祥提交参议院，参议院全部予以否决。袁世凯又二次提出补充阁员名单，密令军警使出流氓吓人战术，恫吓议员必须通过，否则将以炸弹从事，武力解散参议院。陆内阁虽然成立，但参议院因陆失职，提出弹劾，陆征祥遂请辞。8 月 20 日，袁世凯任命亲信、内务总长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责任内阁终于失去独立性质，变为袁的附属机关。

8 月，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与武昌起义的功臣、湖北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矛盾激化，欲借袁世凯手诛锄异己，将张振武与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推荐给中央。张、方抵京的次日，黎即电袁，给张、方妄加罪名，请袁予以正法。袁世凯密令将张、方逮捕，并秘密处死。消息传出，引起公愤，袁世凯将一切责任推到黎元洪身上，挑拨黎与革命党人的关系，迫其倒向自己。

为了平息舆论，欺骗人民，加强集权统治，拉拢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在枪杀张振武、方维后不几天，袁世凯电邀孙、黄与黎元洪进京，共商国事。黎受各方责难，不敢进京。孙中山、黄兴先后抵京，均受到袁世凯最为隆重的欢迎。孙中山在京一个月，与袁世凯会谈 13 次。会谈中，袁世凯对孙中山谈的问题皆表示欣然同意。通过会谈，孙、黄被袁世凯所迷惑，宣言愿推袁为正式总统，号召人民给袁以全力支持。9 月 9 日，袁世凯特授孙中

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25 日,他通电发布八大政纲,并云已取得孙、黄、黎同意,骗取人民信任。

1912 年 12 月,第一届正式国会开始初选,共和党、民主党、由同盟会和其他政党合并而成的国民党展开了激烈竞争。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著名政治活动家宋教仁到处发表演说,鼓吹政党内阁,抨击时政。1913 年 2 月复选结束,国民党在参众两院获得多数议席,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被选为参议员的宋教仁准备出而组阁。袁世凯深恐国民党用和平方法夺去政权,便密令赵秉钧派人刺杀宋教仁,阻止国民党内阁的实现。3 月 20 日晚,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遭受枪击,22 日逝世。全国群情沸腾,国民党人更为愤怒,一致强烈要求查办凶手,严惩国贼。袁世凯贼喊捉贼地当即下令通缉凶手。旋刺宋的要犯应桂馨和凶手武士英皆落网,并搜出应犯与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密电本及函电多件,证明刺宋主谋就是赵秉钧和袁世凯。4 月 26 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将证据公布。袁世凯恼羞成怒,决定武力消灭国民党,为复辟帝制扫清道路。当日夜,命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与英、德、法、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附有苛刻条件的 2500 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筹措战争经费。这笔非法借款遭到新成立的国会和全国人民的同声反对。袁世凯一面进行狡辩,收买统一、民主、共和三党议员合组进步党,对抗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接二连三地下令压制舆论;一面加紧备战,召开军事秘密会议,调兵南下。当一切准备就绪,他气势汹汹地让人传语国民党员:如果国民党敢于"捣乱",他即举兵征伐,公开叫嚣要对国民党实行武力镇压。6 月 9 日、14 日、30 日,袁世凯连下三令,将国民党最有实力、反袁最突出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

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先后免职，促国民党首先采取军事行动，企图把挑起内战的罪名扣到对方头上。国民党人未及时作出反应，袁世凯继续增兵，进逼江西。7月上旬，孙中山召开会议，决定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江西独立，通电讨袁。接着江苏、安徽、广东、上海、福建、湖南、重庆宣布独立。战端开后，袁世凯命段芝贵、冯国璋分统大军由京汉、津浦线南下，进剿讨袁军。至9月上旬，即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平定。

在平定二次革命的过程中，袁世凯勒令解散了江西、广东、湖南三省省议会，10月13日下令拿捕江西省议会议员，赤裸裸地摧残地方立法机关。与此同时，动用反革命专政工具，乱加"鼓吹二次革命"、"私通民军领袖"、"妨害大局"、"袒护逆党"、"煽惑国民"、"诋毁政府"等等罪名，封闭报刊，禁止集会结社，解散政党，随意逮捕处决反对他的人士和议员，剥夺了人民所享有的一切自由权利。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派军警化装成公民，包围国会，胁迫议员选举自己为总统。经过三次投票，他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0日，在故宫太和殿宣誓就职。

10月14日，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出《天坛宪法草案》，基本精神仍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制等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袁世凯以其不利于复辟帝制，竟撇开宪法草案，于16日提出增修约法案，要求扩大总统职权，打击宪法会议。18日提出宪法公布权属于总统，不属于国会，企图利用公布权将宪法草案扼杀。22日复派遣8个委员出席宪法会议，干涉制宪，遭到宪法会议严词峻拒。25日，袁世凯通电攻击宪法草案，号召各省

文武官员群起而攻，予宪法会议第四次打击。31 日，《天坛宪法草案》三读通过，提交宪法会议。11 月 4 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追缴议员证书、徽章，两次非法取消 438 名议员资格，占两院议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名存实亡。宪法起草委员会也因此而解散，《天坛宪法草案》流产。

1913 年 11 月 26 日，袁世凯下令召集政治会议。12 月 15 日政治会议开幕，袁将国会、增修约法问题交付会议讨论。1914 年 1 月 10 日，袁世凯下令停止议员职务，实际上非法解散了国会。2 月 3 日，下令停办地方各级自治会。28 日，下令解散各省省议会。从中央到地方，一切资产阶级的立法、监督、民意、自治机关被其破坏无余。根据政治会议的议决，袁世凯于 3 月 18 日召开御用约法会议，制定《中华民国约法》，并于 5 月 1 日公布，废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为其帝制自为开辟了道路。同日，袁世凯宣布废除国务院，于大总统府设政事堂，负责统一行动，参与审议法令，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赞襄总统政务，对总统负责，在行政方面加强集权。5 月 8 日，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在军事方面加强独裁。23 日，改变地方官制，在省县之间增设“道”一级机构，各省民政长改称巡按使。26 日，停止政治会议，成立咨询兼代行立法院职权的御用机关参政院。6 月 30 日，裁撤各省都督，于北京建将军府，设立各将军名号，规定有督理军政者，在各省开府建牙，未有督理军政者，在将军府任事。

1914 年 7 月，袁世凯动用 20 余万军队，镇压了为时两年多，纵横豫、皖、鄂、陕、甘 5 省的白朗领导的河南农民起义。

第八节　复辟帝制　自取败亡

是年7月，袁世凯公布文官官秩，分为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少士9等，恢复封建时代官制。

9月28日，袁世凯亲率文武百官至北京孔庙祭孔。早在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令，其后屡发告令，制定《崇圣典例》、《祀孔典礼》，规定祀孔礼仪应与祭天一律，借宣扬孔孟之道，攻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企图从思想上动摇瓦解人民的民主信念，要人民绝对服从他的统治，为复辟帝制服务。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祀孔活动。

10月，袁世凯成立直接隶属于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的模范团，自兼团长，企图在军队中建立专供自己指挥的特别系统和绝对忠实于自己的军队，排斥陆军总长段祺瑞的势力。

12月23日，袁世凯效法封建皇帝至天坛祭天，为称帝作准备。

同月29日，公布约法会议修订的《大总统选举法》。该法规定，大总统任期10年，得连选连任；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时，得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议决现任大总统留任；选举前，大总统推荐3名候选人，选举时，选举会对现任大总统及3名候选人均可投票。此法可使袁世凯成为终身总统，并可造成袁氏家族的总统世袭。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京公使日置益代表日本政府，乘袁世凯阴谋称帝之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要求

袁接受。袁世凯为争取帝国主义支持,换取一姓尊荣,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命外交总长陆征祥同日置益等进行谈判。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除第五号日后另行协商外,其余必须速行应诺,否则将执必要之手段。袁世凯甘心卖国,9日将答复书送交日本使馆,满足了日本的要求,并于25日双方正式签约。

对日交涉结束,日本当权人物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袁世凯称帝深表同情,美、德等国亦热情鼓励,袁世凯认为将来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已无问题。这时,国内新的农民革命的危机尚未到来,革命党人绝大部分亡命海外,一时不能对之构成直接威胁。为控制稳定全国政局,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袁世凯着重防范反对其称帝的实力派。在中央最有实力的是其昔日的干将、陆军总长段祺瑞。段自被袁削夺陆军部权力后,与袁矛盾逐渐激化,反对袁称帝亦较坚决、露骨。袁世凯玩弄阴谋权术予以排斥打击,迫段于1915年5月辞职(正式免职在8月)。地方实力派多为袁的亲信党羽,但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的实力派则非其嫡系;即使嫡系当中,也有极个别的人如督理江苏军务冯国璋是反对其称帝的。对冯国璋,袁世凯百般笼络、欺骗,使其相信自己无帝制思想。对西南各省,袁世凯除命广东的龙济光监视广西的陆荣廷外,特于1915年2月任命心腹、参谋次长陈宧会办四川军务,率3个北洋混成旅进川,不久改授陈督理四川军务、成武将军,令其坐镇西南,准备随时消灭异己。另外,袁世凯还指使肃政厅发动"三次长参案"和"五路参案",诱胁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官僚政客充当帝制活动的中坚。

经过以上措置,袁世凯认为称帝时机已经成熟,指使杨度组织筹安会,以研究国体何者适于中国为名,公开鼓吹复辟帝制,

并秘密组织起一个由内务总长朱启钤、税务督办梁士诒、镇安上将军段芝贵、农商总长周自齐、参政张镇芳等10人组成的班子，作为发动帝制的中枢，同时确定了假借民意公举其为帝的办法，密电各省做好准备。人人知帝制即将复活，举国惶恐。袁世凯却装腔作势，矢口否认，说什么“从来无不亡之朝，帝王末路有求为平民而不可得者。余老矣，将营菟裘于海外，外间纷纭，滋非余意。苟相迫者，余当乘桴浮于海”[1]。9月2日，筹安会组织所谓公民请愿团上书参政院，请求改变国体，实行帝制。改变国体就是彻底背叛中华民国，袁世凯不得不虚伪地向参政院表示“改革国体”“不合事宜”；然而又说“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2]，授意参政院盗用民意，作为帝制自为的遮羞布和谋叛民国的盾牌。19日，梁士诒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发动请愿，制造民意。段芝贵等亦联合各军警头目向袁劝进。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袁世凯强奸民意，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投票一致赞成帝制，并推戴其为“中华帝国皇帝”。12月11日，参政院以国民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请求袁称帝。袁世凯为免人讥评，名正言顺地君临天下，当日下达申令，故作谦让，说他从政30年无所“建树”，未有功业“足以称述”；清末曾居要政，“今若骤跻大位”，“于道德不能无惭”；民国初年曾向参议院宣誓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于信义无可自解”，请另行推戴[3]。下午参政院二上推戴书，为袁世凯歌功颂德，称其有“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六大“功烈”，

①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附录”，第2页。

②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57—258页。

③ 《政府公报·命令》，1915年12月12日。

"迈越百王";并为其洗刷了有惭清室、背弃共和的恶名,再请正位登极[①]。12日,袁世凯申令承认帝位,筹备登极。次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贺。15日,册封副总统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未接受);16日,宣布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18日,重申满、蒙、回、藏各族人民待遇条件继续有效,下令优礼旧侣耆硕故人,均勿称臣;20日,申令以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21日,册封军政各界亲信党羽和实权派以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同时宣布从速制定宪法和召集立法院,整顿厘卡,永远革除太监和采选宫女,借以表示他的开明,以收拢失散的人心。预定1916年元旦登极。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举起护国大旗,宣布云南独立,通电讨伐袁世凯破坏共和,背叛民国。袁不思悔改,谋求帝位愈急,于12月31日申令改元,以翌年为"洪宪元年"。1916年元旦,将总统府改称新华宫,对内称"中华帝国",改用"洪宪"纪元,接受百官朝贺,擅自称帝。1月5日,派曹锟统兵从四川和湖南进剿云南护国军。其后又命龙觐光从广东经广西进攻云南。云南护国军进军四川、湘西,屡败袁军。1月27日,贵州独立。革命党人也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再加争取日本的失败和其他列强提出警告,袁世凯被迫于2月23日宣布:帝制活动从缓办理,早正大位文电不许呈递;并通知各国公使,云南事未平以前决不登极。3月15日,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并消灭了龙觐光的征滇军。冯国璋此时也联合各省将军请速取消帝制。袁世凯知称帝无望,3月20日、21日召集高级官员开会讨论帝制问题,

① 《政府公报·命令》,1915年12月13日。

22日发表撤销承认帝制令，发还推戴书，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23日，申令废止洪宪年号，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他仅仅当了83天闭门天子，即被全国人民赶下了台。

袁世凯撤销帝制后仍自居总统，妄想继续统治全国。3月25日，他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的名义，致电陆荣廷、梁启超、唐继尧、蔡锷，提出议和。南方表示赞成，四川前线达成停战一周的协议。但袁世凯对议和毫无诚意，时刻准备着消灭护国军。人民为了彻底打倒袁世凯，更大规模地举行起义，广东、浙江相继独立，湖南、江苏、安徽、江西、奉天等地反袁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农民、工人和商人也采取各种形式投入到反对袁世凯斗争的行列。

袁世凯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继续进行垂死挣扎。4月21日，他宣布实行责任内阁制，公布《政府组织令》，规定国务员辅弼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卿总理国务。5月8日，改政事堂为国务院，幻想以此骗取人民信任。他还派阮忠枢到南方讽劝冯国璋带头，联合未独立各省通电拥袁，向护国军示威，并指使内务总长王揖唐公开为其地位问题进行辩护。但袁世凯枉费心机，全国讨袁斗争更加高涨。5月1日两广都司令部成立，誓师北伐，向湖南、福建进军。8月，滇、黔、桂、粤4省在肇庆成立军务院，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等为抚军，发表宣言，拥黎元洪为总统，军务院负责指挥全国军政，筹办善后。继之，陕西独立，中华革命军在山东迭获胜利。迫于全国讨袁斗争的大势，袁世凯的心腹、四川将军陈宧于5月22日宣布四川独立，并特别声明与袁断绝个人关系。袁世凯本拟筹措军费，作困兽之斗，于5月29日公布《帝制始末案》，一面推卸罪责，一面威胁反对者。

不料同一天，他的另一心腹湖南将军汤芗铭亦被迫宣布了湖南独立。袁世凯见帝制失败，众叛亲离，羞愤交加，原患肾结石立即转为尿毒病，经抢救无效，于1916年6月6日上午10时病死。



第三十一章　蔡　　锷

第一节　东渡日本习军事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邵阳东乡蒋河桥（今邵阳市郊区蒋河桥乡）一个贫苦的农家。父蔡正陵，以种田为生，兼做裁缝；母王氏，辅助劳动，勤俭持家。蔡锷10岁时便读完了四书五经。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蔡锷未满13岁，由父亲领着去宝庆府城（今邵阳市）参加院试。主考官是学政江标，很赏识他的智慧和文章，将其补为县学生员（秀才）。同年秋，他返回邵阳，从同邑名子樊锥游，被免费收为弟子。在樊锥指导下，他熟读先秦诸子之书，尤好读《韩非子》、《老子》；同时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关心时局，学业大进。

这时，中国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以变法图强为主旨的维新运动在全国兴起。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湖南时务学堂成立，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唐才常为分教习。在新任学政徐仁铸的举荐下，蔡锷至长沙投考时务学堂，名列第三。其时他还不满15岁，是头班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而“在堂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

皆敬慕之"[①]。梁启超在学堂大力鼓吹平等、民权学说，他深受影响。曾著文指斥孔子伸君权"流弊无穷"，主张在中国"益之以西人之法"，学习西方的"议院之制"[②]。又在《湘报》上发表《〈后汉书·党锢传〉书后》、《秦始皇功罪论》等文，揭露历代独夫民贼以及训诂、帖括的"剥民"，造成今日的"无面无祸，无地不祸，无日不祸，其剥愈甚，其受祸更不可拯"[③]；认为秦始皇的罪过，在"不智民而愚民而已"[④]。梁启超对他十分赏识，师生自此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1898 年 8 月)，湖南地方当局选拔学生出洋留学，应试者 5000 人，蔡锷以第二名入选。不料八月，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维新运动失败，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学生星散，留学事遂成泡影。稍后，蔡锷与同学唐才质、范源濂至武昌，拟入两湖书院求学，亦以原为时务学堂学生而遭拒绝。于是三人东走上海，次年夏考入南洋公学。时值暑假，他们在南洋公学寄居月余，忽接梁启超自日本来信相招，又得到唐才常的资助，于是东渡日本，留学东京大同高等学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各省蓬勃发展，八国联军大举侵华，攻占天津、北京。在南方，唐才常成立自立会，组建自立军，计划以武汉为中心，在湖

① 唐才质:《追忆蔡松坡先生》，湖南《文史资料》第 1 辑，1961 年 10 月版。

② 《时务学堂札记》(1898 年春)，毛注青、李鳌、陈新宪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以下引用蔡锷著作，凡引自该集者，均只注篇名。

③ 《〈后汉书·党锢传〉书后》(1898 年 7 月)。

④ 《秦始皇功罪论》(1898 年 9 月)。

北、安徽、湖南等省发动起义。蔡锷参加了自立会,并在起义前夕回国。唐才常以其年轻,派他回湖南捎信予黄忠浩,促响应。策应未果,起义失败,唐才常等被捕遇害。他幸免于难,重返日本。

为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蔡锷于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决心改习军事。自此他改名锷。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以自费进了陆军成城学校。次年七月毕业后,曾以候补生投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实习。十月,又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因成绩优异,不久改为官费生。

蔡锷在成城、士官学校学习期间,积极参与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黄兴、杨毓麟等创办湖南编译社,发刊《游学译编》杂志,他积极协助工作。曾撰《致湖南士绅书》,详细叙述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由弱变强的过程,指出日本强盛的原因"不过纯用西法,而判断决定,勉强蹈厉,稽合国情已耳"。希望湖南当权的士绅们向日本学习,实行改革,对编译社事"提倡赞成,集成巨款",并认为,"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同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他曾入社襄理笔政,并以奋翮生的笔名在该报发表长篇政论文章《军国民篇》。文章写道:中国"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奋翮生曰: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又说:人有灵魂,国有国魂,"苟丧厥魂,即陷灭亡"。"故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如日本之武士道。而中国的国魂是什么呢?他闪烁其词:"欲于四千年汉族历史中,搜索一吾种绝无仅有之特色,以认为吾族国魂,盖杳乎其不可得矣。……然而吾脑质中,有一国魂在。"显然,他指的就是军国民主义。次年,拒俄运

动兴起，他参加了拒俄义勇队，稍后该组织即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1903年11月)，蔡锷毕业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在100多名毕业生中，他的成绩名列第三。同时毕业者尚有蒋方震、张孝准，均名列前茅，为人瞩目，时有“中国士官三杰”之称①。

第二节 在湘桂训练新军

光绪三十年(1904)初，蔡锷以日本士官学校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由日本返国。这时他刚到弱冠之年，英气勃发，东南各省督抚争相延聘。七月，江西巡抚夏时聘他为江西续备左军随营学堂监督，不久改任材官学堂总教习及监督。十一月，他辞职返湘。次年一月，他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就任湖南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1905年8月)，蔡锷在广西巡抚李经羲的再三敦请下，前往广西桂林，就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并兼随营学堂总理官。八月，又受委为巡抚部院总参谋官。九月，兼任广西测绘学堂堂长。他乘机邀请革命党人谭人凤等入广西活动，共谈国事；又延请他的老师樊锥入幕，恭执弟子之礼。时同盟会已在日本东京成立，黄兴化名张守正来广西活动，蔡锷与之共商革命方略，并曾挂名同盟会。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1906年9月)，清廷在河南彰德举行新

---

① 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5页。

军秋操，蔡锷奉令前往观操，被选为中央评判官。秋练结束后，他赴北京考察军事，不久返回广西。三十三年正月，广西创办陆军小学堂，他受委兼任陆军小学堂总办；二月，又兼广西兵备处总办。三十四年三月，他被任命为广西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自桂林移驻南宁。宣统元年正月（1909年2月），他奉命前往龙州，任讲武堂总办，旋改任监督，将讲武堂迁于南宁。二年夏，复迁往桂林。不久，他擢升为广西新军混成协协统，兼学兵营营长、督练公所三处（参谋、兵备、教练）及干部学堂总办。

蔡锷在广西，历时6年，身兼数职，为在广西训练新军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他提出，"广西练兵主旨：一、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以此为最高目的；二、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全国一致；三、广西必须为把握全国之枢纽，为完成此事，要密切团结内部"①。练兵的爱国、民主色彩是很明显的。而另一方面，为着扎稳脚跟，团结内部，他处世行事，力求稳健、冷静，避免轻举妄动。广西同盟会支部负责人耿毅、何遂持黄兴介绍信前往联系，他也避免直接接触，还招致了一些年轻的同盟会会员的怀疑和不满。

广西新军原拟编练一镇一协。由于经费拮据，宣统二年（1910），蔡锷决定将已练成的一镇缩编为一个混成协。这样，干部学堂培养的200多名军官就难以全部安置。于是，他采取甄别的办法，考核品行，考试汉文，分别去留。结果，合格录取120余人，其中湖南籍占90余人，广西籍仅30余人。广西籍学生为此激愤不平。一些年轻的同盟会会员遂乘机宣扬蔡锷任用私人，偏

① 刘达武：《蔡松坡先生年谱》，《蔡松坡先生遗集》卷首第7页，1943年版。

祖同乡，排斥广西人。立宪派控制的广西咨议局也开会弹劾蔡锷。从而掀起了一场驱逐蔡锷出广西的风潮。蔡锷沉着应付，不加理睬。直到李经羲(时已调任云贵总督)电邀他去云南任职时，他才决计离开广西前往云南。

第三节 在云南响应武昌起义

宣统三年二月，蔡锷抵达云南省城昆明，但未立即受到任用。他在待命之暇，伏案著书，辑录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言论，加撰序言、按语，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作为对新军官兵进行"精神讲话"的材料。他将所选取的语录分为十二章，并在按语中发挥了自己一系列精到的军事见解。蔡锷编辑此书，主要是有感于当时民族危急和清军的腐败，希望能对新军的训练有所"挽回补救"。

同年六月，李经羲奏准任命蔡锷为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下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两标。时值四川保路运动狂飙骤起，全国革命形势急剧高涨。在云南，同盟会的活动亦有相当的基础，云南陆军讲武堂实际成了同盟会的活动场所，堂长李根源，教官李烈钧、方声涛、唐继尧、顾品珍、李鸿祥、罗佩金等皆为同盟会会员，且多为东京士官学校毕业生。蔡锷"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1]。

武昌起义爆发后，云南革命党人加紧活动。八月二十五日，

① 朱德:《辛亥革命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页。

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刘存厚、殷成献、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等举行第一次秘密会议，策划响应武昌起义。继后，又于二十八日和九月初一、初四、初七连续召开了第二、三、四、五次秘密会议，蔡锷参加了这四次会议。在第四次会议上，与会者歃血为盟，立下誓约云："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①] 在第五次会议上，决定初九日（10月30日）晚12时发动起义，并推蔡锷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

初九日晚8时余，昆明起义提前爆发。蔡锷随即宣布革命宗旨云："满清专制数百年，纪纲不振，政以贿成，四万万同胞如坐涂炭。现在武昌首义，四处响应，皆欲扫除专制，复我民权。我辈军人，何莫非国民一分子。与其被疑缴械，徒手待戮，何如持此利器，同起义军，革命清廷，驱逐汉奸，复我河山，兴我汉室之为愈也！"[②]起义军经过激烈战斗，于第二日中午攻占了五华山、总督署，云贵总督李经羲逃匿，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杀，起义取得了胜利。云南各地，传檄而定。

九月十一日（11月1日），起义军民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推为云南军都督。军都督府成立后，即向全省声明：起义"宗旨在铲除专制政体，建设良善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护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③]。同时发布《讨满檄文》，重申同盟会的纲领。为革新政治，蔡锷设置了军都督府政务会议，订于每星期三照例举行，由省直机关、省议

---

①② 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 孙璞：《云南光复军政府成立记》，《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6页。

会、参议处各派代表参加，讨论本省重大兴革事项。讨论决定后，由都督下令各单位限期办理。他还通知各单位，根据自身的力量和应办事务的轻重缓急，编制滇省五年政治大纲和办事程限表。这样，使"前清官吏敷衍因循之习，廓除殆尽"①。

为了革新政治，蔡锷还采取果断的措施，"更换重要各地方行政官"②。各部、司、局主要负责人，基本上都由同盟会会员和拥护革命的人士担任，撤换了一批腐败的旧官吏。军队中也起用一批年轻军官，以代替不称职的旧军官。大力整理财政，节约开支。整顿厘税，剔除陋规。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又两次带头裁减薪金。结果，都督蔡锷的薪俸，由原来的600两减为60两，与一个副都督(营长)的薪俸相等。"此时都督俸金之彀，举国未有如云南者也"③。不仅如此，他还将"公费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不欲使家有赢余，贫民贫国"④。在他的倡导下，云南上下克己奉公，"廉洁成为一时风尚"⑤。

云南重九起义胜利后，武汉战事仍然十分紧张。九月十四日(11月4日)，贵州宣布独立，但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十月上旬，四川重庆、广安、万县、泸州先后独立，而省会成都仍然控制在清廷手中，社会秩序混乱。西邻的西藏地区，则有英印政府支持达赖喇嘛发动叛乱，围攻拉萨等地，进扰西康藏区。在这种形势下，

---

① 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49页。

② 蔡锷:《滇省光复始末记》,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9页。

③ 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51页。

④ 《劝捐军资文》(1912年2月)。

⑤ 转见李希泌:《如兹美风义,天下知重师——回忆朱委员长和先父李根源的交往》,《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蔡锷于大力整顿云南内政的同时，又先后派遣军队援川、援黔、援藏。九月下旬，援川军组成，向四川进发。接着组织云南北伐军，原拟取道四川赴鄂，后应邀途经贵阳以援黔。1912 年夏，又派遣滇军入藏。这些军事行动，对于支持武昌革命政权，发展全国革命形势，以及抗御英人侵略，镇压西藏叛乱，均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四节　对袁政权的幻想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逐步窃取了国家政权。在这个过程中，蔡锷对袁世凯的认识和态度经历了曲折的变化，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走过了一段弯路。

"南北议和"是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南北议和中，蔡锷对袁世凯是有所警惕并反对议和的。1912 年 1 月 20 日，他致电孙中山、黄兴及各省都督说："我军乘此朝气，何敌不克？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太久，糜饷劳师。试问彼于停战期内，西侵秦、晋，南攻颍、亳，朱家宝又已纵兵寿州，我再株守议和，大局必为所误。伏乞大总统赫然震怒，长驱北指，直捣虏廷。"1 月 26 日，又致电孙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说："现民国中央政府已成立，大总统已举定，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此其一。国民会议，袁世凯欲于北京开议，又欲各省州县皆举代表，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战备，懈我军心。此其二。主张共和，殆全国一致，所反对者惟少数之满清奴隶耳。设开会议而坠袁之狡谋，定为君主国体，则各省必不肯承认，战祸终无已时。此其三。中国此时仍拥戴满清为君主，固理

所必无，即别以汉人为君主，亦事势所不容。故君主国体为中国今日所万不能行，必强留存此物，将来仍难免第二、三次之革命。此其四。唐使(绍仪)签订之约，而袁不承认，方在停战期内，而北军袭取颍州，进攻陕州，在清廷亦并未决心和议。此其五。故此时直无和议可言，惟有诉诸兵力耳。至作战计划，孙、陈各都督所见甚伟，滇处僻远，未便遥度，惟有简率精兵，结联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①] 反对妥协议和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对南北议和后形势的预计也大体是正确的。

但是，当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蔡锷却转而拥戴起袁世凯来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袁世凯业已由临时参议院合法地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另一方面，也是同他渴望国家统一富强和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分不开的。1912 年 4 月 11 日，他致电北京全国联合进行会及上海各报馆说："我国政体确定共和，惟幅员辽阔，统一匪易。此时有能挈五族为一家者，敝省无不服从，以期民国早日成立。……及袁公受职，敝省复肃电奉贺，非徒表欣戴袁公之意，实亦喜统一国家之成也。"4 月 26 日，他又发出通电称："总统就职，宣布共和，薄海欢欣，喁喁望治。乃匝月以来，内则遍地皆伏危机，外则列强尚未承认。究其原因，皆由全国省自为谋，未能统一之故。"又说："吾国势分力薄，积弱已久，全国士大夫皆思建造一强固有力之国家，以骤跻诸强之列。然政权不能统一，则国家永无巩固之期。在大总统维持全局，或不欲骤与纷更；然大权所在，不能不收集

① 《致孙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电》(1912 年 1 月 26 日)。

中央，以图指臂相联之效。”① 渴望国家统一、强盛，这表明了蔡锷一贯的爱国思想；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身上，则不仅仅是一种幻想，而且恰恰迎合了袁世凯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

其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曾企图借南京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来限制袁世凯，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并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袁世凯却坚持要建都北京，并且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如具文。在这场斗争中，蔡锷是支持袁世凯的。1912 年 3 月 6 日，他致电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及各省都督说：若建都南京，“北边形势当为之变迁，恐遗孽有乘虚窃踞之虞，而强邻启蹈隙侵陵之渐，黄河以北沦入毡裘，甚非国民之利。尚望早定大计，建都燕京，可以控御中外，统一南北，大局幸甚”。

民国成立后，各政党社团林立丛生。蔡锷从国家统一出发，曾参加统一共和党，并被推为总干事。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条件下，他认为国权为民权的保障，主张加强国权。他说：“本党主义，务以国家为前提。……天赋人权之说，只能有效于强国之人民，吾侪焉得而享受之？”强调“国权为拥护人权之保障，……苟国家能跻于强盛之林，得与各大国齐驱并驾，虽牺牲一部之利益，忍受暂时之苦痛，亦所非恤”②。这种偏重国权、轻视民权的观点，在当时显然有利于业已篡夺政权的袁世凯。

正因为这样，当宋教仁酝酿把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合并改组为国民党时，蔡锷首倡

① 《致袁世凯黎元洪黄兴及国务院电》(1912 年 4 月 26 日)。
② 《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会上的演讲》(1912 年 5 月上旬)。

军人不党主义，进而倡议解散各党，并声明脱离统一共和党。1912年6月28日，他发出通电说："现在政党林立，意见纷歧，水火争持，党同伐异，或徇个人之攻击而忘国家，政党之利未收而害已毕见。鄙意先将现时组织之各党自行解散，另结合政见相同之健全分子，以先立雏形，而不必急求党务之扩张，以至于破碎冲突。"8月12日，他又一次通电说：现时政府兀臬，国本动摇，"实因政党为之厉阶。……锷初不察，亦尝预闻党事。今默察时局，熟审国情，窃谓此时以讨论为重，而不必强于主张；以培养为先，而无庸急于号召，较为得之。若广召党员，坚持党见，究之利也而不胜其敝，有也而反不如无。今海内大党，无出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数者。锷妄不自揣，愿与各党诸君子首倡解散之议，以齐民志，而定危局。前锷为同人敦迫，勉厕党籍，今谨宣告脱党，诚不敢隐忍瞻徇，致贻国家之祸"。矛头显然是指向同盟会、国民党的。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4月，又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举行"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孙中山和一部分国民党人决定武装讨袁。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7月15日，黄兴在南京组织江苏讨袁军。接着，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纷纷宣布独立。蔡锷对反袁的"二次革命"是持反对态度的。7月17日，他向袁世凯、黎元洪及北京政府发出"急电"说："昨准参部寒、删两电，知赣事已决裂。积年痈毒，趁此一决，未始非福。……惟恳分饬皖、宁严防分窜，一面添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8月，熊克武在四川重庆宣布独立，他遵照袁世凯的指令，派兵入川会剿；只是由于"二次革命"很快失

败，他的部队才没有与反袁军直接冲突。事后，他还对国民党横加指责，说什么“暴烈派以破坏为事，苟可以达其目的，即牺牲全国而不恤。然其进锐，则其退速。今已一落千丈矣，其剿绝易易也”[①]。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将在西南地区拥有重兵的蔡锷调往北京。蔡锷离滇前，在滇军营以上军官会上发表讲话说：“现任总统袁世凯原是我们的政敌，戊戌那年，由于他临时告密，我们的师友有的死，有的逃，现在想起来犹有余痛。但衡量中国现在的情势，又非他不能维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帮助袁世凯渡过这一难关。”[②]10 月 4 日，他到达北京，受委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11 月，任政治会议议员。次年 5 月，任参政院参政。6 月，加昭威将军名号。7 月，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12 月，又被任命为全国经界局督办。他尽力职守，颇思有所作为。他特别热心于改革军事教育，曾邀集留日士官同学蒋方震、阎锡山、张绍曾等 11 人组织军事研究会，研讨战略战术。又修订了早年在广西起草的《军事计划》一书，贡献给袁世凯，作为国防计划的纲要。在该书中他提出：立宪制度和义务兵役制，是新国家赖以行进的“两轮”或“两翼”，“而二者之间，尤有至深至密之关系”。由此，他把军事改革与政治改革联系在一起，主张给农民以“土地所有权”，使其能“自由之劳动”；给市民以“自治权”；同时教育贵族爱国家，破除特典、特权。他兼任全国经界局督办后，对经界局事务也作了详细的规划，并在短期内主持完成

① 《在云南进步党支部欢送会上的演讲》(1913 年 10 月初)。

② 李文汉：《关于蔡锷的几点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10 辑，1979 年版。

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和《各国经界纪要》两书。但是,他把富国强兵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则只能被严酷的现实所粉碎。

第五节　发动反袁的护国战争

蔡锷在北京任职期间,正是袁世凯对内实行独裁、复辟帝制,对外大举卖国、换取帝国主义支持的时期。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次年1月10日,解散国会;5月1日,废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随后又陆续恢复前清官制,"民国"成了块空招牌。1915年1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竟于5月9日宣布承认;8月14日,更指使杨度、孙毓筠等组织所谓"筹一国之治安"的"筹安会",公然鼓吹"君主实较民主为优";9月19日,又有梁士诒等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要求"变更国体"。一场复辟帝制的丑剧从此紧锣密鼓开台。

面对着国家危于累卵、群魔乱舞的紧迫局面,沉着、机智的蔡锷,冷眼旁观,积极思考。对外来侵略,他毫不含糊,坚决主张抵抗。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他在参政院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说,激昂慷慨,要求拒绝"二十一条",下定最后作战决心,并制订了对日作战计划[①]。对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他一方面认识到"此事关于国家前途甚巨,……颇属危险"[②];一方面则表面不动声色,暗中筹划对策,伺机行动。

"筹安会"发表成立宣言后第二天,蔡锷就乘晚班车去天津,

---

① 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云南嵩明县教育局1943年石印。

② 《致刘显世电》(1915年8月20日)。

会见梁启超，彻夜筹划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此后，他一方面与梁启超保持密切联系，一方面与云贵军政人员密电往来，互通声气，嘱令他们“稳静”、“慎重”从事，“加意布署镇慑”①，并促戴戡赴京共同策划。他还密派专使分赴广西、湖南、广东进行联络，与在美国的黄兴也取得了联系。而在公开场合，蔡锷则把自己装扮成帝制运动的拥护者和胸无大志的浪荡公子。8月25日，袁氏爪牙执赞成帝制题名录前来统率办事处试探，他即带头签名表示拥护②。与此同时，他常涉足京中八大胡同妓院，与名妓筱凤仙结萍水姻缘，佯装寄情声色，由此引起夫妻不和，打闹不休。他乘机将母亲、夫人和孩子送回湖南。

蔡母及蔡夫人离京后，袁世凯密派便衣特务闯入蔡锷住宅，翻箱倒柜，检查信件电报，无所获。蔡锷严词抗议。袁故作姿态，饬军警捕拿“盗犯”，并从监狱中提出几名罪犯加以处决，以资掩饰。至此，蔡锷决计秘密逃出北京。

蔡锷逃出北京，转赴云南，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以患病为借口达到逐步脱身的目的。1915年10月下旬，他呈文袁世凯说：“锷于本月初忽患喉痛，因连日从公，未甚留意，迁延日久，病势加剧。近则红肿异常，言语失调，饮食亦为之锐减。迭经医治，未见痊可。现就西医诊视，据云肺胃积热，兼有外感，亟宜避风少言，医药始能收效等语。拟自本月二十九日起，请假五日，以资静摄。”袁批示：“准予给假五日。”③ 11月中旬，他再次呈文袁世

---

① 见1915年8月下旬致唐继尧、刘显世、黄永社等各电。

② 《关于帝制问题的签名》(1915年8月25日)，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813页。

③ 《政府公报》1915年11月2日。

凯,以"病体未痊"为由,"拟请续假一星期,赴津就医"。袁批示"准予续假七日,俾资调理。"① 他到天津后,与梁启超作了进一步的筹划。11 月 22 日,又向袁世凯呈文,说"假期已满,病仍未愈",请"准予续假三月,俾得迁地疗养。并请派员代理,免旷职务"。袁批示:"着给假两月。"② 11 月末,他第四次呈文袁世凯,说自己"病根久伏,殊非旦夕所能就痊。而北地严寒,亦非孱弱之躯所能耐,一交冬令,病势益加。惟有移住气候温暖地方,从容调养,庶医药可望奏功"。明确要求"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病体早痊"。袁批示:"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归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③ 于是 12 月 2 日,他便在戴戡陪同下,乘日商山东丸东渡日本。离津前,他与梁启超诀别说:"失败就战死,绝对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对不争地盘。"④

蔡锷抵达日本后,在黄兴所派张孝准、石陶钧等的接应下,秘密前往神户,然后迅速换乘另一艘日轮,经吴淞口南下香港,复取道河内直奔云南。与此同时,他请石陶钧带着自己的行李去别府箱根,作就医状;并准备了多封亲笔信,让石间日寄一封信给北京袁的亲信唐在礼等人,逐日报告游历状况和养病情形,以掩饰行踪。不久,袁世凯获悉蔡锷潜赴云南,大吃一惊,立即电令蒙自关道周沆和阿迷县长张一鲲,伺机狙击或捕杀。但在唐继尧之弟、警卫团长唐继虞的迎接和护送下,袁的阴谋未能得逞。

1915 年 12 月 19 日,蔡锷历尽艰险,安全抵达云南昆明。时

① 《政府公报》1915 年 11 月 21 日。
② 《政府公报》1915 年 11 月 27 日。
③ 《政府公报》1915 年 12 月 3 日。
④ 《与梁启超的谈话》(1915 年 11 月)。

滇军反袁情绪十分热烈，中下级军官已开过三次秘密会议，酝酿武装讨袁。原国民党骨干分子李烈钧、程潜、熊克武等亦先后来滇，共同策划反袁战争。12月21、22日，在蔡锷、唐继尧的主持下，又联合召开了第四、五次会议，决定立即发动反袁护国战争。12月23日，便以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名义，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惩办帝制祸首，限25日上午10时答复[①]。同日，蔡锷与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李烈钧、戴戡联名将前电通告各省。次日，他又与戴戡联名致电袁世凯，"为最后之忠告"，要求袁"于滇将军、巡按所陈各节，迅予照准，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发明令，永废帝制。……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②] 但是，袁世凯不听"忠告"，到期拒不作答。于是，12月25日，正式宣布云南独立，武装讨袁，护国战争爆发。

第六节　亲赴前线指挥作战

云南独立后，迅即组织了讨袁护国军和护国军云南都督府，蔡锷任护国第一军总司令，唐继尧为云南都督。稍后，又组织护国第二军、第三军，分别以李烈钧、唐继尧(兼)为总司令；另组挺进军，以黄毓成为司令。计划第一军出蜀，第二军入桂，第三军留守，挺进军相机行动。1916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誓师，蔡锷会同唐继尧、李烈钧发布誓词："以告国人，并自申警：一、同人职

① 《护国运动期间唐继尧等文电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
② 《致袁世凯电》(1915年12月24日)，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851页。

责，惟在讨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利思想，悉予铲除。一、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材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与地域观念，自启分裂。一、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消融，绝无偏倚。一、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已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种种族界限。"①

蔡锷第一军下辖四个梯团，每梯团各辖两支队，总兵力约7000人。时袁世凯调到四川的北洋军，有曹锟第三师、张敬尧第七师、李长泰第八师，加上四川将军陈宧所率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3个旅，总数不下3万人。但护国军士气高昂。面对强敌，蔡锷沉着指挥，周密规划：遣第一梯团长刘云峰率邓泰中、杨蓁两支队为先遣队，出昭通，取叙府(今宜宾)，为左翼；派第二、三梯团长赵又新、顾品珍分率董鸿勋、何海清、禄国藩、朱德四支队，经永宁，进泸州，为中路主力；而以第四梯团长戴戡率熊其勋支队，并由殷承献率华封歌支队协助，取道贵州松坎，攻綦江，进规重庆，为右翼。

1915年12月27日，刘云峰所部先遣队出昭通向川边移动。1916年1月14日，蔡锷亲率赵又新、顾品珍两梯团从昆明出发。1月21日，先遣队攻占叙府，川、黔动摇。1月27日，贵州宣布反袁独立。2月2日，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在纳溪宣布独立，响应护国。随后，蔡锷督中路护国军与刘存厚师会攻泸州，同时加强右翼戴戡等部对綦江方向的攻势。2月，护国军与敌军在

① 《告全国同胞书》(1916年1月)。

纳溪、棉花坡一带展开激战。2月23日，蔡锷带病亲赴纳溪前线，直接指挥战斗。2月28日，护国军发起总反攻。战斗激烈艰险，叙府得而复失，纳溪三易其手。由于弹药不继，士卒疲累，乃于3月7日撤出纳溪，退往永宁大洲驿，“盖将休兵以图再举”①。

蔡锷退驻大洲驿后，将司令部设在永宁河中的一条大船上。部队经过一番休整，士气高涨。适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于是3月17日，蔡锷下令分三路大举反攻：中路顾品珍梯团，攻取茶塘子高地；左路何海清支队及刘存厚部，进驻和丰场、牛滚场一带；右路赵又新梯团朱德、金汉鼎两支队，由白节滩向纳溪推进，扫清长江南岸之敌。护国军连日激战，大获胜利，先后攻占江安、南溪等地，3月23日重新夺回纳溪。随后仍退回原地。经此次战役，北洋军在川精锐损伤殆尽，再也无力组织进攻，被迫与护国军停战议和，川南战事遂成胶着状态。

在护国军的沉重打击与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以“大总统”自居。蔡锷与唐继尧等立即发出通电，不仅不承认袁仍为总统，而且要求对袁进行审判。这时，全国各地反袁斗争形势继续高涨，袁党内部也日益分崩离析。4月6日，广东宣布独立。4月12日，浙江宣布独立。5月8日，南方滇、黔、桂、粤等省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国军军务院，推唐继尧为抚军长，蔡锷等为抚军。5月9日，陕西宣布独立，22、29日，四川、湖南也相继宣布独立。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声中，忧病身亡。以反袁称帝为宗旨的护国战争随之胜利

---

① 《护国岩记并铭》(1916年6月)，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1176页。

结束。

还在护国战争结束前,蔡锷的病况因军务劳顿,日形加剧。紧张的战事结束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他多次请求辞职养病,未获允准。6月24日,北京政府任命他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6月28日,他由永宁出发,经大洲驿、纳溪,于7月1日到达泸州。7月6日,北京政府复任命他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这时,他的喉病"经德医施治后,肿痛更剧,声音全失,精神萎顿,饮食骤减"。但四川军政各方"并力劝驾赴蓉,接前敌将士及各属绅民函电,亦纷纷请求速西上就任"。于是,他于7月21日离开泸州,29日到达成都。

蔡锷到达成都后,带病坚持工作,很希望有所作为。他大刀阔斧地整编在川军队,统一财政收支,并制定军队、官吏奖惩条例。但病势日重,实在无法坚持工作。于是再三电请辞职治病,并保荐罗佩金代理川督,戴戡代理省长兼会办四川军务。8月7日,获准给假两月。8月9日,即离成都东下。8月28日,到达上海。梁启超"会着他,几乎连面目也认识不清楚,喉咙哑到一点声音也没有,医生看着这病是不能救了"①。尽管如此,他还为梁启超的《盾鼻集》作序。然后东渡日本,入九州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离沪时,黄兴特为送行。不意10月31日,黄兴竟病逝于上海。他闻耗悲痛欲绝,于病榻作挽联一副云:"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②

① 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

② 《哭黄克强》(1916年11月初)。

1916年11月8日凌晨，蔡锷病情严重恶化，自知不起，口授随员，遗电四事："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同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督军、戴省长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劝；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① 延至上午四时，不幸逝世。

蔡锷的逝世，引起了举国上下的悲痛。孙中山特撰挽联云："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②

① 《致国会和黎元洪电》(1916年11月8日)。

② 《蔡松坡先生荣哀录》，联语第1页，民国石印。

第三十二章　程长庚　谭鑫培

第一节　程　长　庚

程长庚，谱名闻檄，字玉珊，也作玉山，堂号“四箴”，安徽省潜山县河镇乡程家井人，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初七日（1811 年 11 月 22 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幼年进徽调科班学戏，习老生兼净，对其他行当也很留心。由于他勤学苦练，加上悟性较高，进步很快。出科后在戏班中搭班演唱，在当地有了一点小名气。道光年间，程长庚到北京搭班演唱，其后入三庆班。当时，北京的舞台上，昆曲和京腔已经衰微，徽班称盛。其中以三庆和四喜、春台、和春名声最大，被称为“四大徽班”。徽班演员的唱腔重二黄调，在北京流传过程中，不断地吸收秦腔、京腔、昆曲等剧种的特长。嗣又因湖北汉戏演员搭入徽班，他们擅长西皮调，使与二黄调进一步交融，为北京皮黄剧（即后来称为京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程长庚就是以他卓越的艺术成就被誉为“京剧开基创业的大师”。

程长庚的蜚声剧坛，是和他执着于戏剧艺术和勤学苦练分不开的。相传，他初到京演出，第一场打炮戏就唱砸了，观众喝了倒彩，这无疑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他并没有因而气馁，

而是更加发奋，经人介绍，入保定著名的昆曲科班和盛成再次坐科。在三年的科班学习中，程长庚一丝不苟，从唱、念、表演到发音吐字，都认真对待，刻苦练习。他嗓音宏亮，音调高，但唱来发飘，不够厚重坚实。为此他用心钻研，孜孜不倦地苦练，虚心向人请教，终于练成了独具一格的“脑后音”的唱法，艺技精进。回京城演出后，一日，应某权贵堂会，在座者皆达官贵人，程长庚演《文昭关》，饰伍子胥，“冠剑雄豪，音节慷慨，奇侠之气，亢爽之容，动人肝膈，座客数百皆大惊起立”①，由此誉满京城。道光末年，他已是三庆班的班主和首席老生。咸丰年间，程长庚带三庆班进宫为咸丰帝演出，受到称赞，被赏五品顶戴，任内廷供奉，领戏曲艺人团体“精忠庙”会首，总管三庆、春台、四喜三大徽班。

艺术的发展需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程长庚融合徽调和汉调，并吸收昆曲、京腔、秦腔等剧种的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经过自己的创造，形成了一种体系。不论皮黄、昆曲、文戏、武戏，他都能演，剧目丰富，戏路很宽。老生本工戏以外，还演武生戏、小生戏、花脸戏等。即如老生靠把戏，五种颜色靠把戏的角色，他都能演，红靠戏能演《战太平》的花云，黄靠戏能演《风云会》的赵匡胤，绿靠戏能演《战长沙》的关羽，白靠戏能演《镇潭州》的岳飞，黑靠戏能演《白良关》的尉迟敬德。

作为表演艺术家，程长庚很重视塑造人物形象，对角色的性格、身份体察入微。他对唱、做、念、打“四功”和手、眼、身、法、步“五法”并重，善于运用这些表演技术来表现人物，一举手，一投足，都注意符合所扮角色的性格，不仅形似，而且能传神。所以

---

① 朱书绅编：《同光朝名伶十三绝传略·程长庚传》；陈澹然：《异伶传》。

"一经登场,不啻现身说法","为大臣则风度端凝,为正士则气象严肃,为隐者则其貌逸,为员外则其神恬","能令观者如对古人,油然起敬慕之心"[1]。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杰作是《文昭关》的伍子胥、《战长沙》的关羽、《群英会》的鲁肃。

程长庚精于唱工,注意吸收昆剧的吐字发音,讲求字正腔圆,不以花哨取巧。他的嗓音叫"脑后音",初唱时似乎有些吃力,带有涩味,渐渐平坦甘润,抑扬吞吐,高低宽窄,一任其意。唱腔"于高亢之中,别具沉雄之致",跟有的演员徒以调高声宏取胜,而欠缺韵味回音的唱腔迥然不同。当时有人把他的唱腔与唐代诗人杜甫的诗风相比,形容为"天风海涛,金钟大镛"[2]。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程长庚在唱腔上不单是唱声,更重要的是在于唱情,以声传情,声情交融。他生活在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的时代,亲身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种种侵略活动,忧时感世,"愤欲绝"[3],表现出一个爱国者的民族义愤。他的唱腔也因之更加高亢雄壮,慷慨愤激,能够使"闻者泣下"。程长庚在这方面的造诣,是京剧界一致称道的。

程长庚能演的戏很多,除了演《战樊城》、《长亭会》、《文昭关》、《鱼藏剑》、《镇潭州》、《捉放曹》、《击鼓骂曹》、《群英会》、《华容道》、《战长沙》等经常叫座、历久不衰的戏外,且注意上演新编的连台本戏。他主持的三庆班里有一位老生演员叫卢胜奎,擅长编写剧本,全本三国戏自《马跳檀溪》至《取南郡》共 40 出,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在《群英会》中,程长庚饰关羽和鲁肃(有"活鲁

---

① 陈彦衡:《旧剧丛谈》。
② 吴焘:《梨园旧话》。
③ 陈澹然:《异伶传》。

肃"之称),小生徐小香饰周瑜(有"活公瑾"之称),卢胜奎饰诸葛亮(有"活孔明"之称),花脸黄润甫饰曹操(有"活曹操"之称),武生杨月楼饰赵云(有"活赵云"之称),其他角色也无不配搭匀称,氍毹之上,俨然三国人物斗奇争胜。清人沈蓉圃的"同光十三绝"画像中,列入的即有程长庚、徐小香、卢胜奎、杨月楼4人。

京剧在形成时期,著名的老生演员除程长庚外,还有余三胜和张二奎。这三位演员在唱腔和表演艺术上各具特色,各有独到之处,形成了老生三种流派。程长庚高亢沉雄,肃穆凝重,唱、念多徽音,被称为徽派。余三胜圆润流利,苍凉悲壮,以汉调西皮为特长,唱、念为湖广音,被称为汉派(或余派)。张二奎实大声宏,雍容华贵,唱、念运用北京字音,被称为京派(或奎派)。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由于他们的艺术成就,时人称之为老生"三杰",又称"三鼎甲"。

程长庚声誉既高,演戏依然极为认真,不马虎敷衍。他对别的演员也严格要求,演出时如有失误,退场后随即指出,当面规劝。但其为人宽厚,从不当场奚落讪笑,使人难堪,故被赞誉为有戏德。他虽享有盛誉,却不拿架子、不争角色,配角也演。花脸何桂山演《白良关》,饰尉迟敬德,程长庚给配"小黑"尉迟宝林。小生徐小香演《监酒令》饰刘章,他给配陈平。他认为演剧以戏为重,主角和配角都是演戏,好比红花绿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对于三庆班,程长庚管理井井有条。他要求纪律严明,不容班里的人有所违犯,而自己也以身作则。如规定不许演员单独应"外串"[1],他就严格遵守,曾说:"我若应外串之召,自谋诚为得

① 外串,即本班演员另在他班应活演出。

计,其如本班众人何?"[1] 每次演出,程长庚都提早来到戏园,亲自安排演出的各项事务,做到后台没人随便谈笑喧哗,前台除执事人外,无一人搴帘外出,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此外,他还革除梨园界的一些陋习,如废除戏开演前演员在台上"站台"[2]。班里的人对程长庚都很敬重,他也很爱护戏班和同人。凡同人生活上有困难,他总是慷慨相助。按封建皇朝制度,凡帝、后死,称"国丧"。在"国丧"期间,城内戏园禁止演出,只准在外城茶馆、饭庄清唱。同治帝死时,程长庚为了维持同人的生活,每日带领全班到外城清唱,所得收入归全班使用,从不多取分文。晚年,程长庚衣食丰足,但仍不时登台演出,友人劝阻,他感叹地说:"某自入主三庆部以来,于兹数年,支持至今日,亦非易易。某一旦辍演,全班必散,殊觉可惜!且同人依某为生活者,正不乏人。三庆一散,此辈谋食艰难,某之未能决然舍去者,职此故者。"[3]

在当时人的印象里,程长庚以谨饬严正著称,一生专心戏曲事业。演戏历来被视为"贱业",但他却不以此自贱,虽权贵亦不屈。王府、贵官曾屡次传召程长庚演堂会,他一概拒绝。有一次都察院团拜,要程长庚演堂会,他因不从而被强行绑走。当他知道点的剧目是《击鼓骂曹》时,才破例应允。他饰祢衡,肉袒击鼓,气概激昂,指堂下怒骂:"方今外患未平,内忧隐伏,你们一班奸党,尚在此饮酒作乐,好不愧也!","骂罢而唱,唱罢而骂,发目皆动",使得台下达官贵人狼狈不堪。[4]

---

① 吴焘:《梨园旧话》。
② 站台:戏开演前演员在台上站立,供台下观赏,还须陪达官富豪看戏。
③ 徐珂:《清稗类钞》38。
④ 赵炳麟:《赵柏岩集·柏岩文存》卷4。

光绪五年十二月十三日(1880 年 1 月 24 日),这位为京剧奠定基础作出重大贡献的艺术家因病辞世,享年 69 岁。他生前很重视京剧人才的培育,曾创办三庆科班。杨月楼是张二奎的徒弟,程长庚对他很器重,将他吸收进三庆班,传授艺术。后杨月楼继其为三庆班主。著名老生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也都出自他门下。他们继承程长庚等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又加以创造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流派,被称为京剧老生"新三派"。

第二节　谭　鑫　培

谭鑫培,名金福,以字行,因堂号"英秀",又以英秀称之。湖北省江夏县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九日(1847 年 4 月 23 日)。父谭志道,演老旦兼老生,擅长演悲剧人物,调门高而嗓音尖,观众给他起个外号叫"叫天儿"。谭鑫培艺名"小叫天",即沿父而起。

谭鑫培从小就跟他父亲学艺。咸丰年间,他随父来到天津,后入京东金奎班习武生。他练功勤奋刻苦,白天黑夜,从不间断,练就一身好功夫。四年业满出科后,仍回天津随父卖艺。同治三年(1864),谭鑫培想在大地面露头角,到北京搭广和成班演戏。然而,他在戏班里受排挤,只能演个小配角,还要受气。谭鑫培气愤不过,于是离开广和成,到京东加入跑码头的"粥班",在遵化、蓟县、平谷一带的乡镇演出。他担任武生主要演员,有时也串演老生戏或武丑戏。谭鑫培在粥班演出期间,仍然坚持勤学苦练,毫不放松。所谓粥班,是由班主用若干担粮食做本钱,招收一些演员为他们演戏赚钱的戏班。粥班没有固定待遇,收入很少,伙

食很差,业务不好时只能喝粥,演出地点也不固定,流动性很大,经常奔波于乡镇间,生活很艰苦。但是,粥班的演出生活,使谭鑫培得到更多的舞台实践,拓宽了戏路,使艺术根基更加深厚,对后来的艺术发展有重要影响。在粥班几年后,谭鑫培又回北京,搭永胜奎班演戏。但不多久,由于成年发育变声而倒嗓,在一次演出时嗓音竟然哑得唱不出来。不得已只好离开北京城,到京东粥班演武行糊口。后来经人介绍,又到一个富商家为其看家护院。即使遭受这样大的挫折,谭鑫培也没有因而灰心丧气,仍然不断地练功、喊嗓,使嗓音逐渐恢复好转。

同治九年(1870),谭鑫培已20多岁,因父亲的关系,回京入程长庚主持的三庆班,仍演武生。如《金钱豹》的孙悟空,《神州擂》的王永,《恶虎村》的黄天霸,《黄鹤楼》的赵云,《挑滑车》的高宠等。有时也演《五人义》的周文元、《三岔口》的刘利华一类的武丑戏。沈容圃所绘《同光十三绝》中的谭鑫培,即是他饰《恶虎村》的黄天霸。这时,他的嗓音已经变得清亮,遂武生、老生相间演唱。由于他多年搭三庆班,对程长庚的艺术很专心学习,尤其是注意程的四声的运用和行腔吐字的功夫。又因为其父和老生"三杰"之一的余三胜是同乡至交,他得以拜余为师,吸收余的汉调西皮的特长,以圆润流利取胜。谭鑫培表演艺术的精进,受到了程长庚的重视。程认为他的脸庞瘦削而口大,演武生扮相不好看,不如改演武老生,挂上髯口既能掩去瑕疵,使面容改观,又可以施展武功,加上甜润柔美的嗓音,当会受到观众的欢迎。谭鑫培于是兼演武老生,如《定军山》的黄忠、《战太平》的花云、《阳平关》的赵云、《战长沙》的关羽(红生)等,都获得很好的演出效果;间也演一些文老生戏,如《伐东吴》、《状元谱》、《御碑亭》等。光绪

五年(1879),谭鑫培首次到上海演出,常演武生戏。在上海,他向老生孙春恒学艺。孙春恒一反当时盛行的程长庚等沉雄激昂的唱法,创造了清灵低柔的老生新腔。谭鑫培很受启发,就吸收了孙的唱法。翌年回京,仍在三庆班演戏。

光绪八年(1882)后,谭鑫培渐以演老生戏著名。这时他搭四喜班,与著名老生孙菊仙互唱大轴。十三年(1887),谭鑫培开始自己挑班,与花脸刘永春合组同春班。十六年(1890),被选入升平署为"民籍教习"。当时慈禧太后恣意享乐,沉溺声歌,除在专设的演戏机构升平署中,让专职演戏太监经常演出外,还不断从民间戏班中挑选一些名角入署演出。谭鑫培在宫廷中演戏,以其艺术精湛,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赐四品服。他虽被选入署,但主要的演出活动还在民间戏班。谭鑫培由于出色的表演艺术,自创新声,独成一派,人称"谭腔",与并时的四喜班的孙菊仙、春台班的汪桂芬鼎足而立,被称为"老生后三杰",或"后三鼎甲"。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戏园被焚毁。此后,孙菊仙携家移居上海,汪桂芬因遭凌辱受刺激,精神抑郁苦闷,笃信佛教,时演时辍,谭鑫培在北京京剧舞台上独享盛名。据《伶史》记述:"凡王公大臣荐绅先生每有喜庆必招谭,谭不至举座不欢也。膏粱纨袴弦歌相娱,不学谭则无以鸣高也。贩夫走卒抽暇聚谈,不知叫天则无以夸于侪辈也。青楼歌伎以喉侑觞,不摩谭不足以引宾客欢也。他如大家闺秀、学校士子,亦能私相揣拟,低声而歌。"因而有"有书皆作垿(一作'有匾皆为垿'),无腔不学谭"的谚语。王垿是晚清著名书法家。他的书法和谭鑫培的唱腔同时流行天下。当时,谭鑫培的《当锏卖马》秦琼、《李陵碑》杨继业的唱腔脍炙人口,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在京城街头巷尾时常能听到在唱"店主

东……”、“叹杨家……”。有人写诗描绘说:“家国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作者意在讽刺清朝王公贵族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仍然沉湎于声色狗马,不管家国兴亡,但也反映谭鑫培的影响之大。

谭鑫培是继程长庚之后在京剧老生行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京剧老生分为“安工”、“衰派”、“靠把”三种,“安工”以唱为主,“衰派”讲究做工,“靠把”则重武功。虽余三胜、张二奎等前辈名角也有所不工,而谭鑫培文武全才,能兼三长,打破了老生行当的界限。他能演的戏很多,常演的老生戏如《空城计》的孔明、《捉放曹》的陈宫、《击鼓骂曹》的祢衡、《洪羊洞》的杨延昭、《四郎探母》的杨延辉、《珠帘寨》的李克用、《武家坡》的薛平贵、《琼林宴》的范仲禹、《搜孤救孤》的程婴、《状元谱》的陈伯愚、《乌龙院》的宋江、《打渔杀家》的萧恩、《清风亭》的张元秀、《南天门》的曹福、《当锏卖马》的秦琼、《李陵碑》的杨继业、《定军山》的黄忠、《战太平》的花云等。谭鑫培在艺术上之所以有很高成就,是由于他能不拘一格,博采众长,又融会以自己创造的结果。他有扎实的文武功底,在老生表演艺术上集中了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王九龄、卢胜奎、孙春恒、冯瑞祥等各家之长,“同一唱工,《碰碑》则学三胜,《乌盆》则学九龄。同一做派,《状元谱》则学长庚,《桑园寄子》则学三胜。同一靠把,《定军山》则学三胜,《镇潭州》则学长庚。不特此,《天雷报》拟周长山,而身段汰其冗拙;《空城计》仿卢台子(胜奎),而声韵较为悠扬”①。他不固步自封,京剧其他行当如青衣、老旦、花脸的唱腔,以至昆曲、梆子、大鼓、单弦的某些特

① 陈彦衡:《旧剧丛谈》。

长，都加以吸收运用。谭鑫培博采众长，不是生吞活剥，七拼八凑，而是按照京剧艺术的规律加以融会贯通，经过自己的创造，成为浑然一体的艺术风格。在他之前的"老三杰"，虽然都有高度的演唱技巧，然而唱腔比较平板，旋律性不强。经过谭鑫培的广泛吸收，大胆创新，唱腔比以前复杂多变、旋律性加强。他用"云遮月"的嗓音，声调悠扬婉转，长于抒情，独拘一格，与程长庚的"脑后音"同为难能可贵。

在丰富和发展京剧剧目方面，谭鑫培也作出了贡献。他不仅继承了前辈老生演员的一些拿手好戏，还通过自己的创造，丰富和发展了京剧老生的传统剧目。如《珠帘寨》的李克用原是花脸扮演，经谭鑫培改为老生后，成为老生的传统剧目；《南阳关》、《战太平》等剧原来都是不受重视的"开场戏"，谭鑫培演唱后丰富了唱腔和表演，成为谭派的看家戏；《搜孤救孤》、《当锏卖马》的主角原分别是公孙杵臼和店家，经谭鑫培的改编，程婴、秦琼成为主角。

谭鑫培声甜腔美，技艺高超，但他不卖弄，而是仔细体会剧情，分析人物性格，从唱、做、念、打中表达出剧中人当时的思想感情，深入地刻划人物，"装谁像谁"，"演孔明有儒者气，演黄忠有老将风。《胭脂褶》之白槐居然公门老吏，《五人义》之周文元恰是市井顽民。流品迥殊，各具神似。由其平日于各色人等之举止语言无不细心体察，刻意揣摩，故其扮演登场能随时变态，移步换形"①。他的唱不仅唱声，而且唱情，用唱腔来表达人物的感情。例如《当锏卖马》中秦琼的"店主东……"、《空城计》中孔明的

① 陈彦衡：《旧剧丛谈》。

“我本是……”和《捉放曹》中陈宫的“听他言……”，三段唱都是西皮慢板，板式、腔调大致相同，由于能从人物的特定情景出发，不仅唱腔各异，而且表达了秦琼的沉郁、孔明的镇静、陈宫的愤懑等不同的思想感情。同样是四平调，在《乌龙院》里唱得纡曲缓慢，表现了宋江平静悠闲的心情；在《清风亭》里就唱得紧凑朴直，表现了张元秀忧伤抑郁的情调。谭鑫培既重唱腔，也讲究念白和做工，用细致的表情、身段动作来刻划人物性格，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如演《李陵碑》的杨继业，当看到李陵碑，念碑上四句诗时，一句比一句强烈，念到末句“卸甲又丢盔”，随着念的节奏，身子一抖铠甲卸脱，头一甩头盔抛出，把杨继业激动的情绪表现得很逼真。演《空城计》的孔明，“三报”一场，通过脸部表情、身段动作和念白，有层次地表现了身处险境的孔明的忧虑、悔恨、惊叹而又镇静的复杂矛盾心情。谭鑫培早年曾演武生，武功根底坚实，在一些戏里的独特表演技巧运用自如。如《南天门》的甩罗帽、《问樵闹府》的踢鞋、《四郎探母》的“吊毛”及《当锏卖马》的耍锏、《翠屏山》的舞刀等，都有独到的功力，内外行交口赞颂。由于他高度的艺术成就，因而驰名南北，获“伶界大王”的称号。

光绪三十一年(1905)，谭鑫培的《定军山》由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为之摄制成电影。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电影。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谭鑫培任正乐育化会会长。他虽然年事已高，仍然没有离开舞台。这年冬天，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到上海，在新新舞台演出1个月。谭鑫培晚年仍坚持练功，艺术造诣更臻于炉火纯青。但是，这样一位有卓越成就的表演艺术家，晚境却迭遭坎坷。他曾因得罪袁世凯的爪牙，竟被禁演累

月。1917年4月，北京的军阀政客为了欢宴桂系军阀陆荣廷，指名要谭鑫培为他们演戏，当时他正患病，实在不能上台，便婉言谢绝。但是，军阀们始终不准，强行逼迫他抱病演出了《洪羊洞》。谭鑫培为他们演完了这场戏，劳累加上气忿，病势日益沉重，不到1个月光景，于5月10日溘然长逝，时年71岁。

谭鑫培是一位继往开来、自成体系的京剧艺术大师。他把京剧老生艺术提高到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成为流传很广、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除子谭小培、孙谭富英、婿王又宸以谭派老生名外，继起的余派（叔岩）、言派（菊朋）、高派（庆奎）、马派（连良）、麒派（周信芳艺名麒麟童）、杨派（宝森），都与谭派有直接间接的关系。



第三十三章　数　　学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传统数学以一个小的高潮走向终结，伴随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和文化宣传而来的是西方数学的传播与普及，过程相当缓慢和艰难。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也学习西方数学，并后来居上而超过中国。自十九世纪末开始，大批中国留学生到日本、欧美学习数学，他们回国后创办大学数学系，尝试做研究。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稍具雏形，遗憾的是，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传统数学并没有融入西方数学，此后只作为历史存在和文化影响而成为数学史的研究对象。这就是说，中国现代数学基本上是另起炉灶，从西方移植过来的。

第一节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数学

西方数学的传播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数学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一方面，西方传教士借五口通商的便利，在传教的同时，扩大西方数学的传入；另一方面，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洋务派人士注意支持中国的科学事业，包括中国传统数学的发展，以及西方数学典籍的

翻译。李善兰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中国数学家。他既精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数学，又能吸收西方的一些数学观念加以糅和，代表了那一时代中国数学的最高水平。

1843 年，英国人麦都思（W. H. Medhurst，1796—1857）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印刷《圣经》等传教需用的材料。1847 年 8 月 26 日，受英国伦敦会的派遣，伟烈亚力来到上海主持墨海书馆的出版事务。伟烈亚力主持馆务之余，借他在伦敦自学的一点汉语知识，研读中国的天文数学典籍，并涉猎西方科学著作的汉译工作。他自称："余自西土远来中国，以传耶稣之道为本，余则兼习艺能。"① 他和李善兰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后 9 卷，以及第一本介绍微积分的译作《代微积拾级》分别在 1857 年和 1859 年出版，成为继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前 6 卷之后向中国传播西方数学的又一重要事件。

进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英国人傅兰雅、美国长老会牧师狄考文（C. W. Mateer，1836—1908）也参与翻译西方数学著作，影响很广。

另一方面，清政府中的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技术，特别注意对数学的支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同治帝接受恭亲王奕䜣的奏请，于 1862 年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1865 年，曾国藩、李鸿章奏准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1868 年起，在其内设翻译馆，有关代数学、三角学、概率论等一大批西方数学著作被译成中文。政府官员中也有一些人专攻数学，如江苏巡抚徐有壬，与同

---

① 王杨宗：《伟烈亚力》，载《中国古代数学家传记》（下册），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时代的数学家李善兰等多有来往,自己亦有著作多种;江西的吴嘉善曾为翰林院编修,尝与徐有壬共同研究数学;湖南天算家丁取忠曾在1860年应胡林翼之请到武昌作幕宾,晚年和他的弟子左潜(左宗棠的从子),曾纪鸿(曾国藩的次子)在长沙白芙堂研究数学。

1866年,曾国藩"邮致三百金"到南京资助李善兰出版《则古昔斋算学》24卷,这部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传统数学的最高水平。

然而,尽管有传教士和洋务派人士对数学的支持,中国数学前进的步伐仍然十分缓慢。

传统数学的终结

在腐朽的清皇朝统治下,一部分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抛弃了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研究数学排遣忧闷,另一部分则追随洋务派以研究数学而图强。同时,也因多少受到外来数学思想方法的影响,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传统数学出现了一个小的高潮,仅以函数的幂级数展开而论,从1845至1865的20年间,就有项名达、戴煦、李善兰、徐有壬、顾观光、邹伯奇、夏鸾翔等先后发表研究成果。李善兰的数学研究范围更广,在组合恒等式上的研究至今仍被国际数学界称道。

戴煦(1805—1860),浙江钱塘(杭州)人。其兄戴熙官为兵部右侍郎,但他淡于功名,绝意仕进,终生以研治数学为乐。他先与项名达为忘年交,校注古代算学著作,1845至1852年间,完成数学著作4种9卷,总名为《求表捷术》。其内容涉及对数造表方法、三角函数造表法、三角函数对数造表法。对数表的制作,若按《数

理精蕴》的办法，“布算极繁，甚至经旬累月而不能求一数”[1]。他的工作是找到二项式、对数函数、三角函数的对数函数等一系列的函数幂级数展开式，成为造表的有力工具。在微积分未传入我国的当时，戴煦的工作是相当艰难而深入的。1845年，英国教士艾约瑟(J. Edkins，1823—1905)慕名求见，戴煦以“中外殊俗异礼”托故辞之。1860年，太平军攻克杭州，戴煦随其兄戴熙自尽。

徐有壬(1800—1862)，浙江湖州人，历任云南按察司，湖南布政司，以至江苏巡抚。自幼对数学有浓厚兴趣，结交许多当时数学名家，著有《务民义斋算学》，在三角函数和反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上有些新见解，自称其为“缀术”。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时被杀。顾观光(1799—1862)，江苏金山人，以医生为业，兼通天文算学。身后汇刻有《武陵山人遗书》，在对数表制作、《周髀算经》校注上有所贡献。邹伯奇(1819—1869)，广东南海人，对几何光学颇有研究，同时在函数表制作、计算尺的使用上做过探讨。夏鸾翔(1823—1864)，浙江杭州人，与戴煦为世交。1863年游广州，与邹伯奇共研数学，主要工作为三角函数表的制作，以及圆锥曲线的综合研究。湖南的丁取忠(生卒年不详)著有《数学拾遗》，对一次同余式求解有所阐述。晚年在长沙古荷花池的白芙草堂，与左潜(？—1874)、曾纪鸿(1848—1877)治数学。他们也研究幂级数的展开，曾纪鸿用反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求得圆周率的第24位准确数字。

在晚清数学家中，李善兰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人。李善兰的主要数学成就有：尖锥术、垛积术、素数论。在西方的微积分未传入

① 戴煦：《求表捷术》。

的情况下，李善兰独自用尖锥术发现幂函数的定积分公式、二次平方根的幂级数展开式，以及各种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他所使用的求对数的方法，比传教士带进来的方法要高明、简捷。一般认为，在李善兰的尖锥术的基础上，中国传统数学完全可以走上解析几何、微积分的近代数学的道路。

李善兰集前人之大成，在垛积术上有重大突破，其内容属于今之“组合数学”。他创造了三角自乘垛和乘方垛两类新的垛积，其中的组合公式

$$\binom{n+p}{p}^2=\sum_{q=0}^{p}\binom{p}{q}\binom{n+2p-q}{2p}$$

被今人称为李善兰恒等式。晚清中国数学结果中具有一定世界意义的，恐仅此一端。

李善兰在素数论方面，证明了许多结果，其中包括法国数学家费马(P. Fermat，1601—1665)在1640年得出的一条素数定理：

若a^d-1能被素数N整除，则N－1能被d整除。

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等合作翻译过大量西方科学典籍，成为近代中国科学的先驱和传播者。1868年，他应召到北京，在同文馆担任数学教席，官至三品，但他淡于利禄，潜心于数学教学和研究。李善兰之后，中国传统数学再也没有出现有较大价值的成就。

大量翻译西方数学典籍

伟烈亚力经营的上海墨海书馆首先大量翻译西方的科学典籍。1852年，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相识，两人通力合作，先后译出《几何原本》后9卷(1858年)，《代数学》(1859年)，《代微积拾

级》(1859年)等数学著作。《代微积拾级》是中国第一部微积分译作,影响巨大,其中使用的微分、积分、函数、级数、曲率等名词均始自此书,沿用至今。李善兰在翻译时用了一些西方数学的符号,但大量使用中文字母和自创的符号,读来十分困难。

第二次大量翻译科学典籍是在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奏准设立的江南制造局。主持数学典籍翻译的是华蘅芳(1833—1902)。他是江苏无锡人,爱好数学,1861年到安庆曾国藩军中佐理洋务,然后到上海,在江南制造局供职。他除参加地学等书籍翻译之外,主要和英人傅兰雅合译数学著作。十余年间译书以下6种:《代数术》(1872年)、《微积溯源》(1872年)、《三角数理》(1877年)、《代数难题解法》(1879年)、《决疑数学》(1880年)、《合数术》(1887年)。其中《决疑数学》是我国第一本有关概率论的数学译作。与李善兰的译作相比,华蘅芳翻译的著作内容较为丰富,语言更为流畅,但使用的符号仍未有大的变化。

中日数学实力的逆转

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日本数学一直在向中国学习。日本翻译和传播西方数学的时间也比中国稍晚。1859年,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翻译的《代微积拾级》很快东渡日本。"18世纪60年代,日本和算家能读到的最好微积分书籍只有Loomis的《微积分》中译本(即《代微积拾级》)"①。

---

① Mikami Y(三上义夫):Mathematics in China and Japan, 2nd. ed. New York. Chelsea Publishing Company. 1961. p. 176.

现在日本使用的数学名词有许多是从中国传去的，如微分、积分、函数、有理数、无理数、方程式等等，中日所用完全一样，其来源是《几何原本》、《代微积拾级》等中国译本相继传入日本。

但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曾有“废止和算，专用洋算”的指令性要求。1872年的学制令等文件，明文规定：“算术以洋法为主。”日本在重视工业发展的同时，重视基础科学包括数学的发展。1877年，菊池大麓自英国学习数学后归国，进入文部省改革科学教育。日本数学会在1877年成立，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理学部，其中有数学教授。1898年，高木贞治到德国向世界大数学家希尔伯特(D. Hilbert 1862—1943)研习代数数论，日后解决了著名的类域论问题，为世界一流数学家。反观中国，自容闳1872年组织幼童出国留学，主要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十九世纪多批留学生中，竟无一人专习数学。洋务派提倡学习数学，响应者寥寥。同文馆的天文算学馆，学生中无人能超过李善兰。数学之落后，自是意料中事。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数学已明显落后于日本，李善兰时代的数学优势丧失殆尽。1898年之后，中国向日本大举派遣留学生，其中包括派人学习数学。

第二节　晚清时期的中国数学教育

1882年李善兰逝世，中国传统数学研究几乎完全中断，所有的数学活动只是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中国现代数学不得不另起炉灶，从基础的数学教育开始。教会学校、京师大学堂、中小学校开设数学课程，派遣学习数学的留学生，出版基础的数学

教材，就是最初的几步。

1. 数学教材。

西方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大多是宗教课程，间或有一些数学课。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教派在中国所办的学校趋于联合。1877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 W. Mateer 1836—1902)主持成立了教科书委员会，计划编写初级和高级两套教材，每套都有"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学、物理学、天文学"。狄考文和平度人邹立文合编了一套数学教材：1885年出版《形学备旨》(形学即几何学)，1890年有《代数备旨》，1892年有《笔算数学》。1893年美国传教士潘慎文(A. P. Parker 1850—1924)和谢洪赉合译的《八线备旨》和《代形合参》(即解析几何)出版。这些书开始采用阿拉伯数字，+、—等国际通用符号。它们发行很广，每种书都重印了十几次，清末许多学校都曾采用作为教科书。

2. 同文馆中的数学课程。

1868年设天文算学馆以后，李善兰受聘为第一任数学教习(即教授)。同文馆的历任教习中，中文教习当然由中国人担任，其余的外文、理化、生物、地学、军事、医学、法政等等学科的教习均延请外人承担，而数学是唯一的例外。李善兰学贯中西，被认为是"才具很高的人"[1]，受到同文馆上下的尊重。在某种意义上说，数学和西方的差距相对地要小一些。

同文馆的数学课程，按规定第四年有算术、代数，第五年习几何，以及平面和球面三角，第六年有微分积分，但从现存考试

① 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

题目来看,没有考过微分积分的题目。李善兰去世后,席淦、王季同先后于 1886 年、1895 年继任教习,两人的水平不及李善兰,没有多大作为。此外,1873 年起在上海广方言馆任算学教习的刘彝程在中国传统数学上稍有研究。

洋务派人士在筹办船政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等军事学校时,都要安排数学课程。1867 年开办的福建船政学堂,基本课程包括法文、算术、平面几何和画法几何,以及一门详论 150 匹马力轮机的课程。民间兴办的书院,亦设算学课程。上海求志书院的算学课程为西方数学与中国传统数学的混合体,其中有勾股、四元代数、平面几何、三角、微分、级数等内容。

3. 科举中的算学科。

1870 年,沈葆桢、英桂奏请"特开算学科",内称"水师之强弱,以炮船为大宗,炮船之巧拙,以算学为根本"。1875 年,礼部又请考试算学,然二事均未能获准。1887 年,陈秀莹有"奏请将算学归入正途考试疏",李鸿章予以支持,称"为造就将才起见,要皆以算学入手",建议由各省士子、水师武备学堂等学生及教学人员参加考试。当年,总理衙门同意加开算学科。1888 年戊子乡试,报考算学的有 32 人,按每 20 名录取 1 名的比例,当年取中 1 名。

第三节 二十世纪初年普及西方数学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数学的教育皆由师徒间个别传授。百日维新前后,开始提倡办新法学校,算学是其中一门主课。此时,民间的数学团体和数学杂志也开始出现。湖南浏阳的算学社以培

养贤才而劝学算学，谭嗣同曾著有《兴算学议》。1900年，周达（号美权，1879—1949）在扬州创立知新算社，除研究中国古算之外，主要提倡学习西算。他本人著有《周美权算学十种》，且从1902年起5次去日本交流数学。此外，四川重庆的算学馆、上海松江的云间算学会、浙江瑞安的学计馆等都是研究和介绍中西方数学的民间组织。1902年，杜亚泉（1873—1933）在上海出版《中外算报》；1912年，崔朝庆（1860—1943）在南通创办《数学杂志》，也都主要致力于西算的传播。

1902和1904年，清廷先后颁布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规定小学堂有算术课，中学堂设算术、几何、代数、三角；高等学堂授解析几何、微积分。这两个学制虽然推行很慢，但基本上是仿照西方的。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颁布新学制（壬子学制），所设数学课均为西方数学。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量出版自己编写的《共和国教科书》、《民国教科书》等系列数学教材，同时也翻译国外的优秀数学教科书。传统的中国数学不再教习，学校中完全讲授西算。课本中除多用文言文表述之外，已普遍采用横排，使用阿拉伯数码和国际通用的数学符号，西算就此普及。

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其数学教育一仍同文馆旧制，未有大的变化。1906年使用的代数学教科书为日本上野清著，中国徐虎臣译。该书仍为直排，文言文，没有阿拉伯数字，数学记号仍沿用李善兰所创的那一种。京师大学堂所开课程中最高为微积分方程论和整数论。到辛亥革命为止的十余年间，京师大学堂没有培养出较有成就的数学家。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3年成立数学门，1919年改门为系，渐有现代数学高等教育的雏形。辛亥革命以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北京高

等师范学校，设立了数理科。这是民国初年培养数学专门人才的两所高等学府。稍后，又在武昌、南京、成都等地设立高等师范学校，它们的数理系培养了大批数学教师。

十九世纪派往欧美的大量中国留学生中，专习数学的未见记载。1902年，冯祖荀(1880—?)去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和京都大学理学部研习数学，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数学教授，以后长期担任数学系主任。辛亥革命前到美国学习数学的几位学者对后来中国数学的发展较有影响，其中胡敦复(1886—1978)，1904—1907年在康乃尔大学获学士学位；郑桐荪(1667—1963)也在1907—1910年间就读于康乃尔大学习数学与物理；秦汾(1883—1971)于1906年去哈佛大学学习天文与数学，1909年毕业，并继续攻读，于1913年成为中国在数学学科方面获硕士学位的第一人。

1908年，美国国会同意退回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作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之用。1909年派出的首批中有王仁辅(1886—1959)，他在哈佛大学学习数学，1915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10年的第二批留学生中有多人攻读数学。其中的胡明复(1891—1927)，1917年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具有边界条件的线性微积分微分方程》发表在《美国数学会汇刊》上①。这是中国以数学研究而获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他的博士论文也是中国数学家发表的第一篇有现代水平的数学论文。1910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研习数学物理的还有赵元任(1892—1982)，他在1918年获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国后

① Hu Min-fu: Linear Integro-Differential Equations with a Boundary Condition.《Transactions of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19,363—402.

先在清华学校教授数学和物理学，后来转向语言学研究，成为语言学家、作曲家。姜立夫（1890－1978）是1911年第三批赴美留学生中的一员。他在1918年以《非欧的线——面几何》的论文，也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19年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任教授，培养了一大批有成就的数学家。姜立夫在现代中国数学界深孚众望，以后成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

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到法国学习数学的有何鲁（1894－1973）、段之夔（1890－1969）、郭坚白（1895－1959），他们先后在里昂大学、巴黎大学等校获硕士学位。熊庆来（1893－1969）于1913年考取云南公费留学名额，在比利时、法国等地学习数学，回国后办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的数学系，对现代中国数学贡献很大。

第三十四章　天　文　学

鸦片战争后到五四运动前是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鸦片战争后，为了谋求国家的富强，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潮流。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开始全面传入中国，传统天文学逐渐遭到淘汰，而为近代天文学所取代，且在清末的一些学校中出现了天文学教育。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建立近代天文台。民国初年，政府接管清钦天监，成立了中央观象台，并出现了一座民办军山天文台，开始进行近代天文观测和研究工作。这时中国已有了近代天文事业的萌芽。

第一节　近代天文学知识的传入

自明末清初起，西方的近代天文知识已有部分传入中国，但传入的内容和产生的影响都极其有限，只是改变了中国的天文学方法，即西方的几何模型方法代替了传统的代数方法，而并未改变中国天文学的性质。中国的天文学仍是为皇权服务而以历算和星占为主的宫廷天文学。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御用性以及知识界盛行的"西学中源"说大大阻碍了天文学的发展，以致直到

十九世纪上半叶，作为近代天文学基础的哥白尼日心地动说还仍然遭到封建学者的反对。而在那时的欧洲，随着观测技术的改进和理论研究的进展，近代天文学早已有了巨大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随着五口通商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人士纷纷来华，形成第二次西学东渐，近代天文知识再度传入中国。传入的主要途径是中国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与热心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西洋传教士一起合作译著、出版近代天文学书籍。

最早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的译著是中国著名学者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译的《谈天》。《谈天》译自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J. Herschel,1792—1871)的名著《天文学纲要》(The Outlines of Astronomy)，是根据该书 1851 年的新版译出，1859 年在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全书分 18 卷，以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为基础，介绍了天体测量方法，天体力学的基本理论，太阳系的结构和天体的运动规律，以及恒星周年视差、光行差、小行星、天王星、海王星等一系列天文新发现，以及赫歇尔父子对双星、变星、星团和星云的观测结果，首次向国人展示了西方近代天文学的全貌，其与中国传统天文学完全不同，使人耳目一新。李善兰还在《谈天》一书的序言中驳斥当时一些知识名流反对哥白尼学说的种种谬论，并以力学原理和恒星光行差、视差等事实证明日心地动说和开普勒行星轨道椭圆理论已是“定论如山，不可移矣”。声称“余与伟烈君所译《谈天》一书，皆主地动及椭圆立说，此二者之故不明，则此书不能读”[1]。《谈天》出版后，受到社会的

① 李善兰等译：《谈天》，上海墨海书馆 1859 年版。

广泛重视和欢迎,使哥白尼学说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从此近代天文学得以在中国广为传播,传统天文学逐渐遭到淘汰,而以探索宇宙为目的的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逐渐为国人了解和接受,并日渐深入人心。因此《谈天》在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的转变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李善兰与伟烈亚力所译的《谈天》刊出15年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徐建寅(1845—1901)与伟烈亚力又根据《天文学纲要》的最新版本(第12版)续译其增订部分,把截止1871年的最新天文学成果补充译出,于1879年刊印《谈天》增订本。

1880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刻印了美国林乐知(Y. J. Allen,1836—1907)口译,郑昌棪笔述的译著《格致启蒙·天文学》。该书译自英国天文学家洛基尔(J. N. Lockyer,1836—1920)的著作《天文学》,是英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科学初级丛书之一[1]。全书共分七章,介绍地球、月球、太阳系各行星、彗星、太阳、恒星等天文学基础知识,以及牛顿万有引力学说,内容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是优秀的入门教材,也是清末流传较广的一部天文学译本。

这一时期出版的近代天文译著还有英国传教士合信(B. Hobson,1816—1875)编译的《天文略论》(1849年),中国学者王韬(1828—1897)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天学图说》(1880年),美国摩嘉兰和中国薛承恩合译的《天文图说》(约1894年)以及京师同文馆、登州文会馆的天文教习和学生翻译的一些书籍和教科

---

① 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中国科技史料》第16卷(1995)第2期,第1页。

书等。

此外，伟烈亚力创办的综合性月刊《六合丛谈》(Shanghai Serial)（1857 年墨海书馆出版）和林乐知编辑的《益智新录》（1876—1878），以及英国人傅兰雅编辑的《格致汇编》等杂志也以一定篇幅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①]

近代天文知识的传播不仅促进了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的转变，而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清末著名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吸收和运用过近代天文知识。近代天文学中的天体演化学说是康有为历史进化论的科学来源之一，而西方的"以太"假说以及康德和朗白尔的无限宇宙模型则是谭嗣同哲学思想的自然科学基础。康有为还于 1885 年写成《诸天讲》一书，介绍西方近代天文知识。1926 年又对此书作重大修改和增补。书中介绍了不少天体物理学知识，如恒星光谱型、太阳的化学元素组成等等，并首次介绍了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说以及二十世纪初关于太阳系演化的一些新学说。[②]

第二节　清末民初各类学校中的天文教育

中国近代天文教育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派官员开办的一些新式学堂。

创办于 1862 年的京师同文馆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1866

---

① 王扬宗：《〈格致汇编〉与西方近代科技知识在清末的传播》，《中国科技史料》第 17 卷(1996)第 1 期，第 36 页。

② 康有为：《诸天讲》1930 年。

年在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开始讲授自然科学知识。京师同文馆学制8年，从学习语言文字开始，逐渐增设历史、地理和数理化等自然科学课程，最后两年要学“天文测算”。对于不学外国语言文字者，则学制5年，“天文测算”课安排在第四、第五年。实际上天文课到1877年才开始添设，最初均由外国教习讲授，后来渐有毕业生担任副教习。当年的考题有“克伯尔测天文三纲，试一一言之”，“行海路定船方位之法，求表明”，“详论海王星，从何而始知有此星?”“测木星小月之月蚀，而可知日地距，其法详论之”，“土星之光环，详论其理”等题。可见讲授的内容侧重于基础天文以及与航海、测量等有关的实用天文知识，这也是早期各类学校中天文教育的共同特点。据文献记载，同文馆内还建有配合教学用的观星台。天文教习骆三畏(S. M. Russell)曾与学生合译教科书《星学发轫》。从1878至1898年，每年由洋教习算辑，学生翻译一本《中西合历》。[①]

上海广方言馆也讲授自然科学，开设有天文科。由当时江南天算名家贾步纬(1829—1902)和一位英国人担任天文教习，内设天文馆，有观测仪器。每年编辑一本航海年历即《航海通书》。贾步纬曾与傅兰雅合译《恒星赤道经纬表》1册。此外，诸如上海的格致书院这类学堂也讲授天文知识。

在清末民初的天文教育中，实用天文教育比较突出，在一些工业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中，凡与航海或测量有关的学科都教授实用天文学。早期聘请外国教习讲授，以后逐渐由中国人接

①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2—167页。

替。例如 1866 年开办的福建船政学堂和 1880 年设立的天津水师学堂的驾驶班，稍后创办的唐山路矿学堂、天津北洋大学堂、太原山西大学堂等学校的土木工程科等都教授实用天文。清末京师测绘学堂和民初的陆地测量学校是培养测绘人才的教育机构，其三角科以实用天文为主课。京师陆地测量学校高等科有些毕业生，如曹谟、刘述文等人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天文大地测量工作的骨干。[①]

近代中国大学的天文教育与其他学科相比，发展相对迟缓。虽然早在 1903 年，清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就已规定格致科大学分算学门、星学门、物理学门、化学门、动植物学门、地质学门 6 门，1913 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中，也规定大学理科要设星学门，但实际上，由于缺乏师资和必要的近代天文观测设备，直至一十年代末，全国还没有一所大学开设有单独的天文系，只有一所教会学校——济南的齐鲁大学于 1917 年设立了天文与数学合并的天算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只是在数学系或数理部、物化部内开设有天文课。

齐鲁大学是 1917 年由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于 1864 年在山东创办的登州文会馆与青州、济南的一些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天文教育在文会馆时期已初具规模。文会馆实为一个不分院系的书院，实行通才教育，所有学生兼学文、理、天文诸科。学制 9 年，前 3 年为备斋，后 6 年为正斋。据 1891 年所印课程表，与天文学

① 陈展云：《中国近代天文事迹》，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1985 年版，第 58—59 页。

有关的课程,第三年有“测绘学”,第六年有“天文揭要”。该校以中文授课,教科书自编。天文教科书有美国教习赫士(W·M·Hayes)编译的《天文揭要》和《天文初阶》两本。文会馆已具备当时首屈一指的天文观测设备,建有观星台,台内装置有狄考文1879年休假回美时劝募到的一架口径25厘米的反射望远镜。齐鲁大学成立后开始分系。天算系最初只有两位教员,系主任王锡恩(1871—1932)1893年毕业于登州文会馆,后获齐鲁大学理科硕士学位,是法国天文学会会员,编有《实用天文学》、《普通天文学》两本教科书,当是中国天文界的老前辈。另一名教员也是登州文会馆毕业生。齐大天文台除原有的那架口径25厘米的反射望远镜外,又添置一架16厘米折射望远镜。[①] 总的来说天文学已在中国近代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当时天文教育的范围非常有限,学生也极少。

第三节　天文机构的变迁

鸦片战争后,我国天文机构的变迁带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烙印。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设立近代天文台。

1872年法国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建立天文台,1884年设立航海服务部,1900年在佘山建立天文台,1908年又设立陆家浜地磁台,三台一体总称徐家汇天文台。最初建台是为扩大法国对

① 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5—489页。

华侵略服务的，除开展授时工作外，还为各国航海和商业活动提供气象服务。但它也是法国科学院在中国从事区域性观测和研究的一个科研机构。当时，佘山天文台安装了亚洲首屈一指的口径 40 厘米双筒折射望远镜和中星仪等仪器，开展了星图、星云、双星、新星和太阳的观测与研究工作，出版有《佘山天文年刊》和《天文年历》等刊物。[①]

1898 年，即德国在强占我胶州湾的第二年，在青岛设立了气象天测所，隶属于德国海军港务测量部。其最初的主要工作是收集我国华北沿海一带的气象资料，后来逐渐扩充为具备气象、天文、地磁和地震等设备的观测研究机构，1911 年定名为"皇家青岛观象台"。同时又增添天文测时和授时工作，为在附近海域活动的德国军舰服务。该台拥有 16 厘米盖氏赤道仪、4 厘米子午仪和地平经纬仪等天文仪器。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青岛台落入日军之手，改名"青岛测候所"，沿袭德人所做的气象、地磁、地震工作，而停止天文工作。该台直至 1924 年才归还中国。[②]

1900 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钦天监观象台上的我国天文古仪遭到德、法两军的疯狂掠夺。德军劫走天体仪、纪限仪、玑衡抚辰仪、地平经仪和浑仪；法国掠得地平经纬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象限仪和简仪。法国劫走的仪器存放在法国驻华使馆，后迫于世界舆论压力，于 1902 年归还中国；德军掠走的仪器

① 阎林山、马宗良：《徐家汇天文台的建立与发展(1872—1950)》，《中国科技史料》第 5 卷(1984)第 2 期，第 65 页。

② 邵元疆、孙寿胜：《青岛观象台的八十六年》，《中国科技史料》第 5 卷(1984)第 4 期，第 90 页。

则被运往德国，陈列于波茨坦德皇离宫中，直到 1921 年才根据《凡尔赛和约》运回我国。早已没落的清朝的天文机构钦天监，经过这场浩劫也就名存实亡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的封建统治。1912 年民国政府教育部接收清朝的钦天监，撤销了这一机构，以钦天监外署泡子河观象台为台址，建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定名“中央观象台”。原计划按当时欧洲一些观象台的组织模式，在台内设立历数、气象、天文、磁力(即地磁)四科，但因人力经费不足，成立之初只设历数一科，以应付赶编历书的任务。第二年增设气象科，到 1921 年才又成立天文科和磁力科。其天文仪器除明清遗留下来的古代仪器外，主要添购了等高仪、六分仪、计时钟和小型望远镜等。中央观象台在一十年代的主要天文业务就是编制历书。教育部荐任高鲁(1889—1947)、常福元(1874—1939)为技正，高兼台长，常兼历数科科长，还委任历数科技士 5 人，任用办事员数人。台长高鲁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后留学比利时，获布鲁塞尔大学博士学位，深通数理，通晓实用天文，1911 年从比利时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开创中国近代天文事业。常福元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曾在编译图书局任职，是高鲁的得力助手。中央观象台每年编制一本民用历书向各省颁发。高、常二人革故鼎新，对编历工作作了重大改革。从 1913 年起毅然放弃过去按清代《历象考成后编》计算的旧法，改用近代天文方法，即按纽康(S. Newcomb)的太阳表和汉森(P. A. Hanson)的月亮表来进行编算。不过由于直接推算工作量过大，人手不够，实际上是用外国提前出版的天文年历按说明书换算而成。新历书依照公历按月排比。以北京地方平时为标准，列入朔望时刻和二十

四节气，刊载“星期”和“日中平时”，并在历书中刊载天文常识图说。此外还编算出版民国四年至八年的5册《观象岁书》，类似天文年历，包括行星历表。其编算方法，有的直接抄录外国原书，有的则是按外国原书说明书换算而成。中央观象台的另一功绩是发起组织中国天文学会，于1915年以学会的名义，在台内刊行《观象丛报》，宣传天文知识，以扩大天文学的社会影响。该刊还进行国际交换，寄赠单位遍及五大洲，曾收到近百种交换而来的国外刊物。①

在民国初年，我国南方还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座民办天文台——南通军山天文台。该台建于1916年，是近代著名民族实业家张謇为发展当地的农业、水利和航运事业而创办的。业务包括天文、气象两部分。台内仅有4名业务人员。主持业务的刘渭清毕业于张謇所办的通州师范测绘科，曾到法国主办的徐家汇天文台学习近代实用天文和气象。军山台委托徐家汇天文台向国外订购了双筒望远镜、经纬仪、天体仪、无线电受信机等天文仪器，开展了守时报时、经纬度测定、日月食推算预报、行星位置和运动预报、极光和黄道光观测、太阳黑子观测等天文工作，并对黑子的成因及其对地球的影响作过探讨，还曾于1918年举办测候训练班，培养实用天文和气象人才，开展天文普及宣传。②

中央观象台在历算天文领域完成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

① 陈展云：《中国近代天文事迹》，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1985年版，第26—32页、第83—90页。

② 张明昌：《南通军山天文台始末》，《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1984）第4期，第71页。

而军山天文台则开始进行以探索自然为目的现代意义上的天文观测和研究。这表明中国在本世纪一十年代已有近代天文事业的萌芽。

第三十五章　气　象　学

第一节　西方传来的气象学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后，十七世纪上半叶，发明了温度表、气压表，不久又发明了多种湿度表、风速表、雨量器。由此，意大利一实验学院得以于1653年建成一个由7个站组成的气象观测网。不少欧美国家开始观测。哥伦布的航海以及欧洲至东亚海运航路的开拓对欧洲工商业有很大推动，引起了对气象情报的客观要求。科学仪器的发展使得十七八世纪的科学家们研究出一些基本的物理学定律，由此才能取得对气象现象的深入认识。

1780年德国帕拉替那气象学会组织了一个由40个站组成的标准化气象站网，包括一些其他欧洲国家的站和少数美国的站，仪器近似，有统一的规范。15年后因战争而停办。以后许多国家的气象台站逐渐增多。工商业、海运的发展，要求有可靠和经常的天气情报。1853年首次国际气象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主要讨论海洋气象问题。这是国际气象工作合作的开始。

气象站网有了进展才能分析较大区域中天气的分布和变动。1820年德国莱比锡一位气象学家分析了1783年的天气，并开始绘制天气图。虽然都是事后很久的分析，但看出有很大的潜

在用途。要用天气图作出及时有用的天气预报,需要更多的站并解决通讯问题。20多年后,1843年摩尔斯发明了电报,1850年美国绘制由电报传输的天气图,5年后法国也开始绘制。

清朝的海关自1876年开始,于八十年代初步建起一个主要在沿海的观测网,这是由英国人包办和控制的。真正由本国建的完全没有,相反,外国纷纷入侵并设置气象台站。民国初的9年中,中国政府部门开始设了少量台站,但多未能持久。

中国人民于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累积了许多知识和经验,有不少学者提出理性认识。气象季节变化与生物关系(物候)的知识以及在农事上的应用,夏代就开始有所总结,到两周已有专著。自南北朝起,对气象与多种农业问题关系的知识及其应用已写入农业专著,并在多种重要农书中扩大和更新。很多学者、医学家、航海家记录和观察种种天气现象,并探讨其成因,如庄周、王充、沈括、朱熹等提出过不少理性看法。南朝刘宋时就已有对台风(当时称飓风)的描述。明末外国教士开始介绍西方的气象知识,1674年开始有西方初期气象仪器的介绍,1871年已有关于气象学原理的译本。但在封建统治下,却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

第二节　列强在中国设立的气象台站

早期法、俄在北京的活动

十八世纪中叶就有法国人在中国进行气象观测。耶稣会士宋君荣(Gaubil, Antoine Peter,1689—1759)和钱德明(Amoit, Jean Joseph Marie, 1718—1793)精通满文,获得清廷信任。宋

君荣1743年曾在北京进行气温观测。钱德明于1757—1762年首先在北京进行6年项目完整的观测。

1841年俄国教会在北京设立一测候站，1850年扩充改称北京地磁气象台，1867年改属彼得堡科学院，俄著名科学家傅烈旭(H. Frische)为台长，连任16年。在1841—1914年这74年中多次停顿，仅存29年气温记录，降水量存54年记录。

俄国在新疆的考察

1868年俄国人布耶可夫斯基曾在天山进行观测。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三次来新疆，从伊宁深入内地沿途观测，到达哈密和罗布泊。1893年俄国人罗波洛夫斯基到达鲁克沁设站观测(1893年12月—1895年12月)。同年俄国人克莱得茨曾对阿勒泰一带观测。1906年6月奥地利动物学家楚格迈尔曾到和田克孜勒山口观测。

法国在上海设徐家汇观象台

法国早在1840年就筹划在江南设一观象台。1853年3月新建成上海董家渡天主堂，1865年法国教会派曾受过气象培训的神父到董家渡建观象台进行观测。1847年上海徐家汇耶酥会会所建成，新建的徐家汇观象台于1872年12月开始接替董家渡观测。次年在肇家浜(今蒲西路)新址观测。气象方面的成就有：

(1) 项目完全的地面气象观测连续77年无中断，为全国

之最。

(2) 1879年8月初成功地预报了一次台风将临近上海,受到租界当局和舰只的赞赏和鼓励。1895年9月绘制第一张地面天气图。预报台风和海上大风有了依据。

(3) 1884年9月租界当局建成外滩信号台,每日悬挂长江口和上海港风情旗帜信号。1906年起信号扩大到表示海域分区大风、台风和低气压情况。1911年起增加夜间灯信号。

(4) 1914年5月起,通过法租界无线电台,每日两次发布海区天气实况和预报及授时信号,扩大了海洋服务面。

(5) 收集各地天主教堂的气象观测记录。

(6) 出版:《观测公报》,包括本台详细气象记录和地磁记录(1872—1941);《月报》,包括海关各观测点和教会的气象要素月值统计(1913—1943);科学研究报告。

俄国在东北的观测网

1891年《中俄密约》许俄建中东铁路。1909年俄在沿北线建成满洲里等9处测候所,1914—1916年增建5处。其中有7处1936年后为伪满所接办。

日本在东北、台湾和南方的观测网

中东铁路南段于1905年为日本所占有。1905—1909年,日军先后设大连、营口、沈阳、旅顺、长春等测候所。1913—1934年,南满铁路增设12个测候所,并着眼于农业开发。另外在杭州

(1904—1918)、汉口(1905—1936)、沙市(1905—1920)、济南(1916—1943)和上海(1920—1941)领事馆中进行气象观测。

1895年6月日本入侵台湾，1897年在台北等处设测候所5处，后又增设4处。在台北设有气象台。

德国在青岛设气象台站

德国于1897年强占胶州湾，其港务测量部开始简单的气象观测。1905年迁水道山。1909年增设地震、地磁、天文观测。1911年改称"皇家青岛观象台"，增加潮汐观测。德国原有在山东筑铁路的企图，曾设济南、张店、青州、坊子、高密、胶州等测候所。

1914年11月日本侵占青岛后，改称"测候所"，1916年5月委托朝连岛灯塔进行海洋和气象观测，1917—1924年曾在市郊和胶济铁路沿线各设9处测候所，并在大公岛灯塔设海洋和气象观测。

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气象台站

英国1883年在香港设皇家气象台，主要为航海航空服务，早年曾设信号台。不久又开展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业务。后来逐步在启德机场和附近岛屿设有气象站20多处。1922年起有测风气球观测，后又有无线电探空观测。气象台在1942—1946年日军入侵时期停止工作。英国人在天津开埠后于1887年9月设测候所，直到1941年停止工作。

其他国家，如葡萄牙于1881年在澳门，法国在昆明(1921—

1936)、蒙古(1928—1932),印度在西藏亚东(1933—1939)设站观测气象。

第三节 中国兴办的气象站网

海关气象观测网

1854年清廷在各通商口岸派驻海关监督,设助理称税务司,由外国人担任,掌握海关实权。1863年英国人赫德继任总税务司,控制了中国海关。赫德于1869年11月发出28号通札,要求各海关进行气象观测,称"海关广设沿海沿江,地域广达纬线20度、经线10度。机构现况容许进行气象观测而无须增加人员。购置仪器外,不需其他开支。气象观测对于科学界和东方航海人员和其他人可具有实际价值"。由此,自1876年起先后在沿海(包括台湾)灯塔和沿海、沿长江港埠(包括少数内地商埠)建起观测点65处。有10处是在内地(东北、广西、广东、云南)。三分之二是1900年以前所建,1880年已达27处。共有44处连续工作至抗日战争。有26处整年记录长达50年以上,最长的63年。观测项目较全,所用仪器均购自外国,记录文字均用英文,观测人员均外籍(民国始有中国人参加)。这个观测网的直接作用当然是为外国(特别是英国)海运服务,也就是为外国侵略服务。但由于无通讯条件,只有一小部分能将报告通过电报集中到上海。1897年起建点的有天津、芝罘、九江、汉口、宁波、厦门和大戢山岛;1901年起增加镇江、宜昌、重庆、温州、汕头。由于所累积的资料年代长久,这个观测网的记录至今仍是我国气候和气

候变化研究的宝贵资料。

这个观测网虽是英国人包办，为外国航运服务，但属中国海关，是用中国人的财力兴办，所以把它们列为我国的事业。

民国初期农业部门设站

清末变法维新运动后，1906 年才有农工商部，开始设一些农、林、牧试验场。1911 年在北京设农商观测所。1917 年已有 10 个省的试验场和 3 个农校有气象观测，另有 3 个观测所。现在存有长期记录的有保定（1913—1937）、归绥（1914—1937）和太原（1916—1937）。另外东南大学、广东大学和岭南大学的农科也有较长的记录。可见农业部门的气象观测比中央观象台还早，设站成绩也较好。但因当时政府经费无保证，多数测点也维持不长久。

教育部设中央观象台

1912 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中华民国政府决定在北京建立中央观象台，任天文学家高鲁博士为台长，接管原钦天监外署（今建国门），计划设历数、天文、气象、磁力四科。次年派蒋丙然博士筹建气象科（1915 年成立）。蒋丙然，闽侯人，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留学比利时双卜罗大学，获农业气象学博士学位。中国气象事业创始人之一。1924 年任青岛观象台台长、青岛大学教授。1946—1966 年任台湾大学农学院教授。曾任中国气象学会会长（1924—1930）。

中央观象台于1913年开始气象观测，并编订我国最早的观测规程。1915年收集海关测候所气象电报和徐家汇观象台转发来的国外气象电报，据此绘制我国最早的天气图，制作天气预报，次年起向公众发布。1919年航空署成立，下设气象科，次年开始北京至浦口之航运，观象台曾予协助。

布设观测网为事业所必需，也是中央观象台之职责。1920年拟订设立40个台站的计划，强调航空需要。次年经教育部通过，批准先设10处，但终因经费无着，只设了张北、开封、西安3处，且在1927年前后即停办。观象台的观测也于1927年时停时续。

1928年观测工作由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继续，至1937年9月卢沟桥事变起停止，天气预报工作早在1921年已停止。

张謇设南通军山气象台

1905年，张謇在他个人所设的博物苑开始气象观测，开国人气象观测之先河。后派员到徐家汇观象台学习并托购法国仪器，在军山建气象台，1917年开始工作，张自任台长。1909年，接收徐家汇台所发各地报告，绘制天气图，发布天气预报和警报。1926年张逝世后，改由政府维持。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的特权不断增加，他们在各自的侵略基地设置气象台站网，而清皇朝却没有一个气象台站。1876年起，以中国海关的名义用中国财力所设的海关气象台站网也完全是英国人操纵，为其日益增大的洋货输出和海运服务。1920年以前，民国农业和教育部门开始设置的小量台站多数也很快

夭折。下面将1911年和1919年全国各级测候所的数目统计列于下表：

1911年和1919年各级测候所数统计表

	1911年					1919年				
台站等级	1	2	3	4	总计	1	2	3	4	总计
本国设	0	50	3	1	54	0	54	3	5	62
外国设	3	15	14	15	47	2	16	22	18	58
总　计	3	65	17	16	101	2	70	25	23	120

1911年存在的本国所设的54个测候所中53个为海关所设，另一个便是张謇所设。他新建南通军山气象台后曾为此事呈报县知事，说："窃农政系乎民时，民时关系气象。……各国气象台之设，中央政府事由，我国当此时势，政府宁暇及此？若地方不自谋，将永不知气象为何事，农业根本之知识何在，謇实耻之。"足见其对气象的重要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也深知当时政府不可能有办气象工作之能力①。

① 本章涉及的有些时间、机构和人物等，因记忆所及和资料所限，可能不完全准确，尚需进一步考订。

第三十六章　物　理　学

从清代末期至民国初期这一阶段，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物理学已告终结，西方近代物理学知识逐渐在我国得到引进和移植，并且开始了最初的物理学教育。

第一节　传统物理学的终结

晚清时期我国的传统物理学

物理学在我国有着相当早的起源，并且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我国传统的物理学曾经具有丰富的内容和辉煌的成就，但是，明代以后，种种原因造成我国经济和生产发展缓慢，科学技术渐渐处于落后状态。物理学的发展在总体上也由缓慢到停顿。

晚清时期，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物理学知识的发展，大概可以郑复光（1780—1853）和邹伯奇（1819—1869）的光学研究为代表。郑复光的《镜镜诊痴》（1847 年）和《费隐与知录》（1842 年），邹伯奇的《格术补》（1874 年），均刊行于鸦片战争之后。郑复光在《镜镜诊痴》一书中论述了几何光学基本概念，几种反射镜和折射镜的质料和性能，透镜和透镜组的成像情况，以及 17 种光

学仪器和器具的制作、原理和使用等。他的成就主要在于研究透镜和透镜组的成像理论。书中所述几乎涉及当时所知的各种光学仪器和器具。郑复光的另一书《费隐与知录》中的内容也以几何光学部分为最佳。邹伯奇的《格术补》反映了他在光学理论方面的突出成就。书中深入讨论了透镜和透镜组的成像规律，定量地得到了透镜成像公式、透镜组的焦距公式。书中还详细讨论了放大镜、几种折射和反射望远镜以及显微镜的结构和原理，介绍了眼睛和视觉的光学原理等。邹伯奇推导出透镜成像公式和透镜组焦距公式，可以说达到了我国传统光学发展的顶峰。清代，我国在光学器具的研究和应用，以及光学理论研究方面，有比较显著的成就。显然，这应归结于我国传统光学知识与传入的西方光学知识的"融合"。

我国传统的物理学知识主要表现在描述和解释物理现象方面，而这些物理学知识则又常常包容在工程技术知识之中。同时，物理学本身与其他传统上占优势的学科（如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农学等）相比较，又始终稍逊一筹。虽然在明末清初阶段我国曾经传入了一些西方的物理学知识，但随后却是百余年的中断，传入的知识甚为零散，无法形成独立的体系，结果它们被融合纳入传统知识体系的框架之中。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的物理学已不可能再有发展，而是明显地呈现出停滞不前，以致最后趋于终结。

近代意义"物理学"的开始

众所周知，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科学，研

究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和物质的基本结构。然而,在欧洲古代,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总称。西方语文中的“物理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原意即指“自然”,引伸为“自然哲学”的意思。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物理学”的各个部分逐渐分别形成独立的学科,逐渐从包罗万象的“自然哲学”中分化出去。直到近代,才有了近代科学意义的物理学学科。

在我国,近代科学的物理学体系是从西方引进的。虽然“物理”一词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十分久远的年代,但作为学科的“物理学”一词的使用却是1900年才开始的。在正式使用“物理学”这个名词之前,晚清时期曾经一度使用“格致”或“格物”统称包括声光化电在内的自然科学。“格致”或“格物”也就是所谓的“格物致知”,语出自《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后世对这句话虽有不同的解释,然而总的来说是指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因此,如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那么“格致”或“格物”与“物理”即“事物之理”的含义是相同的。但晚清使用的“格致”或“格物”则是专门指自然科学知识。后来,化学从中分化出,于是“格物学”和“格致学”就进一步缩小了范围,专门代表近代科学意义上的物理学了。1900年,上海江南制造局译刊《物理学》一书,书名袭用了日文名称即日文汉字而未作改变。该书原系日本物理学家饭盛挺造(1851—1916)编撰;中文译本由日本东洋学家藤田丰八(1870—1929)翻译,我国学者王季烈(1873—1952)重编。这是在我国首次正式使用“物理学”一词作为学科的名称。数年之后,在我国终于逐渐统一采用了具有近代科学含义的学科名称“物理学”。

第二节　近代物理学的引进

翻译出版物理学书籍

到鸦片战争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腐败的清皇朝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的侵略，不得不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大门。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西方科技知识在我国的传播情况，以及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与以往相比较都有了很大的不同。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历史阶段，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成为传播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主要途径。在此阶段，物理学知识的引进和传播也是主要通过物理学书籍和物理学教科书的翻译出版而得以实现的。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开始出现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科学著述。最初翻译出版有关物理学基础知识和自然科学常识的书籍主要有：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1814—1893)译述的《博物通书》(1851)；合信(Benjanmin Hobson，1816—1873)编译的《博物新编》(1855)；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编译的《智环启蒙塾课初步》(1856)。这几种书籍之中以《博物新编》影响最大。

上海墨海书馆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翻译并出版了我国近代第一批科学书籍，其中有若干种是物理学书籍。如：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和张福僖(？—1862)译述的《光论》(1853)；伟烈亚力和王韬(1828—1897)译述的《重学浅说》(1858)；艾约瑟和李善兰译述的《重学》(1859)；伟烈亚力和李善

兰译述的《谈天》(1859)；以及《奈端数理》等。墨海书馆是外国教会在华最早设立的编译出版机构，该馆除印刷宣教物品外，还翻译出版了包括数学、天文、物理、植物等自然科学几门学科的多种书籍，这些书籍在当时都很有影响，而上述几种物理学书籍，尤其《重学》和《谈天》，影响相当大。从此，西方近代物理学知识开始比较系统地传入我国。

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即洋务运动时期，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翻译出版科技书籍的情形。物理学书籍在这一时期也大量地被译述刊行。1865 年在上海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于 1868 年附设翻译馆；该馆是我国近代最重要的科技著作翻译出版机构。馆内有徐寿、华蘅芳、赵元益、徐建寅等我国著名学者，并聘请傅兰雅、金楷理(C. T. Kreyer)、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等西士口译，还有伟烈亚力、玛高温等人参与，在近四十年间共翻译各类科技书籍二百几十种(其中数十种已译而未刊刻)。译书的内容广泛、质量上乘。该馆翻译出版的物理学书籍有十多种，比较重要的如：傅兰雅和徐建寅译述的《声学》(1874)；金楷理和赵元益译述的《光学》(1876)；傅兰雅和徐建寅译述的《电学》(1879)；林乐知和郑昌棪译述的《格致启蒙·格物学》(1879)；傅兰雅和周郇译述的《电学纲目》(不迟于 1894 年)；徐兆熊译述的《电学测算》(年份待考)；卫理和范熙庸译述的《无线电报》(1898)；傅兰雅与徐寿及赵元益译述的《物体遇热改易记》(1899)；傅兰雅和王季烈译述的《通物电光》(1899)；王季烈重编的《物理学》(1900—1903)。翻译馆还翻译过的数种物理学书籍，或已译成而未刊，或未译完，如《热学》、《分光求原》、《奈端数理》等。另外，还有一些属于其他学科的译著，

也包含较多物理学知识，如《金石识别》(1872)、《谈天》(1874)、《测候丛谈》(1877)等。总之，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外人士曾大规模有计划地进行包括物理学书籍在内的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工作。洋务运动时期，清廷为培养急需的外交翻译人员，于1862年设立了北京京师同文馆。同文馆也编译出版了一些科学书籍。物理学书籍有丁韪良(W. A. P. Martin，1827—1916)译著的《格物入门》(1866)和《格物测算》(1883)，这两部书对于同文馆的物理学教育以及对于晚清社会都有相当影响。上述这些根据欧美原著翻译的物理学书籍的影响巨大而久远，在引进和传播西方物理学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译书是晚清时期引进和传播物理学知识最重要的途径。除了译书之外，来华西方人士所办的一些报刊，如艾约瑟主编的《中西通书》(1852年创刊)，伟烈亚力主编的《六合丛谈》(1856—1857)，北京施医院编辑出版的《中西闻见录》(1872—1875)等，也都曾刊载物理学的一些知识。我国近代最早的科技刊物《格致汇编》(1876至1892年，在此期间实际发行七年。其前身即《中西闻见录》)，由傅兰雅主持。此刊常刊载介绍物理学知识的译文，某些重要译文还有单行本出版，如关于物理学知识的《格致释器》、《量光力器图说》等。由于该刊颇具影响，因此对于物理学知识在我国的传播和普及很有积极作用。

晚清时期，在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一些组织，也曾出版或编辑物理学书籍和教科书。如，"学校教科书委员会"(1877年成立，1890年后改称"中国教育会"。该会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曾出版同文馆的《格物入门》和山东登州文会馆的几种物理学教科书，以及傅兰雅编译的《格致须知》和《格致图说》丛书，后两套

丛书包括物理学内容的若干册,是十九世纪末流行的普及读物。"广学会"(1887年成立。原名"同文书会",1894年后改称"广学会")曾出版《电学总览》(1896)、《电学纪要》(1899)、《质学新编》(1904)等。总之,来华西方人士以及教会的一些机构与组织对翻译出版物理学书籍做了不少工作,他们在传播和介绍物理学知识方面的功绩应该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国物理学书籍的翻译出版状况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翻译出版的几乎完全是物理学教科书,而且,据日文原著翻译和编译的教科书,与据欧美西文原著翻译和编译的教科书,在数量上差不多各占一半。可以说,清末民初,物理学知识在我国的引进和传播,主要表现为翻译和编纂教科书。这方面的情况在下面关于物理学教育的一节中还将述及。

需要指出的是,直到十九世纪末,我国学者几乎尚未独立从事物理学书籍的翻译或编译工作。即使在洋务运动中大规模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之时,译书仍然沿袭明末清初时期那种西人口译、华士笔述的翻译方法。这说明总体上看,我国学者在专业素养和外文程度两方面均有较大欠缺,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倚仗西方人士。当然,像李善兰、徐建寅等人,他们掌握物理学基础知识并无困难,在介绍这些知识给民众时也足以胜任,但毕竟为数太少。随着我国教育状况的逐步改善,学者们逐渐掌握科技和外语知识,译书方法才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

系统介绍近代物理学知识

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阶段,近代物理学知识逐步在我国得

到系统介绍。

1. 力学。

力学最基础的知识首先在《博物新编》第一集中述及，有大气压力及其性质与应用等自然科学常识。《智环启蒙塾课初步》中有关于物质可分、物质不灭、运动，以及简单机械方面的内容。《重学浅说》是最早简要介绍西方力学知识的著作。我国最早系统介绍力学知识的书籍是《重学》。该书译自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惠威尔(William Whewell，1794—1866)的《初等力学》(An Elementary Treatise on Mechanics)。《重学》一书共 20 卷，分静重学、动重学和流质重学三个部分：卷一至卷七静重学部分详细讨论了有关力及其合成分解、简单机械及其原理、重心与平衡、静摩擦等静力学问题；卷八至卷十七动重学部分详细讨论物体的运动，包括匀加速运动、抛射体运动、曲线运动、平动、转动等，碰撞、动摩擦、功和能等动力学问题。其中关于牛顿运动三定律、用动量的概念讨论物体碰撞、功能原理等，都是首次在我国得到介绍；卷十八至卷二十流质重学部分则简要介绍了流体的压力、浮力、阻力、流速等流体力学问题。其中包括阿基米德定律、波义耳定律、托里拆利实验等。在清代晚期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书籍之中，《重学》是最有影响的书籍之一。系统介绍近代天文学知识的书籍《谈天》，译自英国著名天文学家赫歇尔(John Herschel，1792—1871)的《天文学纲要》(Outline of Astronomy)。在《谈天》这部书中，关于用牛顿力学理论分析日月五星运动、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万有引力概念，以及测定行星质量等内容，也是首次在我国进行介绍。《谈天》有 1874 年徐建寅的续述本，该书在清代晚期也极有影响。此外，《奈端数理》(又名《数理格

致》)系根据牛顿(Issac Newton,1642—1727)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翻译。然而遗憾的是,很可能因为受到中西译者学识水平的局限,此书未能译完。

2. 热学。

晚清时期,热学知识与物理学其他分支学科知识一起传入我国。《博物新编》第一集有物质三态及其变化,抽气机的原理与构造,蒸汽机的原理与构造等热学方面的内容。近代热学知识在我国的系统介绍,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物体遇热改易记》。该书共4卷,前3卷分别阐述气体、液体和固体的热膨胀理论与实验,第4卷总结物体热膨胀公式并论述各种状态物质受热膨胀的规律。该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气体定律、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以及绝对零度等概念,尤其详细介绍了欧洲科学家们测量液体与固体热膨胀率的实验及结果。

3. 声学。

我国晚清时期介绍近代声学知识最重要的书籍是《声学》。它也是我国最早翻译出版的声学专著。该书译自英国著名物理学家丁铎尔(John Tyndall, 1820—1893)的《声学》(Sound)。原著有九章,每章后面有提要。中译本基本上按原著译出,分为8卷,但略去了原著第七章有关大气声学的内容。该书比较准确地介绍了许多物理概念,如:振动、声波、振幅、频率、响度、声速、波长、波节、声波的叠加、基音、泛音等等;详细论述了发声传声、弦振动、板振动、管与簧片的振动、声波迭加、音律相和等,以及有关语言声学和生理声学的一些内容;书中还有许多声学仪器与声学实验的插图。总之,《声学》详细系统地论述了声学理论与实验,具有相当的影响。直到二十世纪初,介绍到我国的有关声学

的知识，基本上没有超出这部书述及的范围。

4. 光学。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近代光学的一些知识，如光的直线传播和平行光的概念、反射定律和折射定律、临界角和全反射现象、海市蜃楼的成因、光速及其测定方法、色散和太阳光谱等等，在《光论》一书中首次被详细正确地介绍到我国。但该书原著者与所据底本均不详。《博物新编》中也有关于光的传播、透镜成像和棱镜色散等知识。七十年代开始，波动光学的知识引进我国。《光学》一书译自丁铎尔的著作《光学》(Light)。中文译本 2 卷，共 502 节，由浅入深系统详细地论述几何光学和波动光学。几何光学部分的新内容不多。波动光学部分包括关于光的本质的粒子与波动两种假说、光的传播的以太说、光与色、光谱及其应用、光的衍射、干涉、偏振等等。波动光学是《光学》这部书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关于衍射、干涉和偏振现象，它们产生的实验方法、原理及应用等，对我国来说是完全新的知识。稍后，又有书籍专门介绍英国物理学家克鲁克斯(William Crookes，1832—1919)发明的辐射计，即《量光力器图说》。该书 1 卷共六章，叙述了克鲁克斯在进行真空实验时发明辐射计的经过、辐射计的原理、各式辐射计及其应用等。然而书中介绍的多是较早的一些认识。另外，光谱学的初步知识也传入我国，内容介绍光谱分析的《分光求原》一书，因没有译完而未能刊刻。

5. 电磁学。

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期，电磁学在我国传播的内容主要是基础知识和有关无线电报的知识。五十年代初，《博物通书》最早介绍了电磁学和电报的初步知识。七十年代末，有《电

学》一书，共 10 卷 256 节，402 幅插图。该书译自英国人诺德(Henry M. Noad)编著的《电学教科书》(The Student's Textbook of Electricity)。书中比较系统地叙述静电学、静磁学、生物电流、电流的化学效应、热效应、磁效应、电磁感应、电报等，但内容均为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知识。九十年代，有几种比较重要的电学著作：《电学纲目》译自丁铎尔的《电学七讲教程》(Notes of a Course of Seven Lectures in Electricity)。该书共四十章 357 款，概述电流及其各种效应、电阻、电磁感应、电报、稀薄气体放电等内容。《无线电报》一书比较详细叙述关于无线电报的实验与应用。但该书原著者及所据底本均不详。另外，还有专门讲述有关电力计算的书籍《电学测算》。该书共十一章，分别论述定义、欧姆定律、电阻与电导、分电阻与总电阻、导线截面积、电路连接、功与功率、电池、发电机与电动机等内容。书中附有关于长度、面积、体积、重量及功和能的单位换算表，金属的电阻率与电阻系数，液体与溶液的电阻率，纯铜在各温度的相对电阻与电导，线规，化学与热化当量，化学与电化当量，磁化强度，导磁率，磁阻等共 15 个物理数据表。该书的原著者与所据底本亦不详。

以上所述，是物理学各主要分支学科引进近代知识的大体情形。晚清时期，除各分支学科的专著之外，还有许多综合性的物理学书籍以及大量的普及读物，它们对于物理学知识的传播和吸收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例如《格致启蒙·格物学》、《格物入门》、《格物测算》、《格致须知》、《格致图说》等等，都甚有影响。尤其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格物测算》不仅阐述物理学原理和规律，而且注重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物理问题。该书在我国最早介绍了将微积分知识应用于物理学。这一时期，也有许多通俗读物

介绍一些简单的物理仪器。

应当归类于其他学科的书籍，有些也涉及物理学知识。《金石识别》是一部矿物学著作，译自美国著名地质与矿物学家戴纳(James Dwight Dana，1813—1895)的《矿物学手册》(Manual of Mineralogy)。书中包含晶体物理学和晶体光学的一些内容，如介绍各种晶系，晶体的几何形态与构成，晶体的硬度，光在晶体表面或通过晶体时所发生的反射、折射、双折射等现象，以及利用分光计鉴定分类矿物等。这部书首次将近代晶体学知识系统介绍到我国。此外，讨论大气各种现象的《测候丛谈》，叙述气象测量各种仪器及其原理和应用的《测候诸器说》，也都包含许多物理知识。

虽则近代物理学逐渐在我国得到比较系统的介绍，然而总体上说，所介绍的大多是基础知识，这些知识与同时期物理学本身的发展水平相比差距甚大。这种情形自然与当时中国社会与科学的状况密切相关。几乎唯一的例外，是有关 X 光的知识。山东登州文会馆翻译出版的《光学揭要》(1898)一书，末尾有 5 节简单介绍了 X 光的发现、特性及用途。《通物电光》(1899)一书，译自美国人莫顿(W. J. Morton)与汉莫尔(E. W. Hammer)合著的《X 射线，不可见的照相术及其在外科术的价值》(X-ray, or Photography of the Invisible and Its Value in Surgery)，原著者是美国最早将 X 射线应用于医疗的医生之一。译者用“通物电光”一词形象地反映了 X 光的特性。该书叙述电学基本概念，X 光机装置的各个部分，各部件的制作和连接，X 光的发现及其特性与实验研究，X 光照相方法，X 光在医学上的应用等。除这两部书之外，在此前后，一些报刊亦载有关于 X 光原理与

应用的文章。因此可以说，有关X光知识的介绍，还是比较及时的。

第三节　物理学教育

编译出版物理学教科书

随着洋务运动期间及在此之后新式学堂的逐渐建立，对物理学教学用书的需求大大增加了。然而从总体上看，洋务运动中翻译出版的物理学书籍，虽然其原本多为教材，译本有的亦曾被用作教材，但是对于物理学的系统教学却不尽适宜。所以，尽管可用于启蒙与普及物理学知识的书籍的数量很多，但真正用作学校教科书的却并不很多。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由于社会状况的变化和教育发展的需要，我国出版的物理学书籍的性质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即以翻译和编纂物理学教科书为主。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已有多种译自欧美著名教科书的中文物理学教科书问世。比较有名的，如登州文会馆曾先后出版了赫士(Watson McMillen Hayes，1857—?)和我国学者共同译述的《声学揭要》(1893)、《热学揭要》(1897)和《光学揭要》(1898)。它们所据底本为法国迦诺(Adolphe Ganot，1804—1887)著《初等物理学》(Element de Physique)的英译本(Elementary Treatise on Physics)第十四版，但中文译本略去了难度较大的章节。这三种物理学书籍与该馆翻译出版的其他学科的书籍一样，有一定的影响。《光学揭要》还是我国最早介绍X光的书籍之一。

二十世纪初，由于教学的需要，翻译出版欧美尤其日本的物理学教科书的数量骤增，种类繁多。其中，最著名的是《物理学》，该书由饭盛挺造编纂，藤田丰八翻译，王季烈重编。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真正可称之为"物理学"的著作，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最重要的物理学教科书。书中明确指出，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的万物，研究方法是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该书在系统阐述物理学理论和实验的同时，还特别注意介绍有关著名实验进行和著名定律发现的历史。日本其他一些物理学家编纂的教科书，也在中国翻译出版，如木村骏吉的《新编小物理学》(1903)、中村清二(1869—1961)的《近世物理学教科书》(1906)、后藤牧太的《新编理化示教》和《物理学初步》(年份待考)、田丸卓郎的《物理学新教科书》(1909)、本多光太郎(1870—1954)的《物理学教科书》(1911)等，都是较好的教材。此外，还有译自日文书籍的数量众多的教科书。事实上，二十世纪初，我国的物理学教科书，大约半数以上是根据日文教科书翻译或编译的。

与此同时，欧美著名的物理学教科书继续被翻译出版。如：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的《额伏烈特物理学》(1903)，原著者埃弗雷特(Joseph David Everett，1831—1904)是英国物理学家、皇家学会会员，曾将法国德夏内尔(A. P. Deschanel)著的《初等物理》(Traite Elementaire de Physique)译成英文，中文译本是根据英译修订本翻译的；学部编译图书局的《力学课编》(1906)，译自英国马格纳(Philip Magina)著的《力学》，原著曾刊行十数次之多，中文译本系译自其1891年第17版，并据其1896年修订本增补而成；还有《初等理化教科书》(1910)，原著者之一格雷戈里(R. A. Gregory)是英国天文学家、皇家学会会员，曾著数种

物理学教科书。这些都是较好的物理学教科书。

清末,许多程度不等的物理学教科书被翻译出版。这时,我国学者已具备一定的外语和物理学知识,开始能够独立翻译欧美和日本的物理学书籍,并且能够根据需求进行编著。同时,我国还出现了以编译出版教科书为主的书局或印书馆,有名的像上海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先后编译出版的物理学教科书,如:《蒙学理科教科书》(1902)、《最新理化示教》(1904)、《初等理化教科书》(1904)、《理化示教》(1904)、《格致教科书》(1904)、《物理教科书》(1907)、《物理学讲义》(1908)、《初等物理教科书》(1909)、《中学教科书物理学》(1909)等等,在当时都比较有影响。

清末民初出版的物理学教科书,虽则多数内容浅易,然而它们的翻译或编撰,不仅反映了我国在引进和吸收物理学知识方面的进步,而且奠定了我国近代物理学教育的基础。

课程设置和科系设立

物理学教育是近代科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的发展又有赖于整个近代教育的发展。在我国,正式讲授近代自然科学始于1866年北京京师同文馆中设立的算学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起,同文馆已设置物理学课程,该馆各科岁考题中有“格物题”或“格物测算题”,也就是物理知识试题。同文馆的格物或格致课程初由总教习丁韪良讲授,《格物入门》即为当时的教材;1879年后由欧礼斐(C. H. Oliver,1857—?)继任教职。京师同文馆作为我国最早开始近代自然科学教育的机构,物理学课程

的设置和教学在全国都有相当影响。

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期间，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继京师同文馆之后，类似的尚有上海广方言馆(1863)和广州同文馆(1864)。接着又创办了一些军事学校，如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66)、北洋水师学堂(1880)、天津武备学堂(1885)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除主要进行外文或军事技术教育外，同时也讲授包括物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

在官方的支持下，徐寿、傅兰雅等人创建上海格致书院(1876)。书院聘请中外学者授课，并定期举办科学讲演。曾经讲授电学原理等物理学基本知识，并作演示实验。格致书院对我国近代科技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自十九世纪中期起，西方教会和来华传教士在我国各地陆续开办学校，学校里设有自然科学常识的启蒙教育。像理雅各的《智环启蒙塾课初步》就是当时香港英华书院的教科书。教会和传教士办的学校有些还比较著名，如 1864 年狄考文在山东开设的登州文会馆，该校在物理学和其他学科的教学，以及在编译教材供教学之用方面，均甚为出色。

以上所述的各类学校，虽然它们的性质和教学内容各不相同，但是在传播物理学知识和推动物理学教育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1898 年北京京师大学堂成立。1902 年，大学堂在格致科下设天文、地质、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等六目。不过，京师大学堂的物理学教育，与当时欧美或日本的大学物理学教育相比，尚有相当距离。戊戌变法之后，兴办大、中、小学堂的新政得以保留，物理学和其他学科被正式列为学堂课程。1904 年，

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规定小学设理化课；高等学堂分政艺两科，艺科所设课程中有力学、物性、声学、热学、光学、电学和磁学等物理学内容。1905年，清政府又明令废除科举，成立学部。新学制的建立使得各级各类学校有较大发展，物理学知识逐渐正规地在大、中、小学堂得到讲授。

1911年辛亥革命后，近代科学教育在我国开始得到迅速发展。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格致科改为理科，下设物理学等门。1913年，由曾留学美国和德国的夏元瑮(1884—1944)任理科学长。1916年，物理学门第一届学生孙国封、丁绪宝、张崧年毕业，他们是中国物理学专业的首批大学毕业生。1918年，北京大学改物理学门为物理学系。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这一时期，官办和私办的各级学校数量大增，北京、南京、武昌、广州等地高等师范学堂先后设立数理化部，培养师资，从而为物理学知识在中国的普及与提高作了必不可少的准备。

早期的物理学留学生

二十世纪初，中国开始有学生出国留学攻读物理学。最早的一位是李复几(1885—?)，他于1901年在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先后在英国和德国学习，1907年获德国波恩皇家大学高等物理学博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清代末年，出国学习物理学的还有何育杰(1882—1939，1903年赴英)、张贻惠(1904年赴日)、吴南薰(1905年赴日)、夏元瑮(1906年赴美，1909年转德)、李耀邦(1884—?，1909年赴美)、胡刚复(1892—1966，1909年赴美)、梅贻琦(1889—1962，1909年赴美)等。民国初年，出国

学习物理学比较著名的如赵元任(1892—1982,1914年赴美)、颜任光(1888—1968)、李书华(1889—1979,1913年赴法)、饶毓泰(1891—1968,1913年赴美)、孙国封(1890—1936)、丁燮林(1893—1974,1914年赴英)、桂质廷(1895—1961,1914年赴美)、叶企孙(1898—1977,1918年赴美)等。以后,留学人员数量增加很多。

早年留学国外的人员,大都在当时物理学研究的前沿有所建树。1919年以前获博士学位的有:李复几因光谱学的实验研究而成为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1907);李耀邦进行测定电子电荷的实验研究,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14);胡刚复以X射线的实验研究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18);颜任光研究气体离子的迁移率和气体的黏滞性,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18);等。留学国外的人员,为在中国发展科学事业,几乎都是学成之后立即归国,回国后绝大多数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他们以辛勤的工作为近代物理学日后在中国的成长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三十七章　化　　学

第一节　早期的化学书籍翻译与化学知识传播

西方近代化学知识是随着鸦片战争的硝烟而开始进入中国的。到鸦片战争后期，有一些国人开始学习西方技术，仿造军火和轮船。在这种仿制火药火器的活动中，必然接触到一些酸碱和金属化学知识，这样中国人开始了解到一些零散的西方近代化学知识。如十九世纪初欧洲化学家合成起爆药雷酸银的技术，就在鸦片战争稍后传入中国。道光二十二年(1842)，丁守存在天津制造地雷、火机时进行了仿造，获得成功，并在其《自来火铳造法》中记载了他实验过的硝酸钾和乙醇的提纯方法、硝—矾蒸馏法制硝酸和雷酸银制法等①。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关闭的大门被打开了，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并没有因此而很快传入中国。一方面清廷仍坚持闭关政策，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技之长以制夷”的思想没有受到重视。另

① 潘吉星:《论清代化学家丁守存的起爆药雷酸银合成》,《科技史文集》第15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58—67页。

一方面，自 1807 年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恢复活动的来华天主教士恃船坚炮利为后盾，也不再以科学知识为敲门砖。所以鸦片战争后的 20 年间，传入我国的西方近代化学知识十分有限。

中国人了解独立的化学学科，可能以玛礼逊学堂的学生为最早。该学堂是为纪念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玛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而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学校。1839 年在澳门开办，招收了几名中国幼童入学。1842 年该学堂迁至香港后，曾一度开设过化学课，内容很肤浅①。

在近代早期的西学东渐史上，传教士医师作出一定的贡献。最早的一些西方科学译著大都是他们编译的。如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在译医书时，就编译了一本《博物新编》(1855)，作为其《西医五种》之一。《博物新编》是一本自然科学常识书，它所介绍的近代科学常识，已远远超越了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介绍的科学知识水平。该书共三集，分别讲述了理化、天文和动物学知识。其第一集"地气论"和"水质论"等篇之中介绍了化学知识，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元素理论，并具体阐述了养气(今氧气)、轻气(今氢气)、淡气(今氮气)、炭气(今二氧化碳气)、磺镪水(今硫酸)、硝镪水(今硝酸)和盐镪水(今盐酸)等化学物质的性质和制法。此外，他的《内科新说》(1858)卷下的"东西本草录要"也介绍了一些化学药品的制法。

《博物新编》是第一部介绍了近代化学基础知识的译书，但该书并没有提到化学这一科学分支。最早把 chemistry 译为"化学"并将其作为科学的一个分支来介绍的，是上海墨海书馆的翻

---

①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译家。这是一家英国伦敦会在华出版机构,馆主传教士麦都思聘请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等人与传教士伟烈亚力等合作,翻译了几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植物学著作,较系统地介绍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尽管在他们的译著中,没有一部是化学书,但他们已把 chemistry 一词翻译过来,称为"化学"。他们以"变化"之"化"译以物质反应变化为研究对象的 chemistry 这一学科,极为贴切。据研究,目前所见"化学"一词的最早出处是在墨海书馆佣书的江苏学者王韬 1855 年的日记之中①。稍后,伟烈亚力在他主办的《六合丛刊》月刊上就一再运用此词。伟烈亚力在《六合丛刊》创刊号(1857 年 1 月)"小引"中还把化学与"察地之学"(地质学)、"鸟兽草木之学"(动、植物学)、"测天之学"(天文学)、"电气之学"(电学)、"重学"(力学)、"听学"(声学)和"视学"(光学)等并列,从此化学作为近代科学的一个分支,逐渐为中国人所了解。

1861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一次失败,清廷终于认识到中国再也无法闭关自守了,一部分上层统治者发起了一场"借法自强"的洋务运动,核心就是要学习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军工技术。从 1865 年筹办上海江南制造局开始,一批军工、工矿企业陆续建立,它们都与化学密切相关;许多民用工业品如火柴、肥皂、食品等也离不开化学。化学知识的引进已刻不容缓,在这种形势下,一系列化学译著陆续问世。

1868 年,京师同文馆出版了该馆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著《格物入门》,其中有《化学入门》一册。《格物入门》虽在

① 刘广定:"中文'化学'源起再考",《化学》1991 年第 4 期,台北。

1868 年刊出，但其编译在 1866 年即已完成。《化学入门》分为“总论”、“原质”(元素)、“气类”(气体)、“似气类”(非金属)、“金类”(金属)、“生物之质”(有机物)共六章，采用问答体介绍了 30 种元素及其化合物，已初具化学知识系统的轮廓。

在《化学入门》问世的时候，广州博济书局的美国传教医师嘉约翰与其学生何瞭然，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徐寿和英国人傅兰雅已着手翻译专门的化学书籍。嘉约翰从 1866 年起，在博济医局附设学校讲授解剖学和化学，何瞭然曾从合信氏学医兼及化学，他们在 1869 年开始翻译《化学初阶》，1870 年译成二卷，1871 年刻成印行。1868 年 5 月，在徐寿的请求下，江南制造局专设翻译馆，聘傅兰雅为主要口译人，开始较大规模地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徐寿对化学特别重视，在翻译馆设立之初，他就计划翻译化学书。从 1868 年开始，他与傅兰雅合作，由傅氏口译，他笔述翻译了一系列化学著作，为化学知识的介绍与传播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由于化学专门著作的汉译在当时尚属初次，许多元素与化学概念在汉语中都没有相应的词汇表达，因此必须拟定一套元素与化学概念的汉译名。为此，徐寿等人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1869 年，他们开始翻译《化学鉴原》，同年 11 月之前他们译出了该书第一卷，即概述化学理论的一卷，并添加了“华字命名”一节，阐述元素与化合物的命名方案。关于元素的译法，徐寿等首创了以元素英文名称的第一音节或次音音译为汉字再加偏旁以区别元素的大致类别的造字法，巧妙地将元素名称译为汉字。他们据此新造的汉字元素名称如钙、铍、锂、钠、镍等合乎汉字习惯，几乎看不出是新造的汉字。他们的这一元素译名原则与所译

50 个元素汉名中有 36 个至今仍为我们所习用。而在当时,嘉约翰、何瞭然了解到他们的译名后,就在翻译《化学初阶》时采用了徐寿等人所拟的一些译名。至于化合物的译名,徐寿等除对一些特别常见的化合物采用意译外,一般都译其化学式,“连书原质之名”,如硫酸铜的中文译名为“铜养硫养$_{\text{三}}$”。

《化学鉴原》于 1869 年译完,1871 年作为翻译馆的第一批译书,稍后于《化学初阶》刊印问世。《化学初阶》和《化学鉴原》是最早的两部系统介绍无机化学知识的汉译书,而且它们是根据同一部原著翻译而成,都是译自 Well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Chemistry 的无机部分,原书是美国南北战争前后很流行的课本。著者 David A. Wells(1829—1898)是美国科学著作家和经济学家。《化学初阶》译文比较简略,而《化学鉴原》内容很丰富,译文也比较流畅,被时人誉为“化学善本”。《化学鉴原》共 6 卷,卷一论述化学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如元素理论、亲和力理论、物质分类、原子理论、酸碱理论、当量概念、定组成定律、定比定律、质量作用定律和物质不灭定律等。全书介绍了 64 种元素,从卷二起分类介绍元素及其化合物的制法与性质,是整部书的重点所在。卷二论述气体氢气、氯气、氧气和氮气及其化合物,卷三论述碘、溴、氟、硫、磷、硅、碳等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卷四论述碱金属、碱土金属等及其化合物,卷五论述铁、锰、钴、锌、铅等 22 种贱金属及其化合物,卷六论述汞、银、金、铂等贵金属。由于原书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普通化学课本,它所介绍的化学知识与当时化学的最新水平距离较大,部分内容已陈旧过时,如书中原子量与当量的概念含混不清,还没有正确的分子概念。至于元素周期律在西方化学教材中也是到 19 世纪 70 年代中后

期才被采用。

在介绍有机化学时，徐寿和傅兰雅选择了 C. L. Bloxam（1831—1887）所著《化学》（1867）一书的有机化学部分，译为《化学鉴原续编》，于 1875 年刊行。Bloxam 是伦敦 King's College 的化学教授，所著《化学》从 1867 年初版至 1912 年共出 12 版，是一部很著名的教科书。该书的特点是介绍化学理论不多，而着重论述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制法和应用，故其主体不易受当时化学的飞速发展而动摇。但 Bloxam 对有机化学的兴趣不大，其书有机部分主要取材于他的同事 W. A. Miller（1817—1870）的《化学基础》第三卷（Elements of Chemistry, vol. Ⅲ. organic chemistry, 3rd. ed., 1864—1867），较无机部分逊色①。有机化学被徐、傅译为“生物化学”。《化学鉴原续编》按其不同的来源和制法分类论述当时已知的主要有机物，如氰化物、苯及其衍生物、动植物碱、植物染料、动植物香料、有机酸、醇、糖和金属有机化合物等。由于有机物西文命名都很复杂，徐、傅对有机物名称翻译绝大多数都采用音译，故《化学鉴原续编》一书比较难读。

《化学鉴原续编》译成之后，他们又将原书的无机化学部分译出，称为《化学鉴原补编》，于 1879 年刊行。《化学鉴原补编》主要分类介绍各种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与制备，内容比《化学鉴原》更为丰富，其元素分类较《化学鉴原》更接近于元素周期律。译者还增补论述了新发现的元素镓及其化合物。但《补编》没有介绍当时新的化学理论。徐寿和傅兰雅还根据翻译《续编》、《补

① D. I. Davis et. al, “Charles Loudon Bloxam—A Victorian University and Military Academy Chemistry Teacher”, Ambix vol. 33 (1986), Pt. 1, pp25—29.

编》时积累的化合物译名编成《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85)出版,这是第一部英汉化学词汇表。

《化学分原》(1871)是第一部分析化学译著,由徐寿之子徐建寅和傅兰雅合译,它概述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基本方法和实验。后来徐寿和傅兰雅根据英译本 Manual of Qualitative Chemistry Analysis (new ed. tr. by S. W. Johnson, New York, 1875) 和 Quantitative Chemical Analysis (7th English ed., London, 1876),把近代分析化学之父、德国分析化学大师 Karl R. Fresenius (1818—1897)的两部最有名的分析化学专著译为《化学考质》(1883)和《化学求数》(1883)刊行、Karl R. Fresenius 的这两部著作是十九世纪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面最著名的著作,内容相当详尽,代表了当时分析化学的发展水平。因此,十九世纪介绍到中国的化学知识,与当时西方科学水平最为接近的是分析化学这一学科。

《物体遇热改易记》(1899)译自 Henry Watts(1808—1884)编辑的名著 A Dictionary of Chemistry and the Allied Branches of Other Sciences (London, 1875)中的有关条目。它介绍了气体、液体和固体受热膨胀理论、气体定律、理想状态方程、绝对零度等理论和概念,详细罗列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西方科学家研究液体、固体热膨胀率的实验结果。

上述无机、有机、分析化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表明近代化学知识的引进介绍在洋务运动时期已有一定的系统性。与此同时,江南制造局还译出了不少专门的化工著作和其他化学著作。在化工方面,徐寿等人译有《造硫强水法》、《制玻璃法》、《制肥皂法》和《制油浊法》等。傅兰雅还与汪振声翻译了一部化学工业名

著，即著名的德国工业化学家 Georg Lunge(1839—1923)的 A Theoritical and Practical Treatise on the Manufacture of Sulphuric Acid and Alkali, with Colleteral Branches (London, 1879—1880)，将其译为《化学工艺》(1898)刊行。此书共三集，初集论述硫酸工业，二集论述盐酸工业和吕布兰制碱法，三集介绍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新发展起来的索尔维氨碱法制碱工艺，并论述了漂白粉的制造。另外还有《电气镀金略法》(1881)和《镀镍》(约 1882)，论述金属电镀工艺。在金属化学和矿冶化学方面，有《造铁全法》(1880)、《宝藏兴焉》(1885)和《银矿指南》(1891)等。其中《宝藏兴焉》是根据英国著名化学家 William Crookes (1832—1919)的 A Practical Treatise on Metallurgy (London, 1868—1870)翻译的，详细论述了金、银、铜、锡、镍、锑、铋、汞等金属的矿藏、冶炼与提纯及其物理化学性质，内容相当深入丰富。此书也是徐寿和傅兰雅翻译的。此外，在火药方面，制造局译有《制火药法》(1871)和《爆药纪要》(1880)等；在农业化学方面，译有《农务化学问答》(1899)、《农务土质论》(1902)和《农务化学简法》(1902)。

江南制造局的主要口译者傅兰雅，不仅同徐寿等人翻译了大量的化学译著，他还以自己的力量创办了第一种中文科技刊物《格致汇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和宣传了各种科技知识，其中化学知识在《格致汇编》中占有较大的篇幅。它曾刊登过有关制造玻璃、冰块、啤酒、汽水、蔗糖、火柴、榨油、水泥和造纸等日用化工技术的文章，并连载了傅兰雅和栾学谦翻译的《化学卫生论》一书。《化学卫生论》译自英国化学家 John F. Johnston (1798—1855)所著 The Chemistry of Common Life (rev. ed.,

Edinburg, 1859),论述日常生活中的化学现象和有关化学知识,深受读者欢迎,后来由广学会出版了单行本。化学是实验性很强的学科,但当时制造局没有专门论述化学实验和实验仪器的译书,《格致汇编》中连载二年的《化学器》(1880—1881),填补了这一空白。它译自英国化学家和科学仪器制造商 John J. Griffin (1802—1877) 的 Chemical Handcrift—a Classified and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Chemical Appartus (2nd. ed., London and Glasgow, 1877),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化学实验室常用工具、衡量仪器、容热量热器、分离分析仪器等,并附有大量的插图。《格致汇编》曾多次重印,各册印数达数万份以上,远远多于制造局译书的单种销量,《化学卫生论》和《化学器》还印行过单行本,因此《格致汇编》传播化学知识的作用未可低估。鉴于当时许多人对制造局译书感到深奥难懂,傅兰雅还根据局译化学书,编写了《化学易知》(1880)和《化学须知》(1886)等入门书,便于初学。

十九世纪下半叶,翻译化学书的还有京师同文馆化学教习、法人毕利干(Anatole A. Billequin, 1837—1894)及其学生、同事。毕利干等译有《化学指南》(1873)和《化学阐原》(1882),前者是一部普通化学教材,后者与《化学考质》底本一致,也是 Karl R. Fresenius 的定性分析专著。但毕利干译书中所造元素名称的新字笔划十分繁琐,不合汉字习惯,译文佶屈聱牙,故流传较少,影响较小。

一系列化学译著的出版,改变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化学知识引进与传播的落后状况,到十九世纪末,化学知识的介绍甚至可以说已走在数学、物理等学科的前头。当时许多探求科学

知识的人士都非常重视化学。有人认为“制造功夫，以算学为体，以化学为用”，又有人认为化学应用广泛，因而“冠乎声学热学光学电学之上”，甚至还有人认为“化学实为诸学之根”①。当然，依赖译书学习化学知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绝大多数译书都是英美流行的教科书，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化学新发现和新理论一般都没有介绍过来，化学各分支学科虽大都有译本，但除无机、分析化学外，其他都只有唯一的译本；其次，即使是最好的译书，一般人也感到难读难懂，真能理解其科学内容的人实在很少。因此，人们从译书中获得的化学知识是十分有限的，有时免不了闹笑话。比如，到 1890 年，已知的元素已不止 64 种，但当时译书只介绍了 64 种元素，有人竟将 64 种元素与 64 卦相比附。

第二节　化学教育的形成

翻译介绍化学知识，目的在于培养中国自己的近代化学家。徐寿等通过译书而具有一定近代化学知识的人才，可称是中国第一批近代化学家。他们通过翻译化学著作，传播了化学知识，对化学科学在我国的建立有筚路蓝缕之功。他们还利用自己的化学知识，对洋务运动时期建立新式工矿企业有所贡献，如徐寿为江南制造局龙华分厂建硫酸车间(1874 年)，徐建寅在山东机器局和湖北枪炮厂设计制造火药，徐华封在淄川矿厂冶炼铅矿等。但这一批人人数很少，根本不能满足洋务事业的需要。当时还有一些人通过学习化学译书掌握了一些化学知识，但他们的

① 见王韬编《格致课艺汇编》卷 4。

水平有限，根本不是化学专门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需要专门的教育，这就迫切需要变革传统的教育制度。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洋务派兴办了几所新式学堂，尝试外语与科技教育。但是由于科举制度没有改变，风气不开，洋务派对科技发展支持不力，在甲午战败以前，化学教育进展甚微。

中国近代第一所学堂是京师同文馆，官办学堂中最早实行化学教育的也是同文馆。1866年，该馆拟议科学教育计划，并聘请外人当教习。次年，通过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聘法国人毕利干为化学教习。毕利干曾在法国著名化学家 Jean B. J. D. Boussingault (1802—1887)的实验室工作过，来华前担任另一法国化学家 Anselme Payen (1795—1871)的助手。1871年毕利干来馆执教，至1890年返回法国，继由德国人施德明(Carl Stublman)担任化学教习。同文馆初期的两名优秀学生承霖和王钟祥，曾先后任化学副教习①。

同文馆的化学课，分用中文与外文授课两种。中文化学课，选修者主要是从一些略知化学者中招取的主修化学的学生，这些学生多用《化学指南》、《化学阐原》为教材。但他们不懂外文，难以深造；还有一些年龄大的学生，在"格物"课内兼习化学，也用汉文讲课。同时还开设了外文化学班，供一些有一定外文基础的学生选修，年限不定。教育内容以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为主。1876年，同文馆还建立了化学实验室，学生在实验室可学做一些基本操作和实验。据说在同文馆所有科学课程之中，学生最喜

---

①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883年版，第32—66页。

欢化学。但是该馆培养的科学人才微乎其微，它的大多数肄业生都以翻译或教书为业，少数化学优秀生曾在天津等地的机器局任职。

徐寿对化学教育也曾努力尝试。1876年，他与傅兰雅等创建了格致书院。他们购置了一些简单的化学仪器。1883年，该院曾拟聘一名外国人来院开设化学、矿学课，因缺乏经费而作罢。1889年，聘到一英国人来院执教，但此人不久就病故了。直到1895年以后，傅兰雅等人在书院开设了周末教演班，讲授数学、化学知识。栾学谦《格致书院讲演化学记》所记叙的正是1897年讲化学时的情景①。当时，连《化学鉴原》中的基础知识听众都诧为惊奇，说明洋务30余年间，化学知识的传播还十分有限。光绪初年，浙江瑞安孙诒让、平阳杨镜澄等人办过一所瑞平化学堂，但不久即解散。

洋务运动时期，在教育方面最大胆的尝试是向国外派遣留学生。首先是选派幼童到美国学习，自1871—1874年，陆续有120名幼童赴美，准备学习科学技术。但他们绝大多数还未进入大学或专科学校或未完成大专学业即于1881年被莫名其妙地撤回，学习中途夭折。而且这批留美学生以学习工程技术和电报的人最多，专门学习化学的实无一人。但当时美国大、中学校已有普通化学课，他们当然也因此而掌握了一定的化学知识，且远胜于国内通过译书学习化学。1877—1886年，福州船政学堂选派了几批学生到英、法等国深造。船政学生大都是学习造船和驾驶，但其中学习制造的七八个学生在法国学习矿务学。化学是近

① 《新学报》第三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

代矿学的重要基础之一，这些留学生在巴黎国立高级矿务学院等校学习，已经受到了比较系统的化学训练。陪同第一批留学生的随员翻译罗丰禄，曾进英国伦敦 King's College，受教于化学家、《化学鉴原续编》与《补编》的原作者 C. L. Bloxam，他是当时唯一的专门学习化学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 1880 年都回到了国内，有的主持炼铁炼钢等工作，有的发现了福州穆源铁矿。他们虽不以化学为业，但其化学水平在当时国内远在他人之上。

教会学校较早开设化学课的有山东登州文会馆，其创办人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该馆前身是蒙养学堂，创建于 1864 年，狄考文曾为该学堂建一个极其简陋的理化实验室。1873 年，学堂增设中学课程。1876 年改名为登州文会馆，其后科学教育大为进步。该馆学生在第五、六年学习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采用江南制造局译书为教材，另外狄考文自编有《理化实验》(未刊)。文会馆用中文教学，其毕业生科学水平较高，为当时教会学校争相延聘。狄考文的一名学生丁立璜，学习理化仪器制造专业，在二十世纪初办过一所山东理化器械制造所，为当时全国第一家①。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主要的教会学校如上海圣·约翰书院、苏州博文书院、杭州育英书院、南京汇文书院等都开设了化学课。这些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其中有些人担任了清末学制改革后所办初、高等学堂的化学教师。

在编写教科书和统一化学术语方面，传教士们也做过一些工作。早在 1877 年，新教传教士就组织了学校教科书编撰委员

① 张汇文:《一所早期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文史资料选辑》(上海) 1978 年第 2 辑(总第 22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会即益智书会，该会的非传教士主编傅兰雅编写了《化学易知》和《化学入门》等书。到十九世纪末，传教士厚美安编译了《化学入门》(1889)，福开森(J. C. Ferguson，1866—1945)编译有《化学新编》等。同时，传教士也很注意科学术语的翻译与统一工作。1891年，益智书会下设科学术语委员会，起初由傅兰雅整理化学名词。1896年傅氏赴美后，由狄考文、赫士(W. H. Hayes)、嘉约翰等人负责。1898年，他们发表了《修订化学元素汉译名表》，1901年又出版了狄考文主编的《化学术语与命名法》(Chemical Terms and Nomerclature)。他们拟译了71个元素的译名，对元素译名也有所改进，如气体元素一律加"气"字头(吸取了杜亚泉《亚泉杂志》的做法)；但他们不尊重徐寿和傅兰雅的元素译名已被大部分接受的事实，对大量的元素译名进行了重译或改译，其新造汉字却很繁琐别扭，故很少有人沿用。《化学术语与命名法》的主要篇幅是无机物的命名方案，其中acid先前译为"镪水"，他们改译为"酸"，salt译为"盐"和"礬"，oxide(氧化物)译为"锈"，等等。"酸"、"盐"和"锈"等字一律置于译名之尾，据此他们列出了近千种无机物的译名。这本术语译名出版的时候已临近中国人大量翻译日文科学书籍之时，故而影响较小。

留日运动是在甲午战败，特别是1900年义和团失败后兴起的。1894—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日本，以求强求富为标榜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甲午战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导致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科学技术落后这时仍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就表明，洋务运动中小打小闹的教育变革是远远不够的。甲午战争后，出现了要求变革社会的维新运动，教

育改革为其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这次百日维新最终失败。但是，改革和废除科举制度，已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1901年，教育改革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1901年，清廷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与此同时，清廷还鼓励青年出国留学，特别是留日。在此前后，许多青年为救国求知而赴日留学。

1900年，留日人数超过了先前留学欧美人数的总和。1904年，留日生达3000人，1906年近2万人。其中学习化学科和应用化学科者不乏其人。留日学生在留日期间就开始翻译日文书刊，同时国内许多人也自学日文竞相译书。当时人们认为西书价贵，日译西书众多而价廉，读日译书实如读西书，故译日文书既经济又迅速。一时编译日文书的热潮蓬勃高涨。但是，初期人们关注的中心是社会政治制度，译书以政治历史为主，科技译书较少。在1904年学制改革之前，译自日文的化学书，仅有虞和钦等译的《化学实用分析术》(1902)、樊炳清等译《近世理化示教》(1902)等少数几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杜亚泉(1873—1933)在上海创办《亚泉杂志》，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种科学杂志。同《格致汇编》一样，该刊以译文为主，惟多译自日文期刊。此刊内容以化学为主，刊登了“化学原质新表”；介绍了十多种新发现的元素，其中有惰性元素氩、氦，放射性元素镭、钋等，还专门介绍了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亚泉杂志》仅出10期，次年四月停刊①。

1904年1月13日，清廷颁布了“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推行新的教育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教育制度的一次巨大变

① 杨根编：《徐寿和中国化学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革，科学教育终于纳入了新的教育体制之中。

癸卯学制分为初、中、高阶段教育。第一阶段初等教育包括初、高等小学堂各五年，在高小第二、三学年，格致课讲授物理与化学知识，其中化学讲授“寻常化学之形象”和“原质及化合物”。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五年，第五年设化学课，“先讲无机化学中重要之诸原质及其化合物，再进则讲有机化学之初步及有关实用重要之有机物”，并要求教学“本诸实验”以“得真确之知识”。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其中高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至四年，通儒院五年。高等学堂分为三类，预备入经学、法政、文学、商科者不设化学课，预备进理工农医科者必修化学，在第二年讲“化学总论”和无机化学，第三年讲有机化学。大学堂分为八科，其中格致科下设化学门，农科下设农艺化学门，工科有应用化学门。此外工农医各科各门也都有相应的化学专业课，如医化学、制药化学、卫生化学、物理化学、森林化学、电气化学、制造化学等。格致科化学门相当于理学院化学系，除数学、物理课外，设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化学实验、应用化学、理论及物理化学、化学平衡论等。工科应用化学门，开设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化学史、制造化学及实验、化学分析实验、电气化学、试金术及试金实习、冶金学、矿物学等课。大学堂第三年毕业时，要求“呈出毕业课艺及自著论说”，即做毕业论文。通儒院相当于研究生院，分科分专业进行学术研究①。

除上述正规直系教育系统外，癸卯学制还制定了师范教育章程，分为初级、优级师范。初级师范培养初、高小学堂师资，优

①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

级师范培训初级师范和中学堂师资。初级师范设有化学课,优级师范有一类专门培养理化师资力量。

癸卯学制主要是参照日本的学制而制定的。清末民初,学制虽几经变更,但大都以此为基础,只略有损益。它的颁布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有极其重大的影响,从此科学不再仅仅是少数热心者的爱好,而成为国家的事业,中国科学逐渐走上了体制化的道路。

新学制颁布后,各级学堂如雨后春笋,迅速建立起来。各类学堂迫切需要化学教材,因此大量的日文科学教科书被译介过来。据初步统计,1903—1911年间,译自日文的化学教科书有40种之多,它们一般都是中学堂课本,如余呈文译《中等化学教科书》(1905)、虞和钦译《中等化学教科书》(1906)、敏智斋主人译《中等教育工业化学》(1906)、何燏时译《中等最新化学教科书》、张修爵等译《最新实验化学教科书》(1905)、胡朝阳译《普通化学教科书》(1907)、虞和寅译《近世化学》(1907)、范迪吉等译《无机化学讲义》(1908)和《有机化学讲义》(1908)、杜亚泉译《化学新教科书》(1911)、张修爵与彭树滋译《最新化学实验教科书》(1911)等等,也有不少师范教材,如江苏师范编译的《化学》(1906)、黄乾元译《化学》(1905)、严保诚译《化学》(1907)等。这时也有少数译自西文的化学教材,如曾宗巩译《质学课本》(1906)、徐兆熊译《无机化学教科书》等。这些丰富多样的教材很快就取代了先前仅有而早已陈旧的江南制造局等洋务运动时期的化学译著。大量的日文化学术语也随译书而传到中国,为我国拟定化学用语时采用,如"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元素"、"分子"、"原子"等等都是借自日文的化学

名词，而以前徐寿等人译书的术语除元素名称外，大多摒弃不用了。除使用译书外，某些中学堂还直接使用外文教材，如天津南开中学用英文，湖南民德中学用日文教材。

清末民初化学教育的进步还表现在大多数省立高等学堂都开设了化学课，如浙江、江南、山东、山西、两湖、广东、江西、四川等省高等学堂，一律有无机、有机化学课。各校师资或聘自英、美、日等国，或由教会学校如登州文会馆、杭州育英书院等校毕业生担任，也有一些留日回国者。这些高等学堂多用外文授课，一律采用外文原版教材。直到二十年代，才有国人自编高等化学教科书，但一般高校仍采用外文教材。

至于化学系的设立，虽然癸卯学制已有计划，但迟至1910年京师大学堂才分科，格致科下设化学门，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化学系（即北京大学化学系前身）。京师大学堂化学门的学生都是预科德文班的学生。因为当时认为德国科学最发达，欲通科学必通晓德文，故分科时，德文班学生全部分到了格致科。

京师大学堂格致科化学门也是当时唯一的化学系，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等都不设化学门。因此绝大多数学生都只受到了大学预科的化学教育，国内还无法培养相当于国外正规大学毕业的化学专门人才，于是许多青年纷纷赴欧美留学。与留欧相比，留美是后来居上。特别是庚款留美生选派，推动了留美高潮的到来。1909—1911年，游美学务处进行了三次选拔考试。1911年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成立，同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皇朝终于覆灭，许多人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应该提倡科学和实业了，所以，抱科学救国主张而奔赴欧美留学的人日益增多。他们绝大多

数都学习理工农医。经过几年的努力，留美留欧生中有一些人以化学为专业，获得了所在国家的博士学位。据初步统计，1918—1930 年，我国留美学生，以化学(含生物化学、化学工程)为专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者达 41 人。留欧生获化学博士学位者更早，但人数比留美者略少。此外，还有许多获得学士或硕士学位的化学或相近学科的毕业生。他们绝大多数都陆续回到了祖国。

这些学成回国的专门人才是我国第一批现代化学家。他们在欧美受到了系统的科学训练，从事过现代化学研究。他们的回国大大缩短了我国与世界化学先进国的距离。他们中有不少人成为我国现代化学教育与研究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正因为他们回国，在 20—30 年代，我国一批高等学校建立了化学系；同时，还成立了一些专门的化学研究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1928)、北平研究院理化部(1929)、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1922)、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1929)和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1932)等。



第三十八章　地　学

清末民初时期，在引进和吸收西方近代地质、地理和气象学思想的基础上，中国的新地学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早在16世纪末（明末），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许多西方地学著作、思想和方法，已经开始在我国传播。但是由于清朝实行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使这一传入的发展极为缓慢，而且只对中国极少数的有识之士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入侵和“洋务运动”的兴起，西方地学知识再次大规模传入我国，加之我国一些知识分子的积极学习、引进，使西方地质、地理和气象学的思想、体系在我国的影响不断扩大，并且逐渐取代我国古代传统地学，成为中国地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地　理　学

1840—1919年，是中国地理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时期。一方面，中国传统舆地之学仍焕发着余辉，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另一方面，西方地理学知识的大规模传入，使新地理学开始萌发和建立。

中国近代传统地理学的主要成就

1840—1911年，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在整体上处于缓慢或停滞发展时期。但是，以为现实服务为宗旨的地理学，仍取得了累累硕果。①

1. 方志的兴盛。

作为中国古代地学著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方志，在清代进入鼎盛时期。其成书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分布区域之广，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同时，在编撰实践中，方志学逐渐发展起来。

发轫于西晋的地理总志，历经几代的发展逐渐走向成熟。官修全国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经3次修撰，终于在1842年完成。这部560卷的巨著，体例严谨、考核精详，并集图、表、志于一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编撰最好的全国地理总志。

2. 地理考证的发达。

清乾嘉时期形成的以考据见长的地理学派，至清末民初得到继续的发展，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

清末民初从事《水经注》研究的学者颇多，其中较著名的学者和代表作为：王先谦(1842—1917)以30年之功于1892年完成的《合校水经注》一书；杨守敬(1835—1915)和弟子熊会贞(1859—1936)集清代《水经注》之大成于1904年完成《水经注疏》40卷初稿及《水经注疏要删》等书。

① 参见杨文衡主编：《世界地理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454页。

清代以地理考证著称的大家丁谦(1843—1919)首次对我国历史上边疆和域外地理著作29种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考释。其研究成果由浙江图书馆于1915年出版,书名《蓬莱轩舆地丛书》(又称《浙江图书馆丛书》),分2集共69卷。

3. 大型历史地图集问世。

1911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辛努力,杨守敬和弟子熊会贞编绘的大型历史地图集《历代舆地图》全部刻成。它共358卷,分45个图组,装订成34册。此图集前为《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概略表示历史疆域大势;后为《历代舆地图》,自春秋至明代,以朝代为序安排图幅,表示其统治势力的范围、行政区划、山川等。这一图集,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绘制技术较以前图集更科学和精确。它是当时最完整的大型历史地图集,是中国古代舆地学最重要成就之一。

4. 边疆世界地理研究的繁荣。

鸦片战争后,由于边患日益严重,一些爱国学者痛感边疆和世界地理知识的贫乏,因而开始积极调查和研究边疆世界地理,撰写了大量的边疆域外世界地理著作。

曹廷杰(1850—1926)是清末第一个对东北地区的边疆史地进行全面调查和研究的学者。1883、1885、1895年,他曾三赴吉林任职。其间,十分注意边务。1885年,他完成《东北边防辑要》2卷,系统汇辑和研究了东北古代战守险要、边界沿革等方面的文献。同年十二月,他又完成《西伯利东偏纪要》,记述这一地区的地理险要、道路出入、兵数多寡以及与边防有关的军事遗迹等。1887年出版的《东三省舆地图说》汇集了他关于东北史地的学术札记。这一时期,关于东北边疆地理的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

何秋涛的《朔方备乘》(1858 年)、宋小濂的《北徼纪游》(1890 年)、吴禄贞等的《延吉边务报告》(1908 年)等等。张穆(1805—1849)著、何秋涛校补的《蒙古游牧记》16 卷于 1867 年刊印,书中较详细地记录了内、外蒙古的地域、沿革、事迹等。姚莹(1785—1852)特别注意英国对西藏的觊觎,在对西藏进行了考察后,著《康酋纪行》,对西藏的地理、人文、气候、民俗等作了记载。

魏源(1794—1856)和徐继畬(1796—1873)是清代积极编写世界地理著作作者中最杰出的人物。魏源的好友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时,曾组织译员翻译了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等书,编译成中国最早的世界地理译著《四洲志》。林则徐离粤时,将多年收集到的资料和《四洲志》初稿交给魏源。魏源以此书为基础,大加增补,于 1842 年出版 50 卷本的《海国图志》。此后二次再加增补,于 1848 年出版 60 卷本,1852 年出版 100 卷本。这部图文并茂的巨著,记述了当时世界地理范围几近所有已知世界,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名著之一。书中所附 84 幅地图,可以组成一册世界地理地图集。此书对我国近代的"洋务运动"和维新活动,都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它还传入日、朝、英、俄等国,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其中在日本流传最广、刊本最多,对明治维新运动有较大的影响。徐继畬久驻闽广,悉心收集世界各国的资料,编撰成 10 卷本的《瀛环志略》于 1848 年出版。此书较全面地介绍了当时世界各国的疆界、位置、山脉、河流、地形、气候、物产、风俗、人种和历史等,并附地图 40 幅,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名著之一。

1897 年,清代王锡祺(1855—1913)编汇的中国古代最大的

地理丛书之一《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出版。此书收录 600 余位中外地理学家的论文近 1500 篇，其中边疆和世界地理占有很大的篇幅。

近代地理学的萌芽

鸦片战争以后，作为了解世界的首要对象和手段的地理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以崭新的面貌出现。首先，地理学不再是历史的附庸，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次，它逐渐摆脱古代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体系，开始走向近代科学地理学的道路。

1. 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播。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地理学知识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传入我国：

一是来华的外国人，其中不乏知名人士（详见地质部分）。他们的工作对西方人研究中国有较大的帮助，但是对 1919 年以前中国地理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大。

二是赴国外任公职和观光的中国人。这其中的不少有识之士，在国外时留心观察和记录国外的风土人情，归国后编撰旅行记，扩大了国人的地理视野和加深了他们对世界地理的认识。如中国近代著名学者黄遵宪（1848—1905）先后出任日、美等多国外交官，他于 1887 完成了 40 卷的《日本国志》一书。1897 年，湖南新学书局出版《游记汇刊》，收集十九世纪末编撰的域外旅行记 16 种共计 21 卷，其中包括邹代钧的《西征纪程》、李凤苞的《使德日记》、曾纪泽的《出使英法日记》和黄懋材的《印度札记》等。

三是留学人员。他们是1911年以前西方地理学知识传入中国的中坚力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大批出国留学的人员中有不少人主攻地理学。他们中的不少人在留学期间就开始翻译地理学著作,向国人介绍西方的地理学知识和理论。1900—1911年,中国出版的大量地理学译著中多数都是留学生翻译的。这些地理学译著有几个特点:(1)几乎都是适应初中水平读者的普及性著作;(2)以日文译著为主;(3)区域地理著作所占比重较大。这一时期出版的地理学译著的最大缺陷是没有一本近代西方地理学的代表作问世。

2. 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启蒙者邹代钧①。

邹代钧(1854—1908)受祖父和叔父的影响,自幼爱好舆地之学。成年后,通晓历代疆域沿革和江河迁徙,尤精于测绘地图。1886年,他随刘瑞英出使英俄,行程"海道二万九千四百四十里","陆程二千四百八十里"(邹代钧《西征纪程》)。在国外期间,邹代钧潜心学习和研究西方测绘地图新法。1889年,他带着欧美各国地理图籍多种回国。归国后不久,邹代钧先后撰写《上会典馆书》和《湖北测绘地图章程》,较为详细地介绍西方测绘地图的新方法、新仪器等。甲午战争后,他又在武昌创立译图公会(后改称"舆地学社"、"舆地学会"),积资编译中外名图,以推进地理学的发展。此会是中国地理学方面的最早组织。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邹代钧主持实测和编绘了大量地图,并设法刊印。这些绘制精细、印刷精美的地图成为当时地图中的精品。此外,邹代

① 参见张平:《邹代钧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萌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81—90页。

钧还撰写了大量的世界各国地理志和边防地理著作。

3. 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张相文①。

张相文(1866—1933),字蔚西,号沌谷,江苏泗阳人。甲午战争时期,他经常阅读地图了解战局,从此开始研究地理学。他在认真学习研究我国地理著作的同时,积极学习和吸收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创立了我国近代地理学。

(1) 编著出版了我国第一批地理教科书。

张相文一生主要以教书为职业。他早在1899年就开始在南洋公学教授地理课,此后又在天津北洋女子高等学校和北京大学从事地理教育。在地理教学中,他吸收西方地理学知识,结合我国特点,编著了我国第一批地理教科书,如1901年初刊的《初等地理教科书》(上海南洋公学)、《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上海兰陵社)和1908年初刊的《地文学》(上海文明书局)。我国有教科书始于地理学,"教科书"一词由此创立。前两书的发行量达200万册以上,影响极大。《地文学》一书则是国人自编的较早的一部自然地理学著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相文在书中首先增加了生物界一编,将无机自然界与有机自然界联系起来,这是中国近代地理学上的一个重要进展。

(2) 创立中国地学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

为推动中国现代地学的发展,张相文积极筹建地学学术组织。1909年9月28日,在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召开了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大会。张相文当选首任会长。该会以全面研究地学,坚

---

① 参见林超:《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第150—159页。

持爱国进步,谋求救国救民为宗旨。它拥有一批著名的学者,并聘请了外国名誉会员。学会在困难的环境中坚持各种活动,是民国初期中国地理学最重要的组织之一。中国地学会的成立促进了中国舆地之学向近代地理学的转化。

(3) 创办我国第一个地学学术期刊——《地学杂志》。

中国地学会成立之后,张相文就决定要编辑出版学会会刊。1910年2月,《地学杂志》第1期出版。开始为月刊,后来因经费不足出版周期时常变化,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被迫停刊。28年间,共出版181期,刊载论文1500多篇,各种地图大约140幅。《地学杂志》早期刊登的论文偏重自然地理学和地质学,后期侧重人文地理学。这些文章以新的观点论述地学事物的成因及其发展变化,突破我国传统舆地学单纯记述地理现象的旧框架。该刊既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科学期刊,又是中国最早传播新地学的刊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地学的发展。

第二节　地　质　学

1840—1919年,中国地质学经历了引进西方近代地质学和综述外国人的地质调查结果两个阶段后,终于建立和发展起来。

外国地质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

西方地质科学传入中国,始于十九世纪中期。一些传教士在编写书刊中,已涉及到一些地质学知识。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 Muirhead,1822—1900)首次将地质科学知识较全面地介绍给

国人。他的以中文撰写的《地理全志》下编(上海墨海书馆,1854年)卷一为“地质论”,这是近代意义的“地质”在中文文献中首次出现,并沿用至今。书中还分层叙述了地层,并附有一张地质年代表。

至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地质学开始较为系统地传入中国。晚清最重要的译书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就出版了多部地质矿物学译著:初刊于1872年由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口译、华蘅芳笔述的《金石识别》12卷译自英国代那的《矿物学手册》(J. D. Daina, Manual of Mineralogy),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西方地质学译著;初刊于1873年,亦由玛、华二氏翻译的《地学浅释》译自英国雷侠儿的《地质学纲要》(C. Lyell, Elements of Geology),首次完整、系统、详尽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地质学的基本知识和主要内容。此外,该馆还先后出版了舒高第与郑昌棪合译的《链石编》、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与徐寿合译的《宝藏兴焉》、傅兰雅与应祖锡合译的《银矿指南》、傅兰雅与潘松合译的《求矿物指南》和王汝驹译《相地探金石法》等译著,对西方地质学在中国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一时期,译著多是国人与外国人合作完成,术语的翻译多较蹩脚。

至本世纪初,国人始大量独立翻译外国地质学著作,其译著的水平亦有较大的提高。1900—1911年,中国有几十种地质学译著出版。这些译著主要是地质学教材,且多译自日文著作。它们对在中国普及地质学知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外国人在华的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

1840年后,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不同身份和目的的地学家蜂拥来华,进行探险和资源考察,并撰写了一批报告和专著。这些从总体上说是为列强侵略中国服务的考察和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地学的发展。下面仅记述其中较为重要的几个人及其贡献[①]:

美国庞佩利(R. Pumpelly,1837—1923)是第一位在中国进行地质考察的地质学家。1863—1865年,他先后考察了东北、华北和长江下游一带。1866年,发表他的考察报告《1862—1865年在中国、蒙古、日本的地质调查》。他发现了黄陵背斜,提出了"震旦上升系"的概念,并首次综合中国地质史。他的学生维理士(Bailey Willis,1857—1949)于1903—1904年来华考察,回国后发表的名著《在中国的研究》(1907—1913)在中国地层划分及构造地质学方面有一定影响。

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P. S. von Richthofen,1833—1905)先后二次(1860,1868—1871)来华,足迹遍及十几个省市区,归后发表5卷本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1877—1912)。他提出的中国黄土风成说以及他对中国地质构造和主要地层的论述,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清末民初时,俄国地理学会多次组织考察团来华考察。其中

① 参见吴凤鸣:《1840至1911年外国地质学家在华调查与研究》,《中国科技史料》1992年第1期,38—39页。

普热瓦尔斯基(H. M. Пежевалбский,1839—1888)于1866—1885年4次来华考察了乌苏里流域、蒙古、华北、新疆、西藏等地,是最早而影响较大的亚洲中部的地理考察者。归国后陆续发表了6卷本的考察报告。奥勃鲁契夫(B. A. Обручев,1863—1956)于1892—1895年4次来华考察,回国后发表了多部著作,其中提出了中国黄土风成说。

日本人的考察主要在东北。本世纪初,他们先后成立了"满洲产业调查会"、"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矿产部地质课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等机构专门从事东北地区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 A. Hedin,1865—1952)也是来华考察学者中比较著名的一位。1885—1930年间,他先后6次在我国考察,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回国后发表许多著作。

中国地质科学的建立

1. 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章鸿钊①。

章鸿钊(1877—1951)字演群,浙江湖州人。1904年以第一名考取上海南洋公学东文学院。不久赴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师从日本著名的地质学家小藤文次郎。1911年夏学成回国,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的地质学讲师,是中国高等学府中第一位教授地质课程的中国教师。翌年,任地质科科长。此后又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国地质学会第一任会长。

① 参见吴凤鸣:《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章鸿钊》,《中国科技史料》1994年第1期,第29—41页。

章鸿钊深感地质事业与祖国建设关系重大，一直积极、热情地宣传和介绍地质科学，并制定计划、培养人材、发表论著，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中国地质事业。早在日本学习期间，他就翻译日本井上喜之助所作《世界各国之地质调查》一文(《地学杂志》1910 年第 3、4 期)，向国内介绍世界各国地质调查事业的概况。1911 年，他出任地质科长后，即草拟公文下达各省征调地质专门人材、地质参考品、各省舆图和矿山区域图说，并发表《调查地质咨文》。同年，他又发表《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一文，论述中国地质在世界中所占地位、我国地质调查的时机和调查计划，并附有地质讲习所章程等，为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制订了一幅发展蓝图。此后，他又与丁文江、翁文灏合作，共同开创了中国近代地质事业。

2. 地质教育事业的创办。

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首批官办的新式学校中，有不少已设置了有关地质学方面的课程，如京师同文馆(1862 年)开设了以矿物学为主的“金石”课，福建船政学堂则已列有地质学的课目。1889 年，广东水师学堂始设矿学堂，此后以矿业服务为主旨的矿务学堂在各类学校不断创办。1902 年颁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 1904 年颁布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均将地质学列为必修课程之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立志振兴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有识之士陆续赴国外学习。邝荣光是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的成员之一，是中国最早留学学习地矿的学生之一。1901 年，王宠佑(1879—1958)赴美学习采矿和地质，1904 年获硕士学位。此后留学生陆续回国，为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1909年，中国最早的高等地质教育机构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格致科内创立——地质学门。但是直到1913年只有2个学生毕业。此后因学生太少而停办，直到1917年方恢复，并改称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由曾留学美国的何杰(1888—1979)任系主任，留学德国的王烈(1887—1957)任教授，1920年孙云铸(1895—1979)等8人毕业。此后该系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地质教育机构之一。①

1913年10月，北洋政府工商部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地质研究所，先后由1911年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丁文江(1887—1936，同年11月离职)、章鸿钊任所长。这个研究所实际上是一个培养地质专业人材的学校，是民国初期最重要的地质教育机构。其教师多数是兼职的，只有毕业于比利时鲁文大学的翁文灏博士一名专职教员。这所3年制的学校，招收了30名学生。他们在学习基础课的同时，还系统地学习了有关地质学方面的知识，并且进行了十余次的野外地质调研。1916年7月，举行了毕业典礼，共有22名学生参加，其中18名拿到了毕业证书。这些毕业生多数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与此同时，学校宣告结束。这所开办仅3年的学校，却在中国地质事业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在1922年成立的中国地质学会的26名创立会员中有10名出自这所学校。而且其中多数成为中国地质界颇有影响的骨干。②

① 参见于洸：《关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早期的几件事》，《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2期，第81—84页。

② 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学简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145页。

3. 地质管理和科研、调查机构的创建。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务司下设立地质科，由从日本回国的章鸿钊任科长。这是我国政府机关中最早的地质机构。1913年1月，政府北迁后，地质科改由工商部矿政司管辖，章鸿钊辞去科长之职，由丁文江接任。当时科里仅有一个科员、两个佥事，而且都不是学地质的。丁文江上任后就与矿政司长张轶欧商量，并呈工商部批准，改地质科为地质调查所。1916年1月，地质调查所一度改名地质调查局，张轶欧兼局长。同年10月，仍改回原名，所长仍为丁文江(1921年离职)，所址设在北京西城区丰盛胡同3号。同年分配到所工作的地质研究所的毕业生极大地加强了其科研力量。1919年，该所先后创办《地质汇报》和《地质专报》两种不定期刊物，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地质学学术刊物。这个所是民国时期历史最悠久的中央级地质科研和调查机构。①

4. 地质研究的主要成果。

二十世纪初，留学生在积极学习和吸收西方近代地质学理论的同时，开始以这些新的思想和方法调查和研究中国地质，并在较短的时间里开创了中国地质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②

1903年8月，中国著名作家、当时在日本学习地质学的鲁迅(1881—1936)以“索子”为名，在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第8期上以文言文发表题为《中国地质略论》的文章。这是中国第

① 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调查所史》，石油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参见黄汲清:《辛亥革命前地质科学的中国先驱》,《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2期;黄汲清:《略述中国早期地质工作中名列第一的先驱学者》,《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1期。

一篇以近代地质学理论研究中国地质的论文。1906 年 7 月，他与同学顾琅（生卒年不详，1902 年赴日本留学）合编的《中国矿产志》（内附《中国地质矿产全图》）由上海普及书局出版。这是国人首次以地质科学为依据对本国矿产所作的初步概括。

1910 年，留学归来、时任直隶全省矿政调查局总勘矿师的邝荣光，先后在《地学杂志》上发表了 3 种在中国近代地质学上有重要开创性的图版：第一种《直隶地质图》（1∶250 万）发表在创刊号上。这张彩色图中的大部分内容是作者实地踏勘的结果。它虽然简单、粗糙，却是国人自编的第一幅地质图。第二种《直隶矿产图》发表在第 2 号上。它标明了中国煤、铁、铜、铅、银、金的产地。第三种《直隶石层古迹图》发表在第 3—4 号上。它印出三叶虫、石芦叶、鱼鳞树、凤尾草、蛤、螺、珊瑚和沙谷棕树 8 种化石。其绘画相当精美，是国人自己采集、自己绘画、自己初步鉴定的化石，也是中国人的第一幅古生物图版。

1911 年，章鸿钊以《浙江杭属一带地质》论文获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理学学士。此文是中国地质学者系统研究中国地质的开端，可惜未公开出版。

1912 年，翁文灏（1889—1971）以《勒辛地区的含石英玢岩研究》一文获比利时鲁文大学的博士学位。翌年，这篇被列为最优等的论文在鲁文大学地质专刊上发表。这是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发表的第一篇博士论文。

1913 年底，丁文江邀德国人梭格尔等人赴正太铁路沿线作地质调查。这是地质调查所成立后的第一次野外调查，是国人进行系统的野外地质调研和地质填图的开端。其考察报告《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刊登在 1914 年出版的《农商工报》

第1卷第1期上,是国人以中文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报告。1914年夏,他又独行滇东、滇北200余日,成为国人开展边远地区大规模地质调研的第一人。

1916年,翁文灏等人编写的地质研究所野外实习的成果《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一书由京华印书局出版。这是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本区域地质专著。

1917年6月,丁文江在英国《远东时报》上发表《中国的煤矿》一文,是国人撰写的第一篇关于中国矿产资源的论文。1919年,翁文灏在《地质专报》乙种第1号发表270页的巨著《中国矿产志图》,首次对中国矿产资源进行系统的论述。书中所附1:600万的《中国地质约测图》,是国人自编的第一张全国地质图。

1918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的李四光(1889—1971)完成硕士论文《中国地质大纲》,1921年在英国《地质学杂志》上发表。此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地质的概况。

第三十九章 生 物 学

第一节 西方生物学的东传与西方人在华的生物采集活动

随着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的不断东来，我国与西方的物质和文化交流的与日俱增，西方的生物学知识也逐渐传到我国。最初传进来的是人体解剖学知识。明末来华的著名传教士邓玉函(J. Terrenz 1576—1630)曾著《人身说概》，比较系统地向我国介绍了当时西方的这方面的知识。随后在清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 Paremin 1665—1741)也曾向康熙介绍过当时的西方解剖学知识。而此期间，另一些西方人编写的《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狮子说》、《鹰论》、《职方外记》等等，也零星地向我国传播了一些西方的动植物学知识。

1858 年，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和我国著名学者李善兰合作编译了《植物学》，这是我国第一本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著作。它比较全面地向我国传播了当时新的植物学基础理论知识。全书分为 8 卷，约 35000 字，有插图 200 多幅，主要内容包括植物的地理分布、植物分类方法、植物体内部组织构造、植物体各器官的形态构造和功能、细胞等等。此外，书中还述说了雌、雄蕊在生

殖过程中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善兰用了很多较好的植物学名词和术语来翻译西方的植物学内容。这些词有些是沿用以前的,有些则是他创造的。如描述植物形态和组织的花瓣、萼、子房、心皮、胎座、胚、胚乳和细胞;分类等级的“科”,以及各种科的名称,如伞形科、石榴科、菊科、唇形科、蔷薇科、豆科等。上世纪末我国还出现一些传播西方生物学的小册子,如《植物图说》、《植物学须知》和《动物学须知》。当时会文出版社出版的《普通百科全书》也有《植物新论》、《霉菌学》、《植物营养论》等一些有关生物学的书籍。另外,1876 年创刊的我国最早的一种自然科学期刊——《格致汇编》,也曾刊登过一些有关动植物学的文章。总的来说,自明末起,西方生物学知识虽然开始在我国有所传播,但内容简单,影响不大。尽管如此,应该承认它还是起了启蒙作用的。

另一方面,西方人到我国后,出于商业和学术等诸多目的,千方百计地从我国收集有关生物资源的情报资料,并进而大举在我国收集动植物种苗和标本。像上面提到的传教士韦廉臣就曾在我国的东北收集过植物标本。他们的这种举动,既给西方带去了大量的生物资源,也大大促进了西方生物科学的发展,并且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加速刺激了我国近代生物学的萌芽。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生物种类众多的大国。因此,当明末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等各色人物一踏上我国,马上注意到我国生物资源的丰富,动植物种类的繁多。首先是传教士想方设法搜集动植物资源的资料,与此同时,他们和当时来华的商人一起将所能得到的各种动植物种苗送回西方。稍后,不仅传教士和商人,许多来华的军人、外交使团人员、海关官员、旅行者、探险者都曾

在我国采集动植物标本。著名者如法国传教士谭微道(A. David)、赖神甫(J. M. Delavay)、法盖斯、苏里和韩伯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英国驻华领事人员汉斯、郇和、东印度公司雇员福群,一些大的花木公司和植物园派出的威尔逊(E. H. Wilson)、福雷斯特和进入我国海关的韩尔礼(A. Henry);俄国军人普热瓦尔斯基、普塔宁、科兹洛夫,植物学家马克西姆维兹、科马洛夫;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的安得思、蒲伯,美国农业部雇员梅耶、罗克;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植物学家史密斯;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H. Handel-Mazzetti)等都在我国采集过大量生物标本。这些标本材料的研究整理,对世界生物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我国以后生物学的发展也有相当的影响。这体现在一方面它为我国后来的生物分类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的模式标本流落在外,而对其进行研究定名的原始文献也都在国外,这使得我国自己的分类学家进行相关的研究时困难重重。

第二节　国人介绍和引进西方生物学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我国的统治阶层初步意识到我国的落后,于是,不得不搞点"洋务",翻译些西方书籍,显示出一些输入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要求。随之便出现了一些翻译和传授西方科技知识的机构,如1862年清政府开设的京师同文馆,后二年又分别在上海和广州两地设立广方言馆。1866年,设福州船政学堂。次年又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内设上海机械学堂。1874年,还有西方人倡设但有部分中国人参加的格致书院。但是上

世纪这些学堂以及稍后成立的一些学堂主要教授外语、工业技术或军事，基本与生物学无关，只有1893年湖北设立的自强学堂设有博物科，讲授动、植物课程。① 但由于师资困难等原因，于1897年停办。

1897年创刊的《农学报》是我国最早的一种传播农业科技的专业刊物。此刊出版时间长达10年，共出版了315期。在《农学报》上刊出的文章主要是译文，有不少与生物学有关。如《论橡胶》、《植物始产诸地》、《论稻中成分之转移》、《论植物吸取地质多寡之率》、《阿芙蓉考》；日本宇田川榕庵编译的《植学启原》，松村任三的《植物学教科书》、《植物名汇》，以及《论益虫》、《普通动物学》、《日本昆虫学》等等。负责出版《农学报》的农学会还于本世纪初期翻译出版了一套《农学丛书》，其中有《森林学》和《造林学》等。

1903年，上海科学仪器馆钟观光等创办的《科学世界》，也刊载了一些传播生物学知识的文章。诸如《原生物》、《论动物学之效用》、《动物与外界之关系》、《人类与猿之比较》，及虞和钦的《植物对营养之适应说》、《植物受精说》、《植物吸收淡气之新实验》，虞和寅的《植物学略史》，虞翼祖的《有用植物及有毒植物述略》，胡雪斋的《植物营养上之紧要原质》等等②。

在本世纪初，介绍生物学知识比较多的有上海宏文馆薛蛰龙等办的《理学杂志》。其1906年发行的第一期中有神武的《说蚊》，公侠（即薛蛰龙）的《植物与日光的关系》（第二、三期连载），

---

① 李亮恭：《中国生物学发展史》，（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164页。

② 谢振声：《上海科学仪器馆与〈科学世界〉》，《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2期。

仲篪的《野外植物》(第二、三、四、六期连载)，侠民的《植物学语汇》(第二期连载)。第二期有金一的《人猿同祖说》，公侠的《论动物之本能与其习惯》。1907 年继续刊出的第三期有金一的《蚕性说》，公侠的《我国中世代之植物》，志群的《植物园构设法》(第四、五期连载)。第四期有松岑的《动物之彩色观》、《拔克台里亚(细菌)广论》。第五期刊有十九世纪 5 位德国植物学家的照片，登载了清任的《蚕体解剖学》，国城的《植物品种之改良》，公侠的《昆虫采集之预备》(第六期连载)，《十九世纪德国植物学家略传》，《植物研究会缘起》。还节录了福勃士和赫姆斯莱的《中国植物名录》的部分内容编成《中国植物之种类》。第六期有凤尾生的《生物之道德观》，仲篪的《养蚕谈》以及《犬与狼及豹之关系》。据《植物园构设法》一文介绍，至迟在 1906 年，京师大学堂已设有植物园。

1909 年，金陵大学创办的《金陵光》、1910 年中国地学会创办的《地学杂志》也刊出一些生物学方面的文章，如植物学家钟观光的 10 篇"旅行采集记"就是在《地学杂志》中刊登的。很显然，在本世纪的前十年，一些有识之士已进行了力所能及的铺垫工作，除较系统地介绍各种生物学知识外，主要体现在已有初步的组织，注意到植物学术语，设置了研究实习用的植物园，并传播了野外动植物实习采集的一些基本知识。热心的推进者还开始介绍生物学史，以引起公众更广泛的兴趣，促进生物科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有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学生可能开始采集植物标本。

当然，稍后几年一些与生物学关系更加密切的科学杂志更多地涌现。1914 年，由中华博物学会创编，商务印书馆印行的

《博物学杂志》开始出版。1915年,中国科学社主编的高质量自然科学期刊——《科学》开始刊行。此刊从一开始就登有大量的生物学文章。1918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学会创办了《博物学会杂志》(后改名为《武昌师范大学博物学会杂志》,1924年又改名为《生物学杂志》)。五四运动以前,许多一般性的杂志,如《东方杂志》、《中华学生界》、《妇女杂志》也都刊行过一些生物学的科普文章。如1913年的《进步杂志》和1915年的《东方杂志》都刊登过介绍孟德尔遗传学说的文章。显然,在本世纪的前二十年,无论是刊登生物学文章的杂志数量,还是生物学文章本身的数量都比上个世纪大大增加,而且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进入本世纪,有关生物学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用书也有所增加。1905年峨嵋教育部出版了由黄明藻编写的一本小书——《植物讲义》。1906年,山西大学也翻译出版了《植物学教科书》。上海宏文馆等书局出版了供中学用的《动物学》、《植物学》教材及《博物学大辞典》等参考书。1908年,京师译学馆教授及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场长叶基桢编写了《植物学》。191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奚若等人翻译的《胡尔德氏植物学教科书》。1918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马君武编译的《实用主义植物学教科书》,此书大部分取材德国施迈尔(Schmeil)的《植物学》(Lehrebuch der Botanik)。全书421页。分为(一)总论:第一章、细胞学,第一节、细胞概论,第二节、细胞之内容,第三节、细胞膜,第四节、细胞团体;第二章、植物形态学及生理学,第一节、叶之形态及生理,第二节、根之形态及生理,第三节、茎之形态及生理,第四节、花之形态及生理,第五节、果实和种子之形态及生理。

(二)各论:第三章、植物分类学,第一节隐花植物,第二节显花植物。全书有图 356 幅。[①]

1918 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植物学大辞典》。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在 1905 年前后即着手编写。除作为主持人的著名学者杜亚泉外,留学日本归来的植物学者黄以仁大约是主要的编辑人之一。1917 年,蔡元培曾在《东方杂志》发表该书的序言,文中指出编者们“有感于植物学辞典之需要,而商务印书馆乃有此植物学大辞典之计划,集十三人之力,历十二年之久,而成此一千七百有余面之巨帙。吾国近出科学辞典,译博无逾此者”。杜亚泉在书中的序言写到该辞典的编著的缘起和目的。他写道:“吾等编译中小学校教科书,或译自西文,或采诸东籍,遇一西文之植物学名,欲求吾国固有之普通名,辄不可得,常间接求诸东籍……故其计划不过作一植物学名与中日两国普通名之对照表而已。既而以仅列名称不详其科属、形态及应用,则其物之为草为木,为果为蔬,茫然不辨,仍无以适用。吾等乃扩张计划,而系之以说,附之以图。”从中不难看出编者的良苦用心。

《植物大辞典》包含植物名称和植物学名词 8980 条。每种植物之下给出中文名称、拉丁学名和日文名称。该植物的形态描述,产地和用途,以及别名的考证等。还附有插图 1000 余幅。植物学名词之下则给出对应的英文和德文。书后还附有拉丁学名和日名的索引。很显然,这本植物学辞典对于普及近代植物学知识、推动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发展意义深远。

---

① 王宗训:《近代植物学史总论》,载汪振儒主编:《中国植物学史》,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1—143 页。

第三节 生物学教育和科研的始萌

1902年,京师大学堂创立师范馆,目标是培养“中学堂的教员”。教学的内容分四个门类,其中第四类(博物类)为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和矿物学,授课教师是日本人。1904年,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1907年,原师范馆第四类有24人毕业。1908年,京师大学堂的优级师范科改为优级师范学堂。课程设置与原来类似,第四类的主要课程是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其次是矿物学和农学。在这以后,许多省份都先后设立了优级师范学堂,也有类似上述的课程设置。[①] 此外,京师大学堂还曾开办过博物实习科简易班,于1907年招生。重要课程分为三类:(1)制造标本,专以制造动植物标本为能事。其中又分剥制、解体、卵壳、骨骼、昆虫、切片。(2)图画。(3)模型。当时的教师大多为日本人。据说在1906年的时候,京师大学堂开始设立了供教学实习用的一个植物园。这可能是我国近代植物学意义上的第一个植物园。[②]

民国初年,前清时期的优级师范学堂都改为高等师范学校。教育部在全国分区设立的7所高等师范学校和另外6所省立的高等师范学校,大多设立了包含生物学的博物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12年成立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该校将原第四类设置改为理科第三部,后来又改为博物部,聘请出国归来的留学生任

① 薛攀皋:《我国生物系的早期发展概况》,《中国科技史料》,11(2)—65,1990年。

② 以益:《植物园构设法》,《理学杂志》1907年第3期52页。

教。其中有博物部动物学教授兼主任、人类学家陈映潢，植物学教授彭世芳，以及蒋维乔、吴续祖、张永朴等。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雍克昌、孔宪武、张作人、陈兼善都是该校早年的毕业生。1913年成立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博物部，是次年植物学家张珽从日本留学回来才设立的。在这里任教的还有王其澍、王海铸、薛德焴等。生物学家何定杰和辛树帜是该部的第一届和第三届的毕业生。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该校未设博物部，但从1917年开始设有农业专修科，由留学美国的农学家邹秉文任主任并讲授植物学。从1919年开始，从美国留学回国的胡先骕、秉志、钱崇澍都曾在此授课。虽其任务主要在培养农业院校的师资人才，但其基础学科也是动植物学。该校后与东南大学合并成立了生物系。该科的前两班学生分别于1920年和1921年毕业。其中不少后来成为著名的农学家和生物学家。如金善宝、冯泽芳、王家楫、伍献文、寿振黄及严楚江等。广东、成都及沈阳的高等师范设立博物部晚一些，但最迟的到1918年都已招生。1923年以后，这些学校都改为大学，为我国的生物科学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1917年，北京大学也设立了生物学门（后改系），教授有留学法国归来的李石曾和谭熙鸿，以及钟观光。其后金陵女子大学也于1920年成立了生物系。

上面的论述表明，我国生物学教育的形成，主要依靠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末开始，为了国家的富强和发展，我国有许多青年出国留学。正是早期我国这一批批留学人员把西方的近代科学引进到我国，并使之在我国立下根基和得到发展的。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出国留学的以去日本的为多。其中有不少是学林学和生物学的。如林学家陈嵘和梁希

都是1906年留学日本的学生,差不多同一时期留学日本学习植物学和动物学的大约还有黄以仁和张珽及张巨伯等。但自本世纪的1907年以来,留学美国和西欧各国的学生也迅速增加。其中学农林生物的人也不少。如1907年,韩安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学林学,并于1911年获林学硕士学位。次年,邹树文亦至康奈尔大学学习昆虫学。1909年,秉志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生物系)学习,并于191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与他同年出国留学的金邦正和凌道扬则分别在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得林学硕士学位。1910年和1912年,钱崇澍和胡先骕也先后到美国留学。较早到西欧留学学生物的有去法国的李石曾等。早期这批留学生大多怀着满腔的报国热情求学,学成归来后,如前所述,成为我国的生物学教育和科研的中坚力量,为我国的生物科学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大约在1907年的时候,有人即在上海成立过植物研究会[①],但没有什么影响。1915年,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胡达、秉志、过探先、金邦正等人在美国纽约州的伊萨卡成立了中国科学社。该社的成立在我国近代科技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对于我国的生物学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年,他们还创办了《科学》期刊。1918年,科学社总部从美国迁到中国的南京。

在我国最早进行生物标本采集的可能是留日学者黄以仁,他于1910年前后在江苏和山东采集过植物标本,而且曾将标本送到日本请有关的专家鉴定,1911年日本的《植物学杂志》发表

① 公侠:《植物研究会缘起》,《理学杂志》1907年第5期,9~10页

了这批标本的鉴定文章。黄采的标本数量不多，且送到国外，所以在国内没有什么影响。从 1911 年开始，钟观光先生也开始采集植物标本，他是我国学者自己大规模采集植物标本的第一人。1916 年，钟观光在北京大学任副教授，这给他提供了更好的考察、采集和研究植物的机会。从 1918 年开始，他带着数名助手，先后到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安徽、江西、浙江、湖北、四川、陕西、河南、山西等省作了 4 年多的生物学采集，历尽艰辛，共采得蜡叶植物标本 1.6 万多种，计 15 万多号；动物标本数百种；以及大量的植物果实、根茎和竹类等。为创建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农学院的标本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我国的学者主要进行的是传播和吸收近代生物学的工作。但也有一些学者也开始发表研究论文。如秉志于 1915 年发表的《加拿大金杆草虫瘿内的昆虫》；钱崇澍于 1916 年发表的《宾州毛茛的两个亚洲近缘种》；胡先骕 1915 年发表的《菌类鉴别法》。一些学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局部地方动植物名录的编写工作。1914 年，吴家煦发表了数篇的《江苏植物志略》，1918 年至 1923 年间，张珽发表了十余篇的《武昌植物名录》；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发表了广东和浙江一些地方的植物名录等等。

总之，在 1915 年前后，随着我国一批在海外受过良好生物学教育的留学生的学成归来，及与像钟观光等国内成长起来的富于创业精神的生物学家的共同奋斗，使我国近代生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他们教书育人，普及生物学知识，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的生物科学人才；他们带头考察、采集生物标本并进行开创性的生物学研究工作；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科学救

国”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切磋学术,为祖国的生物科学事业努力奋斗。正是这批人,在这一时期为我国近代生物科学奠定了基础。

第四十章　医　药　学

1840年以后，西方文化大量涌入，西方医学也随之蜂涌而至，并逐渐发展，终于成为我国一支重要的医学力量，从而与我国固有的传统医学——中医学形成对峙的局面。这种局面充分显示出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点，也显示出这种社会医学的独特的性质。

第一节　传统医学的缓慢发展

清代以来，由于封建保守思想的极端发展，中医的发展是极为缓慢的，有些方面甚或停滞不前。

医学文献学

在尊经复古之风的影响下，医学考据之风盛行，对前代重要经典著作进行了大量的文献学研究，包括考证、校勘、注疏及辑复等，并出现了一大批文献整理性质的著作，如类书、全书、丛书等一类作品。

作为最重要的经典作品《黄帝内经》，是受到最多注意的一

部医经。这一时期,有关《黄帝内经》的考证、训诂、注疏及校勘等著作层出不穷。如著名考据家、经学家俞樾,对《内经》做了48条经文的考证,后经他人集为《内经辨言》(1850年)。另一考据家陆懋修则著有《内经难字音义》、《内经音义稿》等等,对该经的难字进行训诂和考据(1866年)。其他尚有胡澍的《黄帝内经素问校义》(1880年)、高玉章等的《素问直讲》(1867年)。除了一般的注疏训释之外,还有一类是对《内经》中某些专题进行研究和发挥的。如廖平曾辑有《六译馆医学丛书》(1913年),共辑有5种有关《内经》的评注及考释。对《内经》中运气学说的研究则更多,包括陆懋修的《内经运气表》、《内经运气病释》,薛福辰的《素问运气图说》、陈在山的《运气举要》、高思敬的《运气指掌》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当然,在西医学思潮的影响下,也有少量开始用一些初步的西医知识对《内经》进行阐释的。如唐容川的《医经精义》(1892),就属于这一类,但由于其对西医的了解有限,故其见解的新义也十分有限。

这一时期,对另一部医经《难经》也做了一些文献学的整理工作。如叶霖的《难经正义》(1895年),对原著进行了校注,并参照以往注家的内容作了发挥。王廷俊的《难经摘抄》则整理和保存了原著的面貌,对后世研究该书有一定参考价值。

对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由于其在临证中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研究者不乏其人,较清代以前有明显的增多,有的还提出不少新的观点和见解。例如,陆懋修的《校正王朴庄伤寒论注》、高学山的《伤寒论尚论辨似》,都提出个人的新见解,以与其前代的注家进行商榷质疑,各不失为一家之言。应当提出的是,由于受西洋医学思想的影响,有些医家提出以中西医汇通

的思想对《伤寒论》进行发挥和重新评价。其中以中西医汇通大家唐容川最有代表性。他的《六经方证中西通解》(1884 年)、《伤寒论浅注补正》(1894 年),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而对《金匮要略》一书进行整理和发挥的,则有陆懋修《仲景方汇录》、杨希闽的《金匮百七十五方解略》、王介庵的《金匮平脉辨脉汇编》等。当然,也不乏对张仲景这两部书进行综合研究者,如胡嗣超的《伤寒杂病论》和李缵文的《订正医圣全集》,都属于这一类。

医案和医话这两类著作的整理出版,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特点。医案大致有两类:一是整理个人临证心得,一是把他人主要是前代医家的验案加以收集。前者如温病学家王孟英的《王氏医案》。此书包括《回春录》、《正续编》、《仁术志》、《三编》等;还有《王旭高临证医案》、《马培之外科医案》等。后者则有柳宝诒的《柳选四家医案》、罗定昌《医案类录》等。在医话方面,陆以湉的《冷庐医话》最为著名,五卷中包括医范、医鉴、慎疾、慎药、保生和诊法、用药,最后还集有历代名医的验案,以病证为纲,此书对后世颇有影响。柳宝诒的《惜余医话》,也属于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编纂大型的医学丛书、全书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其中著名的有陈修园的《南雅堂医学全书》。陈氏的著作文字较为通俗,为一般医家所乐于接受,切于实用,流传颇广,后世书商常于其中加入其他医家著作而形成《陈修园医书二十一种》,或四十种、六十种甚至七十二种者;而陆懋修的《世补斋医书》、周学海的《周氏医学丛书》、邹汉璜的《邹氏纯懿庐集》、雷丰的《雷氏慎修堂医书三种》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另有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等,则是中西医汇通方面的丛书。在全

书方面，本阶段末期有《医学易知》，又称《医学捷径》，全书包括医药及临证各科内容共 14 种，比较全面。

临 证 医 学

尽管这一阶段的临证医学发展缓慢，也比较平淡，缺少突出的成就可言，但仍有少数医家值得一提，其中费伯雄及王孟英两人较有成就。费伯雄(1800—1879)为江苏武进孟河人，幼时聪颖过人，人称“神童”，因其医名而曾奉召进京为道光帝及其太后治病获效而名噪一时。他曾著有《医醇》一书，自认为所言皆醇正不杂。后因战乱，其稿毁于兵火，及至晚年，仍凭记忆，追记原书内容，与原稿相比，“不及十之二三”[①]，遂取书名为《医醇賸义》。其医疗思想以师古而不泥于古，“巧不离乎规矩而实不泥乎规矩”[②]，对内科杂病颇有发挥，如仅以“火”证一门，就列出十多种火，除内脏火证外，还提出诸如毒火、郁火、痰火、邪火、湿火、风火等一类火证，论证较详。王孟英主要贡献为温热病，其著作《温热经纬》等有不少创见。其先著成之《霍乱论》，经二十余年之实践，于晚年增补成《随息居重订霍乱论》(1862 年)，认为霍乱一证有时疫与非时疫之别，指出大流行之原因乃“人烟繁华，地区愈热，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廓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③]之故，这是很正确的。治疗则分寒热两大类。此外，王旭高的《肝病论治》，也是这一时期较有影响之作。

---

① 费伯雄:《医醇剩义》。

② 《孟河四家医集》。

③ 《霍乱论·热证》。

在外科方面，中医外科至这一时期主要集中于外治法。马培之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的治疗特点是强调外证不能只着眼于局部，而要内外兼治，在使用古代各种丸、散、膏、丹等从内而治之外，还用刀针相结合，内外并举，具有辨证论治的整体观思想，主要著作有《马评外科全生集》、《外科传薪集》及《医略存真》等。另一外科医家为吴尚先，更确切一些应称为外治法医家。吴尚先(1806—1886)字师机，为杭州人，他从事外治法研究长达20年，提倡不论内、外、妇、儿各科之病证，均可以外治薄贴(膏药)之法治疗，并罗列出枕药、捣涂、掌摊、绢熨、点眼、纳脐、卧砂、围炉等多种外治方法，提出“凡病多从外入，故医有外治法……矧上用嚏，中用填，下用坐，尤捷于内服”①。其治疗心得经反复记录修改，著成《理瀹骈文》一书，别树一帜，对后世颇有影响。

这一时期出现的张振鋆《厘正按摩要术》，对于用手法治疗小儿科之病证颇有发挥，且全书图文并茂。书中还提出按摩时，尚需兼用服药，内外同治。儿科方面值得提出的是已开始传播西方引进之牛痘接种，并认为痘疮是一种疠气，即烈性传染病。

在妇产科方面，潘蔚的《女科要略》，对胎前产后病证，尤有心得，提出“胎前则顺气安胎，产后则扶虚消瘀”，确是的论。另一医家单南山，强调胎产病之治则是“胎前专以清热补脾为主，……产后专以大补气血、兼行滞为主”②，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阶段在喉科方面有一定的进展，主要是由于多次喉痧大

---

① 吴尚先:《理瀹骈文》。

② 单南山:《胎产指南·女科总论》。

流行,遍及全国,为害甚烈。为了探索此证的诊治,不少医家致力于喉证的鉴别。盖因喉证种类多,有急缓轻重之分,此时流行之喉痧,实为现时所指之白喉,医家多致力于其鉴别诊断。著名的专著有沈善谦的《喉科心法》、夏春农的《疫喉浅论》,对喉痧则分其初起及病情变化,因证施治,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中药学和方剂学的进展

传统中药学源于《神农本草经》,历代虽出现不少新的本草学著作,但对本经至此时期仍有不少人致力钻研。本时期顾观光对《神农本草经》的辑复,是历代诸辑复本中较好的一种。由于顾氏是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史基础的文人,后来又专志习医,他整复《神农本草经》就具有比其他人优越的条件。他认为:"大率考古者不知医,业医者不知古,遂使赤文绿字,埋没于陈编蠹简之中"①,因而根据他的文史修养,从《证类本草》、《本草衍义》、《抱朴子》、《博物志》、《太平御览》、《本草纲目》等有关著作中辑出365种中药。他明确提出他辑复此书的目的是"为考古计,非为业医计也"②。因此,此辑本是一部比较理想的辑本,具有较好的文献学价值。

正如历代本草学的发展过程所示,这一时期虽比较短暂,仍然有一些本草学家依照历代本草学者的惯例,根据个人用药的体会与经验,重新编纂本草著作。如屠道和的《本草汇纂》和周岩的《本草思辨录》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

①② 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自序》。

《本草汇纂》(1863年)的编纂，是综合了不同的分类方法进行的，全书共收药560种，以药物的药性为分类依据，计分成31类，即温补、平补、补火、滋水、温肾、温涩、寒涩、收敛、镇虚、散寒、驱风、散湿、散热、吐散、温散、平散、渗湿、泻湿、泻水、降痰、泻热、泻火、下气、平泻、温血、凉血、下血、杀虫、发毒、解毒、毒物。书中又以其自然属性另分出谷、菜、果、禽兽、鳞等五部。在另一卷中，则又仿古代通用药之例，以病为纲，每纲之下列所用药物，计依五脏六腑各脏器所受之病证包括风、寒、暑、湿、燥、火、热、痰、气、血、积、痛等，列200余种病证，各证均列所用之药物。因此，本书是一部切于实用，取诸家之长的本草著作。《本草思辨录》为周岩所作，刊于1904年，作者对128种常用中药之临证应用，依据其个人经验，进行了详细的辨识，其立论主要从张仲景之《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中的方剂的方意加以发挥，颇有个人见地，具有时代特色。

中医的方剂，具有独特的品格，主要以复方为多。每一个时代的方剂，既有继承前代行之有效的旧方经方，又有自创的新方。迨至近代，历经数千年之考验，方剂以千万计，但行之有效的常用方，也并不特别多。清代名医汪昂于1682年所著之《医方集解》，主要系收集其前代一些验方，加以通俗化的解释，便于医家们推广应用，的确起到很好的普及作用。经过200年左右的实践，诸多医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至本阶段，名医费伯雄又著成《医方论》(1865年)，书中除肯定了《医方集解》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外，他又发挥了师古不泥于古的精神，对该书中若干方剂之弊病作了无情的批评，如认为书中对李东垣的麻黄白术汤可治六经之各种病证不妥，评以“未闻可以六经通治也”。对书中

所用其他古方,如朱丹溪越鞠丸、刘完素防风通圣散等等,也都批评时人滥用套用《医方集解》之弊,劝诫人们:"古人立方,不过昭示大法",要灵活运用,不可泥古不化,"方能得古人之意"①,确是击中时弊的中肯之言。

这一时期另一重要方剂学著作是鲍相璈的《验方新编》(1846年)。此书收集民间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剂共3200余首,分92门罗列,其中不乏颇有效验的方剂。

第二节　西方医学的传入

西方医学,又称西洋医学,一般简称为西医,是指西欧在文艺复兴以后,在近代实验科学的武装之下,发展起来的医学体系。与我国固有的传统医学相比,它是另外一个医学体系,从理论体系、思想方法到研究途径等方面,都与中医不同。由于它是近代实验科学的体系,属于直观的、量化的研究和分析体系,易于为人们理解和观察,被认为是科学的,因而在我国近代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事实上,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早在十六世纪,就已经有西欧的传教士来华传播西方近代科学,包括西医。如意大利的利玛窦、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艾儒略(Julius Aleni)和瑞士的邓玉函。其中邓玉函就译有《泰西人身说概》,其他人也译述了《人身图说》、《钦定格体全录》等,但在我国影响很小。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我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获得

① 《医方论》卷2。

许多特权,西医也如潮水一般涌入我国。

传教医士的初期活动

就在鸦片战争的前夕,西欧来华的传教士,已经成倍增长。他们深知用医药的方法,比用枪炮更容易使中国人屈服,所谓"当西方大炮不能举起一根横木时,他以一把手术刀打开了中国的大门"①。这里的他,是指美国传教医士伯驾(Peter Parker)。他于1834年来华,在澳门、广州等地开诊所行医,并且抓住每一个机会宣传西方的科学和宗教,以扩大其市场和影响。他也曾千方百计想为当时两广总督林则徐治病并接近他。伯驾由于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效果而为西方统治者所赏识,最后升任为美国驻华公使。

初期的医疗活动多注重外科、眼科,这些疾病较易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当时来华的传教医士还有东印度公司的李文斯敦(Livingstone)、郭雷枢(T. R. Colledge)等,都是外科医生。尽管他们竭力扩展其工作,但早期的影响很小。

建立诊所和医院

1840年以后,各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地在我国开办诊所和医院,业务逐渐开展,影响也随之扩大。

最早的教会医院是由伯驾1842年在广州开设的眼科医院,

① 《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 vol. 14, p. 231。

10多年后，伯驾因就任外交职务，其医院改由另一美国传教医士嘉约翰(J. G. Kerr)主持。此医院前后存在约14年。

影响较大，历史较长的教会医院是嘉约翰主持的广州博济医院。博济医院开办时也是业务清淡，后来，医院聘请了中国人做助手，使业务便于开展。先后在这里工作的早期华人有关杜亚、黄宽、伍亚忠、杨英等。医院主要开展外科手术，并先后应用乙醚及氯仿于麻醉，仅嘉约翰一人在该院进行的手术就有4.9万例。

这一时期的教会医院，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最早的教会医院或诊所，都是在五个通商口岸建立的，大约从1842至1848年短短五六年间，共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建了7所。1856年的天津条约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使我国向帝国主义列强毫无保留地敞开了大门，从1860年开始，到十九世纪结束，教会医院已遍布全国，包括台湾省；甚至象陕西汉中这样的内陆城市和福建的霞浦这样的沿海省份的偏远小城，都有教会医院的踪迹；总数已经满100所。

培养和吸引留学生

西方教会除了就地吸收中国人到教会医院进行培养外，在这一时期还开始吸引较多的中国人到西方留学，以培养较全面而且正规的西医人才。

早期赴国外留学习医的，以广东的黄宽为最早。他先到美国获文学士学位，后于1850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于1857年回国，在香港、广州等地开设诊所、医院，

还兼任医院附校教员，大量培养医学人才。我国第一位女留学生为浙江的金韵梅，1881 至 1885 年在美国习医，回国后在厦门、成都等地行医办学，并创办我国早期护士学校，培养护士人才。

除了英、美等国而外，也有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医。我国早期的民主主义者如秋瑾、鲁迅等人，早年都曾经到日本学医，如鲁迅就曾在日本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就读。

总之，这一阶段是西方医学以培养西医人才的方式吸引我国留学生的开始阶段。我国早期的主要西医人才，都是在这一时期出外就学的。如中华医学会的一些创始人，包括伍连德、颜福庆、俞凤宾、牛惠生、牛惠霖、汤尔和、阎德润以及一些女医人，如甘介侯、石美玉等，甚至还包括最早的留洋护士钟茂丰，都是在这一时期出国留学、学成后再回国行医、办学，大大地扩大了西医在我国的影响。

编译医著

为了普及并加速西医的传播，一些来华的西方传教医士还十分重视利用出版物作为工具，扩大影响。

在这方面工作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人。

合信(Hobson)：英国人，他从 1850 年就开始用中文编译一些西医书，其中最早的有《全体新论》，是一部主要阐述解剖学的书。其他还有《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另有一部介绍自然科学一般知识的《博物新编》，后人将这些书合编为《合信氏医书五种》。这些是西医著作译成中文的滥觞，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嘉约翰:他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先后编译了一些西医著作,共有 30 多种,较偏重于临床方面及西药的介绍,如《西药略说》、《药物学手册》、《割症全书》、《炎症论说》、《内科全书》等等。他对精神疾病还有较深入的研究,除创办精神病院外,还发展用西医药治疗精神病人经验的学术论文。

德贞(John Dudgeon),这位美国传教医士比较重视生理解剖学的编译工作,编有《全体功用》、《全体通考》等,都附有图解。他还编有《医学词汇》6 卷,对于统一西医药的名词术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他有关的临床著作还有 10 多种。

傅兰雅(John Fryer),英国人,也编译有 10 多种西医西药著作,如《儒门医学》《西药大成》和《英国洗冤录》(《法医学》)等。

第三节 中西医汇通派的产生

本历史阶段西医的输入,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西医作为一门科学,在保障我国人民的健康方面,是有其客观上的积极意义的。由于我国传统医学与西医学在思想方法及研究方法上,并不属于同一个体系,而是各有特点,因此,客观上就形成了两个不同体系的医疗系统。

面对这种客观形势,如何对待外来的西医,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这里,有拒绝接受和排斥的,有全盘接受的,但最具代表意义的却是一种折衷的思潮,也就是所谓中西医汇通的思潮,这种思潮是近代中国文化在医学上的反映,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实，在明末清初，西医学已经开始对我国医学界产生一些影响。有些医家已在自己的著作中收入一些西医的片断知识，如方以智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收入一些西医的药物和解剖生理内容，但尚未形成中西汇通的思想。经过一二百年的接触，尤其是鸦片战争后教会医学的大量传播，终于促成了中西医汇通思潮的形成，并成为近代医学史上的一个学派。

中西医汇通学派的思想也并不完全一致。有的是出于维护中医的利益，使中医仍能继续生存，向前发展；有的则是企望从汇通的医学中，创造一种尽善尽美的医学。在这方面，有两位代表人物值得提出。

唐宗海(1846—1897)，字容川，四川彭县人，医术高明，活人无数。在西医的冲击面前，他的思想产生极大的矛盾。他深知中、西两个医学体系互不相容，也认为西医与中医的医理及生理解剖方面，有一些相通之处，有必要加以融通。因此，他撰写了《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包括《中西汇通·医经精义》、《血证论》、《本草问答》等。他的主观愿望应该说是积极的，但从总的方面看，他对西医的观点并不全面，总认为西医在各方面皆不如中医。他认为古代中医不论在生理解剖，或医理阐释等方面，皆远远比西医高明，尤其是古代医经，认为西洋医学"与中国近医互有优劣，若与古圣《内经》、《本经》较之，则西洋远不及矣"[1]。这些论述也充分表现出他的保守思想，难于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朱沛文(十九世纪中、下叶)，字少廉，广东南海人。由于他出身中医世家，功底较好，且他亲眼目睹西洋医学在西医集中地区

① 《本草问答》。

广州的种种实情，深知两种不同体系各有短长，需互相学习，但却不能强合。他的这种思想集中表现在他1892年著成的《华洋脏象约纂》一书中。他相当重视人体脏腑形体及功用，并主张医家应亲验脏腑，而不能空谈名理。他认为中西两种医学体系，各有长短，有可相通者，有的则不能强合，而要“存其互异”。所有这些思想，可以说是比较进步的，比起唐宗海、朱沛文的思想可以说更为正确与先进。只是因为当时对西医的整体还缺乏全面了解，在思想上也还有时代的局限，难于取得汇通中西的突出成就，这也是不能苛求的。

第四十一章　科技社团与科研机构

第一节　科 技 社 团

中国最早的科技社团

中国之有科技社团早自明代始。明嘉靖年间，祁门人徐春甫在顺天府(今北京)成立了一个名叫“一体堂宅仁医会”的医学团体①。徐春甫为有明一代的名医，曾组织编写了医学巨著《古今医统大全》100卷。为切磋医术、增进医道，他邀集客居京师的同道，创立了这个医会。据《一体堂宅仁医会录》载，医会会员中有太医院院使、院判、御医、医官及户部郎中、吏部郎中、儒士、廪生等，还有徐春甫的门人，共有40多人，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大的规模了。由于《古今医统大全》一书的大量的校正工作是由医会会员完成的，而该书又是出版于“嘉靖丙辰”年，即1556年，因此“一体堂宅仁医会”至迟在1556年之前就已成立了。

在此后的3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科技社团一直没有得到

---

① 参见项长生：《我国最早的医学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中国科技史料》，1991年12(3)。

发展。直到十九世纪后期，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和西方文化的冲击等特殊的历史因素，中国科技社团才随着中国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

中国近代科技社团的建立

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的晚清最后十几年，是中国近代科技社团萌芽与创立的时期。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①。

第一阶段：维新变法时期。在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鼓动下，京师、上海等地和湖南、江苏等省，纷纷倡立学会，一时间，学会这个新生事物的出现有如雨后春笋。在维新派人士中，梁启超的作用十分突出，他在《论学会》这篇颇具鼓动性的文章中极力倡办学会，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呐喊，比他自己的身体力行还具号召力。在维新派人士的积极活动和直接参预下，各种学会纷纷建立并蓬勃发展起来。此时的学会有政治性的，也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二者兼而有之的，但其中科技社团或与科技有关的社团占大多数。这些社团多是地方性的，规模也较小，建立的速度快，但持续的时间都不太长。其形式有不少类似新式学堂，定期地进行科学讲演，并有简单的实验验示。主要的科学学科为算学、舆地、天文和声光化电等格致之学。

第二阶段：戊戌政变之后至清末。由于后党的高压，使有的

① 参见林文照：《中国近代科技社团的建立及其社会思想基础》，第七届国际科学史会议论文，1996年。

学会停止了活动，有的学会为避维新派之嫌而改换名称。虽然说学术性的学会受政治影响较小，而且风气既开，难以骤压，但势头已大为减弱，且又较少热心之人，因此戊戌之后的清末十余年，科技社团的发展速度相对减缓。不过这个时期也有少数的科技工作者，自身出于对科技社团的迫切需要，感到要尽可能地组织学会，以便切磋学术，交流心得。如1910年丁福保在呈请民政部批准成立中西医学研究会时就说，他们要自筹经费，纠集同志设立医学会，以研究有关医学各科，并将研究所得发表于中西医学报，借供远近医界之观摩①。这种由研究者自筹经费发起成立学会的做法，与戊戌维新时期的一哄而起的情形大不相同。

中国科技社团统计表(1895—1911)②

序号	名　称	时　间	地　点	主要发起人
1	强学会	1895	北京	康有为等
2	上海强学会	1895	上海	康有为等
3	译图公会(舆地学会)	1895	武昌	邹代钧
4	农学会	1895	广州	孙中山
5	务农会(农学会)	1896	上海	罗振玉等
6	医学善会	1897	上海	吴仲韬等
7	译书公会	1897	上海	恽积勋等
8	苏学会	1897	苏州	章钰等
9	测量会	1897	江宁	杨文会等
10	质学会	1897	武昌	
11	群学会	1897	广东	章炳麟等

① 《中西医学研究会上民政部禀》,《中西医学报》,1910(1),见《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参见林文照:《中国近代科技社团的建立及其社会思想基础》,第七届国际科学史会议论文,1996年。

(续表)

序号	名称	时间	地点	主要发起人
12	励学斋	1897	西安	
13	算学会	1898 前	福建	
14	显学会	1898 前	广东	
15	劝学会	1898 前	江宁	
16	地学公会	1898 前	湖南	
17	粤学会	1898	北京	康有为等
18	闽学会	1898	北京	林旭等
19	蜀学会	1898	北京	杨锐等
20	西学会	1898	北京	宋伯鲁等
21	南学会	1898	长沙	谭嗣同等
22	学战会	1898	长沙	黄萼等
23	积益学会	1898	长沙	张祁等
24	群萌学会	1898	浏阳	唐才常等
25	任学会	1898	衡阳	陈为镒等
26	舆算学会	1898	郴州	罗辉山等
27	蜀学会	1898	成都	宋育仁
28	励志学会	1898	江西	邹凌瀚
29	大清商业总会	1898		
30	算学日新会	1899 前		
31	瑞安天算学会	1899	瑞安	孙冲等
32	知新算社	1900	扬州	周美权
33	中国药学会	1907	东京	王焕文等
34	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	1907	欧洲	李景镐等
35	中国地学会	1909	天津	张相文
36	中华护理学会	1909	上海	信宝珠
37	中西医学研究会	1910	上海	丁福保
38	金山中西医学研究会	1911		
39	浦东医会	1911?	上海	刘镜蓉
40	江北医学研究会	1911?		
41	严陵医学研究会	1911	严陵	
42	植物病理学会	1911?		

注:此表系据《中国科学技术团体》及《中国科技史料》等书刊所做的初步统计,尚有待充实与进一步研究。

第二节 科研机构[1]

晚清的最后几十年是中国科研机构的萌芽时期。1872年，法国人在上海建立徐家汇气象台（含气象、地震、授时三个部分）。1885年，英国人在台湾基隆、淡水、安平、渔翁岛、鹅銮鼻等地建立气象站。

其后，清政府也开始注意建立科研机构。1898年，光绪下诏“兼采中西各法”振兴农学，并于京师设立中央负责农业的最高行政机构——农工商总局（1906年改设农工商部）。上海的育蚕试验场同期建立。1902年以后，直隶、山东、山西等地开始建立农事试验场。1906年3月，农工商部上书议设“农事试验场”时说：“泰西各国，罔不以农事为重。美利坚以农立国，富甲全球；日本维新以来，农事改良，遂致物产繁兴，工艺发达。近闻日本之福冈、北海道等处，均有试验场，或数百顷以至千顷，皆为劝农所设”，“京师为首善之区，树艺农桑为臣部所职掌，自宜择地设立农业试验场一所，以示模范”[2]。不久，农工商部便于京师西直门外建设农事试验场。直到清末，有关科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是在农业方面，而且主要的是政府行为。

① 参见林文照：《20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13(2)。

② 参见穆祥桐：《中国近代农业史系年要录》，《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3—4。

中国科研机构统计表(1911年以前)①

成立时间	地　点	机构名称
1872	上海	徐家汇气象台
1885	台湾	气象站
1898	上海	育蚕试验场
1902	保定	直隶农事试验场
1903	太原	山西农事试验场
1903	济南	山东农事试验场
1904	济南	山东林业试验场
1906	北京	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②
1906	大连	奉天农事试验场
1906	福州	福建农事试验场
1908	大连	奉天植物研究所
1908	天津	天津种植园

① 参见林文照:《20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13(2)。

② 1916年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改称为中央农事试验场。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通史．第11卷，中古时代．近代前编（1840-1919） 下册 20 修订本
作者=白寿彝主编
页数=1892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9
SS号=12508385
DX号=000007567252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567252&d=7554050134D0C17467AB467F3465E84C&fenlei=110301&sw=%D6%D0%B9%FA%CD%A8%CA%B7+%B5%DA11%BE%ED+%D6%D0%B9%C5%CA%B1%B4%FA